



# 麦克米伦回忆录

## 6

从政末期

商务印书馆

# 目 录

第一章	欧洲和英国 .....	1
第二章	暂时冻结工资的措施 .....	32
第三章	移民问题 .....	71
第四章	新人新政 .....	82
第五章	欧洲和英联邦 .....	108
第六章	核挑战 .....	139
第七章	战争边缘 .....	174
第八章	变化中的东方 .....	213
第九章	西南阿拉伯地区 .....	253
第十章	非洲的迷雾 .....	269
第十一章	法国的否决 .....	322
第十二章	财政措施 .....	367
第十三章	安全与丑闻 .....	408
第十四章	在莫斯科的突破 .....	439
第十五章	命运的打击 .....	470
第十六章	结束语 .....	502

## 第一章 欧洲和英国

1961年7月27日内阁同意让英国政府提出参加罗马条约的正式申请。为了着手进行各项谈判,以适应联合王国、英联邦各成员国以及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其它成员国的特殊需要,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假如这些谈判果真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希望六国共同体能够扩大,以便把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容纳进去。这项于四天后(1961年7月31日)向议会宣布的决定,可以视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希特勒的崛起使欧洲在仅仅一代人的期间,又一次受到互相残杀和毁灭性战争的威胁;我国的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就在那些生死攸关的年头里,发表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有预见性的言论。在论及美国的惊人发展之后,他预料还有更多这样的大国会应运而生。

到时候,……欧洲各国将会被半打的这样巨人所包围,而不是仅仅面对一个巨人。我们周围的这些巨人早已长得比我们还要高大;他们的巨大力量,都是从欧洲本身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媒介,源源流入他们躯体的生命力得来的。这些处于欧洲以外的大国,不是经过欧洲移民拓殖过的,就是被欧洲人所征服过的,或是经过欧洲商人所开发的,要不就是在精神上受到欧洲技术或是制度或是思想的影响而没有具体被欧洲人所侵入过的。但是不管经过如何,他们都由于被纳入西方文明范围之内而得到新生,而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泉源。这样——把一句名言颠倒过来——似乎我们欧洲人希望一个新世界得以诞生,其目的不是调整而是打乱旧世界的平衡。

他接着说,这种形势是政治家所面临的难题。

如果……处于中心的国家不采取预防行动，那末处于外围的大国就显然一定会单凭武力把它们压倒；这就是说，共同的文明创造者和维护者，将在政治上失去它们的主动权或是它们的独立，大权就会转到外边还不适宜于掌权的“蛮族”手中去。这将不仅仅是欧洲中央一些小国的政治灾难，也将是整个欧洲社会的文化灾难。无论从那方面说，为了大家的利益，都应该避开这场灾难；然而避免这场灾难的责任落在中央各国的政治家身上，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存在已受到威胁，应该由他们来采取行动；可是他们又怎样才能够完成任务呢？解决的办法显然在于设法把多元政治和政治斗争转变为政治上的融合和团结；但是这个奇迹又怎样才能达到呢？<sup>①</sup>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奇迹并没有马上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态发展使一个已经危险的局势提前好几年出现。可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具有先知想像力的人预见到了以后不可避免的演变。我早已谈到丘吉尔甚至还在严重斗争之际，已经就欧洲联合的必要性拟就一篇极端重要的文件，这种联合被看作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和文明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sup>②</sup>

战争一结束，丘吉尔即于1946年12月在苏黎世发表演讲，1947年12月“欧洲运动”也接踵而来。马歇尔计划作为一个伟大国家所从事过的最慷慨的义举，于1948年春导致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这是欧洲复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年以后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年5月，欧洲理事会在斯特拉斯堡召开。1950年5月，向西德发出了参加欧洲理事会的邀请，并且被接受了。这样这个运动大体是在英国的领导下，在含糊的、不符逻辑的形式下展开了。接着开始实行了有关煤炭和钢铁的舒曼计划，1951年4月，六个主要欧洲国家又签订了随之而产生的条约。可惜英国政府却决定不参加。以后几年，各国又忙于尝试组织所

① 阿诺德·托因比，见《历史研究》（1934年）第三卷，第304页。

② 《时来运转》原书第182页。



谓欧洲防务集团。虽然此举未获成功，然而由于外相艾登的发起，在1954年10月建立了西欧联盟，从而使各国能紧密合作。这个联盟容纳了一个复兴起来并且重新武装了的德国。

1955年夏，煤钢联营共同体的六个国家——法、德、意、荷、比及卢森堡——在墨西拿开会，讨论成立“共同市场”。次年（1956年）英国政府试图说服它的欧洲盟友去采纳一个包括西欧所有国家在内的工业自由贸易区的办法。如果当时这个计划取得成功的话，许多涉及英国农业以及我们英联邦伙伴们的主要利益的纠纷，都早已避免掉了。可是参加墨西拿会议的六国却于1957年3月签订了罗马条约，该条约于1958年1月1日开始生效。不过在这个期间，有关各国一直在进行谈判，当时极有希望使这两个欧洲集团的利益调和起来。不幸我国的建议最后在1958年11月被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所拒绝。<sup>①</sup>

于是我国就转而采取另一个看来是实事求是的办法，以便保护自己本身以及欧洲其它非共同市场成员的国家。1959年11月签订了一个包含七个欧洲国家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条约。可是我对于欧洲，即自由欧洲仅剩下来的部分，分裂为两个集团的情况深为痛心，为了西欧的联合，我在1960年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德国人的支持，去取得意大利人的同情，并且设法去消除法国人的持续的反对态度。

1960年末，在短短的圣诞假期中，我准备好了一份备忘录，并让其在同事们中传阅，其内容是关于自由世界的状况，以及把它的所有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组织起来，以抵御在全世界各处向我们逼近的威胁的必要性。这份文件被誉为“宏伟的蓝图”闻名于白厅，它是下一步努力的根据。我已经在1960年最后几个月中，试图争取肯尼迪、阿登纳，甚至戴高乐本人的个人支持。我感到眼前

<sup>①</sup> 参看《乘风破浪》，第三章及第十四章。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集中力量争取东西分裂的欧洲的西欧半壁的真正联合，这样就回到了几乎十四年前曾经鼓舞着欧洲运动创始者们的概念中去。

此事在国内牵涉到的主要具体困难是英国农业的前途问题。英国和共同市场国家都支持自己的农业，但其方式大不相同。必须同农业的领导人密切配合，进行深入而仔细的研究。所以我在1961年初就向内阁办公厅主任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叙述我同巴特勒的一次会谈——我是特别倚重他关于这些事务的判断的。

今天我在进午餐时同内政大臣〔巴特勒〕进行了详尽的商谈，并把我们在最近一直进行的事情向他作了极其简略的介绍。他似乎并不过分感到意外，他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建议。如果在六国和七国的问题上，我们能够做到几乎可以举行谈判的程度，他认为要是农场主协会主席、而且特别是官员们能参与商讨的话，其结果将会大不相同。我们一定要和他们配合。……他说他们的经济专家是很明白事理的，甚至颇值得现在就派人和他接触以作广泛的讨论。

新的农协主席作如此通情达理的谈话，是预先没有料到的，这使我很感兴趣。

5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农业部来进行。<sup>①</sup>

4月中旬，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后，我满意地指出，农业大臣“的确正在认真着手进行一项涉及欧洲农业问题的新研究工作”。<sup>②</sup>

两院中的保守党议员与农业有密切的利害关系，除了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来自这方面的具体反对意见和阻力之外，还有终于成为反对派的怀疑派，他们所以举棋不定乃是出于更传统性的考虑或者更为崇高的动机。要让如此悠久而密切地和大英帝国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保守党去接受新的环境，毕竟是要要求过高了。这种

---

① 致诺曼·布鲁克爵士的备忘录，1961年1月24日。

② 1961年4月13日。引自我的私人日记以及其他私人备忘录的话，均标明记录的日期。

新形势需要有一个新的概念，以便使英国在同欧洲联成一气的情况下较之她保持孤立并且注定要在世界上日益衰落的情况，更能有效地为英联邦和全世界的利益服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她在世界的财富和力量中的比重一定会萎缩下去。所以在提出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申请之前，显然首先要尽量推心置腹而详尽地和英联邦成员国政府进行磋商。上一年秋天（1960年9月20及21日），在伦敦举行英联邦总理会议期间，曾经有过几次纯属试探性的会谈。但这些都是十分小心翼翼的方式下进行的。

2月27日，被内阁授以全权的掌玺大臣希思告诉西欧联盟的部长理事会说，英国准备考虑“根本改变”它对共同市场的原则立场，并准备在得到六国一致邀请的情况下参加同它们的政治磋商。所以我国至少应该决定自己准备怎么办，这一点成了当务之急。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即至少在英联邦各国中间实行初步试探之前，我几乎无法催促我的同僚们去采纳如此新的而冒险的方针，可是除非我们内阁成员已经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很到家，<sup>6</sup>从而使我们自己确信，参加欧洲集团会使英国的力量 and 影响最终得到有利于英联邦本身的增长，否则同英联邦国家的这些磋商将会一无结果，而且甚至会有害处——欧洲集团本身就是战后世界所发生的某些困难的产物及其治疗药方。

不巧在3月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几乎全神贯注于南非联邦的问题，甚至就这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举行非正式商谈的机会都没有。我在访问华盛顿后，于1961年4月13日把肯尼迪政府的态度告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回国途中对渥太华作了短促的访问，有机会同加拿大总理讨论欧洲的问题。我在写给孟席斯和霍利约克的信中说明，肯尼迪政府看来比其前任更勇于承认欧洲在政治上进一步分裂的种种危险。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英国既参加六国的经济联盟，又参加政治联盟那就更好了。在经济上的得



失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把这一点同自由世界所面临的更为重要的问题衡量对比。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自然而然地考虑到这对他本国所带来的具体危险。新西兰产品能继续无限制地免税进入联合王国是极端重要的。孟席斯虽然同意我的想法，但也表示了同样的疑虑。

在以后几天里，内阁就整个问题举行了重要的商讨。初步的结论认为，建成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乃是整个西方世界利益所在。虽然由于我们加入而需要在短期内付出经济代价，但是我们呆在外边，就得在长远的将来付出沉重得多的罚金。当然这里还有某些大臣们所提出的关于主权问题以及对英联邦前途的最终影响的几点疑虑；而且对英国农业和英联邦贸易可能造成的损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这个问题中有关英联邦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在感情上——其重要性肯定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特惠贸易协议是英联邦连结纽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过去五十多年中一直是保守党政策的传统内容之一。固然在近年中其实际重要性的确已大不如前，但英联邦的体制是否经受得住我们正在考虑中的政策上根本改变的压力，殊值怀疑。从另一方面来说，几乎不容否认，即使英国置身于欧洲之外，她可能还是无法永远维持目前与英联邦各国的贸易协议的。要一个保守党政府象数学计算那样精确地衡量得失，其困难程度是可想像的。如果我们获得成功，我们就一定可以取得能够保障主要有关英联邦各国的重要利益的条款，特别是新西兰。我们也一定能够使我们的英联邦盟友们相信，我们所提出要实施的方针会在长远的将来加强英国以及整个英联邦，

7 而不是削弱它们。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商业协议中争取有利条款，我们无论如何还要取得主要英联邦国家的真正赞助和由衷的好感。上述这些商讨有时是在内阁全体会议中进行的，有时只是同



几个主要有关的大臣一起进行的。

就欧洲的问题……大臣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情况相当微妙。同英联邦和农业权益有关方面的人忧心忡忡，甚至发生恐慌。<sup>①</sup>

议会对于联合王国意图的质询不断增多。我只好在5月9日重申：我国对英联邦所承担的义务以及英国农业利益必须被视为前提条件。不过问题照样存在。正如已经对详情作过研究的人所明白的那样，这一点能否做到是一个十分困难并有高度技术性的问题。<sup>8</sup>我一直认为，假如各方面都有这样做的意向，还是办得到的。但是我也认识到任何这类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复杂性。

在下院中的压力继续有所增加。

议会质询大多是关于欧洲及共同市场。步伐已在加快，而我们却还没有一套经内阁批准的坚定的政策。<sup>②</sup>

5月17日

今晨在大臣委员会中，我们就六国及七国问题作了（历时两小时的）非常详尽的讨论。这是对农业大臣所提文件的第二次宣读会。巴特勒自然是为联合王国的农业担心的，并对此持保留意见；桑兹虽然热衷于欧洲联盟，却也为英联邦担心。不过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我们对自己在谈判中的立场有了清楚得多的概念了。<sup>③</sup>

两天以后我感到，

在最近几天里，欧洲问题已引起了议会、舆论以及公众在某种程度上的注意。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的立场了。还有人指责我们犹豫不决；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了解问题的困难和复杂性。

至于议会，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所作三次演讲已给人们以极好的印象——第一次演讲是向〔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有人告诉

---

① 1961年5月14日。

② 1961年5月16日。

③ 1961年5月17日。

我,作为一篇客观地把问题摆出来的演讲词,它是够辉煌的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演讲发表于历时两天的外交事务辩论会的开端和结尾。……

9 在分组表决时,我党仅有五个人弃权……但是有不少保守党人忧心如焚。这非常象 1846 年的情况。不过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象迪斯雷利那样和我的皮尔<sup>①</sup>相颉颃。新闻界的意见有分歧。比弗布鲁克系各报——《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标准晚报》早已在猛烈反对;其余的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每日镜报》)大体上是表示同情的。对于我党和全国来说,我们显然已到了下决心的时刻了。反对派……已经要求举行大选了,可是我却吃不准他们是否真的要这样做。<sup>②</sup>

我并不无视于我们即将面临的决定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决定申请加入共同市场,我们的确就会在过去保守党常常不得不作出的决策上采取一项激烈而几乎有革命性的步骤。但是我还是决心去作这番努力,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假使我们获得成功,不单是英国的前途,就是整个自由世界的前途也会光明得多。

当时发生了一桩讨厌的事件,终于使大家暂时分心了。

可怜的拉布[巴特勒]倒了霉,他上了老当。他到西班牙去度假。当他前往南方路经马德里时,参加了由西班牙外交部长举行的一次“私人”宴会。他在自认为“没有记录”的情况下,作了简短的“即席”发言。他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把西班牙摒诸国际生活之外,真是太不应该了”。他继续说:“应该把西班牙充分纳入西方世界”云云。西班牙情报部发表了讲话的全文,这就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了。这里的报纸——尤其是“读者众多”的报纸——措词非常激烈。肯定有人会提出进行辩论或是进行一次不信任投票。所有这一切都会使议会浪费大量时间,并且更加使人感到政府已经“不中用”了。这事确实十分令人厌烦,做得十分愚蠢的。<sup>③</sup>

---

① 迪斯雷利和皮尔都是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译者

② 1961年5月19日。

③ 1961年5月23日。

一星期后，

下院今天开会，对拉布在西班牙的越轨行为提出了大量的质询——约有十至十一条之多。我将其一一应付掉。接着进行了大约十五分钟的补充质询。除了“同路人”之外，大家都很高兴。①

5月25日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英联邦的高级官员会议。他们接到通知说，同六国共同体个别成员国的非正式和试探性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立即同英联邦国家以及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开始对话。所以我们于5月30日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要内阁摸清在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时，我们希望从中得到的安排是否能为他们所接受，摸清谋求同欧洲结成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同盟的政策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还是予以放弃。这无疑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同时我们感到，通过一些个人之间的商谈会收到很大成果。当然函电来往也如同和高级专员的密切磋商一样会有作用。不过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办法。

今晨内阁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议——从10:30至1:00——。我们大家同意(以我的名义)致函英联邦各国总理，提议派桑兹到他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那里去访问，并派其他大臣到另外的国家去访问，以便商讨欧洲及共同市场问题。我坚信当内阁亲自在要做结论之时而不是在作出结论之后去同他们商量，是正确的——因为后面一种情况实际上不能算是商量。而且，只有一位内阁大臣能够把政治和经济上的整个论点说清楚。②

于是我向所有的英联邦成员国政府总理发出了信件，提议由我们作这种访问。

在下院中的质询浪潮如同伦敦与渥太华之间所交换的紧急信件一样，仍在继续着。我向迪芬贝克解释说，我们无法具体告诉他

---

①② 1961年5月30日。

我们所设想的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安排究竟是怎样。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讨论的事。虽然迪芬贝克私下向我保证，至少在第一阶段，他对于英联邦事务大臣的访问是满意的，但是他却发表公开声明，要求举行英联邦总理全体会议。6月13日，当我于议会质询后宣读我的详细声明时，盖茨克尔自然而然地要求我注意迪芬贝克的建议。我回答说，在这种会议变得有益以前，特别是关于各个英联邦国家的不同权益方面，我强调个人之间详细商谈的重要性。由于反对党领袖以及其他议员使用了“在作出决定之前”一词，我就解释说，首先要作出举行谈判的决定，然后在一个相当时间之后，根据谈判结果再去决定到底是否能够得到满意的安排。在回答其余的质询时，我试图将这个过程予以澄清。

6月13日我对下院说：

第一桩事是：要在我们和六国共同体成员国举行进一步的商谈之前，和英联邦国家进行这些会商。这个过程也如同将在本月底和欧洲自由贸易区各国部长举行的会议一样，要彻底予以完成。

由于我认为对于这桩事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一点，这位可敬的先生和我的意见相当一致，所以我强调我们现在讨论的实质不是决定应否马上去同意某种安排，而是决定究竟要不要参加某项谈判。为了决定这一点，就必须从英联邦和英国农业的角度来判断罗马条约在经济方面的具体作用会带来那些必不可免的坏处。不过这里还有关于世界——自由世界——总的政治前途的更为重大的问题，以及怎样才能使我国能最好地作出其贡献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讨论，所以我认为把事情干脆说成是签字或不签字的问题，未免太简单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应该小心而有效地加以处理。

由于爱尔兰总理明白表示过，如果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他的国家或许也希望步其后尘，所以我邀请他于7月间来面商。这将是方便的，因为我们将联合王国的大臣们出访英联邦各国期间举



行会谈。我发现肖恩·勒马斯对我特别有帮助，和他的几次会面都使我很愉快。

下一次约会是在契克斯别墅举行的欧洲周末晚会。

12

大臣们（于星期六）晚餐前开始到齐了。晚餐后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有益的商谈。（当晚没有官员参加）参加者有巴特勒、劳埃德、希思、莫德林、麦克劳德、桑兹等。次日（星期天）来了很多官员。我估计共进午餐的人有二十五或二十六人之多。我们商谈了一整天——上午及下午。我们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进展不大。……总之，我们大家同意让“钦差”大臣们（也许可以把他们叫做施浸礼者约翰们）出发到英联邦各国去。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计划。邓肯·桑兹将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希思去塞浦路斯；珀斯勋爵去西印度群岛；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将往印度、巴基斯坦、马来亚、锡兰；约翰·黑尔前往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等。这样就凑成一张相当动人的名单。<sup>①</sup>

在契克斯举行的商谈确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同六国的矛盾集中于温带出产的食品以及从发达的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输入工业品上。我们也许能够满意地从不发达国家争取到热带产品、原料以至某些工业产品。但是从长远看来，即使有了令人满意的过渡性的安排，但要保持英联邦各国在联合王国市场的传统权利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必须使六国认识到英联邦对自由世界的重要性。会议一致认为，不论是英联邦国家或是英国的公众舆论，都不会同意英联邦利益只是在过渡时期得到保障。在过渡时期终了时将要进行一次工作检查，那时英联邦国家可能从检查结果中能得到一些什么，目前难以肯定。在此同时，我们必须向他们讲明，即使英国不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政府也无法保证英联邦国家产品能永远无限制地输入。大家同意，英国应当在允许英联邦在过渡时期维持目前向联合王国输出的水平的条件

---

<sup>①</sup> 1961年8月17及18日。

13 下争取参加罗马条约，而且只有为了不至于妨碍共同体的目的而有必要在共同市场时期改变这些条件时，才应该予以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也不得损及英联邦国家的基本利益。

我们同意保持我国财政部在必要时继续对农场主给以某些支援的权利。否则英国农业界会坚决反对的。不过，如果我们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去接受这一规定，我们就应该去接受某种限制——例如，限定付给我国农场主的最高金额、同意在推行这项政策时不至于使我们能够向欧洲经济共同体输出额外的农产品。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在同英联邦各国接触时，应该强调我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愿望的政治方面——并且应该就英联邦国家需要保障的权益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还不知道会取得什么结果。

6月22日向全体内阁提出了契克斯会议的结论。“内阁在经过多番讨论后，完全同意了即将向钦差大臣们发出的（关于欧洲等方面的）‘训令’。”<sup>①</sup>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情况并且对他们所要遵循的方针给以详尽的指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去说明，到目前为止，我们与六国的非正式商讨中尚未摸清我们加入共同市场的具体条件。只有通过正式申请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们急于要让我们的英联邦盟友充分了解情况。假如我们决定去举行谈判的话，一定会同他们继续作密切的磋商。出使的大臣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摆出

我们在政治上的全面考虑，这些考虑的结论是，为了达到我国在全世界的政治目标，并避免我们所预见到的欧洲持续分裂的种种危险，最有效的方法是联合王国完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大臣们要说明，——根据联合王国政府自己对这些全面政治上的考虑以及对总的经济上的理由所作的判断——假如能同欧洲共同体商妥令人满意的、能保障英联邦

14

---

① 1961年6月22日。

(还有联合王国农业和我们在欧洲自由贸易同盟中的伙伴们)基本权益的协议的话,联合王国政府是要参加六国共同体的。

训令的最后两段内容如下:

一俟一切协商结束,我们对允许我们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有了清楚的概念时,联合王国政府——把“一揽子条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就这些条件是否值得我们参加这一点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会充分顾及英联邦国家的,而在这时召开一次英联邦(总理)的全体会议将是适宜的。

可能有的英联邦国家会极力要求联合王国的大臣在这以前召开英联邦会议——甚至真的要求立即召开这种会议。如果是这样,大臣们就要说明,在对方提出可供讨论的具体建议之前,这样的会议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要等到和六国的谈判有了相当进展之后,才会有具体建议),不过他们会负责去了解其余英联邦国家的愿望的。总之,联合王国的大臣们要尽力劝阻这种要求召开会议的提议。

同日下午,

(《每日镜报》的)塞西尔·金来访,谈及欧洲、共同市场等问题。他的确是最能干……而且是干得很成功的巨头之一。<sup>①</sup>

他向我保证他自己忠于欧洲运动,并且答应以他的报纸的全部力量为自己的后盾。他和他的继任者至今都一直信守着这个诺言。

当我的同事们正周游世界之际,我和某些主要的英联邦总理之间很自然有一些函电往来。我再次向霍利约克、迪芬贝克和孟席斯解释说,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是无法永远保证履行渥太华协议的。在这同时有一个问题照样还是解决不了,即只有通过正式谈判才能使我们知道能否获得我们所要求的条款。我把一份综述过去历史的特别文件寄给我所信赖的老朋友孟席斯。文件的要点是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已发展为一个扎实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共同体本身已有了活力。我们1955年末决定不参加建立欧洲经

<sup>①</sup> 1961年6月22日。

济共同体的谈判,当时是受两种考虑的影响,以后证明这两个想法都错了。我们起先以为他们不会成功,或者即使成功了,我们也能够设法凑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联盟。现在我们明白这事得冒个险。我们这样干下去,目的就是为了去摸清“冒险所得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英联邦的某些同事们主要似乎在担心危及英联邦存在的政治后果,而另外的人则比较坚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尼赫鲁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他说,如果他是一个欧洲人的话,他或许会主张欧洲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但是他认为,印度人会担心此事对英联邦的政治影响以及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影响。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工业国是否以牺牲发展中的国家为代价而凑在一起了”。

与此同时,下院开始对“大辩论”越来越感到兴趣了。6月28日,对一个下院议员的提案作了饶有兴味的讨论。虽然未曾进行表决,但是某些主要议员以后却一直坚持他们在当时所采取的立场。劳伊·詹金斯作了有启发性的讲话,他在结束语中表示希望“政府会表现得比以前更为坚决地向欧洲靠拢”。这次辩论后,继之是一阵议会质询。我只好以议会许可的回避问题的方法来应付。有一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的朋友爱德华·博伊尔于7月20日给我写了一封极为有价值的信,他指出,反对加入欧洲  
16 共同体的一派虽然没有提出什么真正的别的建议,却组织得很好;而赞成参加欧洲共同体的人虽有一套政策,却毫无组织。他感到主要困难在于人们吃不准政府的立场。他强调指出迟疑不决的危险性,这说得很有道理。

我认为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分歧是无法避免的。而1903年以后鲍尔弗的例子明明白白地表明,在某个激烈争论的问题上硬想避免所有的分歧,结果反而会导致一个更为重大的和更有害的分歧(而且会



使自己在 대선 中遭到惨败)。

次日我写了如下的回信：

我十分感谢你的来信。我完全同意你来信的内容。我的儿子莫里斯对此事作了很好的判断。他认为最糟糕的就是犹豫不决。

出使的大臣们这时已经回国，并向他们的同事作了详尽的汇报。这五位大臣已经完成了艰苦的旅程，现在除了他们原来不断向国内发回的电报之外，他们还能够向我们提供个人的观感，这往往要比书面函件更有价值。7月22日在下院大楼中我的房间里举行的一次会议确实是极为重要的。

(除了财政大臣派他的经济秘书作为代表外)全体阁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人数很齐。会上，在原则上一致通过决议，让我于下星期一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将申请加入共同市场。<sup>①</sup>

按照我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时的一向做法，我鼓励与会者大家发言，而不想给同事们一个已经成熟的结论。我很高兴，现在所有的人对此都有所准备了。当晚回家时，我自然地感到这是一项重大的而且或许还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不过我对于其结果还是感到没有把握。

我不知道在我们作了这项重大的决定并将其向六国政府转达后，是 17  
否能够就英联邦和英国农业的关键各点达成协议。我认为，除非戴高乐——基于政治上的理由——改变他的主张，否则是不大可能达成协议的。因为我感到他仍然心怀敌意而且有嫉忌之心。<sup>②</sup>

对于那些担心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的政治影响的人们，我认为应该向他们指出，一旦英国加入了这个组织，我们的影响只会增加而不至于减弱。

我在作出决定后随即通知肯尼迪总统。没有过几天，我向英

---

①② 1961年7月22日。

联邦各国元首以及爱尔兰和南非的总理发出了我打算向议会发表的声明的内容。

星期一(7月31日),我发表了内阁批准的一项声明,宣布女王陛下政府为了就我国国内外的特殊义务(英国农业和英联邦贸易)举行谈判,打算根据罗马条约第237条提出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正式申请。人们再次提出大量的质询,我尽量予以解答。总的效果是相当好的。但是保守党感到担心,而且相当紧张,这也是很自然的。<sup>①</sup>

美国总统于28日的回信措词的确极为大方。

对于你的7月28日来信,我要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信中表明了女王陛下政府就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所作的果断决定。正如你知道的,我们是完全同你站在一起的。我钦佩你不顾你在准备性商谈中所遇到的困难而坚持干下去的勇气。在以后的谈判中,你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友善和坚决的支持。在任何时候,如果有什么特殊问题你认为我们能够协助的话,希望能让我知道。在你们和欧洲大国以及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上,美国可能不总是最合适的中间人,不过在我们两国政府最近几个月的商谈中,就我们力之所及,你可以完全信赖我们。谨以个人名义热烈致意。

18 由于我们预定在8月2日及3日进行两天的辩论,所以我发表声明后的质询就不太多。反对党领袖盖茨克尔很讲道理,他仅仅指出一些困难并就预定的程序提出几点意见。自由党领袖格里蒙德带着自以为是的口气说:

能否允许我……祝贺首相转变到这种政策——不仅为了我国和欧洲,而且也是为了整个英联邦我们这些议员长期来一直催促他采取的那项政策——上来呢?

对共同市场的辩论列入了以下的动议中:

为了着手各项谈判以摸清是否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协议,以适应联合王国、英联邦以及欧洲自由贸易同盟的特殊利益,本院支持女王陛下

---

<sup>①</sup> 1961年8月5日。

政府根据罗马条约第 237 条提出正式申请的决定；本院还接受女王陛下政府的保证，非经英联邦国家充分协商和本院批准，非经他们通常可以同意的任何程序，不得签订涉及上述这些特殊利益或影响英国主权的任何协定。

当我于 7 月 31 日正式宣布政府意图之时，我仅作了一个如实的、谨慎而克制的简短声明。当时已经有一些人议论，并且后来历史学家也说，这篇文告内容“似嫌简短，而且同这个场合的重要历史意义对照起来，……它宣布的方式简直太不动人。”<sup>①</sup>为此，我认为在大规模的辩论会中，应该努力提高讨论水平，这样方能显示这一壮举的历史重要性。不过，指出作最后决定的时刻尚未到来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现在要求下院所做的事，便是对政府在上述动议所规定的条件 19 范围之内，提出着手进行关于共同市场的谈判的建议加以支持。不论这些谈判的结果如何，届时下院必须对之作出决定。

我扼要叙述了战后这些年中争取欧洲联合运动的情况，它是以西欧目前分裂为两个集团为高潮的。我接着说：

我本人认为，虽然欧洲所存在的这种分裂从表面看来是属于商业性质的，但无疑会削弱西欧的政治力量和团结。要是我国果真同欧洲打成一片的话，我们——以及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就有责任去寻找消除潜在的分裂原因的办法。

我接着谈到对政府现在急于去推行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英国人民本能地感到忧虑甚至怀疑的情况。

在我国，的确存在着长期孤立的传统。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在我国也存在着一些对外国人怀疑的心理。我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在法律、行政以至政治制度上，发展过程也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差异，就算我们的宗教信仰基本上相同，而在这方面也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sup>①</sup> 米里亚姆·坎普斯：《英国与欧洲共同体（1955—63）》。

不过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每当世界面临专制压迫和侵略的危险时，英国总是放弃了它的孤立主义。而一旦直接危险过去了，我们的确有时会试图回到孤立政策去。不过到时候我们又会把它放弃掉。可是谁又敢说在今天我们当前的危险就已经解除了，或者不久就会消失呢？为了去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势力，我们不得不去进行一次历经一代人以上的漫长而疲劳的斗争，对于这一点谁还会怀疑呢？

还有人对我们准备与之结盟的某些国家的不稳状态表示忧虑。

20 有时听到人家这样问道：“假使一个可能与我国结盟的欧洲国家在政治上陷入困境，或者甚至变成共产党国家，那将怎么办呢？假如我国是它的盟国的话，这会不会对我们产生严重的影响？”当然会的。但是不管我们是否共同市场的成员，其后果将是同样严重的。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是西欧联盟的一个成员国变成共产党或者半共产党的国家，其余的成员国的处境又将如何呢？假如西欧所有国家都变成莫斯科的卫星国，那末英伦三岛的处境又将如何呢？

我们必须对问题作出回答。我们不可能从孤立找到庇护以逃避上述灾祸的后果，我们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可能提供这种庇护了。的确，从这一观点看来，我们倒不如为欧洲的生活和理想的自由发展而竭尽我们本身的责任，并运用我们的影响。

另外的人则预见到另一种危险，即我国可能就要去参加一个倾向于使欧洲和其余世界隔离开来的运动，它会使欧洲不顾外边的世界而闭关自守。自然会有人相信：

这个得天独厚的小小大陆能在几乎同其余世界隔离的情况下过着富裕、丰厚而繁荣的生活。

不过，我不相信这种人的话，如果确实有这种人，他们会在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中间或是政府中找到。我们这个岛国当然决不会去参加以这样一些中古时代的理想为信仰的同盟。如果有这样的小欧洲主义者（也许真的有这种人），难道我国没有责任凭借自己在全世界的关系去帮助大多数能看出事态的真实前景的欧洲人吗？我认为我们应该置身于争取



自由世界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运动的前列，我们处于欧洲共同体之中要比置身其外更能起带头作用。总之，我认为我们应该去试一试。

至于我们准备去采取的方法，我们应该同英国农业界的代表们以及英联邦各国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假使我们同共同体的谈判 21 认为需要的话，我们就应该同英联邦总理举行会议，当然最后还要取得议会的批准。关于牵涉面更广的一些问题，在英联邦中有些人争论说；同欧洲更密切地在这个新的经济集团里结成联盟，会损及英联邦力量的。他们不但这样说，而且由衷地相信这一点。

如果我是这样想，我当然就不会向议会提出这个动议。不过且让我们看一下英联邦的情况。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我们未曾作出有约束性的决议。我们没有一套统一的外交政策可以遵循。我们没有一致的国防政策。英联邦中有的成员国参加自由世界的各种防御条约，有的则是不结盟的。即使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虽然严格地说英联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组织，但她却有其真正的生命力，并能团结一致。这一点是难能可贵而独特的。

我相反地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为英联邦利益服务？

为此，是否应置身于欧洲联合运动之外，还是为促进这个运动而尽我们的责任呢？是否应保持我们在新的世界中的影响，还是在现代世界的巨大的结盟面前听任我们本身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相对地萎缩下去以削弱我们的影响呢？孤立的英国对英联邦盟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相信他们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我认为把我国在英联邦的利益和在欧洲的利益看成是互相矛盾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两种利益应该是基本上相辅相成的。

在两次大战之间达成的渥太华协定签订以来，日新月异的国际贸易结构已造成了一些惊人的变化。

首先，英国农业已经复兴，现在已能提供我国所需的温带出产的食

品的三分之二和我国所需的所有食品的三分之一。所有的英联邦国家也发展了品种更多的工业品生产,部分供国内销售,部分供出口。

22 正如下院所了解的那样,这种多变的贸易结构在某些方面已给我们造成某些困难。不论我们是否加入共同市场,这些问题总是要加以解决的。

我接着就提出了一个保证:只有在英联邦的特殊利益能得到照顾的情况下,这些谈判才能有结果。我们对欧洲自由贸易区各国也负有同样的责任。最后,我们决心通过一切方法去维持英国农业的强大和繁荣。但是我指出,实际经营方式在近年已有了许多变革。在战时以及与之紧接的期间,我们是通过农产品的统购方法来经营的。接着我们改而采用支付补助金的办法。这就可能意味着我们将最终不得不从一个主要依赖财政部来支持农场主的制度转变到一个“使市场本身保证为生产者提供合理报酬的办法”。

接着我谈到英国的工业,我承认在这方面的得失是难以精确估计的。

在战前建立的保护关税已经在国内市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保护以对付这种竞争。不少人认为我们也许做得太过头了。不管怎样,从我们这样的岛国的长远情况看来,我们向别人输出的总是应该大于别人向我们输出的,所以不可能在孤立的保护关税制度下维持我们希望的人民高标准生活水平。

不过我相信,英国实业家多数认为参加一个将具有相当于美国或是俄国那样大小的市场的组织是有利的。最后我谈到了主权问题。我指出尽管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其总的概念中具有政治色彩,它毕竟还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当然每一个条约多少是对一个国家行动自由的一种约束。不过,

这个运动已开展多年了,终于以签订罗马条约而达到了高潮。应该说我

没有看到共同体的成员国由于放弃了一些主权而有丧失其民族特征的任何迹象。我们固然应该十分重视这个牵涉到主权的问题，但它毕竟只不过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 23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由某些欧洲人支持的热烈的联邦运动，不过我不相信他们有什么深厚的基础。我认为把欧洲的情况同美国的创建相提并论，是一种错误的类比。

美国原来是由移民所建立的，他们在那里的历史不长，只有几代人的时间。他们大体说来属于同一个民族，而且使用同一种语言。欧洲却是过于古老了，它在传统、语言以及历史方面的情况过于复杂，以致无法通过这些方面使它本身统一起来。虽然在欧洲有着这么一个联邦运动，但是它在当前却没有得到头面人物的赞许，当然也没有得到欧洲主要国家政府的赞许，并且当然也不会得到法国政府的赞许。

我认为另一个可以称为联盟的概念似乎更适合于

欧洲各国，尤其是我国的民族传统。这是我国很乐意而且要全心全意地与之联合的组织。总而言之，在罗马条约中并没有哪一点责成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去采取任何联邦式的解决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把这种体制强加于会员国。

那末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大呢？如果谈判失败，那自然是一个严重的灾祸。我只能重申，我现在比以前对此更抱有希望。

欧洲局势的恶化就一定会使各国加强团结。有一则关于太阳和朔风比赛的古老寓言，它们互相打赌究竟谁能够使一个旅行者脱掉他的外衣。东风一刮起来，各国就会在团结的共同斗篷下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了。

当我说这些话时，议员们自然就意识到正在柏林发生着的一场尖锐而险恶的危机，而我们大家都是在日益增长的核军备的阴影下 24 过日子的。我以下面的话来作结束语：

但是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如果我们要不落人后并且不脱离世界生活的主流的话，我们一定要下决心

改变我们的办法。在我国整个历史过程中，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

所以我提请下院授权给大臣们——不是去签订一个条约，而是——去探索可以把这样一个条约在哪一种体面的基础上提交下院去作裁决。

我在下院一直有这一种经验：发言者只要一坐下来马上就会知道自己的演讲是否算失败，还是稍获成功，抑或算得是一种胜利。不管怎样，对于自己发言的内容以及态度我都是满意的。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两派的人都听着，没有插话。我的不少朋友都认为这是我所作过的最出色的演讲。事后出版的一些晚报把当时的情况转了一转（也许它们对自己所发动的私下议论运动而最后认为〔我的〕心脏病发作感到有些懊悔吧？）《标准晚报》的大标题是：《首相重新振作——恢复了健康》（鉴于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对共同市场等等所持的态度）这算是宽宏大量的。总之，这可算走运了——因为这时要是我的演说内容很糟糕，或只是勉强过得去的话，那事情就完蛋了。<sup>①</sup>

盖茨克尔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在提案中他坚持他的骑墙的态度——在他以后的工党领导人，就一直保持着这一姿态，有时激动，忽高忽低。但是他说话一向漂亮、娓娓动听。

丘吉尔在这两天的辩论会中对大部分的演说都是从头到尾将其听完。他间或也到我的房间走走。这次（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将使他的欧洲运动奠基者的工作臻于完成了。

第一天晚上以莫德林的一篇说得头头是道的有力演说“作为尾声”。不过在这次辩论中要算威尔逊的演讲最为出色，他在第二天的会上首先发言。他对共同市场谈得不多，却更拚命攻击政府。不过他谈得很高明。其唯一缺点是他似乎对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计划反对得太厉害了，但是他在最后却向政府的这番努力表示祝贺，

---

<sup>①</sup> 1961年8月5日。



从而把这个缺点弥补起来，并回到了他自己的党所制定的骑墙立场上去。这个勉强而又有些笨拙的大方态度使欣韦尔对他大发雷霆。富特发表了一篇辛辣的演说，而邓肯·桑兹则对之作了一个极其漂亮的答复。我很中意我的儿子的发言。

莫里斯的演讲是这次辩论会里最精彩的内容之一，这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声誉。<sup>①</sup>

一篇最有份量而且从以后的事态看来也是辩论会中最重要的演说，是由罗伊·詹金斯发表的。不论是从发言者的有启发性的论点或是从他的诚恳的态度看，这个发言是够动人的。他一开始就郑重宣布他是属于论战中的“右边，即亲欧派那一边”的人。他谈到英国的情况时说，

假如我们置身于欧洲之外，我们就会在经济上继续处于虚弱状态。如果到1970年我国还是一个停滞不前、危机深重的国家，并且无法向英联邦提供可观的财源以作开发资金之用的话，不管英联邦国家在谈判期间发表什么好听的论调，到时候他们照样会背离我们，而当他们一旦发现我们同欧洲打成一片以后在经济上变得繁荣而有力量，并且还能够在经济上领导他们（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这种领导的），他们反而不至于象上述情况那样不理睬我们了。

在谈到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丧失独立时，他的话不论从哪一个观点看来都是同样有力的。

很显然，如果我们说，我们非得保持自己独断独行的权利不可，不管这是为了帝国还是为了社会主义，或者单是为了排外的原因，这样地要求享有独断独行的绝对权利，必定会造成一种眼睛朝里和逃避责任的态度，这是和工党运动的国际观点不相符的。

26

他在结束语中清楚而动人地重申了他的立场。

存在着这样一个真正的危险：即我国将同世界生活的主流脱离而陷

---

<sup>①</sup> 1961年8月5日。

人一种暗淡地衰落下去的境地。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别国，有时又自我欺骗，但却骗不了别人。我认为要防止这种甚为悲惨的情况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欧洲共同体。

多年后回忆到这一情况时，人们会因为看到这些政治派系怎样一直保持相当稳定而感到惊讶。在当时，这些派系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异常现象。

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新联盟是很稀奇的。有人挖苦说自己总算活着看到了“巴茨克尔”被“西尔弗布鲁克”所取代了。（第一个名字是影射所谓巴特勒和盖茨克尔之间相似的立场，而第二个名字则是指西尔弗曼和欣琴布鲁克勋爵之间的关系的。）

希思的一篇风格新颖而有力的演说使自己身价倍增。这两天的辩论是本届议会的要闻之一。我几乎听完了全部的内容，我很少听到过有哪一个辩论会比它的水平再高了。

工党的正式修正案内容空洞，它和政府的动议内容基本相同，所以——一个（象弗里兹·罗伊那样）强有力的议长是很可能不让它提出来的；不过还是对它进行了表决。我们出乎意料之外足足多得了一百余票而取得了胜利（我估计多一百零九票）。

在对政府的动议进行表决时，反对党弃权。极左派硬要进行表决——有五票是反对我们的，其中一票是保守党人投的。……约有二十至二十二个保守党人弃权。我们原来预料有三十个人弃权——可见督导员们干得不错。他们在两次表决时都弃权了。

保守党弃权的人属于两种人——激进的帝国派和不满分子（他们在任何风潮中不论涉及什么问题总是反对政府的）。……不过我看出他们之中并没有象迪斯雷利那样的人物；甚至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乔治·本廷克勋爵。也许他们会在真正摊牌的时候出现——就是说，当谈判取得成功并需要请议会去批准一项条约的时候。<sup>①</sup>

我于8月5日把情况向女王作摘要汇报时写道：

---

<sup>①</sup> 1961年8月5日。

陛下将会看到下院关于共同市场问题的历时两天的辩论以及上院中类似的辩论的结果。在两院中,就这个问题的正反两面所作的演讲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正象我原来预料到的那样,在这里存在着大量的超越党派畛域的思想感情,这自然提高了辩论的价值和水平。两院的议员都不得不去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并且至少在暂时都变成热切的真理追求者,而不是象通常那样持门户之见相互作枯燥的指责,这种指责已经变得十分乏味了。我已向陛下说过,我本来有点担心保守党会因为我们提出要同欧洲六国进行谈判而发生严重的分歧。由于感情和传统上的原因,不少保守党人自然不愿意和欧洲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这些保守党人基于他们对英联邦的感情,考虑到老英联邦国家多而考虑到新英联邦国家则较少。不过他们的确感到英国作为英联邦之一员和她作为欧洲国家之一员之间有着一个实际的利害矛盾。但是保守党到底是能见机行事的,它善于适应时代,而特别是它的年青一辈急于抓紧时机,这一点使我大为宽慰。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我国在工业和经济上衰落下去,我国在英联邦中的地位就会最终地消失掉。我国是否能够在本世纪的下半叶通过与欧洲的联合,不失时机地使自己在经济上变成一个强大的、有活力的、并且发展平衡的国家呢?单就这一点就能使我国变成英联邦的更好的成员国,而且使我国更适于领导它。

于是开始进行一系列漫长、困难而且常常是迂回曲折的谈判,其第一阶段结束于1962年10月,其间是大有取得最后成功的希望的。在这几个月里,不论是在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直接谈判中,或是在同英联邦各国以及英国农业界的商讨中,英国政府不乏得 28 力的人为它工作。最近的一次内阁改组使两个重要的部——英联邦关系部及农业部——置于积极“亲欧”的大臣邓肯·桑兹和克利斯托弗·索姆斯的掌握之中。他们除了承担许多其他职责之外,还要对我们已经着手的新任务给以大力支援。此外我说服了本来坚决要求退出政府的德里·希斯科特·艾默里担任驻渥太华的高级专员,任期至少两年;这一任命使我们的加拿大朋友们感到高

兴，而且他能够以其天生的手腕和本领去执行他的使命。同欧洲共同体的主要谈判是由爱德华·希思来担任的，为此特委派他去外交部同亚历克·霍姆共事，并给以掌玺大臣的职位。他手下有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官员襄助他工作。英国驻法大使皮尔逊·迪克逊爵士被任命为代表团的团长。和他一起工作的有埃里克·罗尔爵士和罗德里克·巴克莱爵士；英联邦关系部派出了亨利·林托特爵士，殖民部派出了威廉·戈里尔和巴恩斯爵士。这些人由于同马约林先生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官员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以及类似的单位中一起工作而成为他们的密友。在我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集中过这么多的有才智的人去执行如此重大的使命。我还说服了巴特勒去主持国内的大臣委员会，它要对谈判进行监督，任何英国代表都必须就一切事项向它请示。这样，在这个阶段中，不少问题都用不着惊动整个内阁而得到了解决。要把这段漫长有时是痛苦的过程详加叙述，的确是不可能的。某些重要的情节已经发表了，我只能就主要的事件补充一点个人的回忆而已。

在议会进行辩论后，没有过几天就得

29 起草一封以我的名义写给（本月担任欧洲共同体主席的）艾哈德教授的信，向他提出英国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起草这封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大家各持己见。掌玺大臣（希思）代表外交部。最后大家终于对内容取得一致意见。信经我签署后送往伦敦，并将于今晚寄波恩。这是一桩很有历史意义的事。自我于圣诞节后在契克斯筹划“宏伟的蓝图”以来才不过六个月！<sup>①</sup>

麻烦很快就来了。在9月12日至14日之间，在阿克拉举行的英联邦经济协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空气有些紧张。这主要是由加拿大代表们所引起的，他们明显而且甚至激烈地反对我国对欧洲的行动。恩克鲁玛虽然因会议在他的首都举行而感到高

<sup>①</sup> 1961年8月9日。



兴，可是他的态度也并不殷勤。虽则我同迪芬贝克一直相处得很好，我总是摸不透他的政治动机。我感到他似乎受到国内不断变化的政局过多的影响，而却过于忽视世界事务的基本动向。

过了几天，我同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埃里克·哈里逊共进午餐时

见到澳大利亚的财政部长哈罗德·霍尔特。这位高级专员颇能尽地主之谊。霍尔特提出共同市场问题，他说话持重公道，很有道理，这使我感到鼓舞。他对加拿大政府这样（据他说）存心要不顾一切地去打击联合王国政府的做法很有意见。<sup>①</sup>

孟席斯在他 10 月 6 日所写的一封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澳大利亚的态度。他总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忠诚不渝地帮助我们。

我们希望联合王国的全部贸易权益得到保障。这些权益是和联合王国在对澳大利亚输出中所享有的权益相对应的。<sup>②</sup>

我在回信中写道：希思一开头就会提议让英联邦商品继续免税进入英国市场，不过要是认为我们可以一切保持原状那是不现实的。30 肯定是要作出一些让步的。真正的问题是要考虑到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

没有过几天约翰·莫内

来吃午饭……他精力总是那样充沛。他对共同市场的谈判充满希望，认为戴高乐就这个问题已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持反对态度，法国官场也都反映出这种态度。不过（据莫内说）这种情绪已经有所改变了。我不得不告诉莫内说，我感到我们这里的困难正方兴未艾——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压力、农场主的忧虑、工会担心外来的“竞争”等等。所以我希望把谈判很快地结束掉；如果拖下去的话，反对党和压力集团的力量就会增强。莫内对这点表示同意。<sup>③</sup>

① 1961 年 9 月 21 日。

②③ 1961 年 10 月 8 日。

10月10日希思向六国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作了正式声明。这份声明是经过我们调动了一切力量才写成的，内容极为动人，它实际上是对我国全部情况的说明。我们不仅向代表们提供了声明全文的英文原文，而且还提供了法、德、荷、意等文字的译文，向报界发表了一份相当详尽的摘要，并将其传达给英联邦各国和外交使团。为了避免造成一种先例所以不发表全文，因为随着谈判的进展，这种先例可能会对其他文件造成尴尬的局面，可是全文却在以后几周里从某些方面泄漏了出去。我和同僚们商量后决定将其全文发表。<sup>①</sup>总的说来，我对这一事件是感到高兴的，因为大家看到了全文后，都普遍地对英国无懈可击的立场感到钦佩。<sup>②</sup>在这次首次会议中，希思受到他的欧洲各国同僚们的尊敬甚至爱戴，至今一直如此。

31 下一个难关是在国内。关于在党内特别是在每年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即将出现反对派的传说纷纭。当时在习惯上党的领袖只在大会结束时才露面去发表带权威性的演讲，其目的在于总结大会成果并鼓励党的工作者去作新的努力。我从属员那里不断接到报告说：

在今天早上举行的关于共同市场的辩论将……遇到困难。比弗布鲁克勋爵和《每日快报》竭力去拉拢我们的人。（恐怕）有些人已经掉进他们所布置的陷阱里去了。<sup>③</sup>

不过一切疑虑很快都打消了。

在布赖顿的大会迄今进行得很好。昨天“共同市场问题”取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四千人以上的大会中只有三四十人投了反对

---

① 《联合王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敕书第1565号（皇家文书局，1961年11月）。

② 坎普斯前书，第377—386页。

③ 1961年10月12日。

票。<sup>①</sup>

总而言之，暂时我们算是太平了。

在此同时，我们在主要的谈判开始之前，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意見交换。孟席斯亟欲我向共同市场谈判的代表们提出，要在讨论到有关澳大利亚权益的事情时让他的代表列席。虽然我很同情他的动机，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建议会被接受。于是我对他说，我认为最好是让希思和他的班子同派驻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澳大利亚或是其它英联邦的任何代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将近11月底，加拿大财政部长唐纳德·弗莱明对我作了一次令人鼓舞的拜访。虽然他来访的动机不明，不过他的真正目的似乎是要对在伦敦和渥太华所发生的小小误会表示歉意。我过去一直觉得弗莱明对我极有帮助。我当然不会向他发什么牢骚，不过我由于确知他同情而且谅解我们而感到高兴。

11月26日戴高乐将军来到桦林居我的家里作客。我已经在 32  
前一卷中对这次访问详细描述了。<sup>②</sup>虽然在关于把欧洲组织起来的适当方法上，我们彼此的意见的确极为接近，我对于他到最后会采取什么立场仍抱怀疑。我试图使我的客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如果长期把联合王国排除于共同市场以及可望从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体制产生出来的一切其他机构之外的话，就不可能期望它继续支出如此巨额的外汇去为欧洲的防务尽这么多的责任。对这一点，他回答说，法国人并不反对英国人加入，不过他们对那“一大群英国亲戚”感到关切。当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时，他就回答说，美洲、老的英联邦、印度、非洲等等。他们大家都要想跟着英国一起涌进来，这就会把六国决心要保全的欧洲本身都冲垮。我禁不住指出，法国人已经为旧法兰西帝国的成员国作了很妥善的安排，我国

<sup>①</sup> 1961年10月13日。

<sup>②</sup> 《指明方向》原书第410—428页。

显然不能同英联邦一刀两断。因为这种做法即使算不上是可耻地抛弃我国从历史所获得的一切，单是从他自己的观点看来，其结果可能比这情况更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必然会归附美国，其余的国家则投入俄国的怀抱。他对于这一点没有作答，但是我感到，他一面不想公开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另一面却要利用我正无法克服英联邦的障碍这一事实来进行刁难。这一次他也同以后几次一样，还问我是否真的能够使保守党一反其传统去采取这样一个有革命性的立场。很显然，我急于要使事情早日了结，而他却极力反对仓促行事。我认为事情办得快是很重要的——而他却主张拖。我明白这就意味着法国人要利用一切外交手腕去拖延谈判时间，并且要求对每一个细节在其得到最后解决之前加以周密的审查。这一点在以后果然得到了证实。我当然把我们关于共同市场的商谈的详细记录送交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僚们。我感到他们应该直接从我这里了解到这些会谈的经过情况，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试图去争取比弗克鲁克勋爵，但是不怎么得手。我在 11 月 27 日写信给他：

上星期四我本来希望在“又一俱乐部”和你碰头，不过我怕你那时来不了。我衷心希望你早日康复。

你的报纸继续“恶毒而苛刻”地攻击我，这和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的身份颇为相称。

不过我还是由于同你的友谊而感到骄傲。

请告知是否有机会见到你？你何时离开英国？

他对此给我写了一封别具风格的信：

接到来信使我十分高兴。我原来在害病，现在已痊愈了。

什么时候来同我一起共进午餐？从下星期二到星期五随便哪一天都行。



报界对你的支持是不落人后的。当你要求进行国民公断的时候，他们自会全力支持你。

不过不幸的是，有这样一个情况使你和他们之间无法调和起来，这当然是指共同市场。这一项政策和《每日快报》对英联邦的信念背道而驰，这个信念是我们信条中有传统性的而且是不可磨灭的一条。要求我们放弃这一条其困难不下于要求我们同长老会断绝关系。

我个人照旧是忠于你的。我为人显然缺点过多，不过我确信自己对朋友的友情还是能够始终不渝的。

这年年底，戴高乐和阿登纳会谈后于12月12日写来一封信。在叙述了他们关于柏林危机的意见后，他以下面几句话作结语：

我们谈到欧洲在政治上的联合问题，也谈到了共同市场。在这两个<sup>34</sup>问题上，我们都重申自己打算继续干下去，并一致希望英国有朝一日能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同等的条件下加入我们的组织。

这一封有点令人迷惑不解的信，也许包含着充满希望的内容吧。在这圣诞节即将来临之时，我想至少能从其中得到一些鼓舞。

## 第二章 暂时冻结工资的措施

在国内，1962年刚刚开始，调子就很阴郁。《年鉴》对此作了如下的描述：

今年一开始，政府就在财政大臣暂时冻结工资的措施上同各工会发生了正面冲突。就在新年开始那一天的午夜，会员人数达十六万的邮政职工工会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照章办事”，对政府于11月18日拒绝他们提出增加工资百分之四的要求一举表示抗议。<sup>①</sup>

百分之四，十年后，当人们回想那些年“保守党之劣政”，不禁诧异。

为了讲清楚我们在当时所处的情况，有必要追述比这再早几个月的事。1961年7月底，财政部在英格兰银行的支持或者敦促下，对于不断出现的通货膨胀的迹象极为惶恐，这些迹象在连续第三年的国际收支逆差上反映出来。虽然我在思想感情上反对“权威们”似乎认为非采纳不可的若干紧缩通货的建议，我却不得不同意某些进一步的限制措施。这包括节省政府开支的新措施、更严格的外汇控制以及包括将银行贴现率暂时提高到百分之七的旨在减少消费的紧缩通货的办法。但是我早已明白，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带有崭新的性质的。我们的困难不是由于我们试图把经济马力开得太足，或者由于政府在国内外的开支过多，这些困难主要产生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一时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个人需求。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1961年7月底向议会所作的一篇报告的确强调过这一点。<sup>②</sup> 工资和薪金已经

36

① 《1962年年鉴》，第1—2页。

② 见《指明方向》原书第377—380页。

增加了百分之八而国家生产力却仅仅提高了百分之三——“所以现在有必要暂时实行工资冻结。”虽然在当时这种工资的增长还比较缓和，但是它一直是战后各届政府所面临的难题。而且正统的紧缩通货的办法以及甚至后来减少就业人员，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的确在过去十年中，不论是工党政府，以及接替它的几届保守党政府，一直面对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双重幽灵。1961—62年之间的暂时冻结工资措施，就是企图转到以后被称为“收入政策”的方针去的第一次——无疑是不成熟的——尝试。由于这个概念比较新颖，而英国工会领袖又是以保守出名的，暂时冻结工资不仅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困难和政治压力，还自然而然地引起激烈地反对现任政府的广泛斗争的前景。

金融情况毕竟还是很快就松动了。“英镑很硬，并由于国外有人在收购而得以维持其价值。”<sup>①</sup>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

我们必须大胆进行工资战。这终究是要决一胜负的。接下去便是政府支出和1962—63年度的预算问题。我们必定会同花钱的部门——尤其是教育大臣——发生纠纷。对于我们非实行不可的削减经济开支措施——特别是削减国外经济开支——国防大臣也不会感到好办。在此同时，假如再开出一张金额达十亿英镑的额外工资支票的话，那么我们千方百计“省下”五千万至一亿五千万镑之间的区区之数又何济于事？要是发生了这一情况，英镑就非贬值不可。不过要是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一定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工潮。<sup>②</sup>

但是我们必须毅然面对“罢工的危险”并应付“如何使(诸如电、煤气、铁路交通等)公用事业不至于停顿的问题”。<sup>③</sup>

37

8月间我已经因7月份对外贸易逆差数字大大减少而感到一些鼓舞。虽然各工会的最终态度还不能断定，不过工会领袖们显

---

①②③ 1961年8月9日。

然很明白，在工资上提出过分的要求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并且会因此引起激烈的控制措施。不幸他们都不敢公开这样说。

在这同时，财政大臣和我共同起草了一封致工业界劳资双方的信，建议设立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从工会、企业管理部门以及政府中抽调人员组成，他们将参予全国计划咨询工作。塞尔温·劳埃德在7月25日所作的讲话中，已隐约地对这项富有想象力的建议作了预告。关于这个计划的商讨表明了

大臣之间存在的饶有趣味而且很深刻的意见分歧。这个分歧实际上相当于这样一个差异：即，他们是否具有老民权党、自由党、放任主义的传统，还是持有保王党见解，后者是搞族长式统治的人，他们是不怕稍为带有一点命令主义的。<sup>①</sup>

不过经过两次长时间的会议后，我的同僚们终于在12月21日正式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即公布了那封信的内容，从此以后这个现在被通称为“奈迪”的机构就成为我国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而有用的组成部分。而且它的的确确收效极大。因为它不仅在最高一级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办法，而且还建立了许多所谓“小奈迪”，它们在各个企业中，颇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劳资关系和生产。这个向前看的计划应归功于劳埃德，他在财政部中是受到他的顾问们的支持的。

秋天日复一日地过去，工潮即将爆发的警报声犹如雷鸣，越来越响，而且日益逼近。不过总的说来，这项预定于下一年4月到期的暂时冻结工资措施在基本上一直是能够得到贯彻的。9月底，我的同僚们决定在机关文职人员工资问题上坚决不让步。同时于  
38 10月5日把银行贴现率减低到百分之六点五，以期借此提高公众的信心。公众对这一谨慎的措施反应良好，后来又于11月2日把贴现率进一步降低到百分之六。但是斗争却马上就要开始了：

<sup>①</sup> 1961年9月21日。



我们即将在所谓政府的 M 雇员问题上同工会发生纠纷。如同对其他文职人员一样，我们对他们也实行了“暂时工资冻结”。不过这些人不是考辛的工会会员就是汤姆·威廉逊的工会会员，他们以罢工相威胁。

汽车工业的情况很离奇。福特厂工人还没有（就吃早茶休息问题）举行罢工。工会正在设法使鲁特斯厂设在阿克顿市的分厂工人复工。这个厂的一千名工人这样一罢工使鲁特斯所有的厂都停下来了，影响到它们的全部小汽车生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工人。

在（包括正在修建唐宁街十号房子的莫勒姆公司的）建筑工业中有零星的罢工事件，也是关于吃早茶休息问题。而同时我们的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在欧洲的竞争者，却正在埋头苦干呢！<sup>①</sup>

说来奇怪，“使人精神激奋但不醉人的一杯茶”，竟会在工业中变成这样一种使人失去理智的饮料。政府的政治地位当然开始受到了影响。在各选区中发生了失去人心以及失去选民信任的现象，看来将会相应地在议会党团中引起不安。

保守党已经执政十年之久。它在过去三次大选中连续取胜，而且得票越来越多。且不说政治和经济上的压力（这些压力实际上并未超出正常情况），公众对这个党也已变得厌倦了，而且这个党对自己也感到厌倦了。

原因在于保守党经过了这十年变得固步自封了。过多无能的旧大臣早就应该请出去了……不得志的年青人也太多了。我总算幸运地把大部分旧大臣转入上院，不过那些仍旧和我们在一起的人却是专爱挑剔的，他们相当危险。<sup>②</sup>

有一个爱讲闲话的人，他本来是我记忆中最不称职的大臣之一，后来他突然变成了某个问题的大权威，可是当他过去担任负责工作时，他对这个问题却似乎是一窍不通的。另外一个过去政绩很差的行政官员则变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了——而当他在职的时

---

① 1961年10月8日。

② 1961年11月30日。

候，却从来没有显示出这种才干。又有一个至今还是令人头痛的人，我曾经任命他担任一个次要的职务试试他看，结果完全不行，后来他却在与本党离心离德的议员中取得了新的威信。过去曾被视为虚狂的，现在却被捧为睿智。

我在暑期休假之前，就已经在考虑有必要更换几个大臣的职位，并已于8月初同大法官基尔穆尔商谈过。不过我明白“如果不作出使人痛苦的决定就难以空出缺来。”<sup>①</sup> 9月间，我一面要极力应付情况复杂的北罗得西亚的制宪问题，以及充满危险的悬而未决的柏林问题，一面开始认真考虑国内事务。

腓利普·德朱鲁塔来吃午饭。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起散步。傍晚我向秘书口授了将于10月份在保守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词的初稿。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我觉得票数开始大大下降了。在本届议会的某个时期中，这事是免不了要发生的，我倒是宁愿它就在眼前发生而不是以后发生。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

一、盖茨克尔反对“单边主义”的十分爱国而且大获成功的立场，无疑增加了他在国内的威望。

二、人们把我国的困难归咎于政府——他们称之为“停停走走”的政策。有的评论家说我们在经济上应该加强计划性。另外的人则说，我们由于过分害怕引起失业，从来不曾让“自由”经济有尝试的机会。普通公众则无所适从，并且责备我们。

三、国外及殖民地问题已使人们胆寒。他们不大相信我们处理得了这些事。

（用丘吉尔叫侍者把一客很糟的布丁拿走时所说的话），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意味着：“我们缺乏主旨。”<sup>②</sup>

为我党物色一位专职的主席已成为当务之急。巴特勒是老好人，他过去不但同意担任他的那个难当甚至容易搞糟的职务——

① 1961年8月7日。

② 1961年9月16日。

他是内政大臣——他还同意担任保守党的下院领袖。大选后我立即请他担任党的主席，因为我急于使我党带上进步的色彩，而这个任命就能保证这一点。除了这些够沉重的任务之外，我还不得不请他去协调那些与欧洲和共同市场问题有关的大臣们的工作。不过可想而知，即使是这样一匹任劳任怨、忘我无私的政界骆驼，也是会被这第四个职务压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同巴特勒全谈过了，我还说服他把党主席的职位让给一个年事较轻的人，（假如我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的话）。这个人要把他的全部时间用来考虑党的工作、组织党的活动并代表党发言。我们两人一致认为现任殖民大臣的伊恩·麦克劳德是这个职务的适当人选（假如我们能够说服他去担任这个职务的话）。他会帮助我去造成一种目的感——一个运动——几乎可说是一次圣战。我为党代表大会所准备的那一篇演说将为它开路。<sup>①</sup>

下一步是把这事向伊恩·麦克劳德提出来。

昨晚我就党的前途的问题以及要麦克劳德担任主席的想法，同他本人作了长谈。他感到兴趣，不过我想他是担心人家闲话的，说他是从殖民部中被排挤出来的。是有人会这样说的；不过任命他为党主席一举当然是我对他完全信任的一种表示。我对此事并不操之过急，只是叫他去考虑考虑，并同总督导员商量。

今晨见到了总督导员（他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而且进一步想要伊恩兼任下院的保守党领袖，而拉布假如不在名义上，也在事实上成为“副首相”）。总督导员和伊恩还要进行一次商谈，这样我还有必要再去找拉布谈谈。这一件事是很不好办的，切不可仓促从事。<sup>②</sup>

9月21日巴特勒于内阁会议后来吃午饭。

经过了极为坦率而有益的商谈后，他答应于本周末再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新的建议是：

---

① 1961年9月16日。

② 1961年9月18日。

一、麦克劳德成为党的主席兼下院领袖，另给一闲缺。

二、巴特勒仍主持内政部。

将对外宣布：由于在国内外事务中首相所受到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加，巴特勒这样（摆脱了下院领袖和党主席的职务后）就有时间在各委员会以及内阁等方面来协助我。不能把他正式任命为副首相的原因有三点。（我已经查过所有的先例，其中包括最近在1952年丘吉尔和宫廷之间就艾登的任命一事所进行的交涉的先例。）

一、女王在过去已经正确地指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式官职，而要作出正式任命是必须得到女王批准的。

二、我绝对不能让舆论说我身心衰弱！

三、我绝对不能让别人指责我试图任命自己的继承人从而使这一王权受到损害，并去束缚住党的手脚。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遵照丘吉尔—艾登的先例）找出一些言辞以补偿拉布因放弃两个重要职位而受到的损失。总之，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一行动对于党、对于我们希望在下一次大选前扭转我党的命运这一点，将有极大的意义。<sup>①</sup>

巴特勒以他特有的慷慨气度于一二天内就通知我说，他同意了这个计划，这样只要讨论一下由此而引起的人事更动就可以了。莫德林将改任殖民大臣以接替麦克劳德。他原在商业部的职位则由弗莱迪·埃罗尔接替。这些更动于10月9日宣布时受到了报界的欢迎。

人们完全理解麦克劳德成为主席的意义。它意味着“保王派是进步的”。<sup>②</sup>

在财政部中恢复秘书长这个古老的职位，也是这次人事变动内容之一。我派亨利·布鲁克担任该职。1970年，我的儿子莫里斯在一个出奇的机会中也被委以同一职务。对财政大臣的这一个

<sup>①</sup> 1961年9月21日。

<sup>②</sup> 1961年10月10日。



双重的支持受到了广泛的拥护。我对于巴特勒是否对这个新安排完全满意感到有点担忧，但在听到他对此非但未曾表示什么不快反而自称是这项新计划的创议人而略感放心。

保守党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黑尔什姆向我提出了一项建议，这使我深为感激。他感到我在大会结束时所作的发言应该“简单、直截了当并且同行动联系起来”，而不是全面涉及整个会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问题。这个意见的缺点是：虽然在政策已经公之于世的情况下它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当政策还处于漫长的酝酿阶段时，它就不是那么有价值了。我们对暂时冻结工资办法负有责任；但是却没有为一个与之密切配合的“收入政策”想出一个头绪来。当大会召开时，代表们似乎主要热衷于查询共同市场的情况以及移民问题，此时这个问题已开始使公众担心。不过暂时冻结工资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即将发生的斗争，却一直萦回于人们的脑际。财政大臣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起主要作用。10月3日大会开始之前，我冒昧写给他一张便条：

我想你一定看过了《工人日报》。它是最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家报纸。它今天发表的社论应该对你很有帮助，因为它指出哈罗德·威尔逊先生及其一伙并不反对工资冻结。他们的决议是反对政府破坏仲裁而不是反对限制工资。该报说得很对，威尔逊先生在发动“六十年代的前进路标”辩论时，的确说过工党政府要比保守党人更能够使人民同意作出牺牲，并克制自己。因此他们的口号应该写成“投工党的票以求得到更大更多的工资冻结”。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在布赖顿就此点大做文章。总之，我希望你每天看《工人日报》。

不巧，这些重大的问题不是通过辩论而是由事态来决定的。报界对大会讨论情况的反应是饶有兴味的。

比弗布鲁克系各报调子缓和：《卫报》……由于布林姆普上校没有露面而失望，特别是在共同市场问题上。《先驱报》可称是气量大了。《泰

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巴特勒罪行的社论，十足像“姑奶奶”那样地叽哩咕噜。《每日电讯报》对政府相当客气。《镜报》好得很。它对女王陛下政府和保守党对共同市场的政策作了赞扬。使我特别高兴的有两点：（甲）我党——作为一个自由的、进步的、现代化的、有效率的党——的形象又得到了恢复；（乙）它的多样性得到了强调——贵族——霍姆勋爵；学院和文官传统——巴特勒；新的经理类型——希思；强有力的政治品格——桑兹；进步知识分子——麦克劳德。他们都干得很成功。①

不过工业战线上的迹象是糟糕的，

不但在福特厂及鲁特斯厂，而且在南威尔士的钢铁厂里也发生了新纠纷。铁路工人也要进行罢工。我原来耽心的工业上的“艰苦”的冬季已经来临了。不过这总比一下子滑到通货膨胀的境地要好一些，而且在1961—2年间发生工潮总比在1963—4年间发生好一些。

幸运的是，教师们在下院召开经济问题辩论会之前，就取消了他们原来扬言要举行的罢工。这个辩论会是规定于10月23日举行的。但是劳工战线的形势仍然险恶。

阿克顿市的鲁特斯厂的罢工仍在继续中，那里的一千名“未经工会认可”的罢工者使考文垂市的成千上万的工人无工可做——并且对出口造成重大损失。福特厂的情况较好，那里的罢工已经结束了。南威尔士的钢铁工人继续在罢工——一万五千名工人仅仅为了涉及三百多名高炉砌砖工人的无谓争端而举行罢工，而据说这些砌砖工人的每周工资仅在三十五镑至六十镑或七十镑之间而已！②

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即：

是否应该同意罗本斯勋爵和煤炭管理局的建议，他们要把每吨苏格兰煤的价格提高十五先令。苏格兰煤矿每年都有重大亏损。罗本斯勋爵想借此减少市场对苏格兰煤的需求，以便把情况最差的矿井封闭掉。可是我们又如何能使这一点同另一个做法调和起来呢？即——基于社会的

---

① 1961年10月13日。

② 1961年10月24日。

原因——把半个科尔维尔钢铁厂的新厂设于苏格兰，而不是基于经济上的理由把它设在南威尔士。<sup>①</sup>

在此同时

44

发电厂即将发生工潮的可能性有所增加。（电力工会领袖）福克斯已提出立即增加工资二镑的要求。不论是从金额还是从期限来看，这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这十五万工人能置全国于死命，由于这些发电厂彼此之间比其他工厂有更大的连带关系，而且它们的情况极为复杂，我们不能像应付 1962 年大罢工的做法那样做。现在不论是工业生产或是家庭生活全都需要用电，而我们仅仅能发出极少量的或是极其不足的电力以应全国之需。<sup>②</sup>

有了此后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现在已能很好地理解任何一项限制工资政策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其复杂性。毫无疑问，当 1961 年 7 月财政大臣为了应付国内经济困难，首次提出了这项临时应急措施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同事，对这种做法的含义都还不十分清楚。总之，我们认为暂时冻结工资措施是对一切有关的人——雇主、雇员和普通公众——的良知和爱国心的一种呼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开始对牵涉面如此广大的一项政策的复杂性有所认识了。在不少企业中，劳资双方达成了根据生活费用上升程度而自动增加工资的协议；在另外的一些企业中，已经达成了即将增加工资的协议；还有一些企业的劳资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此外，很多地方是采取仲裁协议的办法的。是否应该停止执行或抛弃上述这些协议呢？就是在政府本身的雇员中也同样存在许多不同的种类。某些机关文职人员协会也采用了类似私营企业中按照生活费上升程度自动增加的办法或是仲裁办法。在其他地方则长期以来一向存在着下述的协议：某些政府企业单

---

①② 1961 年 10 月 26 日。

位的雇员由于同行政人员有别，应该按照有关的企业工资办法处理。最后，还有受国有化的企业雇佣的一大批人员。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和中央政府在法律上的关系是微妙而暧昧的，政府对他们  
45 又该怎样行使权力呢？是否可以发出一道通令呢？是否可以发出一道特别命令呢？或者仅仅唤起他们的爱国责任感呢？而且，由于暂时冻结工资措施仅作为临时应急办法，一旦经济好转就要予以放弃，要不就是会被另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所取代，那末我们是否一面希望这个不够完善的临时性堤坝至少能抵挡一下洪水，一面就让这个无可避免的漏洞存在下去呢？

所有这些长期以来一直酝酿的问题，终于由于电业管理局对其职工工资纠纷所作出的一项决定而爆发了。

这是第一次严重违反暂时冻结工资规定的事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电业管理局的软弱，部分是由于主管大臣(的软弱)。……参加工资谈判的代表经过了十一个小时的争论后，于星期四深夜打电话（给那位大臣），并且告诉他说，他们认为除非接受劳方所提解决办法，否则别无他策，这个办法远比原来电业管理局和大臣们——非正式地但是肯定地——一致同意的条件还要糟糕。这个办法同意（每小时）增加工资二镑而不是一镑，而且要从1月28日而不是从4月1日算起。……[这个大臣]在电话中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采取措施。他本来应该要求谈判代表停止会谈或者暂时休会。他本来应该立即通知我或者财政大臣或者米尔斯勋爵。<sup>①</sup>

次日舆论和党内都大闹起来。甚至象《经济学家》那样一向镇静的刊物也宣称：

政府应就它在电力工人工资问题上所作退让的责任，受到最严厉的批判；首相活象庞修斯·彼拉特<sup>②</sup>那样无可奈何地紧拧着自己的双手说，

---

① 1961年11月20日。

② 庞修斯·彼拉特是古罗马驻犹太国的总督。他把耶稣·基督付诸审判并处以死刑之后，却自称自己对耶稣之死没有责任。——译者



他自己和他的内阁同僚都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这样地说是无补于事的。

可想而知,那些更畅销的报纸的措词肯定是更为激烈了。

在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党的会议上,大家似乎普遍感到,假如不取得法律上的权力,暂时冻结工资办法就难以维持下去。不过我却感到绝对不应该仓促作出决定。而且也不应该要求那位大臣辞职。我在下院以一篇经过精心撰写的声明来应付这桩事,人们对它的反应不坏。我的目的是要尽量把这一事件化小。不过紧接下去的反响是具有危险性的。要末暂时冻结工资办法整个地夭折,要末我们就不得不去取得法律上的权力——至少在这个阶段中这样做是极为危险的。 46

我党忧心忡忡,这也是很自然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去引导他们,以免他们去寻求愚蠢的补救办法。<sup>①</sup>

圣诞节前的那几个星期,日子不太好过。这一部分是由于上述事件的结局所造成,还有就是党的右翼的某些活动分子对我有私怨,他们一直不赞成我。

但是在12月18日进行大规模辩论的那一天,虽则警报频传,政府还是得到了大力支持。

经济问题辩论会很平静地进行着。我党(由于发出了要求党员支持的呼吁)多得九十二票。这表明我党内开始恢复稳定了。<sup>②</sup>

在下院中突然爆发的刚果危机,的确象是比工资问题更为紧迫而可怕。<sup>③</sup>

不过总有这么一些 Frondeux(专找岔子的人),他们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制造麻烦。

---

① 1961年11月21日。

② 1961年12月18日。

③ 见《指明方向》原书第451—455页。

发现了一个死硬派核心集团——由十至十二名我们这边的议员组成——他们对我本人以及我的“进步”同僚十分仇恨，总是利用我们的每一个困难或是危局来掀动大规模的动乱。一般说来，他们是无法吸引持“受尊敬的”观点或者持“中间”观点的党员的。但是他们可以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影响他们之中某些人——例如，女王访问加纳、刚果问题、为解决电力工人工资问题以致于破坏暂时冻结工资措施、移民法案、对煤矿工业的贷款等等……但是我认为真的想要使政府解体或分裂的人是极少的。<sup>①</sup>

12月13日，我在离开本国前往百慕大去会见肯尼迪总统之前，给女王呈送了一份报告，扼要叙述了迄至年底为止的形势。

47

国内战线上的经济战仍在继续进行。总的说来，在工资问题上，我们的防线守得相当好。正象任何战役一样，总是有些失利的地方，但是大体上我们是能够稳住局面的。不论是工业方面或是非工业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受到暂时冻结工资办法的约束。主管大臣对许多工资纠纷虽没有什么法律上的权力可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不过至少已使其从秋初推迟到次年1月1日。我们在同消防员打交道时也能维持这个原则。虽然报界对此事有误解，并把它说成是一次失败，而它在实际上却是一次胜利，因为我们对地方当局说，假如他们要照自己的办——10月初实行工资调整——的话，我们就要拒付有关的额外补助金，他们终于屈服于这个要挟。由于电业管理局的软弱，使电力工人得以免受此种限制，我对此已公开予以斥责。但是，假使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对陛下讲的话，应该说，我们这样撤退下来是有利的，也许我们撤退时并不是那么井井有序，但是我们毕竟还是从战线上无法坚持的那一个据点撤下来了，因为一旦罢工爆发，我们在技术上还没有什么有效力的方法来产生相当数量的电力以应需要。

情况就是这样地继续下去。

我对于积极的方面，即财政大臣的“由各方共同草拟经济规划的”建议，寄以更大的希望。我想工会迟早是会赞成这个办法的——已经有了

---

<sup>①</sup> 1961年12月20日。

一些很友好的表示。如果我们不是集中这么多力量你争我夺要分享那每年新增加的那一小块饼，而是力求把每一只新出炉的饼弄得越来越大，那显然就要好得多了。我坚信，只要有关方面都真正作出努力，这还是办得到的。

在英镑方面，我们受过一二次冲击，不过总的说来，搞得还不差。我还不知道12月份的国际收支结果怎样，但在11月份则有了五千九百万英镑的盈余，我们动用了其中的五千万英镑去偿还我们欠国际货币基金的某些债务。

圣诞节期间，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忧虑：

英国目前所面对的国内外问题，的确是可怕的。虽然公众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危险，而且对自己成为受害者这一点感到不满，因为在许多地方原是可能使生活过得很舒服的，但似乎没有什么人能理解那些问题的复杂性。<sup>①</sup>

我开始感到，频繁的出国旅行每一次都使我更加疲劳。这些会谈使“人”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也不能从报界听到什么鼓励的话。它们

继续抨击政府。《泰晤士报》更其自以为是，而且教人冒火。幸而我感到那善于说长道短、热讽冷嘲、虚张声势而又是气量狭窄的——和善于造谣生事的——报界的市场越来越小。电视、广播、教育电视广播、无线电广播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肯尼迪告诉我，他那时正在利用电视越过基本上怀着敌意的报界直接向人民呼吁。我不知道照美国每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的办法是否值得一试。<sup>②</sup>

不幸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天看来也不会让我松一口气。

似乎现在大家一致同意让我于1月8日或9日上波恩去会见阿登纳。这实际上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会引起麻烦。但是由于在过去几周里大家相互（除了这一位之外）作了访问，我对阿登纳进行了这次访问

---

①② 1961年12月23日。

后,就可以凑成一局国际四人牌戏了。①

1962年一开始,在政府面前就摆着一大堆复杂而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起码得使六个月前由财政大臣所宣布的暂时冻结工资政策维持到春天。虽然我们不能期望它成为一项天衣无缝的制度,不过我们认为这可以使我国经济中的某些弊病暂时缓和一下,这些弊病是由于工资开支数字实际上升而生产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而引起的。虽然这些弊病还没有达到象我们此后经常感到的喘不过气的程度,但是我们觉得这不是国家所受得住的。即使工资只增加百分之三、四、五或者——至多——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二十或三十,增加金额只不过是几先令而不是好几镑,可是工资不断地增长下去,其结果情况可能是同样严重的。我们可能不得不实行货币贬值,随着这剂药的药性减退,就要发生大规模失业的现象。我本人认为,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工党政府要比保守党政府更合适一些。总之,这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不过工资暂时冻结只能临时应急;我们必须在此期间另搞出一套令人满意的长期性制度来。换言之,我们必须在目前通称为“收入政策”——这个概念在当时几乎是无人知道的,但是在今天不论其含义好坏如何,却已是家喻户晓的了——的领域里做闯将。不过我也同样地决心要以更加积极的行动来配合这个消极的政策;所以我热情地支持了财政大臣的大胆建议——建立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这同时,我一直在担心,他会屈服于财政部官员们以及英格兰银行要求实行通货紧缩的压力。我不认为,特别是在当时工资上升还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一项遵照正统方式制订的全面紧缩通货的政策能够制止工资上涨,这是蒙泰古·诺曼一贯主张的而且为两次大战之间历任财政大臣所奉行的紧缩通货政策。我们已经使当局同意将银行贴现率一再降低下去。它在1962年初为百分

① 1961年12月23日。



之六。我希望把它继续下降,并希望增加银行信贷,以便使银根相应地松动起来。同时我们还要在下院内外应付党内必然产生的失望情绪,并且要鼓起勇气,以便应付那无可避免的补缺选举,在选举中,保守党可能难以保住它的席位,投保守党的票的人就会作鸟兽散,他们不是弃权,就是因为相信自由党现在已重振旗鼓的渺茫诺言而上当。要是我们能够挨过所有这些困难而且能够制订出一个即使不是得人心的但是至少也会令人肃然起敬的预算的话,我相信只要一到夏末,我党就能基本上恢复元气。不过在眼前:

一切要取决于:(1)再坚持执行暂时冻结工资二三个月,(2)能够转入“限制工资”的办法,(3)把长期计划的机器开动起来。<sup>①</sup>

现在斗争真正开始了。虽然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在绝大多数 50 的情况中,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似乎都很自我克制,回想起来这一点是很奇怪的,但是坚守原则是重要的,因为这个问题正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如往常一样,这类严重的事情中有许多很滑稽的现象。邮政职工正在实行“照章办事”。公众对信件及邮包传递得不及时,仅仅略感不快,而对足球赛赌注的交易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这一点,却极为忧虑。不过幸而这总算避免掉了。此外,一个关于怎样区别“照章办事”和“怠工”的典型的全国性辩论开始了。可以根据传统的理由把“照章办事”看成是正当的,而且往往会不可思议地使怠工者得到相当多的加班工资。而“怠工”则可能受不发工资的惩罚。邮政技工工会于1月20日也跟着邮政投递员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的这一表示抗议的行动一直继续到3月中旬。各脑力劳动者工会以及各产业工会都注视着这一纠纷的结果。但是当行政机关办事员协会于1月4日宣布他们也将采取同一策略时,秘书长亨利·布鲁克就向他们保证,政府打算在暂时冻

---

<sup>①</sup> 1962年1月5日。

结工资办法终止以后恢复不受限制的仲裁制度，工资暂时冻结办法可望于3月底告一段落。这就使工会领袖能够约束住激进分子并维持正常工作。

产业工会现在开始强行要求当局接受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作为这一战役的前奏，几条地下铁道和几条电气化铁路工人举行了几次为期一天的罢工；部分机械工业的工人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所有这些风波之中，总有可以稍为松一口气的地方。《年鉴》是这样说的：

从事制造板球的全体一百二十名工人在1月26日威胁说，如果每小时不增加六镑额外工资的话，他们就要举行罢工，这样就使全国的人心整个地冷下来了。不过这个灾难总算是避过了。<sup>①</sup>

51 1月5日财政大臣同职工大会的领袖会谈后，向他们发出了一封重要的信件，要求他们配合，使1962年工资增加幅度不超出财政部所估计的生产可能增长的限度之外。这个限度估计为百分之二点五。这个将于工资暂时冻结办法结束后实行的原则，不久就以“指路明灯”而闻名——这是一个含义复杂十分奇妙的维多利亚式的成语。虽然职工大会的正式答复并不令人鼓舞，但是公众对公布的来往信件很表欢迎：

同财政大臣举行了会晤。致职工大会的信效果很好。我们现在得应付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还有煤气、公共汽车、以及某些其他公用事业职工）增加工资的要求。行政机关的“怠工”算是“结束”了（它造成了不少辛辣的笑话。行政机关办事还能比现在更慢吗？）<sup>②</sup>

我的日记反映了这一场奇怪而又相当不协调的战役的发展经过。

十一时三十分见到财政大臣。我们同意由财政部发表一篇关于铁

<sup>①</sup> 《1962年年鉴》，第2页。

<sup>②</sup> 1962年1月15日。

路工人工资问题的声明，（由于米尔斯勋爵、约翰·黑尔以及欧内斯特·马普尔斯的共同努力）比钦博士终于被说服同意这个声明。我们希望这样就可以促成仲裁办法。但这并不是一项对双方有约束力的仲裁。邮政局中的“怠工”仍在进行之中，而且劳方领袖正发表带有威胁性的声明。不过有迹象表明，职工们对此已感厌倦。<sup>①</sup>

在所有这些纠纷之中，人们由于听说职工大会的经济委员会已经同意去参加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而得到一些鼓舞。虽然他们是在一个明明白白的条件下才同意这样做的，然而由于他们同我们政策的有成果的和积极的那一面发生了关系，这至少能够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上述的那个条件是不能期望他们的代表去向他们所属工会鼓吹限制工资的办法的。

在议会召开前夕，我感到，“在国内……我们正在‘暂时冻结工资’方面以及整个经济战线获得进展”。<sup>②</sup>1月24日，我发表了一篇包罗万象的广播演说，其主题之一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论点：不论我们在任何活动领域里的政策如何，我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赢得一席之地。虽然据说这篇演说总的说来还能被公众所接受，我可并不感到满意。举国上下都有一种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开始在工业界日益增大的压力上反应出来，而且还在政治上人们对政府缺乏支持这一点上反应出来。但是，当议会召开时，我党似乎并不气馁。

我们对铁路工人工资所作的决定引起了一阵抗议的浪潮。这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们原以为自己会被批评为软弱，结果反而被说成是过于强硬了！<sup>③</sup>

恰巧当时内阁正为次年预算而争论不休，它对工资问题显得很坚决。

---

<sup>①②</sup> 1962年1月19日。

<sup>③</sup> 1962年1月24日。

1月29日，下院开会几天后，工党自然地对我们的工资政策提出了不信任案；不过它似乎并没有在下院内外造成什么深刻的印象。这次辩论中最重要的声明，是劳工大臣约翰·黑尔代表政府发表的关于暂时冻结工资办法将于3月31日终止的通告，并表明此后可能开始实行一项新的而且略为灵活的制度。

我们就这个新制度的形式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政府的初步想法见于财政大臣的白皮书《下一步办法：收入政策》之中。<sup>①</sup>

53 这样就吧一个衡量标准定下来了，政府希望通过这个标准来衡量提高工资的要求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而且希望包括仲裁法庭在内的其他方面也这样做。这样，生活费用上升本身就不能作为要求提高工资的理由（这是试图把战后通货膨胀最主要的螺旋形上升曲线之一割除的一个尝试）；除非由于人们接受更为吃力的工作或者更为艰苦的工作条件，或者由于放弃了工作上的陈规陋习而获得增产，一个企业增了产并不能作为增加工资的充分理由。再也不能接受相互仿效的原则了，因为这意味着：某一企业通货膨胀式地增加了一次工资，其余的这类要求就会接踵而来；企业在提高劳动报酬之前应该考虑到国家标准。<sup>②</sup>

虽然这些意见是很好的，但是财政大臣和财政部希望开展的宣传运动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在另一方面却出现一些有希望的迹象：

经过一个月后，邮政职工放弃了他们所进行的“照章办事”。邮政总局局长没作任何让步而做到这一点是令人满意的。铁路及地下铁道工人似乎可能放弃未经工会许可的“为期一天的”罢工或怠工的做法。我们可算搞得相当得手。<sup>③</sup>

2月初，罗本斯勋爵向煤矿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百分之四，比钦

---

① 敕书 1626 号（伦敦，1962 年 2 月）。

② 《1962 年年鉴》，第 3 页。

③ 1962 年 2 月 2 日。



则向铁路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百分之三的建议。2月14日，三个铁路工会中的两个工会就劳方扬言要举行罢工的事来找我商谈。

关于我应该对他们怎么讲的问题，我们内阁同僚之间和财政部专家之间进行了多次的商讨。最后大家通过了一篇我必须去遵守的文件。我对工会代表们没有作出任何诺言或者对他们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在这个有点干巴巴的基础上）我试图使他们抱“一线希望”。同工会代表谈了三个小时；喝了大量的威士忌酒等等。昨天据宣布铁路工人将不举行罢工。这是值得大大宽慰的。报界很客气地称之为“麦克的胜利”等等。它转变得多么快呀！但是直到议会在进行辩论时，直到我们提出“关于炸弹”的倡议时，直到铁路罢工得到解决前为止，它还一直把我称为年老体衰的首相呢。<sup>①</sup>

铁路罢工事件结束以后，我于2月16日写了一张通知给米尔斯勋爵，他在这些风潮中一直是中流砥柱。

这仅是表示我对你在最近的经济问题上，特别是在铁路工资问题上 54  
对我的帮助的谢意。我有了你这样一个可以倚靠的人得益极大。

我现在所关切的是：我们万万不可由于受到政府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或者集团的恐吓而增加工资从而显得和铁路工人过不去。那末，比如说，煤气工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你可否（对此）留神一下？因为假如我们一下子让煤气工人增加工资百分之四的话，铁路工人就振振有词了。这样，这一场颇为紊乱而无结果的战役就继续下去；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按理是可以感到满意的。我们告诉教师们说，他们增加的薪金不能超出百分之三。他们似乎同意这样办了。我们向护士们提出增加薪金百分之二点五的建议，他们的代表们组织了一个抗议运动，由于护士们的薪金较低，他们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公众的大力支持。不过大臣们要是抛弃掉他们所专门负责的领域中的总原则的话，那末就更不可能期望工业中其余的人再去作出什么努力了。迄至暂时冻结工资办法终止时，虽则政府失去了不少人心，它

<sup>①</sup> 1962年2月16日。

至少还是达到了它的一部分目标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医治经济的这一剂药开始生效了；1961年国际收支差额实际要比我们原来期望的为好，看来1962年的前景是良好的。这样第一个阶段算是结束了。我们对下一阶段已经作了一些考虑，但是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在此同时，这几个月里的政局假使算不上令人惊惶的话，也还是很不利于我们的，极容易惹起反对意见，而且使我们朋友中不够坚定的人为之忐忑不安。

2月初，我向“1922年委员会”的一次挤满人群的大会发表了讲话，这个组织是由政府大臣以外的保守党议员们组成的。它的会议内容规定要保密的；可是在有二、三百人参加的会议中，可想而知，破坏这条规则的情况比遵守它的情况更为常见。

55 今天各报发表了关于这次“秘密”会议的冗长而且有倾向性的报道。

总督导员自然感到狼狈。①

次日发生的一桩新的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位讨人喜欢的但是有点古怪的议员哈里·莱格—伯克爵士发表了一篇讲话，对我大加赞扬，不过他又说我已经精疲力尽，应该退休，以便把位子让给一个年纪较轻的议员。②这番话自然成为哄动一时的新闻。我的许多朋友愤怒地写文章为我辩护；不过熟知下院内情的人都知道，这类事情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人们对畅销的报纸以黑体字大标题登载的所谓“对麦克米伦的叛变”以及人们对正在准备中的宫廷政变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一时无疑地会给公众造成深刻的印象。幸而在2月5日有一次重要的外交事务辩论会，在那次会中我对自己至少在议会中仍旧保持原来的地位这一点感到有把握。

昨天总的说来是一个好日子。除《曼彻斯特卫报》之外，新闻界（一如平常）没有对辩论的内容作客观的叙述。《每日镜报》的大标题是：麦克

---

① 1962年2月2日。

② 1962年2月3日。

失败了(发行额四百五十万份)。**《每日快报》**的大标题则写道: 麦克胜利了(发行额也是四百五十万份)。**《每日电讯报》**在发火。……**《泰晤士报》**说得牛头不对马嘴等等。但是对这一情况,人们总是可以想见的。我知道,下院认为我的演讲很好——它并不算是一次辉煌的成功,也不是雄辩滔滔,而只是很好的、能说服人的辩论。我党感到满意,而且还不止于此——几乎可说是情绪热烈。有一些永远不会满意的……不怀好意的政敌。也还有一些象莱格—伯克那样有趣的怪物,他现在到处对人说他并没有看到过我的广播演讲词内容,或是听到过我对“1922年委员会”的讲话,可是他却把这两桩事作为他攻击我的口实。……盖茨克尔先开个头,讲得很好。我接着发言。哈罗德·威尔逊以他惯有的“在我们脸上大抹黑”的方式为反对党作最后发言。特德·希思为我们作最后的发言,狠狠地回敬了威尔逊。表决时我方多得了九十八票(从约克郡来的我党四名议员迟到了两小时,否则我们还可能多得一百零二票呢)。当宣布进行表决时,丘吉尔走到前席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他(沉重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和我一起掌声中慢慢走出会场。①

第二天夜里,我不得不在伦敦市政厅向七百名银行家发表讲话,会议是由我的朋友沃尔特·蒙克顿主持的。我一直认为,同一个银行家见面是一桩相当苦的事;可是在向七百名银行家作演讲时,我倒反而感到自己就象丹尼尔那样进入了狮子窝。②我在事前也没有时间作准备;虽则别人已经交给我的那份草稿是一篇出色的论文,我也无心照它念出来。我将其撕掉,然后作了“即席发言”。对学究式的论文听得发腻的听众,对于明显地发自内心的讲话是会感到欢迎的,这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次日**《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个有见识的评论家的文章:

---

① 1962年2月6日。

② 丹尼尔是古犹太先知之一,被巴比伦人所俘获。后因受巴比伦国王的宠信遭到波斯僧人的嫉视,他们劝使国王把丹尼尔投入狮子窝中去。丹尼尔毫不畏惧,而且安然无恙。——译者

首相强调了英镑的稳固地位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情况，就是政府对某些指责的答复，这些指责说，7月25日所采取的包括暂时冻结工资在内的一些措施都已经失败了。

从那个时候起，外汇储备增加数额已超出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所借款项的金额，其中有一亿五千万镑已经偿还了。国内市场上的需求已减少，进口已经停止增长，每周工资指数的增长还不到一年前同期指数的一半。

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使国外的舆论注意到这些有利因素，而又不至于使国内产生我们实际已在经济战中赢得胜利的印象。这样就引起这种埋怨，说大臣们，特别是麦克米伦先生，时而乐观，时而悲观，摇摆不定。

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部长们无论是在平时或是在战时所经常遇到的困境的一个正确的概括说明。

几天后，我写道：

总的政局没有变化。政府失去了人心；不过反对党却没有得到它。在各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投自由党的票的人和“无所适从”的投票人似乎有所增加。这是因为选民自然而然地离开了已经执政十年的政府，而工党却是既无吸引力又缺乏主旨。在政府本身之内，许多大臣们都疲劳不堪，年老的人是由于身体衰退的天然原因，年龄较轻的人则由于我所认为的原因，即现在的青年人还不知道怎样去进行工作。目前压在我们身上的确实骇人的重担——物质上的以及精神上的负担——会使一个身心正常的城市大亨为之大惊失色。一个“工人”只要这样地过一个星期就会感到吃不消。（就我的年龄说来）我的身体还相当好，不过只是由于我自己十分注意摄养，一有机会就（尽可能卧床）休息，所以才做到这一点。最伤精神的事或许就是人与人之间的<sup>①</sup>问题——阁员之间的不和、隐约地提出要辞职的要挟等等。最近这些事情比以往几年多得多。这也是很自然的。在1956年，那艘船实际上正在下沉，人们除了要设法使其浮起之外，也顾不到其他的事情了。<sup>①</sup>

57

<sup>①</sup> 1962年2月16日。



我有必要显得镇静而且心情愉快。

昨天我走进吸烟室就座时，才发现自己是同莱格—伯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这个可怜的人显得十分尴尬，想要溜走。但是我设法使他和我的交谈；请他喝酒；还吸引了不少朋友围上来。铁路罢工问题获得解决的消息刚刚宣布，许多工党党员也象保守党党员一样向我祝贺。可怜的哈里却似乎在怀疑，这个可怜的老首相是否到底真的不行了，只配被人家解除职务或是废黜掉呢？<sup>①</sup>

正象我所预料的那样，在几次补缺选举中投票人开始显出对政府的不信任，他们不是去投工党的票而是投自由党的票，以显示他们的不满。不少人无疑地认为，这是责备大臣们的一种方式；这绝对不能表明这种所谓自由党的重整旗鼓会一直维持到大选。向在议会中多占了一百席的保守党政府发出警告是一回事；在大选中要去冒工党重新执政的危险又是另一回事。3月8日及13日，在林肯及布莱克普尔两地都进行了补缺选举。保守党在这两个地方都失利了——他们在自由党的挑战之下，在布莱克普尔仅仅勉强保住一个原来万无一失的席位。3月14日，工党（一如预料那样）占有米德尔斯布勒东区的席位，而自由党则进而居第二位。接着保守党在奥尔平顿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个地方一向被认为是保守党在国内最稳固的地盘之一，保守党在这里原来拥有将近一万五千张多数票，其中约有八千票丢给了自由党，实际上没有谁投工党的票。以奥尔平顿的选举为高潮的这一系列补缺选举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工党只能对选举的结果感到差强人意，而自由党却是欣喜若狂了。据信，曾经把自由党的这个胜利称为“难以置信的成就”的格里蒙德先生，甚至开始物色新政府人选了。在此同时，3月22日在庞蒂弗拉克特举行了这一系列补缺选举的第五次选举，由于那里没有自由党竞选，只有极少数选民离开保守党去

<sup>①</sup> 1962年2月16日。

投其他党派的票(不到百分之一),这就似乎证实了这样一个看法:选民是通过这一方式来表示他们对两大党,也许甚至对议会制度本身的厌恶。总之,某些评论家所认为的政治家的开明态度却被另外一些人看作是初期 Poujadism ①(布热德主义)的迹象。

我主要是为了使自己搞清这个问题才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

整个政局已由一系列的补缺选举的结果所左右了,这些选举似乎表明我党的命运(朝坏的这一方面)的惊人变化。……这并不是由于工党的原因。他们保住自己的席位,而我党则由于自由党的重振旗鼓而摔跤。有人说这一现象同1956年在汤布里奇和托林顿两地发生的情况相似,但是它较之这两次却更远为明显,它似乎表明一个真正的动向,这个动向代表着或者表示出选民的真正不满或者他们的某些情绪。……这是中产阶级或者中下层阶级的叛变,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大大改善的生活条件感到愤恨,而且对“富人”——不论他们是否靠公家开支、利润或是本金而生活——的显而易见的荣华和奢侈情况感到嫉妒。这些脑力劳动的“小人物”——职员、公务员等等(过去)投保守党的票,为的是“不让工党上台”。现在(特别是在补缺选举中)他们投了自由党的票,为的是“让政府受一次挫折”。所谓不满仅不过是如此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它(就象《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可以算是一次布热德运动。

还有一个时尚所趋的问题。去当一名年轻的保守党员变得乏味了。去当工党党员也并不时髦。自由党无权无势;有点“与众不同”的味道。

这主要是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表示的反抗。核弹问题(它赞成英国取消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对俄国的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柏林问题、罗得西亚问题等等。但是它主要是由于政府不能保持经济的继续稳步发展而引起的。它埋怨“停停走走”或者“时快时停”的政策。它要求大大增加政府开支而且减少捐税。它希望不用征兵制而维持一支较大的军队。它希望不加限制而能维持工资的稳定。一句话,它要的是我

59

① Pierre Poujade 是法国政客,在1945—60年间活动,组织布热德运动以抗议法国税制。——译者

们大家都想要的而又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得不到的东西。

暂时冻结工资——政府的政策——已得罪了大学教师、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公务员、职员、护士、公用事业工人、铁路工人等等。不过医生、大学教师、护士也许对之最为不满。他们感到比起自己所听到的一个普通工匠家庭所得得到的高额工资来，自己的待遇可算相对地低了。总之，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保守党人对此十分担忧。他们自然要找到一个地方来发泄自己的失望情绪。从长远看来，这必定意味着要对党的领导进行攻击。<sup>①</sup>

这一种情况发展趋势如何呢？

到目前为止，党内大部分人都还保持着忠心耿耿的情绪。保守党中央理事会的口号是：“要镇静”、“要沉着”、“别慌张”。中央理事会（恰巧）在奥尔平顿选举的次日召开，而且我也参加了。……会上的情绪是坚定的。在3月15及16两天，我还得前往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我在主要由保守党人组织的但不以党派名义召集的集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与会的人们情绪似乎相当坚定。保守党议员分成了好几派，但是反对党领导的人数本来就为数不少，他们的力量肯定是有所增强的。……

昨晚（3月23日）我前往布朗利参加保守党协会的年会。与会者——全部是党员——都一如往常地忠于党，不过（我认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我同塞尔温·劳埃德（财政大臣）就预算问题作了几次长谈。这个预算是不可能受欢迎的。预算中的税收没有什么变动（有些局部的增减）。其中所提出对投机收入征收所得税——证券交易或地产交易——在理论上是会投合不从事投机的人的口味的，但是它会受到党内某些富人的激烈反对，他们靠市场投机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毋需付所得税。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是麻烦是会产生的。<sup>②</sup>

我继续又想下去，但我并没有改变我原来的结论。

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的补缺选举中，国内政局肯定是要恶化的。这一点也会在某些相当令人吃惊的全国性（民意）测验中显示出来。…… 60

---

①② 1962年3月24日。

自由党的复兴实际上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复活。因为他们既拿不出什么政策，也提不出什么原则。他们纯然是机会主义者。这是一次反党运动。其真正的口号是“你们这两党都该死！”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也是正常的。不过应付起来却并不容易。但愿在外交战线上的事能够得手！（但是即使做到了这一点，它也是会——象塞浦路斯那桩事情一样地——被人忘掉的。）在国内战线上，两周内连续两次降低了银行贴现率，显示出这一剂药正在发挥作用。

但是，星期六出版的各报都一致预言保守党就要可耻地崩溃，而自由党则将复兴，它甚至将有力量来组织下一届政府。……以后的几个月将是不好过的。届时要对欧洲及共同市场问题作出决定。不论这个决定将来前途如何，都将大大改变英国政治的面貌。

我越是考虑到政治形势，就越发糊涂起来了。我们决不能放弃我们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也许会带来成果。但是即使我国经济能够再度蓬勃“扩大”，我们也必须设法去推行我们的“收入政策”。否则我国就必然会陷入另一次英镑危机。假如能使国外形势有所改善的话，那是会对我们有帮助的。我所真正担心的是：经过了这十年的史无前例的繁荣后，人民已经感到厌倦了；要不然或许就是……我们消灭了阶级战争，并且消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人们的这种恐惧既然消除了，就使他们有可能一遇到小小的困难就大发其火来投票反对政府。总之，我们已使英国可以安全地来实行自由主义了！<sup>①</sup>

又一次补缺选举马上就要举行了——这一次是在我过去所代表的地区提兹河畔的斯托克顿市举行的。从新任党主席伊恩·麦克劳德那里听到的情况是不妙的。自由党的浪潮似乎仍然在汹涌着。我不顾我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的劝告，在那个不屈的战士麦克劳德的支持下，决定一反惯例亲自前往斯托克顿。我或许可能使我党在那里至少做到名列第二。我曾经在那里进行过六次竞选——胜败各三次。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在当地人民群众之中生活了

---

<sup>①</sup> 1962年3月25日。



二十五年之久。我们十分喜爱他们，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虚夸地感到，他们对我们是有些好感的。我是在斯托克顿第一次获得政治实践的知识的。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经济大萧条的可怕年代，它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虽然意识到一旦彻底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还是决定去冒一次险。我和多罗西也象以往一样整天在街头奔走，晚上还得去参加一次大会。 61

星期一（4月2日）一整天——从上午十时半至下午十时半——都用于街头的巡行竞选活动。我在丹麦宫所作的演说似乎颇受人数众多的与会者的欢迎。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党可能名列第二，而我党则将屈居第三位。不过我党还是勉强地取得了第二名，这使我大为宽慰。星期四半夜传来的消息的确令人大感快慰，对于我前往斯托克顿一举是否明智，人们意见不一，但是事实证明我做对了。（甚至象《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那样通常抱着敌意的）报纸也对我的“勇气”大加赞扬。①

我利用在斯托克顿这一个使我感到亲切的城市作演讲的机会，首先为自己在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间去寻找中间道路的一些努力作辩护，这些努力的成果已经体现于人民大众在享有幸福而舒适的生活以及享有财富方面的惊人变化，然后就开门见山地阐明我个人对试图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政策所负的责任：

这事自然是要冒风险的——一切重大的交易都是有风险的。

我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向你们说明政府是希望此事能取得成功的——成功地保住我们英联邦的利益；成功地保住我国实业家以及农场主的利益；而且到最后能够成功地对西欧以及西方世界的事务和前途起更有力的作用。这些赌注是很大的，决不逊于英国过去曾经打算去下的任何赌注。下了高额的赌注为的就是指望有高额的报酬……指望得到和平与安全，指望英国人民日益繁荣和幸福。 62

---

① 1962年4月7日。

这包括所有的人——处在象提兹河畔那样的大工业中心的人们以及处在象附近这一带的农业地区的人们。

共同市场向我们提出了极其艰巨的难题——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政府毅然接受这个艰难的任务。它抓住了这个机会。当然我们既是充满信心又是小心谨慎地、既机敏又负责地去着手进行谈判。这决不是儿戏，而是重大的政策——我们明白应该怎么办。

自由党对英联邦并不负什么责任，而且显然对之不感什么兴趣，然而它却声称：“自由党是主张英国必须加入共同市场的唯一政党。”

而且他们要我们——就这样——不带任何条件并且显然不经过什么谈判就贸然加入。他们无视于此事对英联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所有的新加入英联邦的国家——的利益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似乎也无视于此事对英国农业的影响。他们要我们干脆申请参加共同体，在表格上签个字就一下子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

而在另一方面，工党党人就象谨慎的沐浴者那样，小心翼翼地把手指伸到水里后就立即缩回来了。

如果说自由党人是奋身一跃地跳过水里的话，那末工党党人就是在发抖了。在此同时，我们是做了我所认为每一个认真的人所感到应做的事；我们进行谈判为的是了解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在既不损及又能适当地保障我们对之负有责任的各方面——英联邦、我国农场主以及我们在欧洲其余国家中的贸易伙伴——的利益的情况下加入欧洲共同体。

这无疑是既慎重又体面的唯一办法。

在斯托克顿的选举证实了我关于选民对政府失去信心的这一分析。

63 一般人认为，这主要并非根据大臣们没有向公众好好地通气而犯了政策性错误这一点理由来进行分析。这当然是一种惯用的遁辞。这类话我一生中听够了。其传统方式是去责备保守党中央办公厅。（应该更加公正地说）是大臣们疏于职守，未能使人“理解”他们的立场。后座议员（似乎不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职责）也跟着公众张惶不安。我感到上星期事情似乎变得不可收拾了，而且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变成一场大恐

慌。我党十年来一帆风顺，青年议员尤其是没有过失败的经验，甚至也没有严重挫折的经验。1957年的情况实际上不同于此。我党在1962年的处境要比那时差得多。我认为应该在斯托克顿去进行这番赌博以便带个头。这总算是成功的。但是我当然还不至于愚蠢得连这个普遍性弊病是多么根深蒂固也不知道。工党没有得到什么。保守党不满分子投了自由党的票——不是由于他们受到自由党的某些人的人品或是政策的吸引，而是对保守党一种抗议。我们不得不去执行的经济政策自然是很不得人心的。现在既然已经开始收效（英镑地位稳固、银行贴现率降低、国际收支有所改善），我们就可能开始在政治上恢复威信。不过这一次要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人们确实是对我们厌倦了——他们讨厌我们的面容、讨厌出现在漫画中的我们的那几张脸孔、讨厌我们的模样；他们特别是想找到一个“替罪羊”。他们也实在感到乏味了。不过在几个月内，重大的欧洲问题就得争论出一个结果了，这将会使人们得到一种现实感和兴奋感。<sup>①</sup>

在这同时，我于4月2日从伊恩·麦克劳德那里收到一份有价值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以一个十分周密的分析为根据，表达了他对奥尔平顿这次选举情况的看法：

有一个情况是非常清楚的：诸如退休金、甲类税目表、裁减核军备、殖民地政策这一类容易引起群众不满的原因，同这次选举的结果没有什么关系。特别主要的因素是对工资政策的不满，而我最最怀疑的那个因素，即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也同此有关。我确信这一点是正确的，即一俟暂停增加工资办法开始收效，大部分的不满情绪自会消失，不过这主要取决于预算本身的内容以及财政大臣发言时的措词。至于第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着手去指出在隧道尽头的光明；至于第二点，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我们真正希望的是一项发展经济的政策，而且我们将致力于此。

预算提出后，政局似乎既没有趋向好转也没有恶化。4月中

<sup>①</sup> 1962年4月7日。

旬在德比市举行的补缺选举中保守党屈居第三位，这似乎已成为遍及全国的动向了。不过对正式的反对党说来，这也并不好过。

在德比补缺选举中我们惨败了——我们是第三名——自由党仅比我们多得几百票（与斯托克顿情况恰好相反）。我们于大选中在那里获得的二万票减少到一万票。换句话说，这一种情绪正遍及全国——东北部（米德尔斯布勒及斯托克顿）、西北部（布莱克普尔）、伦敦郊外（奥尔平顿）、密得兰（德比）。这是在短短几个月中的极端不平常的变化。去年秋天的选举很正常。至少在这一阵——这种背离保守党的情况显然是会继续下去的。<sup>①</sup>

选民的心理变得比以往更远为难以捉摸了，我们现在对于一个选区选民在情绪上的突然而惊人的变化，也感到习以为常了。近年来如同在民意测验中一样，在补缺选举中的投票情况变化极大。不过在这时却没有谁能理解现代政治的这个新特点。

所有的社论作者、专栏作家、随笔作者，各有各的解释，矛盾百出。保守党的议会党团相当震惊。工党对此并不高兴（因为每届十年必然产生的正常的反政府情绪，这次使自由党而不是使工党坐收其利）。甚至自由党人也有些吃惊——他们也和大家一样感到出乎意外。从报上看来，保守党象是整个地垮了。在下次大选后，他们可能成为最小的政党。我作为这个党的领袖曾经于1959年带领它取得了它在历史上的最大胜利，而竟会使它在1963或64年遭到最大的败绩，这是很令人不解的。<sup>②</sup>

不过，我从以下考虑中取得了安慰：

尽管我们开这一剂药明显地不得人心，它还是有其作用的。纵使暂时冻结工资办法有其不公平之处，它毕竟使我国得到了难得的好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生产成本开始上升了，虽然出口增长得并不突出，但前景是好的，情况正在逐渐好转，进口减少了。1961年的国际收支情况远比原来所能设想的为好。1962年的前景非常好。银行贴现率已从百分之七

①② 1962年4月21日。



下降到百分之五。我已经同意在下星期四再把它降低百分之零点五。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将会再出现一次“繁荣”。只要我们能够防止工资增加得太不象话，我们的情况应该是不会差的。可是公众会理解吗？他们会赞许我们的决心和勇气吗？或者他们会不会为了这次千钧一发地避免了的经济灾难而继续责备我们？会不会对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感到不满？当共同市场的谈判达到某一程度时，整个政局自然会发生变化——也许会变得好一些，也许会变得坏一些。这将成为1845年以来的最激动人心的政治大问题。所有的政治信仰及党派组成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六国向我们提出合理条件的可能性又如何。他们会不会对我们很苛刻呢？特别是关于农业以及英联邦的利益方面，法国会不会拒绝作出任何让步？戴高乐会不会“堆着满脸笑容”但是到最后还是让我们上当？这些问题谁也猜不透。我对于自己肩负的重担感到相当费劲而且又感到自己很孤单无助。政治命运的突然变迁立刻就会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反映出来。……假如我的年纪不是这样大的话，我就会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现在倒是青年人持有这种态度，或者他们至少认为自己是这样的。<sup>①</sup>

从4月25日至5月1日这一段期间，我正在美国及加拿大。回国时我听到了地方政府选举的结果的细节。其内容都是关于自由党节节胜利以及保守党惨败的那些情况。地方竞选运动不是以地方性的问题而是以全国性的问题为张本的这种做法变成了公认的规律了。选民背离保守党的情况是极为惊人的。5月中旬，由于我的一位老朋友克兰姆·戴维斯的逝世而有必要在蒙哥马利郡进行一次补缺选举。戴维斯极有魅力，他在国家处于严重危机的期间曾经显示出相当大的勇气。在这次选举中，自由党所获的多数票又增加了五千张左右。

同时，工资战线上的情况显示政府是胜败参半。造船及技工工会联合会以绝大多数票否决了为支持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将举行<sup>66</sup>

<sup>①</sup> 1962年4月21日。

的一次罢工。这事发生于5月10日，可是码头工人的工资却于5月12日增加了约百分之九，这就违反了所谓“指路明灯”的百分之二点五的标准。

在整个星期中，码头工人的工资纠纷激化了。（非常软弱的）资方原来答应我们要末就提出增加工资百分之三，要末就提出每周工作四十二小时。他们于星期二同时把这两点向劳方提出。这样他们一开头出价就过高，于是便屈辱地被迫作更大的让步。因为虽然考辛先生仅对资方的这两项让步稍作变动后——把增加金额一先令改为一先令两便士——就将其交给他的代表们去办，可是他们却于星期五（予以）拒绝了。我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必要准备、派了军队等等。而且当我听到劳方拒绝资方的提议时，就从因弗内斯赶回伦敦（我是前往那里去参加苏格兰统一党的年会的）。

我立即找财政大臣、大法官和劳工大臣来商量。

我们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商讨当时的形势的，即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罢工了，而且不让劳工大臣为了迫使资方作更大让步而向他们施加任何压力。反之，他作为政府成员，早已对他们说过他们已经退让得太过分了。<sup>①</sup>

可惜我们已经晚了一步。资方

已经溃逃了。经过八个小时的谈判后，他们于下午十一时向考辛投降了。这是对我们的收入政策的重大打击，使我们不知道今后怎么办。<sup>②</sup>

政府自己雇佣的人员得受工资限制办法的约束，而私营企业资方却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对劳方工资要求全部予以接受，这一事实是很难掩盖的。不过我看到了下述的事实：虽然大家严厉批评对码头工人所作的让步，但实际上为了罢工已告结束而感到高兴，劳工大臣约翰·黑尔在整个风潮中一直显示出他的才干和勇气。他

---

①② 1962年5月14日。

于5月16日向后座议员的全体会议发表讲话，他指出，虽则政府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的界限在某些地方已被突破了，不过总的说来，<sup>67</sup>这个办法还是成功的。几乎有八起工资纠纷是以增加百分之二点五而获得解决的。现在需要作出决定的是：我们应否取得惩戒的权力以对付违反政策的做法，还是依靠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政府的政策？

财政大臣就预算的主要项目和我及巴特勒都进行了密切的磋商。他所提出的建议公平而且光明正大，但是不令人感到兴奋。这个预算是“不偏不倚”的，所以不能讨好任何人。对于间接税的最终负担作了一些变动；但这不过是一手付出去另一手收进来而已。购买汽车、电视机和洗衣机的税率降低了。而却要把它加在非酒类饮料、糖果和冰淇淋上面去了。第一种税颇受欢迎，可是第二种税却使公众大为不满，就有人喊出“对娃娃课税”这句话来有效地反对我们。我本来希望有可能去取消所谓甲类税目表中的所得税——产业主—产业暂时占用者对这项税收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它既苛刻又不公平。不幸财政大臣仅仅能答应于下一年度予以取消。而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好处却被一个众人所认为的眼前亏所抵消了，因为这次预算的最重要特征是对投机资本的收益课税——这是对人们购买股票后六个月内将其再出售而获得利润所课的一种资本税。

我们曾经竭力设法去控制物价，以使其配合工资限制办法，但是此事颇难实行。这项新的资本收益税至少是对工会所作的一个姿态：鼓励他们热情参加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而且说服他们去接受一些约束。虽然我们认为这项捐税的原则是正确的，不过它的作用却不大。资产阶级感到不快；而工会倒也不觉得它怎样。同时我一直极力向财政大臣和财政部说明有必要实行大规模的通货再膨胀。我们至少已经能够改变1961年7月实行的百分之七的

紧急时期银行贴现率，而迄至 1962 年 3 月 8 日又将它从百分之六降低到百分之五点五。可是我不以此为满足，继续催促采取进一步扩大信贷的措施。3 月 22 日，银行贴现率降低到百分之五。4 月 26 日，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同意再把它降低为百分之四点五，这使我大为高兴。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也以同样的心情把国民经济增长率的“目标”规定为每年百分之四。而我则亟欲改变特别存款的制度，使其总金额相应地增加以作贷款之用。这一措施于 5 月 31 日实行了。这一天贷放了七千万镑之巨。虽则暂时冻结工资办法已经终止信贷有所扩大，但主要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应该去采取哪一种收入政策以及哪一种总的经济计划呢？

在实际上……暂时冻结工资办法是成功的。我们已经赢得了一年的时间，工资增长已经比原来可能增长的程度少得多了；我国的“工资结构”更加接近于法国或者德国（甚至可能还胜过他们一筹），所以商业开始“兴旺”起来了。上月的数字很不错——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资金继续流入，外汇储备增加了。这样，虽则人们认为政府已经失败了，而它的政策却大获成功。<sup>①</sup>

虽然许多大臣们正在私下或集体商讨某种可行的收入政策，但财政部却提不出什么有力的或是建设性的建议，这使我越来越感到沮丧。5 月 23 日，我不得不在艾伯特厅向保守党女党员举行的一次大会致词。虽然听众对我的演讲反应不象上年那么热烈，可是当我们离场时，她们却极力鼓掌，盛况空前。这对报界很有帮助，因为有的报纸可以说听众对我反应冷淡，而另一些报纸也可以说反应热烈。这样所有的读者就能皆大欢喜了。事实上我感到女代表们对多罗西较之对我更表示好感。她短短的讲话，讨人喜欢，把她们吸引过来。

自我就任首相之后，她就全力以赴地为我操劳。她的足迹遍及全

---

<sup>①</sup> 1962 年 5 月 17 日。



国，去参加妇女的各种类型的朴素而充满友好气氛的集会。此刻（她们在会上碰头时）有不少人是和她有私交的。<sup>①</sup>

但是内阁还是拿不定主意，财政大臣并没有为大家真正带个头。<sup>69</sup> 5月24日

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讨论“收入政策”。所有的大臣都参加了争论，大家纷纷提出不同性质的以及相互矛盾的意见。结果是莫衷一是！<sup>②</sup>

我那几个忠心耿耿的顾问所组成的一个小小班子——我的几个私人秘书——在内阁办公厅支持下尽力去帮助大家。

他们为两个大问题工作了整个上午：

(1) “英国与欧洲”，以我于星期六及星期日对戴高乐的访问为根据。

(2) “英国经济及收入政策”。这两个都是棘手的、不知如何是好的困难重重的问题。

关于第一点，我们越来越感到（虽然顾夫·德姆维尔似乎同意把我国的加入欧洲看成是一个“历史的定数”）戴高乐似乎决不希望我国加入。不过这位将军也许感到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公开地而且正面地反对我国申请加入，他极可能指示他的谈判代表们步步设障、耗费时间、试图使所有的人——包括英国人在内——都为之扫兴。如果做不到这点，法国人就会转而采取另一个手段，他们会坚持对我国的农场主以及英联邦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这样我国就不得不自动退出来了。这当然是危险的玩意儿。法国在欧洲（或者欧洲的一部分）的霸权可能维持一时，不过以后就很难说了。继阿登纳之后，德国会怎么办？继戴高乐之后，法国又会怎么办？

关于第二点收入政策问题，我的同僚们意见纷乱——在下院中的党员也是如此。我们要搞出的办法应该比我们目前已经搞出的更具有建设性。<sup>③</sup>

---

① 1962年5月23日。

② 1962年5月24日。

③ 1962年5月27日。

我们现在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老挝及整个东南亚日益恶化的形势上。一直到5月28日,我才能够把我自己关于一个可行的收入政策的想法向我的同僚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我一再找劳埃德和巴特勒两人商讨,但是我对于有些人明显地想把寻找任何新办法的主要担子推到我身上这种态度开始感到不满。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在当时的发言提纲,由于这个大问题——收入政策是否可取或切实可行——尚在讨论之中,现在把需要一小时以上才能念完的一篇发言内容概括复述一下,也许是值得的。

我们有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有盈余、发展经济。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至少是没有一个自由国家,能够长期维持所有这四点。要末就得放弃掉其中一个目标(这一点我是不能接受的),要末就需要建立某种既适用于私营企业又适用于国营企业的长期性收入政策。假使私营企业的工资可以任意增加的话,就不可能一直约束住政府雇佣的人员。我们怎样才能说服公众舆论去赞同把这样一个与传统方法截然不同的制度作为我国工业体制中的固定的组成部分呢?报界是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他们的方针是在理论上实行工资限制,而在实际上却是对报界工作人员所提出的增加工资要求一律照办。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几乎没有可能去完成这项任务。它还是一株过于脆弱的初生的幼树——而且专业性也太强了。一个收入政策必须是一个总的规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规划应该被各方面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而且也被认为是唯一的公平办法。这意味着对“工人”和“职员”的相对地位以及对雇佣他们的条件彻底重新考虑。必须为雇佣工人、多余人员的安排及人员再训练的安排,制订出适当的合同。必须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在整个范围内都适用的估定工资的根据,以代替那些为应付大家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加工资而临时作出的仲裁决定。必须采取行动,必要时得使用抽税的方法来防止

利润在国民收入这块饼中所占份额的增大。最后，为了鼓励经济发展，必须有更大的需求来刺激它，因为我们不能期望所有增产的产品都能够输出国外。这就意味对于特别存款、银行贴现率，尤其是对长期贷款的利率要采取措施。

内阁对这篇不平常的谈话感到有点吃惊。几天后我毫不动摇地又继续对后座议员们提出了这一论点。

我去参加了 1922 年委员会。(据有些报纸说)我是“应召”而往的。<sup>71</sup>我对他们说，由于他们之中有些人——也许只是一个人——是受报界雇佣的，所以我无法对他们作秘密讲话。他们都欢呼起来！接着我说，最严重地违反暂时冻结工资措施的事件之一是报纸发行人造成的，他们已经把新闻记者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十一——“我但愿临时供稿人的工资也能象固定供稿人那样地得到增加”。听众哄堂大笑起来。关于经济问题，我谈了十五分钟。今天由特别存款中贷出的金额达到七千万镑；银行放宽了贷款条件；我们又向国际货币基金偿还了二千五百万镑——这次春天来得晚，不过它终于是开始了！但是（在暂时冻结工资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后）我们必须有（一个）“收入政策”。不要低估困难，但是也让我们大家去试试看。<sup>①</sup>

我感到经历了所有这些困难之后，我已经赢得了整个议会党团的同情和支持。

6 月初，又举行了两次稍为比较满意的补缺选举，

由于自由党的关系，我们（一如预料的那样）把米德尔斯布勒的席位丢失给了工党。但是我们还保持第二位，仅比工党少二千票。这是糟糕的，——不过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中——还不算太糟糕。在另一方面，艾丹·克劳莱却以一千二百票的多数票为我党取得了西德比郡的席位。自由党在这里名列第二，工党居第三。自由党的选票肯定主要地是从我党那里得来的。不过西德比郡的席位一向归自由党所有（在辉格党时代卡文迪什家族占有这一席位；而在自由党时代它则由查理·怀特所据

<sup>①</sup> 1962 年 5 月 31 日。

有)——这样总的说来,成绩还不差。①

虽则我在法国呆了几天,又在伦敦和鲍勃·孟席斯就欧洲共同市场问题作了几次长谈,我还是能够于6月19日完成一个关于收入政策的草案。我在契克斯同三、四个同僚对这个草案进行了讨论:

假使内阁能接受(根据我在圣灵降临节以前向他们提出的概括建议而作出的)这项计划的话,我们至少能够赢回一些主动权。我认为财政  
72 大臣的反应相当冷淡,其余的人似乎很赞成。②

但是在政府从事这一工作之前,我开始认真考虑,我们不仅需要新政,也还需要新人。

---

① 1962年6月7日。

② 1962年6月17日。



### 第三章 移民问题

当我和我的同僚们还在极力应付日益严重的工资问题之际，我们对另一个同样困难的情况也感到几乎穷于应付——突然涌进的、特别是来自新英联邦国家的大量移民。这个问题是于1954年丘吉尔的最后一届内阁任职期间首次受到大臣们的注意。当时在英国的有色人种总数约四万名，而战前只有七千名左右，移入的人数还在继续猛增中。1954年一年中，进入联合王国的有色移民比1953年猛增了四倍。看来这种人口迁入的规模极可能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密得兰地区，有大量新到的移民要寻找工作和住所，这就可想而知引起了严重的住房和社会问题。1954年11月5日，殖民大臣于回答下院的质询时说：

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它的紧迫性，以及它在全国许多地区引起的严重的关注，我们是很明白的，我们决心加紧工作以谋求制订出满意的解决办法。

通晓议会辞令的人们可以从这个含糊的答复中猜测到，在当时对这个问题不会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在以后是可能要加以处理的。

1955年初，内阁对此漫谈一通后，大家同意应为一个议案试拟一份草稿。我记得丘吉尔以相当严厉的口气说，我党不久将不得不在没有他的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竞选，而“保持一个纯粹白种人的英国”这种呼声，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竞选口号。可是他和他的同僚们对英联邦国家和母国之间传统的人口自由移动问题却有意地避开不加干预。不过压力却继续有所增长。1955年，来自西印度群岛、印度、巴基斯坦、塞浦路斯、非洲、亚丁及香港的移民，

总数上升到四万三千人。

1957年夏天，我请内政大臣再去研究一下采取某些控制措施的问题。而在所谓的“种族暴动”事件迫使公众去注意到这一事情之前，始终不曾采取过什么行动，这种暴动在1958年首次发生于密得兰的诺丁汉，以后又发生于伦敦的诺丁山。在这一年中，也象在其后一年中一样，进入我国的移民人数下降了，1958年为三万八千名，而1959年则为二万一千名。但是我感到，我们迟早总得要下决心去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我于1958年9月2日向内政大臣发出了一份备忘录。

当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在伦敦以及其它地方所发生的所谓“种族暴动”的情况时，我相信你将会向它提出报告。我记得我们在不久前，曾经同意在几个月内要再把移民问题研究一下，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在这同时，我们向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它证实了下面这一点：政府对整个问题正在进行研究，不过只有在长时间而又周密的考虑之后，才能作出长远的决策。公众从这里正确地推测到，政府仍旧希望不经过立法手续而能找到一些控制人口涌入的办法。

同时司法部门正确地作出了决定，要对“种族主义”暴行严予惩处。暴动发生后，对“殴打”过西印度群岛人的几个青年作了很重的判决。鉴于有关的九个青年以前没有受过刑事处分，而且受害者也都已经完全复元了，对他们的这些判决几乎近于野蛮了，因为法官对他们判处了四年徒刑。

1958年9月，牙买加总理诺曼·曼利和他的几个同僚到英国<sup>75</sup>来商讨这个难办的问题。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但却没有结论。

为曼利先生(牙买加总理)以及其他西印度群岛的要人举行了盛大的午宴，他们是为所谓“种族暴动”而来的。由巴特勒和艾伦·博伊德同他们交涉，他们似乎进行得很顺利。我希望我们能够不用经过立法手续而使

移民减少,至少我们必须这样试一下。<sup>①</sup>

不幸 1958 年以及 1959 年移民人数有所减少的情况后来又变过来了。1960 年增加到五万八千名。也许我们在当时还没有充分认识战后人口移动的真正原因。它是对较为自然的而且有传统性的移动突然加上的限制的一种反应。巴特勒勋爵是这样说的,

鉴于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有必要以历史眼光正确地看待这一项法案。过去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西印度群岛人由于在国内没有发展机会、没有工作又没有钱,所以移居到美国去了。195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案,从而在实际上堵塞了这条途径。其他美洲大陆的国家也对移民实行各种限制。唯独英国就象她对所有的英联邦各国人民那样地对西印度群岛人敞开大门。<sup>②</sup>

同时,对移民说来,在英国的就业以及(还应当说)失业的待遇,都要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优越得多,以致英国和她的“福利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大。1961 年的移民人数似乎可能成倍增加。它在次年实际上快达到十三万六千人之多。所以我在 1961 年春就明白,我们不能再依靠原来的方法了,许多英联邦国家政府原来是通过这些方法自动地去阻碍人口移出,或者至少使移出的人口限于那些在到达英国时可能获得职业的人们。我们有必要采取更严格而且更有效的办法,不管这项违反我国悠久而被珍视的传统的决定是多么令人厌恶的。<sup>76</sup>

我们大家都意识到任何变革的困难及其意义。多少代人以来,来自任何一个英联邦国家的人一直是能够自由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的。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联邦范围大大扩展之前,大多数的人口迁移的动向恰恰是同目前相反的。那时成千上万的移民是自英国出发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现在却

① 1958 年 9 月 12 日。

② 巴特勒勋爵:《处理办不到的事情的艺术》第 205 页。

有大量的人口开始朝相反的方向流动。由于民族的差异而引起了就业、住房以及所谓“同化”于我国社会的许多问题，要实事求是就无法掩盖这种事实。的确，所有新旧英联邦国家对移入他们本国的人口都是严加控制的。在澳大利亚，这种限制是明明白白地建立于种族歧视的基础上的。“白人的澳洲”是澳大利亚人民的一项坚定不移的决策——几乎是他们的一个教条。澳大利亚的两大党谁也不敢对之有异议。新建立的英联邦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在西印度联邦内部，甚至岛与岛之间也不允许居民自由迁移。所以那些为了请求给西印度群岛人自由进入英国的权利而雄辩滔滔的部长们，恰恰就没有实行自己的主张。不过当内阁决心去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个被勉强采取的而且可能被某些人认为过迟的决定，是既难以执行而又令人不快的。5月30日，

就迁居英国的西印度群岛移民的问题举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现在这个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了。似乎大家普遍同意要在秋天制订出法律来。殖民大臣（相当令人惊讶地）同意这样做。不过我们在秋天以前，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而且同时要请大法官和他的委员会（它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了）继续筹划必要的措施。存在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其中重要的有爱尔兰移民的问题。<sup>①</sup>

77 在夏末，议会开会之前，保守党由于获悉移民人数急剧增加而显然大为震惊。据估计，当时国内有三十五万有色移民。假如容许他们每年增加十万人或十万人以上的话，显然只要在短短几年之内，其所产生的压力就会变得几乎无法忍受了。在10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又出现了政治压力。

虽然巴特勒很巧妙地应付了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他还是同大会的某些人员在这个或是那个问题上发生了纠纷，根据我的经验看来，对待这种人总以坚定为上策。

<sup>①</sup> 1961年5月30日。



他由于显得举棋不定而为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这其实对他是很不公正的。他也象阿瑟·鲍尔弗一样，具有一位杰出的学者的头脑，我个人对之极为欣赏。<sup>①</sup>

事实上，他是告诉代表们说，将于秋季提出有关移民的议案。

这项法律将会小心地避免种族歧视或是肤色歧视的色彩。它将以下述的原则为根据：凡是不拥有足够维持自己独立生活的财产的移民，必须使劳工大臣确信，他们是有了一个现成的工作等着他们来干才到英国来的，要不然就是英国需要他们来服务。政府将有权力防止犯过罪而且有案可稽的移民进入英国。这些限制办法将适用于来自爱尔兰以及“老的英联邦国家”的移民。我国将同有关国家政府进行磋商。<sup>②</sup>

据此，我们向所有的英联邦国家政府通知了我们的这个意图，西印度联邦的总理格兰特利·亚当斯爵士也接到了通知。11月1日，议案公布了——风暴发作了。一开头就可以看出，不仅下院中的工党及自由党议员将会持反对态度，而且许多不同的以及某些 78 意想不到的方面也会广泛地甚至强烈地表示出反对的意见。在大多数报纸中，特别是在投合教育水平较高阶层的态度严肃的报纸中，这种攻击是有双重性质的——第一点是攻击政府没有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第二点则更远为重要，即把自由进入母国的原则再度强调为维持英联邦力量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并把这个原则看作为对宗教和伦理持高尚和仁慈的态度所必需的东西。

第一点是被盖茨克尔特别视为他自己所独创的一个论点，他于11月初进行议会质询时，就开始把它提出来了，并且还出奇地企图重复他在前一次使用过的无效手法，从而把它推向了高潮。<sup>③</sup>格兰特利·亚当斯爵士对我国的行动提出了严重抗议，他甚至宣称，这种行动同在南非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没有两样。可是各岛本

① 1961年10月13日。

② 《1961年年鉴》，第45页。

③ 见《乘风破浪》原书第553页。

身的实际做法却并无助于他的这个论点。但是不管来自加勒比海的困难有多大，我总还是能够避开汉普斯特德如此巧妙地布下的陷阱。

正当我要前往记者俱乐部参加宴会时，我接到一封盖茨克尔寄来的信。他在信中攻击我们没有同西印度群岛人“进行磋商”，引证了格兰特利·亚当斯爵士发来的一分电文，并且要求我在下院发表声明。盖茨克尔说，他就要把他的这封信发表出去。他是在重复使用他于若干年前就“近海岛屿”问题对我使用过的一个手法。我当时还在凯斯尼斯的兰威尔市。那次我挫败了他，而今天我再度挫败了他。我在办公室里准备好了回信，得到了殖民部的同意，然后把信送往汉普斯特德交给他；接着再将内容送交报界——这一切都在上午十时前办妥了。这封信是于宴会时送给我签署的。<sup>①</sup>

这就是时刻警惕而忠心耿耿的属员的好处。在我们交换了信件的次日，盖茨克尔照样是劲头十足地提出了同一个论点。我也只能够把已经对他讲的话重复一遍。

我在信中已说过，政府已经把它的意图通知了西印度政府，请它提出意见，还争取西印度政府去配合执行任何一项已经大略提出的计划。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磋商的含义。也许这位可敬的先生是把磋商和同意这两桩事混淆起来了。

79 也有人提议召开英联邦国家全体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一点是某些不太负责任的评论家所极力主张的。的确很难设想出比这更能破坏英联邦团结的会议了。在这个会议中，每一位总理都不能不向其他总理说明自己在国内所实行的极端严格的限制移民的法律。我可以理解西印度群岛的部长们特别有必要在公开场合采取强硬的立场，不过我也确信他们是理解而且同情英国政府不得不极其勉强地放弃由来已久的做法的原因。

---

<sup>①</sup> 1961年11月22日。

这个关于同英联邦国家磋商的第一个问题，虽然在此刻反对我们的宣传战中起重要作用，其实不过是一个枝节问题。第二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则牵涉到了一些更远为严重而重要的决策。如果说议案内容发表后起了一场风暴的话，那末在下院要对它进行二读时，就可能会不折不扣地引起一场大台风。自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以来，我从来不曾看到下院有过如此激烈的情绪。唯一的不同表现于下面这一点上：我认为，除了盖茨克尔、戈登—沃尔克以及其他一些对此事感到愤慨的人所怀的真正信念之外，某些情绪多少是带有复杂性质的。大臣们在更大的问题上已经遇上了一些困难，再给他们带来一些烦恼似乎不失为一个良策；把一个一向如此忠于大英帝国的党说成为不忠于英联邦是特别有吸引力的。我们幸而有巴特勒主管此事。他作为一个持有自由而进步观点的领袖人物的长期政治声誉对他极有帮助。不过他还是受到了干扰，当一位大臣提出议案时，这种程度的干扰是和议会传统很不相容的。但是他保持镇定，毫不动摇，也不动气，慢慢地把反对党压下去了。他一开始就明白表示，他和他的同僚们是多么不愿意作出决定去提出一项限制移民入境的议案；可是不论这个“门户开放”原则的由来是多么悠久，它在现代条件下却变得无法执行了。联合王国早已是高度发展、人口稠密的国家了。虽然我们对自己能够去接纳数目适中的英联邦同胞以及其他外国人是感到高兴的，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到生活现实。近来移民人数惊人增加的程度显然已使我们无法把这些新来者吸收到我们国家生活中去了。这一定会而且在实际上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危机。它使住房问题尖锐化，而且这些新来者无法在实际上同原来居民协调一致。所以这种自由进入英国的绝对权利是无法再维持下去了。不过我们将会想尽一切方法来确保我们在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之内去尊重这项权利。这个议案的原则是直截了当的。英联邦各国

80



公民中除了能够依靠自己的资财来养活其本身以及受其供养者之外,此后,其余的人可按以下三种办法之一进入英国。第一、劳工大臣将对那些能够证明有着现成的职业等待自己去担当的人;第二、对于那些具备对我国可能有用的专业训练、技能以及学历的人;第三、将实行定额制度,劳工部将据此批准某些申请者,而这些申请者政府认为必要时可随时加以限制。对第三种人适用“依次解决”的办法。对留学生将有特殊的安排。这个措施将属于临时性的,暂行五年,以后如果没有得到经过议会两院决议批准的敕令的同意,就不得延长下去。

产生了一个关于爱尔兰共和国公民的特殊问题。政府内部举行过多次讨论,感到控制移民进入的条文很难适用于南爱尔兰人。为了进行农业收割以及其他目的而来往移动的大量人口,对英国及爱尔兰两国说来都是由来已久而且是很有用处的。要象战时那样地实行出入境限制显然是不好办的。这种限制措施需要封锁厄尔斯特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界线,这一点在和平时期是难以做到的。在许多议员看来,这个关于爱尔兰人的决定,自然而然地证明移民法案纯然有其种族主义的目的,不过这是政府对困难情况加以周密研究后而不得不作出的一项决定。而反对派就以这个对爱尔兰人的例外规定作为攻击的重点。虽然制订法案的目的是

<sup>81</sup> 在于控制来自英联邦任何部分的移民,从而就实行了一个相当于英联邦成员国所普遍使用的制度,可是在实际上,下述的论点却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即纵使没有从西印度群岛以及印度次大陆涌来如此大量的移民,我国也会同样地采取这些措施。政府的不少拥护者,特别是最热衷于大英帝国和英联邦的概念者,不喜欢这项措施,而对于爱尔兰人的决定使他们大为不安。

为爱尔兰共和国移民寻找另外某些可行的计划的说法甚嚣尘上,但结果却证明办不到。



关于移民法案的情况并无好转。有关的大臣们正在制订一项“专门适用于爱尔兰人”的方案——但其内容将是相当贫乏的，恐怕难以满足批评我们的人们的要求。假使为了爱尔兰问题而再度使一届英国政府垮台的话，这就会成为一桩不可思议的笑话了——而这次倒阁却是由于提出了一项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所支持的议案（有如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示）而引起的。<sup>①</sup>

因为虽然我们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但是群众的立场却是毋庸置疑的。巴特勒的讲话在下院内外都遭到猛烈的攻击，他在说明情况时，以他惯有的坦率态度承认在这问题中所存在的各种不同的观点，这种公正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没有被人看作是有力量的表现，反而被视为自认软弱。这位不幸的内政大臣最起码也会被人家说成是懦弱地屈从于同僚的意见，而那些人是犯有种族主义、言行反动、莫斯莱主义<sup>②</sup>、甚至希特勒主义的罪行而为人所共知的。引证巴特勒自己的话：

在休·盖茨克尔领导之下的反对党工党对这议案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他们把这项议案称之为残酷而野蛮的反对有色人种的法律。<sup>③</sup>

《泰晤士报》是这个运动的带头者之一，它自以为是，假装热心得太过分了。它连珠炮似地一周又一周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火力越来越猛，终于在12月4日以“假如能把这项议案干脆否决掉那就再好也没有了”这一句话而达到了顶点。这么多年来一直对历届 82 政府施加影响的这家大报的传统能够如此历久不衰这一点，确是令人惊奇的。托罗洛普于一百多年前就把这位伟大的雷神丘辟特<sup>④</sup>所在地称为奥林匹斯山，丘辟特就从那里颁布了

---

① 1961年11月30日。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法西斯主义分子。——译者

③ 巴特勒的书，第206页。

④ 指《泰晤士报》。——译者

各届内阁都必须遵守的……一些绝对正确的法律；这些法律还将指引着主教、节制着贵族和平民、向法官们传授法律知识、向陆军将领传授韬略、向海军将领传授海上战术、而且向卖桔子的女人传授推车子的秘诀。<sup>①</sup>

世世代代都有人提出了这类谴责而且颁布这类命令。报馆发行人和编辑们更换了——一个又一个的阿缪拉斯<sup>②</sup>相继即位——可是其作风照旧不变。幸而每隔一段适当的期间后，这家报纸虽则是有点不高兴，但还是以罕有的耿直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公诸于世。这些材料显示出，《泰晤士报》的编辑当民族处于极端关键时刻所提出的意见一般说来是错误的，而且常常是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的。可是当年占有那个宝座的编辑无视于前车之鉴，却兴高彩烈地对我的同僚，特别是对我本人大发雷霆。所以在我退休之际，看到这家大报于1967年2月16日发表的自己认错的温言软语，就会产生一些自慰之感。

人们对1962年通过的英联邦移民法案普遍感到不安。许多人不认为这些限制办法是必要的。但是从此以后其重要性却变得明显了。

在专门委员会审议阶段的那一个战役在激烈地进行着。虽然大家渐渐地明白，在事实上有必要采取某些控制措施，可是他们对政府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满意。不过我们照旧干下去，1962年2月27日，内政大臣为议案作了一通精彩的辩护之后，这项议案进入了第三读。7月1日法案开始生效。在联合王国出生的人以及持有联合王国政府所颁发的护照者将免受限制。居住在非洲英属各殖民地的大量亚洲人，后来成为麻烦和忧虑的根源，因为当其所在地的国家独立时，他们根据当时的特殊规定，宁愿保持联合王

---

① 安东尼·托罗洛普：《监护人》，第一卷，第133页。

② 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苏丹的名字，在这里用以比喻上述报馆发行人和编辑。——译者

国公民的身份而没有以新国家的公民资格去登记。

后来没有过几年，人们对我和我的同僚们所加的指责，不是说我过于严厉，而是说我们轻率大意失之过宽，这一点回想起来是奇怪的。尽管在野时的工党具有崇高的思想感情，并且作了精彩的自我表白，而当他们执政时，就不得不采取比我们所负责采取的更远为严格的措施。这些改革的倡议者后来在他自己的希望中所表达的那种思想，也许可以使人得到宽慰吧。他说：

由于两大党更密切地配合支持控制移民入境以及使其同化的这两项诞生的政策，这就使任何一党的竞选人在政治上更难以利用有色人种的问题来做文章。<sup>①</sup>

事隔十年后，这种宽宏的气量自然是可以使人引以为慰的，可是当时的情况却是不好受的。

---

<sup>①</sup> 巴特勒的书，第 207 页。

## 第四章·新人新政

1962年夏,为了应付一个新问题,作了几次决心不大的初步尝试,可是事隔十年,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获解决。迄今为止,几乎被“权威们”(即财政金融界以及财政部内部的一些泰斗)奉若神明的那个正统理论虽则会附带产生一些困难和痛苦,但它到底还是一条良好的工作守则。假如说经济体系就象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变得“温度过高”的话,那末就有必要通过各种紧缩通货措施以使其降温,这包括从英格兰银行的公开市场运用直到在一切方面节约政府开支的各种办法。据说这种弊病的迹象是很容易觉察的——就业人数过多,国际收支有逆差,英镑受到压力,没有增加生产而却不合理地增加了工资,以及相应的物价上涨。如果能及时应用最有声誉的医师们所介绍的传统治疗方法的话,病情就可望有转机,一旦消除了疾病的积因之后,病状自会消失。可是在1962年,正象人体对过于频繁使用治疗方法有时会产生反应那样,第一次出现了抗药现象——药物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了。这样就使人们对医生的诊断以及其治疗方法都产生了怀疑。

在前一年中曾经细心地使用了传统的降低摄入量的护理方法,可是压力并无减轻之势。反之,工资以及要求提高工资的事件却与日俱增。我预感到,我们正开始进入一个新环境,一如爱因斯坦所发现的那个世界一样,在这里似乎另有一些不同的规律在主宰着因果关系。经济繁荣的一个通常现象,即无理地增加工资的要求不断增多。对于病人减少食量后而仍然出现高热不退的意外现象,我们后来为它起了一个“经济停滞性通货膨胀”<sup>①</sup>的新术语。

<sup>①</sup> Stagflation,又简称滞胀,即一面萧条,一面又通货膨胀。——译者



我曾在第二章中描述过自己关于必须制订出某些更好、更有效的办法的日益坚定的信念。我似乎得不到最有名气的医生们的赞助，他们看来是对传统的退热办法（放血，泻药等等）感到满意的。于是我不得不去依靠江湖医生或是自己在百忙之中设法想出一些新的治疗方法。

我一直在研究“收入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课题。我手头有大量资料和别人所提的建议（大多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是我仍然搞不出一个头绪来。似乎还找不到一个解决这许多错综复杂问题的办法。上星期四，有关的大臣们举行了一次有益的会议——但进展不大。黑尔什姆所提建议是一个最完善的“宏大”理想——但是没有具体内容。财政部的方案没有什么建设性。我想得很多，可是却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而时间却是很急迫的。<sup>①</sup>

我的一位朋友肯定了我的诊断，我对他的判断是极为倚重的。可是连他也似乎想不出什么显然有效的办法来。

罗伊·哈罗德认为经济正在衰退，应该加以发展，工资不能增加（因为这样只会使成本增加）。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似乎是没有办法的。<sup>②</sup>在这同时，我只能在我的为数寥寥的几个属员的帮助下尽力地干下去。我在6月22日感到

在“收入政策：一个新办法”上，我们已取得一些进展——不过相当吃力。我昨天一整天向我秘书口授指示，并和蒂姆·布莱（我的主任私人秘书）以及两个内阁秘书（卡尼和包德温）开了一次会。我们一开始就为这些建议（特别是关于全国工资及薪金委员会的建议）拟出新方案，而且还拟出了某些其他的计划。现在有必要在财政部、商业部以及劳工大臣的协助下拟就一份文件，以供内阁批准（或拒绝）。<sup>③</sup>

次日早晨

---

① 1962年6月11日。

②③ 1962年6月12日。

黑尔什姆于上午十时来找我，进行了极其有益的商谈。他的思想精密而又有真正的想象力，接着接见了财政大臣——商讨关于护士、煤气工人、电气工人以及所有其他方面提高工资的要求。他似乎处于某种困境。不过——同等重要的是——1962—63年度经济前景如何？——是景气还是萧条？现在连财政部也感到不是那么有把握了。<sup>①</sup>

西洛西恩区的补缺选举结果很不妙。这里的席位一向属于工党，我党自然难望取胜；不过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候选人都失去了他们的竞选保证金。过去一度显赫的自由党对此种丢脸的事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这对我党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再一次向财政大臣力言降低长期贷款利息的必要性，此举不仅是出于社会及政治的动机，而且也作为使实业家增加投资的一种鼓励。虽然我还在努力从事草拟文件的工作，但是6月16日在我自己的选区布朗利举行的保守党周末晚会，尽管冒了一些险，却使我愉快地散了一下心。

晚会结束后，由于反核弹示威队伍在我乘坐的小汽车前挡住去路，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才离开了会场。（驾驶汽车的）多罗西很镇定，没有一个人受伤。<sup>②</sup>

我记得对多罗西斥责那些文质彬彬的抗议者的出口成章的话，警察钦佩得五体投地。

经过同黑尔什姆、麦克劳德、塞尔温·劳埃德以及（保守党研究部的）迈克尔·弗雷泽的进一步商讨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草稿。

这个计划有四大要点。第一，在年初已经提出的“指路明灯”的原则必须坚持下去。个人收入的增加必须同国家财富的增加相适应，而国民收入增加率估计为每年递增百分之二点五。“指路明

---

① 1962年6月13日。

② 1962年6月16日。

灯”可以随国民收入增加而变化。其次，我建议成立关于工资的常设委员会，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仲裁委员会，而是一永久性机构，它的职责是在坚持由“指路明灯”所指明的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来审查各种工资要求，并对其相对的优点加以肯定。它的建议将不具有约束性；在当时还谈不上制订一项够得上现代标准的法定的收入政策，但是这样能够保证全部事实向公众通气。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想通过废止维持商品转卖价格的办法来处理物价问题；我还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正在设法减低关税以及调查垄断企业情况和企业中的陈规陋习的一些努力，多加报道，但是在第二点上，如果我们在获悉关于共同市场的谈判结果之前就着手去制订法律的话，那将可能是不明智的。我也提议设立一个消费者的委员会，并提出关于度量衡的法案。我根据劳工部的意见提出了若干提高包括职员及工人在内的在职人员的地位以及生活保障的建议，这里还包含着从业人员训练及多余人员的安排事项。要尽早提出“关于商店及办公室的议案”，以便使脑力劳动者得到如同产业工人已享有的那种保障。

怎样才能使上述那个委员会发挥作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政府将就公务员工资的问题咨询该委员会的意见；但是委员会又怎样才能使企业单位保证与之合作呢？当然，我们可以采取强制的办法。这就需要明文规定有关方面要把现有的工资和薪金协议向政府备案，并把所有新的工资要求通知政府。政府根据某些标准来决定这些工资要求是否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并有权将其交给委员会去处理。在委员会对政府已经交给它去处理的早已议定的工资或薪金增加率发表意见之前，企业单位擅自予以提高就可能构成犯罪行为，可以适当地加以惩处。要不然就会被处以 88 罚金，比如根据有关企业工资总额课税等等。凡是藐视政府的请求，不把工资纠纷提交委员会去考虑的任何工会组织，可以被剥夺

“1906年行业工资纠纷法案”所规定的保障，从而就要因罢工而冒被控告并被要求赔偿损失的危险。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因为政府有把那一些纠纷提交委员会处理的绝对权力。总之，由于在工业中大多数的罢工行动都“不是经过工会认可的”，所以它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不过由于自愿遵守的制度很容易不被人理睬，因而可能就会整个地垮掉，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种可能做的事便是加进一些强制的因素，规定凡是提高的工资或是增加工资的协议超过了“指路明灯”的标准时，就可以对有关企业的整个情况作详尽的调查，这样就会暴露出企业的种种问题：管理不善，工作中的陈规陋习，机构臃肿以及以增加成本的形式来掩盖增加工资的大家心照不宣的做法。这样劳资双方可以继续谈判，但是在最后解决时就得对外宣布全部事实，并且要受到公众的谴责。最起码也得让我们试一下“把事实公诸于世的这个治疗方法”，这个方法用于治疗其他疾病时似乎颇为有效。

这就是我在提不出什么其他建议的情况下，决定向我的吃惊而忠心耿耿的同僚们所提出的野心勃勃的、即使在某些方面还是模糊的方案。同时有一点是重要的，即不能让人们把这个计划，尤其是收入委员会，看作是旨在把一些虽是短期却讨厌的限制强加于不甘愿的国民的一项单独的或临时的措施，应该把它描绘为同充实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密切关连的措施。假如它代表国家总的利益这一点的权威性能够逐渐为人们所承认的话，它就会使继任的各届政府有可能去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换一句话说，收入政策决不是紧缩通货的一个手段，而是使经济加速发展的武器。

现在我就得去处理一个同样严重的但却是更远为难弄而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人事问题。去酝酿并推行一些宏大的政策是一切政治家和他们的朋友们乐意的事。可是涉及高级大臣职位的

<sup>89</sup> 事，尤其是内阁改组将影响到不少多年来久经考验的友谊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一个政府首脑挑上一付令人不愉快的、而且往往是几乎难以忍受的担子。<sup>①</sup>和英格兰银行行长克罗默勋爵的一次谈话，使我相信的确存在着一个世界性通货紧缩的危机。

这样……一项有效的“收入政策”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目前我们不敢实行通货再膨胀，因为我国的制度在两方面存在漏洞——工资和进口。（没有增产而）增加工资就意味着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sup>②</sup>

6月21日，当我正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巴特勒来吃午饭——他总是很镇定而且对我有帮助。

他认为，目前的严重政治局面，完全是由于财政大臣和财政部对经济问题处理不当（或者说由于经济情况本身就很糟）。他感到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挽救危局。这就意味着要更换财政大臣的（重大的人事和政治）问题。<sup>③</sup>

6月22日，我同某些同僚就我已请他们传阅的收入政策文件初步进行了讨论。

这次讨论进行得很好，大家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意见。我们还得在这上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使我对财政部以及财政大臣的拖延和缺乏主动更感恼怒。一年过去了，还要首相亲自在最后一刻去完成工作。<sup>④</sup>

此刻我在几乎日夜操劳的经济政策和改组内阁的双重问题过程中，也有了这么一次令人愉快的间歇。6月24日我同外交大臣在卡尔顿花园共进晚餐。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以及他的某些出色的随行人员也在场。

我感到自己说话有失检点。但是我禁不住要责备人家几句。总统 90  
曾经把马卡里奥斯称为一位“著名的自由战士”——这是使不少英国人

---

① 见《指明方向》原书第31—33页。

② 1962年6月20日。

③ 1962年6月21日。

④ 1962年6月22日。

感到痛心的一句话。我说我提议把卡斯特罗称为“那位著名的自由战士”。腊斯克(很认真地对待我的这句话)恳求我不要这样说。<sup>①</sup>

当我们谈到涉及范围更大的问题时，我想起当时在华盛顿流行的一句话：要混个名堂就得上哈佛大学念书，然后加入左派。我但愿过去的确是这样；可是这时的美国人在经济问题上却是十分保守的。

我们在征收木材、玻璃以及其他商品的关税问题上，以及在海运政策等等方面，也有争执。我认为有时对美国人直言不讳倒是好事。不过可怜的哈罗德·卡奇亚爵士等人却为之大为不安。更糟的是，我们在货币问题上也有分歧，我又一次把我自己关于黄金的离经背道的看法亮了出来。<sup>②</sup>

可惜说时迟那时快，那法力无边的美元却已开始从它的宝座上倒栽下来了。

7月6日早上，我和几个特邀来的大臣们就收入政策又开了一次会。

他们对我的计划略作修改后就加以同意了。现在可以把它向整个内阁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我的讲话已经使事情大有进展。

我对改组政府的事还很担心，不过巴特勒和总督导员对我帮助极大，财政部仍然是个大问题。<sup>③</sup>

我整个执政时期中的某些最痛苦的日子接着就来到了。有勇气的大臣对国家的重大困难乃至民族灾难，都能镇定地应付。这种困难甚至还会为人们带来一种不可思议的令人感奋的因素。可是个人之间的纠纷往往会使长期融洽的关系和友谊破裂，它是一种程度完全不同的精神负担。它使私生活和友谊充满辛酸乃至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丘吉尔认为自己应该责无旁

---

①② 1962年6月24日。

③ 1962年7月6日。

贷地去改组高级指挥部，不过他也感到这事比之我们注定要遭到的许多军事挫败来，甚至更加棘手，而且伤精神。我将照惯常那样，主要根据我自己在当时写下的材料来叙述改组政府的经过情况。<sup>91</sup>

我坚信有必要在财政部进行重大的改组。我是很喜欢塞尔温的，而且自从我当首相以来，他一直是一个真诚而忠心耿耿的朋友，不过我感到他似乎已经不中用了。……最近他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收入政策）上似乎很少有所作为。暂时冻结工资办法开始实施到今恰好一年。这年年底时，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必须有一项更为长期性的政策来代替它。虽然我不断对他施加了压力，可是他除了在经济政策委员会和内阁中进行了一无成果的长时间讨论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还是我使这些讨论得出一个头绪来。我绝望之余，在两个年青的内阁秘书和蒂姆·布莱的协助下，在圣灵降临节的休假期间，亲自拟就了新政策的内容。我至今还在做这些工作，当然这里还有大量的问题和细节有待解决。财政大臣本来起码也得在新年后（即实行暂时冻结工资六个月后的第一阶段）动起来。他要是这样做的话，收入政策计划现在可能会更加完善了。<sup>①</sup>

另有一事使我十分担心。当时关于美元可能贬值的传说甚嚣尘上。万一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

那末美元、英镑或许还有其他货币都会一起发生变动，我们所欠的黄金债务（或以黄金计算的债务）就会变得加倍地沉重。所以我们应当尽快以美元来偿付。<sup>②</sup>

可是

对于尽量减少我国所欠黄金债务（即向国际货币基金清偿贷款）这件大事，在我（很不妥当地）把英格兰银行行长请来，而且发现他也对我的忧虑怀有同感之前，并未采取任何措施。<sup>③</sup>

事实上，塞尔温·劳埃德由于多年来工作负担过重而影响到

---

①②③ 1962年7月8日。

健康了。他经受了同埃及的长期谈判的种种挫折，1956年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前，还由于美国国务卿所使用的转弯抹角的方法而一直大受其苦。他过去在那整段时期中，特别是通过他在联合国为我国所作的卓越的辩护，做了极其出色的工作。当我——<sup>92</sup>于艾登病发后——去接办这项困难的甚至是绝望的工作时，我继续留他担任外交大臣，接着他又在我的请求之下，于1960年7月毫无怨言地转到了财政部工作。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些新的而且日益严重的困难问题。他从1951年以来——共十一年——一直在政府任职，而且自1955年年底以来一直是担任最高级的职务。唉，从事政治工作者所处的环境是如此冷酷，以致在其他行当中可以用以应付此种情况的任何办法在这里却是毫无用处的了。一位外交大臣或是一位财政大臣决不能象在企业或学术机构工作的人那样，休假六个月后再回来照常工作。当时这个问题及其令人痛苦的症结使我心情十分沉重。

这事对我个人说来，将是很可怕的，我感到畏缩不前。人家会说这是一个“狂热”措施。人家会指责我十分“不忠于”朋友。不过所有受我信任的人……都一致说我做得对。我将要在星期四和(劳埃德)谈话，给他透个口风。<sup>①</sup>

我现在决心要去尽自己的职责；不过在多年后的今天，我回顾到这一阶段时，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我把这一行动和整个政府的改组并在一起进行，以试图掩盖一位大臣、尤其是曾经如此密切地同我一起工作过的这么一位大臣在名誉上所受的损害。假如仅仅在财政部进行人事更换而把更大的内阁变动放在议会休会以后进行，那就可能更为明智，这样就可能使这件事在秋天悄悄地进行，而不至于使人感到过分的压力。我过去一直在想，经过了这么多年后，应该在内阁中吸收一些年事较轻的人，而且进行

<sup>①</sup> 1962年7月8日。



整个政府改组所根据的总原则应当简而明。不论我党在下次大选中是否获胜（这就可能取得前所未有的任期——连续四次在大选中获得胜利），我必须保证：不管我党是否执政或在野，其坐在议会前列席上的人都应该具有足以胜任其工作的能力。我记得历史上有过多次这种情况，一个原来执政的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弄得七零八落，没有一个有力的领导。老的领袖们中，有的人不是辞职了，便是被授予爵位；另外的人则在政治上垮掉了；该党在野花了好多年才培养出一届新政府的核心力量。这大体上就是鲍尔弗先生在1905年所犯的错误，我决心不重蹈其覆辙。不过现在回想往事时，我确信，如果当时把上述两桩事情分别处理，可能会更好一些。也有人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要使10月份举行的保守党大会通过事关重大的加入欧洲的计划是极为重要的。而在10月初，恰恰于大会举行之前更换大臣之举可能会使人产生这种印象：这些大臣们是由于不同意这项大胆的欧洲计划而自动辞职的，不过这个险也许是值得去冒一下的，所以我错了。

我从长远利益出发，向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同僚提出他们在本届议会结束后准备怎么办的问题，除非他们要在大选中再度参加竞选，我认为理应向他们之中某些人暗示，要他们现在就辞职。他们要末就在眼前要末在议会结束时接受爵位。某些人欣然同意，毫不恼火。这类人中有米尔斯、沃金逊、麦克莱三人。至于和我的交谊最长、最亲密的大法官基尔穆尔，我感到只要我认为时机一到，就应该同意他经常提出的让位于贤的要求。我感到，由于总检察长曼宁厄姆-布勒多年来一直为我们工作得很好，应该让他在本届议会结束前去接任大法官的职务。我请教育大臣大卫·埃克尔斯改任商业大臣，可是他宁愿立即退休去接受爵位。我于星期六把经过情况记录如下：

我此刻正在桦林居家里，我是坐在床上写下这段经过的。我感到精

疲力尽，过去两天中发生的事几乎把我拖垮了。星期四早上召开了内阁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项目就是我所草拟的关于收入政策的文件（即我在最近所进行的许多会议和谈话的成果）。这次会议使人十分不快，我拿不准是不是塞尔温已经听到谣言了，还是由于他最近又产生了一种更厉害的无动于衷的离奇心理状态。讨论得很好，麦克劳德、黑尔、莫德林和黑尔什姆所提出的意见更是特别好。塞尔温发言不多，（秘书长）布鲁克似乎很窘，不过他——当然——是对我有帮助而且是通情达理的。<sup>①</sup>

我已和财政大臣约定于六时会晤。

我极力对他做工作——可是那个光景却是十分令人为难而激动的。谈话历时三刻钟。我自然试图使他相信为了政治原因而进行重大的政府改组的必要性；我并且说，他已经出色地担任过了政府中两个最高级的职位——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而（除非他想去当党的领袖——他已经多次对我说过他并没有这种野心）现在似乎是在商业中去开始从事第三个工作的时候了，他从前常常对我谈过自己有志于此。但是说了半天一无效果。说实在的，恐怕这些事情总是很糟糕的，而且或许也是一位首相所有任务中最糟糕的事情了。塞尔温拒绝接受爵位；他说他要留在下院以便继续维护他自己的财政政策（我想他的意思是要对背离那个政策的做法加以抨击）。<sup>②</sup>

我见到亨利·布鲁克之后感到一些安慰，我对这个人的品德是极为放心的。他对自己在财政部的上司很忠诚，他也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天时间过得很慢，教人难受，几乎是在滑稽的气氛中结束。

此刻是赶紧换一身衣服上萨伏伊饭店去参加（利比里亚）塔布曼总统招待女王的宴会的时候了。我们恰好在王室人员（大公主、玛格丽特公主、格洛斯特公爵夫人、肯特公爵太夫人、肯特公爵夫人、王太后、女王）预定到达时间之前到场。不过还是有人来得迟，到晚上九时才开始吃饭！这一次我又是福星高照，恰巧坐在肯特公爵夫人和汉密尔顿公爵

<sup>①②</sup> 1962年7月14日。

夫人之间。这是一个奇异的场面——我们的座位围成一个大圈子—— 95

桌子既小，桌面又很窄，只有一边坐着人。在这样形成的一大块空隙地面的中央竟放着三只大花环！我和多罗西在欢迎会结束之前趁女王离开的机会脱身而去。<sup>①</sup>

次日(7月13日)，我明白已有大量关于政府改组的消息漏出去了(我始终不知道消息是从哪里传出的)，随着议会中的各种阴谋以及周末报纸的猜测而产生的政治后果，可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所以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从公众的观点看来，最主要的变动是任命雷吉·莫德林为财政大臣以取代塞尔温·劳埃德。其余的人虽则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是知名的政界人物，但其在政府中的权位较低。

结果情况相当不错。不出所料，大卫·基尔穆尔、哈罗德·沃金逊、珀西·米尔斯等人毫不为自己打算，而只想到我以及最有利于国家的办法。我为大卫弄到伯爵的封号，为米尔斯取得子爵的封号，并为沃金逊及麦克莱争取到荣誉勋位。我叫蒂姆·布莱打电话给塞尔温说，由于我和他两人在谈话时情绪激动，我忘了向他提出要授以荣誉勋位。他是否喜欢这个封号？如果他接受这个封号的话，我将为之高兴。<sup>②</sup>

塞尔温·劳埃德此后当选下院议长的高级职位，从而使他的一生出色的经历达于顶点，我回想到这一点就更其高兴。

莫德林从殖民部转到财政部后，使我有可能去进行我一直急于要去完成的政府改组工作。于是我决定把英联邦事务部和殖民部合并起来，均归桑兹掌管。在我所吸收的新任大臣中有爱德华·博伊尔爵士，我对之极为敬仰，他主持教育部工作。“还有一个聪明的年青人——基斯·约瑟夫爵士——将去主持房屋及地方行政部”。<sup>③</sup> 桑尼克罗夫特成为国防大臣，而迪兹则取代米尔斯成为 96

① 1962年7月14日。

②③ 1962年7月10日。

不管部大臣。由于巴特勒正忙于一项困难而使人生畏的全权处理中非问题的的工作，他自愿放弃内政部的职务。我任命亨利·布鲁克继任。朱利安·艾默里担任航空大臣，但不算为阁员。

这一天好不辛苦（我估计自己接见过二十个人——有的人还被接见了两次）！但是总算在下午六时十分向女王提出了名单（当时她正要离开游园会）——这张名单包括了各种人事变动、授予爵位及勋章等等对象，所有这些内容都要向报界发表，以便赶上晚上七时的新闻广播。塞尔温认为他应该写一封（措词相当生硬的）信，而且让我也写封回信，然后将其一道向报界发表。此外别无其他信件——我的确认为如果写了七八封信的话，那就太不近情理了。……十一时驱车回桦林居，到家时疲惫不堪。<sup>①</sup>

我同塞尔温·劳埃德的来往信件内容如下：

亲爱的首相：

你已经告诉我说，你要我辞职，我乐意地照办了。

我明白，我参与制订的一些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却相信这些政策是正确的，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我认为我国的货币更加稳定了，而且我国的经济前景是比前一时期基础更坚实了，我们现在比起以前来，更能够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困难了。

我也为自己曾经参与筹划诸如充实收入政策以及建立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之类的新措施而感到高兴。我的基本目标是要加强我国的竞争力量，并为以后的健全发展打下基础。

我知道你很清楚，对于这些政策能够继续得到贯彻这一点，我是很关心的；你也很明白，我是亟欲不使政府开支的增长超出国家财力的，尽管这种开支本身是多么必要。

对于你向我所表示的许多个人的好意，我是十分感谢的。

你的永久的朋友

塞尔温

---

① 1962年7月14日。



亲爱的塞尔温：

接到来信，十分感谢。

你在财政部所推行的大胆政策一直是得到你的同僚们的支持的。我们是要沿着你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确信，这就是我们能够象你所说的那样地把经济发展建立于一个健全的基础上的唯一办法。

对于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进行一次着眼于将来的广泛的政府改组，我确信，这一点你是明白的。我感激你对此所提供的方便。

你信中所提到的关于我个人好意深使我感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共同努力备历各种困难，我对你的善意支持和鼓励深为感谢。

你的永久的朋友

哈罗德·麦克米伦

星期六的报纸论调不一致——有的纯属危言耸听，其余的就比较负责，显然某种风暴可能就要出现了。

危机有如下几个方面：

(1) 主张采取限制信用措施的极端派会集中于塞尔温的周围。奈杰·伯奇向《泰晤士报》所写的一封辛辣的信已经为此开了头。

(2) 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狂热”措施。星期四晚上，莱斯特补缺选举的结果又不幸揭晓了——我党被自由党所击败，屈居第三位。

(3) 有人会指责我“不忠于朋友”。说我牺牲朋友以保全自己。他们是会极力这样说的，尽管在过去六年中，别人是以恰恰相反的罪名来指责我的。

(4) 更加严重的问题，有人可能认为我们会一反初衷地去推行一项充满危险性的“扩大主义”的政策。如果让这种想法扩散开来，就会对市场和英镑产生不利的影晌。我同英格兰银行行长商讨后，要莫德林在昨晚发表一项声明，以便使有关方面，特别是外国人放心。在这一点上，我们至少暂时没有受到美元持续疲软的拖累。<sup>①</sup>

① 1962年7月14日。

星期六上午我承认自己有些动摇了，很显然，有些人在嘴上讲得很硬，一碰到实际就软下来。不过在人事方面的经验却更使我气馁。<sup>98</sup>我觉得自己与其再去经历一下这种极度令人难过而痛心的场面，不如上战场去拼一下。

嗯，一切全都过去了。我正躺在我母亲原来的卧室的床上，眼睛望着室外的花园和树木。周围一片宁静。多罗西陪伴着我——别无他人。多罗西对那一切都能经受得住——不过这些事情是够令人难过的。我由于要求大卫·基尔穆尔让位而特别感到抱歉。他的确对此是极为爽快的。可是他却是最老的、最坚定的、最忠诚的朋友之一呀，我今后对之还将怀念不已。<sup>①</sup>

我在星期六晚上对自己的计划略作变动。

我在考虑后，于当天晚些时候决定向每一位大臣发出正式信件（这些信件将发表于星期一的报纸上——它们无论如何是不宜于刊登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的）。我已经向他们各人——基尔穆尔、埃克尔斯、沃金逊、麦克莱、希尔——发出了很长的私人函件了。我感到这将是有益的。<sup>②</sup>

次日，我们不费力地就作出了所有次要职位的任命。我感到这个新的内阁班子一定会使人产生好印象。在政府中一共有十个新脸孔，从长远看来，这会为我党带来好处。

7月14日，我向女王报告整个政府改组工作业已完成，我写道：

主要问题在于，政府改组工作究竟是否立即进行还是在议会开始休会时进行，而后一做法则较为正常，而且在许多地方也更为方便。如果制订出一项新的收入政策并将其向议会提出这一点不是极为重要的话，我本来是会向陛下建议去照这样办的，我自己从事于这项收入政策工作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必须在议会休会之前将其向议会和全国人民提出来。可是如果把这件事情让财政大臣来处理就似乎不切实际了，因为

---

<sup>①②</sup> 1962年7月14日。

我已经决定向你奏请把他撤换。所以唯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马上采取行动，并且让新任的财政大臣于推行第二阶段的收入政策时，在下院的辩论会中发言。

99

在说明为了改组政府开头几次困难会商以及报界泄漏了消息的情况后，我说：

我当时认为在议会中或者在党内可能有一个阴谋，它可能引起一个真正的政府危机。周末出版的报纸及其种种猜测将更加火上添油。所以除非迅速采取行动，任何办法都可能是为时过晚的，到了下星期的头几天里，政府就可能支持不下去了。

所以我决定在当天把事情办妥，我对陛下的配合行动深为感激。

在谈到自己的感想时，我又写道：

由于这种事情所引起的紧张和激动情绪如何使我烦恼是难以言状的，多年来的友谊可能会一时地甚至永远地毁掉了。陛下可以设想，某些人同我有着极好的配合和友谊。有一些大臣总是要让位于年轻人的。……但也有一些大臣希望取得更高的地位，他们因此极为不快。所有这一切使我不得不在六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二十人次的接见，这使我感到十分疲乏。不过我已经回到了苏塞克斯老家休息一两天了。我现在正是从那里给陛下写报告的。

最后我谈到将来的形势。

将来情况是很难说的。有这么一大堆严重问题和困难。我希望我们能够向国际货币基金偿还我们所欠的那一大笔债而使我了却一桩心事。由于这是一笔数额为二亿五千万镑以上的以黄金计算的债务，而且鉴于美元有贬值的可能，继续背上这笔债务是极为危险的。我想，在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配合下，这事可望于下周末得到处理。

新的大臣们会为陛下好好地工作的，我想这一点陛下可以放心。莫德林先生虽然年纪轻，却很有经验，有能力，而且遇事镇静。我由于有机会引荐了有如爱德华·博伊尔爵士以及基斯·约瑟夫爵士那样的人而十分高兴，他们代表了活泼而且生气勃勃的青年一代。所有的一切都会

100

好起来的。

但是，如果目前的舆论趋势象补缺选举所显示的那样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我就无法向陛下隐瞒我们的政治危机了。我将尽力去改善我们的地位；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政治手腕。我相信我可以期望得到全体同僚以及整个议会的支持。在我们党内自然一直存在着有人搞阴谋诡计和分裂的危险，但这决不是保守党的正常行为；尽管它有种种弱点，它基本上是忠诚的。

新内阁于7月17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它有一种新鲜和引人兴趣之感。<sup>①</sup>

下午，

我于三时十分到下院去答复质询。我们这边无人鼓掌，反对党发出了嘲笑声。当我回答问题时，反对党中不断传出了笑声和讥笑声。我们这边的人则寂无一声，偶尔也有一两个人想来帮助我，可是（就象常常发生的那样）却对我帮了倒忙。我明白，这个风暴不是容易对付的。事情也真奇怪，原来主张改组政府最卖力的人，现在似乎成了主要批判者了。<sup>②</sup>

一两天过后，情况有所好转。

我党的情绪似乎正趋于平静。（这一点的确在某些报纸上反映出来了。）议会质询很平稳地进行着——反对党的调子实际上几乎是温和的，我们这边的人对我以轻松并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而作的一二句尖刻答话，表示好感。<sup>③</sup>

当天稍晚我到1922年委员会去了一趟。

与会的会员共二百五十人。我讲的内容十分……简单——主要是关于这次政府改组的人事方面。根本不存在什么“狂热”的问题。政府确有必要进行果断的改组措施，而且我在前一个时期已经在原则上对此

<sup>①②</sup> 1962年7月17日。

<sup>③</sup> 1962年7月19日。



作了决定。问题在于何时进行。现在时机有的是——或在布鲁塞尔谈判的结果分晓之前，或在保守党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或在各部门预算的规模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次年总预算确定之前。我对塞尔温以及其他的同僚作了赞扬。有人提出了一两个(不含敌意的)问题后，我就回到了海军部大厦，我们在那里为一百九十名选民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我感到……满意。与会者对我表示欢迎而同情。我认为这肯定是对我本人以及对我所采取的措施而作的一种表示。(如果议员们所收到的信象是我们在唐宁街十号所接到的那些信的话，他们是很可能受到影响的，我们所收到的来信十之八九是赞同我们的。①)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虽然报上发表了内容大不相同的消息，但是我确信危机已经被克服了。《泰晤士报》作了绝对正确的报道。《电讯》和《卫报》的立论都很公正而且态度友好。《快报》抱着十分敌对的态度，而《标准晚报》却出奇地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针，不再说这是我的一次“屈辱”，而说是一次“胜利”。也许比弗布鲁克已对他的报纸下达了新的命令吧。

现在新内阁得要去审查并批准最新的收入政策了。这项政策基本上是遵照我原来建议中所提出的一些原则的，其重点是放在包括下列内容的总方针之上的：职工的地位及生活保障，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指路明灯”以及设立收入常设委员会的建议等等。不过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把“指路明灯”的原则加以修改，以便我们比照国家的利益来估定提高工资要求是否合理时，能够更灵活地加以掌握，例如，某一领域可能相对地比其他的领域更有增加人力的需要。关于收入常设委员会这一点，我们决定放弃把工资要求强制性地提交委员会处理的一切规定。不过凡是未经委员会处理而达成的协议，而且其内容又是违反国家利益的，政府就可以要求委员会进行事后检查，委员会将有权要求提供资料 and 人员，并

---

① 1962年7月19日。

在它的报告中作出建设性的以及否定的评语。

102 7月26日，下院就整个局势召开了正式辩论会。反对党提出了不信任案，其措词如下：

本院宣布女王陛下政府已失去全国人民的信任，从而要求首相向女王陛下建议解散议会以便举行大选。

这是相当厉害的行动，在议会内外掀起了极其不寻常的激动情绪。我知道得很清楚，一切全取决于讨论的情况以及接着举行的投票的结果。我错误地把财政部的人事更动和整个政府的改组工作混在一起进行，这无疑地已经使人看不清我所设想的基本目标。“麦克这把刀子”，“白厅的狂热”等等耸人听闻的报纸大标题吸引着反对党的领袖把攻击的矛头集中于人事问题上。他开头是这样说的：

这次辩论会是在……耸人听闻的事件……的阴影下举行的。我们所提动议的内容是由这些事件直接引起的，因为所发生的事情正是政府所能提供的承认失败的最有力的自白，而且也完全证明了反对党所提出的指责和批评的正确性。

当然，所有的政府都要不时地把不称职的大臣罢免掉，在所有的政府中，总有些年纪较大的大臣要退休。所有的政府都会举行改组，有时也会因为政治和人事的理由而有人辞职，不过，从7月20日以来所发表的大量评论中，我却没有看到有人提出下列的做法是有过先例的：即更换的大臣人数达七人以上，占内阁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也把财政大臣不客气地同政府中其他八位大臣一起免职了，此人过去曾经担任过另一个仅次于首相的最高政府职位，即外交国务大臣。

他把政府改组描绘为

103 一个处于绝境的人的垂死挣扎，而此种绝境则表现于保守党的命运不断地在一次又一次的补缺选举中无情而急速地恶化的情况。

他的整个发言的调子就是如此，而且这无论如何也是言之有理的。

不过盖茨克尔秉性类乎一个讲演员，而不象一位雄辩家。一当他谈到实际问题时，他所说的关于经济形势的话既不动人又不深刻，他说了一些愤慨的话以作为结语：

以往的几届功勋卓著的政府常常是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组成的，但是他们是由于某一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的。历史上的名相把自己的政策目标看作比自己任期更为重要。比尔·格拉德斯通、丘吉尔、艾德礼都是如此，艾冯勋爵也是如此，尽管我们认为他的政策是多么错误的。

可是，现任可敬的首相先生就不是这样，他的政府将不由于其对国家的正确领导，而是由于阴谋保持权位而被后人所牢记不忘，为此，它是不择手段地去牺牲别人的。

我在答辩时想到应该立即把这些责难驳倒。于是我一开头就说：

这位身为反对党领袖的可敬的先生在提出动议时，他的发言有的涉及对人物的批评，有的则涉及政策方面。我必须指出，关于政策方面，他谈得不多。他却很快地回过头来品评人物了。他无疑是感到在这方面容易做文章。

接着我说了几句话为自己的过去辩护，并说明了所以要改组政府的原因。

我丝毫也没有由于人家责备我不忠于朋友、缺乏勇气、或者惊惶失措而感到不安。人家说这类讽谕的话是很自然的。这样地说话显然是十分省力的；不过说来奇怪，自从我担任首相以来，人们曾以性质恰恰相反两种口实对我进行了攻击。在我任职期间有人说我过于偏袒老朋友和老同事，不愿意把新生力量吸收到政府中来，也有人说我持有几乎近于藐视的疏远态度。现在人家又责备我说，我在狂热之余采取了极其粗暴的行动。 104

这些相互矛盾的责难一点也没有触动我。我有了在近五十年的工作经历中——在军队里，在商业上，在下院以及在政府中——和我共事

的那些人们对我的评价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使我难过的是，我不得不作出一些影响到长期友谊的决定。而不幸的是这些决定又必须作出，我的可敬的有学问的朋友前财政大臣曾经密切地配合我工作了六年之久。他担任过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的高级职位。我们一致赏识他所显示的勇气、真诚和爱国心。去年7月间，他在我的完全支持之下，开始去推行一项由于当时产生的对英镑的沉重压力而有必要采取的措施。这一战役已告一段落。我们已经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必须肯定这一点并且转入新的阶段。

我已经决定必须任命一批新的指挥官以应付这一新战役。凡是担任过我的这个职位的人都知道，这些决定是压在一个首相身上的最沉重的负担之一。我可以向下院保证，避免这类决定要比作出这类决定便当得多。对所有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自己作出决定并对其后果承担责任，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对我这位可敬的学识渊博的朋友工作成绩赞扬的诚意。我相信坐在下院这一边的所有可敬的议员先生，都会抱有同感。

我在讲话的其余部分中对经济状况作了概述，并且还谈及指导着我国在现代世界中所作努力的必要原则。像在我们这种总的说来存在着充分就业而没有象某些欧洲国家那样拥有巨大人力储备的国家，要“扩大经济只能依靠下列两种办法：即把可用的人力从衰落的行业迅速转移到扩展的行业中去，并设法消除一切妨碍发展的因素”。所以在利用现代科学已能提供的巨大机器组合与  
105 各种技术时，我们必须依靠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来最有效地利用企业管理能力和劳动力。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假使全国工资、薪金及股息的支出超过生产增加的幅度，那末生产成本一定会增加而出口就要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个人收入有所增加也是没有意义的。

我接着就作了一个我至今仍然坚持的声明：“因此收入政策作为我国经济生活的一个永久的特征是必不可少的。”接下去我又谈到要



对工资和薪金加以控制的各种尝试。

即使在战时——当时实行了物价控制、商品配给制度、劳动力控制，百分之百的超额利润税以及在战后为了减轻日益增长的工资以及其他方面的冲击而产生的债务——我国也并没有一项完全奏效的收入政策，其后果之一就是我国目前所欠的一大笔债。

1945年以后，虽然工党政府继承了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经济体制，他们也碰上同样的棘手问题，而这个经济体制是一个岛国在战时非采取不可的非常时期经济所带来的。

我们之中不少人还记得，当时的工党大臣们如何象我们一样地采取了向国民呼吁和规劝的办法，我们之中不少人尚记得斯丹福德·克利普斯爵士为此目的而贡献出的巨大精力和热情。（议员们高呼：“说得对！说得对！”）可是他也并未获得成功。而现在由于我们有了自由得多的经济制度，我们的任务可能是更困难一点。这一点我是完全承认的。

不过所有这一些努力并不是毫无成效的。公众舆论开始明白了：如果一部分人不合理地要想比其余的人多占便宜，就一定会发生什么情况；同时也明白：如果所有的人都坚持争取增加货币收入而不顾及其实际价值，就会产生怎样严重的结果。去年由于实行暂时冻结工资措施以及其他办法，我们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而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套新的机构和一次新的经济发展。

然后我按照内阁所批准的全国收入委员会的形式，阐明了它的组织和职权。 106

我们在过去几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单由政府作笼统的指导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机构来对比较重要或困难的工资问题提供公正而有权威性的意见，它既能够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又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收入委员会将是一个永久性机构；当然，在这里并无任何意图要去剥夺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愿望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去雇佣别人

的劳动力的权利。自由的工资谈判、仲裁的机构以及工资会议的制度都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收入委员会将起重大的作用。

我们将为它制订出职权范围的条例，规定它要对特别重大的工资要求进行调查并发表意见。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要顾及每一项要求的具体情况，而且还要考虑到诸如工资增加必须同生产增加相适应的这一类涉及面更广的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它将尽可能公开地去进行这一项工作。它将详细公布自己对于这些情况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其所以然。……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目前很有必要去动员公众舆论并且把情况告知公众。

目前工业上所出现的许多朦胧不清的情况很可能要明朗起来。这个委员会不仅将处理工业上的问题，而且还要处理公共事业等方面的事情。它的重要性是不能单纯以商业眼光来估量的。

由于采取强制性制度的时期尚未成熟，委员会就要依靠动员公众舆论的力量来工作。它

将考虑特别重大的工资要求或有关方面一致同意交给它处理的工资纠纷。不过有时也很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虽然有一方不同意把工资要求交给委员会去处理，不过政府可能根据另一方的意见或者更为重大的理由，认为委员会应该为公共利益而去考虑这个问题。

107

我不相信，在实际上有关方面会不重视政府所明白表示的意见，我不相信任何一方会置之不理。但是万一它们这样做的话，公众自会对此作出自己的结论。

对这个计划以及它的种种困难和有希望的前途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后，我认为应该对利润和股息发表一些意见。

我已经谈过增加工资和薪金的事了。不过我对于认为限制利润和股息也是同样重要的那一种广泛而又是很自然的想法也不是置诸脑后的。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不能使人们觉得，他们接受了收入政策所规定的限制只不过是使其他某些人得到更多的利润或股息。这主要应当由政府来处理。政府将通过财政手段或其它适当的手段来制约

因工资和薪金受到限制而利润总额产生的不适当的生长。

我想可敬的先生们会同意这一种看法：在大多数的经济体制中，利润总是和工资的增长齐头并进的，而且随着工资和薪金的限制而下降。然而，我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正式保证：

接着我谈到其它各种改革措施——对消费者的保障，商店及办公室法案，从业人员再训练的必要性，签订适当的服务合同的必要性，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我在结语中说：

我有信心请求下院去拒绝这项动议。保守党自从1951年重新当权以来，它在执政期间一直是忠诚地推行着它的纲领的。它1951年掌权，它的委任状曾两度展期并经确认。我们希望在下院的支持下继续进行并完成我们的工作。

这样，收入政策就在试行基础上——也还只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始实施了。这艘耗费这么多精力而造出来的三桅船是注108定要碰上风浪险恶的大海的，而且差点就要沉没其中。不过它暂时还处在船坞中。

如同一切其他经报界大事渲染的辩论会一样，这次辩论会相当不成功。盖茨克尔作了一次很蹩脚的演说，这次演说无论对这个场合或者对他本人都是不相称的。我的答话虽不是雄辩滔滔，不过我却能提出我的建议，而且能够使人家注意听我讲。（新财政大臣）莫德林最后发言，他所说的内容不错，可是他却不断受到诘难和嘲笑声的干扰。我们取得九十八票的多数——我们这边的人无一弃权。（现在我们的正式多数为九十四票。）<sup>①</sup>

我听到我们有些支持者是从国外才回来的，有的则是放弃了重要的约会而来参加表决的，这使我特别感动，他们这样做往往为自己带来许多不便，而且还要花不少钱。当我得到所有这些特别显得忠诚的人的名字时，我向每一个人都写了一封私人的感谢信。

总而言之，这次辩论大大地澄清了真正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肯

<sup>①</sup> 1962年7月29日。

定地决心去实行扩大经济的方针了。在财政部进行人事更动的整个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立即执行这一点。不巧由于我错误地把大规模政府改组的事同这个问题混淆起来，所以起先一度使人看不清这个重大的目标，这次辩论会使这一点明朗化了。事实上，在我在职的剩下的期间，我们执行这项发展经济的政策并非没有成就的。为了使经济能持续地发展而又不至于产生随着工资而增涨的成本费用所引起的种种弊病，我们把收入政策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些弊病在过去曾经有过，而且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在将来也还是会有。虽然寻找新人和新政的这个过程是令人难过的，但是我的总的目标总算达到了，虽然职工大会宣称他们决不理睬什么收入政策。那样的初步反应也是意料中的；不过我也高兴地注意到，有一些更为负责的领导人没有说什么话，我相信他们可能会不动声色地暗暗同情我们。

109 我们为了替以后通称为“尼基”的全国收入委员会物色一位适当的主席，并且为了替它的职权范围订出一套条例，着实花了一点时间。王室法律顾问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同意担任这个艰难的职务，职权范围的正式条例也于11月5日公布了，这使我大为高兴。这个机构自然是去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的初步尝试，不过它在设立期间还是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它于工党执政的1965年3月为物价及收入局所取代。此后接着发生了不少充满希望以及令人失望的事情。不过我仍然坚信，我们于1962年的倡议是正确的，如果要在长时期中做到并且维持我们的四大目标——充分就业、稳定的物价、一个在国际收支中有顺差的稳定的币制以及在经济上的持续发展——的话，就有必要采取某种形式的收入政策。说来奇怪，某届工党政府也转而采取了这个观点，不过他们也象保守党一样，后来犯了错误甚至改变了宗旨。

这一段插曲虽说是令人痛苦的，但也无可避免。由于那几个



月里发生其余教人分心的事——东西方的纠纷和与日俱增的苏联压力,不久后就要以古巴危机为其高潮;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谈判在布鲁塞尔显然处于僵局的状态;中非联邦的分崩离析迫在眉睫——这段期间我没有得到安逸。虽然我在描述本书涉及的各种主题时有必要分别地加以处理,但是读者切不可忘记,所有这些困难的事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对考柏的“多样化才是生活的调味品”的诗句所表达的思想我虽然在原则上同意,但我有时感到这种调味品未免多了一些。

## 第五章 欧洲和英联邦

尽管在国内有了这些使人分心的事——丝毫未见缓和的工资增长的压力、新近产生的移民问题、令人痛苦的却又是非实行不可的内阁改组——我和我的同僚们却仍然认识到，1962年可能成为英国和欧洲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同欧洲共同体事务主要有关的几个大臣，一点也没有受到这次政府改组的影响，莫德林接管财政部后，的确向我们提供了他在类似谈判中所积累的长期的即使不是那么成功的经验而使我们得益不浅。巴特勒继续领导着那几个处理日常工作的大臣，而希思则在他的专家小组帮助下，在布鲁塞尔负责进行着漫长而疲劳的商谈。英联邦的利益是由邓肯·桑兹来捍卫的，他作为欧洲运动的奠基者之一，是非常适合承担把这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的任务的。作为农业大臣的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是一个极力主张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人，不过他也同样坚决地捍卫英国农场主的权利。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中，有四大症结需要加以处理。第一，美国的态度。它基本上是同情我们的。第二，六国领导人，特别是戴高乐和阿登纳，在同我的会谈中，以及共同体部长们和官员们在同希思的长期谈判中所表现的欧洲各国的态度。而共同体各国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们内部的安排，这一点使上述情况更为复杂化了。第三，英联邦各国领导人在同我们交换意见中所表现的那种情绪在1962年引人注目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达到了高潮。第四，在保守党内部存在着为10月份党代表大会作准备的种种压力和活动。

肯尼迪总统本人一直帮助而且同情我们。我们于1961年底<sup>111</sup>在百慕大会晤时，主要是讨论由于俄国的政策所引起的威胁和挫折（这我将于下一章中加以叙述）。但是我们也谈及共同市场，而且发现彼此意见大体吻合。除了总统以外，美国朝野都赞同我们关于欧洲联合起来的主张。当时他们凭着固若金汤的美元堡垒，有恃无恐，对于可能产生的后果显得毫不在意。美国政府中的个别部门，无疑地担心着以后可能出现的一个联合的欧洲的竞争力量。五角大楼和我国的国防部也一直相互竞争，彼此都竭力想从重新武装德国一举中获得最多的武器定货；还有国务院的乔治·鲍尔先生，他似乎一直决心要阻挠我国的对欧政策以及共同市场谈判。不过，不论是在我同肯尼迪面商的时候，或者在他向我不断发出的鼓励信中，他总是表示完全赞同我国的意图，他这样做部分是由于这事对自由世界所带来的经济好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个联合的欧洲在战略上能提供更多的贡献。他于7月4日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演说中表明了这些想法。当时他论述并且强调了我自己关于自由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必须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维持伙伴关系的老论点。当我看到他的演讲词时，我极为感动，并于7月9日向他发出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必须就您在美国独立纪念日所作的关于各国相互依赖的演说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由于我去年在波士顿作过一些微小的努力，谈不上有什么建树，所以我为此特别感到高兴。现在一切全取决于布鲁塞尔谈判。欧洲人的情绪很焦躁。不过我对最终的结果很抱希望。暂时最好还是让事情悄悄地进行下去。

在谈到共同市场各国时，我们必须记着，有多少关键问题还没有通过罗马条约的条款而获得解决，或者明确起来。<sup>112</sup>的确在某些方面，这些条款是过于具体而详细了，可能不受我们大多数英国人欢迎。但是六国对许多问题都仅在“原则上”作出了决定，“在

实施时”还得大大地加以充实。而当需要大家同意对农业实行单一市场的办法时尤其如此，此举涉及面极广，有关各国为了解决各个细节问题，开了好几个月的会，而且会议都是整夜进行的。此外，还存在着各国彼此在方法与目的上某种相互矛盾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则是这个运动的整个历史所固有的，也许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一点是更为令人不安的。有一些人热烈主张建立联邦，他们相信很快地就可以在欧洲成立象美国那样的国家；也有一些口是心非的人，他们一面接受欧洲联合的总概念，一面在实际上却把它看作是推行自己野心勃勃的国策的一个锐利工具。在这两种人之间还有一些中间派，他们认为，一旦在经济上做到了统一，就可以逐渐而谨慎地设法做到对诸如国防、外交政策之类的事务实行统一决策而又不必为此实行高度的“制度化”。

很奇怪，戴高乐自己所采取的立场在表面上是和我们相仿的。他主张成立联盟，而不主张成立联邦。不过我总是感到，引起他去反对联邦理想的那种对传统所怀的感情，正是他不愿意接纳英国为会员国的天然原因，因为英国加入后甚至很可能成为共同体的领袖。

1962年1月14日，六国经过了好几个星期的讨论以及几乎日夜不断的会议后，终于对它们在下一阶段的农业政策达成了协议。这时才能够就温带出产的食品问题同英国代表团开始进行谈判。过了几天，即1月18日，富歇委员会又重弹它的政治联合的老调——一个充满危险的论题——不过我明白，我们和法国人在这一个题目上的观点将会是非常接近的。

113 同日，意大利总理阿明托雷·范范尼和外长安托尼奥·塞尼一同到伦敦进行访问。

昨天一整天是意大利日，早午都有会议。意大利大使馆为我们举行了午宴；我们也在海军部大厦为他们举行了晚宴。我们所举行的会谈很



有好处，但是进行得不生动。这两位大员[范范尼和塞尼]都很能干，彬彬有礼而且见多识广。他们最大的顾虑乃是自己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他们不愿意受到盟国对柏林的危险方针的波及。……在欧洲问题上，他们将会有助于我们——不过他们有浓厚的“联邦主义”思想。今晨，我前往直意使馆同他们话别。<sup>①</sup>

### 下月初

特德·希思来吃午饭，他对我谈了自己对于共同市场谈判的感想、谈判的困难情况及其前景。他希望能于7月底予以结束——不过我却对这一点有怀疑。假使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打算在9月底或10月初召开英联邦总理会议。这样就可以接着去召开党代表大会和议会。但是我担心谈判会拖下去。尽管如此，这一切都会使今年的秋天一开始就分外迷人。<sup>②</sup>

由于受到他的报告的鼓舞，我们为了着手举行加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以及煤、钢共同体的谈判而提出了坚决的申请。为我国驻德军队的费用而经常发生的争吵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拍，因为我们对于每年必然发生的这种争吵也见惯了。

到3月份，我对在布鲁塞尔进行的事情很抱希望。不过一个新出现的困境却开始使我担心。

摆在眼前的大问题是怎样去召开英联邦总理会议以讨论欧洲问题。关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在布鲁塞尔顺利进行。虽然这些谈判目前还只是预备性的，但是到夏天就得摊牌了。我们可望于7月底获悉，就欧洲自由贸易区、英国农业以及英联邦等方面我国能够以什么条件加入六国共同体。事实上，我们一直是同英联邦各国官员们密切磋商的。<sup>114</sup> 我们曾经和英联邦部长们相互进行了个别访问。不过每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有利)都会假装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而且除了召开英联邦总理会议之外，没有什么行动可以被认为是构成“磋商”的事实。于是就产生了

<sup>①</sup> 1962年1月18日。

<sup>②</sup> 1962年2月7日。

何时举行会议的问题。可能在5月份,即恰好在真正的谈判开始之前举行,或是在9月份,即在谈判结束之后举行。假使在5月举行的话,他们之中某些人,就会对欧洲人横加指责……以致使谈判遭到破坏。假使在9月举行,保守党中的“精忠派”(沃克·史密斯、特顿·索尔兹伯里勋爵)就会说是向他们先斩后奏。这样,他们就可以操纵10月份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并在议会召开后影响下院中的议会党团。<sup>①</sup>

4月初,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停战后,法国举行了公民投票,戴高乐以压倒的多数票取得了胜利;有百分之九十的投票者对他表示信任。我想这会有助于我们,因为阿尔及利亚的叛乱,触及了他的敏感的性格中最脆弱的部分。于是我于4月16日,写信祝贺他的成功。

自从我荣幸地于去年11月在桦林居接待你以来,已经发生了不少事情。我希望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圆满解决,以及你从法国人民那里所得到的巨大支持,会使你现在更有可能顾及西欧的政治、经济以及防务问题。

至于我们这一边,我希望在夏末取得真正的进展,以便圆满地结束布鲁塞尔谈判,并达成其所意味的一切。

假使你同意的话,我想是不是找一个你感到方便的机会,以便我们两人就所有这些关键问题再商量一下。我已经安排好于复活节后立即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作短暂的访问。你能否于6月上旬和我相聚一天?

115 我们由于失去了(卸任的法国大使)肖夫尔先生而难过,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对(新任的法国大使)德库塞尔先生也是同样十分欢迎的。

5月15日,戴高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自己反对欧洲的超国家的政治发展动向,而宁愿要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他的五位赞成联邦主义的部长因此愤而辞职,这一事实颇使我们受到鼓舞。不过我们如何才能使法国支持英国加入共同体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从经济观点看来,我国加入共同体对法国不可

<sup>①</sup> 1962年3月24日。

能有多大吸引力，因为这样就会在共同市场中加进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我们也不能够提出同他们做一笔核交易，因为我们已同美国有约在先了。是不是或许由于对德国的未来一向感到怀疑，而使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指望英国成为一个忠诚而可靠的盟友呢？因此我同戴高乐的这次会晤将是事关重大的，我们必须为此作周密的准备。

在这几个月里，在英联邦中，特别是在老的英联邦国家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疑虑、不满的言论，甚至某种程度的猜忌。1962年2月初，希思访问了加拿大，并且极力使一个已经开始变得有点激动的局面平静下来。我于1月11日写给他一张便简，以表达我的谢意。

我要告诉你，对于你极为成功地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我是多么高兴。

根据报道看来，你似乎已在加拿大取得不少进展。对于共同市场，官方特别是公众舆论的情绪，现在似乎普遍比原来平静多了。此贺。

高级专员德里·艾默里也于1月15日向我送来了一份令人鼓舞的报告：

这里的报纸几乎一致对我国在欧洲所作的努力表示同情和谅解。部长们也的确正在努力把他们原来对此所持的僵硬的敌视态度改变为一种比较建设性的友好态度。他们对于自己可能在联合的欧洲和美国之间被夹得喘不过气来或许可能被后者吞并这一点，怀有真正的、或许是很自然的恐惧。特德·希思的访问无论如何是极有好处的。 116

虽然迪芬贝克于2月20日强调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召开英联邦总理会议的必要性，这其实是马后炮。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召开会议最为适宜。在2月份谈论这一点，显然是为时过早了。3月26日，迪芬贝克又重新施加压力，孟席斯也表示了某些忧虑。所以变得有必要去作出具体决定。于是我于3月30日，向所有英

联邦国家的总理或总统发出了内容相似的信。我们解释说，我们原来想提议在此后二、三个月内的某个时候召开会议，不过我们现在却认为，假如真正的目的是要大家一起来考虑以后在布鲁塞尔所商定的内容的话，那么把开会日期稍为往后推迟一点可能更有好处。所以我作出如下的具体建议：如有可能，应从9月10日起在伦敦举行会议一星期。我还提出，总理们可能希望把他们的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带来开会。我还说：“虽然会议的正式内容主要是涉及我们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这个主题，不过英联邦总理们必然会希望乘这个机会一起来讨论一下世界局势”。要适应十六位左右的工作繁忙的政治家的便利的这种会议，自然需要好好地作一番安排。所以，我感到自己如能于4月19日在下院宣布具体日期——9月10日——就算是幸运了。

同时，澳大利亚副总理约翰·麦克埃文访问了我国，而且还遍游了西欧各国。

他去过巴黎、波恩、罗马、布鲁塞尔，并受到各国领导人的友好接待。

117 戴高乐对他十分殷勤，这使麦克埃文感受极深。总而言之，麦克埃文先生对共同市场的总态度，以及欧洲和政治家们对他的友好接待，都使我们鼓舞。哈尔斯坦亦复如此。<sup>①</sup>

这是一桩好消息，因为麦克埃文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代表乡村党。这是孟席斯所依靠的联盟中的基本力量之一。他是一个高明而果断的谈判者。他是一个能坚持主张、直言不讳的人，有时甚至会面红耳赤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我对他十分器重，因为他既直爽又讲信用，只要他答应下来，就决不食言。

我于4月29日至5月3日，访问了加拿大。当时加拿大正在举行大选，所以我十分小心谨慎。不过，我在多伦多市向加拿大报界发表的讲话，似乎颇能为听众所接受。

<sup>①</sup> 1962年4月12日。



我所说的英国的双重义务——对英联邦以及对欧洲的义务——颇能为人们理解并受到欢迎。①

迪芬贝克毫不掩饰他对我们的宏伟计划的敌视态度，不过我认为，

认真对待问题的一些加拿大人对此并无同感……我在多伦多市碰到的银行家们和实业家们所持的豁达的观点给了我强烈的印象。②

的确，

我并未感到普通群众对我国的政策有什么敌意。当我被授以多伦多市荣誉市民权时，我受到了盛大而热烈的欢迎。③

我在回国时，向新西兰的霍利约克发出了一封信，要他派一位部长到伦敦来。他写了一封热情的回信，同意派他的政府中同这些问题关系最密切的部长杰克·马歇尔来英国，这使我感到高兴。

由此可见，不仅在议会以及国内公众舆论中，而且在欧洲本身以及英联邦中，我们都正取得稳步的进展。不过我也知道，随着我们接近最后阶段，空气就会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接下去的一桩重要事情显然就是我同戴高乐的会晤。5月19日 118  
日，我同希思作了长谈，以讨论我们所采取的策略。

目前形势的奇异特征在于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即戴高乐所要的正是我们很乐意去参加的那种欧洲，可是他却不要我们加入（L' Europe d' l'anglais sans les anglais 没有英国人的英国式的欧洲）。皮尔逊·狄克逊爵士是白厅中思想最敏锐的人，他认为，戴高乐现在已经肯定地决定把我国排斥于共同体之外了。但是他相信，如果我们应付得法的话，我们可以把戴高乐推向连他自己也不喜欢的为难境地……皮尔逊·狄克逊爵士认为我们能够——以耐心和好性子——来制服他。其余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于戴高乐已经肯定地作出了决定这一点，并不是那么有把握。我认为他的感情和理智可能仍在激烈斗争中。他由于第二次

---

①②③ 1962年5月6日。

世界大战、由于法国所受的耻辱、由于丘吉尔和罗斯福和由于核武器而痛恨英国——而且更痛恨美国。不过这是一种“爱憎交错”的心理。不久就可见分晓。<sup>①</sup>

希思本人认为，戴高乐和他周围的人希望谈判会在可以归咎于英国的情况下破裂，要末是因为他们向我们提出了无法接受的条件，要末就是因为即使我国谈判代表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但其根本精神却不能为英联邦及英国议会所接受。他也感到，戴高乐的确害怕英国加入后会成为特洛伊木马，它会打乱目前的体制或者阻挠法国独霸的局面。他无疑地对英美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在国防方面）也感到不满。接着我们举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以决定如何去应付戴高乐的猜疑和敌对态度。总之，几天后，

关于戴高乐的恐惧、忧虑、畏缩和嫉妒的某些十分有趣的证据开始出现了。所有这一切全都证实了我一直说的话——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sup>②</sup>

我的思想老是围绕着这个几乎无法解答的难题转来转去。

119 (虽然顾夫·德姆维尔似乎承认我国加入欧洲是一个“历史的定数”，)但是我们似乎越来越感到，戴高乐是决不希望我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不过这位将军可能感到无法或者不愿意公开而正面地反对我国申请加入。他可能指示他的谈判代表们来步步设障，空耗时间，使大家——包括英国人——都扫兴。假如此计不成，法国人就会转而坚持对我国农场主和英联邦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以迫使我国退出谈判。这当然是危险的玩意儿。法国可能暂时维持在欧洲（或者欧洲部分地区）的霸权。不过将来就难说了。<sup>③</sup>

我在动身前往巴黎之前，有机会同孟席斯作了一次非正式的私人会晤，他为了来找我和我的几个主要同僚，已经前来伦敦了。

---

① 1962年5月19日。

② 1962年5月22日。

③ 1962年5月27日。

主要就国际形势和我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政治目的同鲍勃·孟席斯作了长谈——历经二小时。我想，我的论点已使他产生了印象，但却没有说服他。<sup>①</sup>

次日他和新西兰的部长马歇尔就共同市场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篇声明已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感到鲍勃今天似乎很惭愧。他假装说，他当初没有想到这项声明会被这样地大事渲染。这种说法自然是掩耳盗铃，因为鲍勃是老于此道的。其后果如何，目前尚难断言。幸而他们主要是谈及自己最不过硬的论点——让工业品根据渥太华协定免税进入英国。他们对于在这些年中英国的特惠待遇怎样地被削减以及对英国贸易……所采取的许多歧视措施……却只字不提。<sup>②</sup>

同日下午二时，我和多罗西离开伦敦。菲利普·德朱鲁塔和我们同行。飞机在机场着陆后，我们受到了法国驻英大使库塞尔先生和鲍勃·狄克逊的迎接，接着驱车前往乡间别墅。受到这位将军的接待一向被视为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主人，有着天生的殷勤态度和旧式的礼貌。乡间别墅对他是再适宜不过的了，那是一幢令人喜爱的十八世纪房子，不大不小。

120

本来属于蓬皮杜夫人，后来由一个有钱的犹太人买下来，加以整修后献给了国家。它有一个由勒诺特尔设计的古典式奇妙的花园——有石灰岩砌成的小径，有各种塑像，有喷泉等等。室内陈设优美，房间相当舒适。<sup>③</sup>

第一次会谈在下午六时至七时三刻之间举行，只有四个人在场：将军和他的私人秘书布林·德罗济尔；我带来菲利普·德朱鲁塔。在那个星期早些时候，戴高乐已经同我国驻法大使作了一次笼统的谈话，他罗列了自己所看到的一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次他又重弹老调。“我试图用大量详细事实，并且用大道理

① 1962年6月1日。

②③ 1962年6月2日。

来逐点否定他的这些看法。”<sup>①</sup>接着吃了一顿十分惬意的家常便饭，戴高乐有如一位威严的君王，对一个过去一度同他敌对的、但目下却已和好的国家的代表，略为不那么矜持了。

次日是星期日，我在再度举行会谈之前思索了一下迄此为止所发生的一切。

我感到相当满意。这位将军并没有显出什么蛮横的态度，人家曾经说过他态度蛮横，而且预言过他可能会这样。在另一方面，他显然不太欢迎我国加入，其主要原因有二：

(1) 可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改变共同体的性质。目前这个由法国独霸的俱乐部很不错，既不太大也不算小。加上了我国以及挪威和丹麦等国，它的性质就要起变化。这会对法国有利吗？

(2) 他认为，我国除了要忠于英联邦之外，还要一直同美国人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戴高乐认为同美国的联盟是重要的，不过他也感到美国是想把欧洲变成一系列卫星国。<sup>②</sup>

121 正如往常所碰到的那样，我感到这个奇特而象谜一般的人的性格实在难以猜透。

我感到很难摸透戴高乐的态度。我同他的会谈肯定已使他相信，假使能够(尤其是为老的英联邦国家)取得合理的条款的话，女王陛下政府认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总的说来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我想他也相信，我们政治上的考虑同经济上的考虑一样，甚至有过之。我对于这个不幸的世纪所作的回顾以及一个紧密的英法同盟，经常地、真正有效地加以经营后，本来是可能避免战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问题。这些给他留下了印象。不过对于戴高乐和法国人在英国加入是否符合法国的利益这一点上他们是怎样想的，我是毫无把握的。假使不是经过多次讨论和谈判，假如不打乱六国之间通过极力讨价还价之后好不容易达成的某些协议的话，我们就无法加入。而且这还意味着法国霸权的完结。<sup>③</sup>

---

① 1962年6月2日。

②③ 1962年6月3日。



有一点是很清楚地显出来了：这位将军希望法国也有核威慑力量。不过他似乎也明白：虽则我们可以就我们自己所掌握的某些细节和他们合作，我们却无法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核子科学创始者的继承人，才从美国获得的那些秘密。我于6月5日写给女王的信中试图把我对那次访问的印象概括如下：

（戴高乐将军）对于我国申请加入六国共同体所存在的一些困难是直言不讳的，他还指出，这就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改变共同体的性质。他似乎对经济上的影响并不介意，而对政治上的后果却显然更远为不安。他说，他认为一个联合的欧洲将能够对美国人昂首睥睨。欧洲人不但要有一个针对欧洲的政策，而且要有一个针对全世界的政策。为了保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也就应该有一个全欧洲的防务体制，这种体制是任何政府为维持其职权所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自己能够就某些经济上所产生的影响向戴高乐作解释，并且能够打消他关于联合王国是否有可能加入共同体的某些疑虑。关于政治和国防方面，我一面小心地为美国辩护，说它是一个好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盟邦，一面却不能不对他的观点深表同情，他对我关于美国的论点并不反对。 122

我回国时遇到了金融界所经常发生的一次较小的危机：

一个新的忧虑是：纽约证券市场的崩溃正开始影响到英镑的地位了。我猜想，美国人是在出售他们在英国的投资以抵付他们在华尔街所受到的损失。<sup>①</sup>

在此同时，关于共同市场的论战正在国内展开。

比弗布鲁克勋爵已争取到蒙哥马利勋爵了，人们正在所有各报以大幅……版面来宣传蒙哥马利的观点。（由德里克·沃克·史密斯爵士、特顿先生、欣琴布鲁克勋爵等人所领导的）保守党反对派正开始形成。工党的态度不明——产生了一个反对盖茨克尔的斗争，他已经被希利（或许）以及哈罗德·威尔逊所抛弃了。<sup>②</sup>

---

①② 1962年6月6日。

应反对党之请,安排了一次关于欧洲问题的辩论,但是这是在议会休会期间举行的,所以没有进行表决。

希思……在辩论会中首先作了令人钦佩的演说——清晰、坚定而且显示出他对于所有复杂的细节都瞭如指掌。盖茨克尔仍然扮演着为人所熟知的骑墙角色。<sup>①</sup>

但是情况是微妙的。6月12日,在澳大利亚俱乐部举行的以孟席斯为主宾的宴会上,

我不得不向他祝酒,我自己感到干得很成功。鲍勃的兴致很高——他所说的关于共同市场的话要比我所预料的远为通情达理。他显然极力想做到光明正大,他同我们大家交谈的内容对我们很有帮助。<sup>②</sup>

《快报》自然把我和鲍勃的发言都完全加以歪曲。它以粗体字刊登发言内容中的一言半语,而把修饰性句子删除掉。把说着玩的话改成本正经的论点,又把正经的话改成开玩笑的话。<sup>③</sup>

123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现在又给这个有点紧张的局势火上添油。他在密执安州发表了讲话,把所有各国的核力量谴责为“危险”而“不可信任”的。

麦克纳马拉的愚蠢的讲话……已经激怒了法国人……所有的盟国对于美国要我们购买(它的)火箭的建议都感到忿怒。……这不能算是欧洲人的火箭,它是美国工业界对我们的敲诈。<sup>④</sup>

美国政府部长们中存在的问题是,他们一般不是来自工商界就是来自各大学。可是无论这些巨头或是学者在政治上都不是很老练或者很敏感的,而对外国的政治尤其如此。

7月初我写道,

---

① 1962年6月6日。

② 1962年6月12日。

③ 1962年6月13日。

④ 1962年6月19日。

《每日快报》现在正在暗示将就共同市场问题在秋天举行大选，以作为它反对加入共同市场运动的部分内容。在下一阶段中，它自然会要求非得就这个问题举行大选不可了。<sup>①</sup>

7月16日，我接到阿登纳的一封来信，信中谈了他访问法国的经过：

戴高乐总统和我在会商中，也谈到了联合王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欢迎英国的决定，应该对之加以支持，认为这将有助于欧洲的巩固。在这同时，我们感到似乎有必要来彻底研究一下，由于一个如此重要的伙伴的加入而引起的一切问题。

至于欧洲在政治上联合的问题，戴高乐总统和我同意，六国在不久的将来，再把这项自1961年夏季以来一直搁置起来的问题继续研究下去，以便得出积极的结果。我们也同意，要让英国政府一如目前一样继续了解这些努力的进展情况。

虽然这封信从表面看来是令人满意的，不过它的措词却极为笼统。<sup>124</sup> 于是我在回信中要求他不要使谈判拖下去，因为这样对团结是极为不利的，而且鉴于英联邦总理会议即将召开，这只会为我国造成种种困难。可是他的回答又使我大失所望。他告诉我说，根据他从布鲁塞尔听到的消息，这些谈判将会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拖到1963年去。这就证实了我国代表们所得到的关于他们所采取的策略的印象。这一切都使我担心，我感到德国人并未作出真正的努力以阻止法国人的拖延策略。我认为还是把过去一段历史向他提醒一下为好。

自从我们两人于1960年决定应该重新采取行动来看看英国是否能够加入共同市场以来，我一直感到，对于下面这一点你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英国的加入似乎就代表了欧洲联合格局的另外一半，而您的名字将会永远同欧洲联合这一词联系在一起，并且我知道您对此事也极为

---

<sup>①</sup> 1962年7月7日。

重视。所以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你和戴高乐总统一致认识到，为了巩固欧洲，英国的加入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一直是以同情而关注的态度注视着六国走向更高度的政治联合的努力。我可以向您保证，一旦成功地结束了布鲁塞尔谈判，我们也希望全力参与这项工作。

同时，正如您所说的，在谈判中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我丝毫也没有低估在今后几周的谈判中我们将面临的一些困难。我想给您送上一份简短的提纲，附在本信后面，其内容涉及我所认为的我国对于一些主要争论问题所持的立场以及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在这同时，我想再次表明我的坚定信心，只要在政治上有决心，我们将会根据罗马条约而建立的体制范围之内，找出解决的办法。

125

我主要关心的是：我们应该一致认识到迅速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我们务必使谈判有个眉目，以便使（我国）政府明白，究竟是否有条件达成一项可以向英联邦以及我国人民提出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根据我将于9月初和英联邦总理们会商的结果来决定究竟有没有可能把这事再进行下去。我确信，如果到8月份，这些方针仍然不能明确的话，我们大家都会处于严重的困难中。这就会失去一个重大的机会，我不敢说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弥补其造成的损害。

当然，随着我们接近决定关头，每一种反对变革的势力和既得利益者都肯定会一显其身手。那些反对欧洲联合的人、那些把局部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人都一定会在未来几周中大吵大嚷，并且会使我们所有人的动机都受到怀疑。我们决不能让这些使人分心的事把自己引入歧途，或者让我们的伟大事业由此而落空。

不幸我的担心不久就被证实了。7月29日，我接到消息说，就温带出产的食品问题，在布鲁塞尔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就意味着：甚至在假期前结束预备性谈判的希望也没有了。

这次新危机是：无法在布鲁塞尔就有关温带食品的这个英联邦问题达成协议。法国人成功地迫使其余五国在谈判中采取了比较否定的态度。各国经过了三天的会谈后实行休会，要到下星期三才复会。这当然



破坏了……在假期前结束全部预备性谈判的机会。

希思和鲍勃·狄克逊于星期六下午五时（从布鲁塞尔直接）来到契克斯。亚历克·霍姆从吃午餐一直留在这里，我们商量了一下以后的步骤。情况十分复杂，我担心这种僵局会使这里的舆论变得强硬起来。不过反正欧洲人已经指出，我们只知要求他们对老的英联邦国家提供保证，而我们自己却是从来不愿这样做！<sup>①</sup>

这时希思把情况向大家作了比较详细的报告，内阁同意了他于8月3日向大臣们所提出的若干折衷办法；可是接下去也并没有达成全面性的协议。甚至整夜的会议也打不开僵局，于是我们不得不于8月5日同意休会。不过迄今，正如一位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历史学家所承认的，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126

对所有涉及英联邦各点，都进行了足够详尽的商讨，这样英国人对于他们可能争取到的协定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不少积木都已经搭好或者几乎搭好了。将来适用于从温带输入的农产品的一些原则已经确定了，不过还有不少问题以及某些十分重要之点尚有待解决。对适用于从发达的英联邦国家输入工业品的办法已取得了协议。对将要制订的适用于从印度、巴基斯坦及锡兰输入的产品的办法，已大体上取得了协议。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之外，大家已经搞清了将邀请哪几个英联邦国家加入这个联盟，而六国早已同它们自己的同盟者就新的盟约的条款达成协议了，所以在事实上，“同盟”一词的含义已经是相当地清楚了。除了在免税请求这一重要之点上尚未取得进展，以及对某些经过加工的食品特别是罐头果品、干果以及罐头鲑鱼将如何处理尚无定论之外，谈判中特别涉及英联邦国家的那些方面已经大体得到解决了。这样，虽然希思先生要促成一个“总体”协定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已经有了很多内容足供英联邦各国总理们去讨论。<sup>②</sup>

尽管这年夏季发生了这许多麻烦问题，保守党在议会内外总

① 1962年7月29日。

② 坎普斯前书，第411—12页。

的说来都还能保持坚定而忠贞不渝的态度；在国内发生了暂时冻结工资、工资冻结、内阁改组的问题。在国外柏林的形势日益恶化，俄国的核试验咄咄逼人——所有这一切就凑成了一个混乱而且相当阴郁的景象。我只好以我的前人曾经历过比这更为艰苦的  
127 日子这一点来聊以自慰。从这时起直到秋末，只要戴高乐一直是令人莫测高深，只要阿登纳继续无能为力，英联邦各国和保守党对“宏图”中关于欧洲的内容的反应，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众目所矚了，而这时我和我的同僚们对于“宏图”是负有责任的。

8月11日，我向所有英联邦国家总理们发出了一封信，把在布鲁塞尔谈判的大体情况告诉他们。

当我们正在考虑为总理会议选择最合宜的日期之际，我感到我们应该记住两个因素。第一，要找一个能适应十六位以上有着不同政治任务的总理们的日期是不容易的。阁下以及我们的其他同僚们，对这个似乎为大家普遍感到方便的日期表示同意这一点，使我深为感激。第二个困难是：要在六个月之前就能够预料到何时谈判会达到某一程度，而在该情况下召开这次英联邦会议就可以收到最大效果。结果，我认为，情况还是相当好的。我总是想去避免这种局面，即，我们似乎是把一个预先准备好的方案向大家提出来。而在另一方面，我也一直感到，假如提案内容不明确，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会议就没有多大价值了。事实上，我们还是通过种种艰难险阻而取得了成功，这一点殊堪欣慰。

我们还不能在布鲁塞尔谈判中就每一个问题达成临时性的结论，而这些问题都得在我们就加入欧洲共同体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获得解决。不过我们却已经能够对其余英联邦国家政府所关切的大多数重要方面，作出了临时性的结论，而且我们对大多数余下的讨论题，也已进行了有益的预备性讨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9月所举行的会上，向阁下以及其他英联邦总理们提出我们加入共同体（如果我们决定加入的话）的条件的相当全面的梗概。

我在约克郡度过了一个短短的假期后，即返回伦敦去履行同

拉布·巴特勒久已约定的一次会晤。

这次是在巴克饭店同他会晤的，他请我到那里去作客。这次会面早在7月就约定了。这显然是一次重要的会见，事实确是这样。他告诉我说：他已决定不顾农场主和苏联联邦的反对，以及保守党可能发生分裂，支持我国加入共同市场。现在要掉回头来已经是来不及了。要使英国富强，机不可失。不过我们必须勇敢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可能遭受罗伯特·比尔爵士及其支持者们同样的命运。<sup>①</sup>

这个即使是晚了一点但还是有用的声明，给我很大的鼓励。次日内阁召开会议，用了将近三小时的时间来听取

巴特勒的委员会所作关于共同市场的报告，这个委员会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举行了会议。在委员会工作的几个大臣（包括英联邦事务大臣和农业大臣）的意见是一致的。内阁对掌玺大臣的文件逐字逐句地作了长时间的讨论后，终于同意了委员会的决定。（某些新阁员——博伊尔、基斯·约瑟夫等人所提的谦虚而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意见使我惊叹不已。）

接着巴特勒以他昨晚在巴克饭店向我所说的同样内容提出保证。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故意提到比尔、乔治·本廷克勋爵和迪斯雷利。拉布虽然很忧郁，却很坚定。索姆斯（农业大臣）的情绪也极为低沉，他预料此事在我国农场主方面将遇到重大阻力。

大臣们从下午三时至五时半一直开会，讨论如何来掌握英联邦总理会议。大家同意采取一项广泛的带策略性的方针。<sup>②</sup>

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现在正接近决定性阶段的这种感觉，使大家充满幻想和激情。有消息说比弗布鲁克勋爵已经写信给诺福克郡中部保守党协会主席，提议在一次补缺选举中支持一个反对加入共同市场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不过即使如此，也并未使我十分惊惶。这活象是把1930年以来我一直记忆犹新的那部电影重新放映

① 1962年8月21日。

② 1962年8月22日。

## 129 一遍。我也并不过分担心

阿登纳博士在电视上所作的可笑表演，他对我很有意见，还提到了我写给他私人信件；这位德国总理对我的攻击反而使他自己吃了苦头，我想情况已经明朗了。德国的官员和公众对于他的失检显然感到恼火。甚至《快报》似乎也站在我这一边了。<sup>①</sup>

英联邦总理们开始聚集到伦敦来了。9月5日，鲍勃·孟席斯独自来吃晚饭，我们作了十分坦率而有益的谈话。

我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想去试行一项有建设性的方针——不去破坏英联邦会议或者绕过我们直接向英国人民呼吁。我告诉他，我认为他是有力量来阻止英国加入欧洲的。不过我也认为这将担负可怕的历史责任。

我估计鲍勃·孟席斯是目前形势中的真正关键人物——而迪芬贝克却不是……鲍勃·孟席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伟大的帝国派政治家中的仅存者。<sup>②</sup>

为9月10日开始举行会议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但是9月7日却是

过得既慢又使人疲乏。早上花了二小时半同澳大利亚人——孟席斯、霍尔特、麦克尤思商谈。襄助我的有桑兹和希思。下午又花了二小时半同新西兰人会谈。霍利约克和马歇尔代表新西兰；我们照旧还是这三个人。同澳洲人的商谈取得很大的进展；新西兰人却十分忧郁。<sup>③</sup>

我还接见了新英联邦国家的所有代表。我们希望争取使大多数这些国家同共同市场结成“联盟”。9月8日，我和新西兰的在野党领袖纳什谈了二小时——看来现在不仅英联邦各国总理，而且连在野党的领袖也蜂拥到伦敦来了，这种情况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不过我同我的老朋友进行了很有益的谈话，“内容包括从黄油直到

---

① 1962年8月30日。

② 1962年9月5日。

③ 1962年9月7日。



乌托邦的种种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好处的。”<sup>①</sup>巴基斯坦的阿尤布 130  
总统来吃午饭。

他是会讲道理的。他希望为纺织品取得较好的条款——或许不如说，他认为对印度太客气了。他秉性纯良，很容易商量——他是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和印度骑兵的标准产物，满口是骑兵军官食堂里通用的语言和惯语。<sup>①</sup>

9月9日，即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盖茨克尔蓄意把一颗炸弹丢进了原来就已经是微妙的局势。他

在英联邦各工党领袖的支持下，也许同他们开过会后，发表声明反对根据目前条件加入共同市场，并且要求举行第二次英联邦会议。……他还要求在各党派对此有分歧意见时应即举行大选。<sup>②</sup>

幸而这一炮完全失灵。次日

报界……对盖茨克尔意见很大。《泰晤士报》、《卫报》、《每日邮报》十分藐视他的这个“政治”手段。《每日镜报》很赞成加入共同市场，但却猛烈反对政府，它试图把事情搪塞过去。《每日电讯报》态度很好。《每日先驱报》……（赞成加入共同市场）感到为难，而且无所适从。当然，它可能及时地击中了要害，它或许也可能犯了一次致命的错误。这就有待于时间来证明了。<sup>③</sup>

在这同时，我和迪芬贝克两人单独吃了一顿耗时很长的午餐。

他对自己的策略秘而不宣，一点也不透露他在未来的大辩论中准备说些什么。他装得十分和悦，所谈的主要涉及国内政治……我想他是由于在大选中失利和金融危机而变得有点低沉了。不过这一点很容易引起他去遵照比弗布鲁克的方针在大会上为英联邦的利益大大表演一番，

---

① 1962年9月8日。

② 1962年9月9日。

③ 1962年9月10日。

以弥补自己失利之处。午后稍晚，(牙买加总理亚历山大)巴斯塔曼特(爵士)和(特立尼达总理埃里克)威廉斯博士来访。<sup>①</sup>

131

大会在马尔巴勒大厦举行，这是女王所赐的一幢房子，专供英联邦会议之用。这幢古老的建筑物修饰一新后对召开这种会议极为合适。身历其境者都会因女王的慷慨油然而生感激之情。在完成占去第一天整个上午的一些议项目讨论之后，我便带着霍姆和尼赫鲁回到唐宁街十号吃午饭。“尼看上去既老又疲惫不堪——他没有说什么。”<sup>②</sup>

下午，我以一篇细心准备的开幕词讲了一个多小时。<sup>③</sup>接着“希思作了一小时半的讲话。这使与会者感到疲倦——我希望也能使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我从来不曾听过象希思发表的那样出色的演说。他今天的

论述堪称为一篇杰作——并且是根据提纲而不是照本宣读的。语调平和，对细节之熟悉殊堪惊叹，而且他对于涉及二十个国家以及无数商品的复杂问题的理解程度，的确使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以后两天的时间是供总理们发言的，他们以不同的调子纷纷提出警告或是抗议。

英联邦各国代表作了两天的发言。第一天，在迪芬贝克带领下，他们集中火力对我们作了攻击……孟席斯在第一天最后发言，他说得很巧妙，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害；霍利约克说，新西兰会因此而破产；尼赫鲁(的健康情况似乎极差，他)显得不高兴；而通过和欧洲的“联盟”就可以获得自己所要的一切的非洲人，甚至不屑……去争取它。

实际上，第二天的情况有所好转——特立尼达(的能干总理埃里克·威廉斯博士)作了长篇通情合理的演说；马来亚的态度是友好的。<sup>④</sup>

---

① 1962年9月9日。

② 1962年9月10日。

③ 《附录》一。

④ 1962年9月12日。

当我事后阅览会议的详细记录时，感到自己在辩论会达到高潮时所写的这些评论有点过分了；不过我感到还是值得这样记下来的，因为在写的时候至少并没有想到事后的看法。由于有了这么多外国政治家集中在一起，除了各国总理和财政部长之外，还要加上议会中的反对党的人员，记者们自然是极为活跃的，还有大量的接见活动，以及从这次有名无实的秘密会议中不断泄漏出来的消息。我于9月12日写道：

今晨报界“大放厥词”。马克斯·比弗布鲁克系统各报措词激烈得近乎发狂。这些报纸普遍认为，政府必须向英联邦各国低头而放弃它的计划。《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则比较冷静。《每日镜报》照样热情地支持加入欧洲的计划，但这不过是社论的话而已，它的“新闻”部分却是以远为耸人听闻的方式来报道的。据它说，这是麦克的一次惨败。<sup>①</sup>

第一天会后，在海军大厦为所有的英联邦部长们举行了一次宴会。餐后又在兰开斯特大厦举行大规模的联欢会。

到处显出紧张的气氛。盖茨克尔面带笑容走来走去……他活象刚刚吻过女王的手那样得意。……很奇怪，人们也象利用经济作口实那样地利用政治作口实。英联邦将无法存在下去了。……那些多年来一直责骂我国的国家现在却恳求我国不要抛弃它们了，听到这些话令人啼笑皆非。联合王国可能自行宣布独立了，这个念头似乎是闻所未闻的，以至使人为之大为恐慌。<sup>②</sup>

我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而感到吃惊：不少英联邦国家的代表不承认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存在的事实，他们似乎在想，我们还在考虑究竟要不要去组织欧洲共同体。然而它的确的确是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对待”？<sup>③</sup>

9月12日晚，我的确感到有点动摇了。不过经过考虑后，认为各国

<sup>①②③</sup> 1962年9月12日。

在开头一下子的反应都是不好的，我以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认为要经过一两天后才能开始进行认真的讨论。换言之，在大会开始时的一些发言可算是“在二读阶段”的努力；我们将很快地转入委员会讨论阶段了。

9月13日，我于十时半前往

133 马尔巴勒大厦和孟席斯会谈。这就是说，要错过内阁会议的时间——这是一个好主意。由于我没有参加会议，报界就无法把它说成是一次“紧急”内阁会议。我在会议前，同巴特勒在马尔巴勒大厦商谈了一会。他是既镇静又很坚定。在会上总有大量日常事务需要加以处理，他还要把英联邦会议的大体情况告诉大家，因为他是自始至终一直参加这个会议的。事后他告诉我说，除个别人之外，大臣们都很镇定。

孟席斯显然很苦恼，他似乎急于想找一条出路。我想还是让他谈出来为好。他要看一看是否可能为最后公报的内容想出一些主意。我同米尔顿·马盖爵士（塞拉利昂）和亚历山大·巴斯塔曼特爵士（牙买加）共进了一顿有趣味的午餐后，回到马尔巴勒大厦，同阿尤布总统作了有益的会谈。过后，迪芬贝克先生来了——他没有说什么，不过我想他也感到有点惊慌。<sup>①</sup>

于是我向大会提议建立我们所谓的“专门小组”来处理一些特殊问题：温带出产的食品，亚洲问题，非洲及西印度群岛问题等等。他们于（9月13日）星期四开了一整天的会，并且在星期五和星期六还继续开下去。这个巧妙的办法是由诺曼·布鲁克爵士提出来的。由特别有关的英国大臣们以及其文职顾问们分别负责主持各个研究小组。这个办法不仅使英联邦各国部长们接触到实际，而且使总的气氛大大地缓和下来。

女王所设的宴会是在9月13日举行的，搞得很成功。

在每张圆桌上派一个王室人员来作东道的这种办法，较之把所有坐席根据礼仪规定，沿着一长行正式宴会餐桌而排列的方式远为合适。<sup>②</sup>

---

①② 1962年9月13日。



我已经注意到报界态度的变化,除开比弗布鲁克系各报之外,一般就变得镇静而且甚至对我们有帮助了。

星期六(9月15日)下午稍晚,

桑兹、希思和诺曼·布鲁克来会商“策略”问题。有些总理似乎想再度发表演讲——我希望他们谈得较为克制一点。也许最好是让他们在星期一上午发表讲话。看了小说《凯尼尔沃思》——内容很精彩。 134

菲利普·德朱鲁塔同我一起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写(大会闭幕)演讲词,以备明天上午之用。不巧由于有人去参加婚礼,有的在休假,也有的在伤风害病,办公室里人手较紧。我向一个女秘书口授了一大段精彩的话,她也似乎把它全记下来了。可是一俟要把自己速记下来的内容译出来时,她却译不出了,她急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过我们终于在午夜前完成了工作。<sup>①</sup>

星期天是有名无实的休息日。除了《星期日快报》之外,报界的态度无疑是好的。不过我有这样的印象:即使这家报纸,也“亟不想使它的读者感到过分厌倦;报上涉及英联邦和共同市场的内容,要比我所预料的为少。”<sup>②</sup>

星期一(9月17日),大会于十时半开始。

有几位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又作了发言。各“专门小组”已经整整地开了三天会,而不是原来预定的两天。星期六那天,他们从早上一直工作到夜里。这证明各国总理、部长以及官员们都感到这些小组很有用处。<sup>③</sup>

我考虑了总的形势,感到它似乎变得比较松动了一点;拟议中的方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很有利的,虽然它们还要在每一点上讨价还价,它们感到在最后照理是应该满足的。

---

① 1962年9月15日。

② 1962年9月16日。

③ 1962年9月17日。

就非洲人而言,要他们加入“同盟”的经济条件好得几乎难以置信。可是他们听到这个词就畏缩不前。和白种人结成同盟可就是新殖民主义呀!澳大利亚很焦急,但是鲍勃(迫于麦克尤恩)正在玩弄权术。不过他们反正是有其担心的理由的。新西兰仅仅说,他们相信我们会为他们争取到一些特殊待遇。加拿大只是本着迪芬贝克的奇异玄术,正在作一种政治游戏。<sup>①</sup>

135 我在五六位总理发言之后,于中午十二时开始致闭幕词,并于下午一时予以结束<sup>②</sup>。我在手头已经收集了一些极好的资料,我所能提供的关于英国工业变化情况的统计数字似乎使与会者相信,英国不可能单独在世界上继续成为英联邦各国商品的自由贸易市场了。

下午的会议时间用于讨论国际形势,由霍姆以外交大臣身份首先发言。在9月18日,还继续讨论了整个上午,于午饭时结束。所有总理都参加了,讨论得生动活泼。接着到来的,便是所有此类会议的关键时刻——起草会议公报。

午餐后,就起草公报的事,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从三时三十分开到五时。这时已可看出,(虽然昨晚官员们对公报内容已在大体上达成协议)起草公报的事将证明是一个真正的困难问题。我一度担心可能要不只发表一份公报——甚至连“同意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话也没有。向大家提出的公报草稿内容是以我自己大约在一星期前准备好的材料为根据的。

它阐明了四个总原则,这些原则是我的闭幕词的主要论点,而且也由报界很好地加以论述了。可是每一位总理都要求在这个总原则上再补充自己的特别解释——这样,公报将会变成一种“购货清单”。鲍勃·孟席斯(显然处于麦克尤恩的压力之下)态度僵硬,所有其余的人都跟着他。我感到再谈(下去)也没有什么用,于是提议让官员们在晚上开会去

---

① 1962年9月17日。

② 《附录》二。

准备两份草稿——一份是原来的草稿，再加上讨论过程中对总原则所提出的某些主要修正内容；另外一份则包含各国代表团所送进来的涉及他们本国的一切特殊保留意见等等。于是我们就休会了。①

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阶段，

我的情绪十分低沉，可怜的特德·希思也是这样。不过我的那个方案（实际上是由那出众的诺曼·布鲁克向我提出的）可能还是行得通的。一当大家看到那份提及每一个国家的要求的冗长草稿时，就会明白其内容之荒谬。② 136

次晨，

报界调子忧郁。它们说：麦克失败了，麦克崩溃了，麦克受到考验，会议完蛋了，等等。《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说得最好，它们说，还有达成协议的希望。③

结果证明它们说对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与会者们再一次面对了现实。这项协议

实际上是在一小时内达成的，布鲁克—麦克米伦策略奏效了。那份“冗长”的草稿立即被否决了；我们大家有条不紊而又融洽地对那份“短的”草稿逐条加以讨论。只存在着—两个难点，但是和昨天的气氛截然不同。迪芬贝克的听觉不灵，这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样，我就能够使大家很快地逐条讨论下去。又发生了一场关于非洲的争吵。锡兰和印度很帮忙。巴基斯坦是够朋友的。孟席斯很讲道理（我估计他为应付国内政治也已经表演得很够了）。他又恢复了他所喜爱的玩意儿，又对迪芬贝克开玩笑。④

由于大家有了这样一种新的情绪，

整个会议在十分正常、而且甚至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于昨天午饭前结束。我作了关于诺曼·布鲁克爵士的简短讲话。这次是他参加过的第

---

①② 1962年9月18日。

③④ 1962年9月19日。

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大会。总理们都热情而激动地谈及他。接着迪芬贝克以极其客气的措词，提议向我鼓掌表示感谢。这样大家就分手了！<sup>①</sup>

公报于下午二时十五分发表了。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内容可称满意。因为，即使它并不隐瞒某些英联邦国家对个别之点所感到的忧虑，它却能同意英国决心去推行的总政策。<sup>②</sup>

137 我于9月21日写信给女王，综述会议的经过，当时感到有必要承认，

但是我不应该忽视尚待我们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们只能以想象力和勇气来应付它们。我十分明白，共同市场以及它对英联邦的影响，已经造成了一些困难，而我本来是希望在我担任首相期间，免得陛下下去为这些事而操心的。陛下作为老英联邦的君主以及新英联邦国家的元首，一定会因为看到这些地区和陛下在联合王国的政府之间发生不和，或者发生局部不和，而感到十分为难和痛苦。……

夫人，总的说来，我只能说，会议开得比我所预料的为好。当然它也可能开得更好一些，不过也可能开得比目前更糟得多。我并未感到英联邦已经动摇了，也根本没有听到关于一旦英国有可能参加欧洲共同体时，英联邦就会产生破裂的谈论。

在继续谈到英联邦有可能受到某些涉及面更大的压力时，我说，这个加入欧洲的问题至少可以用来掩盖这些问题，或者使其推迟出现。

报界在开头一下子的反应是饶有趣味的：

《每日快报》语调激烈得几乎难以置信——这很象十九世纪初叶的报纸。（似乎持骑墙态度的）自由党人已经在他们的大会中，表示坚决赞成加入共同市场。……《曼彻斯特卫报》仍然态度暧昧——它代表了约

---

① 1962年9月19日。

② 《英联邦总理会议——最后公报，1963年9月19日》，敕书第1836号（皇家文书局，1962年）。



翰·罗素勋爵用毕生精力去倡导的一种态度——老是想去伤害别人，却不敢下手——基本上总是沾沾自喜，而且略为有点不老实。《每日邮报》态度良好。《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继续保持坚定的态度。《约克郡邮报》态度很好。《每日镜报》对我个人进行了攻击，但却支持我的政策。①

### 盖茨克尔在电视广播中

所发表的议论比以前更激烈了。他抨击了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条件，他现在似乎也反对在任何条件下加入共同体了。他宣称，英国将会变得象得克萨斯州一样。（可是他却希望我们放弃核威慑力量而整个地投入美国的怀抱！）② 138

鲍勃·孟席斯寄来的一封措词十分友好的信，使我得到了安慰；不过他自然得去考虑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他凭自己多年经验和智慧认识到，这个朝着欧洲联合的动向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来，英国孤立状况也不可能有益于英联邦。

在布鲁塞尔的谈判要到秋末才能恢复进行。同英联邦各国的函电交往已经以英联邦总理会议而告一段落，这次会议虽然不曾批准，但至少同意了我们的政策。剩下的就是国内各党派之间以及政府和各政党之间的内部斗争问题。当各党派对一个新产生的问题还没有做到彼此门户分明之际，当然会对党的领袖造成严重的困难。政党组织者、宣传小册子的作者、迎合群众口味的演说家都喜欢走老路，这样他们就可以各站在一方，不费心思地象鹦鹉学舌那样，重复着精雕细琢的论点。迄至此时，欧洲联合的概念几乎还只是属于学理范围内之事。丘吉尔虽然在晚年的确通过一系列惊人的努力使其问世了，可是他却无法在他最后一次执政期间，为欧洲联合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实际贡献。而且，某些比较死硬的保守党人认为，丘吉尔实际算不上一个保守党人。虽然为了赢得

① 1962年9月21日。

② 1962年9月22日。

战争，他们的是需要他的；可是他们的内心是向往于在和平时期执政的那些更为体面的人物。就算这个拿不定主意的问题已经多少由于现任政府的行动以及它所宣布的决定而得到了解决，可是许多问题还有待处理，而且一项漫长而困难的谈判也还有待完成。这样，一方面，欧洲联合的概念还不能马上得到热烈的支持，另一方面，各种强大的力量却基于经济以及政治上的理由，集结在一起来反对加入共同体的整个计划了，这些理由是以历来已久的爱国情绪和对大英帝国传统的感情为出发点的。

在左派方面，原是可以指望那种推动着初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国际主义来坚决支持欧洲联合的理想，可是事实上，工会却受到了保护主义和差不多类乎孤立主义思想的控制。所以议会党团领袖们感到有些为难。他们在思想上是倾向于加入欧洲的，但他们所受到的压力却又使他们踌躇不前。所以我对他们的领袖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状况，并不感到意外。9月29日，

在欧洲问题上，盖茨克尔似乎又回到了骑墙立场上去了。果真如此，他的威望就要受到相当打击。

盖茨克尔(在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又发表了一项(我认为是更有权威性的)关于欧洲和共同市场的声明。它回到了“得克萨斯州”以及“一千年历史”的论调，这是盖先生上次广播演说的特色——就是说，在原则上反对加入欧洲。现在他们所采取的方针是：两种说法都有理由；假如我们取得的条款比看来可能得到的条款更好得多的话，那末“总的说来”，参加欧洲共同体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还有这么一个相当含糊的要求：除非大家对条款都表示同意，否则就要举行大选。在目前，还很难估计这一切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对此首先产生的印象是：这是一份很巧妙的文件，它可能使工党通过它的代表大会而大大地团结起来。①

我感到反正这个问题最后总是会通过比我国的政党强大得多的多

---

① 1962年9月29—30日。

方面的力量而得到解决的。

德国要的是什么？阿登纳要怎么办？戴高乐是否决心不让我国加入？等等；条款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到底还比不上时代精神呀！<sup>①</sup>

过了几天，反对党领袖以高明的手腕，稍微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的方针似乎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加入欧洲的概念，而是去提出一些使我们在实际上无法达成任何协议的要求。

140

我本身的任务是要为保守党代表大会准备发言稿。因为遵照传统做法，这种发言是要在大会结束时发表的，这就使我为难了。我必须在事前设法来影响代表们。于是我就编写了、并且发表了一本名为《英国、英联邦和欧洲》的小册子，它综述了我的整个论点。其内容主要是以我在英联邦总理会议所作的两次演说为蓝本的。这本出版物出现于十分适当的时刻，因此无疑产生了相当的效果。不过我还得去准备发言稿，

可是我对于在明天(星期四)就共同市场而举行的辩论的结果如何，却一无所知。我在下午同希思通了电话。他对于可能使听众迷惑不解的那项修正案感到有些担心。不过他说，总的情绪似乎是对我们有利的。唯一不能参加这次事关重大的讨论会的人就是我本人，这是奇怪的(如果这次讨论会进行得不成功的话，就会使以我为首的政府受到致命的打击)！<sup>②</sup>

幸而我于10月11日接到了好消息说：

保守党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特顿—沃克—史密斯的关于共同市场的修正案——在四千票中，只有五十票左右赞成它。巴特勒和希思的演讲似乎十分出色。<sup>③</sup>

于是我带着我的演讲词的最后一稿，也就是第八稿，以愉快的心情

---

① 1962年9月30日。

② 1962年10月10日。

③ 1962年10月11日。

前往兰杜诺。它比通常的这类演讲词为短，也许正是为此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的妻子也一如往常地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所以在向欧洲求爱的第二阶段終了时，我和我的同僚们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戴高乐将军本来预料——无疑也希望——我们会深深地陷入这些困难之中而无法自拔的。英联邦会议显然是英国政府大获成功的一次会议。假如关于细节方面的谈判能取得相当成就的话，英联邦各国的领导人即使不是兴高采烈，也会感到满意的。我们也胜利地克服了保守党内部的一切反对意见。因此，假如戴高乐将军或者阿登纳总理指望我们这匹英国马会在跳过这些险峻的障碍物中摔倒的话，他们是大失所望了。我们此刻是“在直道上跑”<sup>①</sup>的。假如有人要阻止我们到达终点，除非他们把我们摔翻，而这样他们就得负全部责任。他们是一心要使布鲁塞尔谈判归于失败的；要是做不到这一点，那末就只好去找出一些那怕是极其琐碎的理由，以作为行使否决权的借口。

---

① 赛马用语。——译者



## 第六章 核挑战

1961年下半年，东西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抗变得越来越可怕了。俄国人以新的方式来对柏林施加压力。他们除了以同东德缔结单方面的和约相威胁之外，还由于修建了柏林墙以及随之而发生的赤裸裸的暴行而造成了新的损害。这条横贯欧洲的精神鸿沟此种露骨的具体表现使西方世界的理想大受影响，而且使它在良心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此同时，与日俱增的核武器所引起的乌云似乎是接连不断的。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对于至少使不断增加大气污染的一系列核爆炸暂时停下来可能性继续进行着商讨。不过这些冗长而旷日持久的会议却证明是毫无结果的。苏联政府一如约罗克斯先生那样，采取“除了理论之外，尽量少谈实际”的办法来应付这些永无休止的裁军讨论会。

同时，俄国人已于1961年秋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特别“肮脏”的核试验。我在美国总统的完全赞同下，却能够向下院保证：英美两国都不会单纯为了报复的目的去进行一系列新的核试验。我们两国政府唯一的方针是维持核威慑力量的平衡。

对于怎样在策略上最好地来回答俄国的政治攻势，盟国内部意见不一，或者至少是各有不同的着重点，这一情况也许就是我们立场中最大的弱点。最初，美国人似乎是赞同法国所采取的（同时在戴高乐的压力下，也为德国所同意的）方针，即我们应当毅然对付俄国人，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至于美国恢复大规模核试验这一点，法国则对之显得特别冷淡。可是在这一年 143 结束之前，美国人却转而采取了英国对柏林问题所持的态度了。我

们相信以实力为后盾；不过我们也认为我们的政策应具有灵活性。我们至少也应该去探索一下进一步的而且也许是有成果的谈判的可能性。1961年就是在大家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心情中告一段落了。肯尼迪和我都明白，此刻我们两人必须赶紧举行一次会商。

在我于12月19日前往百慕大之前，已经产生了两个新情况：12月13日，美苏两国于长时期的商谈后，同意发起并参加一个“十八国委员会”，以便恢复包括常规以及非常规武器在内的裁军谈判。在这个奇异的外交战中，不管大家对这种大型谈判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会怎样感到怀疑，把这种会议开下去似乎还是有利于和平事业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欢喜的国际谈判的方法；即使我们有时会以鄙夷的态度阅览着以前几世纪中外交上的繁文褥节，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也遵循着一些极其类似的也并不是那么文雅的方式。当然我明白，假如我们是存心去达成某种协议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再度去使用在1960年5月所举行的命运攸关的最高级会议上已经惨遭失败了的一些办法。不过目前所提出的这一种国际竞技表演，只会使局势有所缓和，而不至造成害处。

同日（12月13日），赫鲁晓夫向我发出了一份冗长的定期通报，内容是关于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问题。他并未改变他的主要论点：必须和两个德国都签订和约，各国占领军必须撤出柏林。但是，假如西方国家坚持要在西柏林继续驻军的话，那末也必须让俄国派分遣队参加驻防。他当然没有提出对东柏林也要如法炮制。假如西方不同意让俄国部队分担守卫西柏林的任务，那末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联合国部队来接替目前所有各国的驻军；而  
144 为了西柏林的繁荣昌盛，最好希望把一切国家的军队都撤走。他总是用一套甜言蜜语为陪衬，使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的实质显得不那末严酷。我只能把这篇通知的副本连同我对赫鲁晓夫发出的简短收文回件送交肯尼迪、阿登纳和戴高乐，供他们参考。我坦

率地告诉他说，虽然我不能同意他来信中的许多内容，但我希望，在同美国总统会商后，就“可能去恢复进行……葛罗米柯先生最近为了探索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谈判的基础而访问美英两国时所开始着手的一些努力”。

在此同时，核禁试会议（当时正在日内瓦隆重举行多种外交四人舞，这是其中的又一次）暂时休会了——是否由于圣诞节休假还是由于无法取得进展，原因秘而不宣。

12月19日是一个工作繁忙的日子。

开了长时间的内阁会议——内容涉及外交事务、刚果问题、肯尼亚问题等等。讨论得很热烈，可是在到处都看不出有一丝希望。<sup>①</sup>

我在日记上继续写道：

只有三项议会质询。下院似乎十分焦灼不安。在四点半到七点半举行了国防委员会会议。接着和财政大臣就铁路工人工资问题谈到八点半。这些人的确是应该增加一点工资的。可是我们又怎样才能使一条小川不至于泛滥成灾呢？<sup>②</sup>

我们一行于午夜离开伦敦机场。

坐的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不列颠号飞机。主要随行者有：外交大臣、诺曼·布鲁克爵士、威廉·彭尼爵士、伊夫林·沙克布勒爵士以及菲利普·德朱鲁塔——还有（霍姆勋爵的政务次官）塞缪尔以及（外交部新闻司的）罗素。（我的医生）约翰·里查森爵士也一起来了。<sup>③</sup>

我们于次日（12月20日）当地时间六时到达。到达时我们听说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中风，总统能否前来殊无把握。 145

我们到达百慕大并且在（非常舒适的）总督府住下后，我就向总统发出了一份电报：提议改在棕榈海滩或是华盛顿开会——或者采取任何其他便利于他的地点。当天稍晚我们接到来电说：老肯尼迪先生病情稍有好转，总统希望照原来计划进行——即于明天（12月21日）前来百慕

①②③ 1961年12月19日。

大。<sup>①</sup>

凡是知道那美丽的百慕大岛的人都会理解：一个人从英国冬天的阴郁环境跑到这个风光明媚的大西洋殖民地来换换空气，是多么令人陶情怡性呀。据说，首批到百慕大落户的人们实际不过是前往美洲而路经这里的；不过既然误以为是到达目的地而靠岸了，他们就明智地决定将错就错心满意足地呆下来了。有人甚至说：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就是以伊丽莎白时代的这些开拓者的历险经过为背景的。我们在那里受到了当地总督陆军少将（我当掷弹兵时的老战友）朱利安·盖斯科因爵士的款待，总之，没有什么再比我们在那里所度过的那几天更舒服的了。当美国总统到达时，总督盛装尽礼恰如其分地接待了他。起先肯尼迪对于总督的有点古老的戎装、三角帽、帽羽、佩剑以及金质马刺感到相当可笑，不过他不久就开始理解我们的东道主的真正品质了。

我们进行了两天的几乎无间断的会谈。关于我们所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总统似乎决心要同苏联谈判，并去探索解决柏林问题的办法。他是以改变宗教信仰者的热情去坚持他最近所采取的这个立场的。他

146 曾经同赫鲁晓夫有过一些秘密通信。他把这些信件给我和霍姆勋爵看了。除了（国务卿）腊斯克和麦克乔治·邦迪之外，谁也没有看到过这封信。我也将我在前几天从赫鲁晓夫那里收到的那封长函以及我准备用以作答的回信给他看了。我感到这位总统对阿登纳开始感到不耐烦，而且的确对戴高乐很恼火了。虽然他在表面上以及在公开场合中把话说得很硬，其实他并不准备为柏林去冒战争的风险。<sup>②</sup>

为了解决是否要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问题，美国人派了一个庞大而出色的专家小组。他们拿出了一大套文件，我对其内容的绝大

---

① 1961年12月20日。

② 1961年12月23日。



部分是一窍不通的。可是威廉·彭尼爵士却比所有这些人高明一点。总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超群的人物，这位鲁瑟福德勋爵的当之无愧的接班人。他的幽默、他的有分寸的头脑，以及他的高深的学问，都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不得不一致认为

俄国在最近几次所搞的核试验是相当可怕的。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努力研究一种“反导弹的”导弹。他们建立了一座拥有二万名工作人员的科学城，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且，一亿吨级的核弹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噱头。……如果掉下来的话，会使半个法国或者英国化为焦土。到那时我们将怎么办？<sup>①</sup>

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个强烈的呼吁：

尽管俄国人诡计多端，不讲信用，我们应当再作一次努力，使大家不再干这类蠢事。针对俄国从事发展反导弹的这个情况，我们同意暂且先为恢复核试验（也许在圣诞岛进行）作一些准备。但是我们将暂不动手——先要看一下，在今后几个月中，在柏林以及裁军问题上究竟能否取得一些进展。<sup>②</sup>

关于刚果问题，

美国人是支持阿杜拉的，但是他们也认识到联合国军政领导方面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为争取刚果的所有非共产党的非洲人的真正和解而努力，而且要防止再度发生战斗。<sup>③</sup>

最后，我们讨论了共同市场以及开放世界贸易的问题。由于 147  
这时我身边没有财政顾问在妨碍我，我就试图阐明一下我自己关于改革货币的一些想法。肯尼迪同情我的看法，不过我明白，他也会受到过去破坏全盘接受梅纳德·凯恩斯的政策的那些人的徒子徒孙的阻挠。我提这个意见是过早十年了。

这次我们总算能够发表了一项受报界欢迎的公报，因为它一

---

①②③ 1961年12月23日。

反常规，的确透露了一些具体的内容。<sup>①</sup>除了这些问题之外，

我们也谈及联合国的前途；谈到果阿和印尼；谈到古巴；谈到中国。对于后者，总统实际上承认美国在过去和现在的政策都是荒谬的。可是他不能太快地在过多的问题上进行改革。<sup>②</sup>

我回国后尚能直接回到苏塞克斯老家去，在大批信件和电报堆里、在频繁的电话声中以及在好几箱文件中，欢度了所谓圣诞假期。百慕大会议的一个令人愉快之处是：我感到肯尼迪和我的交谊更深了。我记下了这样一个印象：

肯尼迪总统对具体问题（例如，刚果、西伊里安、加纳）“采取行动”时的作风和他对更大的问题（核战争、东西方的斗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等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前一情况中，他是一个办事非常迅速而有效的实行家——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不是其贬义“政客”）。在更大的问题上，他却似乎茫然不知所措。<sup>③</sup>

一如惯常，我除了向阿登纳和戴高乐发出信件之外，也向英联邦各国领导人发出了会议详情的记述。在我于12月24日写给女王的信中，我略为详细地叙述了我们两人就柏林、刚果以及拟在圣诞岛举行核试验等问题的讨论经过后，还写道：

148 我想陛下可能乐于了解一下这位总统在和我的这一次、也就是第四次会晤中的一些情况。他的父亲突然病发自然使他受到打击，因为肯尼迪一家人都是十分孝顺的。总统的父亲对他有很深的恩情，他对他的父亲显然也有着极深的感情，而且，看到本来好端端的一个人两天后突然病倒、从此不能行动的情况，的确会使人震惊。我当时也感到总统自己的身体也并不好。他由于背部有病而坐立不安。他不能以同一姿势久坐。我注意到他吃力地弯下腰去拾起一张落到地板上的纸张时的情况。我们为他提供了一只摇椅，这会使他舒服一点。如此年青的人竟是这样多病，这的确是很令人难过的事。不过他很勇敢，除了例如不愿意作不

① 《附录》三。

②③ 1961年12月23日。

间断的长时间的会谈之外从不示弱。他也是很动感情的人，容易讨好也容易动气。他喜欢接受礼物——我送给他一件礼物，我的侄女迪博·德文希尔也送了一份。他喜欢人家写信给他。他喜欢受人注意。他显然是政治领域里的一个麻利而有效的实行家，这一点足以和上述各点相匹配。我感到他对于近期的问题要比对重大的长远的问题更感兴趣——不过从他目前的经验看来，这也许是很自然的。他是一位极其讨人喜欢的客人，他以朴素而庄端的举止显示他的重要身份。

总统好几次对我谈及陛下，并以真正关心和亲热的态度问到您的近况。他说了不少关于加纳以及陛下在那里的遭遇情况。他感到自己应当作出最大的贡献以和陛下媲美，这样才能够得上豪侠的气概。夫人，我敢冒昧地说，我想如果您偶尔给他写一封内容不拘的信，部分涉及国际事务，部分涉及政治，再有更多的一部分涉及个人感到兴趣的事，他将会对此十分欢迎。我认为，他很喜欢和别人通信。

我也在12月22日发出了我对赫鲁晓夫上次来信的详细回信，我在收到这封信时仅仅写过了简短的回条。我首先对他主动写信给我表示欢迎，接着我感到有必要去驳斥他对西德的指责。

您来信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您的这一声明：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去消除同德国发生战争或者消除由于德国而引起战争的可能性。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国的每一个男女国民都会赞同这一目的。我也可以声明，英国人民会充分认识到苏联对确保其本身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的关注情况。我当然不会同意您关于复仇和侵略思想已经在联邦共和国复活的想法。我认为这些指责很不符合事实，我还由于您坚持这些指责而感到极为遗憾。我认为我可以说，在我们北大西洋同盟各盟国之间所维持的在防务上的密切而经常的联系中，有一切证据可以说明，联邦政府是致力于以国际联军为基础的联防政策的，而且北约体制为防止一个国家的独立冒险行动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欧洲大陆上的军队是受国际联合国司令部指挥的，而且只有大家一致作出决定时才能加以使用。这就意味着：盟军的一切行动尤其是要得到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同意的。我可以有把握地代表联合王国声明：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盟国把盟军使用

于同我们以防御为宗旨的目的不相符的任务,此外,您也明白,我们在核武器的使用方面,还有另外的安全措施,即所有这些武器都是由美国来控制的。

我继续说,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在于同波茨坦协定所设想的一个通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表全德国的政府签订和约。不过,我充分认识在目前这一点是苏联所无法接受的。在这同时,我们必须去找寻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包含着这样一个内容,即双方应相互尊重对方所认为重要的事情。

150 我满意地注意到您的下列声明:您认为在苏联去缔结任何一项和约之前,有可能同西方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我想我们也应该照这个办。正如您正确地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威信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正如我们不想去破坏我们所不赞成的东欧既有的秩序那样,您也应该尊重西方各国现有的立场。这就是说,一直到我们能够就永久解决德国问题办法达成协议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去破坏对方的重要安排和政策。应该有可能制订出防止侵略和突然袭击的相互保证和集体保证的办法,以便使大家可以和平相处,并为真正地改善我们的关系打开一条途径。对我们说来,这就必须包括苏联尊重西方的立场,以及尊重西方对西柏林的责任这一点。

接着我谈到赫鲁晓夫关于设立西柏林自由市的建议。这个计划似乎有很大的片面性。把东柏林完全并入了东德,而却要把西柏林和西方的合法联系切断,并且还要取消西方盟国对西柏林的权利。

任何涉及象您所说的那样一个自由市的计划,都应当适用于整个柏林。象柏林那样重要的整个城市,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可以差强人意地被建成一个“中立化的自由市”。可是现在就只有这么半个城市,其周围地区全被另一个势力所控制,既不允许它维持同其天然盟友的合法联系,又不允许它依靠这些朋友来自卫,您的这个办法就不可能行得通。我



请您认真地研究这一点，这样您就会理解我在这个建议中所看到的一些缺陷。

那末应该怎么办呢？当然合理的办法就在于双方承认既有的事实，并且尊重彼此的权利和威望。这样就可以商讨出一个妥协办法。

在这里的主要争执点是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的问题。我们愿意来商讨可能改善现有安排的一些办法；而且我使用“改善”这个字时，并不单单意味着使自己方便而却为你们添麻烦。我们不想要苏联军队去起着交通警的作用，我们也明白交通安排是同在交通线所经地区行使职权的当局直接有关连的。我们所关心的是要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执行自由通往这座城市的一些办法，而且我们也要作出相应的保证。当然应该有可能制订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手续，以便顺利执行上述办法。关于这一点，我想再添一句话：假如我们要使柏林本身的局势稳定下来，并且去避免在边界上天天发生的危险事件，就一定要去想办法使这个城市的两个部分之间恢复合理的自由通行。一旦负有责任的各国表达出了它们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愿望，这件事情就很容易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就地获得解决。 151

如果我们能就这些事情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我们就可以扩大我们商谈的范围，而且能够创造更有希望的前景。现在事经十年了，似乎有可能根据我在这里所粗陈的一些原则来达成一个协议。

我当然把我的复信的副本送给了阿登纳、戴高乐以及肯尼迪。这位将军仍然反对根据策略上的理由来进行谈判，不过他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也没有显出什么恶意来。对于伦敦和华盛顿所进行的有点外行的外交努力，他和他的主要同僚们采取了一种世界上最老练的外交家所持的那种和悦而又有些高傲的藐视态度。这种冷淡的姿态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因为从长远说来，英美两国都不会对欧洲的防务撒手不管。

圣诞过后，我有好几天由于患严重感冒而卧床不起，但是

我在病榻上再三考虑，并于昨晚想出了一个新计划，以便谋求普遍缓和西方及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计划中，所有的从其本身看来似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被纳入一个新的总解决办法中去——再回到1960年5月谈判破裂前的最高级会议的概念中去。

今天，我同威廉·彭尼爵士(为了核实核武器部分的内容)、蒂姆·布莱和弗雷迪·毕晓普一起起草文件——约有二十大页之多。接着(午饭后)再同诺曼·布鲁克爵士、弗雷德里克·霍耶·米勒爵士以及哈罗德·卡奇亚爵士(他每逢星期一接替弗雷德里克·霍耶·米勒爵士的工作)一起起草文件。他们并没有象我所预料那样地震惊，这使我感到惊讶。如果我能够及时将它修改好的话，这份草稿将于明天送往在苏格兰的外交大臣。<sup>①</sup>

152 我的文件经外交大臣同意后，于1月3日由内阁全体会议加以讨论。

大臣们当然已经接到了关于百慕大会议的详细报告。虽然其内容涉及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不过我们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还是集中于东西方的问题上。关于柏林问题，由于总统现在已经亲自致力于美国人本来反对的和谈政策而使大家普遍感到松了一口气。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只要能够继续进行着某种谈判，即使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急性子，也不会使苏联政府去采取阻止西方进入柏林的任何行动。他们可能会提出要挟，甚至也可能同东德政府达成一个协议；不过似乎不大可能采取引起西方立即作出具体反应的那种妨碍西方交通的军事行动。

不过，关于使用圣诞岛以进行一系列新的核试验这一点，却是需要内阁马上去作出决定的唯一事项。我的同僚们明白，我已经在上次俄国进行了核试验后告诉议会说，西方盟国决不会单单为了面子或忿怒而去作新的核试验。我们只是由于充足的军事上的理由才这样做。美国人认为有必要为两个重要目的而去进行

<sup>①</sup> 1961年12月28日。

新的核试验，我们很难反对他们的意见。第一，为了维持核威慑力量的平衡，我们就必须对下面这一点做到心中有数：即，我们是能够同俄国的新型超级核弹的巨大威力和波及范围广大的破坏力相匹敌的。第二，为了发展一种包括反导弹导弹的新型防御体系，也同样需要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内阁会议占用了整个上午以及下午的大部分时间。

午餐后，威廉·彭尼爵士参加了内阁会议。他——用了一刻钟时间——就这个问题向他们作了一个简单而出色的说明。<sup>①</sup>

我们的会议的经过情况和讨论内容都很好，大家一致同意了我将 153  
向美国总统所作的答复的内容。

会后，我必须着手根据已经提出的意见去修改我的信。这将稍为花一点时间。

内阁同意采取必要措施，以使圣诞岛上的设备于两国政府决定恢复核试验时即可使用。但是他们也希望能提出新的裁军倡议，并对此广为宣传。我的同僚们尤其希望：我们将使用圣诞岛以作进一步的核试验一举能和新的裁军倡议同时宣布。于是，我于1月5日把内阁的决定通知驻美大使大卫·奥姆斯比·戈尔时写道：

虽然我并不希望把总统同意提出裁军建议作为我们在圣诞岛向美国提供核试验设施的条件，我的确很希望总统会照我的建议去办；假使他不这样做的话，我非经再度同我的同僚商量就无法同意提供圣诞岛的设施。我还得去考虑我们可以采取的（或许以单独倡议的形式出现的）其他裁军措施。

我经过深思熟虑的致美国总统的信是以外通信件的形式送去的。我知道他正受到五角大楼和原子能科学家们要求立即恢复核试验的巨大压力。我也明白我们不适当地“拖着步子走路”或者断然拒绝提供美国进行试验所必需的设备所可能引起的严重不利后

<sup>①</sup> 1962年1月3日。

果。同时，我明白肯尼迪是极为希望推迟恢复核试验日期的，他把恢复核试验看作是承认自己在外交上已经失败的自白。他也和我一样地渴望能朝和平方面取得一个突破。因此我的目的便是向他提供必要的弹药，并催促他去为处理整个问题而作出新的努力。

154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

当我们在百慕大会晤的时候，我答应尽快同我的同僚们来考虑您所提出的、要我们和你们一起在圣诞岛为进一步的大气层核试验作准备的要求。

我已经同内阁就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了。我们认为，就我们目前所能作出的判断看来，这次提出的核试验计划似乎还是属于您和我在去年秋天对可以允许的核试验所下的定义范围之内的。在这个情况下，不论我们是否同你们一起在圣诞岛作试验准备，我们认为应该义不容辞地去支持您为执行这一计划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因此我和我的同僚们一致认为应该向您提供您所需要的圣诞岛上的设备，当然这还有待于签订一项关于科学技术合作以及经费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协定。我们希望向你们提供联合王国的某些技术和经验以作为我们对科学合作的贡献，例如，我们认为我们在观察核武器试验方面的技术和经验是会有一些价值的。

我们是根据两个假定来作出这一决定的。第一，根据和你们一起工作的我国科学家们所提供的一些意见，我们可以相信，拟议中的核试验计划的确是属于我们关于合理的核试验定义范围之内的。根据自己当时在百慕大听到的情况，事实上，我并不估计在这里会遇上什么困难。第二，我们希望在真正决定在圣诞岛开始实行核试验之前举行详尽的商讨，我想您一定也会同意这一点的。鉴于我将在下文阐明的关于在政治上采取主动的一些倡议，这一点是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的。我们认为，在宣布使用圣诞岛的核试验设备之时，最好坚决地声明，我们两国已经作出了联合决定，认为在军事上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核试验，而不是仅仅地



说：我们已经同意为核试验作准备，同时也可能决定暂不进行试验。不过同时，您将会在本信的最后部分看到，我们认为，在发表这样一项公告之际，还应该提出一项坚决的新裁军倡议，而且这项公告还要指出，恢复核试验的时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苏联对我们的建议的反应。根据您在百慕大所说的话，我相信，您自己在作出恢复核试验的最后决定 155 之前，会考虑到总的国际局势，所以我希望您会赞同这个总方针。

## 二

内阁在讨论时也考虑到了俄国人在最近几次试验中所可能获得的反导弹技术方面的进展，以及我们一旦由于没有作出同样的努力而有任人摆布的危险。当然，正当我们开始在这个领域进行工作之际，我们还得去考虑这一点：一亿吨级的核弹似乎不但符合于赫鲁晓夫好大喜功的天性，而且在军事上还具有极大的潜在重要性。再者，甚至当我们还不十分明瞭我们的防御体系是否能够应付那些必须比这种核弹更远为接近于目标而爆炸的导弹的时候，这就为我们的防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不存在着这种复杂情况，还是无人知道双方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反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上述这些只不过是初步的难点而已。您记得，我们的科学顾问们说过，假如这不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的话，他们就会说这是办不到的。不过由于这个重大的利害关系，只要提供充分的财力，他们就不能肯定地把任何一桩事情说成是办不到的了。可是，我们如果就照我们所设想的去做的话，我们就会在这场无穷期的斗争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承担其一切后果。当人们再想到所需要耗费的巨额金钱之时，对于一个冷静地考虑这个问题的普通人说来，人类就似乎真的走上了一条几乎难以相信的既充满幻想又是倒退的，既是登峰造极又是野蛮的道路——而费用金额只不过是说明所耗费的巨大的人力及物力的一种便利的方法而已。总统先生，我竟会在圣诞节考虑以怎样的措词以及以什么理由来向我的同僚们建议把圣诞岛用于这个目的，这一点的确似乎是一桩不可思议的有讽刺意味的事。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三点担心的事。假如作了这些核试验——规模 156

不大，也不会严重污染大气层，这样看来就不至于加剧已经造成的害处——俄国人就一定不但会继续去准备而且去执行他们的下一步的核试验。我们以后也将会被迫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样，这种竞赛大概是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双方彼此都想胜过对方。不过费用如此巨大，国家财力上的负担如此沉重，我很担心到头来就会产生这类军备竞赛的几乎免不了的结局——当有一方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一时的优势，就会跃跃欲试。第二点需要考虑的是：从技术观点看来是否有真正理由来相信可以研究出有效的反导弹体系。对于我们这个小岛国说来，这种反导弹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即使只有八九颗象目前大小的导弹进入境内的话，那末我国就会荡然无存了。你们和俄国人则单纯由于国土辽阔所以情况稍有不同。不过，我可以设想，由于所有的反措施、假目标、电子设备等等，究竟是否能够建成一个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的防御体系，这一点殊可疑。第三，还有所有其余国家的态度。如果大国的核试验不断进行下去，就没有办法应付你们说的第几个国家的问题了。某些国家（也许是中国，最后是德国，而且当然还有法国）会发展强大的核武器体系。其余的国家会发展一些干扰体系——这些体系将会形成巨大的干扰。如果世界上的所有这些破坏能力都分散到各种不同的人物——独裁者、反动派、革命派、狂人——的手中去的的话，那末我确信迟早于本世纪末，某些人肯定会由于错误或者愚蠢或者发疯，而犯下滔天大罪。

总统先生，我感到这些就是您我两人应该稍为多加考虑的想法。当我们在百慕大作短时间的会晤时，我冒昧向您提出了上述的某些意见，而且由于您对这些意见背后的动机不谋而合，所以我敢于把这份更进一步的分析送给您看。

### 三

我们在百慕大所讨论的内容涉及面很广。除了公报所提出的那些内容之外——柏林问题、核试验问题、刚果问题、欧洲共同市场问题——我们还谈到一些几乎同样重要的其他各点。这包括老挝和越南问题，以及远东的总局势；中东的混乱而且总是难以捉摸的局面；由于“殖民主

义”存在过久或者由于过快放弃了“殖民主义”而产生的几乎同样危险的非洲局势；诸如加纳那样的新兴国家的前途；联合国就其目前的形式并在其目前的影响之下，其本身的发展趋势。

有这么一条贯穿着所有这些问题的共通的线索。所有这些问题都以不同方式反映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左右着世界局势的大分裂。在每一点和每一问题上都存在着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双方都力图去遏制对方，并且去争取所谓不结盟国家的支持。

我越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就越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圆满地单独得到解决。不过在另一方面，如果使人类受苦的根本疾病能够真正地有所好转的话，个别问题就能够很快地获得解决。近年来，已经进行了两次旨在打破这个僵局的尝试，似乎也一度显示出一丝成功的希望。第一次是在日内瓦举行的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第二次是包括铁幕两边的政治家们的相互访问在内的一系列努力，这些努力导致了1960年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这两个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了。回顾起来，我认为应该说，这两次失败主要都应归咎于苏联政府，但是盟国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例如，我个人相信，本来是可以在禁止限额以上的核试验的基础上，在日内瓦达成协议的。这就会使我们至少得到在某一个领域中采用一种初级的检查和监督体系的巨大好处，而这个领域的性质恰恰就能使俄国人关于我方进行间谍活动的怀疑和指责更加站不住脚。

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同样也是经过长期而且周密地准备好的 158  
顺次发生的事件的高潮，所有这些事情都似乎带来一些真正缓和的希望。可是它不但失败了，并且是在纷乱而且难以置信的方式下破裂了，而在这里，我们也得负一些责任。当时似乎没有谁理解到赫鲁晓夫先生对U<sub>2</sub>飞机事件的过于重视的态度。不过我现在却认为，日内瓦会议和巴黎会议之间，的确存在着比我们在当时所认识到的更为密切的关系。赫鲁晓夫先生由于发现我们如何熟知他们所倚重的大型火箭的位置而可能真的大吃一惊。这就可能会连带影响到他们在日内瓦的态度，再加上美国在核潜艇和北极星导弹上的显著成就，这很可能使俄国决定去进



行他们最近的试验,当然他们本来已经对此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了。

总而言之,不论原因何在,仅有的两个有希望的巨大外交尝试终于惨遭失败了。不过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还是得到了这么一点安慰。赫鲁晓夫先生原来早已在1958年11月27日就宣布决定同东德签订一项和约。当我于1959年2月访问莫斯科时,他推迟了这个威胁;虽然他于巴黎谈判破裂后,又重新把它提出来,可是他甚至到今年年底还没有将其付诸实施以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温和态度。我知道有人说:这与其说是由于他想对西方盟国以及整个世界表现出讲道理的态度,不如说是由于他不愿意把这些有危险性的决定交给乌布利希和他的朋友们去执行。不管怎样,我们总算获得了喘息的余地;我也明白,您是要不顾西方盟国内部所存在的阻力而去充分利用这一点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困难在于决定该怎么办。我心中原来酝酿的多少带有阴郁的想法,除非起码是用来促成某些建议,以便使我们从所处的迷雾中找出“一条出路”来,否则便是毫无价值的,也可能是不存在什么出路的。我们也可能象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们那样地逃不出定数;并且也要象他们一样地去忍受这种命运,只能以当前名列前茅的专栏作家们的带有训诫性的而有时又是令人恼火的评论作为安慰。在另一方面,甚至那些不同意这种悲观看法的人们也可能感到,较明智的做法是避免作出使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任何尝试,并且去期待“某种变化”,从而设法使一个生死攸关的危机至少能延缓一个时期。我一生之中总是遇到如何最妥善地处理这类问题的两种意见。我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类争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这些争论自然是极其普遍的;而且至今还有很多人对此辩论不休。有一种论点说,我们应该耐心地继续努力把损及人类国家面貌的肉瘤切除掉,并且希望通过这个方法,把不论是局部的或者是普遍的主要危险逐一消除掉,终于使有效的全面解决办法在政治上成为切实可行的。另一种观点是:有时不如作出更为大胆的抉择,而且对更富于野心的行动投下更大的赌注,在历史上是不乏这种时机的。最近在希望缩小柏林问题讨论范围者们和希望扩大这个问题讨论范围者们之间进行了类似的争论。阿登纳总理和他的朋友们经过



一番踌躇后，似乎变得赞成缩小谈判范围的这种主张了，这样就单只要去处理进入西柏林的通路以及为了实际需要而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以起码的承认的问题，从而就避开诸如奥得—尼斯分界线或是德国的最终的前途的这类更为重大的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戴高乐将军却似乎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涉及面广大的普遍缓和的话，任何一项关于柏林问题的有限的协议都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不应该让所有这些枝节的争论把一个基本事实掩盖起来，即世界上的均势和持续和平，是由以美国和联合王国为一方的核威慑力量，以及苏联为另一方的核威慑力量来维持的。试图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保持中立的不承担义务的国家的前途，事实上要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这就使我们两国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并且我从我们在百慕大的会谈中也获悉，您也和我同样强烈地感到去探索某种打破东西方僵局的办法的无与伦比的必要性。在一方面存在着柏林问题，我们正试图就此点找出一个相互谅解的基础。在另一方面，则存在着核竞赛的严酷的问题，160我们已经面临着核竞赛的新阶段，它很可能把双方都弄得民穷财尽。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关于柏林问题的试探的趋势如何，但我们至少已筹划了一个用以测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行动计划。我们将在以后几周或几个月中知道这方面的前景如何，它自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俄国关系问题的整个方针。但是在这同时，我认为，我们应该作出极大努力以便在裁军以及核禁试的领域内取得进展，在这方面，我们目前还不曾搞出一套有效的行动计划来。我的想法是：我们两国可以就一个政策的纲要达成协议，这个政策旨在为裁军谈判提供新的推动力并去打开目前的僵局。我恭敬地提出了下述的办法并且请您仔细而同情地加以考虑。

#### 四

我们和俄国人已经同意从3月中旬开始召开一次十八国裁军会议。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来制订计划。毫无疑问，这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相当臃肿而复杂的组织，除非受到主要的核大国的推动和领导，否则不大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我的想法是：您我两人作为西方带头者，应当采取

主动，并且请赫鲁晓夫先生在这个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配合我们想出最好的办法，以保证取得具体进展。例如，我们可以建议在裁军委员会召开之前去召开一个由科学和文职顾问们襄助下的三个核大国（也许可以请法国参加）的外长会议，去讨论大家同心协力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三国（或四国）会议之目的在于：

（1）把我们要充分监督裁军的愿望和苏联的间谍恐怖调和起来；

（2）试图去迅速地确定一下大家可以同意的永久禁止核试验的条件；

（3）讨论在达成有监督的裁军协议之前，为保证双方有更大的安全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161 （4）讨论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以执行由爱尔兰所提出的并经上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禁止核大国把核武器的控制权或者把制造核武器的知识交给没有核武器的国家。

我建议：在我们建议举行这次会议时，我们应该发表一项声明：说我们拟以裁军会议的圆满结束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要点之一，而且我们要亲自负责进行谈判，我们本人或者我们的外交部长将亲自参加裁军委员会的头几次会议。

假如您也认为以这些方针为基础的一个计划是可行的话，接下去的问题便是怎样把它向我们国内的舆论和俄国人提出来。就我对美国公众舆论能作的判断看来，在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核试验后，美国人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赞成恢复制试验。不过我也认为，如果拿不出什么办法制止目前世界的趋向的话，失望的情绪就会与日俱增。至于我国，虽然与贵国彼此在这方面的合作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而且我们是极为重视这种关系的，可是我国的人却不能一下子就理解决定恢复制试验并且还要英国为此而提供其领土的做法，除非在作出此决定之同时还公开表示，我们正在采取新的行动以影响目前的事态。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建议的梗概和决定提供圣诞岛的设备一事同时予以宣布。另一方面，如果要同俄国人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的话，我们决不可把这一件事单单公布一下就算了，而必须直接同赫鲁晓夫联系，

并且向他说明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一起配合来制止核军备竞赛。此外，切不可使他误认为，我们是要通过这类建议来设法回避柏林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决心要在这一问题上获得一些解决办法的。所以我建议，除了公开宣布我们的意图之外，我们应该私下向赫鲁晓夫发出一份详细得多的通知，催促他去配合我们作出真正努力，以便推动裁军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还要他在上述原则下，来参加核大国的外长会议。162  
私下去同赫鲁晓夫取得联系的目的是，表明我们是真正地关心怎样把人类从一个新的竞赛的威胁和财力消耗中拯救出来，这个竞赛的目的在于提供预防核攻击的安全设备。我们认为这种竞赛几乎肯定是没有什结果的，而且它会把整个世界的经济生活弄得一团糟。

自然有必要把我们的想法通知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博士，而且或许还有必要邀请法国一起参加对赫鲁晓夫作初步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假如能够在同赫鲁晓夫联系后不久就按照下述的方针来发表公开声明的话，我们就能够争取舆论。我们将这样说：

（甲）我们认为，鉴于目前的技术发展情况，西方国家有理由而且有必要为了单纯的军事理由而去进行一系列新的核试验。为此，美国及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在包括圣诞岛在内的各处，为这一系列核试验做好准备。

（乙）我们认识到西方进行了新的核试验后，苏联也会跟着作更多的核试验，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不应该因此而放弃我们目前的计划，不过假若不能制止核武器竞赛的话，我们对于自己的处境以及人类的前途是极为担心的。

（丙）因此我们决心尽一切力量使世界脱离这种险境，并且为此向俄国人提出了建议（我们可以发表建议的简短纲要）；我们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够使核大国完全停止核试验，以作为走向全面裁军的第一步。

如果您同意上述各点的话，我认为，首先是要设立一个机构，以便我们两国之间，就已经设想出来的计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问题，进行紧急磋商。这可能不仅包括核试验以及裁军计划的问题，而且也许还包括更好地保障欧洲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安全措施的问题。这些措施包

括预防突然袭击的办法(对大规模军事调动的通知,设立观察小组等等)以及(要是我们能够使法国人和德国人改变其怀疑的态度的话)在不限于某些特定国家的一些特定的地区中,对军备实行限制及检查。我希望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在他所需要的人的襄助下,为我方担任这项工作。以后我们应该设法使法国人以及或许其他盟国参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工作做准备。由于时间紧迫,我希望我们能够马上去进行这项工作。

我已经讲过,所有这些都要看柏林问题谈判的进展情况而定。如果这次试探不获成功,而且我们不得不在恶劣的气氛中去举行谈判的话,我们西方的处境将是困难的。不过,您已经在百慕大对我说过,我们不会就此不再试图和苏联达成协议,而且我现在所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办法会有助于我们去采取新的行动,即:就那时可能就德国发生的严重局势,去和俄国人进行谈判。在另一方面,假如关于柏林问题的试探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似乎有可能导致有关国家就这一问题召开一次外长会议的话,我们的另一个倡议仍然会使总的前景更有所改善。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两项谈判联系一起进行。我们也许可以设想在以后举行最高级会议,以便缔结解决这两大问题的一系列协定,这样就能为普遍改善东—西方关系铺平道路。

当然,无所作为或者并不专心致志于某一件事是够轻松的。不过,人们往往不是由于自己在一生之中有过什么作为,而却由于错过的机会而后悔。

1962年1月5日

我于1月8日及9日到波恩作了短时间的访问。这除了作为礼节上的往来之外其实是不必要的;可是阿登纳总理似乎很重视这些往来。他听到了我所作的关于我们同总统会谈经过的叙述后,似乎很希望柏林问题的谈判能够进行下去,只要这些谈判的进展不要过快而且不至于影响到他同戴高乐的关系。我于1月13日把这一情况通知肯尼迪时,还写道:



可是(阿登纳)对俄国人所持态度要比我一向所了解的为温和,他谈了不少关于变化中的苏联社会的性质,在此社会中产生的一个知识阶层或中产阶级证明会有助于达成缓和。他对于裁军新倡议的想法感到兴趣,你也知道,他一直是强调裁军的重要性的。 164

我认为值得把最后这一点提请肯尼迪注意,因为它同我的长函中所略述的总政策是一致的。很凑巧;大卫·戈尔和肯尼迪的交谊极深,他们总是坦率而亲切地进行商谈的。

1月14日,我接到美国总统的回信,其开头两段内容如次:

我们正在最急迫地考虑您1月5日的来信以及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对这封信所补充的意见。对于您所说的关于军备竞赛的危险以及象我们这样对这些事情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们有必要作出大胆行动这一切,我几乎都深为同意。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使核竞赛的螺旋曲线朝下降低,并且把人类从极为可怕的与日俱增的事态发展威胁中拯救出来。

不论您关于圣诞岛的最后决定如何,不论我关于美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决定如何,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是随时准备和您一起尽快去研究作出新的裁军努力的可能性。我们亟欲一起搞出一个倡议,假使它能成功的话,就可能成为往前跨进重要的一步的标志,而且至少还会显示出,我们正不断地力图用一切办法使军备竞赛告一段落。迪安·腊斯克正同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商量如何最好地去进行此事。我们对于您的建议中有关策略的某些方面是有意见的。不过我们对于这项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作的努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毫无异议的。

第一个困难就是拟议中的首脑会议。不出所料,总统果然对此有点持反对态度:不过他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有力的论点:即,假如俄国人突然主动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就会使我们受到打击。事实上,这正是他们在几个星期后所做的事。他也担心,只要把成功地达成普遍裁军或者缔结核禁试条约同在圣诞岛恢复核试验一举密切联系起来,就会引起俄国人一味拖延谈判时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哄骗我们”——以便为他们自己的一系列新的核试验作

165

准备,这样便能够比我们领先。

我同驻美大使相互通了电报之后,于1月18日把全部内容向我的同僚交了底,大使来电中曾向我警告说:有人正向总统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和我国签订关于圣诞岛的正式协定。我们于周密的讨论后终于商妥了答复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同意提供圣诞岛以作为核试验之用;他对于我所提出要结束一切核试验的新倡议表示赞同。”<sup>①</sup>

同时,在新年里“重新召开”的核禁试会议,在陷入完全僵局和相互指责的情况下散会了。

鉴于我同戴高乐的长期友好关系,我认为应该让他知道我们的立场。我告诉他说,我国愿意允许美国去使用圣诞岛,但是我们也决心去提出某项新倡议,以便为十八国裁军会议的召开作准备。他是否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的答复是别具风格的。他于2月6日的来信的首段内容如下:

您在1月28日所写来信使我很感兴趣,因为其中包含了关于核军备的这个大问题的信息和建议。而且我还由于您作为一个政治家兼基督徒、在悬于人类头上的核危机的面前所正确表现的情绪而受感动。

他接着谈到准备恢复核试验的决定以及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告诉你,苏联在最近进行了一系列的确具有挑衅性的核试验之后,我感到,在西方方面,人们会很自然地急于不让我们和苏联之间产生危险的差距或者让原有差距扩大开来。此外,我们法国人决心不管我们目前的力量多么有限,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继续进行我们自己的核试验。

可是一谈到裁军问题时,他却认为,只有在销毁一切现有的核弹及其运载工具的情况下裁军才会有效。

如果问题只涉及防止在将来进行任何新的核试验,而却允许已经积

---

<sup>①</sup> 1962年1月18日

累下来的巨量核武器存在下去的话，法国显然是不会赞成自己照此来办的——理由何在，你是明白的——可是它也并不反对三个核大国（英、美、苏）保证以后不再进行新的核爆炸，这些国家早已制成了自己的核武器而且要将其保存起来。至于期望十八国委员会能在这方面搞出一些公正而有效的办法，我却预感到这似乎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这个委员会所脱胎之处（即联合国大会）及其构成有着过于显著的蛊惑人心和不负责的性质，以至使人除了对之保持完全的缄默态度之外别无他法。

这个答复并没有使我过分感到失望，我也并未由于自己在发表公告之前去同他磋商而感到懊悔。

2月7日，我和美国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了联合呼吁，邀请他于我们在日内瓦开始进行新的谈判之时，和我们一起作出一个真正的持续的努力。在过去，这种谈判“老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

我们大家应当明白，我们决不能再对这些谈判采取消极的看法了。决不能任其自流而终归于失败。所以，我们建议：我们三个人要对我们的代表在即将召开的会谈中的活动亲自负责；我们还要在事前同意，不管这个会议历时多久，除非达成具体的结果，否则我们的代表们就不离开会议桌。

会议开始时以及在必要时，我们的外长都应当出席。如果外长们在会议开始前几天，先碰一下头以作初步的讨论，可能是有好处的。我们在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打算采取的工作制度，并于结 167  
尾提出了一个呼吁以及要赫鲁晓夫迅速表态的要求。

2月8日，我向下院发表了一项公告。我向下院提醒了

俄国军方领导人的未经证实的话，他们在去年秋天进行核试验时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摧毁在飞行中的弹道导弹的问题。

我接着说：

所以我不得不同意军方以及科学界赞成为恢复核试验作准备的主张，

(议员们,“真丢脸!”)而当肯尼迪总统请求利用圣诞岛的设备时,女王陛下政府就认为应该予以同意。从而,我们此刻正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以便签订一项协定,女王陛下政府将据此允许美国在一定期间,并且为了执行一项当然由我国参加的特定的核试验计划,而去使用圣诞岛的设备。此事将在伦敦和华盛顿立即发布公告。

我继续说:我和美国总统多么不愿意承认准备新的核试验的必要性,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必要性以及对于在无法制止核竞赛情况下的世界前途感到多么难过。

当我在百慕大时,我极力向美国总统指出了这一点。他十分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我回国同我的同僚们商量后,就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了一项具体的建议,要西方国家再作一次坚决的努力,以就裁军问题和苏联达成某种协议。我们早已同意参加将于3月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工作。我相信这将会为重新进行认真的商谈提供一个机会。

168 我高兴地指出,肯尼迪总统是很欢迎要对该委员会赋以特殊的动力并使其奏效的想法的。所以,我们两国政府已在今天通知了苏联政府,还邀请他们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派出外长去参加三国外长会议,并且也以外长一级的形式来召开日内瓦会议。我以个人名义向赫鲁晓夫先生写了一封信,呼吁他去赞同这个建议,肯尼迪总统也这样做了。

我当然也已经通过私人函件方式,将此事告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并向英联邦的其他国家发出类似的通知。

我在下院发表的声明……效果很好。这个“双管齐下的办法”使情况大为改观。如果我单只宣布同意提供圣诞岛以作为美国大气层核试验之用……而没有发表我和肯尼迪总统致赫鲁晓夫的联名信所提出的解决裁军问题新的紧急办法的话,那末这事就会更加棘手了。我在宣布我们自己在内华达州所进行的地下核试验时,侥幸地“免受责难”。而且在内阁如此担心的问题上——谁有否决权的问题——我也没有受到过紧的质询。大家接受了我强调英美密切磋商的观点。这事当然使盖



茨克尔更为不安,因为这就揭开了单边主义派和多边主义派之间的老疮疤。我认为,政府由于能处理难局而受到了信任。<sup>①</sup>

次日,赫鲁晓夫果然不出所料地提出了更为惊人的建议。他提议不经过任何准备或专家的讨论,就立即在日内瓦召开十八国“首脑”的“最高级”会议,他试图以此跑在我们前面。这当然是纯粹的宣传攻势,可是我们得小心应付,否则人家就会责难我们是“拖着步子走路”。我们的答复很高明,暂时应付一阵;不过我认为自己又得再设法去催促……美国总统往前走了。他是够朋友的,可是太小心翼翼了。<sup>②</sup>

我在2月14日致赫鲁晓夫的回信中,对于我们彼此想法一致并且都答应于必要时亲自参加任何一个阶段的裁军会议这一点表示满意。我同肯尼迪总统都已经说过,我们自己将密切配合这项工作。169

不过我感到,一俟主要问题明朗化了,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再举行最高级会议……将更可能是切实可行而有效果的。同时我认为,在开始阶段,外长级会议将是取得进展的最好的手段。

我们作为核大国政府,显然对会议的成败负有特别的责任。因此我和美国总统向您建议,让英、美、苏的外长于裁军会议召开之前去开一次会,以便商妥裁军会议的工作计划。我相信您会最认真地对这个建议加以考虑,我也相信这个建议将会被苏联政府所接受。

次日,肯尼迪总统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表示完全同意我的上述答复,并且说,他也要以同样的话来答复。在这同时,我们必须尽量对十八国施加压力,以使它们支持召开由外长参加的预备性会议的建议。我强烈地感到,虽则各国首脑可能是非得再去举行一次会议不可,不过我们却不能再让这一次会议也象1960年的那次令人惋惜的巴黎最高级会议那样地归于失败。

同时在柏林的局势并无好转。所谓外交上的“试探”,即腊斯克和葛罗米柯两人于1961年秋就开始举行的会谈,并未产生任何

---

①② 1962年2月16日。

结果,而且莫斯科也没有采取什么接连下去的行动。

俄国人正在这个城市内外“制造”事端;他们的飞机“突然朝”我们的飞机“俯冲”;威胁着要把它们打下来等等,这是很狡猾的做法。<sup>①</sup>

我和肯尼迪的确变得有必要去紧急地商讨我们在局势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可能采取的行动。

关于裁军问题,人们开始有赞成英美计划的,也有反对的。虽然我们对戴高乐发出了新的呼吁,他仍然保持冷淡态度。在他看来,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能为核裁军作出任何积极的贡献。十八国会议似乎只不过为双方提供一个宣传的机会而已。

赫鲁晓夫于2月23日作了答复。他的回信总是十分冗长的——达十六页之多。他坚持说,只有政府首脑才能够作出必要的决定——当然我们对这一点是从来没有异议的——不过他也主张,他们应当在谈判的重要阶段始终出席会议。

至于我本人,我毕生的处事原则是:哪里正在开展主要工作,哪里是成败的关键,就要置身其中。

随着他的滔滔雄辩,他把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我所以主张先举行由外长参加的预备性会议,是否由于我不希望这个谈判获得成功,而让外长们去承担失败的责任呢?不过他的回信中的关键部分是涉及监督的问题的。他把对于不论是核武器或是常规武器的任何形式的国际监督都看作是一种间谍活动,而且俄国人一直是持着这种态度的。就是这个关于提供一个有效的侦察系统的问题,使我们着实耗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自己相信,我们的科学家们用不着实地调查,也甚至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测出任何威力较大的地下核试验。不过美国人却老是不相信这一点。

在这一段时间,大家继续在打笔头官司。2月26日,我向赫

---

<sup>①</sup> 1962年2月16日。

鲁晓夫保证，一俟看来有可能达成协议，或者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是愿意到日内瓦来的。以我看来，只有耐心而仔细的工作才能揭示出可能取得的成就的大小。但是我也再次论述由外长举行的预备性会议的重要性。

2月28日，美国总统通知我说，他已经决定，美国必须在裁军会议召开之前宣布恢复核试验。这样做，要比等到会议开始后才宣布更为策略。在此同时，他还要宣布一个建议，如果苏联愿意签订一项附有1961年4月所提出的监督办法的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美国就不去进行核试验。否则将于4月15日恢复核试验。<sup>171</sup>我于3月1日对他说，虽则我也认为在军事上有必要去进行核试验，不过我也希望他会把警告的期限往后延长一点，以便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试图同俄国人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参酌了我的意见。他同意把他的声明推迟到明晚宣布。这就对我们方便得多了。他同意把这一决定通过（我们在五国委员会中的盟友）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以及北约组织。他本来竟然把这一点完全置诸脑后了，这使我猜想到，美国国务院大概没有怎样与闻此事。他同意把试验日期改为“近4月底”——这就为先同俄国人进行谈判提供了一些机会。内阁认为，事已至此，不得不予以同意。<sup>①</sup>

当我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在议会中披露美国总统的立场时，我收到了一个好消息，说赫鲁晓夫至少已在程序问题上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我一早接到外交大臣的电话，他告诉我说，赫鲁晓夫已经同意了英美两国所提关于日内瓦会议的程序，这包括特别为讨论核禁试问题而举行的由三国外长们参加的预备性会议。当我在下院宣布美国利用圣诞岛恢复核试验的决定时，这将对我很有帮助。我们花了整个上午去准备好的这份声明没有引起什么纠纷。盖茨克尔先生……对我们很帮忙。他

---

<sup>①</sup> 1962年3月1日。

甚至替我去驳斥了格里蒙德。没有什么补充质询。左翼分子以及他们的同路人们似乎由于听到赫鲁晓夫同意我们的建议而目瞪口呆。(因为这消息于二时半才公布,大多数议员都是初次才获悉此事的。)<sup>①</sup>

172 外交大臣向内阁详细地解释了我们拟向裁军会议提出的裁军方案。我对于美国态度开始趋于强硬的迹象感到有点吃惊。于是我于3月9日写信给美国总统,向他提出一项目前据认为是在科学上切实可行的简便监督办法——设立一些国内监视系统,并由一个国际性权威机构对之加以支援,这个国际机构既能够核实震动数据又能派出流动视察小组,去实地调查有违反协定嫌疑的情况。我想这个方案可以克服苏联不愿意在其境内设立监督哨(所谓“间谍活动”的论点)的困难。(可是在另一方面,正如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流动调查组的办法可能使他们更为不安。)虽然可以说俄国人是蓄意制造困难,不过我自己却感到,他们的极端敏感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许多高级科学家的不信任,再加上他们历来的仇外心理,是我们必须设法加以应付和克服的一些真正的情绪。

霍姆和腊斯克在日内瓦碰头后进行了详尽的商谈,并且象平常那样地融洽合作。不过腊斯克却告诉外交大臣说,美国科学家现在开始对国内的侦察系统是否有效这一点感到怀疑,纵使这个体系是象我们所提议那样地遍布于英联邦各国以及其他的友好国家中。而且苏联在最近所采取的加紧扰乱我们通往柏林的交通线的活动,也并不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事。3月14日,霍姆报告说,葛罗米柯断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国际视察办法。

接着我们提出一项新的建议,它当然是对俄国人是否有诚意的一个考验。我们问俄国人,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在国内建立侦察系统的办法的话,他们会不会允许我们对未曾判明

---

<sup>①</sup> 1962年3月5日。



的爆炸去进行任何形式的核查办法？虽然他们拒绝这样做这一点是令人失望的，但是这却大大加强了我们在道义上的地位。不过我感到在美国恢复核试验之前，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些更为明确的证据，以说明我们的诚意以及俄国人的推诿态度。我起先想建议召开一次由美国总统、赫鲁晓夫和我自己参加的会议。不过大卫·戈尔却警告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提出了其他各种计划，其中包括这样一个建议：由肯尼迪正式宣布，甚至只要赫鲁晓夫现在同意国际核查核爆炸的原则，美国就会推迟自己的核试验。

我一直得到我国的两位专家(索利·朱克曼爵士和威廉·彭尼爵士)的大力协助。我于3月12日的一次会议后写道：<sup>173</sup>

现在实际的争论点是，如果在俄国领土上不设立监督哨的话，国内侦察系统究竟是否能够测出在俄国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使俄国人的“间谍活动”的论点站不住脚。如果即使不在俄国建立常设的监督哨，而俄国人仍然拒绝由一个国际小组去作六七次、每次也许仅为期数天的视察活动的话，那末显然可见俄国人并不是要防止间谍活动，而是要保持欺骗别人的权利。<sup>①</sup>

可是我们一切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这十天，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好过的。日内瓦会议毫无进展。我同日内瓦和华盛顿之间每天电报往来频繁。还经常同美国总统通电话，我派了索利·朱克曼和威廉·彭尼二人到华盛顿去。

他们受到了热诚的接待，可是我感到，美国科学家们对于侦察核爆炸的可能性是有点怀疑的。

虽然他们是有所感受的，不幸，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国内仪器设备能有把握地测出在苏联境内的地下核爆炸。这是令人遗憾的事——而且更糟于此。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毋需在俄国设立监督哨，而只要求由国际小组偶尔去作实地视察，而且这些小组也可能是由中立国派出的

<sup>①</sup> 1962年3月12日。

话,我们就的确能够揭穿俄国人害怕间谍活动的假话。(总算)幸而葛罗米柯已在日内瓦一再声明:甚至连国际小组偶尔视察的活动也是不能接受的。这样他们完全违背了他们在日内瓦核禁试会议上所说的话,以及赫鲁晓夫和我一起于1959年在莫斯科所提出(或接受)的主张了。这样就似乎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美国于复活节后在圣诞岛去着手进行核试验了。(于昨晚回来的)外相今晨和我作了长谈。他仍然对美国人将推迟核试验这一点抱有希望。美国总统显然也和我一样地对整个局势感到闷闷不乐。但是他的确正处于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巨大压力之下。所有这些压力都是要他反其道而行之的。<sup>①</sup>

我于3月30日又作了一次努力。我建议由我,或者由美国总统,或者由我们两人一起要求赫鲁晓夫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否能够接受国际核查核爆炸的原则?肯尼迪于4月3日的答复中对我坦率地说:他认为向赫鲁晓夫直接呼吁是不会成功的。而且美国舆论会反对这样做,不过他认为,如果我独行其是的话,这是阻挡不了我的,而且他也不会感到什么不快;如果我宁愿采取他策的话,他将同意和我联名发表一份声明而不是一个呼吁,并将给我送来这项声明的全文。

我在这时正忙于处理许多关于国内政策的问题,以及在非洲发生的棘手而复杂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以可算不合理的顽固态度去追求一个的确有点是不可捉摸的东西。肯尼迪一直显得很有耐心,这部分是由于他完全理解我的政治地位,而且还由于他对我的理想和希望抱着同情的态度。他极力顶住自己所受到的压力,那怕赫鲁晓夫仅仅作出附和我们的主张的最起码的姿态,我相信肯尼迪一定就会去冒一切危险再接再厉干下去。不过我却不得不常常暗暗地自认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来了大量的电报以及由电传打字机所印出的函件;一星期来,华盛

---

<sup>①</sup> 1962年3月24日。

顿与伦敦之间电话来往不绝。我一直让内阁获悉经过情况。情况的确是很糟的。要是科学能够再往前进展一点,我们也许就能够向俄国提出一个可能为它所接受的建议,而且它只有在宁愿失去所有中立国的同情的情况下才能够加以拒绝。(我想)我国的科学家们可能认为,政治家们不妨去冒一下险。美国的某些科学家也有同样想法。我们用一个现在称之为“国际负号”作为密码代号。它的意思是:我们要绝对放弃在俄国领土上设置监听站以探测非法的地下核试验的想法。我们只要求由中立的科学家小组偶尔去调查一下无法解释的震动情况。不过单纯从宣传观点看来,由于俄国在日内瓦所持的僵硬态度,以及葛罗米柯和佐林两人一再拒绝任何形式的调查小组或者拒绝在俄国境内偶尔进行的几次视察活动,我们是理由充足的。我已经同意于星期二和肯尼迪总统联名发表一项声明。我自己也要写封信给赫鲁晓夫,要求他接受某种形式的国际核查核爆炸的原则。但是我感到郁郁不乐,因为假如西方能够十分明白地表示我们将放弃在苏联境内设立永久性监督哨的主张,我想俄国人是很可能接受国际小组偶尔去进行实地调查的办法的——1959年在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对此是和我意见一致的。当然他们当时在日内瓦是既同意建立常设监督哨又同意实地检查的办法的。 175

我由于下述的观点有许多人……支持而感到安慰:俄国人已为另一系列核试验作好准备了,一旦美国人开始进行核试验,俄国人就要跟着去进行规模更大更可怕的核试验!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糟了。不过也许这两位K<sup>①</sup>先生的处境可能都一样,都得去应付军方和政界的压力。<sup>②</sup>

我们于4月9日把我和肯尼迪总统的联合声明交给了苏联政府。它的最后一段内容如下:

我们继续希望苏联政府能重新考虑局势,并且表示乐于接受国际核查核爆炸的原则。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办的话,还是来得及去达成协议的。但是如果苏联不改变目前所持的态度的话,美国和联合王国政府就

---

①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名字的英文拼法的第一个字母都是K。——译者

② 1962年4月7日。

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即，他们为签订一项切实可行的核禁试条约所作的努力现在已不获成功，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去进行预定于本月下旬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

同时我还以私人名义向赫鲁晓夫发出了一封信并于次日告知议会。盖茨克尔通情达理而且很帮忙，不过他和格里蒙德却都上了赫鲁晓夫提出召开(十八国)最高级会议的当。这个会议拥有几乎象九头蛇那么多的脑袋。我在回答盖茨克尔时说：

176

如果问题是关于召开一个由三四个政府首脑参加的最高级会议的话——而不是有二十位、三十位或乃至四十位首脑参加的会议——对下面这一点我就希望能十分有把握地做到：即要在最可能取得成果并且在涉及面也许是相当广的时候召开这种会议。

正象我所担心的那样，

在日内瓦的中立国代表们正在抨击我国和美国。俄国人(相当巧妙地)再次提出了“暂停”核试验的建议。我想它们(中立国们)已经忘记了在过去三年中所发生的事。要不是俄国人去秋突然象晴空霹雳那样地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的话，这个暂停核试验的情况可能至今还继续存在着呢。①

赫鲁晓夫的答复于4月14日到达。他

以洋洋四千言来回答我简短而语气温和的信，其内容牵涉极广，还对我们以及美国人大肆攻击——而且在通篇中采取了一种好斗的调子。外交部认为他的确感到很窘。不过他已使在日内瓦的中立国代表们发生恐慌，他们正在威胁说，假使核试验再进行下去的话，他们就要“退出”裁军会议。去年秋天当俄国进行核试验时，他们态度却不是这么强硬。这又是一种“厚此薄彼”的做法了。②

不过中立国还是不死心：

---

① 1962年4月13日。

② 1962年4月14日。



关于核试验的大辩论继续进行着。我本来以为赫鲁晓夫先生写给我的信已经使大家没有什么可争论了。可是在日内瓦的“中立国代表们”却搞出了一个所谓折衷方案。《泰晤士报》在一篇虚伪的社论中对之大加吹捧。中立国的提案一点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俄国人不答应在俄国的神圣领土上进行任何视察活动。《泰晤士报》说这仅仅是“能够”和“应该”之间一词之差而已。然而这恰恰正是世上最大的差异。<sup>①</sup>

我在向下院发表的声明中说，现在肯定是要去进行核试验了，下院对此并无什么异议。于是在圣诞岛的一系列核试验从4月25日起开始进行了。我当然也向所有英联邦总理发出了应有的通知。

在以后的四天里，我不得不前往纽约和华盛顿，接着又到渥太华作短暂的访问。当然我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欧洲共同市场，不过我们商谈的内容也大量涉及对苏关系。肯尼迪总统显然真的急于在这一系列核试验结束后，设法制止新的试验。关于裁军问题，他作了一个后来证明是有些实质内容的预言。他感到，一旦双方都拥有足以进行“即将到临的相互大屠杀”的核武器时，大家就会终于十分认真地去着手进行裁军谈判；不过这将是几年后的事了。

在夏天，英国和美国科学家之间一直频频有电报和备忘录往来。作为二十世纪的诗人的科学家们似乎处于极端矛盾的情绪中。有一个阶段，我接到一封信说，美国总统现在认为，美国科学家们正在彻底修改他们关于如何判明地下核试验的想法。他们能够毫无困难地把核爆炸和自然震动的现象区别开来这一点，是很可能得到证实的。可是三个星期后，他们又否认了这项报道。还是需要某种其他的视察办法，而这仍然是最大的绊脚石。不过7月27日我却在这一大批不断来往的意见书中接到了一封信，其中包含了以后最终达成的条约的苗子。假如俄国人始终是疑神疑鬼地

<sup>①</sup> 1962年4月17日。

拒绝实行就地国际视察的办法的话，我们是否可以退而求其次——去订立一项禁止在大气层和 underwater 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就是我们在下一年取得成果之前一直要去争取实现的另一个办法。

在此同时，还不时继续就柏林问题进行“试探”，但却未取得什么效果。而且我们也从不同方面听到了关于俄国即将采取行动的惊人传说。甚至有人说，俄国人关于核试验的种种叫嚣，其实就是为着掩盖他们在德国的一项坚决行动而精心炮制的计划。不过在腊斯克和葛罗米柯之间所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商谈过程中，后者似乎从不急于要为会议定下什么期限。但是于8月5日当我们接到关于俄国人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核试验的消息时，我心中的某些疑窦终于解开了。这些试验肯定是在好几个月前就准备好了，即使对我们最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也无法坚持说，俄国人的这些试验是直接由于美国恢复核试验而引起的。

夏天是在一切莫测的气氛下度过的。关于柏林，

目前一般的看法是：8月份可望太平无事。以后（当赫鲁晓夫休假回来以后）可能会有些惊人之举。由“热爱和平的人民”（即俄国的卫星国）所召开的一个大会将正式同东德政府签订一项和约。也许他们会诱使某些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去参加这项和约——南斯拉夫、埃及等等。法兰克·罗伯茨爵士似乎认为这类做法大有可能（法兰克·罗伯茨是出色的我国驻莫斯科大使）。其他的人则感到东德经济状况很糟，乌布利希不至于敢冒被切断来自西德的一切必需品供应的危险。<sup>①</sup>

虽则我急于要及早采取某种行动，不过我们却万万不可以做出任何损及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于共同市场谈判的事情。这样，我们便在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中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建议，而东西双方的舌战则继续进行着。

当我于8月间到博尔顿艾比市作短时间的访问时，大卫·戈·

---

<sup>①</sup> 1962年8月5日。

尔也是来宾之一。他很生动地向我描绘了美国总统所处的困难情况。他

想做一番大事；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办。他无法在柏林、核试验等问题上取得什么进展。在经济战线上，他也同样地受制于国内政局以及美国人对于非正统的政策们的恐惧。<sup>①</sup>

8月底，我们同意向俄国人提出一项有选择的建议：要么就实行大气层核禁试、要么就实行全面而广泛的核禁试，允许进行一定次数的视察活动。赫鲁晓夫于9月5日作了一个有点模棱两可的答复；这样，随着秋天的到来，这场论战就象一条消失于沙漠之中而永远流不到海里去的大河一样，令人厌倦地进行下去。

虽然我一直全神贯注于国内问题和极端重要的关于我国加入 179 共同市场的问题——它引起了在布鲁塞尔的长期的而且显然是有点无效的谈判——而且还有着就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召开的英联邦总理会议的沉重负担，我还是本能地感到忧心忡忡，唯恐自己和肯尼迪总统受骗或者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之中去。在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时而咄咄逼人、时而和风细雨的手段的背后究竟是何动机？是不是在酝酿某种新阴谋？我们会不会一早醒来发现自己不仅面对着口头上的争吵，而还面对着可能到头来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的前奏的行动？

---

<sup>①</sup> 1962年8月21日。

## 第七章 战争边缘

我没有等多久；在树叶完全枯黄之前，在我的苏塞克斯老家的橡树和桦树都披上一身灿烂的秋装之前，我那预感到的可怕事情就以惊人方式出现了。一个星期天的晚上（10月21日）十时左右，当我还在伦敦的办公室里静悄悄地工作的时候，值班办事员交给我一份由肯尼迪总统发来的紧急电报，他通知我说，美苏之间正迅速地酝酿着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已于两天前，从英国驻美大使处接到了警告，美国总统已经以谨慎的措词对他透露过口风了。虽然大卫·戈尔没有提供详细情况，不过他感到，在白宫所产生的惊恐“也许”是“关于在古巴的导弹”。这样，这场危机注定是要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爆发——在加勒比海而不是在德国爆发了。

谈到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的确说来话长。这个岛国本来是由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的（以现代的话来说，也就是“解放出来的”），它于1902年独立。虽然有时也需要派美国军队到那里去恢复秩序，但是华盛顿还是一直对它维持着一项开明的政策。美国政府发展了、并且丰富了岛上的经济，美国人对制糖、炼油、运输以及水果种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既有助于当地经济，又使当地居民眼红。不幸在当地一直没有产生过一个令人满意的政体。每一个继任的政权都似乎比其前任更加无能而腐败。当卡斯特罗的革命游击军于1959年1月终于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统治时，古巴的激烈向左转就变成无可避免的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担心而且震惊，不过他还不相信，这就必定会接着产生一个纯粹的共产党政体。可是美国人产业遭到了没收；把收获的蔗糖卖给苏联；



和波兰签订了贸易协定——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古巴的政治和经济趋向中危险的而且推脱不了的铁证。1960年5月，美国终止了它对古巴的“援助”。7月，壳牌石油公司在哈瓦那的炼油厂被没收了，联合王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正式的但却是无效的抗议。美国人只能以进一步压缩古巴糖输入美国的定额为报复。 181

接着赫鲁晓夫就以他惯有的虚张声势的作风参加了这一幕，他发出了一个令人震动的警告：“必要时，苏联炮兵部队将以他们的火箭炮火来支持古巴人民。”

不过艾森豪威尔却保持镇定态度。的确在卡斯特罗执政的头六个月里，他一直试图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但是在接下去的期间，卡斯特罗整个地加入俄国集团的情况已经变得明显了。至此艾森豪威尔只好依靠施加经济压力的办法，他也要我国参加一起施加压力，以激励古巴人民去反对新的压迫者们。虽则我同意了这位总统对形势的分析，不过对于古巴国内的经济困难究竟能否激起人民去反对卡斯特罗这一点我却表示怀疑。特别是如果这种困难是可以归咎于美国人的并且可以通过俄国的援助而使其减轻的话。我也无法同意无论是对油轮或是对其他船只实行任何封锁的办法。在和平时期，我们是没有什么法律上的权力去阻止油轮从俄国运油到古巴去的。我还可以加上这一句话：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实行封锁时，也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的。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偶尔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中也发生过几次争吵。我听了卡斯特罗的著名的长达五小时的演说的某些部分后，甚至自己也为之感到苦恼。可是我们却束手无策。既无法推翻卡斯特罗，又感到难以与之共处。

接着，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伊始，就发生了著名的“猪湾事件”。卡斯特罗又一次胜利了；而且肯尼迪仅仅由于自己的内在的勇气和恢复常态的能力才能够挨过对自己威望的一次沉重打击。

当我开始去看这份冗长而惊人的电文时，上述的这些想法和记忆也随之涌上心头，这份电报是在那个沉静的星期天晚上，从“机器”里慢慢地吐出来的。

182 在肯尼迪的电报到达之前几小时，驻美大使已发来了又一个警告：

我方才见过了总统。他即将通过电传打字机向你发出一份关于古巴的极端重要的电报，电文将于今天伦敦时间午后十时左右到达海军部大厦。我认为你务必在那里立即收阅。总统特别强调说：不但电文内容是绝密的，而且你在此时收到一份电文的这一个事实也绝对不能让人知道。

总统的电报内容如下：

我向你发出这份绝密电报，旨在预先向你通知一个极为严重的情况以及我要去应付它的打算。我要派大卫·布鲁斯于明天早晨向你作更详尽的报告，不过我希望你在今晚就接到这份电报，以便使你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去考虑我们目下要一同去应付的危机。

上星期，空中摄影的情报毫无疑问地肯定了，苏联已在古巴进行大规模集结中程导弹的活动。迄今已经判明了六处发射场，其中有两处可能处于随时可以使用的情况了。总之，尽管我们在这一点上已接到了苏联的再三保证，他们显然照样一直进行着大规模的秘密活动。

本政府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已经决定去阻止苏联继续通过海路来集结导弹的活动，并且还决定要求苏联去消除对我们西半球的这个核威胁。明天布鲁斯大使见到你时，他会带来我将于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上发表的一篇讲话的主要内容。

苏联的这一非常危险而有挑衅性的行动显然造成了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我们将不得不在这个危机中最紧密地一起去采取行动。我感到为了安全和神速处事，自己绝对有必要先作出独断的决定，不过从现在起，我却期望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且我也知道，在我们的其余盟友一起配合之下，我们将会坚决地对付这个挑战。我完全认

识到，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可能在于使自己在柏林更能稳操胜算，我们不仅要准备在加勒比海，而且也要准备在那里充分发挥作用。在这个最严峻的考验关头，至关重要的是：要让赫鲁晓夫发觉，假使他指望别人会软弱无力或犹豫不决的话，他就打错算盘了。 183

我冒昧地复述一下我的希望：在这里作出宣布之前，对于这个带威胁性以及我要怎样对付它的初步决定，均须严加保密。

虽然我们自己也已经看到古巴的问题有可能扩大的一些迹象，但我们仅收到关于苏联在夏末一直在集结武器及技术人员的一般性的报告。美国总统曾于9月初发表声明，清清楚楚地表示：把地对地攻击性导弹或者任何其他巨大的“武装力量”运入古巴，不论其是否归古巴人掌握或是置于俄国人指挥之下，都会引起最严重的问题。他在9月13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发出了这个警告：

一旦……古巴……成为苏联的有力的进攻性军事基地，我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保护它本身以及盟国的安全。

不过我们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消息，而且因为忙于许多其他事务，我对于俄国人的否认既不感到吃惊也并没有不相信它。直到10月14日，美国人通过空中摄影才获得了他们果真在修建一些攻击性导弹发射场的第一次的确证。这些并不是“萨姆”导弹（地对空导弹），那种导弹也许还可以被说成是一种防御空袭的自卫性武器；它们却是弹道导弹，以美国的大城市为目标，能够于几分钟内在到处造成惨重的破坏和死亡。

我再三念着美国总统的来电，特别注意到其中重要的第三段的内容；虽则这些发射场已修建得差不多了，不过似乎还没有装上多少导弹。所以美国政府决定要“阻止苏联通过海路来进一步集结导弹”。当然我在当时并不知道美国总统是在自己的顾问们就应当如何适当地来对付已经揭示的威胁而进行的长时间而且甚至

184 是激烈的辩论后，才作出这一项声明的。我们现在知道了，某些人而且还是大多数的人建议是立即发动攻击，并且继之要对这个岛国加以侵占，假如总统和他的班子里的人获悉了几天后才搞清的下述情况的话，肯尼迪是很可能无法抵制主张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的意见的。这个情况就是：导弹大体上已安装妥善，而且所部署的力量代表了俄国全部经济所能提供的核力量的绝大部分。不过，他主要由于他的弟弟罗伯特的影响，才决心去找出一个方法来，这样，要是赫鲁晓夫希望作退却的话，他就能够从他所处的危险境地退出去，而又不至于太失面子，这就为他在那些危险万状的日子中所显出的沉着的智谋生色。

在这个星期天晚上，我除了等着会见布鲁斯大使之外，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不过自己在如此紧急的关头却无所作为的确是不好过的。我考虑之余，决定在这时甚至也不去惊动外交大臣；还是等美国大使来后再说。

我当时的笔记对次日（星期一，亦即 10 月 22 日）的情况作了最完善的描述：

这是世界性危机的第一天！布鲁斯大使于中午来访。他带来了肯尼迪总统的长函以及一大本文件册，这本册子证明：（不顾俄国政府所提的具体保证，以及特别是葛罗米柯的保证），目前苏联在古巴已经秘密地布置了一套威力强大的中程和近程导弹，它就象一支指着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的手枪一样，这是不能容忍的。总统将于今晚（华盛顿时间晚上七时；伦敦时间午夜）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讲话。讲话全文将（于十二时半或一时）立即送给我。

185

布鲁斯大使态度淡然而镇静，他并不想去掩盖华盛顿的紧张而几乎是混乱的气氛。揭示部署于古巴的进攻性导弹的全部内容的照片是约于 10 月 17 日才拍到的。总统急忙取消了他的竞选旅行，于星期六（20 日）赶回华盛顿。所有的决定都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作出的。他确信，这些决定还不是最后的——所以把演讲稿送得晚了一些。这位大使认



为，总统所建议要采取的行动（内容似乎是规定对无论是俄国的或是中立国的运送武器前往古巴的所有船只实行“隔离”或封锁，并可能在必要时实行更为彻底的封锁）并不会使美国“主战”派感到满意，但却具有引起冲突的巨大危险性。我们稍为猜测了赫鲁晓夫先生可能作出的反应。是动口还是动手？在加勒比海还是在欧洲？<sup>①</sup>

我已对总统的来电发出了收文回条，并且答应于见到布鲁斯大使后立即回电，由于两国时间上的差异，该电应于次晨到达。这位大使从总统那里为我带来了更进一步的而且更为详细的情况汇报：

我们现在已掌握了通过空中摄影侦察活动得到的无可否认的军事证据，说明苏联人已在古巴安下了进攻性的核导弹，而且其中某些可能已经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了。这就构成了对和平的一种威胁，它不仅危及这个半球的安全，而且也危及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你还记得我公开地声明过：美国政府将把古巴存在着地对地导弹的情况看作为一个进攻性威胁。苏联人针对我的话，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运往古巴的武器及军事设备纯属自卫性质的，而且仅在上星期四，葛罗米柯还奉命向我重申了这些话。

上述情况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局势，我们必须迅速而大胆地加以应付。我将于今晚华盛顿时间十九点发表一次公开声明，布鲁斯大使将把它的草稿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你，这封信的每一细节并不都是不可变动的，不过信中所陈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要点以及我打算去应付的办法却都已决定了。布鲁斯大使也充分准备向你说明我们据以作出结论的证据。我也要写信给赫鲁晓夫主席，使其明白他目前所采取的行动具有多大的危险性，不过我也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同意回到和平谈判的道路上去。我心中很明白，无论如何要使他们把这些导弹撤出去，你将看到我准备在我的讲话中公开声明这一点，而且要在我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对他说明这一点。

186

---

<sup>①</sup> 1962年10月22日。

要进行隔离的目的在于防止苏联把更多的导弹运入古巴，并促使已经安装好的导弹撤除掉。这个办法即将付诸实施。

我也将向迪芬贝克总理、戴高乐将军、阿登纳总理以及范范尼总理发出私人信件，并且已经派迪安·艾奇逊到巴黎去协助芬勒特大使，以便在我发表公开声明之前不久，向北大西洋理事会作简要说明，但是我希望你首先获悉这一严重的变化，以便当你希望和我商量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通过我们之间的秘密联系渠道来对局势进行磋商。

这是我们两国面临的严重的关头，而且的确也是全世界命运所系之时刻。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决不能让苏联人对我们在他们不顾一切地采取的方针的面前打算做些什么和准备忍受些什么作出错误的或者过低的估计，以免使我们面临的已经够巨大的危险更加有所增长。

我用不着向你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而危险的行动和柏林问题之间所可能存在的联系。我们必须一起准备去经历一个考验的时期。我们彼此能够在此刻通过迅速稳妥的方法保持密切联系这一点，对我个人说来是极可满意的，我打算随着情况的发展，随时让你充分知道我的想法。

187 在此同时，我也要提出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我已请史蒂文森大使代表美国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撤去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以及其他进攻性武器。这样，美国就可能解除它的隔离措施。我希望你能指示贵国驻纽约的代表同我们积极配合，并且立即发言支持我们上述的在联合国中的计划。

这个大使一离开，我马上请外交大臣和他的某些主要的顾问一起来讨论形势。后来，我们从空军参谋部取得了一份资料进行分析。事实确凿，似乎无可置疑。不过，我还在等候大卫·戈尔的报告，我明白，由于报告内容准确而且戈尔深知总统的想法，所以我可以信赖。在此同时，

尽管总统答应送给我一份演说稿的全文，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拿到。它终于在下午五时送达。亚历克·霍姆来和我一起搞出一份对总统的回信。

我认为这是一篇质量相当好的文件。<sup>①</sup>

这封信的起草却是煞费周折的。当然可以用概括笼统的话答应支持美国,不过我应当记住,欧洲和英国的人民已经在靠近苏联导弹的情况下生活多年了。而且美国要实行哪一种封锁也还不大清楚——是否仅仅阻止运载导弹和武器的船只进入还是实行全面封锁呢?而且,赫鲁晓夫的真正目的会不会是要把古巴来换取柏林?假使他丢脸地在古巴被美国人挡住了,他会不会在柏林争回一些面子呢?这个活动的整个目的会不会真的在于把一个卒子往前推一步以便去换取另一个卒子呢?我已经把这几项意见全都向美国大使提出了。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答复不应该显出任何软弱或是犹豫不决的态度。我在写初稿时的确曾想劝他去拿下古巴以了此事;这至少可以避免掉我们曾经在苏伊士事件时所陷入过的情况。而且,我唯恐肯尼迪

会“失去这次机会”——他以后可能除了放弃土耳其、意大利或其他地方的基地以作为交换条件之外,无法弄掉在古巴的导弹。这样赫鲁晓夫就会得逞。<sup>②</sup>

我还考虑到

188

将实行的是对“武器”的封锁,这会防止更多的导弹进入古巴。可是只有更加严厉而全面的封锁才能使卡斯特罗政府垮台。但是时间将是很长的(至少三个月)并且(因为这种做法显然是“非法的”)这就会引起美国同中立国以及甚至友好国家之间的无穷纠纷。<sup>③</sup>

不过我们得迅速行动,我们送出的复文措词如下:

布鲁斯大使今晨来访并把苏联在古巴的军事集结的证据交给了我。我对于美国公众舆论一旦获悉这些事实时会作出如何猛烈的反应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我此刻已通过电传打字机接到了你拟于今晚发表声明的全文。我可以立刻对你说:我们当然会在安理会中向你提供一切可

---

①②③ 1962年10月22日。

能给予的支援。我希望你立即向我们提供一些你们所能提出的法律上的最好例证,以便支持我们在道义上总的地位,这样,我国代表就能够有效地助你一臂之力。国际法学家们当然会认为,一项包括要搜查所有国家的船只的封锁,在和平时期是难以辩解的。过去对于战时使用这一办法也的确有过不少争辩。不过我们主要应该以处于核时代的现代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情况,而不是以以往的先例为根据。

假使安理会的决议会象我所估计那样地被否决了,那末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大会呼吁。谁也不知道在那里会得出什么结果来,不过对于他们会不会赞成任何一种断然的行动我是有怀疑的,而且即使他们赞成这样做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去执行。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是赫鲁晓夫可能作出的反应。他可能动口或者动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假使他仅仅动口的话,他可能要求美国撤走在欧洲的所有基地。假使他决定动手的话,他可能在加勒比海或者其他地方动手。假如他在加勒比海作出反应的话,他显然会对他的船只实行护航以迫使你们去加以攻击。我们是一直为这个先开火的窘境而担心的,而且总是希望把俄国人逼进这个困境里去。你肯定是考虑过了这一点,不过我希望了解你对处理此事有何想法。在另一方面,他可能对自由世界防御体系的较弱部分施加压力。这可能在东南亚、伊朗,也可能在土耳其发生,不过更为可能发生于柏林。如果他在加勒比海以外的地区作出反应的话——我担心他可能这样做——他很可能宣布实行另一个封锁以回答你的封锁措施。所以我们必须作好准备。各种应急计划所设想到的任何一个在柏林的报复行动,不是使我们朝世界大战而升级,就是去举行和谈。我感到重要的是,我们两人应该考虑一下并决定自己要在盟国内部以及其他地方把事情引导到什么方向去。我们应于俄国人作出反应后立即进行磋商。

虽则你明白我多么同情你们遭到的困难,而且明白我们要怎样地尽一切力量去帮助你们,不过还是应该让你知道,我对两个方面是感到担心的。我们不少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是紧紧地靠近于敌人的破坏力最大的那种核武器而生活着,所以也变得习惯了。因此要注意欧洲的舆



论。其次,更加令人担心的是:要是赫鲁晓夫来谈判的话,他自然会试图利用自己在古巴的有利地位来做交易,以实现他在柏林以及其余地方的野心。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这一点,因为这会危及盟国内部的团结。

我还没有从驻美大使那里直接听到什么。由于某种原因,他的电报直到晚上十时才到达。虽然它会有助于我们去草拟我们对总统的复信,不过我和霍姆都感到,绝对不可以不把我们的想法及时告诉他。

外相一离开,我就

找来财政大臣并把情况告诉他。他的建议是有见识的。他要找英格兰银行行长。可能出现大量购进黄金和股票价格普遍下跌的现象——不过不致于产生恐慌。<sup>①</sup>

这天晚上,我预定要举行盛大的宴会,以招待我所器重的老朋友、现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这虽然是一次令人厌倦而分心的事,却至少

使我有机会同诺斯塔德将军作一次密谈。华盛顿……已经在催促北约组织实行“警戒”,并执行其所意味着的一切(在我们说来,就是发布敕令并征召后备军。)我告诉他说,在目前阶段,我们决不能同意这样做。诺斯塔德对此表示同意,而且还说,北约国家将会采取同一立场。我说,“动员”有时曾引起战争。不过在我们这次情况下这样说却是荒谬的,因为“警戒”措施所提供的增援部队并无军事价值。<sup>②</sup>

的确,除了对皇家空军采取了某些戒备措施之外,我们在这个危机中始终维持着这个立场。由于盖茨克尔也参加了宴会,我想最好把我所知道的主要事实向他通气。我把他带到了

内阁办公室,并向他出示所有的文件以及总统的发言稿。他没有采取很坚定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党“不会赞同”。我就不相信他们会赞成无论

<sup>①②</sup> 1962年10月22日。

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任何决定——任何坚定的决定。<sup>①</sup>

我约于十时半左右听说戈尔的电报终于到达了。它的内容很长而有启发性，我能在接听总统的电话之前看到它的确是感到高兴的，总统是预定于晚上十一时打电话来的。大使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明白大卫·布鲁斯已奉命于今天中午在伦敦向我们说明情况，不过要是我把自己和总统在昨天所作谈话的内容告知你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要我暗暗于午饭前上白宫走一趟。别无他人 在场，他告诉我说，美国政府以外的人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191

他接着说，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古巴的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U<sub>2</sub>飞机的大规模摄影侦察活动现在揭示出了，古巴正取得两种中程进攻性导弹。一种是固定式的，估计有二千英里的射程。另一种是活动式的，其估计射程为一千五百英里。他没有指出很精确的数字，只不过说他估计岛上或许已有三十至四十枚导弹，而且他们知道还有更多的导弹正由轮船源源运来。他们不得不假定这些导弹是要配上核弹头的。如果没有核弹头，其用处就不大。不过关于核弹头是否已经到达这一点，美国人在当时还没有确实的情报。不过他们的确获悉苏方修建地下储存设备的情况。他说这个新的消息使美国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于9月13日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他特别提出，假如古巴成为苏联的一个有力的进攻性军事基地的话，美国将尽一切力量去保护其本身及其盟国的安全。这种对于进攻性和防御性能力的毫不含糊的区分就构成了一个清楚的警告，它说明美国所能容忍的限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得不根据这项最新的情报来决定可以采取的适当行动。

总统说过，他们已经作出结论，认为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

(一) 他们可以于星期一清早就下令进行全面的空袭，以消灭他们迄今为止所能确定其位置的所有已知的导弹发射场和导弹。军事当局估计这种空袭将至少消灭古巴导弹潜力的百分之五十，但是这肯定会造

---

<sup>①</sup> 1962年10月22日。

成俄国人和古巴人的重大伤亡。空袭之后，将继之实行对古巴的封锁。

(二) 他们可以不先进行空袭，而立即进行封锁。他们将拦阻并搜查一切可能运载有助于增强古巴军事潜力的物资的可疑船只。这就意味着，要让古巴人拥有他们目前已有的进攻能力，但是要显示出美国不允许这种军事集结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

接着总统就我认为这两个办法之中何者为正确这一点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认为他所说的第一种办法有严重的缺陷。居住于美国以外的人们很少会认为古巴人的挑衅行为会严重到要美国对之实行空中打击。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在政治上受到损失，而且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已经运到古巴的导弹会构成对美国的重大军事威胁。即使在古巴有了这些武器，如果美国在将来决定非制服古巴不可的话，它只要在极短时间内大概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对柏林局势所可能产生的反响。美国采取这种行动很可能提供一种烟幕，俄国人可以在其背后，在有利的条件下对柏林采取行动。从而，在他向我所提出的两个对策之中，我当然是赞成第二种办法的，虽则这也会引起包括俄国人也许可能在柏林问题上作出重大反应的一些深远的政治影响。 192

总统说他和他的同僚们已经作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他们打算去采取第二种办法。他还说他想或许还有第三种乃至第四种办法。例如，他们可以利用最近形势为借口对古巴作大规模入侵，一下子推翻卡斯特罗。这可能是他们采取这种行动的再好不过的机会了。但同时，他们也可以一无作为，一切照旧，不过他认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不允许，而且也太危险了。苏联人眼下在古巴的行动显然构成了对美国的正面挑战。他们是深知他本人以及美国政府的处境的，假使肯尼迪面临这种挑衅而毫无动静的话，那末他的朋友们和盟国就会认为他是不敢动的，而赫鲁晓夫也就一定会认为，美国人虽然把话说得很硬，却是因循苟且，不准备对他所作所为采取行动。这就会对全世界所有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柏林产生影响。

我在回答这一点时说，我坚信在这个时候入侵古巴是最大的失策。

我并未看到在古巴存在着美国人可以期望当地广大人民群众来支持他们入侵的任何迹象，而且历史已经指明，得不到国内人民支持的入侵往往引起无穷的祸患。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来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的情况，并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前景。总之，当美国政治资本低落到极点而且可以把这样胆大妄为地引起彼此以卒换卒的罪名归于美国人的时候，这个办法就可能为苏联人夺取西柏林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也很了解一筹莫展所产生的政治危局以及在国内的困难，但是我认为实行封锁办法会给我们造成许多麻烦，而且我们现在还要提防俄国人对此所作的强烈反应。

接着我问总统，他们要实行封锁有何根据。他说，将以里约热内卢条约为根据，并将召开美洲国家组织的紧急会议，他们可望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争取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的赞同。我说，我担心这样地引用里约热内卢条约我国是帮不了什么忙的，因为我认为联合王国对它的条款是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的。我国关于在公海上自由航行的传统态度会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地位。说到这里，总统说他了解参加对古巴贸易的大多数英国船只并不是由较有声望的公司所经营的。他也明白地指出将禁止向古巴运进石油、燃油及润滑油。这种运输将被视为对古巴军事潜力的支援。总之，既然动起来了，似乎就不应该采取半吊子的做法。禁止上述油类进入古巴当然会严重打击古巴的经济。

总统最后说，他不禁要佩服苏联的策略。他们存心向美国挑衅，知道要是美国人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话，就会向俄国人提供一个对柏林采取行动的绝好的机会。在另一方面，假使他一无作为，那末，拉美国家以及其他盟国就会感到美国人并无真正要抗拒共产主义侵蚀的意志，从而就会采取骑墙的态度了。

总统向我力言在他们准备就绪之前务必对这项消息加以保密。他希望只让你自己以及你的最亲密的顾问们知道此事经过。我说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不通过通常的渠道向你汇报为好，而不如由他于午后稍晚时间通过电传打字机向你发出私人函件。

晚上十一时，总统来了电话——这是由我们的保安人员严密



保护的一条特别秘密的线路。这是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多次通话的首次电话；这几次通话使我大感宽慰，因为我感到自己一直能秘密获悉这些可怖的日子中所发生的每一变化。由于机器的特殊结构，进行谈话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去掌握这个技术。有时，总统会在一天之中打三次电话来。不幸，他却忘记了：他打最后一次电话时照他的时间说是午夜，而对我们说来却是早上五时了。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刻化，在忠心耿耿的秘书们的轮番陪伴下，我和亚历克·霍姆一边不断吃些点心，一边高高兴兴地坐以待旦，挨过了好几夜。我记下了我和肯尼迪就古巴问题所作的第一次通话的情况：

他似乎很激动，但是头脑很清醒。他刚刚作过广播演说。他对于我的去电以及大卫·戈尔所提的意见表示谢意。他不知道赫鲁晓夫会怎样办。他对于封锁办法谈得很空洞（他们显然正在整天商讨各种计划）。他正在集结军队，拟于必要时对古巴实行 *coup de main*（突然袭击），以便予以占领。<sup>①</sup>

但是当晚还有其他事要做。

使我们在夜里搞得很晚的许多任务之一便是向盟友们发出得体的函件。所有这些信都需要仔细地分别来起草。在欧洲的戴高乐、阿登纳、范范尼；迪芬贝克……孟席斯、霍利约克——还有尼赫鲁和阿尤布总统。（我还向尼赫鲁寄去了一封充满热情的私人信，以慰问他所遭到的困难。中国人正在全线乘胜进逼。我们正向印度运去大量军火、轻武器等等。）然后还要以大体上相同的措词向非洲各国总理们发信等等。<sup>②</sup>

内阁于次日（10月23日）开会，由

195

我来说明古巴的整个形势，我还宣读了主要文件（但并没有予以传阅）——即：（甲）总统致我的密电；（乙）驻美大使的献策和关于在古巴的导弹的证据的概要；（丙）我的答复；（丁）我和美国总统的电话交谈的概

<sup>①</sup> 1962年10月22日。

<sup>②</sup> 1962年10月23日。

要。大臣们似乎很震惊,但他们是满意的。①

当然迄此古巴似乎已经同我的生活分不开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日以继夜地连做梦也在想它而不遑顾及其余。对我的同僚们说来,这却是晴空霹雳。不过即使天就要塌下来,英镑也还是稳定的。财政大臣

在会上交给我一封信,其内容如下:“今晨英镑坚挺。黄金市场极为活跃。我们出售了价值二千二百万英镑的黄金,但是全部补进了外汇。美元开盘疲软,不过已经稳定下来了”。可是证券行情的大大下降了——或许主要是由于股票经纪人们压低标价,而不是由于有人大量抛出之故。②

诺斯塔德将军于午饭后来告别。“他除了只告诉我他已经说服华盛顿要更加通情达理地处理”及北约国家动员的事这一好消息外,没有说什么。我早已明白目前的形势并不需要这类老式的办法。要末就是核弹掉下来,要末就是一方缩回去。正象腊斯克国务卿以后所说的那样,“我们从炮口望望炮膛,俄国人就退缩了。”虽然事情也许并不就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去遵循常规战争的一切传统的而且几乎象仪式般的准备程序,以应付可怕的核战争。

后来我应盖茨克尔之请又会见了。他带来了他的两位同僚。

盖茨克尔、布朗和威尔逊于下午五时来了。他们没有说什么。布朗的态度要比盖来得坚定。……幸而他们都彼此十分猜忌。③

196 接着我去觐见女王。我试图不夸张地向她说明局势的危险性。一般说来,她是平静的,基本同意我的看法。

在此同时,美国政府以出色的手腕和充沛的精力采取了行动。

---

①②③ 1962年10月23日。

美洲国家组织已经开过会而且要求“立即从古巴撤走所有导弹以及有进攻能力的其他武器”。它还要求所有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去阻止中苏集团国家继续向古巴供应军事物资。这的确是肯尼迪个人的一次胜利，他在中南美国家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同日（10月23日）安理会召开会议，俄国代表佐林在答复艾德莱·史蒂文森的充满激情的控诉时，竟然厚着脸皮否认在古巴有任何导弹或是发射架。这对这位激动的美国的理想主义者说来实在难以忍受了。他高明地把随身带来的一些放大的照片拿出来给别人看，使他的对手哑口无言，并且能够向甚至最抱怀疑态度或是怀有敌意的观察家证明，美国所提的控诉是多么正确而有力。这事件在英国和全世界引起了深刻的影响。这事的确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早已告诫过华盛顿要尽可能地把实况照片让大家看到，而且要尽可能地使大家看得懂，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布鲁斯大使交给我的照片须经专家说明后才能使人确信无疑。在安理会的那一幕新闻界予以广泛的报道。而且，一切怀疑最终被赫鲁晓夫本人自己给打消了。

10月23日夜，我除了坐等消息之外，别无他法。总统又来了电报告诫我说，如果俄国船只一旦遇上了美国迅速动员起来的执行封锁任务的庞大武装力量的话，那末严重的关头就来临了。

我们已向海军指挥官们发出了指示，要尽量少用武力，不过我也明白，没有把握做到不发第一枪。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坚定。<sup>①</sup>

我后来听说，大卫·戈尔同总统谈话时指出，把拦阻线设于离古巴 197 八百英里之处未免过远了。如果我们旨在使赫鲁晓夫有机会重新考虑他的立场的话，时间越充裕就越好。所以在他的建议之下，总统把这个距离缩短为五百英里了。

次日（10月24日），封锁正式开始了。同时，总统决定向全世

---

<sup>①</sup> 1962年10月23日。

界的报界散发更多的照片。随着美国摄影飞机翱翔于古巴岛上空，每天都不断有新照片出现。每天的照片都揭示着工程正在进行的情况。这样地把证据积累起来是很重要的，总统也很明瞭这一点。星期三（10月24日），我接到驻美大使一封关于这一点的电报：

昨晚，我在白宫吃了一顿便饭后和总统又作了一次长谈。他问及联合王国国内对他的演说的反应。我说，我认为美国人能向公众提供关于苏联在古巴集结进攻性武器的真正有力的证据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他很能理解这个道理，他叫人拿来一批照片后就指示他们，哪些照片是应该予以发表的，并且强调了要在照片下面加上清楚的说明的重要性。我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这些说明，外行的人就不明白照片中的导弹到底是不是因为有六呎长而所以是防御性的，还是因为有六十呎长而就是进攻性的呢？总统说他们在白天进行了超低空摄影侦察飞行，他们希望这会提供一些有用的导弹特写照片。他要求提供关于佐林在安理会发言的报告，人家告诉他说，佐林并没有具体否认在古巴有远程导弹。佐林的论点是，古巴并没有进攻别人的意图，所以他们手中的一切武器都是防御性的。

当时我们获悉有二十五艘苏联船只正驶近古巴，据信其中有十四艘是载有导弹的。这样第一次冲突肯定就要发生了。总统已经明智地决定只没收导弹，运载轻武器的船只经过搜查后可以继续放行。

这时，吴丹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发出了呼吁，建议双方在谈判期间停止封锁和运输武器各两三个星期。当夜我是首先从总统那里听到这消息的。

除了听到某些俄国船只已经掉头开回去的谣言之外，那天（10月24日）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晚上十一时（伦敦时间）总统打电话来。这次谈话确是很离奇的。不过假若我能够在议会中加以利用的话，我当然是可以用它来驳斥伦敦与华盛顿之间不存在



“特殊关系”的这种指责的。肯尼迪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就谈到俄国船只这个主要问题。

肯尼迪总统：也许你已经听到，船队中某些为我们所特别注意的船只已经返航——其余的则继续往前行驶，所以我们应于以后的十二小时中知道他们是否要冲过封锁线还是接受搜查。所以到明天晚上我们就会掌握更多的情况，不过我们也许不比现在更好过一些。

首相：你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否准备驶回去还是准备突破封锁线吗？

肯：已经返航的船中有几艘是我们所最为注意的。而且我们想这些船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资料。其他的船还继续往前驶。我想继续开过来的这些船只是一些油船而已。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惹起我们去把它们击沉还是允许我们来搜查。这还是一个问題。

至此我就说，有些船掉头驶回了，这似乎是个肯定的胜利。不过总统还不是那么有把握。

肯：有些船正往前开来，我们认为：回航的那些船可能载有进攻性军事设备，所以他们也许不希望让这些设备落到我们手里去。这就是它们返航的原因，不过我们还不知道其余的船只会不会遵守我们的隔离办法，还是迫使我们去采取军事行动来对付他们。这一点我们可不知道，<sup>199</sup>今天晚上是无法知道的了。

首相：这倒是很有趣的。但是你现在对他们这种做法作何解释，他们掉头驶回去不是说明他有点害怕吗？

肯：不见得，他可能命令这些较小的船驶回以避免被我们截获，因为这些船不是装着导弹，就是装着导弹的辅助设备，这些东西不是保密的物资，就是怕截获后会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这些船——我们特别希望截获的这五六艘船——就奉命掉头回航了。不过其余的船还是照样开过来，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船上没有运载什么有军事价值的东西的情况下，是可能发生事情的。我们要碰上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不过我说过，我们要等到明天才会知道究竟怎样。

接着，我问他怎样设法去使苏联把已在古巴的导弹撤走？

肯：唔，要是我们就象我所说的那样顺利通过第一阶段，要是他们遵守我们的隔离办法，那么我们就去处理在古巴的导弹问题，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拍摄的照片显示出，他们还在继续安装这些导弹，我们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趁机冒一下险去进攻古巴呢还是暂不动手，或用古巴来制约柏林问题。只要他们对柏林采取行动，我们就对古巴采取行动。这的确就是我们在眼下可以抉择的办法。你的意见如何？

首相：唔，我要考虑考虑再说。我认为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感到，全世界都认为我们迟早总得和他们进行某种谈判，不过我们是不愿意在他胜算在握的情况下去进行谈判的。

肯：他掌握了古巴，可是并没有拿下柏林。假使他拿下柏林，我们就要拿下古巴。假使我们要拿下古巴，我们当然就要遇上是不是单单去击毁这些导弹，还是对全岛用导弹实行全面轰击的问题。而且我们当然会遇上柏林被占领的问题。

首相：对，我同意这个看法。这是需要加以考虑的。

200 赫鲁晓夫在广播中回答贝特兰德·罗素所写的一封信时说过：他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我不知道总统是不是另外还听到什么。

肯：是的，我看到过这个报道，不过他说，假使我们继续采取海盗行动的话，召开最高级会议便没有什么意义了。他的意思是：他是愿意来谈判的，不过要是我们不改变隔离办法或是去执行隔离办法的话，他就不愿意来谈。他的话不太明确。

他还告诉我说，吴丹已经要求他暂停实行隔离办法两星期，不过除非俄国人同意停止修建导弹基地，否则他就不能同意这样做。

我对此表示支持。我还说：“我想他反正是有点弄不明白应该怎么办，你感到怎样？”

肯：唔，我想他们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的确还没有明确表态。首相，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假使他们遵守隔离办法的话，我们就进入这个问题的第二阶段。并继续去处理导弹的事情。我们是

不是到时候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不把导弹撤出，我们就占领古巴？然而他可能会说，要是我们进攻古巴，他就要发动全面的核攻击，而且他必然要夺取柏林。要不然，我们是不是因为估计他不敢在古巴发射导弹而让那里的核武器发射场修建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要等到他夺取柏林的时候再进入古巴呢？这就是我希望你去考虑的问题。

我说我愿意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还要在以后给他写信。他同意了，并且还问我在议会中反对党有没有在同我作梗？

首相：我只要作一个简短的声明，然后他们稍为提出几点质询，这样一共花不了半个小时，议会就可以休会了。所以明天的事情比较简单，我只要叙述一下情况兼表示支持你就完事了。当然他们会问我是否打算干预等等，不过我将说时机尚未成熟。

肯：那很好。……我感到有两点重要的事：第一，我在9月初声明：除非古巴人硬要使自己获得进攻的力量，我们是不赞成对他们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第二，他们声明说他们是永远不会把导弹弄进古巴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的这种欺骗手法，即便对他们自己也是无法辩护的。我想，你手头是备有这些材料的，万一工党议员追问得很紧，就可以加以引证。 201

首相：是的，蒙你向我提供了一份，是由布鲁斯大使在今天早晨交给我的。我想我们已经把所有这些内容都包括在声明中了。你方才讲到的这个大问题是我要去考虑的。然后我们还应该考虑怎样去应付欧洲人以及其他什么人将开始变得有点激动了——戴高乐和阿登纳以及他们的一帮人——还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等等问题，不过我自己确信我们办事不能太性急。在一两天内对这事应当听其自然。

肯：首相，你说得对。我已说过我们正在动员军队，以便一旦决定进攻时就可以在几天内动手。

接着我们谈到联合国的问题，我问他吴丹究竟是怎样对他说的。

肯：秘书长建议的第一点是：不准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第二，

停止执行隔离办法两星期，并且在这两星期中要举行谈判。我们将发出回信说：这个办法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保证。第一，要是我们撤销隔离的话，我们却还没有得到不把武器运进古巴的保证；第二，假使我们能够取得不运进武器的合理保证的话，那将是令人满意的。不过还要使导弹发射场的工程停下来，而且那些目前指向我国的导弹应该置于监督之下。这就是要我们恢复原状的条件，再看他怎么说。

首相：他是否要公开把它提出来还是向你秘密写信呢？

肯：我想或许他将向安理会提出报告。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关的电报，但是他就要把它寄给赫鲁晓夫了，所以我断定他会将它发表，而且还要发表我们的回信。

首相：我认为他（吴丹）很令人头痛，因为他这样做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其实很糟糕。

202 肯：唔，是呀。我认为导弹基地上的工程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这一事实——我且把他的来信念给你听。我方才接到消息说，他还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他刚刚把一份将要发表的公开声明的内容交给我们。他到头来也可能不发表它，不过我倒要念给你听一下。〔然后总统以记录速度慢慢地把内容念出来。〕

“许多联合国成员国政府的常驻代表曾经要求我在目前严重局势下向你提出紧急呼吁。这些代表感到，为了国际和平和安全，一切有关方面都不应该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并随之引起战争的危险的任何行动。他们认为，应该使有关方面有时间聚在一起去解决现存危机所造成的形势，并且去使加勒比海的局势正常化这一点是重要的。这就需要一方面自动停止向古巴输送一切武器，而同时也要自动停止执行包括对驶往古巴的船只加以搜查在内的隔离措施。我相信，自动采取上述措施只要二三星期后就会使局势大大缓和下来，并且使有关方面有时间去为探索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开会商讨。我将乐于就此点向一切有关方面提供自己所能作出的任何贡献。我向阁下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你立刻对这封信加以考虑。我已经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发出了同样的信。吴丹（签名）。”



我们现在吃不准究竟他是否最终要这样做，还是仅仅表示自己在半小时以前打算去做的事。

我认为这是一封危险性很大的信，总统应该妥善地加以答复，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肯：是呀。唔，我们就要把回信写好了。我们要指出他的建议中的缺陷，就是说，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苏方不去违反隔离措施，而且建立导弹发射场的工程还会继续下去，这样在这两星期之中，危险就会增大。我们就是要这样指出来，并且一俟有迹象说明他就要向我们发出这一封信时，马上就把我们的回信送过去。

首相：那末你认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此事呢？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试试看能否作一笔交易，同他碰一次头，还是怎样？你看应该去提出什么倡议，并且应该由谁来提出？

203

肯：唔，我想我们于二十四小时后，对他打算怎样对付海上隔离的意图有进一步的了解时，或许就能作出更好的判断。首相，我说过我们的答案似乎部分取决于我们原来所讨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便是：我们是否应该等待并且让他们继续在古巴修建发射场，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要去冒战争的危险，而且同等重要的，最起码也是相当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冒失去柏林的危险。否则，我们可以继续实行隔离办法，而他们也继续修建导弹发射场，我们还要提出警告说，要是他们进入柏林，我们就要在古巴采取行动。

在我们决定怎么办之前，召开会议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谈些什么呢？赫鲁晓夫会提出，只有在我们同意使柏林中立化的条件下才撤除他的导弹。我们应该怎样回答他？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政治难题。

我一定要对此加以考虑。同时，我吃不准假如我去同他会晤的话，会有什么益处。

肯：为什么不等到星期五，当我们知道怎样来处理海上隔离的问题时再谈呢？假如看上去似乎我们将会有一个僵持时期，那末我就认为是

很好了。我们为什么不等到星期五谈后再看看在什么时候召开会议最为适宜？

首相：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们星期五晚上再谈一次。你看这样好不好？

肯：首相，这样很好，就怕你星期五晚上有事要离开。

首相：我将留在伦敦，但是我想，假使我们能够每天晚上稍谈一会将是很有好处的，如果这样做不至于使你感到不便的话，我们只要对情况交换一下意见就可以了。

肯：好，那末首相，我明天晚上按我这里的时间六时再打电话给你。

首相：这将对我很合适，晚安。

肯：晚安，首相。谢谢你。

204 现在有必要来解答总统提出来的那个关键问题：“是否应该拿下古巴？”我于次日晨作如下的答复。

我考虑过了你上次在电话中所提出的那个重大问题。经过多番考虑后，我认为事情很不好驾驭。虽则有可能产生一种非去采取这种行动不可的情况，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还只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即，你应该设法通过其他办法来达到你的目的。

我将在今天向下院发表下列意见：假使你在9月发表了关于古巴的声明后还照样听任俄国人为所欲为的话，那末美国对自由世界的任何保证都会是毫无价值的。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辩护的要点。我还要提出第二点意见：鉴于俄国人的不老实，对任何解决办法不能只听其言，我们一定要观其行。因此，我将建议：由于你今天要向吴丹作答的信事关重大，而且也为我们的盟友、中立国以及敌人所密切注视，所以你在回答中应着重这一点：即，要终止实行隔离就必须有某种检查的制度。这种检查必须肯定运载武器的船只实际上不会驶入古巴各港口。我们不能轻信俄国人的诺言。这是第一点。

你还必须要求由联合国或是其他独立权威机关来进行检查，以便在谈判期间去制止主要军事设施的修建工程。这就能使你在实际上达到你的目的。因为假如没有什么装载武器的船到达的话，那么海上隔离的

目的就达到了；假如导弹基地工程停止了，那么基本消除这个威胁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换一句话说，我所提出的办法就是我认为必须回答你昨晚所提出的问题而所提出的建议。

在这同时，你当然要继续进行军事集结以便应付任何紧急情况。这可能也是促使古巴人去接受检查办法的重要因素之一。

赫鲁晓夫果然不出所料地接受了秘书长的建议。不过总统却很精明，并没有落入这个圈套之中去。他明白表示，必须把进攻性武器从古巴撤走。吴丹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有可能命令已经在途中的苏联船只在一定期间避开一下美国的拦阻区以便双方进行商谈。”他写信给肯尼迪总统，要求美国避免正面对抗。肯尼迪对此作了巧妙的答复，他说，如果俄国船真的避开这个拦阻区就不会发生对抗行为。

同日(10月25日)下院恰巧就为了休会而开了一次会。由于下次要等到10月30日才复会，我们至少可以幸运地避免每天发生的质询以及随之而出现一切尴尬的处境。不过我还是答应盖茨克尔于上午十一时去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

保守党的座位上坐满了人。反对党，尤其是与本党观点不一致的议员出席的人数相当多。各方面对我的声明反应很好。盖茨克尔一如往常那样，说要提出两个问题，结果却连续提出了十个问题。不过他的话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在包括塞尔温·劳埃德在内的一二个保守党人发言后)轮到共产党人亦即同路人发言时已将近十一时半了。我已经和盖茨克尔商妥把休会时间推迟到十一时(通常休会时间)以后，但不超出十一时半。有人提出了客气的抗议，但无关宏旨。<sup>①</sup>

至少在这一阶段议会、报界和公众都十分镇静。

我向所有英联邦国家的领袖以及戴高乐发出了信件。我向老英联邦国家竭力强调说：如果要美国的盟友继续信赖美国的支援

<sup>①</sup> 1962年10月25日。

的话，美国就有必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俄国人言而无信的这个经验教训至少可以用来证明：决不能轻信俄国人的诺言进行裁军。

总统和我晚上十一时又进行了一次交谈。他一下子就问到我们在议会中的处境。

206

首相：我们搞得很不错。下院的态度很友好。我已经向你寄去了我发言的内容，我认为人们对此很表欢迎。我把所有能提出来的理由都提出来了，我特别谈到你告诉我的关于你在9月11日发表的声明中的那个论点，以及俄国人所说过的骗人话。这一点很受欢迎。

肯：首相，我们从吴丹那里接到了第二封信，你可能知道它的内容。这封信要求赫鲁晓夫使他的船避开那个地方，同时要求我们避免发生对抗行为。我们准备回信说，假如他的船避开那里，我们当然会避免发生对抗。你知道今天有十四艘船掉头往回驶，也许这些就是装载着进攻性武器的船。我们拦住一艘油船，盘问它驶往哪里？它回答说是从黑海驶往古巴的，船上装的是油。它显然是一艘油船，所以我们就放行了。明天还有二三艘船要来，特别是其中有一艘东德的船，它可能载有六七百名旅客。途中在列宁格勒停了一下，可能载有六千吨货物。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去拦阻那艘船。这就是我们目下正在讨论的事。我们要同时应付两桩事。一桩事是：赫鲁晓夫继续派遣的那些船只中的一艘正朝古巴开来；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正当吴丹据说在和俄国人商量要他们避开的时候而让吴丹看到我们击沉一只他们的船。我们可能还得等几个小时后再说，不过也许迟早在明天晚上我们就不得不去接触其中一艘，并登船检查。昨晚我们从赫鲁晓夫先生那里接到了一封信。不知你收到此信没有，如果你还没有收到这封信，让我在这里告诉你。信上说：这是海盗行为，说他们的船将要通过封锁线，并且不理睬这种做法，如果我们真的加以拦阻的话，他们将有办法来对付我们。这是昨天晚上来的电报。这就是我们这边的大体情况。

我看到过他致吴丹的信，我告诉他说，我认为写得很好。它的内容不但很巧妙，而且坚持说，问题在于撤走苏联的武器，同时还



坚持由史蒂文森和吴丹去讨论怎样办到这一点。我很想知道史蒂文森会采取什么办法。

同时，总统还告诉我其他的消息。

肯：我约在半个小时前接到了吴丹的一封信，此信比上一封的内容又进了一步。

秘书长现在说他正明确要求赫鲁晓夫使他的船只避开隔离区——他在上一封信中不是这种提法。总统对此表示欢迎，而且重复地说，假如苏联船只能避开隔离区，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207

肯：另一方面，我们在答话中指出苏联的船还继续开来。情况就是这样。一当谈判开始，我们就要指出，我们大家应该首先解决苏联来船的问题，对苏联船只我们一次还没有检查过，这将是一桩极为重要的事情，只有经过检查，我们才可能知道俄国人正在干什么。不过这事明天即可见分晓。一旦开始谈判，我们在开头就要指出，导弹基地工程还在进行中，必须使它停下来，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扩大封锁范围，并且考虑采取其他行动去制止它。但是我想这至少是二十四小时以后的事了。鉴于联合国现在已经插手这桩事，我想我们下一步要考虑一下怎样来进行第一次搜查。换句话说，我不希望正当吴丹看来已经使俄国人同意停止继续派船来的时候，而在明天同俄国船发生冲突，并且对它进行搜查。我希望到明天下午就可以明白，俄国人是否在预备性谈判阶段还继续派船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要由他们来承担责任了。

首相：这样来处理苏联船的问题很不错，但是你还得继续处理把导弹撤出古巴的问题，这该是你的一个主要问题吧？

肯：是呀，方才说过，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基于上述两点，我们将对俄国船进行首次搜查。

赫鲁晓夫仍然坚持不得搜查俄国船，而吴丹则向他呼吁在谈判期间停止派船前往古巴。假如俄国人停止派船的话，局势就会缓和下来，可是假如俄国船继续前往的话，总统就得于次日下午某时去

冒搜查或是击沉俄国船的危险了。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克服了第一个难题,并且还能着手进行谈判的话,我们还得坚决要求他们停止  
208 仍在进行中的导弹基地工程。否则我们就得加紧封锁或者还要采取其他行动。这将是我们在谈判中首先要提出来的问题。

肯:即使谈判不马上开始,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星期六提出这一点。

首相:是呀,这一点我是很明白的,我认为你非这样做不可。不过我深切认为这事应该分为两个阶段来处理。第一个问题是苏联船,接着才是在古巴的苏联武器这个真正的问题。

肯:我说过,那十四艘返航的船显然里面是有鬼的,他是不希望让我们把它拿到而公诸于世的。那些继续往前驶的船也许没有装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过我们不能允许由他来决定哪些船可以开过来哪些船不可以开来。不过我说过,我想我们在明天晚上就会对下列各点更加清楚了:联合国的行动,以及赫鲁晓夫对继续派船的态度,还有他对我们搜查他的船只可能采取什么态度。

首相:好,那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总统先生,要是我明天晚上打个电话给你或许是有好处的。你意下如何?

肯:第一点,我们于明天晚上将会明白赫鲁晓夫会不会接受吴丹关于在谈判期间停止派船前往古巴的建议。第二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对我们搜查他们的船只时会作出什么反应。所以我想假如你不感到太晚的话,我可以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首相:那好极了,这对我是很方便的。多谢多谢,明天晚上再谈,晚安。

肯:晚安,首相。我将把赫鲁晓夫昨晚的来信送给你看。晚安。

在星期五(10月26日)有大量函件不断往来。虽然赫鲁晓夫通知吴丹说,他已经命令前往古巴但“还没有到达采取海盗行径的美国舰队活动范围区”的船只避开拦阻区,但他在他的回忆录(假定这本回忆录不是伪造的话)中说,“我国船只载着应交给古巴的  
209 剩下部分的货物直穿过美国舰队。”在此同时,空中观测揭露了一

个可怕的事实：导弹的炮位已经竣工，他们很快地把导弹安装上了。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

和总统的两次长时间的谈话内容。形势十分难以捉摸而危险。这是对意志的一种考验。<sup>①</sup>

通过我和肯尼迪的第二次的交谈，想出了一些新的主意。

首相：你方才提出的主意是要通过国际保证使古巴成为象比利时那样的国家——成为一个不可侵犯的国家，我们大家都要保证它的中立和不可侵犯的性质。这是否有可能？

肯：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事，我们将在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中，讨论一下是否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获得解决。只要是卡斯特罗掌权，俄国人也许就能自由地运进更多的进攻性武器，他们其实也已经运进不少了。我们发现了很多有着极为尖端的特殊装备的自动推进的装甲车等，不过这事只是一种可能。我也许可以在明天晚上向你提供更多的这方面的消息，目前至少已经有人提出了一两点暗示，不过还不足作为讨论的依据。

首相：好，我想另一个可能性是：吴丹自己可以向联合国提议，由他带领一个小组前往古巴，以便保证使这些导弹在举行任何会议或是谈判的期间不能使用，我相信他们是会接受这个建议的。

肯：对，可能在技术上需要有一些方法来确定在谈判期间这些武器是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而且还要确定修建导弹基地的工程是处于停止状态，你说得对。

首相：对，不过你想吴丹会不会……我确信要是哈马舍尔德的话，他是会这样做的。吴丹会不会向联合国提出要这样做呢？他也可能自己带领一个小组前去，并且使这些武器在谈判期间不能使用。

肯：是有过这种提议的。他们还要去视察在佛罗里达、尼加拉瓜、危地马拉以及天鹅岛上的某些难民营。这就是吴丹和（史蒂文森）州长会谈的主要内容，我正在对之加以研究。我认为我们在那些地方是没有什 210

---

<sup>①</sup> 1962年10月26日。

么不便让人家视察的东西的，不过这只是我们鉴于吴丹和州长的会谈而正在研究中的那些政治建议。首相，总起来说，就是等到明天早晨或是中午，我们才可以知道究竟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接受的政治建议，而且俄国人是否也对它感兴趣。我想到明天下午，我们就会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在这同时，不管他派不派船来，海上隔离办法仍继续下去。今天下午我们让一只船通过了，在大约四十八小时内不再会有什么其他的船开来，所以我们想，在海上不会出什么事。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他们继续修建基地的问题，今天我已就这事发表了一项声明。

他答应把关于上述政治建议以及吴丹和史蒂文森会谈的更为详细的一份报告送来，以便我于次晨看到它。

首相：我们感到还有第三点须加以考虑。如果我们要帮助俄国人保住面子的话，在同一期间——就是会议期间——是不是我们把在英国这儿的导弹撤除？

肯：好，让我把这一点用录音机记录下来，以后再和你联系。

首相：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可能有助于俄国人去接受我们的建议的主意。

肯：的确是这样，首相。让我把这一点通知国务院。我想我们是不愿意拆除过多的导弹的，不过也许这个建议会有用处；他们还可能坚持要我们撤走在希腊、土耳其以及意大利的导弹，不过我会记住你的这个建议，如果他们这样提出的话，你的建议可能是有好处的。

首相：好，我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在古巴的导弹还没有那么多。

肯：对。你听了艾德莱·史蒂文森的报告，就会从他同吴丹的会谈中想到这一点。

首相：唔，假如您认为我们还可以提出什么其他的建议的话，是否请你在今晚发给我一份电报，以便我们明天同你联系。

肯：对，首相。为了我们对这个会谈内容作出分析，我们只好等一等。我还没有看到会谈的全部内容，不过我认为用这些导弹来换取一些关于古巴的保证，其前景还是十分渺茫的，我在实际上还无法确定局势



是否有缓和的可能。也许在明天晚上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更加清楚一点。

首相：是呀，因为你在这个阶段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必然会在柏林引起对我们大家十分不利的后果。这就是当前的危机所在。

肯：唔，由于他不让他的船开过来，并且我说过，根据你所提的那个理由我们今天还放行了一只船，我们是不会碰上什么问题的。在另一方面，假如过了四十八小时，我们仍然搞不出什么名堂而且他们还继续修建导弹发射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去作出严酷的决定。

首相：当然我们在作出这些决定时应当明白，这对柏林以及古巴都是会产生影响的。

肯：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没有采取比迄今所采取的更为激烈的措施的真正原因。不过反之，假如让导弹发射场的工程继续下去，并且完成了，而我们还不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末我想，这无论如何也会对柏林产生很大影响的。

首相：是的，我想这就是困难所在，不过，目下我们总还有这么一些政治计划在进行中，请允许我给你发一信，把这些计划的内容告诉你，也请你把史蒂文森和吴丹会谈结果的记录寄给我。

肯：我准备给你发出一份根据史蒂文森和吴丹会谈内容而写成的备忘录。我还要在明天这个时候和你联系，要不就在明天向你发出一份电报；如果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我会立即给你发电报。还有第三点：总之，我在同你商量之前，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明天不想打电话给你了，因为明天晚上我可能离开这里，我想你也可能离开，不过假如发生了什么新情况，我会打电报给你的。总之，在我们采取果断的措施之前，我会同你通电话。

首相：谢谢。我明天整天都在，所以明天或是星期天你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找到我。

接着总统暂时离开了这些重大的话题，扯了一会其他的事情以便让我知道：他为了要把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在北约组织的值勤期间延长到年底这一点，准备向我提出正式请求，以便使这位将军的继任人兰姆尼兹将军和他有六十天的交接时间，“这样就可

以使兰姆尼兹较能适应自己的新任务。”我想他与其说是担心我的反应，还不如说是怕戴高乐会作梗，因为他说过，“戴高乐对于北约组织的事务是十分敏感的。”我对于这项看来是合理的打算，当然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肯：好吧，我将在明天就这件事通过（通常的）途径同你联系，我还要在今晚把关于和吴丹的会谈的备忘录送给你。希望一切顺利。

首相：唔，多谢，多谢。邦迪自然总是可以打电话给这里的德朱鲁塔的。他们彼此可以通话，所以谈起来很方便。

肯：好，首相。回头再联系。谢谢你，晚安。

首相：晚安。

俄国人此刻提出了一项相当恶毒而阴险的建议。他们要把已经运进古巴的导弹和美国在土耳其的火箭进行讨价还价。国内外一些软弱的人自然会赞成。幸而总统早在星期六就发表了声明说，只要“眼前苏联所制造的威胁结束了”，就可以探讨涉及“这个半球”以外的国家的安全的建议。这个危机完全是由于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所引起的。必须停止基地的修建工程；不能提供进攻性武器；必须停止运进新的军事物资，而且所有这些必须经过有效的国际查实。这个答复是巧妙而令人信服的。

虽则我准备同意，但又真的提出：在谈判期间，在总的谈判处于成败未决的情况下，可以暂时拆除在联合王国的导弹，这仅是设法为赫鲁晓夫找出一条退路而已。尽管有人可能认为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已经落后了，我仍是决不会同意把这作为永久的交换条件。不然的话，美国的所有盟国都会因此而感到：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古巴的威胁，竟以取消对它盟国的保护做交易。尽管肯尼迪的  
213 谋士中有人对他施加了压力，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从不动摇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赫鲁晓夫提议以在古巴的导弹来同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交易的那封措词严厉、而且颇为刻板的信，是紧接着另

一封冗长而噜苏的信而来的，这封信是在前一夜接到的，其内容大不相同，此信有着赫鲁晓夫私人信件所特有的激昂情绪。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信中向肯尼迪呼吁，要把世界从迫在眉睫的劫数——核战争的必然结果——中拯救出来。同时，他颇为天真地宣称，在海上航行的苏联船并没有运载什么导弹，因为他们早已把导弹交给古巴了——这是首次承认在古巴存在导弹这个事实，和苏联的部长们的再三表白的话大不相同。不过赫鲁晓夫在信中建议，假如肯尼迪肯保证美国“不参加对古巴的袭击并且解除封锁的话”，那么他就同意不再把导弹运进古巴，而且还将批准把已经在古巴的导弹撤走或是销毁。这实际上完全迎合了肯尼迪的要求，等于是彻底投降。

第二封信于星期六早上到达，它注销或者可以说是收回了第一封信中所说的话。随之还发生了引起极度忧虑的其他事件。美国保安警察报告说，俄国驻华盛顿和纽约的人员正在销毁他们的机密文件。有一架美国飞机在古巴上空被萨姆导弹击落了，这个有意识的行动危及美国的整个侦察系统，这个系统对美国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在星期六危机似乎已达到了顶点，美国人除了发动攻击之外别无他策了，至少要摧毁其萨姆导弹的发射场。

如果说在接下去的三十六小时中，在华盛顿是不好过的话，在伦敦又何独不然。可是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俄国人还是露出了一些软下来的迹象。在过去二三天里，据说有一个俄国的使馆人员以相当迂回曲折方式多次向外交部联系，建议：假如英国政府发出一项呼吁，要求召开最高级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局势还 214 是可以挽救的。这项建议是由一位德高望重的保守党议员于星期六下午向我直接传达的。我和霍姆都认为，头几次的建议只不过是企图离间伦敦和华盛顿的阴谋而已。我甚至感到连最后这一次呼吁似乎也包含着一个骗局。不过我们现在获悉，他们于星期六

那天在华盛顿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也是通过中间人提出的。

在那危急的一天里我们整天在等着听消息,而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则努力去寻找采取军事行动以外的办法。直到星期六深夜,肯尼迪听从他的弟弟的建议,才采取了一个灵巧而且后来证明是成功的行动。他决定去作出最后的努力,聪明地不去理睬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而却给他发去一信,表示欢迎而且同意第一封信中的建议。星期日早上,在接到任何新的消息之前,

我决定(巴特勒、霍姆、桑尼克劳夫特和希思都同意)发信给赫鲁晓夫,我们支持美国所提出的把导弹撤出古巴的要求。我向他呼吁去这样做,并且还要他去做其他更有建设性的工作——裁军等等。我们的信是在中午十二时发出的。就在我们大家一起正要吃完午饭时,(无线电)传来了俄国人屈服的消息!①

这样一切全都过去了!赫鲁晓夫的答复真的等于是彻底投降。他同意在充分监督和视察之下撤走导弹。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在传达这一项有历史性的决定时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说,赫鲁晓夫“希望向总统致意”,这项决定实际上使危机告一段落。我们在那几天里既感到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又不得不把它掩盖起来,我和我的同僚们经过了这样的几天后,终于能够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几乎有着从一个高潮中一下子冷下来的感觉,共同感到即使不算是一种胜利也可算是一种宽慰,并有感激之情。我们原来真是处于悬崖的边缘,几乎马上就要掉下去了;可是这个世界终于侥幸地从千钧一发中得救了。

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不过这些困难都只属于次要的。吴丹到古巴去商量撤出导弹的技术细节。卡斯特罗起先既不答应让导弹撤走,也不答应放弃手中的轰炸机。于是赫鲁晓夫不得不派米高扬去说服他。撤除导弹发射场的工作终于开始了,而一面美

① 1962年10月28日。



国还继续对古巴进行封锁。到11月12日，有四十二枚导弹被拆下来了，苏联当局允许美方从飞机以及船只上进行肉眼视察。不过当我于11月14日同肯尼迪再次进行谈话时，还有些可以忧虑的事情；

肯：关于古巴以及轰炸机的事进展还不大。

首相：关于轰炸机的事怎样了？

肯：有可能使他们把轰炸机撤走，不过他们要求我们取消隔离措施以及空中侦察，而且要象我们对古巴那样他们要对佛罗里达州进行视察。我们不想为了这些轰炸机而再进行海上隔离。唯一的问题是：究竟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或是采取其他行动。例如，我们可以说，整个交易已经做完了，并且撤回我们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在总的方面来刁难他们。首相，我想我准备就我们打算在古巴怎么办这一点给你去电报。我应该感谢你为我所作的判断。我将在明天给你发电报，我们或许在星期五就可通电话商量。

首相：谢谢，你一定不能向他示弱。

肯：问题在于是否要继续进行海上隔离或是空中侦察。但我会就这事给你送份电报来。

经过双方耍尽手段之后，而且尽管有人对总统施加压力要放俄国人一马，俄国人于11月20日终于正式同意把轰炸机撤走，美国也终于解除了封锁。最后一批轰炸机是于12月6日确实离开了古巴。

我于11月4日试着写出自己的感想：

重大危机使人无暇写下日记，可是由于事情本身又真正引人入胜！……

事情已经经过一个星期了——至今还搞不明白……

216

同上一个星期比较起来，(本)星期很象是并没有度过那样——有那么多的函电和电话联系，还有想去做一些事情的强烈欲望，虽则自己明白(除了同总统交谈并且使欧洲和英联邦国家镇静而坚定之外)，不去做

任何事情也许就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还由于这一星期中的其他工作)我至今感到十分疲乏。我渴望能连续休息几天,但却办不到。我现在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不是象自己年轻当军官的时候那样容易恢复疲劳了。可是这却是一次关系到一切的决战。我正在(桦林居)家中,我必须设法去分析一下自己的想法。(我在自己于星期二向下院所作的发言中,相当完整地叙述了实际的经过。)……唯一不巧的事是我们已经决定通过外交途径把我们的信送交赫鲁晓夫。这就意味着,当俄国表示“软下来”的无线电报到达时,我们才发表这封信。这几乎象是我们在赛马结束之后才发出押注的电报。在其他方面,我认为我国干得很出色。我国是“清楚其事”而且充分介入(并且几乎也承担)美国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的责任)。我国完全镇静的情绪有助于使欧洲人保持镇静。①

整个欧洲自然是相当恐慌的。

不过他们说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有碍美国手脚的事。

下列各点似乎是我们的主要疑问和想法,

(一)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导弹(运进古巴)?

人们普遍认为,他自以为可以暗暗地完成这项工作而不被发觉,或者以为只要(象他那样地)矢口否认这一事实,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随着他否认之后,所有的其余共产主义国家以及《论坛报》,《曼彻斯特卫报》也跟着这样说,甚至《泰晤士报》起先也不大相信有这一回事)。

他希望这项工程完成,乃于11月底前往联合国,就柏林问题提出要挟,然后透露出自己在古巴已经集结的力量,一面把导弹指向美国的“软腹部”,提出警告,限美国于三分钟内而不是十五分钟内答复。(当然,对我们这些面对着俄国指向欧洲的无数这类导弹的人说来,在古巴的区区二三十枚导弹又何足为奇。不过我对总统说过,当一个人生活在维苏威火山时,就不去考虑到火山爆发的危险了。)对于赫先生的动机的这个解释,似乎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一直说在美国大选(11月初)之前不去制造任何麻烦。他的意思是,等到导弹在古巴安装妥当之后再说。

(二) 赫花费了多少钱?

---

① 1962年11月4日。

他花了不少钱——也许有三亿至四亿英镑。必须为此租借或是提供一百艘以上的船只。我们估计约有一万名俄国军事人员在这个岛上。除了进攻性武器之外，还有许多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当然只有俄国人才会使用它们。还有大量其他军事物资——坦克、大炮等等。

（三）他为什么在星期六提出要把古巴（俄国基地）来换取土耳其（美国基地）？

这个关于基地的阴险的主意，受到了不论是在这儿还是在中立国以及不结盟国家中的一切比较软弱的人士的大力支持。当然我们是无法把已经在欧洲对峙了十五年以上的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的军队，和突然加于西半球的导弹威胁来相提并论……赫肯定是明白自己可以得到很多的……支持的。这样做的确就得去承认在古巴存在着弹道导弹——他本来是一直否认有这回事的。可是美国空中侦察摄影也实在太高明，而且毫不放松，以至无法一笑置之。这项古巴—土耳其交易自然会大大有利于美国。土耳其的基地是有用的但不是主要的。古巴的基地却是至关重要的。我向总统提议过，假如要这样办的话，还是用我们的（导弹）来做交易为好。因为英国的舆论对于这个做法是受得住的；土耳其人则会感到被出卖了。（这一建议虽说是没有必要但却是有用的。）不过（美国人）在星期六明白了，任何这种交易都会对北约组织造成重大损害。

（四）他为什么突然放弃土耳其—古巴交易，而发出了星期天的那份电报，从而在实际上认输了？

这就是关键的问题，它的答案是关系重大的。他为什么不在例如柏林这些地方采取反措施呢？他是不是马上就要这样做呢？或者是不是在土耳其还是在波斯这样做呢？这当然还是一个谜，每一个大使和外交专家都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他明白美国人对此很认真，会去攻占古巴。（他们本来准备于星期一上午这样做。人们多半预料于星期一（29日）去进行这种袭击的。总统在那个星期的头天，约在23日或是24日，告诉我说，从他发表演说那天——星期一即22日——算起，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来从事“军事集结”。）美国的这次进攻是无法用常规的手段来阻止的。所以俄国人可能不得不“先下手”而使用核武器。他们

不愿意面临这种抉择——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要是美国人发动进攻的话,可能采取下列三个措施:(1)摧毁卡斯特罗和共产党政权;(2)大大打击俄国人的威信;(3)缴获导弹。所以从表面看来,赫鲁晓夫是“认输”了,但他至少避免了上述的所有不利情况。这样,在第(1)点上,卡斯特罗以后还会使美国人感到极为头痛。在第(3)点上,俄国人将可收回自己的导弹。在第(2)点上,由于这个花钱的小小的投机买卖失败了,在这个意义上俄国人是失了面子的——不过这个损失还没有美国入侵古巴所引起的损失那么大,俄国是无法也不敢阻挡美国入侵的。所以他决定尽量去减少自己的损失。

#### (五) 什么是我们在战略上的一些经验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会不会是这样:在谁也不敢发动的可怕的核战争的阴影之下,可以通过常规战争的办法来为所欲为?美国可以拿下古巴。敌方只能以全面核战争来回答。不过这一点也适用于柏林。俄国人可以用常规方法占领柏林。盟国却不能以任何常规方法来防守或是收复它。(这样推断出来的结论是相当可怕的。)

#### (六) 在古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等等?

联合国(吴丹等人)和美国将会发现卡斯特罗这个人很难对付。他自然为俄国人添了不少麻烦。他们已经不得不派米高扬去应付他。不过这只不过是关于弹道导弹的事情而已。其他防御性武器仍将照旧不动(萨姆导弹等等),而且古巴仍将是整个中南美洲的共产党宣传基地。

219

#### (七) 处理危机的办法

肯尼迪总统以高明的手腕、极大的精力、机智和勇气来处理事务。他用共产党人自己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因为他们总是使用好几个而且甚至是大不相同的方法去达到他们的目的。(甲)他一直在军事上采取坚决的策略——行动迅速,一经动员就可以随时采取行动。……不能让“一支入侵的军队”老是徘徊不进。它要末就发动进攻,要末就解散掉。肯尼迪总统并没有虚张声势——不过大家都知道(假如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话)他是会发动进攻的。(乙)他把外交上的这张牌打得非常出色。在欧洲的盟国以及其他盟国对于美国不找他们商量实际上也没有



什么可埋怨的地方。迪安·艾奇逊的匆匆欧洲之行以及对北约组织理事会的通知，已做得十分周到了。(丙)他在联合国中的那一手也十分令人钦佩……肯尼迪大大动员了联合国内的舆论，并且利用史蒂文森……去使联合国保持平静。假如把问题谈到底，那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中就不可能取得多数国家的支持。所以他们明智地不让这事闹到安理会以外去。俄国人在安理会厚着脸皮撒了谎，犯了致命的错误。当赫鲁晓夫提出用古巴的导弹同在土耳其的导弹做交易的信发表时，佐林还在否认在古巴有导弹呢！

总之，总统干得非常成功——而且得到下面这些人的有力帮助——腊斯克、史蒂文森、邦迪(还有我们英国的代表戈尔和迪安)。

#### (八) 英美关系

反对党(在某些报纸——特别是“专栏作家们”和随笔作者们——的支持下)在(上)星期二(当时盖茨克尔提出了下述的议论)以及星期三(当时哈罗德·威尔逊对那个论点进一步加以发挥)的辩论中声称：美国人不仅不找我国商量，而且把我国全不放在眼里；“英美特殊关系”原则不再适用了；我国作为核大国一无所得；美国不顾我国或者欧洲而在同苏联的争吵中冒全面战争的危险。他们所以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在于(1)不明真相；(2)想对我个人加以伤害和诋毁；(3)反对保有核威慑力量；(4)对美国在古巴取得成功——或是相当的成功——感到不快；(5)出于羞愧——因为他们公开说过他们要反对暴力或者反对以暴力来威胁别人。当然在事实上，总统和腊斯克(特别是总统的“秘书长”麦克乔治·邦迪)一直和我以及亚历克·霍姆保持联系。大卫·戈尔也一直进出于白宫。整个经过就活象一场战役；我们身处海军部大厦，感到似乎自己就置身于作战指挥部之中。

电传打字机和电话(通往白宫的直线秘密电话)一直畅通无阻。

我们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好了，以致使这种反对或是批评的态度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我们正在设法去透露真相。……它会从白厅渐渐地传到伦敦交际界去再从那里普遍流传出去。不过这是相当教人厌倦的事而且还带有一些危险。决不能让英国人民感到自己受人冷落

了。<sup>①</sup>

赫鲁晓夫于 11 月 27 日给我写了一封信，它为这段骇人的插曲写了一句最奇怪的结语，他在信中说：

我完全同意你和肯尼迪总统的见解：即，古巴危机使我们对于迅速解决严重的国际问题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想法——不过他却还有不少话没有说出来。

---

<sup>①</sup> 1962 年 11 月 4 日。

## 第八章 变化中的东方

### 一、印度和中国

认为遵循同一基本原则的主权国家应该在它们的对外关系中执行一项共同的政策的那种信念，是既庸俗又不切实际的。历史表明，即使在例如宗教改革后的宗教派系斗争时期中，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大国，也由于相互猜忌而无法同心协力去攻打英国、荷兰和德国的闹宗派分立和赞成异端邪说的政府。伊丽莎白女王就是主要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才能维持其统治。即使作为意大利政治势力之一的教廷，也受到了这些相互对抗势力的压制。教皇保罗四世时代所发生的一桩事件，就是一个这样奇特的例子。那时，阿瓦公爵正带领一支忠心耿耿而虔诚的天主教军队向罗马进军，大有再度占领罗马并加以洗劫之势，而教皇却是由德国新教徒的军队来捍卫的。他们是一批粗鲁鄙野的士兵，“肆意侮辱路上和教堂中的圣像，对天主教徒举行的弥撒礼横加嘲笑……他们犯了数以百计的种种罪行，要是处在其它情况之下，教皇肯定是会把他们全都处死的。”<sup>①</sup>

这个时代过去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主要的欧洲国家由于它们的物质利益或统治者要发扬本王朝威信受其野心所驱使而发动战争。甚至在1789年以后，虽则革命理想和固有的“反动”观念在开头是有矛盾的，可是不久，战争的性质就变成了法国和它的统治者为实现其扩张主义的梦想，和受威胁的欧洲国家为争取独立和生存而进行的一场斗争了。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如 222

<sup>①</sup> 兰克：《教廷史（1842）》，第一卷，第229页。

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巨大斗争中，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互不相容的原则，也并没有阻止斯大林和希特勒共同密谋去掠夺他们的邻国。俄国人至今仍然保有他们的战利品。德国人则做得太过头了，他们得不偿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大获全胜，野心勃勃，要通过马克思教义的传播，在意识形态和物质领域里都去推行扩张的计划。可以设想，它的伟大的领袖对中国共产党人要去完成这个幅员广大而人口稠密地区的政治变革的努力，本来是应该表示欢迎的。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斯大林不是由于天生的猜疑心理——他阴沉气质的突出特征——就是由于想到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所表现的独立自主的做法，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将领们显得很冷淡，而且他似乎害怕他们会取得成功。铁托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取得对全国的控制后，就不听莫斯科的指挥了。当中共的胜利已成定局以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大国在表面上的确维持了好几年的融洽关系。假如他们对彼此的领土要求和野心互相有所猜忌的话，而这些不应有的猜疑都因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谴责而被遮盖起来了。可是一当彼此的领土野心开始流露出来——一当彼得大帝的遗烈和沙皇的扩张主义的传统开始左右俄国的政策、一当中国领导人往往心怀不满地开始追忆他们过去西藏丧失给英属印度的领土、开始追忆过去满洲丧失给沙皇俄国的领土时——他们的关系先是冷下来，继之就变得十分紧张了。

而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莫斯科的作风开始发生了变化。在那里流行的“和平共处”的原则肯定是特别不投合北京的口味的。对于奉行马克思主义的严格的加尔文学说的中国人说来，俄国人的放任主义肯定显得是一种非严加申斥不可的“倒退”。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确清楚地透露了中苏领导人之间从1959年和1960年初开始积累的恶感。在1960年终以前，俄国就把它的技术人员从中国撤回，这一步骤无论是在实际上和心理上，都是很重要的。尽管



双方在报上、在言论中以及在无线电广播中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不过两国都通过一种典型东方式的手法，极力避免彼此作正面的指责。赫鲁晓夫明白指出，俄国人所使用的方式是把矛头指向蕞尔小国阿尔巴尼亚，来指桑骂槐地攻击中国巨人。因为阿尔巴尼亚不论是由于利害关系还是由于信仰，坚持了最严格的正统教条。虽然阿尔巴尼亚以后仍然是正式的攻击目标，中苏双方的裂痕在实际上却已经公开化了。这样总算体面地保住了彼此的“面子”。可是在1961年10月于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中，赫鲁晓夫的攻击变得如此猛烈，以致使中国人退出了会场并回到北京去。为此，苏联不象一般人可能估计的那样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而却是同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关系。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是在二十三大中拒绝了毛的主张的主要信条。我已经对他感到不耐烦了。<sup>①</sup>

这时，俄国领导人忘记了斯大林的暴行，几乎变得道貌俨然了。他悲伤地说道：

中国人不承认权力和暴力法则以外的任何法律。你不服从，他们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他们做得很巧妙：把你放在广场中央，当着成千上万的人的面前绞死你。这是什么性质的“政治”呢？甚至无法把它称为野蛮。它是更有甚于此的。<sup>②</sup>

甚至在当时，这些情况变化已经使我明白了，历史旧教训又一次证明是正确的。思想意识的一致并没有使共产党阵营比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欧洲各国更能自动地密切合作。

在这几年中，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也同样地变得紧张了。印度次大陆是在不幸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这些情况之一，就是把长期统一起来的广大地区分裂为二，这个地区先是在莫卧儿帝国统治 224

---

①②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伦敦，1971年版），第478页。

下,后来又在英国统治下统一起来的。这就必然产生了这种情况:即,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感到越来越无法执行任何一项共同的政策。它们之间仅有着英联邦成员国的这个不绝如缕的关系;可是它们却不仅由于宗教,而且还由于领土争执而存在着严重分歧。在这个领土争执中,巴基斯坦一直坚持要求占有克什米尔,这就象严重的伤口那样不断地化脓。英国政府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甚至好不容易地在利用印度河河水问题上,努力使双方达成某种合作,这条河对双方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样,虽则两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依靠英国和美国人民的慷慨援助,可是在中苏争执中,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自然而然地分别开始去偏袒一方。

1959年,中国平定西藏之后,中印关系恶化了,中国人声称西藏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所谓的西藏叛乱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许多虔诚的西藏人逃往印度,继之中国军队就越过了边界进行袭击,这事在整个印度引起了极其激动的情绪。在这桩边界纠纷中,双方对各种不同的分界线的划定有着许多针锋相对的争论,不论此事的曲直是非如何,中国人的暴行无疑使印度的所有种姓和阶级都大为震惊。自然,这对尼赫鲁本人说来,其痛苦程度几乎不下于刀割。他不论是写信给我还是对我面谈时,都以激烈的措词埋怨中国共产党人。<sup>①</sup>在此期间,我总是感到,这事使尼赫鲁大失面子。他一面早已催促我去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要在联合国中占有一席的合法要求。另一方面,他却由于中国领导人们的唯物主义和“两面手法”,而感到极度震惊和痛苦。曾经被认为可以使各民族自动做到和平相处的不可捉摸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原则,已经受到了无情的打击。自从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由于提倡和平而赢得了世界地位,他还为了实行自己的理论而谨慎地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所进行的冷战中避免“结盟”。不过这时他

<sup>①</sup> 《指明方向》原书第173页。

却认为，毛在理论上是和平主义者，而在实际上却是帝国主义者，只要他们能够提出他们在其漫长的历史的任何时候，曾经在一些地方有过某种古老的统治权或者甚至是宗主权，他就会要求在所有这些地方恢复中国的统治。这一切对他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是引起他去怨恨的原因。

可是迄至 1961 年底，印度政府却采取了一个类似的重要步骤。8 月，印度合并了两块面积很小的葡萄牙领土。该年年底之前，印度军队集结于葡属果阿的边界；尼赫鲁于 12 月 11 日以我们听惯了的话宣布“印度变得忍无可忍了”。英国统治结束之后，竟然在欧洲人手中还有着这么一小块地方，这是有点不正常的；虽则我认识到印度人对此所自然产生的强烈反感，我仍然极力劝阻尼赫鲁去采取那个看来似乎是纯然的侵略行为。我在 12 月 13 日呼吁他住手并通过谈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表示：我对于他所受到的压力，以及他要把看来是一种不合理的情况的遗迹加以消除的愿望，是完全理解的。

不过我深深地感到你的决定中还包含了一个涉及面更广的有关全世界利益的因素。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在你领导之下，在其独立的十四年中，已经赢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受人尊敬的世界地位，它认为，不管挑衅的性质是多么严重，使用武力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并且无论何时都要尽一切力量去探索其他办法。这一点已经，而且会继续为你提供这样的地位；它使你能够通过一直对我们大家最有益的方式，来从好的方面对国际关系施加影响。但是，在我国以及在其他国家的亲印人士们将认为：要是你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进入果阿的话，你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

我继续说：

最使我感到忧虑的是，事态使人们变得惯于以暴力来执行自己的政策了，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危险：即，人们越来越把采取武力看作为

达到自认为正确的目标的最好办法。在过去十年中，你在世界事务中所一贯采取的反对暴力的立场，就是对这种思想的有力抵制。你的以身作则对许多其他国家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唯一的保障的话，我就无法想象情况会变得怎样了。我确信，苏加诺总统在那时就会认为，自己对新几内亚的军事进攻是合情合理的，我担心，不少新成立的非洲国家也会采取同一办法，来解决彼此的争执和猜忌。

但是尼赫鲁写了一封冗长而客气的信来作解释。他宣称，印度公众舆论过去一直显出“非常忍耐的态度”，经过了这十四年后，他再也不能不动手了。于是印度军队于12月17日夜侵入了果阿。在安理会中提出的一项要求停火的决议，却受到了苏联的否决。果阿于两天后投降了，葡萄牙曾经通过宗教、教育和商业方面为印度带来的一切的这一段漫长而并不丢人的历史，就这样突然而粗暴地被斩断了。这个教训并没有被人忘记。我担心，这一事件不但会引起别人在远东群起而效尤，而且还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个迫不及待地去利用的机会。

早在1962年5月就有谣言流传，说印度政府即将向俄国购买战斗机——有名的米格式飞机，我自然地问尼赫鲁这些传说是否确实，他坦率地回答说，鉴于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以及印巴两国日益紧张的关系，他必须迅速设法增强他的空军。不过对于飞机的来源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美国人大为惊恐，美国总统亲自干预此事，提出要尽力帮助我们。我国的困难部分是技术方面的、部分是经费方面的。我国当时的新飞机“闪电式”刚刚投产，而且费用可能很大。要是我国肯冒险推迟本身武器更新的工作（空军司令部自然会极力反对这样做的），美国会不会在经费方面支援我国？我国的不知疲倦的英联邦事务大臣邓肯·桑兹正访问印度并和尼赫鲁以及他的部长们举行了几次会谈。克里希纳·梅农——显然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急于去进行同俄国的交易；财



政部长 M. R. 德赛则更为明智而且有经验，对于印度和俄国调情可能对美援所产生的反响极为敏感，而印度是很依赖于美援的。

虽然桑兹于6月19日报告说，尼赫鲁似乎由于英美两国的强烈反应而大大动摇了，他可能只答应推迟作出决定。于是英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商讨整个问题——商讨由英国提供战斗机以及继之将要在印度装配或是制造更多的飞机的办法。但是谈判旷日持久，毫无结果。我于8月初不得不向美国总统发出警告说，印度人似乎决心要同俄国人作成一笔交易了。8月17日印苏协定正式公布了。俄国同意提供十二架米格飞机，并且显然是免费的，此外还要允许并帮助印度制造俄国的喷气式引擎以供印度制造的飞机之用。虽然俄国实际只交出六架米格式飞机而且还是在一年以后才交货，不过这项协定仍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英美两国的公众舆论都由于印度政府明显地投入苏联阵营而惊惶。美国人还没有象英国人那样地领略过人家对他们忘恩负义的经验，所以就受不住而感到痛苦而且甚至恼怒了。

可是在几天之内就发生了一次新危机——只要德里同莫斯科和好，北京就不会有相应的友好姿态。相反，中印双方在相互发出了一些外交备忘录并且发生了一些微小的边界事件几个月后，中国军队于1962年9月8日在西藏高原越过了边境线。前线沉寂了几个星期后，中国军队发动了巨大的攻势，印度军队被迫在全线后退，尼赫鲁向我们发出了乞援的紧急呼吁，这同他在最近采取的疏远的中立主义的精神是不大相符的。我由于考虑到还是忘掉过去刚刚发生的事，并且强调一下英联邦团结的重要性为好，早就向他发出了一封表示同情的短函。他在10月24日的回信中，一面对我的友好言词表示热烈感谢，一面以沉痛的措词抗议“中国人在最近所进行的出乎意外的侵略行为”：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人不断进行具有侵略性质的入侵，我们一直争取通过和平谈判和协商来解决争端，可是中国军队自9月8日开始发动的侵略，以及庞大的中国军队从1962年10月10日以来沿边界线各段所进行的入侵，使我们除了抵抗之外别无他法。这会使我们背上极大的负担，不过我们决心不屈服于侵略。

你的充满好意的来信，以及你所提的要尽一切力量来支援我国的保证，更使我们决心去抵抗中国这次悍然发动的侵略。

这话的确大大不同于这位鼓吹不抵抗和“不结盟”的领袖过去所唱的论调。

当这些信件来往时，我们正处于可怕的古巴危机的当口。即使如此，我并不忘记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便向他提供一些援助。尼赫鲁这时向他的人民发出了爱国的号召，并向全世界请求支援。我在觐见女王时，先说明了尚未解决的古巴局势，然后对她详细叙述了中印战争的经过。我也指出了

尼赫鲁的变化过程，他先是学乔治·兰斯伯里，继之则不大象样地模仿起丘吉尔来。不过我想目前印度人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我们正运去大量的小型武器、自动步枪和军火。虽然接到消息不多，我猜想他们正在往后撤。不过一旦他们更接近平原并离开了高山，中国军队就不那么占便宜了。<sup>①</sup>

10月27日，尼赫鲁写来了一封长信，说明经过情况并且呼吁所有国家予以支持，

不仅由于他们同我们的友好关系，而且还由于我们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斗争，而这种斗争又是以消除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欺诈、虚伪和暴力手段为宗旨的。

229 我们已经开始尽力运去我们的物资。10月30日，在答辩中有人提到了这一桩事情。盖茨克尔叙述了边界纠纷的争论各点，并

---

<sup>①</sup> 1962年10月23日。

且竭力支持印度的观点，接着他发出了一个呼吁，要求英国和西方各国政府给印度提供援助。我在回答中提到了不久前的一些事：

虽然中国军队实际上于1950年10月进入西藏，中印关系一直很好。在1954年还宣布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友好关系的确臻于顶点了。在一年后举行的万隆会议又对此加以确认。

在以后的几年中，虽然发生过一些边界事件，不过影响不大，直到1959年和1960年，才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即使在那时，印度政府还是以特有的温和态度设法安排了一次尼赫鲁先生和周恩来先生的会议，以便解决争端。他们的会谈是成功的。

我指出，随着冬季的到来，沿麦克马洪线的东西两段的战斗就无法以目前的规模进行下去了，我接着说：

英国人民极其沉痛地看到了印度政府和人民目前所受到的沉重压力。我国和印度之间历经好几个世纪的关系，并不由于1947年宪法的修改而就此中断。我们两国之间仍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贸易和商业联系，这是令人庆幸的。来到我国的法学院和大学学习的印度留学生人数，甚至比以往更多了。最近，女王以英联邦元首的身份，对印度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成千上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印度人民对女王所表示的热烈欢迎，使全英国都为之雀跃。

英国已经向印度提供了很多的东西——它的统一的局面、它的边防、发展了一个质量很高的文官体系、根据我国制度而建立的一个司法体系、议会和民主政体。在某些主宰着过去十五年中的政治的大问题上，的确存在着分歧或者存在着在某些思想和政策上的分歧。我们彼此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的，不过我认为，我们一直是十分尊重彼此的观点的。230

我们之中荣幸地和尼赫鲁先生在私下有过接触的人们，一定知道他是如何重视他自己一直去争取的这些道义上和精神上的价值的。如果我们之中有人怀疑印度过去的观点是不是够现实，如果象我们这样由于肩负防务的重担，有时会对所谓中立主义或不结盟感到不耐烦，我们必

须公正地记住,这些概念之中,有着多深的印度哲学的渊源。

所以我们体会到了这位总理所遇到的悲剧,他作了多番努力,要同新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崇高而有道德的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关系,可是却突然发现对方粗暴而无情地采取了以赤裸裸的和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念为依据的政策,这时他自己就以沉痛的言词描述了这个悲剧。

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当然持着一种较为超然的看法。他指出,看来中国是不会跨出那条边界线的——即划定之前或者被英国强行扩展之前的老边界线,中国要求恢复这条边界线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还说,由于印度仍然集中其主要军队来对付巴基斯坦,西方国家用不着急忙去帮助它。我当然力图去使他安心。不过在这桩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印度次大陆的分裂状态一直是整个问题的主要特征,这种状态注定会对将来具有极其可怕的威胁。假如印度倚靠苏俄,那末巴基斯坦会不会迟早要和中国结交呢?以后事实的确证明如此。

在此同时,尼赫鲁在 11 月份一直向我和肯尼迪总统告急,请求把武器立即运送给他。美国人认为这些请求显示出“一种惊惶失措的状态”,因为其内容“涉及面极广”。我自然和英联邦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持密切接触。大家同意,除非能设法  
231 使巴基斯坦和印度达成谅解——即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妥协——美国和我们增加供应的武器和军需都只能适可而止。

这时,北京突然于 11 月 21 日宣布停火,并说中国军队要在 12 月 1 日撤到“1959 年 12 月的实际控制线”以内。过了几天,即可看出:就拉达克——克什米尔一带的边界线而言,他们打算占住的便是他们于最近发动攻势后建立的阵地。他们的目的自然在于修建一条战略公路,以便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在同孟席斯和霍利约克以及肯尼迪商量后,我和同僚们对实际情况仍然感到不大



明瞭，似乎最好还是派桑兹再去调查一下。英联邦关系部次官梯尔尼和帝国总参谋长里查德·赫尔爵士也要向我们提出报告，他们已先于桑兹前往德里了。

中国人提出停火而且后撤了，这显然已使局势有所缓和，不过中国成功地入侵印度之举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将是极为严重的。由于桑兹访问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后将对局势作出估计，并且我们可以据此设法为支持印度而助一臂之力，所以他的这次访问将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中国入侵之后，假如我们能使克什米尔问题获得解决的话，就会大大改善军事和经济上的形势，这也将是桑兹的主要目标之一。

当我正在等候这三份报告之际，我接到了孟席斯的一封信，信中包含了这样一个敏锐的判断：即中国军队的撤退也许会使印巴两国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协议的任何尝试都变得更加困难。不过他还是要尽力襄助，这包括在大家普遍同意的情况下向将驻扎在克什米尔的一个英联邦旅派出一支分遣队的措施。桑兹此行的成就仅在于：通过会谈后，尼赫鲁和阿尤布汗于11月29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宣布准备恢复商谈关于克什米尔的问题。至少是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两位领导人的会见使我想起了有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及吉罗和戴高乐勉强握手的情况。

232

英联邦事务大臣在议会中成功地发表了一项声明后，于这天稍晚的时候来访。他的确干得很出色，至少迫使了尼赫鲁和阿尤布汗去会晤。我很怀疑，举行了这次硬凑成功的婚礼后，到底会不会怀孕而且生出小孩来。

同时，帝国总参谋长从印度回来了。他的报告总的说来是令人鼓舞的：

陆军……打得不错，他们在某些场合中显得非常勇敢。指挥却是软

弱无力的。<sup>①</sup>

当我们正在等待尼赫鲁和阿尤布汗去举行会谈之际，我和肯尼迪就如何组织印度次大陆的防务问题，相互交换了不少函件。在那里没有防空设备，人口拥挤的城市极易受到空袭。他怎样能够向印度提供必要的援助，而又不必公开提出条件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出让步呢？否则只会引起印度作出忿怒的反应。不过我和肯尼迪在拿骚举行会谈之后，于1962年12月23日向尼赫鲁和阿尤布汗都发了信。我向尼赫鲁建议派出一个美英联合小组，去对防空的整个问题加以研究。除了谈到对可能部署于中印边境的印度陆军的一些师要进行武器更新之外，我还对他说明了我和美国总统所担心的

关于保护贵国的居民以免受到空袭之事。所以我和肯尼迪作出了如下的决定：要是你同意的话，我们愿意派出一个英美联合小组到印度来，和贵国的空军参谋部一起研究如何加强贵国的防空体系的问题。

我还说明我们如何渴望他和阿尤布汗的会谈能取得成果。我接着说：

233 我们在这儿拿骚商谈时，肯尼迪和我都丝毫没有想到过要以贵国和巴基斯坦解决现存的分歧，作为我们目前向你提供军事援助以应付眼下中国威胁的条件。不过要照我们所希望的规模来援助你，而又不至于严重损害到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其困难程度是用不着加以说明的。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我们英美两国自己国内的舆论。当此危急之际，我们两国人民对印度极为同情，而且真诚地想给以支援。在这同时，假如把本来可以用以防备中国的不少印度的军力钉死在巴基斯坦边境的话，他们的热情是一定会受到打击的。

我在写给阿尤布汗的信中，强调了避免仓卒作出结论的必要性。

---

① 1962年12月3日。

希望能够为一个存在多年的纠纷马上找出一个大家同意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要求过高了。在局外人看来，首先需要的似乎是彼此主动耐心地探讨任何建议，尽管双方在开头可能显得多么难以撮合。随着商谈的进展，双方就会更好地理解彼此的问题；参加谈判代表们之间，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和信任，这可能证明是促成协议的一个有效的办法。谈判拖延过久是不好的。在另一方面，要是任何一方过早地仓促作出结论，认为无法达成协议了，从而失去了取得成功的机会，那就将是可悲的事。

我在信中的其余部分，极力去抚慰由于我们增加对印度的援助而必然引起的巴基斯坦人民自然产生的忧虑。

这样，随着中国军队暂时从印度后撤，这一年就结束了，他们显然由于狠狠地教训了自己的邻人而感到心满意足。随着这一年的结束，至少也带来了一个希望：即这个巨大的次大陆的两个部分所进行的谈判，可能促成一个解决彼此争端的协议，这个争端从他们独立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彼此在一切方面的关系。

这些会谈刚在年底之前开始，但很快就在 1963 年 1 月休会了。由于巴基斯坦就它所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地区和新疆接界的那一段国境线，同中国达成协议，印度人显得很恼火。因为克什米尔边境这一地段是由于签订停战协定，巴基斯坦才占有的，所以印度政府认为这是“侵犯主权”。不过还是恢复了谈判，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虽然传来的消息并不令人鼓舞，我们至少对双方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还是抱有希望。正象我所担心的那样，谈判终于在 1963 年 5 月 16 日破裂了。

这个不幸而且显然是不可调和的争执，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向这个次大陆提供防御力量的困难。当谈判在进行之际，美国人对于“赤色”中国的侵略意图忧心忡忡，一直要求去采取某些积极措施。美国驻德里大使 J. K. 加尔布雷思认为，一定要使印度感到

自己足能对付中国而无虞，这样它就可以不再去想克什米尔问题。我对此感到十分怀疑，并且坦率地告诉美国总统说，我认为其结果会恰得其反：印度人越是感到高枕无忧，他们对巴基斯坦人就越寸步不让，这样后者就会倒向中国人。

最后大家终于同意派出了英美防空代表团，并将由澳大利亚参加。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是很难予以妥善处理的。肯尼迪和孟席斯对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有用的成员国巴基斯坦的立场感到不安。在另一方面，我却急于不使自己背上一个英国力所不及的“无底洞”的包袱。阿尤布和尼赫鲁之间的谈判破裂之后，肯尼迪变得更为坚决了。他于1963年5月22日发信给我说，假如我国害怕卷入，不愿派出一大队空军前往印度的话，美国只好“单独干”了；不过他还是很想和我国一起行动的。我们对这一切都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内阁终于在5月底同意派出一个战斗机大队，而且说是一种“训练飞行”的访问。我们明白表示，我国的空军在印度出现，并不意味着它在印度同中国人重新爆发的冲突中，负有任何参与战斗的义务。肯尼迪于6月1日同意了这项意见，他还加上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这位总统对于下列的主张是毫不掩饰的：即，假如中国军队要对印度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尤其是这种进攻危及不设防的印度城市的话，美国舆论将作出严重的反应。不过，在眼前并无必要作出确定的保证。经过一番说服工作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都同意，在两大队战斗机——英美两国各派一队——出发之同时，各派出一个代表参加空军代表团。

迄至年底，所有这些计划都取得了成果。在印度举行了有英国和美国战斗机和澳大利亚轰炸机参加的联合防空演习。尼赫鲁忠实地遵守了协议——他明白表示，纯然为了训练目的，而不是为了应付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而去组织一个空中保护伞，才去举行这些演习。



回顾这一段插曲时，英国人的怀疑态度同美国人的惶恐相形之下颇使人感到诧异。我们的顾问们正确地认为，中国军队不会越出最便于他们防守的那一条界线。他们进行了一次突袭，目的是要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中取得一条更为便利的国境线。他们不会进行大规模的人侵，我和我的同僚们同意了这种意见；可是华盛顿要比伦敦更为紧张，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是东南亚一切麻烦的根源。就是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后来使美国吃了多年的苦头。我们凭自己长期的经验坚信，虽则中国人可能利用邻近地区发生的任何麻烦和困难，但他们自己不会进而去采取冒险的政策。我们是一直竭力去促使印度次大陆独立以来的根本问题获得解决的。我们感到，主要的危险不在于大群中国人入侵印度并予以占领，真正危险在于我们于1947年急促地退出时所遗留下来的脆弱结构——印度分治——可能弄得支离破碎。以后的事态已经可悲地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 二、印度支那

236

纵使让印度次大陆独立一举带来了印巴分治的严重害处，不过多年英国统治却留下了一笔遗产，那就是，以经过印度不断充实的文官体系为基础的有效的基层、省和中央行政机构。所以继任的政府在其初期的领袖的英明决策下就能比较容易地去维持法制，并且能使他们继承下来的制度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印度，特别是在独立初期，国大党的压倒的权威，再加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英明领导，使人对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巴基斯坦先是在真纳领导之下，继之是在里阿夸特·阿里汗领导之下，开头的情况也很不错；即使不合于他们国情的议会政治制度容易产生很多祸害，但是在接下去执政的军人的领导下，在那里似乎还是存在着稳步发展的良好前景。的确，要不

是为了克什米尔这个脓疮，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原是不可能一直不错的；它们受到英美两国的慷慨物质支援和真正的同情，原是可以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而且，印度的各族人民，部分由于传统，部分由于经历了在英国统治下的长期安宁和进步，总的说来是有耐性而听话的。

过去由法国人进行帝国主义统治的印度支那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它在 1949 年独立伊始，就接着产生了纷乱和国内问题，这是同在共产党操纵下的毫不放松的外部压力有关系的。所有这一切都逐渐地、而且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南北越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使美国等于卷入了一场历经十年的战争。

237 不过当我在职期间，越南战争的第一阶段才开始。似乎还有希望使局势稳定下来。北越人的渗透规模还不小。的确，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要防止他们把邻国柬埔寨和老挝也卷进去，并去利用后者作为物资和游击队通过的走廊。

1954 年 5 月，由于艾登的出色和不懈的外交活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促成了有关各国——英国、法国、美国、俄国、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控制着北越的共产党组织越盟的代表们——之间的一项协定，这次会议约在法国于奠边府遭到惨败以及法国军队终于撤出越南之际召开的。虽然美国并没有签字，不过他们宣称，自己是会“遵守这个解决办法”的。然而，福斯特·杜勒斯采取的这样一个生硬而无益的态度，却是一个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它给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项协定要求在两年内，于越南全国举行大选之前，在北纬十七度划定一条停战分界线。北纬十七度至今在名义上还是一条分界线——可是却从来没有举行过选举。

同年稍晚时候，美国政府利用其影响，在所有争权的各派中，帮助了由吴庭艳所领导的那一派，使其获得成功。1954 年 10 月，

他的政权受到了英国、法国、美国以及某些其他国家的承认。不过吴庭艳一直激烈地反对日内瓦协定，其理由是：这个协定使他的国家分裂为二；他坚决拒绝采取任何措施，以便作出使国际委员会能够去主持选举工作的安排。

在1961年，主要困难产生于老挝，因为北方的共产党人——当时称为越盟——在战略上有必要去占领老挝或对之进行渗透。不过老挝政府和共产党军队在1961年5月，达成了停火协定，并且又召开了一次日内瓦会议，参加者除包括已经参加过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们之外，还加上作为国际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印度、加拿大和波兰，再有缅甸和泰国。这次会议结束于1962年7月23日，当时达成协议，至少在字面上同意保障老挝的中立。一切外国军队都必须撤出，由上述各国组成的一个国际委员会，受委托监督这项工作的执行。不过在这一大段时间里，共产党人不仅在老挝，而且在柬埔寨和泰国也继续施加压力。由于后者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即使在日内瓦会议开会期间也必须保障它的利益和领土的完整。

238

1961年秋，越共——共产党游击队——不顾停火协定，开始再度渗入老挝去攻击南越的一些据点。有必要去考虑某些至少能维持现状的计划了。我于1961年6月15日写道：

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共产党人正在破坏停火协定。<sup>①</sup>

不过虽则老挝国内继续处于动荡之中，三位老挝亲王——文翁亲王代表右派，梭发那·富马亲王代表中立派，而苏发努冯亲王则代表巴特寮——却一直以超然的态度，在平静的瑞士的环境中，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谈判。

我在这时一直亟欲去探索某种办法，以便维持停火状态，或者至少对无关宏旨的违反行为，视而不见。我于1961年7月5日写

<sup>①</sup> 1961年6月15日。

信给外交大臣说：

俄国人正是希望当柏林问题接近严重关头时，看到西方陷入其他问题之中，不得脱身。我们目前要尽量使日内瓦会议开下去，以便把整个老挝问题暂搁一下。

美国人自然开始感到不安了，在日内瓦，不论是从三位亲王那里，或是从会议本身，似乎都听不到好消息，我担心，在华盛顿的主战派会因此取得上风。我于1961年3月和总统在基韦斯特会谈时，对陷入这些荒凉的地区的危险性，对他发出了警告，我们在那里没有基地，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和战略目标，没有任何有效的体制来部署武装部队或者来控制地方行政机构。至此，我感到以前和他商定的一切临时性协议都已经无效了，而且我也这样地对他讲了。如果要联合王国承担责任的话，就要重新得到内阁的批准。我于9月15日在写给女王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在这一时期中的忧虑，这封信对当时有点错综复杂的局势作了综述：

当我们接触到老挝问题时，美国政策的双重性就显得比它在欧洲所表现的更远为糟糕了。总统和腊斯克先生似乎正渐渐地取得对欧政策的控制权。而在远东，我认为，虽则腊斯克国务卿在总统支持之下，是绝对讲信义地执行大家同意的争取老挝中立化的政策的，不过国务院的部分人员和在当地的美国人却存心要去破坏它。一项新的第五号计划（它的正式名称）中的一些建议——即由东南亚条约组织武装力量来进行干预的计划，以便至少保证这个国家的部分领土不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已被军方所拒绝，而且这些建议不久就会被有意地泄露给富米将军。这就会使这位关键人物越来越不愿意去赞同任何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越来越希望谈判破裂后美国会进行军事干预。哈里曼先生办事十分诚实，他明白会发生什么事情，并且正以全力来对付它，不过我却担心可能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正当欧洲的危机深刻化之际，却可能要我们在远东进行军事干预。

我于9月16日从外交大臣接到了一封教人安心的信，从而大感宽



慰。由于“在托盘里”有这么多的问题和困难的事需要处理，总统显然不愿卷入对老挝的军事干预。他认为，我们这时应当在外交上坚决支持富马。在当他的美国官员们会不会去执行总统的指示又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接着传来的消息说：三位亲王已经回到老挝，并且同意让富马当首相。可是由于各种考虑，并且显然由于不愿意去应付严重的局面，他们却无法决定如何分配各部部长的职位，而在较先进的国家中，这种局面有时会表现出议会领袖的特殊性格。所以虽然大家选定了首相而却无法组织政府。 240

当戴高乐于 1961 年 11 月底来拜访我的时候，我们对局势作过了一番讨论。他只提出一点意见——法国要在老挝留驻一个军事代表团，而且要尽力去促成一项协议。可是美国却在此时采取了一个步骤，这一步骤成为他们此后漫长而痛苦的经验 的开端。一个规模很小的干预，往往会使自己陷入长期而无法脱身的纠缠中去。1961 年 12 月 11 日，美国直升飞机和教练机连同四百名军事人员到达西贡。当然，其目的只在于协助南越政府去培养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当时我看不出有什么再严重的发展情况，12 月 13 日我向女王提出的报告中写道：

在此同时，南越局势正在恶化，美国正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只差没有进行实际的军事行动——这无论如何应付不了此种渗透的。

不过继这第一步之后，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其速度比我所担心的为快。2 月 8 日，华盛顿正式宣布成立一个拥有四千名人员、“以训练为目的”的新的美国对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同时，老挝的形势继续处于纷乱和动荡之中。俄国政府似乎由于局势可能继续发展而感到惊慌。于是在 1962 年初，葛罗米柯和霍姆，作为原来的日内瓦会议的联合主席，发表了一项声明，催促敌对的三方，在三位亲王领导之下，去成立联合政府，并且埋怨说：虽然大家对老挝中立化的问题已充分达成协议，可是成立一个

稳定的政府一事，却由于他们三派之间的不和而迟迟不能实现。3  
241 月底，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在老挝成立以富马为首的联合政  
府的原则。

1962年5月，战火重燃，共产党军队占领了老挝的一个大城  
镇，并且进到泰国边境。

老挝形势突然恶化了。经过了数月的争辩仍无结果（这是由于美国的代理人富米寸步不退之故，他后来证明是一个不听话的代理人），巴特寮——共产党人——破坏了停战协定，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在一处竟到达了湄公河和泰国边境。老挝保皇党军队都拚命逃跑了，把他们的（美国）武器丢给了共产党人。<sup>①</sup>

对泰国的这些威胁引起了新的纠葛，而且此事和英国政府的牵涉较大。

老挝政府军队在南塔吃了败仗，使泰国大为惊恐。巴特寮以及他们的共产党支持者们入侵泰国的进路似乎是畅通了。泰国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忠诚成员国，在必要时，理应受到支援。美国人是十分愿意来提供援助的。

总统开始派出一支舰队，并且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不过（迄此为止），这都是根据美国和泰国之间的双边约定而进行的。这样要是不马上进行会商的话，我担心东南亚条约组织一定会卷进去，这就意味着要派出英联邦旅和更多的英国军队。<sup>②</sup>

我立即通知孟席斯和霍利约克说：如果我们接到乞援的正式要求，就要派出一大队猎人式战斗机。孟席斯很得体地回答说：假如泰国人提出请求，澳大利亚就要派出喷气式飞机到泰国去，不过他殷切希望，即使某些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并不提供什么援助，还是应该用东南亚条约组织名义和履行该条约的义务的名义来采取一切行动。霍利约克作了类似的答复。他愿意派出由“丛林部队，一些

---

<sup>①②</sup> 1962年5月14日。

运输舰也许还有一艘快速舰”组成的一支小小的兵力。他以素有的明智态度补充说：“我们感到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家在泰国看到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国旗。”<sup>242</sup>

内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

大家同意，一旦泰国政府要我国派兵的话，就派出一支多少带着象征性的兵力到泰国去。可以把皇家空军的一大队猎人式飞机再派到那里去。它们最近曾经去泰国进行过演习。不过泰国人既然诱使美国人派进了相当多的地面部队，我不相信他们真的需要我们。不管怎样，内阁算是同意了，而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也这样做了。<sup>①</sup>

自然有必要在下院宣布此事，我在同日下午就这样做了，这引起了一场司空见惯的大争吵。

工党左派（在自由党人支持之下）要想根据议事规则第九条，让下院实行休会。议长也如平常一样拿不定主意，他起先拒绝接受这项动议，接着又同意了。（我认为他的第一次决定是错的。）可是只有三十六个议员站起来，而且另一项要求在午后七时进行辩论的动议，也在表决时被否决了。<sup>②</sup>

不过在下院所取得的胜利，并不一定就会使六千英里以外的地方的经济或政治形势好转起来，而且虽则我们遵照条约作出了十分适当的行动，我却更急于去赶紧进行日内瓦会议。只要老挝稳定下来、只要柬埔寨保持相当的平静状态，泰国的形势就会很快好转。

6月12日，三位亲王终于同意成立老挝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以富马为首相兼国防部长；文翁亲王将退隐，而另一个右翼份子富米，则和苏发努冯同样地当上副首相。这次在日内瓦的谈判经过了数个月的挫折后，突然取得了成功。它为结束日内瓦会议，并且为签订关于老挝中立化的协议以及撤退外国军队的安排作了准

<sup>①②</sup> 1962年5月17日。

备。当时俄国政府似乎亟欲使情况稳定下来，这就引起了我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一些令人愉快的电报往来。联系到在短短几个月后我们所遭到的古巴事件，赫鲁晓夫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中的措词，的确显示出他的多才多艺和喜怒无常。他于6月12日写道：

从老挝传来了好消息。由于在老挝的三股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已胜利结束，一个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老挝民族团结联合政府顺利地成立了。这项行动无疑会成为老挝人民本身生活中的转折点，而且会成为在东南亚巩固和平的事业的转折点。老挝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为在极短期间内结束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进行的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的工作，并且为实施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协议，开辟了一条途径，这些协议为老挝作为一个中立而独立的国家的发展前途，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老挝的例子表明：如果有着在相互顾及各方面的利益而进行合作的基础上，去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的愿望，这种合作就能带来应有的效果。解决老挝问题的成果也增强了有可能遵照同一方针进行合作，去成功地解决其他国际问题的信念，这些问题正使各国不和并且引起世界紧张局势。至于苏联政府，他们过去一直是坚持这个方针，而且还继续要坚持这个方针，在目前情况下，这个方针是国际事务中的唯一正确的符合于和平利益的办法。最后，我希望表示：对于作为日内瓦会议联合主席的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配合一起，在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而扫清道路的工作中所起的有益作用，我是感到满意的。

我寄出了一封措词恰当的回信，对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想法表示同感。

现在，是轮到柬埔寨人了。西哈努克亲王抱怨说：泰国人和南越人都不断侵犯柬埔寨的边境。他希望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保证他的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以个人名义向我发出了一份冗长的、说得头头是道的抗议书，以配合他的呼吁，我只好回信说，虽然我十分同情柬埔寨要保持“独立自主的中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不过我感到在一开头就应该取得泰国和南越的同意。俄国人和法



国人联合起来去支持西哈努克的建议,可是我和肯尼迪都认为,还是看看老挝的情况发展如何再说。在这里,美国军队至少遵照最近达成的日内瓦协议而撤出了,而且据说巴特寮军队也撤走了。不过双方却频频相互指责,说对方破坏协议。

至于泰国,情况已大为好转,使我们能在1962年11月16日,把我国的部队撤回。由于老挝问题获得了解决,其他盟国也仿效了我们的这一做法。不过形势仍然不稳。肯尼迪和我为此通过电话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那时古巴问题刚刚解决,所以我们两人都感到比较轻松。我写道:

昨晚又通过电话作了一次长谈。新的电话机是(一)更好了——通话时就象是使用普通电话机那样;(二)更安全——需要用九十年的时间才能识破它的密码;(三)是英国制的。是我国的一项成就!①

对于老挝的协议将遭到破坏,我们两人都感到有点担心。我们的谈话部分涉及古巴,我劝总统要坚持叫俄国撤走轰炸机。至于老挝问题,

我们将试图派马尔科姆·马克唐纳(现在正以普通公民身份在东南亚游历)到老挝去,以便向梭发那·富马打气。他是“温和派”领袖,是老挝和局的关键人物。据说他很消沉,扬言要回到巴黎去,在那里有他的财富——还有他的心肝(他的几个女儿)。②

西哈努克一直要求向柬埔寨提供国际保证,我和同僚们虽然乐于作出某种声明,却对具体措词感到十分为难。提出保证而却无力去履行,是危险的权宜办法。 245

这样1962年终于结束了,在东南亚,1963年的第一个月过得比较平静。不过在1963年春,老挝局势却不断恶化了。三个集团之间并不存在真诚的合作关系。右翼的军队盘踞着湄公河的低洼地区,巴特寮占领着北部和东部山区,而中立派则不稳固地控制着

①② 1962年11月16日。

政府首都万象。发生了一些暗杀事件和零星的战斗。以波兰人为一方,和以加拿大人以及印度人为另一方的不和,再加上巴特寮拒绝同他们之中任何一方合作,使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了阻挠。在另一方面,俄国人似乎仍然真的急于要避免发生麻烦,于是葛罗米柯和霍姆终于能够于4月21日至少安排妥一次短时间的停火协定。巴特寮和中立派于1963年7月初重新开始谈判,但是不久就在相互指责声中破裂了。

在南越发生了新的骚乱——处于吴庭艳的不那么直接控制下的统治集团据说是基督教徒,他们和佛教徒发生了火并,引起了一些伤亡和深刻的仇恨。尽管有关方面设法去调解此事,可是夏季还不曾结束,却又重新发生了纠纷。

我于1963年10月去职之前,局势大体如下:泰国情况比较平静;在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对侵犯他的边界的行动特别担心,甚至疑心重重。他声称这种行动是来自泰国和南越的,这也许是言之有理的;在老挝,有着零星而无结果的战斗,大体上是由巴特寮来采取攻势的,他们当然是受到北越政府和急于使通过老挝的供应线保持畅通的越共游击队的支持的;在南越,由于政府的无能——内部的不和、各派在行动上缺乏有效的配合——能成功地抗御南下的共产党人的前景看来是黯淡的。

246 在接下去的几年中,美国越卷越深,它终于发现自己派出大量兵力而却无法对当地政府进行有效的控制,并且还遇上打一场遏制战的严重的战略上的困难。这种情况对于美国国内的人心和在国外的威信都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是后话了。美国的政策恰恰造成了我于基韦斯特首次同肯尼迪总统会晤时,就冒昧地警告他去防止的那种局面。然而英国人民不应该对此加以苛评,他们也常常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境地,被无情地拖进自己没有预见到的义务中去。对于我们的忠实的盟国所遭到的困难抱有一种敬而憫

之的情绪,似乎是比较适当的。

### 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假如说在印度次大陆,把权力从英国手中移交到继任的政府手中的措施,在经过初期的恐怖和屠杀的可怕阶段后至少还是达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的话,继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崩溃之后,却在那里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个斗争至少在越南还在继续着。在马来亚,反对共产党侵略的类似斗争却于1961年夏出现了十分令人鼓舞的局势,这使我国能够顾及更广的事务了。

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在英联邦内的完全独立,新加坡则于1959年被授予国内自治的权利。由此,我才能够结交上马来亚的出色总理东古·阿布杜·拉赫曼,他通常是以“东古”一名而见称,不久我们就成了知交。在我们英联邦总理开会讨论时,他说的话总是很生动的,而且一般说来是明智的;他由于热爱足球赛,尤其是当讨论的内容似乎和他的人民牵涉不大之时,有时会因此而逃避开会,虽则我有时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不过我和同僚们总是喜欢和他在一起,而且从他的经验和智慧中得到裨益。我也同样地认识到李光耀这位极为出色的人物,他是新加坡新政权的最有权力的总理。 247

马来亚的相对平静的状况,是由于长期不断努力的结果,从1948年的中期起约经过了十二年后,终于在1960年6月底正式结束了紧急状态。在相当于美国人后来在越南所遇到的棘手的困难面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几乎是完全由于杰勒德·坦普勒将军干劲十足地领导下的英国殖民当局——政治、警察、保安和军事当局——的勇气、决心和才干。他们以包括二百五十名英国士兵在内的数达万名的伤亡为代价,把革命镇压下去了。和平的或者比较地和平的秩序建立起来了。这对于不论是马来亚人或者是

中国人的全体居民说来，都是极为有利的。如果为了维持这种情况，必要时继续让殖民当局享有不经审判而拘留人民的权力，这种代价该算是低的了。

新加坡的形势也并不轻松。李光耀老是希望有可能和马来亚更密切地联合起来，他并且为此试图在他的多民族的人民中去打击华人的沙文主义，扩大忠于他的力量。可是在 1961 年的头几个月中，根本的紧张局势变得无法加以掩盖了。很难使非马来种人，主要是华人去忘记自己的本源以及自己和祖籍的联系，很难使他们真正地忠于一个在另一个民族的领袖们领导下的新近成立的国家。所以当东古于 1961 年 5 月 27 日在一篇著名的演说中宣称，他的国家有必要和新加坡以及英属沙捞越、文莱和北婆罗洲建立更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时，这通常被理解为要求成立大马来西亚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似乎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在新加坡所引起的反应并不是不好的；而当有人于 6 月 20 日在下院提出质询时，我认为，至少理应小心翼翼地表示一下欢迎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人民才开始享受着独立的种种乐趣，也遇上独立的种种危险，他们至少有这么一个要求我们去支持他们的权利；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可是尽管东古满怀热情并亟欲迅速解决问题，一直到 1963 年 7 月 8 日，才达成最后的协议。拖延的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事关重大的防务问题，这包括英国和在该地区的主要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这里也牵涉到其他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利益。第二个原因是有必要去说服而不是去强迫这些英国仍然对之负有责任的各国人民去参加这个新组织。

8 月 3 日，在伦敦举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后，我向东古发出了一封长函，我一面在信中对他的雄心勃勃的、有想象力的建议表示欢迎，一面也试图多少约束一下他的急性子。



在防务方面，继续使用我国在马来亚以及其他有关国家中的重要基地和设施是极为重大的问题。当然，目前在东南亚的困难局势，以及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维护那一地区对我们的信任，使下述这一点变得极为重要，即万万不可说出任何不妥当的话，以免使英国在这一地区维持防御力量一举受到怀疑。我们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朋友们，当然也对此直接有关，我们希望同他们商量。

至于婆罗洲属地，我听说您亲自刚访问过文莱和沙捞越。这样您就可能对那里的形势以及人们对你所设想的范围较大的联合的意见如何，得出一些初步的印象。我们的看法是，在同马来亚的某种联合下能最终找到他们的政治前途，这种想法是有吸引力的。这意味着，假如做了过细的准备工作，而且大家普遍认识到范围更大的联合的好处的话，婆罗洲属地是会自动而且自愿地加入的。我确信您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鉴于在这一地区紧密的政治联合牵涉到那里众多的民族而已公开表现出疑虑和犹豫，这在初期阶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切不可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我们毫不顾及他们的意志，就擅自决定他们的前途。 249

我已有过准备不充分而筹建联邦计划的某些不幸的经验教训。我肯定不希望产生强迫结合的情况。

东古在回信中向我明白表示：虽则他为了遏制共产党的威胁愿意把新加坡纳入新联邦中而且要从速进行，不过他几乎无法应付大量增加的华裔选民，除非这种不平衡状态能通过增加马来族选民的办法而加以纠正；只有三个婆罗洲属地才能提供这些选民。从而，我们就必须决定是否要把在新加坡以及在婆罗洲各邦的主权都放弃掉。关于防务问题，虽则他感到可以在现存的防务协定范围内作出一些安排，但是他的话不太具体。

成立了一个大臣委员会去研究整个问题，英联邦事务大臣和殖民大臣都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事情还不能急于求成。我当然认识到，李光耀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共产党的政变，会被迫要求或者强行在新加坡宣布完全独立；如果不从速实现联邦

的计划，这一点就成为真正的危险所在之处。可是我却<sup>不</sup>准备被迫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仓卒的决定。我国对于自己曾经如此长期而有效地治理过的属地的居民们负有责任；我国对英联邦，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负有责任，我们的决定对它们的防务利益是有重大影响的。于是，我就邀请东古<sup>尽</sup>速前来伦敦以便进行详细的商讨。他由于任务多，直到11月的最后一周才到达；不过他这样一耽搁，却至少使我有机会就上述两个问题同孟席斯和霍利约克交换意见。澳大利亚人自然对婆罗洲以及更为重大的防务问题，都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所以孟席斯于10月18日所写的来信是很有意义的。我已经于事前把情况详细告诉他。

250

对您的10月4日来信表示谢意，该信把您对东古所说的关于大马来西亚计划的话告诉了我。我完全同意您对此事的处理办法，我还由于东古不久将和您在伦敦会面而感到高兴。

我特别注意到了你强调要让婆罗洲属地各族人民自愿地和马来亚联合这一点。我认为，联合王国政府或者马来亚政府打算让其他考虑凌驾于民族自决原则之上的任何建议，都将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特别在婆罗洲会立竿见影。这就会损害到达成更广泛的联合的前景，而即使联邦建立起来也会破坏它的稳定性。如同您的声明草案所说的那样，必须在作出关于移交主权的约定之前和婆罗洲属地进行磋商。我认为您就此点向东古所提的意见，是既有见识又及时。

毫无疑问，成立大马来西亚对于英联邦战略后备力量参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和作战行动方面的影响，将在您同东古的商谈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希望及早尽可能具体地告知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预定目标，以及您认为可以为联合王国所接受的最低条件。

作为进一步商讨的准备，我向他，还向霍利约克发出了一份关于我国国防战略的重要文件的摘要，其中特别述及即将在马来西亚发生的变化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我还向两位总理提醒：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之外，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事实：即，

我们在国外的基地是有赖于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好感和支持的。新加坡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在那里，上述的支持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将来国防战略中，政治和经济策略将必然起较大的作用，而老式的军事方法则仅起较小的作用。在另一方面，我国军队日益增大的机动性将会部分补偿上述不足之处。同时，我建议让我所极为信任的海军大臣卡林顿去访问堪培拉和威灵顿，并在归途中访问华盛顿，以便在我们同东古商谈之前，举行紧急防务会议。不巧由于澳大利亚即将举行大选，使这个计划无法执行。不过我在东古前来讨论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之前，还是通过不断的函电往来，充分了解这些可靠的朋友们和同僚们所怀的主要忧虑。 251

总的说来，事情进行得很好。东古素来是热情洋溢的，这次更是满怀信心。商谈主要是由英联邦事务大臣和其他大臣来代表我方进行的。迄至 11 月 22 日，我终于能够同

东古和马来亚人举行会议，以便就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基地已达成的协议举行签字仪式。该协议的防务部分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殊非始料所及）。<sup>①</sup>

虽然马来亚和成立后的大马来西亚联邦不会正式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不过新加坡会继续在海港出入和其他设施等方面提供充分的便利。特别是鉴于东古在前些时候所作的（或者说体现他的旨意）的某些声明，能够做到在将来无限制使用新加坡基地这一点，确是我国谈判代表所取得的一大成就。

不过主要的政治困难仍旧存在——怎样才能确实知道将要加入联邦的新地区的各族人民的意见呢？但是 we 和东古都同意为此设立一个机构。我于 11 月 22 日写给女王的信总结了所有这些谈判的结果。

---

① 1961 年 11 月 22 日。



陛下将会知道东古已于本星期前来伦敦，商讨关于建立一个包括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建议。这些谈判都是在十分友好气氛中进行的，而且已经达成了协议。主要的政治问题在于如何确知北婆罗洲和沙捞越人民的意见。为此，已经决定成立一个由英国以及马来亚政府所任命的委员会，它将设法去了解这些地区人民的想法。主要的防务问题是要确定，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的情况下英国是否继续对其履行英联邦的责任和国际责任。现在我们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可以为任何目的去使用我们在马来西亚联邦中的一些远东基地，这一点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从长远看存在着危险而使人感到某些忧虑外，眼前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印度尼西亚的敌对态度。若干年前我和苏加诺曾作为尼赫鲁的座上客在德里见过一面，此人完全就是我当时他给我的那种恶劣印象，爱浮夸，野心大，秉性残暴。在那受民众拥护的独裁者的外表掩饰下，爱国者的理想似乎早就没有了。他的统治注定是不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不过在他当权的时期，不仅对他本国的许多阶层，而且对他的近邻以及对外部世界，都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威胁，的确东古主要是由于印尼统治者的压力，以及处于他的东侧的共产党活动，才这样急于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如今，苏加诺开始威胁着要攻击荷属西新几内亚，由于他在1961年圣诞节宣布将它改成一个新的西伊利安省，而使这个地区更为不稳定了。这就是于圣诞前夜突然发生而且影响到我这几天休假的一些麻烦的问题之一。

整个早上都不断有电话打来，内容是关于(1)刚果(2)西伊利安—印度尼西亚(3)科威特。

在(1)点上，阿杜拉—冲伯协议似乎就要垮掉了。这将是很糟糕的，这样我们就会重新回到我们上星期好不容易挣脱的政治困境中去。



在(2)点上,(在果阿事件鼓舞下)印尼人似乎马上就要发动攻击了。这自然使澳大利亚人大为紧张而惶恐。

在(3)点上,关于伊拉克首脑卡塞姆将发动进攻的谣言甚嚣尘上。我们已经使军队处于警戒状态,以备科威特人要求我们去支援不久前接替我们的阿拉伯联盟军队。<sup>①</sup>

这些就是一个现代的首相在节日中所遇到的有点烦恼之事。

然而我们还是决定加紧进行工作,虽则这个马来西亚计划总的说来似乎是以东方式的慎重态度进行缓慢,但于1962年2月初,随着科博德勋爵被任命为联合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已开始跨出了第一步,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的各民族对于现在新的大马来西亚计划抱什么态度。科博德勋爵长期以来一直是英格兰银行颇负盛名的行长,他肯去担任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使我大为高兴。我于2月3日写了如下的信给他:

在马来亚联邦总理的赞同下,我写此信给你,以对英国和马来亚政府把你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一事加以确认,这个委员会将对沙捞越和北婆罗洲进行调查。

这个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鉴于联合王国政府和马来亚联邦政府的明确协议,认为把北婆罗洲和沙捞越(连同其他地区)包括在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联邦中,是一个符合有关地区各族人民的利益可取的目标,委员会将:

(甲)调查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各族人民对这问题的意见;并且

(乙)根据自己对这些意见的分析再提出建议。

对于你同意去担任这个极为重要的调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和东古·阿巴杜·拉赫曼是非常感激的,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对英国和马来亚政府决定下一步怎样办,将有极为重大的关系。

这个委员会如期出发,并能于1962年7月初之前完成它的报告。驻新加坡高级专员塞柯克勋爵是我们在所有这些工作中的最得力

<sup>①</sup> 1961年12月24日。

的顾问。他在国内曾经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由于他的政治经验，我可以大大地倚重他的意见。

254 塞柯克勋爵和夫人以及 R. A. 巴特勒夫妇来吃午饭。就马来西亚一事作了长谈，所涉及的是东古下月来到这里时我们将遇到的那些相当棘手的问题。<sup>①</sup>

不论委员会的报告内容如何，要执行这个计划肯定会遇上困难的。

7月4日，我们接到了科博德勋爵和他的同僚们的建议。对于大马来西亚的目标大家是一致拥护的，不过英国委员们和马来亚委员们之间，对于在必要的过渡时期中，应以什么形式来管理婆罗洲和沙捞越这一点，有着严重的分歧。东古显然不喜欢下述的这种建议：即在当地可以找到适当的接替人选之前，把要从婆罗洲和沙捞越撤出的英国官员们留下来，并在内政上赋以全权。在另一方面，我们感到一旦大马来西亚成立，就立即把对当地风俗和人民毫不了解的马来亚官员们强加于这些地区，是不妥的。不过内阁一致同意，我们可以在下列精神下来支持成立大马来西亚的目标：即我们是能够找到可以接受的办法以便解决过渡性质问题的，而且这个办法将会充分保障婆罗洲地区居民的利益。我根本不想再同东古进行商谈了，因为他已经在一封措词有点尖锐的信中表明：如果不以他的官员接管新地区的内政的话，他将拒绝承认正式的统治权。不过我们之间的首次会议还是进行得很好。

11—12时和东古会晤。这是我们两人就成立大马来西亚问题而举行的一次单独会谈。在一阵轻松的谈话之后（他似乎已经收回自己威胁的话了），双方部长和官员也参加了一起会谈，大家对工作计划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举行了午宴。<sup>②</sup>

谈判是由邓肯·桑兹老练地加以掌握的，他现在兼任英联

---

① 1962年6月29日。

② 1962年7月17日。

邦事务大臣和殖民大臣两职。经过了大约十天的会议后，取得了很好的进展，迄至8月1日，桑兹终于能够以他新的身份在下院作出了详细声明。同时“科博德委员会”的报告也发表了。桑兹宣布新的马来西亚联邦将不迟于1963年8月31日，亦即在一年 255 内成立。届时英国政府将把沙捞越、北婆罗洲和新加坡的统治权移交给新联邦。文莱的苏丹还没有正式加入，不过也已经公开宣布支持成立新联邦。

英联邦事务大臣在其向下院所作声明中强调，虽则在原则上已达成了协议，还需要就这个计划的所有各点进行一段时间的详尽商讨，这包括对下述事项所提供的必要保障：

宗教自由、教育、联邦议会中的代表名额、当地民族的地位、对迁入人口的控制、公民资格以及各邦宪法。

他继续说：

为了尽可能顺利地实行新的联邦体制，而且要尽量不打乱现存的行政安排，在移交统治权之后，将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期间，有些宪法上赋予联邦的权力，将暂时委托各邦政府来行使。

将尽速成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由英国、马来亚、北婆罗洲和沙捞越派代表参加。它的任务是商定将来的宪法并制订出保障两个地区的必要制度。

将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的殖民国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和马来亚联邦副总理东·阿巴杜·拉扎克即将前往沙捞越和北婆罗洲去指导协商。

为了维持行政管理效率，英国和马来亚政府对于尽量留下将要撤退的官员的重要性，有了一致的认识。这位国务大臣将同各地区政府以及助理人员商讨如何最妥善地处理此事。

在临近年底时，在文莱有些马来人发动了一次反对苏丹的小小 256 暴乱。

在文莱出了事情。约有二千至五千名叛乱分子夺取了壳牌石油公

司的炼油厂，企图把苏丹赶走。这无疑是由苏加诺在印尼酝酿起来的。我一直担心，一旦西新几内亚的问题解决了，荷兰人被“赶走了”，他就会在婆罗洲动手。<sup>①</sup>

我们迅速地采取行动，把叛乱镇压下去，我在派出三千名英国军队后不久，出现了下述情况：

文莱当地的局势已处于控制之下，不过印度尼西亚以进行干预相威胁。我怀疑他们是存心要迫使我国采取强硬态度，以使他们有借口来没收我国的巨大投资。他们把荷兰人勒索得精光之后，就要对英国开刀了。<sup>②</sup>

警报频传，他们甚至提出了威胁。

我们接到了关于印尼觊觎北婆罗洲的十分惊人的报告。他们似乎就要再度去“煽动”文莱的叛乱；将在婆罗洲进行大规模的越境渗透（那里是一片热带丛林），并且也许还要公开地从海上发动攻击。我们已经准备好更多的军队和飞机，而且把我们的这种做法尽量加以宣传。这会在当地产生很好的效果。<sup>③</sup>

此刻菲律宾有点出乎意料地对北婆罗洲提出了领土要求；不过我们对这项荒谬的无耻要求坚决地予以拒绝后，他们似乎缩回去了。同时，这个新联邦显然将不会受到它的邻国的欢迎。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复杂。存在着危险——但是主要是渗透和颠覆的危险而不是大规模战争。<sup>④</sup>

同时，在文莱的骚乱开始扩大，在新加坡、沙捞越和马来亚本身，赞成和反对成立联邦的两派的争吵也日益尖锐。迄至4月，印尼不断派出武装部队对沙捞越进行袭击，有必要把一些英国和锡克族

---

① 1962年12月9日。

② 1962年12月24日。

③ 1963年1月28日。

④ 1963年2月17日。



的援兵调到边界来。至此，苏加诺就在国内打击各石油公司以作 257  
为报复。

印尼人要没收壳牌石油公司——五千万镑的财产在一天之中就化为乌有了。除了进行战争之外，似乎是无法挽回的。美国人毫不在乎。美国政府无法应付一个“苏伊士事件”，而且美国(在当地)的石油公司将会感到很高兴。一旦委内瑞拉变成共产党国家，并把所有的美国企业和特权没收掉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得克萨斯州和加拿大会成为受益者，因为除非俄国人来帮助，我不相信他们能生产出同样多的石油。①

我于5月27日写信给苏加诺，告诉他说，拟议中的涉及壳牌石油公司的法案是带有“没收性质的”，而且一旦予以实施就会“严重地损害到英国——印尼的关系”。同时印尼和石油公司的谈判进行得似乎还有希望。

我们决定不受国外压力的干涉，并且于1963年7月8日签订了马来西亚协定。文莱的苏丹对加入联邦的条款感到无法同意；因此这个联邦只将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现在叫做沙巴)。这个成就完全归功于英联邦事务大臣邓肯·桑兹的坚持。他耐心、勤勉、彬彬有礼而又镇定，几乎完全凭着自己的意志和魄力，完成了这项艰难的计划。

我于午夜前往马尔巴勒大厦去签订马来西亚协定。这是一个十分激动人心的时刻。除了文莱之外，其它所有各邦都“参加”了。文莱的苏丹十分固执，他同现代世界隔离得相当远。他仅有八万名臣民而且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宪政改革。不过他每年从石油中有一千万英镑左右的收入。所以(他)是一个令人欢迎的伙伴。②

此时有人建议由印尼、马来亚和菲律宾等国政府的首脑召开一次所谓“最高级会议”，会议将于7月30日至8月5日举行。我

---

① 1963年5月20日。

② 1963年7月8日。

确信,东古不至于上当。

258 肯尼迪总统进行干预,并且呼吁把正式建立大马来西亚的日期从8月31日推迟,否则他认为会“破坏”最高级会议,这就使情况更为纷乱。外交大臣——霍姆感到为了使美国保持“友好态度”,可能以接受这一要求为宜,不过他也承认这对苏加诺说来反正是一样的。我并不准备用妥协态度来争取或者证实自己同总统的友谊,这种做法并无必要,甚至也不见得是慎重。所以我对肯尼迪坚定地回答说,日期问题我们必须让东古去决定。我们确信,苏加诺的真正目的是不让我们使用东南亚的基地,从而阻止我们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起作用,美国在该组织中是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的。

关于马来西亚的所谓“最高级会议”的消息不明。我担心东古会被迫屈服于印尼人(这正是美国人所希望的)。虽然美国总统及其政府由于最近印尼既威胁英国石油公司也威胁美国石油公司,而稍为明白了一些,不过他们是较为“倒向”印尼人的。但是我确信,应该去反对肯尼迪总统要使我们自动提出延期的企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东古一定会把失败的责任推到我们的身上来。<sup>①</sup>

结果在马尼拉会议上,大家同意推迟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一面要求联合国在马来亚、印尼和菲律宾所派的“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对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沙巴)进行民意测验。我对此感到担心,不过我们无法拒绝东古自己同意的事情。于是我叫霍姆发表声明说:如果联合国能在8月31日之前完成它的报告,而且这份报告毋需联合国本身或者三个派出观察员的政府确认的话,我们就同意在马尼拉所作出的决议。吴丹立即接受了第二点,不过他要求延长期限,并且答应于9月14日以前完成测定民意的工作。虽然我忧心忡忡,联合国秘书长还是老老实实地执行了自己的诺言,而桑兹

<sup>①</sup> 1963年8月5日。

则是毫不动摇地亲自到马来亚去为东古打气。

他这样做的确是很凑巧的，因为李光耀可能是由于不耐烦，或者由于想利用我们拖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这个机会，于8月31日声称，他要接管英国政府保留下的权力，并且宣布新加坡完全脱离英国而独立了。

从东南亚来的电报内容相当糟糕。我已叫邓肯·桑兹在（联邦成立）那一天前，要一直呆在马来西亚。但是（1）联合国会说些什么呢？（2）新加坡的华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这又一次证明了，放弃一个帝国要比赢得它要困难多少呀！<sup>①</sup>

幸而英联邦事务大臣充分保持冷静。他以纳尔逊的那种镇定自若的态度，对李光耀悍然违反宪法的行为视而不见，并且能够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前，使局势平静如常——他把这称做尽量维持局面——而在此刻，有关各方似乎都是决心要成立这个联邦的。他的这个策略大为奏效，9月14日公布了联合国写给吴丹的报告。调查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调查团确信，沙巴和沙捞越的绝大多数人民是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所以这个联邦就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了，以后就把这一天称为“马来西亚日”。

印尼和菲律宾马上拒绝承认，并且和马来西亚断交。在雅加达发生了暴动，把英国大使馆和许多英国公民的住宅破坏了。在印尼各地，无疑是在苏加诺的命令下，各工会企图夺取英国商业公司的控制权。9月20日，印尼政府不以对英国在雅加达的财产作了进一步的破坏为满足，又把所有英国的公司都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

我国在孟席斯和霍利约克的诚意帮助下，显然是能够依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来抗御任何来自印尼的威胁，并且能够保护马来西亚，使其不受直接或是间接的袭击的。我们只要在东古

<sup>①</sup> 1963年9月7日。

和他的政府的邀请之下,就能正当地做到上述这一点。

260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英国和锡克军队在支援日益壮大的马来西亚本身的武装力量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难以遏制的严重军事入侵。不过在这些困难中,有这么一点使我既担心又十分失望。将近9月底我接到似乎是可靠的消息说,两家美国石油公司在不顾壳牌石油公司的权益,而且在把它排挤在外的情况下,即将和印尼签订协议。鉴于我和美国总统多年来在各方面有过的密切合作关系,我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于9月23日写了一封抗议信。我本来希望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使三家石油公司和印尼政府就它们将来的经营问题,最后达成协议。虽然美国驻印尼大使正在催促印尼人在同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签订协议之同时,同两家美国公司德士古及美孚签订协议,不过现在看来壳牌石油公司可能会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劝告两家美国公司自行去签订协议了。

这使我大为不安。由于美国在东京和苏加诺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才达到了两个目标——保障英国的石油利益,并有效地显示出英美的团结一致。这就把这个好的效果白白地糟蹋了,而且除非我们两国紧密团结,在印尼投资的外国人的前途的确将是很不妙的。但是我决不单单想到商业利益。我们在东南亚正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局面。苏加诺显然是一心一意要破坏新的马来西亚的。鉴于我国的重大责任,我国不能袖手旁观。英国在道义上是应该介入的。可是只有当苏加诺十分明白西方国家是一致地反对他的巧取豪夺时,他才会住手。所以我呼吁美国重新考虑他们正向美国石油公司发出的指示。如果把壳牌石油公司排除在外边,它们就不应该签字。

总统的答复并不太令人满意,我感到他有些为难。美国政府似乎已经告诉过这两家美国公司,要它们就此事所包含的一些风



险，“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包括它们自己在壳牌石油公司被排挤的情况下的前景的问题。不过它们既然想单独干下去，强迫它们违反自己的决定去办可能是有困难的——并且这也许是很费钱的。但是总统还是马上向美国大使发出指示，要他尽一切力量以保证在东京签订的协定得到充分贯彻。他还要就允许石油集团分裂的最后影响问题，向美国公司提出进一步的警告。 261

在这同时，美国大使寄了一封私人信通知我说，肯尼迪对这事所显出的无力态度，是由于他得到过保证，说在任何的新交易中，都会把壳牌公司包括进去。这种说法似乎相当勉强，美国对更为重大的问题的态度也并不使我感到怎么舒服。华盛顿似乎决心要去讨好苏加诺，并且向我呼吁，要我使用我对东古的影响，叫他照美国的办。

苏加诺似乎是准备不带任何先决条件来同东古会晤了。虽然我认为应该把这一点通知东古，不过我感到他即使处于美国压力之下也不会屈服，这时美国人正直接向他施加这种压力。我已经明确地告诉美国人说，虽则东古希望达成缓和，不过在他的政府尚未获得苏加诺正式承认之前，不可能期望他去会见苏加诺。

这就是在我那届政府结束期间的大体情况。大马来西亚建成了，但是代价却不小。虽然我确知苏加诺为了实行他的共产主义兼沙文主义，本来一定会去没收在印尼的外国产业，不过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当然为他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这样，虽则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可是我和东南亚事务的联系却将在不大令人愉快的情况下告一段落。虽然我充分理解到总统所受到的压力，我回想到自己和他之间的裂痕时，也并不感到舒服。

也许有必要对接下去发生的事情作一个简短扼要的叙述。

事实证明，要把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不是轻而易举的。在东南亚的紧张气氛中，马来族人指责非马来族人和北京、印尼沆瀣一 262

气，而新加坡的非马来族(即华人)则指责中央政府在经济上对他们有歧视。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在压力之下”决定退出联邦。于是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并且还成为英联邦和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随着英国在远东军力的减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已经消除了彼此的隔阂，开始在防务以及其他事务上进行合作。沙捞越和沙巴继续忠于联邦。仅有文莱的苏丹，在他的臣民的明显赞同之下，决定不加入联邦，作为一个“英国的保护国”继续享受“帝国主义”的一切好处。

1965年9月，由共产党人图谋发动的一次政变，在印尼被镇压下去了，接着在全国各处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被共产党人内定为他们的国家元首的苏加诺总统，在名义上继续任职，不过已经没有权力了。到了1966年3月，假如还要估量他的能力的话，那么就处于完全不起作用的状态了。因为这时苏哈托将军实行了实际的接管。共产党被禁止了。从而在1966年8月11日终于结束了和马来西亚的“对抗”(即不宣而战的状态)。1967年3月12日，苏哈托将军成为具有全权的“代理总统”。这样印尼的反革命政变尽管有着伴随而来的种种恐怖，却至少为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带来了和平以及日益增加的繁荣。

## 第九章 西南阿拉伯地区

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港、亚丁——过去英国就是长期依靠这一大串堡垒来维持它在整个地中海和中东的势力的。直布罗陀是关系到当年英美在北非军事部署的枢纽，后来证明，这种部署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马耳他奇迹般地经受住了它所受到的可怕攻击，它在从西方通往东方的航线完全被切断的情况下，在那些艰苦的年头里，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亚历山大港和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曾经是维持英国生存的安全线。亚丁作为一个港口、加油站和空军基地，也起了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在我现在所述及的最近几年里，这些基本的连系纽带仍然不曾被切断，尽管西班牙对直布罗陀有领土要求，不过还是可以通过明智而有礼貌的外交手腕，来使这个地方继续安如磐石。我们当时认为没有必要无谓地对欧洲最骄傲的民族大肆辱骂，以证明我们是忠于自己的民主理想的。马耳他的重要性虽不如前，不过还是有价值的。经过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进行长期而耐心的谈判后，在塞浦路斯的基地似乎已通过一项可靠的协定而稳稳地建立起来了，它至少是继亚历山大港之后视为强大的空军基地的。我们在1958年的一次有点冒险的行动中，就是从塞浦路斯才能够响应约旦国王侯赛因求援呼吁的。<sup>①</sup>我们可以从亚丁来控制波斯湾，并且如同我们于1961年支援科威特那样，向我们的盟友酋长国提供援助。<sup>②</sup>所以这时亚丁就注定会引起纳赛尔以及阿拉伯世界里受他的有害

① 《乘风破浪》，第十六章。

② 《指明方向》，第十三章。

影响的一些国家的仇视。

264 亚丁殖民地包含有港口、船坞、机修厂、空军基地以及这些宝贵的设施周围的重要地区。邻近各邦一向是受英国保护的，当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担任殖民大臣时，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其中六个酋长国结成一体，以期改善这些国家的生活状况，并使其日趋繁荣，这些酋长国是以下列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而为人所知的：贝汉、奥扎利、法兹利、扎拉、上奥拉基和下雅法，它们于1959年组成一个松散而却是有力的联邦。同年稍晚，拉赫杰也加入了。每一位酋长派六名代表参加负责处理共同事务的联邦理事会，他们还同继续保护他们的英国签订了一项新的友好条约。在此同时，在亚丁，由于处理内政的立法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已由选举产生，所以采取了进一步的自治措施。次年，1960年，又有三个邦，下奥拉基、达西纳、阿克拉比，参加了联邦。

总的说来，各邦内部一直还算稳定。不过我们有必要去采取规模相当大的行动，以防止有人向奥拉基酋长国的叛乱部族提供武器。我们获悉这些武器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由俄国出资的这种武器供应，通常是用捷克的名义的），它们当然是通过纳赛尔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运来的。

同时，尽管我们的能干的代表亚丁总督威廉·鲁斯力图改善我们同也门的关系，也门人却继续采取敌对态度。也门王国政府这种态度，并非出于共产主义的动机，而是出于民族统一的愿望。不过，尽管他们经常在广播中对我们大肆进行攻击，在边界上也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但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担心的。殖民地自己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带有危险性的罢工，这是由一个依靠纳赛尔支持的政治组织阿拉伯职工大会所煽动的。但是还是取得了很多具体成绩。由于投入了巨额资金，不仅改善了港口设施，而且促进了社会进步；开始实行免费医疗，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开设起来了，



还建立了一所技术学院和两个师资训练中心。

不幸,纳赛尔的险恶用心还不限于对亚丁施加压力而已,他还 265  
把颠覆约旦王国作为自己的最大的野心。约旦国王的地位岌岌  
可危。

侯赛因国王来吃午饭。真可怜,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我却为他  
耽心。毫无疑问,不论是由埃及直接派出的特务,或是由开罗间接在约  
旦挑起的纠纷,都威胁着他的生命安全。①

不过这位国王就象他一贯所表现的那样,似乎毫不畏惧。

居住于亚丁殖民地的人数众多,种族复杂的工人群众极易受  
人煽动。有着这么一个“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  
宣传的联合攻势提供了一个醒目的目标。这个殖民地在政治和军  
事上对我国极为重要;可是其内部情况却令人为之不安。处在内  
地的酋长们生活在比较简单而有时几乎是族长式的社会环境中,  
他们大体上是对我们友好的,于是我们就提出了一项计划,试图借  
助于这些苏丹国联盟的势力来巩固这个殖民地。

就亚丁殖民地和保护地的问题,举行了长时间而且极为重要的讨  
论。已拟就两种计划供我们去考虑。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利用苏丹们  
的影响和力量,去帮助我们保住这个殖民地和它的重要防御设施。②

过了几天,

我们对亚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的方针是要把这个殖民地和酋  
长联邦合并起来,以便使我们把尽可能多的权力交给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苏丹们。③

1961年末,纳赛尔由于也门的态度变得比较温和而感到不  
满,把阿拉伯国家联盟解散掉,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也门之间

---

① 1960年10月12日。

② 1961年5月5日。

③ 1961年5月16日。

的一个松散的组织。他在表面上的理由是：也门的统治者们也变得“反动”了。他甚至以同样拙劣的口号，敢对有钱有势的沙特阿拉伯政府进行一阵恶毒的宣传攻势。在我们看来这一切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这显出他的脆弱，而不是显出他有力量。

同时在次年，尽管由埃及出资出人在亚丁殖民地组织了所谓“人民社会党”，反对建立联邦，不过在长时间谈判后，终于在1963年3月1日正式宣布，亚丁殖民地和酋长国联邦即将合并以组成一个“负责的”政府。被选出的政府成员将全权处理内政。不过现在为高级专员的总督，将保有在外交、国防、安全、警政及文官体系方面的权力。

这时，1962年9月9日，也门国王伊曼姆·艾哈默德去世了。即使在一个看惯了恐怖和野蛮现象的时代中，他在过去十四年的统治，也还是由于其真正东方式的残酷和专制而声名狼藉的。他当然是英国的死对头——他用尽了一切手段对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大受其害，不过他还是能够使那个处于中古时代的、既肮脏落后又俯首贴耳的国家维持统一局面。三个星期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巴德尔被陆军所推翻，他原在前一年已被他的父亲封为“王太子”。虽然这个不幸的继承者曾经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革新派，对纳赛尔总统表示友好，并且要根据积极中立的原则同俄国、中国和美国合作”，可是他的革新工作不是为时过晚就是太不成熟了。陆军根本不需要他。9月27日，有六辆坦克包围了王宫，尽管王室卫队作了殊死的抵抗，阿卜杜拉·萨拉勒上校还是宣布自己成了新产生的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虽然我们以后获悉，年青的伊曼姆逃脱了，但是萨拉勒显然控制着局势。我相信，他将会显得十分“进步”，不过我对他是否持有博爱或者甚至“积极中立”的想法，则感到没有什么把握。

整个下午和晚上都用于讨论也门的局势，它的发展对我们很不利。

如果新的革命政府成立的话，它对亚丁保护地以及对亚丁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压力，将具有极大的危险性。<sup>①</sup>

267

只有一个好处，自从布莱米事件发生后，<sup>②</sup>我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此刻这个富裕而骄傲的国家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危机。

我们希望同大受惊恐的沙特阿拉伯政府改善关系。由于他们有些飞机逃到开罗去，他们的整个空军都无法起飞（他们也缺乏零件）。<sup>③</sup>

年青的伊曼姆·穆罕默德在他的叔父哈桑亲王的帮助下，开始组织抵抗活动，哈桑是在最近才从联合国回来，这次联合国大会气氛比较平静。由于萨拉勒已经任命了纳赛尔的亲密党羽阿卜杜·拉赫曼·拜达尼为副总理，即使纳赛尔不曾在实际上组织这次政变，他显然是乐于去支持它的。果然不久就从阿联派来了大量军队，而且在几次遭遇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尽管新政府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保王党却并没有屈服。然而，使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大为惊异而懊恼的是，这个新的“解放者”在他们的不少地方，好象几乎也和以前的暴君一样地不得人心。虽则新的统治者对英国和沙特阿拉伯进行了猛烈的口头攻击，想借此争得民心，而且虽则这个办法在首都和主要城市里是受欢迎的，可是在较边远和纯朴的地区则收效甚小。

在1962年10月间，在其他地方发生了更为急迫的危机，我一直对我们在亚丁的地位感到严重关注。10月5日及6日，我同主管殖民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同僚们进行了紧急磋商。我们一致同意作出防御准备，以防万一亚丁及保护地受到公开的攻击，并在同时采取一切看来是合理的其他行动。虽然我们对于保王党“叛

① 1962年10月5日。

② 见《时来运转》原书第641页。

③ 1962年10月8日。

乱者”的“反动”性质不抱幻想，不过革命政权对我们的重大利益却有更大的威胁。我于10月7日写给女王的信把形势概括如下：

我必须告诉陛下，我们对于也门的局势是十分担心的。我们正在竭力应付……不过我很耽心的是：新的革命政府会取得控制权。这就意味着对亚丁的重大危机，这首先影响到亚丁联邦，影响到统治着处于我国监护下的这些地区的显贵们，其次影响到亚丁殖民地……我们迄今还能够较好地维持在波斯湾的地位，这是出乎意外的。譬如说，我们在科威特的行动是非常成功的，不过亚丁同我国有重大关系，假如我国被赶出亚丁或者在亚丁遇上可以使我们的基地失去作用的严重革命事件的话，我国在整个波斯湾的势力就完蛋了。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焦灼地商讨应付办法，而且已经采取了某种行动，不过我担心我们会遇上极大的困难。

我们迫于形势，不得不去支持一些反动的而且在实际上是相当过时的政权，这是令人难过的，因为我们明白，新兴的力量即使在开头还持温和的观点，但结果似乎总是要滑到激烈的革命立场和反对西方的立场上去的。纳赛尔当然正在公开地支持也门的革命力量。……此刻，比起许多从表面上看来更为急迫的其他一些问题，更使我担心的却是当地的混乱局势。

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同样地感到惊惶，不过他们一时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主要是由于没有有效的空中力量之故。

亚丁总督应我之请，于10月22日前来伦敦进行磋商。我们幸而有着能代表超凡的能力与权威的查尔斯·约翰斯顿爵士——他能干，勇敢，有耐心而且有决心。他以我们从苏格兰历史中熟知的用语向我说明也门的局势：新政府据有首都和大部分平原地区，不过高地部落或者部族则控制着山区，其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一，他们还名义上的当局所占的地区多次进行严重的袭击，他们频频切断交通线，并且对不习惯于此种战术的大队埃及军队进行伏击。这位总督认为，如果纳赛尔坚持下去，他和萨拉勒最终是可能成功的，不过他强烈地呼吁，虽然最后可能还是有必要去承认新



政府,但是应该慢慢来。我国通常的做法是,一旦一个新政府能够宣称在事实上对国内取得了“有效的控制”,就给以外交上的承认。在当前情况下,还不能够说萨拉勒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此外,总督还解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以便(1)使哈桑一伙有这么一个去作最后努力的机会,(2)让保护地的酋长们看到我们的的确确曾经向保王派提供过这么一个机会……,(3)使我们的朋友们明白,承认新政府是无可避免的事,而且使我们至少有一个同新的共和国政府打交道的机会。<sup>①</sup>

这次会议是在下午进行的。就在这天上午,布鲁斯大使来看过我,向我说明古巴危机已经露头了。不过,我也并不想对也门的事仓促作出不成熟的决定。如果古巴局势变得糟糕的话,全世界就会在核战争中遭到彻底毁灭,那么就没有必要过多地虑及亚丁及其邻近地区了。反之,如果加勒比海的危机解决了,我们还是有必要维持自己在阿拉伯的地位的。

也门的局势正对亚丁和亚丁保护地的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亚丁总督查尔斯·约翰斯顿爵士不止一次地来和我以及外交大臣商量,我感到,对他的困难处境应给予全力支持。但是除了要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保卫我国的利益之外,此刻还就承认新政府的问题,开始发生了一次大争论。我在同世界各地就古巴导弹的事频频交换函电之际,抽空再同两位负责大臣商讨了这个难弄的问题。

下午,一开始就同外交大臣和英联邦大臣就也门的事开了一次会。消息不明,很难作出决定。要是我们承认新的革命政府,我们就会失去 270 亚丁保护地的所有朋友,而且殖民地也会变得难以控制了。要是不承认,我们(到时候)就得关闭在那里的大使馆,并会失去对该政府施加某

---

① 1962年10月22日。

些影响的一切机会。<sup>①</sup>

外交部赞成承认新政府，不过我并不认为其理由充足，特别是鉴于萨拉勒上校那时正在广播中向我们提出了严厉的威胁——实际上等于是号召亚丁居民起来造反。我不愿意去采取我认为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步骤。还是拖一下为好，而且由于我们至今还能够使我国代表留驻在也门的首都，并且至少还能够从中央听到一些消息，这就更有必要拖下去了。于是我向美国总统发去一封信，这就展开了以后证明是我们同华盛顿之间的长期争论。实际上，萨拉勒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埃及军队的支援。如果让也门变成纳赛尔的藩属或是占领国，既不可能有利于主要在沙特阿拉伯有利害关系的美国人，也不可能有利于在亚丁及其周围地区处于困境的英国人。我于11月14日要求肯尼迪至少要推迟正式承认也门新政府，为这一场争论开了头炮。

我感到你在阿拉伯地区的王牌就是承认新政府和提供财政援助。你当然想去保全沙特政权，我们两国也都希望使约旦不受波及。而且我国在亚丁有着重大的权益，我们担心当地的酋长们会灰心或者投到对方那里去。如果失掉了亚丁，就一定会使英美两国在波斯湾的整个地位受到严重影响。我想你是会同意所有上述各点的，但是问题在于怎么办。……

下述一点似乎是危险所在之处，如果你过早打出你的牌，特别是承认新政权这一张王牌，以换取一些空洞的诺言，你可能就会失去能影响事态发展的一切力量。所以我认为你在给予承认及提供金钱之前，应该先要取得一些比诺言更为实际的保证。我深深地认识到，到头来也门保王党也许是不能取胜的，不过要是能使也门新政权在以后几年中埋头于国内事务的话，这对我们说来还是有利的。

从而我建议：你们应该一直等到埃及宣布了一项详细的撤兵计划，并采取了某些具体措施后，才承认新政权，上述这项计划还应该包括一

---

<sup>①</sup> 1962年10月26日。

个撤兵时间表以及完成撤兵的最后期限；你可以坚持第一步，先把阿联的空军从也门撤出来。此举将会起相当的作用；这事容易办，容易觉察，而且会把一个使当地形势恶化的因素消除掉。还有一个建议是：或许可以在后一阶段派出联合国观察员去监督双方脱离战斗。

美国总统立即作了答复。他一收到我的信，就马上要同我通电话商谈。关于古巴的事并没有什么新情况可谈；不过白宫和国务院都显然急于要去承认新的也门政府，尽管新政府不能宣称自己有什么合法的权利，而且也并未在实际上取得对全国的控制。

肯尼迪以他惯有讨人喜欢的坦率态度，一开头就说，自己对也门是一无所知的。“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不过他急于要完成两桩事情，要让沙特阿拉伯和约旦人“脱身”，并且要诱使纳赛尔撤兵。他认为，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美国援助埃及的计划，再加上“承认”纳赛尔的也门朋友这一个诱饵，就会奏效。

虽则我是赞成肯尼迪的目标的，我却对他的办法抱有怀疑。如果能使纳赛尔订出一份确定的撤兵时间表，就肯定要比上述办法为好。要等到他完成撤兵工作后，再加速进行援助并承认新政权，这才是正确的步骤，对付纳赛尔时尤其应当这样办。

肯尼迪提出了一个相当无力的问题：假如纳赛尔由于美国不承认而拒绝答应撤兵，便会产生什么情况？我回答说，除非美国人采取强硬政策，纳赛尔当然会继续进行干涉，并且对撤兵的事拒绝承担任何责任，美国人可以推迟承认新政权，并且暂不给援助。任何显得软弱的态度都会立即影响到我们在亚丁和波斯湾的地位，而且还影响到酋长国人和有赖于我们保护的各民族，肯尼迪稍为迟疑片刻后问道：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是不是真的有助于我国在亚 272  
丁的地位？

这正是我所要他提的问题，我答复的话早已准备好了：保护地的酋长们正在观望形势。只要他们一旦认为英国可以一直“听

人指使”，他们自会作出其结论。如果我们失去了在保护地的势力，所剩下的只有亚丁了。可是亚丁和直布罗陀不同，后者还可以防守（而且说来也凑巧，要不是我们有了直布罗陀的话，我们可能赢不了那次战争）。假使我们失去了保护地而且在亚丁遭到重大困难的话，而且更糟的是，假如我们失去亚丁的话，那末我们就会在波斯湾失去一切保卫我们自己以及保护国的手段了。这是对我们力量的又一次考验。纳赛尔至少必须同意实行“分期撤兵”。阿比西尼亚、摩洛哥、苏丹、利比亚、约旦等国正在等着瞧。我恳求他去考虑这事。这不单是也门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威信的问题。

虽然肯尼迪显然正受到国务院中的谋士们的催促（他是不时向他们咨询的），他还是答应去考虑这事并再和我联系。但是我对此不抱什么大的希望。

9月13日，亚丁总督写信给我说，承认新政权就会使我们在阿拉伯的朋友，特别是在亚丁保护地的朋友大为惊恐，他们会认为，英国没有什么大的决心去使自己让别人信得过，也没有什么决心去抗拒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他宣称，承认新政权一定要以埃及撤军为条件。除了空军之外，埃及军队已达到一万三千人之多，组成三个大旅。

11月17日，我接到来自华盛顿的一封冗长而令人沮丧的信。美国总统宣称，“美国对局势的判断”是：萨拉勒和革命派一定会获胜；纳赛尔对于保证他们取得胜利，是承担着全部责任的；而且推迟承认只会使他们倒向苏俄。“沙特和约旦人试图赞助保王派之举只会损害到他们自己”。结束那里的内战是符合西方的利益的。纳  
273 赛尔不会同意撤走“他用以对付部族们的王牌”空军。美国人越早承认新政府，他们就能够越早地逼迫纳赛尔和萨拉勒作出保证，这样就能够使埃及撤军，并使他们保证不干涉亚丁和沙特阿拉伯的



事。我可不相信这一套，而且在 11 月 18 日的另一次电话商谈中，明白表示了我们的立场。我作了这一次呼吁之后，又写了一封信，要求美国尽量推迟承认。我们此刻正在修改亚丁宪法，全力进行亚丁殖民地和保护地的合并工作。这将是很难搞的工作，我们能否取得普遍的信任，是成败的关键。

肯尼迪最近在古巴所遇到的可怕经验比起波斯湾问题来，自然更使他操心。不过他还是答应再等几天，并答应在给予承认之前，要纳赛尔和萨拉勒作出明确的声明，将要求纳赛尔作出撤兵的诺言，并将要求萨拉勒接受同“邻近地区实行关系正常化和维持友好关系”的原则。人们将提醒他，亚丁和波斯湾不仅是英国权益所在，而且还深深地关系到美国。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好，我心目中几乎看到一个国务院专家正在草拟这些漂亮的句子。虽然我还是感到不满意。我感到还是寄去一封措词温和的回信为好。我反映说，

要是美国人能使纳赛尔答应“分期”撤兵；要是他们能够使萨拉勒发表一项通情达理的声明，……以收回他对亚丁保护地和殖民地的威胁，那末美国承认新政权一举还不算太糟糕。总而言之，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了。我们不能进行公开的干涉。沙特阿拉伯内部很不稳。约旦人无能为力（两架“猎人式”飞机以及他们的空军司令逃往开罗，这使侯赛因国王受到厉害的打击），埃及的士兵打仗虽然不行，还是能够拿出不少力量来帮助也门叛乱者的政府的，他们还有一支空军，可以依靠它来轰炸无法自卫的保王派，不过我对亚丁是极为担心的，那里的情况很容易失去控制。<sup>①</sup>

一二天内我的忧虑果然证明是正确的。

274

我担心美国关于也门的计划要失败。纳赛尔十分小心翼翼，我怀疑他到底是否能从也门脱身出来。这样美国人就要冒付了钱（承认）而却拿不到货物（埃及军队脱离也门）的危险。这会使我们在保护地的地位

<sup>①</sup> 1962年11月17日。

恶化。<sup>①</sup>

当我于11月16日见到戴高乐时，和他简略地谈及此事。他也怀有同样的忧虑并且明白表示，法国决“不会急忙去承认这个共和国”。在年底之前，国务院的主张得到了贯彻；可是我国外交部却对承认有多大价值感到怀疑。在美国承认之前，萨拉勒作了一次厚颜无耻的广播，宣布要成立一个包括全阿拉伯半岛的共和国。这就意味着要求在沙特阿拉伯、亚丁及各保护地以及波斯湾各国实行革命。这个也门学生学起他的埃及老师来，的确一学就会。

下一阶段自然就是要求美国给以二千万美元的巨额贷款，美国人对此作了谨慎的答复，他们宁愿送去约四千吨的玉米。那年美国获得了玉米的大丰收。

在这期间，叛乱者的地位看来肯定正在削弱下去。埃及军队推进到接近亚丁保护地边境的马里卜，并且把射程能达到亚丁的火箭运到了萨那，这引起了一些忧虑。不过殖民大臣保持坚定的态度：除非双方相互承认，不然，就不承认他们。要我们承认萨拉勒的政府为也门事实上的政府，他也必须承认我们在亚丁和保护地的地位。

这个未决的问题一直拖到新的一年里去，我并不打算急忙加以处理，并请亚丁总督再度到伦敦来，我是十分尊重他的判断的。

275 查尔斯·约翰斯顿爵士……于星期一晚上到达，我们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切可利用的间歇时间来，就是否承认新的也门“共和国”政府问题，进行了仔细磋商。这事极难作出决定，因为一些较为远大的考虑（例如，我国同纳赛尔的关系等等），和担心会在亚丁保护地及殖民地引起直接影响，这二者之间的争论相持不下。我们终于决定召回我国大使（从而争取得几个星期的时间），并且试图尽速完成亚丁的“合并”或者“成立联

---

① 1962年11月26日。

邦”的工作，这事本身就会引起纳赛尔等对我们大肆攻击。<sup>①</sup>

亚丁总督仍然主张拖延承认，不过这个情况却另外有其光明的一面：沙特阿拉伯人由于感到压力过大，于1963年1月16日恢复同英国的外交关系，它是于1956年在苏伊士危机期间同英国断交的。

我虽忙于应付其他困难的事，不过却没有把也门忘掉。1月28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把甘迪（驻也门公使）召回商量，可是由于他一到就因感冒病倒，所以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殖民部和外交部之间在承认问题上还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国防部则站在殖民部这一边。<sup>②</sup>

不久后，肯尼迪总统向我提议，既然亚丁合并工作已经完成，我国也已和沙特阿拉伯恢复了外交关系，英国要是承认也门就会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的行动”。我们之间有了不少信件往来，但没有取得结论。不久后，这个问题自行解决了，也门总统萨拉勒要求本来一直呆在塔伊兹的英国使馆撤出。由于我们同这个政府发生任何正式关系而却享受了在当地派驻一名观察员的好处，所以没有什么可说。这个纠缠了这么久的问题就这样几乎很可笑地获得解决了，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

也门问题（也像这么多其他问题一样）自行解决了！共和派等我们承认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把我国的使馆封闭了。外交部和外交大臣相当狼狈。殖民大臣得意洋洋——国防大臣也是这样。我认为这事“在短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因为否则我们在新的亚丁联邦中的所有朋友们就会失去对我们的信心。它可能在长远将来给我们带来麻烦。不过阿拉伯人的策略变化得十分快，谁也拿不准。<sup>③</sup>

---

① 1963年11月11日。

② 1963年1月28日。

③ 1963年2月17日。

我于2月14日给美国总统寄去一函,说明我们的情况,并在结尾写了一句语气温和的话,因为我感到他对我们坚持自己的主张有些恼火了。

在我们对也门的政策上,我们两国的步调现在竟然似乎有点不一致,对于这个结局我是感到抱歉的,但是我认为,这与其说是由于彼此目标的不一致,不如说是由于彼此处境不同之故。

纳赛尔果然不履行他对美国人所许下的诺言。埃及军反而源源涌入也门,迄至3月初,

也门局势迅速恶化了。至此在也门已有二万八千名埃及军队(占全埃及现役兵力的三分之一)。很明显,埃及人目的在于利用也门作为跳板,以便夺取沙特阿拉伯这份大战利品。他们正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空投武器,并且显然同那里的颠覆分子有联系。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对亚丁和亚丁联邦(尤其是老殖民地)所受的威胁是有点处之泰然的,可是此刻对纳赛尔要去夺取沙特阿拉伯以及美国在那里的巨大石油利益,却变得极度激动而恐慌了。<sup>①</sup>

在此同时,保王党力量似乎正在削弱下去。“那些部落就象从前在苏格兰的部族一样,正倒向胜利的一方”。<sup>②</sup>

也门人严重侵犯了亚丁的领土。我们轻易地就把这些事件应付掉了。

我们已把入侵者从我们境内赶出去了。不过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埃及人对也门承担着很重的义务,虽然美国人想通过外交手段使埃及人退出,不过却不容易做到。<sup>③</sup>

277 萨拉勒现在以罕见的厚颜无耻的态度,向联合国控诉英国侵略也门,不过我并未感到过分担心,但是中东的情况却是很不妙的。

---

① 1963年3月7日。

② 1963年3月8日。

③ 1963年2月28日。



埃及人的确很容易使人讨厌，所以从长远看来，甚至也门人也会反对纳赛尔的，然而此刻在叙利亚却已成立了一个亲埃及的政府。<sup>①</sup>

不过这时美国人正在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尽管他们一向是支持中东各共和国的。他们却不能忘记，沙特阿拉伯这个主要的君主国家对他们的石油权益是生死攸关的。

1963年3月，拉尔夫·本奇博士代表联合国访问了亚丁和开罗后宣称，纳赛尔已经答应说，假如沙特阿拉伯先停止支援保王派，他就撤兵。过了一个月后，埃及、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于4月29日共同发表了一项停战协议，并且同意由联合国派出“观察员”小组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可是等到他们于6月13日到达时，战争又在激烈地进行了，我不禁想到联合国的不可思议的偏袒态度。

例如，纳赛尔正用俄国制的强大轰炸机队日夜轰炸也门和沙特阿拉伯，而且还在使用毒气。什么反应也没有，也没有谁提出抗议，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也没有人通过任何有关亚非国家的决议。试想，要是我们(例如)从亚丁发动进攻，纵使所作所为仅及其二十分之一，那会产生什么后果！<sup>②</sup>

在短短几个月后，我的职责就要告一段落了，不过对这个可悲的情况的接下去的几个阶段作扼要的记述，也许是值得的。迄至1965年，共和派发生分裂，他们有些人猛烈反对埃及干涉，这时在也门的埃及军队增加到七万人之多，在1966年整整一年中，亲埃及派和反埃及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接着双方各处决了一大批人。这些年中，纳赛尔的担子的确极为沉重，不久他的威望就在1967年6月间同以色列的六天战争中，受到致命的打击。

同时，亚丁及其周围地区的形势在1965年中开始严重恶化<sup>278</sup>

---

① 1963年3月11日。

② 1963年8月16日。

了,我国于 1966 年作出了撤出亚丁基地的无法避免的决定。这次撤兵是危险万状的,我们尽量把麻烦和危机估计到最大限度;因为在我们于 1967 年 11 月撤退之前,其间还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那一天我们就得放弃掉我们的朋友,而让我们的敌人心满意足。联邦政府和军队终于瓦解了,我们找不到一个继任的政府,以便把我们的职责移交给它,并且在强大的海军的掩护下,于 1967 年 11 月底被迫离开了。这一事件对此后的局面是孕育着种种危机的,留下的一小支英国军队的勇气和忠诚却多少洗雪了我们在这桩可悲的事件中所受的耻辱。

## 第十章 非洲的迷雾

### 一、刚果

在刚果独立后的第一年以及接下去的一些动乱的年头里，西方国家政府所一直焦虑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防止那一大片土地及其资源落入共产党人手中，或是受到他们的控制。为此，英美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去取得联合国的帮助，以期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来恢复一些秩序。并且还要以联邦的形式来保全或者恢复过去比利时人在部落之间与地区之间存在着种种猜忌的情况下，为这些原始未开化的居民带来高度统一与繁荣。虽然我们两国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可是实行起来却有着不少困难。而且联合王国政府还不断受到各种压力，如果对之处理不当，就会在英联邦中引起严重的分裂。

不过迄至 1961 年底，危机似乎已被克服了。刚果中央政府总理西利勒·阿杜拉是一个具有相当才能和勇气的人，他在那位镇静的、绝对合法的总统约瑟夫·卡萨武布的真诚支持下采取了行动，正开始在联合国帮助下，在利奥波德维尔市及其周围邻近地区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力。他甚至还成功地击败了基赞加的势力，以及他设在斯坦利维尔市自行选定的共产党少数派政权。因为在 1962 年 1 月初，中央政府在联合国支持之下，逮捕了基赞加，并且打败了他的武装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似乎说明，事情正沿着正确的路线取得“进展”。不过还存在着涉及加丹加前途的重大问题。<sup>280</sup>这一广袤地区拥有巨大的铜矿资源，它在周围各省处于一片动乱的情况下，却能在莫瓦泽·冲伯的控制下，保持比较平静而有条不紊

紊的状态。冲伯当然受到了韦伦斯基和中非联邦政府在道义上的支持。他们很希望看到在同北罗得西亚接壤的地区中有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权。其余的欧洲人利益集团、特别是主要由矿业联合公司所经营的重要铜矿的股东们也同样地感到关注。所以我们是极为宽慰的心情获悉，联合国部队“占领”了加丹加的某些重要城市后，冲伯和阿杜拉已于1961年12月20日签订了一项终止分裂的协议。因为假如让加丹加成为一个完全分立的国家的话，那末，失去了加丹加富源的刚果在经济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了。

可是不久就出现了裂痕。不过我也高兴地获悉，“在现场的美国人感到有些担心，正在试图劝阻阿杜拉不要把冲伯逼得太紧”。<sup>①</sup> 所以当我听到加丹加省议会愿意去接受协议的条款时，就更乐于在议会中为那笔一千二百万美元的捐款作辩护。为了支付联合国在这次冒险行动中的费用，内阁已经勉强同意了这笔捐款。但是我不久就大失所望。冲伯心怀疑惧也是情理之常，只要各邦在新联邦宪法中的权利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他就不愿意把他的宪兵——唯一有实力的当地武装力量——并入中央政府所属的宪兵中去，而当时中央政府尚处于纷乱状态。阿杜拉也同样亟欲控制这个维持法制的武装力量，以便防止再度发生分裂运动。

1962年4月26日，我在纽约时，同当时的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商讨了刚果的局势。

(他)很讨人喜欢，看来也很通情达理。

281 他亟欲尽力使联合国摆脱在刚果的责任，不过这几个非洲人看来的确难以对付——冲伯和阿杜拉都是同样难弄的。<sup>②</sup>

肯尼迪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于5月3日告诉外交大臣说，肯尼迪认为，现在该是大家一起制订出一项英—美—比共同政

<sup>①</sup> 1961年12月24日。

<sup>②</sup> 1962年4月26日。



策的时候了，这样就可以使其余的国家都遵守这项政策。他起先只愿意要对冲伯施加压力，不过当我指出也有必要对阿杜拉施加压力，而且还有必要对刚果的宪法加以修改时，他也不表示反对。美国人似乎可能同意在伦敦设法去制订出一项联合政策，并派大卫·布鲁斯为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我们应该再接再厉地干下去，因为这对将来说来是个好朕兆。

时光荏苒，不论是冲伯与阿杜拉之间的会谈，或是英美两国官员之间的磋商，都没有得出真正的结果。我怀疑冲伯是否搞得太过头了；不过我也向肯尼迪明白表示，我们不赞成再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把冲伯搞垮是不会有好处的；我们一定要使他参加刚果联邦，一面也要说服阿杜拉去适当尊重各邦的权利。这样我就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即，要试图使华盛顿相信，对一个幅员广大，并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性传统的国家说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于组成联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由于某种原因，美国人似乎把这看作是一个有点不成熟的、甚至是有有点新奇的建议。

1962年6月26日，阿杜拉宣称，一切和平解决的办法都已经用尽了。7月6日，外交大臣前来同我商讨这一形势。

（在利奥波德维尔的）阿杜拉和（在伊利沙伯维尔的）冲伯之间似乎不可能达成真正的解决办法。联合国威胁着要采取军事行动，此事是带有种种危险性的。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做。<sup>①</sup>

幸而吴丹本人也极其不愿意去采取新的强制办法。7月31日，他对所有会员国发出了呼吁，要求它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以达成和平解决办法。针对一切说服工作都归无效而冲伯仍然保持不讲理的态度<sup>282</sup>的情况，他则发出了可能有必要采取经济制裁措施的警告。虽则我在当时的想法也许多少代表了一种偏见，不过这些想法却典型地表现出我们以后将要感到的恼火情绪。在我们幸运地克服

<sup>①</sup> 1962年7月6日。

了共产党的祸患之前,我们曾经配合得很好;现在这种祸患已经消除了,我们却似乎正在分道扬镳。

刚果的情况平静了一点。原因在于咨询委员会(吴丹和联合国人员是不得不找他们商量的)代表了派军队参加驻刚果联合国部队的国家——印度、爱尔兰、瑞典、埃塞俄比亚等国。前一年,他们都主张采取坚决的行动,可是他们在碰得头破血流后,再也没有(什么)胃口来打仗了。所以现在美国人要对冲伯实行“经济制裁”——也就是说,不准把铜运出去。愤世嫉俗者说,(因为除非洲之外,全世界的大部分铜矿均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实行这种抵制会使美国人和美国股东大获其利(他们在矿业联合公司中没有什么股份)。我们真正担心的是,联合国干的蠢事可能会迫使韦伦斯基也自行干出另外的蠢事来。他可能同冲伯结成联邦或是军事同盟。这种做法是有吸引力的。加丹加和北罗得西亚的铜矿地带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体系。<sup>①</sup>

但是吴丹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耐心。他于8月20日,根据联邦体制,提出了一个修改宪法程序的纲要,对拟定的财政收入分摊办法、对统一货币的办法以及其他事项,都有所阐明。要是这个计划行不通的话,联合国要末退出去,要末就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强行贯彻。加丹加政府于9月3日接受了这些提议,我由于冲伯可望变得通情达理而又感到鼓舞。六星期后,真的在10月16日正式开始实行了联邦宪法。可是此刻冲伯却冥顽不化地拒绝了整个计划。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新危机,它包含了前一年所存在的一切困难。

283

刚果问题又激化了。吴丹(在肯尼迪支持下)要对冲伯施加军事压力。我们对此不能容忍。他们也可能以实行“经济制裁”为满足——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但也只以不增加我国购铜数量为限度。<sup>②</sup>

---

① 1962年8月5日。

② 1962年11月27日。

不过直到我于1962年12月同肯尼迪在拿骚会晤之前，还没有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我们两人能够碰头去作坦率的交谈总是很有好处的。议事日程是排得满满的，不过我们仍在会议过程中对整个局势作了详尽的商讨。

双方各执己见，似乎相持不下，在一方面，美国总统极力争辩说，阿杜拉的地位日益恶化，几乎处于绝境；如果他整个地失败的话，俄国人就会带着其一切有害的影响卷土重来。阿杜拉是猛烈反共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他。迄今为止，一直是由于卡萨武布总统和他的历任总理们的坚定做法，才能维持局面。在这些总理中，尤以阿杜拉为其佼佼者。不应该让冲伯以其冥顽不化的态度来毁掉任何达成完善而温和的解决办法的机会。

这些话是有些道理的。不过霍姆却力言，我们应当设法组成联邦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加丹加把适当数量的财政收入交给中央政府。对此，美国代表鲍尔回答说，冲伯总是不断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最后，我们被迫接受了下列这一点：假使不及早达成可靠的协议，就必须以军事行动把冲伯压下去，并加强中央政府的阿杜拉的力量。结果，联合国部队于年底前取得了对加丹加主要城市的控制权，冲伯处于压力之下，才同意重开谈判。

这种形势自然大有在保守党内部造成新的麻烦之势。

在刚果的联合国部队——在美国军队协助下——打败了冲伯并且在保守党内部引起了一场危机。除了刚果这桩事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大量日常工作，举行了多次大臣会议等等。我主要是希望矿业联合公司会转到阿杜拉这边来——这就意味着转到同坦噶尼喀租让公司有密切关系的(权益集团)这边来，后者本身就是矿业联合公司的大股东。即使在非洲也是*pecunia non olet*(金钱关系不露形迹)。<sup>①</sup>

过了几天，

---

<sup>①</sup> 1963年1月11日。

刚果的事还未了，它在性质上部分属于滑稽戏、部分属于悲剧。冲伯又到北罗得西亚去了，不过他还是准备回来进行最后的谈判。在矿业联合公司的巨大设备下面已经埋下了地雷，那至关重要的堤坝随时都可以炸毁。唯一能够制止此事的人是英国驻伊利沙伯维尔的领事。可是（刚果中央政府的）阿杜拉却偏偏已把他赶出了刚果。<sup>①</sup>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即使对冲伯的最热情的支持者说来，他这个人也是靠不住的。他能够同别人达成协议，可是却不遵守它。因此我们不久迫于形势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政策至少是明白而行之有效的。在接下去的几个月中，由于刚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总崩溃，这个国家的整个广大地区陷入混乱状态。从而有必要使联合国军政机关继续呆在那里，以免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冲伯于1963年6月14日逃往欧洲。他离开后就使这一阶段的长期纠纷告一段落。于是情况开始好转。将近7月底时，阿杜拉到伦敦作短期访问。我为了向他表示特殊的礼遇，着实张罗了一番。我还发现他这个人很有风趣，而且好说话。

驱车到伦敦机场去迎接阿杜拉先生。他讲一口好法语。阿杜拉夫人、两位部长以及一大群幕僚和他一起来了。——还有我国的新任大使罗斯也从驻地回来了。

285

刚果的情况平静——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内战（例如同冲伯的战争）至少在眼前已经结束了。但是由于没有警察（他们叛变后成了武装匪徒），所以社会动荡无秩序。除了少数几个城市之外，在这个广大地区中，政府的政令实际上是行不通的。<sup>②</sup>

阿杜拉对我很坦率，讨人喜欢。他并不想去掩盖刚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崩离析状态。不过他希望，如果他能摆脱议会的话，他到头来还是能够恢复秩序和一定程度的繁荣的。目前存在的巨

---

① 1963年1月12日。

② 1963年7月22日。



大困难就是由议会所引起的。我自然是有点赞成他的观点的，不过我感到不应该流露出来。但是当我在秋天听到在刚果宣布了“紧急状态”，而且阿杜拉显得相当坚决，已经树立了他的权威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逃往前法属刚果；到了11月底，两个有外交官身份的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殴打之后，苏联大使馆的全部人员都被驱逐出境了。这个新政府能够巩固到怎样的程度尚有待证实。让联合国部队呆到1964年7月这一项决定，看来是明智的。

这部错综复杂而多事的历史的一个阶段，至少就此告终了。它于几年前，随着比利时人的撤退而开端。不论在亚洲或是在非洲，从欧洲人的统治转变为独立的这个过程，往往显得困难重重、充满血腥。至少在初期，欧洲各国政府虽然很爽快地把它们的权力移交出去，但在当地却没有一个能承担这种责任的有力政府来配合这一行动。这样整个国家就沦为大国之间相互竞争、大展宏图 and 勾心斗角的方便场所了。共产党人的确想把刚果变成他们的卫星国，以便把整个资源如此丰富的、而且假如好好地组织起来的话又是如此有力量的地区变成一个基地。他们可以从这里使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大陆普遍传播。美国人和英国人也同样决心要挫败这些计划。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英国政府的任务是更为复杂的。因为虽然伦敦同华盛顿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却更易受到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这一段有点痛苦的历程中，还是能够设法在国内以及在英联邦中，避免掉一些主要的危机。

## 二、肯尼亚

当英国人决定把自己在非洲各殖民地的政权逐步移交给当地居民的代表们时，他们一如其他有关的欧洲各国政府一样，遇到各

种复杂的困难问题。在像刚果那样的一些国家中，单是其广大的幅员就几乎令人应付不了，还要加上部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和以及缺乏有训练的非洲籍行政官员等问题。在像中非联邦那样的其余国家里，在扶植当地机关及当地文官体系方面已有了大得多的进展。不过导致它最终解体的主要难题是两个成员国即当时称为北罗得西亚及尼亚萨兰和南罗得西亚的根本矛盾。在前两国中，欧洲籍居民为数极少，而且有些人还不是常住人口。在后一国中，其欧洲籍居民几乎全是英国人或南非白人的后裔。他们在居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都很富裕，而且已经依照南非办法做到了几乎完全自治的程度。这是本世纪初自由党政治家们所热衷的方针——也就是说，几乎完全不顾非洲人的利益。

在肯尼亚，伴随着我们在其他地区所常见的一些问题而存在的，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有着这么一部分人数不多但却富裕而有知识的欧洲籍居民。他们通过创业活动已在农业中达到很高的生产效率。接着又使商业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甚至也发展了一些工业。这些欧洲人几乎全是英国人的后裔，大体上属于两类人：一种是原来定居下来的人，我们几乎可以把他们称为冒险家。他们过去在诸如德拉米尔勋爵和克兰沃思勋爵这些人的带领下，发现了实际上无人居住的高原。在他们来到之前，只有些游牧部族偶尔到此巡游。在海拔六千英尺并且几乎位于赤道的这个地方，精心经营的大型农场拥有相当多的基本设备，搞得十分得法。这些产业负责为当地消费以及出口提供剩余产品。它们还生产某些特殊的、有价值的作物，例如价格很高的除虫菊等。这些冒险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来到这里。他们往往很富足，能经常到英国去游历，并且能够把子女送回国内去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这种人之后，来了一批年纪较轻的移民。他们大多是来自部队的军官，受到当时政府的鼓励，把自己一点积蓄或退休金投资在

规模不大的事业上。这两种欧洲居民都带来了资金、知识和决心。由于他们的农场经营得很成功，使内罗毕这个地方日趋繁荣。其他的移民包括一些阿拉伯人和大约十七万以上的大量印度人。那里的主要居民是非洲人。他们分为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部落，继承着由来已久的传统，互相仇视斗争。

即使在早年，也不用“白昼秉烛”就看得出：假使一旦英国政府开始把权力交出去的话，非洲之外的人，尤其是欧洲人的地位就会变得越发不稳固。的确，早在1923年，当时的殖民大臣（德文郡公爵）就发表过一项著名的声明。它充分说明，在任何利益的矛盾中，英国政府都要把非洲人的利益看作是“首要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结婚的初期，这位公爵的不少亲友都已经决定到肯尼亚高原去生活，并在那里碰碰运气，他们对他的政策大加责难，有时措词也很激烈。但是他勇敢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并得到了博纳·劳内阁及以后各届内阁的支持。这个把非洲人的利益看为“首要”的原则，从未受到过严重的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部着手发展教育，并使非洲人逐步参 288  
加政府工作，这些是殖民地独立必须预先具备的条件，不论它何时独立。从1952年至1956年，由于悲惨的茅茅叛乱及其所带来的恐怖和野蛮情况，破坏了大好局面，并使工作进度受到相当的影响。不过不论是当时的殖民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及其继任人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都对自己的长远目标毫不动摇，虽则他们是竭诚支持负责当局去扑灭这次可怕的暴动的。从而，特别在1956年之后，在这个殖民地的政府机构中，作了逐步改革和变动，使非洲人所占比例有所增加。激进派的政党领袖自然认为这些改革是不够的。但是这毕竟还是为通往独立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60年1月12日，持续了七年的“紧急状态”终于正式结束了。随即在1月份的下半月和2月份的第一周，召开了会议考虑

修改宪法问题。殖民大臣麦克劳德秉性热心，他把自己的全部理想和机智都用于这项工作。当地总督帕特里克·雷尼森爵士以及立法委员会的四十名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一起参加了工作——后者代表欧洲籍人、亚洲籍人、非洲籍人等不同的集团。此外还有一定人数的官员和顾问配合一起工作。人们普遍认为，这次会议象征着茅茅恶梦的结束。当我正在非洲旅行之际，麦克劳德向我发出了一些电文，说明他在试图调和非洲籍人要求实行的体制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这种体制会最终使他们取得权力，并使其他集团都忧心如焚。这位殖民大臣相信到头来权力一定会归于非洲籍人所有；但是他也希望而且相信，关于改变宪法的时机这一点，他们的领袖会听从我们的劝告，以便使其他居民认识到，这个最后阶段的来到是避免不了的。

我回到伦敦时，麦克劳德要我去会见迈克尔·布伦德尔先生和他的新肯尼亚党委员会成员们。布伦德尔代表欧洲籍居民中的  
289 温和进步分子。他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他带来了他的党中的一些英籍人、非洲籍人和亚洲籍人成员。

我请他们喝酒并且大加鼓励。关于制宪问题的会议进行得很好，但是由于土地问题，大有失败的可能。<sup>①</sup>

结果，会议还是取得了成功。只有属于欧籍人极端派的布里格斯上校不同意大会的报告。下一个任务是怎样去执行大家已经同意的计划。它规定设立一部长会议，有四名“官员”和八名“非官员”，其中四名是非洲籍人，三名是欧洲籍人，一名为亚洲籍人。将有一个拥有六十五人的立法委员会；其中五十三名委员将由合格的选民直接选举出来，选民资格为知书识字以及每年有七十五镑以上的收入。另外十二名委员分民族间接选出。结果，被邀请参加立

---

<sup>①</sup> 1960年2月17日。



法委员会工作的非洲人中当时有三人表示拒绝，最后还是有二名同意参加了。

到了次年初，才有可能举行第一次选举。但是形势却日益紧张，非洲人之间的关系更显得特别紧张，终于组成了两个非洲人的党——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通称“卡奴”）以及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通称“卡杜”）。不幸这两个政党都是依照部族原则而组成的。在这同时，欧洲籍人普遍产生了恐慌情绪。我从友人以及其他方面人士接到不少来信，他们深恐非洲人实行自治会使他们特别是在高原地区站不住脚，而实行独立后就更其如此。我懊丧地回想到几乎二十年前，当我担任短时期的殖民部次官时所作的一番毫无结果的努力。当时我建议，应当由英王把欧洲人经营的大农场收购下来，依照它们原来的规模或者将其合并为更大的单位后改为国营公司，并留用原来的农场主们为经理。即使所耗的费用可能还比不上六年战争的每天开支数字，财政部还是照例加以反对。<sup>①</sup>至此就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以后变得日益紧迫而棘手的土地问题。“对于善于思考的人说来，这个世界的确是一出喜剧，而对于多愁善感的人说来，则是一出悲剧。”

1961年1月初，我同大法官（基尔穆尔勋爵）作了一次长谈。

我们两人对肯尼亚的情况都感到焦灼不安。在某些方面，这甚至要比中非问题更会在国内引起麻烦。人们对于我国迟早总得同意让肯尼亚独立这一点还不习惯。……“迟早”——殖民部认为这就是1964年。我们之中不少人感到这似乎过早了。从我党的角度来看，肯尼亚将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我党甚至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裂。索尔兹伯里勋爵和拉姆顿勋爵能够轻易地在这儿纠集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移民”院外团。在肯尼亚的移民（比起在罗得西亚的移民来）更是来自贵族和上层

---

<sup>①</sup> 参看《战争风暴》原书第177页。

中产阶级,并且和财政金融界及政界有密切联系。①

3月1日肯尼亚总督决定不能取消对“卡奴”党领袖和受人拥护的英雄乔莫·肯雅塔的“行动限制”,这是他和茅茅运动的一些领导人们所必须遵守的一种“限制”。于是“卡奴”拒绝参加政府工作,不得不在“卡杜”党和布伦德尔的新党集团的支持下,以恩加拉先生为首组成政府。不过这当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肯尼亚少了肯雅塔就好比《哈姆雷特》一剧中少了丹麦王子这个角色一样。

关于解决肯雅塔的事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案。一个非洲人的党将同意据此组成政府。不过总督已经对他们和报界说得一清二楚:肯雅塔终究要获释这一情况是不变的。此事仍然要取决于总督于3月1日在广播中所提出的一些条件。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不过在国内的保守党人自然是疑虑重重。②

这些条件其实就是:社会秩序有了相当的恢复,以及由于政治激情所引起的压力有所松弛。

291 英国人是很健忘的民族,至少他们对自己所受到的损害是这样的。即使如此,经历了四年茅茅战争的可怕事态后,要这样快就取消对肯雅塔和他的主要同僚们的一切管制,也未免太过分了。当然,我们明白,最后还是有必要采取这个步骤的;不过应该择机而行。那年夏天,当局批准肯雅塔回到吉库尤地区去,这几个月过得很不平静,人们以两个非洲人政党的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的集会、罢工、谴责当局的恫吓等等活动。新政府面临着资金不断枯竭、失业增加以及有必要实现它自己的竞选诺言等问题,这特别是指关于教育以及使无地非洲人得到土地的诺言。竞选诺言同样地使实行议会制的一切新老国家的部长们一直操心。也许这就是为

① 1961年1月20日。

② 1961年4月18日。

什么往往要乞灵于一党专政或军事独裁的原因。

于此同时，处在北部省份的索马里人要自由加入索马里共和国的声势日益浩大，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11月，改任殖民大臣的雷吉·莫德林访问了肯尼亚，并且安排于次年在伦敦召开一次会议，以期解决所有这些困难问题。我忧郁地想道：

如果我们不得不让肯尼亚独立的话，它很可能成为刚果第二。如果我们坚持呆下去，就会意味着一场长期而残酷的战争——茅茅战争等等。<sup>①</sup>

在举行会议之前，在这里的同僚们都接到了详细的通知。

我们举行了长时间的内阁会议。莫德林似乎是既谨慎又坚决，并且决心去应付必不可免的困难事情。困难在于：此刻肯尼亚的财政已经破产（亏空了三千万镑），而且就要（在几个月内由国内自治转为独立）随之发生一场大屠杀。<sup>②</sup>

后来证明我的这种情绪是有点悲观的；因为虽则会议最后陷入了完全的僵局，大家还是同意把所有党派联合起来，特别是就地方权292限和地方境界问题“去制订出更为详细的规定”。由于这个典型英国式摆脱僵局的办法，肯尼亚在当时不得不表示同意。不过就像一切折衷办法所经常引起的情况那样，各党派对之各有各的解释。恩加拉先生回国后说，“已经达成地方分权的原则了”，而肯雅塔先生则极力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只为宪法拟出了一个框框；“所有的具体内容”都要在以后“制订出来”。

肯雅塔的权势日增；在他手边的汤姆·蒙博雅的声望也不断升高。其他的领导人也极力相互争权。所有这些内部的斗争，自然是由于各个不同的部族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引起的。莫德林于

---

① 1961年12月19日。

② 1962年2月16日。

1962年7月10日再度前往肯尼亚，极力使纷乱的局势安定一些。他所能作出的最重要的、经过内阁同意的声明，也许就是一个关于处在欧洲人所拥有的高原上的非洲人居民点的公告。自从这个地区得到开发之后，自然而然引起非洲人大量迁到那里去，有的当农业工人，有的当工头；鉴于当时整个殖民地农民缺乏耕地的情况，显然有必要去采取一些办法以使非洲人得到土地。这就不单是一个种族问题，因为除了那些大庄园主们所属种族之外，那些大庄园主——小土地所有者希望它们垮掉——对此也会羡慕。即使这些大产业归于非洲人所有，一个非洲人的大庄园主也会在其本族人中称霸一方。所以英国宣布要在五年内为非洲居民出资购买一百万英亩的土地受到了欢迎。

由于有关各方面不同的利益、由于包括沿海地带和索马里地区在内的各地方疆界难以划清，在制宪过程中的各种纠纷使工作推迟了好几个月。直到1963年4月才公布了宪法；并于5月18日举行了选举。

同时又产生了某些涉及面更广的问题。坦噶尼喀和乌干达本来希望一旦肯尼亚独立就同它组成一个有实力的联邦，它们的代表们对于制宪工作的缓慢进度开始表示不耐烦了。这两个国家早已实行了自治和独立，而且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的地位感到自豪。当时兼任联邦事务大臣和殖民大臣的邓肯·桑兹同他们打交道时，表现出了异常的耐心。

我不得不让……坦噶尼喀的卡瓦瓦先生和乌干达的奥博特先生责备（几乎辱骂）了几个小时。不过，事情终于在和好的气氛中告一段落，他们同意发表一篇十分和善的公报。他们抱怨说，肯尼亚的情况进展得太慢了——他们其实只能就大家都是东非组织的成员国这一点过问此事。<sup>①</sup>

---

<sup>①</sup> 1963年1月28日。



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索马里人要求分立出来。我们设法为在东北部的索马里人设立了一个单独的地区来应付他们。不过仍发生了一些暴动事件；形势日益紧张。在不久以前成立的索马里共和国决定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是他们似乎不至于发动军事进攻。至此，显然可见，继续推迟实行内部自治就会造成严重的错误。

5月选举的结果，肯雅塔对党大获全胜。虽则有一二个重要部族临阵脱逃，它还是获得了几乎三分之二的选票。因此，他能够组成一个能代表广大部族的强有力的政府，并于1963年6月1日当内部自治政府成立之际，成为肯尼亚的第一任总理。想起来的确奇怪，这个人作为一个恐怖万状的叛乱的领导人，曾经被人如此害怕而痛恨过，可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不仅开始赢得了大多数非洲人的衷心爱戴，而且还赢得了欧洲人的尊敬和钦佩。他连续多年担任总理职务。的确，由于想到肯雅塔一旦去世或者退休，必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损失，人们至今还对肯尼亚的前途怀着不少忧虑。

显然，实行了内部自治接着就该很快实行独立。此事决不容耽搁；只要有信心就可能赢得一切。于是我批准于9月底之前在伦敦召开筹商独立的会议。这个会议如期召开了，大家就地区和联邦政府的权利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接着“卡杜”党领袖们威胁着要另外成立“卡杜”的国家，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1963年12月12日，肯尼亚完全独立了。<sup>294</sup>

在以后的十年里，情况有的变得好些，也有的变得差一些。对于欧洲籍土地所有者的压力增加了。政府通过种种办法把大量欧洲籍农场主的土地收购下来，以解决人数日益增加的非洲籍居民的土地荒。虽则收购的条件并不宽大，但却也并非完全是不合理的。肯尼亚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中有一点在英国引起了极度沮丧的情绪，连得对非洲人的愿望最抱同情的人士也是这样，那就是他们用以排斥所谓“非公民”、主要是亚洲人的法律所表现的那种极端

民族主义精神。由于不发给工作许可证,有大量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离开那里前往英国去,引起了相当紧张的局面。到了1967年初,当时的内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就感到有必要订出法律加以制止,否则它就有可能成为不可抗拒的冲击浪潮。不少欧洲人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谬见:认为非欧洲人之间一定是彼此十分投合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由于非洲人疑心亚洲人比自己聪明、勤俭,更善于经商,所以能飞黄腾达,这就增加了他们通常对亚洲人所怀的敌意。在商业中,亚洲人的确掌握了零售以及大部分的批发业务,而且还经营了大量的借贷业务等等。这样,他们就被当作非洲的犹太人来看待,并引起非洲人民的嫉视和痛恨。一项等于是大批驱逐出境的政策即使是可以理解的,也总是残忍的。

在其他方面,肯尼亚还是幸运的。因为在肯雅塔有力的领导下,虽则存在着不少经济困难,它一直能稳定发展,而且能保障国内安宁。

### 三、罗得西亚

在我担任首相的最后几年中,组成中非联邦的那几个国家的日益紧张的局势,虽然还没有使我万分痛苦,却也令人担心不已。为了达成可以为大家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一面继续去作出似乎是毫无希望的努力,一面却感到极为痛苦。这一段历史还由于各派领导人的高贵品质和热忱,而更具有悲剧的性质。他们每个人都致力于自己所认为的明智而公平合理的路线,但却往往不能理解构成这些可悲的但也许是无可避免的斗争的基础的深刻感情。

为了使事情经过明白易懂,有必要追述一下我于1960年2月从非洲回国以后的那个时期。<sup>①</sup>

1959年终,经过了在开头的一些周折后,一个由蒙克顿勋爵

<sup>①</sup> 见《指明方向》,第六章。

所领导的审查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宪法的咨询委员会，已经稳妥地建立起来了。它的任务是：通过研究“去实现 1953 年宪法（包括序言部分）所包含的一些目标的最适当的宪法程序及体制”，为预定于 1960 年召开的“审查”会议作准备。<sup>①</sup>

当委员会正在收集证据和准备报告之际，我开始明白，局势已变得多么微妙甚至危险了。例如，将近 1960 年 4 月底，当南罗得西亚总理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来伦敦拜访我时，就可以清楚看出这些头面人物的争权夺利是多复杂。我不仅为了政策，也为了信义的关系，决心尽力去使中非联邦存在下去。鉴于在整个大陆中非洲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情况，我对这种做法能否成功的确已经有所怀疑了。从贸易和发展经济的观点看来，把南罗得西亚、北 296 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组成一个联邦是有其种种好处的。非常明显，制订出这个有想象力的计划的人们，假如在 1950 年就知道那阵突然刮起的变革风会如何猛烈地吹遍非洲，而且几乎达到了飓风的程度，他们就会踌躇不前了。但是我们已经保证要尽力而为之；由于资本的输入和工业的发展，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市场以及建成了一些重要的工程，其中尤以卡里巴水坝为突出，不仅当地的欧洲籍居民，而且连非洲籍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有了相当的或甚至惊人的提高。这个体制已经为所有的地区带来了如此明显的好处，我们决不可以不负责任地将它抛弃掉。

虽则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对中非联邦的前途开始产生怀疑了，不过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却毫无此种想法。他不仅致力使它存在下去，而且对它的种种成就感到真正的骄傲。他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逐步建成一个多民族体制，它将使非洲人占有合理的地位，并且使他们对这个新颖而鼓舞人心的概念更

<sup>①</sup> 《审查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宪法咨询委员会报告书》，敕书第 1148 号（皇家文书局，1960 年 10 月），第二段。

加忠心耿耿。可是尽管他既热情又有献身精神——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品质——他却赞成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政策。联邦宪法原来是由英国政府制订的。在他看来，这是绝对不容违反的。他在联邦议会中是多数派，票数相当多，他把人们以那个横扫非洲的激动人心的浪潮为根据而提出的一切责难都看作是将来发生背叛的迹象。所以，虽则他具有坚强而果断的性格，却感到穷于应付自己在此刻所面临的新问题。因为联邦议会实际上仅是一个代表欧洲籍人的议会，稍为有几个非洲人聊作点缀罢了。不幸他甚至也无法得到态度比较温和的非洲人的同情——也许无论如何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可是他却献身于多民族主义的事业，而且真诚地相信，要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就应该使联邦存在下去。

同时，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定居的欧洲籍人为数较少，那里的非洲人领袖们由于看到英国在非洲的其他属地已经稳步地取得了独立或者即将取得独立，自然希望他们的地区也能取得类似的地位。在此同时，代表着人数众多的欧洲移民的南罗得西亚政府和议会也开始考虑：要是解散联邦，让南罗得西亚得到法律上的独立，会不会对自己更有利？南罗得西亚自1923年以来，在欧洲籍人统治之下，除了几条重要但为数不多的限制之外，实际上已经享受到了这种待遇了。

但是怀特黑德的建议却使我几乎大吃一惊。

他……使一个已经够困难的局面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复杂问题。他要求“取消”联合王国政府对（一）土地（二）对非洲人区别对待所保留的权力。他似乎不理解在我们这里的、在非洲的以及同蒙克顿委员会有关连的一些政治难题。<sup>①</sup>

我和几个主要的同僚商量后，对他说我们就要

去考虑，是否可以制订出另一个同样有效的办法——设立一个法庭或是

<sup>①</sup> 1960年4月26日。



通过一项人权法案，或是设立一个由非洲人占半数的上议院。他表示同意说，这是合理的。但是他迄今还只能拿出极其初步的方案。他威胁着要回去把南罗得西亚议会解散掉，并且要以“脱离”……联邦为口号去进行大选。<sup>①</sup>

这大概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南罗得西亚去实行“独立”。

同样，虽然释放黑斯廷斯·班达博士以及终止在尼亚萨兰的紧急状态之举，已经使局势有所好转，可是在刚果的事态是会引起反应的。在南罗得西亚出现了一些麻烦的迹象。7月19日，有三个非洲人领袖被捕了，接着发生了抗议性的示威。7月24日，在布拉瓦约市发生了骚乱，其中还夹杂着抢劫和纵火的事件。在秩序恢复之前，有十一名非洲人被击毙。韦伦斯基表示担心在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将发生新的骚乱。

在这个有点激动的气氛中，也有这么一桩令人高兴的事情。7月25日在伦敦召开了修订尼亚萨兰宪法的会议，并且于8月4日完全达成了协议，将设立一个由非洲人占多数的立法委员会，而在行政委员会的十名委员中，至少将有三名非洲人。<sup>298</sup>

传来了尼亚萨兰会议取得成功的消息，这可算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这是殖民大臣（麦克劳德）的一次大胜利。要是这个消息靠得住的话，就会使整个联邦的问题缓和下来，而蒙克顿委员会则将就该问题提出报告。<sup>②</sup>

可是我的乐观想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因为很显然，不论实行哪一种新宪法，班达博士都必然会得到全体居民的拥护，而且他自己不久也就会谋求脱离联邦。任何代表非洲人民意志的北罗得西亚政府都一定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怀特黑德由于认识到，他的党会因为联合王国议会在南罗得西亚还保有一些剩余的权力面临削弱

<sup>①</sup> 1960年4月26日。

<sup>②</sup> 1960年8月4日。

的危险，也同样地越来越坚持要求放松执行或废止非洲籍人依赖的英国政府的保护办法。因为他认为，除非能够做到这一点，更严厉的压力将引起人们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以使欧洲籍居民保有类似他们在南非的地位。

尽管自己是忧心忡忡，不过当我于9月初接到蒙克顿报告书时，还是感到有希望达成某种协议的。不出所料，这份报告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所有的二十六名委员，除了两名之外，一面认识到大部分非洲人强烈反对保存中非联邦，一面却都认为，事实证明联邦对所有有关方面都有重大的经济价值。这部分是因为慑于民族主义派的威吓；部分由于不理解经济利益的重要性；部分还由于坚信联邦一直在阻碍非洲人在政治上的进展，并且认为它还依靠着南罗得西亚的力量，正在实行而且甚至扩大种族歧视。

我们认为，在北部地区，非洲人反对联邦的势力如此浩大，已不可能使联邦照目前形式维持下去。<sup>①</sup>

我们认为，非洲人对联邦已经十分不信任。假如不使联邦组织本身以及南罗得西亚的种族政策产生激烈和根本的变革，就不可能消除这种心理。<sup>②</sup>

因此我们建议改变联邦宪法，大大增加非洲人在联邦议会中的席位比例(虽然还不是多数)；建议在北罗得西亚迅速进行修改宪法，参照最近商定的尼亚萨兰宪法，使非洲人在立法委员会中占多数席位；在南罗得西亚的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法律应当修正或废止；应制订出人权法案，并在各地区设立国务委员会以检查新订的法律是否违反人权法案。不过作为最后一着，“我们达成了下述的结论：女王陛下政府应该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自己准备去考虑一个地

① 敕书 1148 号，第 49 段。

② 同上，第 74 段。

区政府提出的脱离联邦的要求”。<sup>①</sup>由两个委员所提出的少数派的报告认为，由多数委员所提出的报告过高估计了联邦所带来的经济好处，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对非洲人所带来的好处，并要求即将召开的审查宪法会议举行公民投票，以便测知（不论是否有公民权的）居民是否愿意让联邦存在下去。“我们自己的看法仍然是：中非联邦应该立即解散”。<sup>②</sup>这两个委员还要求在审查联邦法律之前召开北罗得西亚的制宪会议，并让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实行“自治”。

接着，我们同韦伦斯基发生了长期的争论。他坚决认为这份报告只不过是“一篇讨好非洲民族主义派的文章而已”。他认为，<sup>300</sup>报告中所提关于某些地区要脱离联邦的事是越出蒙克顿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而且他所得到的保证已经把这一点排除在外了。反之，我却感到没有必要去接受或者拒绝这份报告书——它有助于解决问题，是提出来供审查委员会考虑的，而各方面对于这个审查委员会都负有责任。

至此事情已经很清楚：只能通过联邦本身的优点以及必要的让步才能使这个联邦维持下去。它必须依靠说服力而不是依靠暴力。不幸在报告发表前的一二天，在索尔兹伯里和格威罗两地发生了严重的暴动。接着便制订了高压的法律，引起联邦大法官提出辞职。所以我对于在10月11日发表报告书这一点是相当担心的。这份报告受到了报界的欢迎。虽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一个狭隘的法律观点看来，韦伦斯基很可以借口说调查委员会已越出其职权范围，而完全拒绝这份报告书，我却明白形势马上就需要我们提出一项涉及面更广的、更有力的办法。我们总得设法召开审查宪法的会议，这已成为我的第一个目标。

① 敕书 1148, 第 300 段。

② 同上, 少数委员的报告, 第 31 段。

在答辩中，我关于这事的发言在国内受到了欢迎；但是，不出所料，韦伦斯基却坚持说，他原来所得到的保证和我最近在议会所作的几次声明是无法调和的。

他认为我的发言是不公正的，他要在下星期作出回答，还说他愿意让我们把彼此来往的电文予以公布，“让世人对此作出判断”。<sup>①</sup>

我不能同意这个做法。

301 我不能坐等韦伦斯基爵士来“挑战”。我已经打电报给他，提出立即（就是说在星期一）发表有关的电报，但要求他在第一次泄露英联邦总理之间的私人秘密电文之前再考虑一下。……我不认为发表了这些电文会在任何其他方面（除了开了这个恶劣的先例之外）有损于我。我到底并没有改变或者扩大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正由于我没有这样做，工党才拒绝派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对于委员会在实际上所作所为，或者它是怎样来解释自己的职权范围，并不负任何责任。我只可能把报告书压住，不让发表——可是这种做法将是不可思议的。<sup>②</sup>

韦伦斯基终于撤回了他的要求，虽则我认识到对私人信件应该严格保密的原则，我还是感到有点懊丧。他

现在不想发表我们之间来往的信件了。我感到高兴，因为这将成为一个不好的先例。但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假使不是直接地，至少也是含沙射影地）又重新责备我们“不守信用”，这是相当令人头痛的，因为我现在不能以发表信件的内容作为回答。<sup>③</sup>

幸而韦伦斯基虽然往往有点急躁，却是宽宏大量的。当他于11月底来伦敦时，

我和他于进餐后好好地谈了一番。他虽然很悲观，但是态度极为友好。他在实际上收回了所有责备（或者诋毁）我不守信用的话，虽则他仍然对

---

① 1960年11月2日。

② 1960年11月3日。

③ 1960年11月7日。



蒙克顿勋爵极为不满。他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来自罗得西亚的所有欧洲籍人会在这份报告上签名？”<sup>①</sup>

现在召开决定中非联邦前途的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会议将于1960年12月5日在兰开斯特大厦进行。在以后的几周里，会议的进展照例一直是变化无常的，此刻我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两个国务大臣，英联邦事务大臣桑兹和殖民大臣麦克劳德负责主持会议工作，桑兹负责处理整个中非联邦和南罗得西亚的事；麦克劳德则经管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事。

（我于上午十时到达兰开斯特大厦，即往“咖啡室进行活动”，我在那里见到了包括班达博士在内的主要代表们，接着）我于上午十时四十五分在兰开斯特大厦（向报界、无线电广播记者们、电视广播记者等）发表了一篇简短而正式的演说，作为会议的开场白。接着报界等方面的人离场，我们商妥了议事规则等事项。一切都很顺利，大大出乎我的意外。302接着我们实行休会，要等到第二天下午三时才开始进行“大辩论”。<sup>②</sup>

我在日记中写道：

会议迄今开得很好，不过我听说班达博士于今天下午稍晚时忿然退出会场（而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不论欧洲籍人还是非洲籍人，只要我们稍为得罪了他们，就要这样做）。人们认为，他不至于会完全不参加会议。<sup>③</sup>

同时，联合国大会由于对日益恶化的刚果局势感到不满，开始插手干预其事。

我……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去了一份电报，强烈抗议美国决定在联合国投票赞成亚非国家所提出的一个关于“殖民主义”的荒谬决议。赫脱国务卿把它称为“一份令人极为厌恶的文件”——可是他为了讨好亚非国家，却指示美国代表去投票赞成它。美国总统迅速对我作了答复，

① 1960年11月26日。

② 1960年12月5日。

③ 1960年12月9日。

答应重新考虑这个决定。<sup>①</sup>

我请所有代表都到契克斯别墅去。我已将这个地方交给他们去度周末。我于星期天晚上驱车前往那里参加宴会，当时

偶尔有人发表了一些简短的讲话，内容都很诚恳而且风趣。罗伊·韦伦斯基和班达都讲得很好。<sup>②</sup>

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集会——除了英国的大臣们和他们的私人秘书之外，还有罗伊·韦伦斯基爵士、温斯顿·菲尔德(联邦议会反对党领袖)、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南罗得西亚总理)、哈珀先生(南罗得西亚反对党领袖)、尼亚萨兰的班达博士、北罗得西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和南罗得西亚的乔舒亚·恩科莫。

不论这次“周末晚会”会产生什么结果，它的确是值得举行的。不少客人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

班达博士和邓肯·桑兹分别念了圣经经文的第一和第二课——人们认为这是很有象征性的。<sup>③</sup>

303 可是星期天的那种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次日，三个主要非洲人领袖

不经事先警告……就在今天下午会议结束时“退出”了联邦会议——他们在分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和电视谈话中说，这次退出后就“再也不参加”会议了。<sup>④</sup>

我同两位国务大臣就局势进行了商谈之后，决定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

局势没有澄清是“不能举行”地区性会议的。班达博士当然毫不在乎——因为大家对尼亚萨兰的宪法已表赞同，并将在来春举行选举。但

---

① 1960年12月9日。

②③ 1960年12月11日。

④ 1960年12月12日。

是非洲人却亟欲举行南北罗得西亚的地区性会议。因此，这一动议也许可能使他们明白事情应该怎么办。<sup>①</sup>

次日，12月13日，

我设午宴招待尼亚萨兰代表团——三四个欧洲籍人和六七名非洲人——包括班达博士在内。他们本来似乎不大可能出席——可是他们还是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个未经邀请的非洲人！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最后，我向他们开导了几句话，他们听了似乎很乐意。<sup>②</sup>

桑兹和麦克劳德都极力使各种会议恢复原状。接着

在中非会议中……发生了不少争吵，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一直开到翌晨二时，好不吃力。<sup>③</sup>

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是会议内容过于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大受

报界和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和教育电视一样坏）的奉承。它们自动提出要无限制地传播他们的谈话——任何时候，不分昼夜，都可以举行“记者招待会”或是在电视表演一番。<sup>④</sup>

直到我清晨就寝时，

304

关于全体大会会不会受到所有非洲人的抵制，或者地区性会议会发生什么情况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解决。<sup>⑤</sup>

原来预定于次日上午十一时召开内阁会议，我只好把它推迟到中午。

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和两位国务大臣上午十时来访，我们争论了很久。怀特黑德爵士（没有告诉韦伦斯基或是桑兹就）已经写信给恩科莫（南罗得西亚的主要非洲籍人物），把他开除出代表团。这是由于恩科莫退出全体大会之故。但是这样也使他无法参

---

① 1960年12月12日。

1960年12月13日。

③④⑤ 1960年12月14日。

加南罗得西亚地区性会议——他可能是愿意去参加这个会议的。怀特黑德的情绪……很不好。他的视力和听觉越来越坏。可怜的罗伊·韦伦斯基爵士留了下来，向我倾诉他和怀特黑德之间的争执。<sup>①</sup>

12月17日上午，召开整个联邦会议。

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发表了讲话，对大辩论情况作了“总结”，这篇讲话虽然很尖锐，却还是相当公正的。他于昨晚给我送来了一份草稿，我已经说服他把攻击非洲人领袖们的某些话删掉。接着，邓肯·桑兹代表女王陛下政府作了总结发言，他出色地对各种意见作了一个恰当的评述。他设法找出意见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非洲人并不是真的反对联邦体制本身；他们所以反对，是因为目前它是完全处于欧洲籍人控制之下，所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于是桑兹……建议，我们应该（一）继续进行地区性的审查会议，（二）根据在（一）项中所取得的进展，停止地区性会议，以便使各地区政府在适当时候重新召开（联邦会议）。

我最后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桑兹的意见，并于一些代表们漫谈几句（这是危险的一刹那）之后，宣布休会。罗伊·韦伦斯基单独一人来吃午饭。我们作了详尽的商谈。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不过他也象不少身体笨重、肥胖、外表稳健的人物那样，喜怒无常。他禁不住不时要批评女王陛下政府几句——尽管在事实上我们几乎是他的仅有的朋友了。<sup>②</sup>

305

我们至少避免了会议整个垮掉的情况。当地区性会议取得相当进展时，就要重新召开联邦会议。在此同时，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的会议召开了，并于圣诞节前休会；南罗得西亚会议将于新年后在索尔兹伯里再度召开，而北罗得西亚的会议则将在伦敦举行。

对这些情况比较详细的叙述，可能给人们在这些会议期间不断出现惊恐和混乱的印象。可是真正关键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呢。非洲人要求在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的立法委员会中都占有多

---

① 1960年12月15日。

② 1960年12月17日。



数席位，而欧洲籍人却甚至拒绝考虑让非洲人在前者占一半席位以及在后者占有适当的席位。在这两种要求之间如何取得妥协呢？

同时，关于修改联邦宪法的问题仍然没有取得进展。在以后的十四个月里，努力的重点是为各个地区分别作出不同的安排。大家对尼亚萨兰的新宪法已取得协议，所以它不在讨论之列。那里仅有的变化是，班达博士于1961年8月取得了辉煌成就，他接着又在1962年提出了脱离联邦的正式要求。尼亚萨兰一直保持平静。班达博士由于他的爽朗而有魅力的性格，开始赢得了政界内外的所有欧洲籍人的信任。所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南北罗得西亚。

至于南罗得西亚，桑兹于1月底向我报告说，在那里，人们的情绪很激昂。不过这位英联邦大臣由于处理得法，终于能够于1961年2月7日在索尔兹伯里会议上使双方就总的原则取得几乎完全的协议。只有自治领党，即极端欧洲人派，表示反对。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又同政府以及各党派人士举行了几次进一步的会谈，于6月1日就新宪法的细节达成了最后协议，并且在英国议会中予以宣布。这个方案包含一个选举立法会议的复杂办法，它拥有六十五名议员，其中五十名代表全体选民，十五名代表选区，并有着两种具有不同资格的选民名单，还有一个“增加”票数的巧妙办法。其目的在于保证使非洲人的代表人数略有增加。更远为重要的是，随着非洲人所受教育和所拥有的财富的增加，这个办法还为进一步扩大非洲人代表名额敞开着大门。还有为将来着想的一些办法，也具有不相上下的重要性。将公布一项“人权宣言”，在这个宪法颁布之后通过的任何法律，凡是违反“人权宣言”者，都将无效。法院将是唯一的解释者。此外，还要设立宪法委员会，以就任何拟订中的法律是否符合“人权宣言”这一点，向立法会议提出咨

询意见。同时,现存的当地土著的保留以及土著地区,将被视为部族托管地,而置于一个独立的托管委员会管理之下。最后,只有在立法会议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赞同下,再加上欧洲籍人、亚洲籍人和有色居民分别举行的公民投票的赞同下,或者在向英国政府提出后,才能修改宪法的基本条款。

这个宪法是桑兹的一次巨大成功,直到它在近年被非法修改之前,一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由于它仅仅稍为增加非洲人代表的名额,它自然受到了象罗伯特·特雷德戈尔德爵士和加菲尔德·托德那些声望很高的同情非洲人的欧洲人士的批评,它也受到了某些非洲人集团的猛烈攻击。不过它却表明了真正的进步。

根据协议的部分内容,在南罗得西亚的原有投票人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它如期于7月26日举行了,投票结果——使我们大感宽慰——说明绝大多数人赞同新方案。虽然接着发生了一些动荡,使怀特黑德采取了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两个月的措施,新宪法却在英国议会中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并于1961年11月23日得到了女王的批准。只有对选举办法作了必要的变动后,这个新宪法才开始生效。从而南罗得西亚议会于12月13日对选举办法作了更动,所以,南罗得西亚的制宪问题一如尼亚萨兰的问题一样,至少暂时不会引起什么公开争论了。

不幸人们却为北罗得西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它持续了好几个月。大会后没有过几天,我于1961年1月9日向韦伦斯基提出一项方案,要让非洲人在立法委员会中占有十六席,而欧洲籍人则占十四席,否则就无法满足非洲人的合理要求或者应付外界的批评意见。而且,增加了几名 *ex officio* (根据职位而任命的) 委员就会保证相当稳定的局面。我陈述了如下的意见:

在过去几天里,尽管有许多其他教人分心的事情,我还是一直在考虑预定于1月30日再度举行的北罗得西亚制宪会议。我想我们两人在

上次会谈中都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成败关系极大。不管困难多大，要是在会上能够达成合理的协议的话，如何解决联邦前途问题的整个性质就会大大改观。

当然非洲人要提出的目标和我们所认为是合理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需要我们设法加以弥合。我同伊恩·麦克劳德、奥尔波特<sup>①</sup>（暂代邓肯·桑兹）以及对这类事有过长期经验的亚历克·霍姆进行了几次商谈，我随信附上我们建议的大纲。这个建议允许在立法委员会中设置通过选举产生的三十名委员名额，再加上大约六名正式委员和二三名非正式委员，其中至少有一名是亚洲籍人。还可能再包括几个酋长，不过这一点还要经地方商榷之后再作决定。要是把他们包括进去的话，我们打算不让他们在委员会中享有投票权。

所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通过选举产生的非洲人和欧洲人委员之间的具体比例如何。据我了解，虽则我们将避免使用部落名册，在实际上，选举办法将是这样的：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使两种当选者人数之间保持平衡，而毋须根据种族来保留其名额。当你和我上次在这里会晤时，我们感到我们必须使非洲人和欧洲人代表的名额相等，或者采取诸如此类的办法。但是我猜想非洲人将会在会上提出取得绝大多数席位的要求，并且还要取得几乎所有的这三十个席位。要使他们降低要求是不容易的。实际的相等数是双方各占十五席。非洲人在立法委员会中的象征性多数可能是十六名非洲人对十四名欧洲人。但是非洲人委员即使再加上非正式委员，比起欧洲籍委员加上正式委员来还是少数。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两种比例的实际结果是一样的。再加上我们设想中的行政委员会所具有的性质，照理是能够保证使实际政权继续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

我深深地感到，要是我们能够让通过选举产生的非洲籍委员达到勉强的多数（虽然欧洲籍人可能感到十分难以接受这一点），这也许会有助于使他们降低自己的要求，以使会议取得成功。在另一方面，我的确认

---

<sup>①</sup> 殖民部国务大臣 C·J·M·奥尔波特即后来的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高级专员（1961—63年）奥尔波特勋爵。

为，欧洲人会感到十五对十五的比例比较容易接受，而连这个比例也还需要你以及你的朋友用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获得通过。

以后就是环绕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进行一场长期而激烈的斗争。韦伦斯基在回信中根据他自己的观点罗列了所有反对意见。他根本否认自己曾经考虑过要让非洲人取得多数席位，甚至否认要让他们取得一半的席位；因为上述任何一种做法都将“标志着联邦的完结”。这将等于是把北罗得西亚的欧洲籍人抛弃掉，并让非洲民族主义派在将来主宰大局。民族合作的概念将就此完蛋了。这封信结构完善，而且还由于包含着不少强烈的呼吁而显得更为有力，它把真正的问题搞清楚了。韦伦斯基和他在联邦政府中的同僚们存心要在最后让尼亚萨兰脱离联邦，或者至少容许非洲人取得那里的控制权。可是北罗得西亚，由于它的丰富矿产资源以及它的巨大的经济潜力，却是联邦概念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而北罗得西亚就必须一如南罗得西亚以后仍将保持的状态那样，继续处于欧洲籍人控制之下。只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联邦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而且繁荣昌盛。不久大家就开始争得面红耳赤。我曾试图使韦伦斯基认识到公众舆论要求让非洲人占有一半席位或这一类安排的情况，他回答说，我们的计划是民族极端主义的蓝图。

309 同时，北罗得西亚会议于1961年2月初在伦敦召开了。北罗得西亚联合联邦党和自治领党拒绝参加。

麦克劳德正在伦敦主持北罗得西亚会议，它受到了韦伦斯基派欧籍人的抵制，但并没有受到约翰·莫法特爵士派自由党人们的反对。<sup>①</sup>

我以比较悲观的情绪对形势作了概括的叙述。严重的局势大大地加深了这种情绪，不过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活动，也许还是值得把它记下来的：

---

① 1961年2月4日。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简单的。欧洲籍人不是真的希望非洲人多取得席位，而是愿意在北罗得西亚立法委员会里让非洲人代表们取得略少于半数的席位（非洲人在南罗得西亚立法委员会里席位较此为少）。非洲人是要求“一人一票”的，不过他们会同意改进选举办法，以便得到一半席位（如有可能，或许还可以得到名义上的多数——但是这个多数要扣除正式委员人数）。这样就达不成协议了。女王陛下政府必须作出决定。如果我们过于偏袒欧洲籍人：

- （一）就会失去（非洲人）对女王陛下政府的信任。
- （二）在北罗得西亚就会发生严重的骚动，也许还会波及整个联邦。
- （三）（某些大臣）会辞职。
- （四）我们的政府和党将分裂为二。

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它总的说来是对非洲人有利的，但却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 （一）欧洲籍人将不再信任女王陛下政府。
- （二）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将宣布联邦“实行独立”，并且要试图通过武力或恐吓或二者兼施，以接管北罗得西亚的政府。
- （三）如果总督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就要发生内战——欧洲籍人将同英国官员、军队以及非洲人对阵。
- （四）（另一部分大臣）会辞职。
- （五）我们的政府和党将分裂为二。

我们必须于下星期内想出一个办法来。坦白地说，照目前情况看来，我还找不出什么办法。<sup>①</sup>

不过此刻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开始比较抱有希望了。我在自己于2月15日写给女王的信中，阐明了我们已经面临的情况：

自从上次我于2月7日写信给陛下以来，我已经不得不把自己的几乎全部时间用于北罗得西亚的制宪会议。虽然关于选举办法、行政委员会的组织等等其他重要问题还有待于大家取得协议，但是主要困难在于立法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蒙克顿委员会已经建议在新的立法委员

---

<sup>①</sup> 1961年2月4日。

会中，要让非洲人占当选的委员名额的半数或多数。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和北罗得西亚联合联邦党对这个意见感到很难接受。该党由于获悉陛下的政府赞同这个方针，所以拒不参加制宪会议。

通过相当次数的会议，并且通过英联邦事务大臣和殖民大臣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们终于能够制订一个巧妙方案的纲要，根据这个方案，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将区分为三类：

(甲) 由高资格选民即具有较高的选举条件的选民选举出来的人。

(乙) 由低资格选民即具有合乎选举资格的选民选举出来者。

(丙) 还有一些席位将同时由两种选民来投票选举，候选人要至少同时取得两种票数的一定比例才能够当选。这就是说，双方的极端派都不可能当选。

还要对低资格选民的票数（它要比高资格投票人票数多二倍）打上一定的折扣，免得使选举结果过于有利于低资格选民所要选的候选人。

311

经过了一些电报往来并通了几次电话后，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和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终于相信这基本上是一个好方案。殖民大臣也已经将它向北罗得西亚制宪会议提出来。虽则这远远达不到非洲人各党派的要求，不过还是有希望取得某种协议的。

这个解决办法经过全体内阁会议批准之后，就作为英国政府自己的建议在一份白皮书<sup>①</sup>中提出来。当我们把它提出来时，我并不向我的同僚们隐瞒下列的各种危险：欧洲籍人可能擅自采取行动或者非洲人将掀起一场近乎革命的严重骚乱；因为我们的办法就象一切想要调和矛盾的决定一样，一定会受到双方的猛烈反对的。因为韦伦斯基的比较温和的态度并没有维持多久。

我们正为应付北罗得西亚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即公开叛变——作准备。我们正在制订必要的……计划，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最严重情况。<sup>②</sup>

---

① 《北罗得西亚：修改宪法的一些建议》，敕书第 1295 号（皇家文书局，1961 年 2 月）。

② 1961 年 2 月 24 日。

不过尽管韦伦斯基认为这个决定是致命的，他却并没有采取什么极端行动，这是值得称道的。他继续忠于女王，始终如一。

韦伦斯基在(索尔兹伯里的)联邦会议上所提动议的措辞，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激烈，不过人们是可能把它作为采取暴力行动的根据的。它并没有要求实行独立，而是要求联邦政府“用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来反对在北罗得西亚的(亲非洲人的)宪法进行改革。<sup>①</sup>

同时，我接到

怀特黑德的一封内容很好的电报——他继续保持镇定，感到韦伦斯基很有趣，他显然把韦伦斯基看作一个冒失鬼(可能有点象约翰·莫利谈论哈考特那样)。我们还得等着看看韦伦斯基的演说词。<sup>②</sup>

幸而他就要来这儿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了，不久就将有机会和他 312  
面谈，也许至少可以取得一点协议。

韦伦斯基在这次令人痛苦的会议开始前几天到达，我们竭力设法要使南非留在英联邦里。可是在会议结束时，我为了不愿看到英联邦本身整个地垮掉而不得不忍痛放弃掉那个伟大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从而可以想见，在当时去讨论拟议中的北罗得西亚新宪法的席位分配和选民名册问题决不是时候，它不可能成为离开主题的一个很有趣的插话。不过，幸而当韦伦斯基和我单独共进晚餐时

显得很和悦……我请他为制订北罗得西亚宪法另外提出一个方案来，要是他不喜欢我们的方案的话。结果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方案所根据的原则。如果我们的建议——的内容——没有贯彻这些原则，或者其实施的结果会大大地违反原来的意图的话，那么就让他的官员们和我们的官员们一起开会，共同对这些建议作出一致的确实的估价，并且让他提出另外的方案来。他(于到达一星期后)在3月14日照这样做了，提出了三四种方案。我们于3月18日对这些方案加以讨论。虽则我们无法接

① 1961年2月25日。

② 1961年2月26日。

受他所提出的任何一个方案的内容，我却在实际上说服了罗伊·韦伦斯基爵士，使他同意让在卢萨卡举行的一些谈判进行下去。他提出的部分方案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方案：其唯一目的在于保证他那一派取得“固定的”多数席位。在任何选举中，总有一些那怕是极其微小的难以预料的因素。（这个想法似乎使他大为震惊。）<sup>①</sup>

我向桑兹和麦克劳德发出了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报告，大家终于商定要在卢萨卡继续进行谈判。当韦伦斯基在伦敦之际，他试图去争取著名的右翼保守党人的支持，在上院里他们是由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而在下院则以拉姆顿勋爵为首。我听说他已经向二百名以上的保守党下院议员讲过话，对英联邦事务大臣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就象感情冲动的演说家们那样，不明白“学单剑刺杀的人在自己的手指关节上一定会挨一下”的道理。不过比起他对我自己和我的同僚们的诋毁来，更使我担心的是：他的活动可能损害到怀特黑德在有关南罗得西亚宪法的公民投票中获胜的机会，这次投票是极为重要的。幸而后来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他一定知道了，要是万一发生政变，就必定会发生于南罗得西亚，而且会引起该邦去宣布——不论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独立。这并不能拯救联邦，反之，这将标志着它的最后灭亡。

我极力设法去使罗伊爵士相信：女王陛下政府几乎就是联邦的唯一朋友了。这儿的工党和自由党反对它。联邦所属三个地区的一切非洲人都反对它，莫法特和在非洲的其他自由党人也反对它。埃德加·怀特黑德随时都会放弃它以保全自己。罗伊爵士为什么要辱骂女王陛下政府？为什么要同我和我的大臣们争吵呢？为什么要煽动我党起来造反呢？为什么要挑动比弗布鲁克勋爵呢？如此等等。要是女王陛下政府垮台，继任者不会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和拉姆顿勋爵。他仅有的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们都要下台了……<sup>②</sup>

非洲籍人和欧洲籍人对于白皮书所提出的方案都感到不满

---

①② 1961年3月24日。



意。到5月初为止,人们为了修正或者充实我们的各种建议,一直争吵不休。非洲人希望作出有利于他们的修正,欧洲籍人也同样地认为,我们的建议内容太过火了。北罗得西亚总督伊夫林·荷恩爵士主张采取坚决立场。两位国务大臣桑兹和麦克劳德,虽然都是气度相当宏大、能够持开明见解的人,但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压力。麦克劳德一直受着一种崇高理想以及他对非洲人的热望所抱的深厚同情的鼓舞,桑兹也同样地认识到事态的必然发展,以不懈的努力去探索能保证进步而又不致于引起灾难的一些办法。5月8日,这两位大臣终于同意了某些经过修正的建议,并将其送给韦伦斯基,可是他立即加以拒绝了。桑兹、麦克劳德和我 314

对要向韦伦斯基提出的下一步办法取得了一致意见。此刻,北罗得西亚总督将要同意的一切办法都还不能使韦伦斯基感到满足。凡是能够满足韦伦斯基的任何办法都是无法为北罗得西亚总督所接受的。我们过去竟会去赞同象“中非联邦”这样艰难的计划——它竟使两位国务大臣负责主持同一地区的工作,这一点使我越来越感到吃惊。<sup>①</sup>

奥尔波特勋爵自从1961年以来一直担任驻索尔兹伯里的高级专员,他在这些纠纷中,一直向我们提供最详尽的情报,并且是一个极好的联系人。

在6月间,不论是在非洲还是在白厅,气氛的确开始变得阴沉了。在星期天(6月4日)开了几次长时间的会议,会后我开始感到我们就要接近绝望了;可是接着大家又达成了一项协议。

我相信,即使是由天使加百列想出来的办法也不能够得到普遍的支持,甚至还得不到所有有关方面的同意。……这意味着:我们得在两周左右,或在至多三周以内自行作出决定。<sup>②</sup>

---

① 1961年5月8日。

② 1961年6月4日。

于是我写道：

目前国内形势就这样继续下去。可是我们的殖民大臣（虽则是一个才气横溢、极其讨人喜欢的人）却不是容易相处的。他是高地人——这就是说，他很容易激动；也就是说，他既高傲又雄心勃勃。不过他有其优秀的品质——意气风发，娴于议会辞令。……

桑兹和麦克劳德大不相同。他处事冷静，有条不紊，性格极其坚强；他已经逐渐掌握了议会的辞令，工作十分勤奋，不容易使他改变自己的方针。<sup>①</sup>

6月18日，我从奥尔波特那里接到几份令人吃惊的电报，其内容显示韦伦斯基的脾气又变得难弄起来了。他已经获悉我们决心要坚持我们最近提出的建议，即让非洲籍人和欧洲籍人在立法委员会中的名额各占半数。因此他威胁着要到伦敦来动员英国舆论去支持他，以便为维护欧洲籍人在中非的地位而背城一战。我们驻中非的代表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报告，尽管他的电报所涉内容的性质极为严重，不过我确信我的同僚们是不会被它吓倒的。

在海军大厦召开了会议（非洲委员会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象富于经验的大法官那样的精明老手，还有某些象外交大臣（霍姆）那样的极为能干而敏感的人物。我们大家同意……要根据对白皮书所作的公平合理的解释，坚持和韦伦斯基作一笔“一揽子”交易。在北罗得西亚，“高资格选民占优势”这一点变成真正的问题症结所在了。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和他的朋友们要求做到这一点；虽则约翰·莫法特爵士（自由党）和非洲人在理论上要求实行“民主”或“一人一票”，不过他们会同意在选举全国性的席位时，让高资格选民所选出来的代表和低资格选民所选出的代表人数相等。换句话说（就象白皮书所提出的那样），五十对五十，或者（象罗伊·韦伦斯基爵士所要求的那样）六十对四十。不过在某

---

<sup>①</sup> 1961年6月4日。

些地方,我们还是能够基本上满足联邦党的要求的。①

同日下午,我认为有必要让全体内阁知道整个情况。

大臣们很好,他们放手让我们少数几个人去处理这桩令人头痛的中非事务。不过我感到已经到了非适当地让他们知道经过情况不可的地步了。这次内阁会议的时间拖得很长——因为要宣读不少文件和电文,而且还延长了讨论的时间。会议的性质和气氛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②

亚历克·霍姆单独来和我一起进餐,以便在商谈一些其他麻烦的问题时,连带讨论这件事。我并不想去缩小存在的危险,我甚至还加以夸大了。幸而桑兹此刻已经亲自前往罗得西亚,并能够对之施加自己的影响。

高潮的场面发生于索尔兹伯里——韦伦斯基正等候坐伦敦彗星号飞机到这里来,格林菲尔德③也一直打电话催促他快来。另一架较小的 316 但却更有诱惑力的飞机也在等待着他的吩咐——他可以到北罗得西亚去休息一下,钓钓鱼。最后他被召到索尔兹伯里机场的电话室里去,受到了邓肯·桑兹的严肃告诫……叫他不要来。他一来,我们就要对原来已经作出的一切让步重加考虑。韦伦斯基说:“这听起来倒象是一句威胁的话。”桑兹回答说:“正是。”④

此刻我正遵照约翰·理查森爵士之嘱全休几天;可是我的休养计划到第三天就横遭干扰。当我在苏塞克斯家里安静地打瞌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韦伦斯基要求我们作更多的让步。我回答说“不行”。我们已经答应了他原来四点要求中的两点——主要的两点。此刻绝对重要的事是宣布我们的决定,并停止争论。这一点似乎终于做到了。我于当晚七时接到通知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殖民大臣将于明天发表声明。⑤

①② 1961年6月19日。

③ J·M·格林菲尔德,联邦司法部长。

④⑤ 1961年6月25日。

尽管这次长时间的斗争引起了不少忧虑，我对情况可能好转还是抱着希望的。

如果罗伊·韦伦斯基爵士(他既不得意也不抱怨)同意我们的建议；如果他不提出愚蠢的威胁；如果南罗得西亚人不认为北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办法中有什么可以引起惶恐的内容，而却认为它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办法；如果他们因此在公民投票中赞成怀特黑德的新宪法；如果公众恢复了信心而且在整个联邦范围内随之又恢复了资金的流入和基本投资的支出；工党正责备我们向韦伦斯基“投降”，而《泰晤士报》则谴责我们向卡翁达和非洲人叛卖，如果英国下院能够在此情况下持合理的温和态度；如果这一切都实现了(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末这几个星期的辛苦和紧张也还是值得的。这事从2月份以来(从不间断地)一直在进行着。大臣们都“很焦急”。……麦克劳德虽然有着不少缺点，却一直有恒心、有想象力而且机敏。桑兹一直对我极为忠诚并且毫不知疲倦。我们向韦伦斯基作出某些让步之时，也并未放弃掉任何原则。<sup>①</sup>

317 6月26日，我们正式宣布了经过修改的关于北罗得西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即使没有受到议会和报界的批准，至少也得到了他们的默许。

我们奇迹般地为在一个近在眼前的危机商妥了一个解决办法。桑兹和麦克劳德都同意了，韦伦斯基——在压力下——也同意了。所以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既是镇静又团结的。<sup>②</sup>

不幸，近8月底时，由于在北罗得西亚发生了暴力行动，总督不得不正式下令禁止卡翁达的党，该党要求立即独立，实行“一人一票”的办法。殖民大臣也同样地受到了卡翁达的压力，这种压力旨在使他作出某些更有利于非洲人的新改革措施。但是对于显得仅仅是对暴力进行妥协的任何改革，我都加以拒绝了。不过，在欧

---

① 1961年6月25日。

② 1961年7月8日。



洲籍人温和派支持下的非洲人的强烈舆论给麦克劳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们于9月14日同意去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假如能够迅速恢复秩序,政府将愿意在真正制订北罗得西亚宪法之前,去倾听各方的意见。我休息了几天后回到伦敦,就同两位国务大臣碰头,我们终于同意了桑兹和麦克劳德

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声明内容。它宣称,我们无法在存在纷乱和暴力的情况下,听取针对我们的方案所提的抗议。不过假使一旦秩序恢复了,我们愿意在真正实施我们的方案之前,听取各方的意见。这当然同样地受到了韦伦斯基和卡翁达的强烈谴责!①

这时政府进行了改组,主要有关大臣的职务有了一些变动。1961年10月9日宣布,巴特勒将接替我去监督所有和共同市场谈判有关的大臣们的工作。他将继续保持内政大臣的职务,但不再担任下院领袖和保守党党组织的主席。麦克劳德将继任上述后 318 面两个职务。他是很适宜担任这两项主要工作的。当我把这个打算首次向麦克劳德提出时,他自然而然地感到犹豫不决。一方面是他对殖民地所感到的深厚而真正的关注,他已经把这么多的才智许定给它们了。另一方面是前程远大的下院领袖的地位,它必然会使他登上政府最高级的职位。对于请他担任党组织的主席这一点,他也是感到得意的,他已经以其他身份为党组织工作多年了。他经过考虑后,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这个变动使我们有必要去物色一位继任者;我幸而找到了雷吉·莫德林。他是一位能力与之不相上下的大臣。不过,要是我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我少受一些来自殖民部的压力的话,我注定是要大失所望的——我不久就发现莫德林的“进步”程度不亚于麦克劳德。的确,在某些方面,他似乎是更进一步了。

1961年11月,韦伦斯基前来作所谓“非正式”访问。在此期

① 1961年9月15日。

间，他对董事协会和下院保守党后座议员们都发表过演说。他的第一次演说确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已预定在他之后要发言。我感到他的谈话内容很不寻常，属于一种

据说是拉迪亚德·吉伯林所信仰的、间接抄袭的模仿性滑稽文学。我接着发言。奇怪的是，我们两人的讲话都受到了热烈的鼓掌。<sup>①</sup>

当然，这时我们两人都一直在极力应付在刚果发生的危急事态，罗得西亚对此有密切牵连，不过我们仍然维持友好关系。当晚我还为他举行了单由男人参加的宴会。与会者有政界、工业界、法律界以及宗教界等各界的许多知名人物。

在南罗得西亚，虽则有必要去禁止恩科莫的民族民主党，局势继续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但是要求我们对拟议中的北罗得西亚宪法进行修改的压力，还是丝毫没有放松。在1962年1月份，我们一直设法去探索某些合理的妥协办法。现在回想，当时双方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分歧，就使人感到相当难过——我们当时正试图制订一项宪法，使欧洲籍人和非洲籍人都感到相当放心，并试图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基础。各种方案的微妙之处和复杂情况是难以详述的，而且在今天看来，也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像瑟伊斯神父那样提出一个又一个方案以期使双方达成协议。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代表少数亚洲籍居民的席位？否则会不会说我们的做法本身就是否认多民族共处的原则？应该怎样在选举中设计一个成功的当选者都需克服的种种障碍，因而保证任何候选人都一定能受到各民族以及各种选民的最起码的支持？甚至连英国政府似乎一度也要依赖这样的巧妙办法才能保持稳定了。然而后来证明，它们都只不过是一个不现实的梦境中的一瞬即逝的魔影而已。

1962年1月30日，有关大臣进行了一次会议。他们经过长

---

<sup>①</sup> 1961年11月13日。

时间的讨论后,同意了一个修改过的方案,并将向内阁提出。

大法官负责起草各种文件和向奥尔波特发出的电文稿——以便找韦伦斯基商谈等等。这些稿件将于星期四向内阁提出。(要是得到批准的话)奥尔波特将立即采取行动。桑兹将于下星期前往索尔兹伯里,设法向韦伦斯基讲清事理。在这里,索尔兹伯里勋爵等是可能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但是我们的方案是公正而体面的。至少霍姆勋爵和基尔穆尔勋爵是这样说的,他们应该是明白这一点的。<sup>①</sup>

桑兹尽力而为之,不过他也向我们报告说,班达博士此刻的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尼亚萨兰有必要脱离联邦。将近2月底,当他回国时,我们又举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当我处于所有这些令人为难的困境中时,巴特勒一直对我很帮忙,他自始至终保持镇静和公正的态度——几乎是超然的态度。但是我却开始感到,虽则我们最终还是有可能为制订北罗得西亚的宪法找出一个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解决办法,不过“所有这一切仅不过是我们即将面临的可怕的困难的前奏而已。到那时候先是尼亚萨兰,接着便是北罗得西亚,都要提出‘脱离’联邦的要求”。<sup>②</sup>

北方的安定状态又恶化了,我们此刻还得去应付一个来自纽 320  
约的新威胁。从而我于2月24日向外交大臣送去了一份备忘录:

我看到了一件新的可怕事情——联合国过问到南罗得西亚的事了。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将要去调查在南罗得西亚的人们享有多少自由!

2月26日及27日,内阁根据目前看来无可避免的联邦解体的情况,讨论了它的前途问题。第一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从四时三十分开到七时。

会议的气氛和内容都极好。我们一开始就对中非联邦的整个局势

① 1962年1月30日。

② 1962年2月23日。

及其险恶的前途作了全面的检阅。尼亚萨兰已经要求“脱离联邦”了。一旦北罗得西亚获得任何自决的权利时，它的立法委员会也将会这样做。<sup>①</sup>

次日“继续进行讨论……大家都赞成及早宣布北罗得西亚宪法”。<sup>②</sup>因为尽管在国内外存在着包括联邦政府甚至有可能采取激烈措施在内的各种威胁，我的同僚们现在都同意去作出最后决定，并且立即予以宣布。我对于殖民大臣的态度仍然拿不准：

经过了大约三刻钟的讨论后，殖民大臣——很冷静地说——他感到政府和国家在一切方面都正面临着如此的重大问题，他愿意接受同僚们所作出的——任何——决定。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刹那——对我说来的确是这样。<sup>③</sup>

我们立即向韦伦斯基和奥尔波特发出了必要的电报，奥尔波特过去已经如此出色地在索尔兹伯里代表我们工作过。在这个关键时刻中，我一直受到了巴特勒和麦克劳德两人的大力支持。

321 但是此刻有人，特别是怀特黑德，开始提出了各种新方案。他已在韦伦斯基陪同下来到了英国。罗伊爵士于2月28日来拜访我。

他很镇静——相当温和。他试图对电报发得不及时这一点发牢骚，但是这其实不是重要之点。他根本没有必要为北罗得西亚的事跑到这里来。他还埋怨女王陛下政府多年来对待他的态度，并且通知我说，他已经决定回去举行大选。他将要求选民给他一份“给医生的委托书”以便“挽救联邦”。我没有追问他准备怎样做到这一点或者他是否打算使用武力？他已经抱怨报界拣起他自己的一句话“战斗”——所以我想这是他收回自己的威胁的一种方法。<sup>④</sup>

---

① 1962年2月26日。

②③ 1962年2月27日。

④ 1962年2月28日。



同日殖民大臣在下院宣布了政府的决定,反应很好。事实上,引起了这么多争论的修改内容只是次要的,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马上就要去应付一个重大得多的问题了。

我已经作出了一个结论,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它似乎受到了内阁的普遍赞同。过去两年的经验使我明白了,尽管大家抱着善意,尽管一般说来人们是会为保守党的内阁尽忠的,可是把整个中非联邦和南罗得西亚置于英联邦事务大臣管辖之下,而却把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置于殖民大臣掌管之下的这种体制,使人几乎无法处理工作。而且,一切当地显要人物都会很自然地去利用这种目前已经过时的分工办法,在进行谈判时就免不了受人谴责,说我们不讲信用,大臣之间所采取的政策互不通气。于是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在于把这个广大地区整个地置于一位大臣管辖之下。我在考虑之后,明白自己必须说服巴特勒去担当这项沉重而乏味的工作。他本人已经描述了自己是在什么心情下接受这个任务的,而且还叙述了自己是以什么办法来完成任务的。<sup>①</sup>两位国 322  
务大臣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解决办法。诺曼·布鲁克爵士一向不声不响,办事敏捷,已经为迅速完成技术性的细节作了安排。3月9日,巴特勒正式接受了我的建议。

此事经公布后受到了欢迎,

不过在开头是受到下院、报界以及善于思考的人的一阵嘲笑的。幸而韦伦斯基、怀特黑德、班达以及甚至卡翁达似乎都很乐意。<sup>②</sup>

要是韦伦斯基不那么仓促行事,他也许可能根本不会去要求进行联邦的选举,因为它无论如何变得有点象一出滑稽戏。非洲人党派和自由党由于反对联邦所以抵制它,其余的欧洲人党派则认为没有必要改选而同样地加以抵制了。甚至参加温士顿·菲尔德领

<sup>①</sup> 巴特勒勋爵:《处理办不到的事情的艺术》,第210页。

<sup>②</sup> 1962年3月24日。

导的罗得西亚联合阵线的极右政党，也决定把力量集中于南罗得西亚，不参加联邦的选举。这样，韦伦斯基的党实际上就无人与之竞选了。

巴特勒已经描述了他用以处理这一漫长过程的最后几个阶段的方法。<sup>①</sup>他于1962年5月访问了尼亚萨兰后，明白告诉他的同僚们说，尼亚萨兰脱离联邦的要求不能过久搁置下去了。在另一方面，南北罗得西亚的经济是如此地相互依赖，应该尽力设法达成某种形式的联合。6月28日，他终于能够宣布，将派一个专家小组到尼亚萨兰，去考察尼亚萨兰退出联邦后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影响。

在此期间，我感激地写道：巴特勒

的确使我们太平地度过了六个月。但是随着在11月召开的尼亚萨兰会议以及在北罗得西亚举行的选举，就开始有发生新危机的趋势。<sup>②</sup>

323 我得以无需处理几乎天天积压的大量来往电报，而且避免了在旧体制下所不断产生的各种压力，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10月底，北罗得西亚根据新宪法举行了选举。12月14日，一个非洲人的联合政府成立了。

非洲国民大会党(恩坎布拉)同统一联邦党(韦伦斯基)达成了一项交易后，似乎可能同联合民族独立党(卡翁达)一起参加一个非洲人的联合政府。这可能不是一桩坏事，他们可能开始去了解一下政府的职责，而不单是当反对派，享受清福。<sup>③</sup>

11月中旬，在伦敦召开了关于尼亚萨兰的会议，大家对于它接下去走向独立的一些阶段，取得了一致意见。巴特勒巧妙地处理了这桩事，所以大家并没有公开讨论过脱离联邦的问题。

---

① 巴特勒前书，第210—230页。

② 1962年10月9日。

③ 1962年12月12日。

但是一当我们宣布准备让尼亚萨兰享有脱离联邦的权利时，韦伦斯基就会吵起来。<sup>①</sup>

12月10日，三位联邦部长巴罗、考尔迪科特和格林菲尔德在韦伦斯基要求之下来到了伦敦，

以便就尼亚萨兰以及南北罗得西亚问题对我们施加压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满足他们。内阁已经决定，如果尼亚萨兰要脱离联邦（一如班达博士和他的党所当然希望的那样），就必须让它这样做。这个声明将于南北罗得西亚选举结束之后，在12月17日予以宣布。至于南北罗得西亚的前途，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我们是要筹划某种联盟的。但具体采取什么形式我们无法（象韦伦斯基要我们做的那样）保证。这是很令人难过的。组成联邦是一个好主意，可是又由于两个因素而遭到破坏了：（一）以意料不到（至少在十年之前并没有被人料到）的威力吹遍整个非洲的“变革风”，（二）先是由于哈金斯——他现在是马尔维恩勋爵——后来是由于韦伦斯基所执行的政策，使非洲人认为联邦就是象征白人统治。可怜的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成了一个受害者。<sup>②</sup>

正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南罗得西亚的选举使温士顿·菲尔德所领导的罗得西亚联合阵线取得胜利——欧洲各派中最开明的一派中非自由党彻底败北了。这样我们就遇上了我长期以来一直要避免的局势，不过此刻已是无可避免的了。联邦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从表面看来，南罗得西亚的选举（排斥了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而代之以温士顿·菲尔德）是一次倒退而反动的选举。但对巴特勒说来，事情可能更好办了。因为三个地区政府中没有一个赞成联邦的。但是，真正的危险当然就增加了。南罗得西亚可能不得不加入南非联邦。这样多民族政策就会归于失败。在非洲的白种人为了对抗非洲人的极端主义，就会被迫在到处采取极端主义。<sup>③</sup>

---

① 1962年11月26日。

② 1962年12月10日。

③ 1962年12月26日。

怀特黑德的失败使我深感痛心。因为他是他的温和而且甚至是自由主义传统最得力的代表。于是我在1963年1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他。

我没有在南罗得西亚选举之后写信给你，因为，正如你将明白的，这次选举违反我们大家之间的传统做法，不过我还是一直很想念你，我颇乐于趁拉布前来访问罗得西亚的机会，给你捎来这封简短的私人信。

政海的浮沉是不可思议的，有时是令人很痛苦的。你至少可以从自己的十分出色的成绩里得到安慰；而且我不认为你的工作会是白做的。你已经使许多人记住只有你才具有的理想和抱负。即使你暂时在选举中失败，你还是可以回头看到自己执政以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不相信，这种贡献就到此为止了。我十分希望，你能够在将来起着有价值而又有建设性的作用。总之，我总是愉快地回想你到这里来同我们会商时一直保持的那种温和以及谅解的态度。我希望你也有同感。

325 12月19日，巴特勒宣布英国政府同意让尼亚萨兰退出联邦。这自然引起有人在联邦议会中猛烈抨击我们不守信义，背弃了联邦成立时及其存在期间的一些协议。这些谴责是没有道理的，但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事情显然已接近于结局了。

1963年1月22日，巴特勒从罗得西亚向我报告说，他希望说明，并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三个地区自己分别要求解散联邦。在这同时，他感到尼亚萨兰的情况大有改善，2月1日该地区被授以国内自治的权利，由班达博士任总理，这样它将来的独立就得到保证了。实际上，除了个别联邦部长之外，此刻所有的人都不要联邦了，这些部长们对于自己所认为的天职继续忠诚不渝。

温斯顿·菲尔德访问伦敦是那年春季最重要的事情。他在这里从3月21日呆到3月29日。他来同我共进午餐，我们进行了一些私下的交谈。

他似乎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固执而不自负。他的另一位部长杜邦（司



法部长)是一个英国律师——聪明而却不太出色。……菲尔德说联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猜想,他是想自己避免公开这样说而叫我们(女王陛下政府)代他说这话。他不认为韦伦斯基会试图去发动一次政变。他感到韦伦斯基现在甚至已经失去了欧洲籍人的支持了。我警告菲尔德说,韦伦斯基可能试图在他自己的(联邦)选民中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这些人——其实——就是南罗得西亚议会的选民。假如他这样做,他可能赢得很大的多数票,宣布自己获胜,菲尔德失败。这位南罗得西亚总理似乎不大相信,不过我认为他有些惊惶。温士顿·菲尔德于饭后坦率地对我说,南罗得西亚当然希望取得“独立”。……但是他也承认加入英联邦的问题很不好办。不过要是英联邦和女王陛下政府不要他们的话,他们还是同南非有着很好的联系的,而且将在国防、经济发展等各方面与之合作。那时北罗得西亚对它说来就不重要了。① 326

我明白对他说,在采取复杂的步骤以解散联邦之前,在大家一致认为取代联邦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任何安排是符合大家的利益之前,南罗得西亚的独立问题也同另外两个地区一样,是不可能得到最后的解决的。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还必须为非洲籍居民制定一些适当的保障办法。过了几天后,

卡翁达先生和恩坎布拉先生来吃午饭——他们是组成北罗得西亚联合政府的两个非洲人政党的领袖。我们这边和他们会面的有巴特勒、大法官、麦克劳德和基思·约瑟夫。这顿饭吃得很不愉快。饭后可怜的拉布同他们进行了会谈。他们要求立即同意他们“脱离联邦”。当他对此表示异议时,他们就拂袖而去。我是于深夜接到这个消息的。②

我并不很重视这个插曲。卡翁达是一个能干的人,他明白自己只要等一等就可以了。

3月28日,内阁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后,我记述了自己的印象:

---

① 1963年3月22日。

② 1963年3月25日。

罗得西亚问题是讨论的主要内容。情况正朝着高潮发展。……北罗得西亚的形势是比较简单的。他们要我们授予“退出联邦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愿意来开会讨论联邦解散后各地区之间如何建立联系、主要是经济上的联系问题。他们认识到，联邦解体的过程也许将需要一年的时间。此后，他们期望(象加纳、尼日利亚等国那样地)先实行国内完全自治并最终实行独立。

南罗得西亚的情况比较复杂。除了国防和外交之外，他们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四十年之久了。我们不干预他们的国内事务这一传统一直是受到英国政府的尊重的。结果，直到一年之前，他们的议会中始终没有一个非洲人的代表。怀特黑德——在桑兹的巨大压力下——在限制性极大的选举办法下，选出了十五名非洲人代表。当然，他们在防务上一直依靠韦伦斯基的联邦军队以及他们自己的警察。最后，还有在国内外保卫南罗得西亚的(由欧籍农场主组成的)联邦地区师团。(在上次选举中被挫败的)埃德加·怀特黑德爵士是一个受过教育而且思想开明的人。温斯顿·菲尔德则是一个庄园主……他并非不具有某种魅力……。处于韦伦斯基支配下的联邦政府希望目前的体制能继续存在下去，不过(我想)它们也明白大势已去了。所以韦伦斯基和菲尔德正在搞一套出奇的花样。韦伦斯基的盟友怀特黑德已经败于菲尔德之手。菲尔德的一帮子人全是反动派，而且决心要“教黑人服服贴贴”。怀特黑德已经保证取消歧视、甚至保证取消在土地问题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考验——的歧视。他已经着手这样做了。菲尔德和他的一派却正在反其道而行之。菲尔德和卡翁达(甚至还和班达)此刻正结成一种奇怪的联盟。他们要取消联邦。不过现在既然局势已不可挽回，韦伦斯基就很可能和菲尔德结成联盟。南罗得西亚(似乎也有些道理地)提出要求说，如果联邦解散了，南罗得西亚也必须独立，而且韦伦斯基也会支持这个要求。女王陛下政府在实际上并无具体权力干预其事。不过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合法地位和某些道义上的影响力。南罗得西亚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二十万白种人统治着几百万非洲人，而种植园主的利益则在白种人中占支配地位。难道我们可以让有着这样的宪法、而目前又是

处于菲尔德领导下的这样一个国家……正式独立（而且大概还要向它提供财政援助）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会受到所有进步的而且甚至温和派舆论的谴责。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也不会使非洲人得到好处，而且会迫使南罗得西亚投入南非的怀抱。这就意味着形成一个从好望角直到赞比亚的白种人势力集团。这是不是一桩好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sup>①</sup>

在这期间，这些领导人物正在伦敦，他们在几次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向保守党后座议员们发表了演说。我自然听到了其经过情况。温士顿·菲尔德在3月21日发了言。他说他一直觉得联邦会证明是搞不下去的，不过他还是设法使它维持下去。现在既然联合王国也明显地要把它放弃了，南罗得西亚就要去探索和其余地区合作的办法，不过它还将坚持要求独立。卡翁达在3月26日的会上发了言，他强调北罗得西亚坚持脱离联邦的态度。韦伦斯基于3月28日发言，他说他由于一系列事件受到了英国人的指责，这些事其实是由于地区政府的行动而引起的，和联邦政府无关；可是他却成为一切事情的替罪羊。以后将发生重大的经济问题，“前途是很暗淡的”，以后还得由英国政府去收拾残局。如果联合王国政府解散联邦的话，他就会全力支持菲尔德所提出的独立要求。 328

3月29日，巴特勒代表政府向报界发表了声明，并予以广播。他在声明中宣布了我们要在地区之间保持某些联盟关系的旨意。同时，他也宣布了我们的决定：即，不得违反一个地区的愿望而强迫它呆在联邦里。必须召开一次会议以商定新的关系，这次会议最好在非洲召开。他本人已经描述了自己把这项决定通知韦伦斯基和他的部长们的那次教人痛苦的会议。<sup>②</sup>

---

① 1963年3月28日。

② 巴特勒前书，第225页。

一个新的而且危险的斗争开始了。温斯顿·菲尔德向我写了一封正式公函，他要把答应南罗得西亚独立作为它参加解散联邦的会议的条件。我觉察到全党在这个严重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有些人认为，要对我们实际上无法制止的独立加以拒绝是不现实的。还有一些人深切地关心到非洲人的前途，他们感到，即使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没有为非洲人的进步制订出有效的保障办法，我们在道义上就不应该答应南罗得西亚独立。内阁一直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讨，这与其说是一个实际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有关良心的问题。奥尔波特已经向我们报告说：菲尔德和他的同僚们似乎认为，即使他们擅自独立，也会继续使英联邦特惠办法、  
329 英国投资以及其他与英国有关的利益保持原状。我明白表示，应该告诉他们，“不能两全齐美”。如果他们成为叛逆者，我们就会把他们当作叛逆者来对待。经过多番考虑后，我们终于向温斯顿·菲尔德送去一封措词坚决而客气的回信。4月20日，南罗得西亚政府拖延了很久后，才复来一封正式回信：①

就我们所发出的关于“独立”的一封信，我们接到了一封冗长的、雄辩滔滔的、坚持他们自己意见的一封回信。他们要经过谈判而且无条件地取得独立。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们就自己干起来。反正一样，这封信的调子比较好听点，他们花了十天时间才把它写出来这一点，也许是一个好迹象。菲尔德是生手，他可能会尝到他自己也不得不遇上的一些苦头。同时，怀特黑德发表了一项极好的声明——开明、温和而且反对鲁莽的行动。②

可以用我于4月15日写给女王的信来对这时的形势作最完善的综述：

---

① 《女王陛下政府和南罗得西亚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1963年4—6月》，敕书第2073号（皇家文书局，1963年6月）。

② 1963年4月23日。



陛下的臣仆们最近所忙于从事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结束中非联邦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南罗得西亚要求立即独立的事。内阁已经开了几次会，主要有关的大臣们多次会商。陛下可能已经看到了上星期四以白皮书形式发表的一些来往信件。<sup>①</sup>我认为我们的答复是正确的，而且一点也不会惹怒别人。根据最近往来的电报内容看来，双方这种通信关系可望继续保持下去，以期能在最后召开某种会议。对于在会上，南罗得西亚政府是否愿意向非洲人的舆论作出让步这一点，我是没有把握的。当然要以保守党绝大多数议员的同意在下院通过独立法案，对我来说并不难做到。老实说，除非菲尔德先生和他的同僚们能作出一些让步，我认为独立法案是不容易通过的。困难在于，这位总理和新任的部长们都完全是新手。虽则我对菲尔德先生有很好的印象，我认为，他对于世界舆论趋势或乃至在罗得西亚的非洲人的要求都显得茫无所知。我们现在必须去做的是：召集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一起去认真讨论有关他们大家的福利的一些经济联系。不过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即不可能使两个由非洲人掌权的国家同一个纯由欧洲人掌握的国家结成一个政治联盟，我担心，除非所有各方都作出一些让步，要使他们在一个经济联盟中相互配合是困难的。不过唯一的办法在于有耐心，并设法缓慢而稳步地取得点滴的进展。

非洲人领袖们自然地以个人名义或通过联合国，开始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坚持立场。幸而孟席斯应我之请，极力影响南罗得西亚去采取温和的态度。5月9日，菲尔德略为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不再要求立即独立，而只要求从联邦正式解散之日开始独立。但是他认为，应该立即召开预备性会议，并提议于5月27日开始谈判。在政府的完全支持下，巴特勒同意这样做。他指出，假如在解散联邦会议举行之前还不能结束此项谈判的话，以后可以尽早恢复这种谈判。菲尔德接受了邀请，于是谈判开始了。此时我的同僚们都一直对于我们必须去应付的困境感到十分苦恼。不

<sup>①</sup> 敕书，第2000号。

过我明白,除非非洲人的利益得到正式而可靠的保障,不仅英联邦的亚非成员国大感不安,它们甚至于会因此而脱离联邦,而且连老的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会几乎同样地对我们不满。我们也把准备就南罗得西亚的独立问题,以及就解散联邦的问题而召开的两种会议,正式告知了议会。

我把谈判工作全部交给巴特勒去办。

331 “拉布”就他同南罗得西亚总理温斯顿·菲尔德的头几次商谈内容提出了报告。菲尔德显然开始理解一些生活的现实了。在这一阶段,他不能答应菲尔德什么,而却要逼他告诉我们,他自己准备怎样去使他的政权“开明起来”,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我请菲尔德来吃午饭,和他会面的有克罗默勋爵和钱朵斯勋爵以及澳大利亚的高级专员。菲尔德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似乎不大懂事。<sup>①</sup>

最后,菲尔德回到索尔兹伯里后,于6月13日通知我们说,虽则谈判并没有为独立打下什么基础,南罗得西亚还是准备去参加解散联邦的会议的。这项会议于1963年6月28日在维多利亚瀑布市如期召开了。

巴特勒自己已经叙述了这次会议的结果,他是以极大的机智来主持这次会议的。官员们努力工作,7月2日大家达成了完全的协议;联邦将于1963年底结束,并且已经令人满意地制定出了所有的复杂细节,以便至少能保持旧联邦中的某些实际上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于7月4日向他发出了如下的电文:

今晨内阁在开会时,就你掌握维多利亚瀑布市会议的办法,要我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场所——一次崇高的试验的完结——而且它是很可能在大家十分忿怒而且决心不再合作下去的气氛中结束的。可是你的手腕、经验和机智却使事情大获成功。你已

---

① 1963年5月28日。

经使与会的各个政府产生一种自尊感和责任感。如果中非国家今后会变得更加接近的话,这将完全归功于你的指导有方。

实际上,我同这些重大事务的关系就此结束了。在秋天,我们主要忙于应付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的一些决议,我们否决了前面的一些决议,并且拒绝参加对后面一些决议的表决。针对英国政府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殖民地和附属国采取的政策所提的那些抗议,对公正的人们是并无影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炮制这些抗议为的是国内的需要,而不是在国外有什么用处的。

关于南罗得西亚可悲的经过的其余部分,已是众所周知的了。<sup>332</sup>我至今仍以惋惜的心情反问自己,是不是有可能设法使南罗得西亚对非洲人的舆论作出让步,这样就可以使英国政府名正言顺地让南罗得西亚取得完全独立?不过当我卸任之时,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因为大家都同意在联邦存在期间,即1964年1月前,不采取最后的行动。但是回想到我们坐失的良机及以后的恶果,就不禁使人难过了。固然我们轻易地就看出了在非洲的欧籍人领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也同样地应该承认我们在国内的人们无疑犯过的错误。我们和其他政府一样,得去处理许多国内外问题,而在处理这许多令人困惑的国内外问题之际,我们还为非洲一些地区的前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我至今忘不了的。要是说,我们作为凡人固然无法保证事事必获成功,但是,我们还是敢说,我们是作了努力的。

## 第十一章 法国的否决

1962年秋，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接近最后的阶段了。虽然法国代表们极力拖延，可是由于希思和他的同僚们(大臣以及官员们)的手腕和决心，还由于其他五国显然希望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以减少英国的困难，法国的策略大多被挫败。由于休假而中断的会谈于10月8日恢复了；不少困难都逐步被克服了。至此戴高乐肯定明白，自己就得在短短几个月内去作出明确的决定。而且，我在我的同僚们的帮助以及在保守党的衷心拥护之下，也成功地克服了他认为可能是致命伤的一些障碍。英联邦国家由于相信共同体似乎可能会对它们作出某些让步，所以在9月份召开的英联邦大会上，经我们说服而接受了下述的看法：即，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后，可能加强它们的经济力量，从而也就增加了整个英联邦的势力。此刻将被称为“反共同市场派”的反对活动已经证明彻底地而且几乎可笑地失败了。在11月底的一系列补缺选举中，虽然选民背弃政府的情况是显著的，不过这是由于其他的因素而引起的。仅在南多西特区，有一个席位是由于欧洲问题而失去的。在这里，(继承了桑德威治侯爵爵位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个荣誉的)欣琴布鲁克勋爵即将退休，他支持了一个独立竞选的保守党候选人，由于这个人以反对加入共同市场为政纲，获得了大约五千张左右的选票，使安古斯·莫德——保守党的正式候选人——在竞选中失败了，并且使保守党失去了一个长期拥有的选区。不过，这个事件再加上其他选区选民背离我们以及我们在苏格兰失去的一个席位，使我们的某些较为懦弱的追随者甚为丧气。



星期六和今天的报纸都大肆喧嚷，他们预言议会党团将背叛我。唯一的办法是保持镇静并继续干下去。<sup>①</sup>

我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在布鲁塞尔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毫无困难地在议会中取胜。我当然明白，要是戴高乐准备使用否决权的话，他就会去寻找某种理由，或者不如说去寻找某种借口，六国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国都享有这种反对吸收新会员国的权利。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他后来就是以一个大伙熟知的理由为借口的。该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长出于最良好的动机但却使用了坏得无以复加的办法，屡次用他的笨重的皮靴着力地踩在法国人的敏感的脚步尖上。假如有两桩事情对戴高乐所起的作用不下于向来用以逗惹公牛的红布的话，这便是北约组织和英美的核威慑力量。我们这位老朋友把北约组织看作是北非的盟军总司令部和西欧的最高盟军总部的再版。设立在巴黎的北约组织总部是不断使他感到苦恼而且几乎是使他感到屈辱的原因。虽则法国随时都准备依靠英美部队而且最终还要依靠核力量来保卫欧洲的边境，它却希望忘掉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总之，这位将军是宁愿去抹煞这些事实的。5月初，在雅典举行的一次北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发表了一篇演说，虽然它在名义上是“保密”的，可是不久就“传开”了。6月初，他又在密执安州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把它的主要论点公开地加以阐述。没有什么比他的这样做法更能使他的英法盟友感到狼狈的了。他当然对除了美国以外的一切国家所拥有的核力量，都同样猛烈而笨拙地大加指责。他以双重的、不过有点自相矛盾的理由，对所有其余国家进行攻击，说它们都是“既危险”又“不能使人信任”的。他还要求所有北  
335

约组织国家花费巨款来购买昂贵的美国火箭，可是火箭的控制权却操诸美国手中，这对于他向英法政策所作的全面攻击，不啻火上

<sup>①</sup> 1962年11月25日。

添油。

麦克纳马拉关于核武器的愚蠢演说已经激怒了法国人，并且使我们处境为难……我在星期天将有个机会，把美国人在欧洲的一切方面所造成的重大损害，说给腊斯克听。美国建议要北约组织国家购买价值以亿万计的火箭，而核弹头却要由美国来控制，这使所有的盟国都大为恼怒。这并不是什么欧洲人的火箭，这是美国工业界的一种讹诈。至于共同市场，美国（虽然一片好心）却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们越是告诉德国人、法国人等说（美国）要英国加入，他们就越是促使这些国家把我们摒诸门外。最后，美元地位不稳了，而且到时候就会把英镑拉下去，并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片混乱，这时他们就走遍欧洲各国首都，说明自己的虚弱情况，要求别人帮忙。这样黄金价值（黄金股票）就上涨了。美国人（天真而缺乏经验）遇上了多少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外交手腕和计策同他们作对，这是相当可悲的。<sup>①</sup>

要是说法国人感到愤慨的话，英国国防当局和我国的实业界领袖们对于这种强制推销的办法，也同样地感到关注。这个办法是以推销真空吸尘器或者洗衣机时通常的优惠条件，来诱使大多数北约组织国家去购买一种叫做“军士”的短程陆军地对地导弹。这实际上就使英国电气公司所单独研制的一种更好的武器“蓝水”归于夭折。美国推销导弹的压力是无法招架的，于是造成了我们于8月中旬被迫停止研制自己的武器，并受到相当大的损失。无怪乎英国人认为，同美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变得有点象是单方面的交易了。大家公认“蓝水”的性能较好，可是在这次较量中，美国的军事外交所施的压力却更能奏效。于是虽然大家并没有选中“军士”，却不得不去购买它。尽管我向总统提出了抗议，却没有什麼办法可想。此外，还要记住使用这类武器的政策方面的重要问题。起初认为这种武器只是一种高级的大炮，而现在由于它具有五六百英里的射程，并运载着爆炸力极大的弹头，这个所谓“战术”核武

<sup>①</sup> 1962年6月19日。

器就同“战略”核武器没有什么差别了。我极力向总统提出了这个看法,他也在大体上同意了;不过他宣称,他的政府“是在积极地再次告诫北约组织,这就是麦克纳马拉演说的目的之一。”但是不幸,在北约学校学习的大多数学生们对于教师的笨拙教授法虽只提出温和的抗议,可是法国人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军事历史以及自己在欧洲生活中的传统领导地位,却几乎忿怒得说不出话来了。

不过美国人照样不顾法国人的敏感,继续推行他们所谓“不扩散核武器的原则”的运动。因而,我于1962年9月26日向在纽约的外交大臣写了一封信:

我确信,我们应该紧紧地把握住目前必须优先顾及共同市场谈判这一点。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不过问这个核武器问题,让美国人单独自行其是。由于美国政府似乎亟欲我们的谈判获得成功,我想你可以坦率而友好地向腊斯克说明我们的这种态度。

过了几天,当时在罗马的希思向我报告说,范范尼和他的同僚们亟欲支持英国加入六国共同体,不过他们也告诫他说,阿登纳此刻十分耳软,不管是什么离奇的提议都听得进。有人曾经对他说过,一旦我国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我国就要从内部来破坏它。

过了几天,戴高乐于10月10日,在法国政府失败之后解散了法国的国民议会。他曾经要求举行公民投票来修改宪法,以便使共和国总统通过全民投票而产生,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法国当然有许多记忆犹新的往事,为此目的而使用公民投票的办法是有过一些不幸的先例的。

法国的政局微妙不清。戴高乐已经傲慢地对各政党和议会进行挑战了。我猜想他会在公民投票中获胜(不过所获多数票也许会略少于他通常所得的票数)。一旦举行议会改选时,他可能得不到足以支持一个政府的多数票。这时他可能被迫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取消议会或再度

改变宪法。不过这会使他一直力图掩盖的“独裁政体”的实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重大的问题是——这一次变动将使他对付欧洲问题变得更难还是变得较容易一些？我怕它是更难对付了。①

实际上，公民投票是在完全不顾议会的表决的情况下，于10月28日举行的。虽然各方对于这个投票结果的含义有着各种矛盾的解释，法国宪法还是如期作了修改。

不过希思却从布鲁塞尔向我报告说，他一点也不沮丧，他还认为，法国人虽然会继续使用拖延的策略，却不能公开反对我们加入共同体。

11月中旬，肯尼迪总统由于感到在各方面堆积着大量问题有待解决，提议在圣诞节前同我会晤。

从肯总统那里又接到一份电报，他提议于12月19及20日举行一次会谈。这很好；不过我要依照在一二天前同亚历克·霍姆商妥的计划，先去会见戴高乐。假如我不这样提出的话，戴高乐就会疑心重重。②

在此同时，法国在11月底举行了大选，结果戴高乐派大获全胜，这和许多有见识的猜测大不相同。

338

现在和戴高乐以及和肯尼迪的会议已安排在12月下半月举行。我担心戴高乐由于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而更加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了。他会以最令人恼火的方式，对我在最近所遭的失败，加以慰问。不过他对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以及同俄国可能达成“缓和”的问题，都会持僵硬的态度。③

戴高乐地位获得巩固之后，其效果立即显示出来了。

特德·希思于六时半左右来访，我们于晚饭前后进行了详尽的商谈。法国人正在用一切手段来反对我们。……由于某些原因——才智

---

① 1962年10月10日。

② 1962年11月17日。

③ 1962年11月27日。



过人、秉性傲慢——他们使(五国)害怕……其实他们是害怕背上破坏欧洲联合的罪名。①

过一二天后,我作了如下的考虑:

戴高乐在公民投票和议会改选中都获得胜利后,目前地位十分稳固。他有点象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混合体——他本人当然是如此认识的。这就意味着,他将变得更加神秘、更加高不可攀,并大言不惭、武断其词了。同时,为了保护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具体利益(和眼前利益),他就会象一切法国老主妇那样地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在商场上讨价还价时寸步不让。布鲁塞尔的谈判正在拖延下去——不过我想,至迟到2月份或3月份,一定会见分晓。②

在这时期,正如一个政府长期执政后总会遇到的情况那样,政府在一些内政问题上,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我并不太重视职业选举统计分析家们的预言,只要我能在欧洲取得成功,我感到自己就一定能赢得议会和人民的信任。12月6日,

意大利大使于五时来访。我把自己写给范范尼的一封信交给他。(鉴于我对戴高乐的访问以及同肯尼迪的会谈)意大利人也要我访问罗马。我想最好预定一个日期(例如,在3月份)并在现在予以公布。③

在这两次重要会谈之前,突然一场风暴发作了。这是由于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发表的一篇无疑是深思熟虑而富哲理的演词所引起的。艾奇逊当然不是有意得罪英国,而是没有想到自己的话对如此微妙的局势会引起什么后果。他宣称,在他看来,英国已“不起”作用了。毫无疑问,如果他是在一篇历史性的文章中,在论及俄国和美国的势力和力量的相对增长情况时提出他的这个论点,就可能无所谓而不得罪别人了。我不认为国内的强烈反应是一个好迹象。

---

① 1962年12月1日。

② 1962年12月5日。

③ 1962年12月6日。

(因为我们应该是强大得可以对此类事情一笑置之)。公众舆论哗然(假如你相信报纸所刊载的是可靠的话)……钱朵斯勋爵、路易斯·斯皮尔斯以及其他董事协会的人向我写了一封正式的抗议信,他们已经把这封信放在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以及电视节目中广播,还把它交给昨晚和今晨的报纸去发表。所以我想最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回答一下。我一清早就把回信写好,并且经哈罗德·卡奇亚代表外交大臣表示同意之后予以发表。我认为,这将会使保守党以及国内的“爱国”分子感到高兴。不过它仍然坚持我在战后这些年头里一直宣扬的原则——即“相互依赖”的原则。<sup>①</sup>

我写给钱朵斯勋爵的信内容如下:

我方才收到了你和你的两位同僚代表董事协会给我的一封信,内容涉及前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先生在西点军校所发表的一篇演说。

我只从各报的报道中看到了这篇演词的内容。如果这些报道是正确的话,就艾奇逊先生似乎要诋毁英国和英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这一点来说,他已经犯了过去四百年以来许多人所犯过的错误,这些人包括西班牙国王腓力普、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以及希特勒。他也似乎完全误解了英联邦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340

至于他把英国想要单独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说成是差不多是无用了这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假如他对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任何其他国家曾经都持这种观念的话。这就是相互依赖的原则。如果要确保和平和繁荣,就必须在现代世界中运用这个原则。

我不知道艾奇逊先生会不会同意这个从他自己的论点中所引出的必然推论,我确信美国政府和人民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

会谈之前这一离奇的序幕太平无事地告一段落后,我们才有可能集中精力来应付真正的困难问题——这些问题确是令人生畏的。

此刻已经预定要举行两次会谈,第一次是12月15日及16日在朗布伊埃和戴高乐将军会晤;第二次则于12月18日至21日在

<sup>①</sup> 1962年12月7日。

拿骚同肯尼迪会晤。两次会谈都十分重要，而且此刻都乌云密布，令人不安。我去法国的目的是要向戴高乐作最后的呼吁，要他不再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我可以宣称，我和我的同僚们已经克服了来自英联邦和保守党的种种阻力，戴高乐本来是十分强调这些阻力的。毫无疑问，如果达成一项协议的话，一定就会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布鲁塞尔的谈判说明，在经济方面，为了适应英国农业的需要，可以立即安排出一个过渡时期。为了照顾到英联邦国家的特殊利益，也可以作出期限更长的一些安排。至于他如此重视的政治问题，随着以俄国人为一方和以美国人为另一方的力量的不断增加，并且鉴于美国政策中的一些令人担心的趋势，欧洲肯定应该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保卫它的最广泛的利益——在防务、外交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方面。他也无法否认，法国人民总的说来是欢迎英国加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联合运动过去就是由一些英法的头面人物所创立的。它曾经是和德国达成和解的工具。一个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西欧所有国家的有成果的合作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我仍然希望可能用足够有力的理由来说服这位将军，要他在 341  
欧洲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作出让步。不过我很明白，他除了有其孤立主义者的天性之外，还对美国近来在政策上的变化感到不高兴，甚至恼怒。麦克纳马拉对于“核扩散”的危险性的大声疾呼，是对英法决心在可预见的将来保有它们各自独立的核武装部队的一种赤裸裸的攻击。虽则我可以为通过北约组织在战略以及甚至战术方面进行全面规划的种种好处加以辩护，不过各个政府还是应该对它们自己的核部队享有最终的控制权。所以当我看到麦克纳马拉在 12 月 14 日于北约组织理事会上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时，就大感不安。毫无疑问，为了要孤立英法，他提出“鉴于某些其他成员国的意见”美国准备去考虑“为一个多边核力量作出一些可行



的安排,所有北约组织的盟国,在它的具体作战和运用以及对它的支援中都有份儿”。他接着说,这样一支导弹部队应置于“北约组织控制之下”。他并没有阐明这句话的明确含义以及如何实行这种控制。我明白戴高乐将军自然会把这篇即使是不含恶意地作出的演说(也许真的是这样)看作是阻挠法国发展核力量的阴谋的进一步的证据,而他是一心一意要发展这个核力量的,并且法国政府已经为此支出了巨大的费用。

虽然我同肯尼迪总统的会谈范围要涉及整个世界的政治,不过事实上,一个关系到英国核威慑力量前途的新的而且令人为难的形势,却肯定成为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必要简单复述一下 1960 年 3 月间所作出的一些决定。在我们先前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达成了一些协议后,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能够加速发展了一种核弹头。他们又能够倒过来对美国同僚们提供具体的帮助。虽则我们在制造核弹头或者核弹方面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不过我们还得依赖轰炸机或者自行降落的炸弹作为  
342 运载工具。可是由于防御技术更趋于尖端,有必要去发展从飞机上发射炸弹的方法。为此,我们已经能够通过一种称为“蓝钢”的装置,把炸弹射到离飞机二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把这个设备改进以后,也许还可能使射程达到三四百英里)。同时,我们已经开始发展了一种称为“蓝光”的地面火箭,而且已经花了不少钱。虽然在发展这种武器的过程中,是有着通常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挫折的,不过我们肯定可以成功地使其完善起来。可是部分由于总参谋长们当时感到我们这个岛太小了,在大都市附近安装这些固定的火箭有妨碍,部分还由于空军已达到了很高的效能,所以政府决定去依赖一种可移动的武器,因此我于 1960 年 3 月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达成了一项协议,据此,他将向我国提供一种从轰炸机上发射的新装置,美国人在这上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它被命名为“闪电”。



这和“蓝光”以及类似的技术不同，因为它虽然是从飞机上发射出来的，却同地面导弹一样，是一种射入大气层的火箭。所以我们感到，它似乎具备了适合我们需要的一切优点。它可以由空军从机场来操纵；它不需要巨大的、一般的地面基地；它保有我们的军事顾问们所要求的必要流动性。关于“闪电”的协议不仅是口头的，而且是正式有约束力的协定。同时部分为了报答我们让发射核导弹的美国北极星潜艇使用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些基地，艾森豪威尔总统向我们提出了确定的、虽然不是法定的保证说：如果“闪电”的研制万一不符所望的话，我们可以取得北极星导弹的主要部分，以便将其装设在我国自制的潜艇上来代替它。<sup>①</sup>

此后就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谣言说，研制“闪电”在技术上有困难；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肯尼迪总统都先后向我保证说，这些困难都会克服掉。直到最近 1962 年 4 月，国防大臣彼得·桑尼克 343 罗夫特还感到有可能向下院保证，他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挫折。的确，迄至 7 月 10 日，经过同国防委员会的几次会议后，终于商定了所需要的“闪电”火箭的数量以及将在英国制造的弹头的数量，而且还在华盛顿提出了正式定货单，并经接受。可是，随着这一年的消逝，这类谣言越来越多了，我国代表们所接到的消息是令人焦急的。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五角大楼各兵种之间有利害矛盾。美国海军自然希望集中力量搞“北极星”导弹，美国空军则竭力坚持研制“闪电”。不过鉴于麦克纳马拉在密执安发表的、以及他再次于 12 月在巴黎举行的北约组织会议上发表演说的含义，就不能不使人疑心美国有些人会把研制“闪电”失败一事作为把英国排挤出核俱乐部的手段而加以欢迎。

12 月 12 日，桑尼克罗夫特来向我报告他同麦克纳马拉在巴黎会谈的情况。这些会谈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国防大臣相信，

<sup>①</sup> 参看《指明方向》，原书第 251—255 页。

美国人是存心要完全放弃“闪电”的计划了。我作了简单的记述：

在两国都会发生大争吵。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下星期就要同肯尼迪进行一场大战。<sup>①</sup>

次日在华盛顿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说是由于没有预见到的技术困难和日益增长的费用，“闪电”的前途尚处于未知之数。虽则还要就此举行进一步的谈判，而且还要在拿骚作出最后的决定，这个声明自然在英国引起了一阵狂热的浪潮。

在比弗布鲁克勋爵带领下，“畅销”的报纸正在煽风点火，使关于“闪电”的争吵接近于歇斯底里的程度。所谓“负责的”报纸稍为好一些。总统已经声明，要等到我们本星期在巴哈马群岛举行会议后，才会作出明确决定。

344

同时，下院在进行议会质询时还相当平静，不过我意识到随时都会发生一阵强大的反美浪潮。（可怪的是）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反对共同市场院外团是其带头人。他们从内心说来其实是彻底的孤立主义者。<sup>②</sup>

我立即向我国驻美大使发了一封信，指示应该如何进行拿骚会议。我感到似乎一开始就应该讨论“闪电”问题。

我的苦处在于这一点，假使不能就维持英国独立的核威慑力量的具体办法达成协议的话，那末所有其余的问题都不值得认真讨论了，因为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的全部外交和国防政策作“痛苦地重新估价”。

我无论如何希望于星期二晚上——也许在晚饭后——当我们必须就议程进行面谈时，向总统提出这一点。

所以我是带着有点沉重的心情去进行自己所面临的两项任务的。我当然得较详细地把这些困难以及我们尽力去维持一个独立核力量的决心说给戴高乐听。我明白，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会得到他的同情的。不过我感到，他也可以利用美国不顾我国的利益

---

① 1962年12月11日。

② 1962年12月13日。

这一证据作为一个理由，以便反对我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同历届美国政府密切合作的政策。他肯定会对英美的不和感到高兴，其程度不下于他对英美的密切同盟关系动辄感到恼火的情况。

我和多罗西于12月14日下午出发前往巴黎。德朱鲁塔和往常一样充当我的总顾问和秘书。我们一到达，检阅了通常的仪仗队后，

驱车直赴大使馆，我在那里同大使和狄克逊夫人静静地共进晚餐。（我的孙子）亚历山大·麦克米伦（正在巴黎大学求学）前来吃饭，他看来身体很好。

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亚历克·霍姆分别来汇报关于北约组织的事。

虽然报上谣言纷纷，情况似乎还很平静。（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欧洲人兜售（没有弹头的）核火箭。他们似乎不大感兴趣。<sup>①</sup> 345

麦克纳马拉竟会提出这样笨拙的建议，我感到的确难以相信。这就象是把一支鸟枪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孩子，并对他说明他是永远不会得到子弹的。不过我们肯定会在拿骚了解到更多的内容。关于“闪电”，我的同僚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明确的看法，即，美国人已经决定中止这个计划，不过他们这样做是否出于政治还是军事的原因，仍然不得而知。

次日，12月15日，开始了正式访问。八时半，我和驻法大使鲍勃·迪克逊同车前往朗布依埃，让多罗西过一会跟着来，我们一开始先要进行一场猎雉活动。

我们受到了戴高乐的接见，约在九时半开始打猎，一直到十二时半，这时我们才进屋更衣进午餐。那天天气很冷，下了一点雨，不过还不算太糟糕。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介乎运动和操练之间奇怪的混合活动——这是很引人入胜的。有四条车道——都不长——由于树木都不高，除了靠近每条车道尽头的一种古怪的（由矮篱构成的）驱鸟尖刺之外，别

<sup>①</sup> 1962年12月14日。

无遮蔽物；而且由于（除了最后一条车道上的鸟儿之外）这些鸟儿都是刚从屋子里赶出来的，它们可算飞得很好了。帮助赶鸟的助手们都是穿着白外衣的兵士；装子弹的人是穿着一种军装的猎场看守人（他们的动作十分利索）；喇叭声吹得震天价响，又是一片叱喝声。“Ah! un double——bravo——un double!”（“啊，再来一个——嘿，再来一个！”）（意思是左右射击）很多鸟儿自然都飞得很低，不过由于风大，而且在大多数车道上的风都是横吹的，许多鸟儿飞的时候身体左右摇晃，看上去似乎很吃力又很有趣。这些鸟儿以前已经遇到过两次射猎了；我可以猜想到，当第一次射猎时，它们根本就不会飞起来。射击时枪和枪之间的距离很近，这是很令人为难的。……没有用狗（次日才用狗来找猎物），不过有不少“拣猎物的人”。所有击落的鸟都经过清点而且要记在各个射手的帐上。我们一起大约打了四百只（约385只雉），据说我本人就打了七十七只之多！这是一种不寻常而且老式得无以复加的礼节。我想英国爱德华王的射猎会……也不过如此。戴高乐将军没有参加射击，他只走出来观看了最后一轮。<sup>①</sup>

其余参加射击的人有英国大使，库塞尔先生（法国驻英大使），（我在阿尔及尔时已经结识的戴高乐的“抵抗运动”的老朋友）德布瓦斯兰贝先生、戴高乐将军的儿子戴高乐司令以及另外的个别人士。据说这次射猎会是由“国家射猎会主任”维德隆先生所组织的。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正式开始会谈。除了将军和我，加上我们的两位秘书代罗济尔和德朱鲁塔以及备用的一名译员之外，别无他人在这场。这次历时三小时的长谈涉及面很广，作了详尽的记录。将军一开始就说“我们有的是时间，今天不行，还有明天”。“我们此刻的情况就好比是两个无须慌忙的国家一样”。这句有点象谜般的话并不令人鼓舞。因为无论如何，就布鲁塞尔谈判而言，进度的快慢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回答说，我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是古巴事件以后的世界形势；接着是关系到法国和英国方面的欧

<sup>①</sup> 1962年12月15日。



洲局势；最后而且是最急迫的问题，即布鲁塞尔谈判。

在第一个，即世界全局问题上，这位将军以他惯用的概括方式，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曾经对于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大胆行动”感到惊讶；他对于赫鲁晓夫这样迅速地退回去也曾经同样地感到意外，而且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他的目的只在于讹诈而不是要发动战争，希望使美国人惊惶失措，以至于把柏林放弃掉。他怀疑赫鲁晓夫是否经受得起自己在威望上所受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提请将军注意一个重要事实：“美国可以用常规武器夺取古巴，而俄国人只能以核武器来报复。而在柏林，情况恰恰相反。”

虽则我们两人都一致认为应该设法达成某种缓和，可是我们的会谈并没有解决怎样以及何时才能做到这一点的问题。戴高乐只能说，西方国家应当为应付和平或战争的局面，更好地组织起来，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同俄国人进行有效的谈判。 347

关于欧洲防务问题，第一点就是核武器问题。我提到了那次为了建立一支北约组织核部队而举行的莫衷一是的商谈。在具备比较明确的谈判内容之前，很难作出什么决定。同时，英国已经拥有一支力量相当大的核部队了，而且我们决心使其在下述意义上保持“独立”，即其最终控制权将归属于英国政府。我认为这支部队对于英国是重要的，其程度一如类似的部队之对于法国那样。它是独立的标志，而且显出我们不仅仅是美国的卫星国或保护国。这是一个方面，而且是关键的方面。在此同时，我们应当同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一起组织我们的武装部队，因为结成同盟而却没有联合使用其军事力量的各种计划是荒谬的。为此，我们在战术上已经作出了安排，以便最有利地同时使用我国以及美国的部队。不过作为最后一着，我国对自己的部队应该有最终的控制权，以防万一发生需要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应付危局的情况。我想法国也可

能是这样的。

我接着说明了关于核武器运载工具方面所产生的困难情况；谈到了打算使用轰炸机、研制“蓝钢”、放弃使用地面火箭办法、研制“蓝光”以及同美国约定购买从飞机上发射的一种称为“闪电”的火箭等经过。现在美国人看来有可能放弃“闪电”的计划，不论以什么理由为借口，要是他们决定这样做的话，这就意味着，在五、六年之内，英国的轰炸机将无法深入敌人腹地。我国过去一直指望得到“闪电”导弹，而且已经发出了不少定货单了。我在同肯尼迪总统会面之前，是无法说明具体情况的。不过我希望向这位将军提出这样一项保证——我们是决心要维持我们的独立核威慑力量的。我将向总统说明，如果“闪电”不行的话，我必须从美国取得一个例如北极星导弹那样的足能抵得上“闪电”的代替物——否则英国将不顾一切代价，不得不自行发展它自己的、不论是从潜艇还是从空中发射的运载系统。

348 这项声明是有其重要性的，因为后来有人提出，这位将军所以要对布鲁塞尔谈判加以否决的原因就是因为于几天后和肯尼迪总统达成了一项购买“北极星”导弹以代替“闪电”的协议。在法国某些圈子里，甚至流传着这种说法，说我在这桩事情上欺骗了他，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当然戴高乐将军并没有同意让人家这样说，因为他不至于如此卑鄙。将军肯定是知道我的意图的，而且他后来还向我的许多朋友证实，我在这次会晤时，对他说过，要是美国政府取消“闪电”的研制工作的话，我就要设法去取得“北极星”来代替。<sup>①</sup>

戴高乐说，他听到我关于独立的核部队的意见感到高兴。他

---

<sup>①</sup> 当1966年3月有人在英国重提这一指责时，我就发表了一项详细的声明，说明事实经过，而且还加上了下面的话：“我已经把自己记忆的事实和私人档案材料核对过了。当时还作了详尽的记录，它现在肯定还保存在政府档案中。”

也感到，法国也需要这样一支部队。它的规模不大，但力量是强的。我们接着讨论了英法两国一直在进行的各种合作的办法。我说，除了泄露我们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关于核弹头本身的秘密情报之外，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办到。关于盟国之间需要有一个联合计划和需要共同制订指标这一点，将军实际上接受了我的论点。当我提到，在现代世界中，独立自主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在一个同盟中起着有价值的作用的一种方法时，他似乎表示同意。不过他感伤地说，其实在目前，只有苏联和美国是举足轻重的。他希望有朝一日，欧洲也会举足轻重；可是他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点，因为欧洲各国决心不大。我明白，这些话反映出富歇委员会没有取得成功，法国人已经通过它为共同市场各国之间在政治上的变革，提出了一些设想，但是却没有受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欢迎。戴高乐对此很不高兴。

接着我们谈到了布鲁塞尔谈判。我强烈要求使其迅速了结。我还说，我十分明白农业在法国的特殊地位及其对法国的重要性。<sup>349</sup>我国同样地也要去克服一些困难。不过我希望他注意到两大要点。第一，拖延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大量投资都搁起来了，这种情况正妨碍着经济发展。第二，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诸如统一的税率，结束英联邦特惠制度，或许还有对英联邦的某些不利情况，英国还是完全接受了罗马条约。我国要求欧洲共同体作出的让步，没有一项是越出罗马条约范围之外的。最后，当我上次在乡间别墅见到这位法国总统时，他还对我是否能够取得英联邦和我党的同意，表示过怀疑。这不是容易办到的事，但是我还是成功了。英国人民理解，一个日益扩大的市场的重要性；英联邦认识到了旧殖民地在建立自己的工业力量的过程中所处的新形势，也认识到联合起来的欧洲是关系到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的。英联邦的主要障碍，除了某些特殊的地方之外，都已经克服了。例如，新西兰的情



况是很特殊的，它是“英国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农庄”，必须特别加以处理。至于我国的情况，政府当然是冒了风险的；不过任何情况总要比已经被铁幕分为两半的欧洲再分为六国和七国集团，从而进一步变得四分五裂为好。一个联合的欧洲是欧洲力量的基础，这一点从政治角度来看较之从经济角度来看，更是如此。

将军的回答却是令人沮丧的。他对共同市场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价值感到怀疑，它仅是一项经济协定，如此而已。罗马条约的确对政治方面的变革有过设想，可是它在这方面甚至还不曾触及过。我们的建议将使原来设想的整个概念面目全非。他并没有说英国不能加入。不过在实际上，英国加入后会使共同市场大起变化。法国和德国在工业和农业上都有类似的经济结构。可是英国的经济体系却不同。它一旦加入后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共同市场。而且除了英国之外，还要接纳诸如爱尔兰和丹麦等等许多其它新会员国。第一次讨论就在这个相当悲观的调子里结束了。

在戴高乐的一两位部长以及他们的夫人们的陪同下，吃了一顿惬意的晚餐。我们同往常一样地观看了电影之后，这天晚上就算结束了。次晨（12月16日，星期天）上午十时恢复会谈。将军扼要地复述了前一天关于国际事务和国防政策的讨论内容后，就把话转到了主要的题目——他暧昧地将它称为“欧洲事务”。他抱怨说，他为欧洲在政治上的联合所作的尝试并没有产生效果。其它五国不愿意去制订出真正的共同政策。当然，它们的借口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美国人不喜欢这样做；有的说英国人会反对这样做等等。不过其实是缺乏这样做的意志。即使英国参加了，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为了使共同政策有其实质内容，就必须把它和某些具体目标配合起来，他看不出大家能够就什么具体内容达成协议。至于在布鲁塞尔的谈判，肯定是要拖下去的。六国之间的各种规定也许是过于严格了，以致不能适应英国的需要。我



坦率地说，将军的话使我惊讶，而且甚至使我痛苦。六个月以前，在乡间别墅会谈时，他问我过，英国究竟会不会成为欧洲的一员，而且把可能作为欧洲在政治上联合的基础的经济协定说成是主要的东西。他曾经表示担心说，我国同英联邦的关系可能使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我已经克服了这些障碍，而此刻仅仅由于富歇计划没有被人立即接受，将军就说，欧洲联合的理想就已经整个地完蛋了。我继续有点激动地描绘了丘吉尔首次创树欧洲运动时，存在于这个运动背后的理想及热情。戴高乐对这个反击似乎有点吃惊；虽然他比较详尽地为自己的立场作了辩护，我感到他这次有点措手不及。我继续指责他出尔反尔。他说，就算此刻英国的努力会遭到失败，也不见得会永远失败下去。我回答说，历史显示过，对国家也好，对个人也好，一旦失去的良机是很少能再得到的。一旦失去了一个机会，人们就必然会去走其他的道路，于是关键时刻就一去不再来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法就是这样。在乡间别墅时，将军曾对我说过，英国不会希望加入欧洲，这个国家和英联邦还没有作好准备。现在他却告诉我说，正由于其他国家还没有马上接受富歇计划，所以一切都变了，这使我极为痛心。

这时我们的谈话变得有点象争吵了。这在我们之间是很少有的事。但是我们很快就转而对英法两国的农业作比较详细的分析。虽然这次访问的余下内容是以责备的语气为基调的，不过暂时却没有宣之于口。戴高乐在我们回过头来谈到政治问题时说出的话也许是最露骨的了。他说，假如有朝一日可以在欧洲成立一个包括大约十个国家在内的政治组织的话，它们在什么问题上可能有共同政策呢？我回答说，假使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就必须把已经左右世界达二千五百年之久的欧洲文明的影响看作就此告终了。难道我们不能就国防、俄国、中东、远东、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不断使各个政府操心的多方面的问題，制订出一些共同的政策

吗？迄今为止，我们的政策是很少能配合的；我们过去就是因此而失败的。这时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关于上述这些大问题的一些具体问题——刚果、印度、中国、东南亚、非洲、埃及等等。

我们谈到中午十一点四十五分，这时外交大臣霍姆勋爵和英国大使鲍勃·狄克森参加到我这一边来。蓬皮杜先生、顾夫·德姆维尔先生、德库塞尔先生则来帮助戴高乐。先由戴高乐对我们两人的商谈内容作了总结，他以有点盛气凌人的方式说明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题目以及作出的结论。这是很有趣的，不过不知怎么地却有点令人恼火。当他谈及欧洲时，戴高乐把欧洲在政治上难以取得进展这一点说成是由于富歇计划失败之故。其实这是因为美国没有份，所以欧洲国家就不敢有所作为，从而他就认为没有什么基础能组成真正的欧洲国家组织。而且，要是英国加入了，接着挪威、丹麦、爱尔兰、葡萄牙，甚至西班牙也会要求参加。也许总有一天会搞出一些名堂来，不过只能慢慢地做到这一点。英国的确做得很对，但是它应当有耐心。布鲁塞尔谈判还没有结束，特别关于农业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对法国说来，目前共同市场情况应该保持不变这一点是重要的——不要急，慢慢来。我注意到，蓬皮杜对于他以如此消极的、颓丧的方式提出的这个悲观主张，似乎感到不快，甚至德库塞尔也感到有些吃惊。接着戴高乐谈到了关于诸如刚果、中国、非洲、东南亚等其他问题的讨论情况，并且说我们两人对这些事情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再次以一个小学校长向一个聪明而又有点勤奋的学生训话的口气，说了一些离奇的话以作结束。他宣称，英国更加接近欧洲这一点是重要的，它做到这种程度使法国感到很高兴，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完全要归功于我的领导。他接着问我还要补充什么话。

我感到不得不对戴高乐总统的悲观看法责备几句。布鲁塞尔谈判进行顺利，就要达成协议了。我们应该赶紧进行——不要拖

延。如果属于欧洲民族和传统的人们要想去起着无愧于他们过去历史的作用的话，欧洲就应该联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同美国、俄国、也许不久还要同中国这些巨人们分庭抗礼。富歇计划在原则上是很可以被英国所接受的。在目前阶段，我们无论如何相信应该组成联盟而不是联邦；也不应该存在着某一国在欧洲独享霸权的问题。布鲁塞尔谈判结束之后，我国自会同法国共同创造出一个完善的政治基础。在经济领域内，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是否可能建立共同的币制？还有关于防务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早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的话，就可能来不及了。也许不至于发生什么灾祸，我们各国人民无疑会继续生活下去。不过为整个欧洲所瞩目的这些谈判竟然破裂，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悲剧。我自己为了采取这项政策已经在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我相信，这是我对历史、对祖国以及 353 欧洲应尽的责任。戴高乐说了一句离奇的话作了回答。他谦和地说，我的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他不能不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一阶段时，丘吉尔先生对他说过，他在作抉择时总是要选中罗斯福而不是选中戴高乐。这句话使我感到有点吃惊，于是我就回答说，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只有美国才拥有丘吉尔先生所亟需的财政、经济和军事力量。我国的钱都用光了，只能依靠租借法案来过日子，所以我国在战争末期要比美国盟友为弱。我说，不管怎样，一当英国能作出抉择之时，它为了捍卫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独立，单独支撑了好几个月之久。戴高乐对这一切都承认了，但是态度相当不好。接着他提到在布鲁塞尔所遇到的困难。在六国共同体中，法国甚至可以对德国人提出异议；由于它的实力地位，它可以制止自己所不同意的政策。一旦英国等加入了这个组织，情况就不同了。而且世界的其余国家就一定会要求对它们作出特殊安排，一个扩大的共同市场就无力去抗拒它们。一种世界性的



自由贸易区可能是好办法——不过它不再单单限于欧洲了。

这时大家沉默了一阵，我经过思索后愤慨地说，戴高乐总统此刻提出的意见就是根本在原则上反对英国申请加入。如果法国真的持有这一观点，它应该一开始就说清楚。经过一年的谈判后，再提出在原则上反对我国加入，这是不漂亮的。这似乎使戴高乐相当震惊，他说我误解了他的意思。在这个尴尬的当口，蓬皮杜先生插话说，这“是一个日期的问题”。在外交大臣参加之下，我们稍为谈了一些关于柏林的事后，就散会去吃午饭。

英国大使后来把他自己和顾夫·德姆维尔之间的离奇的谈话内容告诉我。顾夫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我误解了戴高乐将军的意思，而且他似乎差不多要为戴高乐明显地改变态度表示歉意了。最后他承认，他实在也拿不准戴高乐究竟在想些什么。他认为，他主要是关注到在扩大后的共同体中可能产生的农业上的困难问题。我们的会议就在这个低沉的调子中结束了。

我于当天午后回到英国后作了如下的记录，以便把自己得到的印象概括起来。

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会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将军和我对于眼前对莫斯科的政策大体上意见一致。我们也一致认为有必要在适当时候实行范围广泛的缓和。

我们对北约组织和核武器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将军也和我们一样，不相信将来会在德国以常规军队进行大战。他（同我一样地）认为，这场战争只要打三个小时，或许至多三天。他认为应当保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不过我们两国应当合作。独立和相互依赖——这两者是否能够调和起来呢？到拿骚就可以见分晓。

但是在经济政策上——布鲁塞尔谈判和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戴高乐的态度十分僵硬。法国农业已经从德国榨取了最大的好处，他们还要死抓住这个好处不放。戴高乐却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治意义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否定态度。五国已经分别拒绝了“富歇计划”——



所以他（戴高乐）现在对欧洲失去兴趣了。他不要欧洲了！他要在六国共同体中树立法国的霸权以代之，并且不接纳新的会员国。（所有这些话都是在讨论时无掩饰地或者故意拖长了话音说出来的。有一次，甚至连蓬皮杜和德姆维尔也感到吃惊，试图去对这位将军的话重作解释。不过他十分坦率，毫不留情，而且似乎由于我们并没有更热烈地把他当作路易十四来看待而感到意外。）

从欧洲的观点看来，我认为讨论情况是糟得无以复加的。唯一希望的是法国人不愿意在世人面前公开破坏我国加入共同市场，不再毫无谈判的诚意。法国在农业方面的利益当然是巨大的，不过我认为，它对英国的嫉妒是一个更大的动机。法国人（或者不如说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希望法国能够支配六国集团。他们不希望有一个包含八国、九国或 355 十国的欧洲集团，而且在其中，大家的力量都是不分高下的。（我认为）这是目光很短浅的。……不过他们的自豪感和自然产生的孤立主义使他们对更为宏大的理想产生畏惧。这是一次十分令人沮丧的经验，当然这个残酷的真相是被人们用笼罩着这次访问的每一个细节的所有礼仪巧妙地加以掩盖了。<sup>①</sup>

以我看来，如果说这次访问是毫无成果而且令人丧气的话，它却也使我确信，戴高乐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必定要使用不论是公开的或是隐秘的手段来阻止布鲁塞尔谈判取得成果。我过去一直对这位伟大的法国人十分尊敬，所以想到下面一点就感到难过：尽管他具有魅力，彬彬有礼，但却由于他的气质中所固有的孤立主义，或是由于他对法国所实行的独断的以及几乎是专制的统治的影响，而且又没有受到议会政体中部长们所经常受到的那种约束，以致他的性格也起了变化——并且不是朝好的方面变。

我们以沉重的心情于 12 月 16 日回到伦敦。同日下午，同“闪电”的事有关的大臣们和官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会开得很晚。次日，桑尼克罗夫特向下院报告了他同麦克纳马拉会谈的经过，同时

<sup>①</sup> 1962 年 12 月 16 日。

还明白地警告说，“闪电”的前途不妙。乔治·布朗提议，现在应该是放弃拥有独立核威慑力量的企图的时候了。这话似乎并不太有说服力；不过它说明了甚至工党温和派所可能持有的态度。

同日，我出发前往拿骚。霍姆以外交大臣身份、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以国防大臣身份和我同行。英联邦大臣邓肯·桑兹后来也来了。我们占用了一座漂亮的房子，这是业主霍尔特夫人向我们提供的。

356 屋子座落在一个小岬上，两面临海，有漂亮的房间，一个精致的花园，各种舒适的设备应有尽有。我同蒂姆·布莱和菲利普·德朱鲁塔住在那里。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则住在俱乐部里（英联邦大臣在政府大厦下榻）。有这几位大臣和我在一起，使我感到十分安慰。<sup>①</sup>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宜人的天气就意味着，不管谈判是多么艰苦，我们至少将在最惬意的环境中开会。总统住在另外一幢美丽的房子中，并在那里布置了通常有的周密安全预防措施。

第一次会议是在12月19日九时五十分开始举行的。霍姆和桑尼克罗夫特和我在一起，还有英国大使奥姆斯比·戈尔以及两个私人秘书。陪同总统的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院的乔治·鲍尔以及两位大使：他们是美国驻伦敦大使大卫·布鲁斯和长期驻莫斯科的大使汤普森；此外还有麦克乔治·邦迪，我的属员对他已很熟识，可以和他密切配合工作。

会议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过去期望举行的关于世界重大问题的商谈已不幸由于这个“闪电”导弹的问题变得黯淡了。美国政府担心会做出什么得罪他们的北约组织盟国的事情来，我对于他们的这种恐惧是深为理解的。不过我们决不可以忘记历史背景。至今还记得核武器发展初期情况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我是其中之一。当时称为“合金钢管”的这个规划，本来是由英国科学家们所研究

<sup>①</sup> 1962年12月23日。

出来的。丘吉尔是基于安全和方便的理由，才和罗斯福商定把以后的研制工作交由两国联合在美国进行。但是欧洲国家知道得十分清楚，英国在这个领域里是一马当先的，而且可以说，迄至战争结束为止，它一直在这事情中和美国享有平等的权利。由于战后美国通过了麦克马洪法案而终止了英美的这种合作关系，它本来就不曾受到过什么具体的或者有约束性的合法条约的保障。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坦率地告诉我说，他认为这个法案的某些条文是不讲信义的。1958年之前，由于声名狼藉的一些间谍案件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使人们始终无法去修正这个法案。不过以后我们两国就357 就一直进行了完全的合作。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作了巨大贡献，而且我国一直做到了严格保密。我国已经研制了“蓝光”，大约已经花了二亿美元。这是一种强大的武器，我们原是可能使其完善起来的。但由于某些原因，我国决定在能够取得更好的装备的情况下放弃这个发展项目。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在戴维营同我商谈过关于“闪电”和“北极星”这两种导弹的事。我们接受了“闪电”，因为这似乎是延长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寿命以及利用其长期经验的好处的最好办法。英国政府也提供了霍利洛奇作为北极星潜艇的基地以作为报答，它大大地提高了这项潜艇武器的射程和作战能力。假使我们肯定得不到“闪电”，我们就得去找一个代替物。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向我保证，在必要时，我们可以指望获得北极星导弹。

不论共同市场谈判结果如何，我确信，它不会受到核武器运载系统问题的影响。戴高乐所表现的一些疑虑和踌躇是出于一些与此完全无关的考虑的。总之，我不认为，我们放弃了这匹跛马“闪电”，转而采用了看来是新的爱畜“北极星”，就会使法国或者德国大感不安。仅仅把从空中发射的导弹改变为从海底发射的导弹只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问题。最后我感到有必



要再补充一点：要是研制“闪电”的一些困难是被利用、或者似乎被利用来作为一个手段，以便剥夺英国的独立核力量的话，其结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我国人民中赞成自己拥有独立的核力量者和反对者，都会痛恨这种做法。这会损害到民族自尊心，我国将尽一切力量加以反抗。

肯尼迪似乎有点吃惊。他立即说，并非由于政治原因而作出放弃“闪电”的决定。他提出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建议，说美国政府将负担以后研制费用的一半，英国政府则负担另一半；估计还得花二亿美元的总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有购买这些导弹的权利，但是美国人却不能保证去买它。他提出了这番有点教人吃惊的建议之后，就说到美国让我国转而采用北极星导弹的难处。他不顾我说的那些话，仍旧认为，这样做会使戴高乐更加不信任美国，而且会使他指责美国人想继续支配欧洲的这一点，变得更为有力。

我们进行了常常是争得面红耳赤的讨论，在这过程中，美国人继续坚持说，让英国改用北极星导弹以取代“闪电”，是他们在道义上所不允许的一个原则问题。经过了多番讨论后，总统还争辩道，他所提关于“闪电”的建议将使我们恢复到一个月以前的情况。我说，虽则他所提的关于英国和“闪电”的结合并不十足就是强迫的婚姻，不过现在这位新娘的贞洁却是值得怀疑的。要求我国去为一项武器花上亿万美元，而总统属下的当局却正在公开地和私下地对之表示怀疑。

随着双方这样辩论下去，美国人发觉自己由于以两个相互矛盾的论点为依据而处于为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说“闪电”会失败；一方面又说，可以设法来使用它，不过由于发展了北极星，所以他们不再需要它了。他们准备——有条件地——把它卖给我。

这时，讨论内容转入了美国人希望去发展的“多边核部队”的



问题。当我们在下午开会时，可以明显看出，肯尼迪和他的谋士们都极为重视这项计划。他们痴心地相信，它将会对北约组织的盟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支设想中的部队不仅是由各北约组织国家出资，而且是由各国出人组成的。这种构造复杂的军舰拥有用以推进军舰和发射火箭的无法设想的尖端机器，又是由八至十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船员来操纵的。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还存在着这支多边核部队应处于谁的指挥下作战的问题。我本人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在于建立一支联合部队，由美国、英国、或许还有法国指派部分力量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其他国家不必再去 359 建立一支核部队才是合理的。

当然“指派”这个词的含义如何是关系重大的。假使我国果真取得了北极星导弹，我国又如何能证明自己是致力于相互依赖的事业呢？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这个主张的倡导者之一。我记得自己在一个阶段中说过，我把“指派”这一词解释为“一支在平常时期处于盟军司令部指挥之下而作战的部队，但是它在紧急时期可供个别国家使用”。我记得自己也向总统提醒过我国于1940年初，在这个含义上向英法联军所派遣的那支部队。我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师在庞大得多的法国军队的司令部麾下，仅仅组成了一个兵团。不过一当可以看出甘茂林将军对战局已失去控制的时候，戈特勋爵就毫不犹豫地行使他作为独立的指挥官的权利。事实上，我以后就一直主张，除非等到成立了一个单一的超国家的国家，就一定要做到既有独立自主又能相互依赖。

最后我重复了我们要以“北极星”来代替“闪电”的紧急请求。我是理解总统的顾虑的。不过我的建议以后并不会把他关于多边主义的概念排除掉。美国人不能理解欧洲人所担心的事，这一点我是同情他们的。美国人愿意去保卫欧洲而且有这样做的能力。他们是不是一直都会有这种愿望呢？美国必须明白，有着不同的

历史和肩负不同程度的责任的欧洲大国，会要求享有一定程度的尊严和安全。当然，由于英国在全世界的义务，它至少在目前必须继续拥有一些独立的核力量。

这时，大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图使我们双方的观点统一起来。总统基于政治的理由，不愿意把“北极星”交给我国，他生怕惹怒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它们之中除了法国之外，谁也没有去发展核武器。在另一方面，我决心要取得北极星导弹，而且感到我们有权利去取得它。作为对美国的报答，我们准备明白表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将把我国的核力量视为可供北约组织使用的兵力，以便加强其力量。

360 12月20日的整个上午都进行着讨论，那天设立了一个英美两国的起草委员会，以便拟出一份正式文件。最后，在12月21日，双方在一次全体会议上达成了协议，还有时间去讨论重要程度不等的其他一些问题；其中最紧迫的是如何在适当时候继续作出努力，以便和俄国人就停止进行新的核试验一点达成协议。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由美国向我国提供北极星导弹，而由我们自制弹头，我国已经善于制造这种弹头了。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将把我们的核舰队“指派”到北约组织去，除非“女王陛下政府决定国家的最高利益正处于危急关头”。这次会谈使人精疲力尽，双方针锋相对，相持不下，其程度较之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激烈。

进行了三天的艰苦谈判——实际上是将近四天。美国人把我们逼得很厉害，很可能使我们“大上其当”。这一点是说不定的。<sup>①</sup>

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一直向伦敦的同僚们发出详尽的汇报，而且一当拟就了协定草案和公报的草案就将其送交内阁评议。他们所补充的内容都写在最后的定稿中。<sup>②</sup>

---

① 1962年12月23日。

② 附录三。

会议的时间拖得很长,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内容几乎全都围绕在我国必需的“独立性”问题上。我不得不步步设障——休会、再考虑;拒绝了一个草案又要求写出另一个草案等等。究竟议会和全国人民是不是认为我们干得很好,或者很差,我还不得而知。<sup>①</sup>

虽然我们的争论是很激烈的,而且有时是令人痛苦的。不过我最终还是愉快地感到,我和肯尼迪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化,有时他和麦克纳马拉都出奇地象是一点也不知道刚才发生过争吵似的。我对这一切已经有二十多年的经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占了便宜的。

总统本来打算于星期五(12月21日)一早就离去,不过我由于听说迪芬贝克就要到拿骚来,所以劝他留下吃午饭。他在我坚 361  
请之下,同意了。我呆在拿骚的其余时间都用于和迪芬贝克商讨当前的所有问题。我们终于设法于12月22日晚上离去,并于次晨(12月23日,星期天)回到国内。

很凑巧,“闪电”的性能问题是原来左右着整个会议的一些拿不准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刻似乎突然变得明朗起来了。

会议结束的次日,进行了一次十分成功的试验。总统和麦克纳马拉是否原来就知道这回事?还是预料这次又会失败呢?不过,不论试验的成绩如何,美国国防部长和白宫显然已经——基于更重要的理由——决定集中力量研制“民兵”(洲际火箭)和“北极星”(潜艇导弹)。我也明白他们是出于妥善的总的考虑而决定终止“闪电”的研制工作的——并不单是为了刁难我们,或者为了要把英国排挤出核的行列才这样做的。不过他们的确曾经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以致我们之中不少人疑心重重。我们也还不知道“闪电”试验获得成功会在美国政治中产生什么影响。总统显然大吃一惊,在华盛顿的空军“院外团”和“道格拉斯”<sup>②</sup>院外团的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所有这一切都会对我们达成的并于星期五(12月21日)

① 1962年12月23日。

② 美国的一家飞机制造公司。——译者

在拿骚公布的总协定产生反响。<sup>①</sup>

报界对于公报，特别是对于其涉及核威慑力量的前途那一部分的反应是很不一致的，它一如往常那样，又是自相矛盾的。有的攻击我们“把英国出卖了”，其他的则批评我们顽固地死抓住毫无用处的核力量不肯放手。我在这时写道：

在大体上，我同意把我国现有的轰炸机（或者部分轰炸机）以及（将来到手的）北极星导弹作为北约组织的一支力量用于总的目的。但是我绝对地保留了女王陛下政府“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独立地使用它的权利。

362

以后对这些措词还会有争论。不过这是在保持一个主权国家最终权利的同时，对“互相依赖”的防务作出适当的贡献的一个真正的尝试（美国人最后同意了这一点）。这是承认生活现实。但是我自己明白，这个概念会在国内的论战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内阁（在星期五早上召开会议，我们是一直让它获悉会谈经过详情的）虽然忠心耿耿地支持了我们，不过它并不很喜欢这个协定。<sup>②</sup>

我回国以后，即向孟席斯和霍利约克发出了私人函件。我自然已经在拿骚把一切都向迪芬贝克讲清楚了。

多年后回顾到这一桩事情时，就会感到：谁竟会对英国政府所保留的权力提出疑问，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总之，核武器不论是否独立地或相互依赖地加以使用，都不可以轻易地就用上，要是果真出现了必须使用它的这种可怕情况，那末就必定要在国家最高利益处于危急之际才可以这样做。不过，我只好等待议会召开并看事态的发展情况再说。

当我们在拿骚时，我嘱咐过皮尔逊·狄克逊爵士向戴高乐说明我们每天的活动情况。到时候，肯尼迪也向戴高乐提议要向他们提供北极星导弹，其条件类似同英国所商定的内容。我只能希

<sup>①②</sup> 1962年12月23日。



望美国人不要过多谈及多边核力量的计划，以致于使法国人产生畏惧，而是让法国人有时间去考虑美国提供北极星导弹的建议，这个建议可能是对法国人很有好处的。

在其他方面，这一年是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结束的。人们会以各种大不相同的理由来反对拿骚协定，而且法国在此时对欧洲问题可能采取积极的看法这一点似乎也是渺茫的。

同时，我于圣诞节前夕收到了一封女王亲笔信，向我慰问，使我大受鼓舞。当然我是一直把会议经过情况向她报告的，而且会后还向她提出了详细的报告。

1963年1月3日，内阁于上午召开会议。第一桩事是和将要退休的诺曼·布鲁克爵士告别。虽然伯克·特仑德爵士将会胜任愉快地接替他的工作，我还是深深地感到惋惜。多年来，我一直和这位出色的公职人员相处得很好，而且得到他的忠心耿耿的支持，<sup>363</sup>我的所有的同僚们都信任他，而且对他有感情。

我作了关于他的简短发言，他也致了答词；我已经把一只漂亮的盘赠给他，以示敬意。<sup>①</sup>

整个上午都用于处理日常事务，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增加养老金、保险金支出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计划。

我们在午后五时又开了二小时的会，讨论拿骚协定。讨论得既详尽而又顺利，内阁对我们所做的予以批准。<sup>②</sup>

在签订最后协定之前，还有一个障碍需要克服，不过我认为，这将不过是一个手续而已。所以我在将近月底时听说美国政府现在要我分担北极星导弹的研究和发展费用，就感到十分关注。他们在拿骚会议上从来不曾提出过这一点，我们在那里时，曾经猜想他们向我们提供北极星导弹将按照“闪电”的——即“实际成本”。

---

<sup>①②</sup> 1963年1月3日。

美国国防部长十分贪心。我已经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不得不直接向总统呼吁。昨天我听说他同意了我的建议。所纠缠的是可能要我国分担北极星导弹将来的新“型号”的发展费用问题（不是已经服役的A1或A2型，而是在研制中的A3型）。我已经拒绝漫无限制地去支付无法估计的研究和发展费用。相反我提出在零售成本之上再加付百分之五的钱作为代替办法。这样，假使我们购买价值五千万英镑的导弹的话，我们就付五千二百五十万英镑。这个交易不坏，但是它却害我失眠了好几夜。<sup>①</sup>

这样，为预定于1月31日举行的下院辩论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不幸，这时关于欧洲的事却产生了令人沮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变化。虽则希思于星期六（1月6日）来见我时，“对谈判取得成功仍抱希望”，<sup>②</sup>我只好“瞧着并且祈祷上帝保佑”。这样新年一开始，政府就处于虽不算是真正危险的但也是困难的境地。

人们普遍认为工党会在大选中获胜。全国人民处于不满和焦躁的情绪中。我自己的声望大大下降了。存在着一个反欧洲和反美情绪的浪潮。<sup>⑤</sup>

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是个麻烦问题。报界几乎一致持敌对态度。电视台对政府意见很多。总之，我们正处于低潮。我们是否能在1963年或1964年恢复元气？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试试看。<sup>③</sup>

我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天注意到，报界

对我们十分敌视，它们预言我会很快地去职，政府也即将垮台！幸而我没有在两年前的由于它们的过分吹捧而趾高气扬，所以也没有因它们的态度变化而感到过分沮丧。<sup>④</sup>

这是我担任首相后的第七年了，我接到大量对我勉励的信，也

---

① 1963年1月28日。

② 1963年1月6日。

③ 1963年1月12日。

④ 1963年1月1日。

接到一些辱骂我的信。

从表面看来,政治和经济的形势是糟糕的——有些人感到绝望——为政府的寿命和前途担心。但我并不抱同感。关键在于布鲁塞尔的谈判。一旦谈判成功,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亲欧洲的宣传运动。我(迄至)现在还是按兵不动,不过(已经是)随时都可以发动了。在联合王国的不论是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的私人投资都会急速增加。<sup>①</sup>

我注意到法国报界无疑是在官方指导之下,正在酝酿着这种意见,即如果英国加入六国共同体的话,美国的控制势力就会随之偷偷地溜进来。我对我国驻巴黎大使的判断是很信任的,他报告说,关键在于戴高乐感到自己在冒犯其余五国欢迎英国加入罗马条约的明确愿望这一点上能够走多远。这样,布鲁塞尔的谈判即将在有点紧张的气氛中重新恢复起来。

365

法国的反英宣传……正按照我们所熟知的方针开展。我并不沮丧。他们在签订协定之前往往是这样做的。<sup>②</sup>

不过同时,我国农业大臣克里斯多弗·索姆斯却对我报告了他同法国农业部长的一次谈话,那位法国同行对他说过:

亲爱的朋友,这事是十分简单的。目前这六国之中,五国算是母鸡而一国可算是公鸡。如果你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加入的话,将来就可能有七八只母鸡,但是却有了两只公鸡,唔——这就不是那么教人舒服了。<sup>③</sup>

当打击终于到来,戴高乐行使了他的否决权时,人们为了说明法国所采取的敌对态度,作了不少解释——英美关于北极星导弹的协定,在北约组织中建立多边核部队的计划,以及其他理由更为不足的一些解释。我想这位法国农业部长也许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吧。

---

① 1963年1月11日。

②③ 1963年1月12日。

1月14日，在布鲁塞尔谈判恢复的当天，戴高乐举行了一次有名的记者招待会，所有的外交使团都参加了。他极力强调了英国和欧洲共同体各国之间的基本差异，而且还强调了扩大共同体的危险性，因为它最终会受到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支配。法国决心保持完全的独立，决不参预在拿骚所商讨过的任何安排，他甚至宣称，我国独立使用自己的核力量的权利到头来会证明是一个幻想。

这次记者招待会是以戴高乐的最威风凛凛的和“路易十四”的方式召开的，会后(报界)对我国和我个人捏造了种种谣言；对于戴高乐作出突然决定的原因，(连顾夫·德姆维尔在事前也不知道)众说纷纭，十分可笑。<sup>①</sup>

366 我向肯尼迪发出了一份紧急信件，通知他说，我们应该冷静地进行布鲁塞尔的工作，让五国有机会把牌打出来。

在这位将军对全世界来了这一着之后，德姆维尔就前往布鲁塞尔要求现在立即停止谈判。这使五国感到恼怒(但只可惜是无能为力的恼怒)，它们才开始理解到法国政策的真正内向性，戴高乐想要支配欧洲。他想的不是一个伙伴关系，而是一个拿破仑式的或者路易十四式的霸权。

这两个星期都用于进行大量来往磋商活动，以及会议、电报等等。我们的内阁非常之好——坚定而通情达理。不过这事是对我们一切希望的一次重大打击。我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一切这一下就完了——至少是暂时受到了阻碍。对于国内政治，这是又一次打击。<sup>②</sup>

1月17日，法国人传达了这位将军的一个要求，几乎是一个命令，要布鲁塞尔谈判无限期休会。不过其他五国至少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反对这一点的，而且预定要在1月28日复会，这就为五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提供了一些机会。希思异常镇静，他要求清楚说明：

---

<sup>①②</sup> 1963年1月28日。



如果谈判是由于技术性问题而暂停的话，根本就不存在不能解决的、或者的确还没有解决的技术上的困难问题；如果单纯由于政治上的理由而休会的话，那末这不过是出于一个人的意志罢了。

不巧，阿登纳已经安排于1月20日访问巴黎。德国各政党都对这位年迈的总理施加不少压力，要求继续谈判。不幸，他却没有采取什么补救的办法，只以签订一项德法条约为满足。在这同时，法国人散布了一些谣言，说肯尼迪和我已经就欧洲前途问题签订了秘密协定。

我趁在利物浦发表演讲的机会，强调说明了我们的立场，这次演讲主要是涉及失业以及其他国内问题的。戴高乐企图阻止我国加入共同市场是他一个挫折，“我相信而且但愿它还不是一个致命的挫折”<sup>367</sup>。我继续说道：

反唇相讥是无补于事的。真实的用心应当公诸于世。如果在原则上是反对英国加入的，应该一开头就对我们讲明。

有人说我不曾绝对真诚地对待戴高乐将军，对此我彻底地予以否认了。指责美英两国在拿骚有了什么密约是不正确的。反之，将军已经和我详细讨论过了整个防务的问题。“我于12月间在朗布伊埃对戴高乐说明过，要是美国人决定放弃‘闪电’计划，我就要尽力取得一个有力的代替物”。我们认为，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在欧洲享有霸权。美国是通过北约组织和主要有关的欧洲国家结成联盟的。由一个国家来左右一切的任何这类观念已经过时了。关于英联邦，我指出“法国人已经把自己同他们过去的海外属地的特殊联系纽带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英国人认为，我们可以成为忠心耿耿的欧洲人而又毋须不忠于我们的伟大的英联邦传统和职责”。不过我觉察到这是不能打动戴高乐的。我在有点象是失望的一刹那间，写了如下的话：

我国在国内外的所有政策都失败了。我们的防务政策已经作了根本

的改变，把重点从空中转移到海上。再也不存在欧洲团结的事了；法国对欧洲的支配是一个使人惊恐的新现象；我国政府的威信正在迅速低落下去。我们除了还有勇气和决心之外，什么也没有了。<sup>①</sup>

当各国在布鲁塞尔恢复谈判时，在莫内的秘密协助之下，希思和其他五国频频商谈如何最妥善地来对付戴高乐。最后，五国一致同意请求协商委员会向六国以及英国政府就当前情况提出报告，然后就恢复谈判。但是法国人却要委员会“就扩大共同体的影响”提出一份报告，而没有答应要继续进行谈判。1月29日，当六国在布鲁塞尔开会时，法国拒绝了五国所提出的要向委员会发出这样一个指令的方案。于是它们正式通知希思说，这个“建议已被法国所拒绝，从而谈判就到此为止了”。接着希思明智地决定把讨论集中于如何使共同体在英国下次申请加入时，不至于变得更是障碍重重。

我本能地感到，虽则我本人可能无法参预最终使欧洲联合起来的工作，不过我要是能够活下去的话，还是可能目睹最后成功的。不管我们感到多么愤懑，我们决不可因此而说出什么会危及将来的话来。同时，我特别为希思感到难过。

比他再好的谈判者和使者是没有的了——但是我们都由于法国人的不诚实而失败了。最后的一幕发生于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们对欧洲的一切政策的终结——或者至少是一次长期的拖延，不论它是否就这样长期拖下去，或者仅是最后的一次拖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后果。在国内，“法国人到头来总是要使你上当”的这种旧想法又重新抬头了。这个美妙的幻想的告终使人们（特别是在较年轻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巨大而悲痛的失望情绪。<sup>②</sup>

各国的政治家们以及欧洲运动的友人们，纷纷向我写信表示同情，

---

① 1963年1月28日。

② 1963年2月4日。

其中有一封是由保罗·莱诺写的。他追述了丘吉尔于1940年提出的英法结成联邦的建议，这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最好是于1月30日发表广播谈话，来说明一下布鲁塞尔谈判破裂的情况。

昨天在布鲁塞尔所发生的事是糟糕的，不论对我国、对欧洲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都是糟糕的。我们失去了一个良机。想去掩饰或者去缩小这个事实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要在布鲁塞尔做的，是非常引人入胜而激动人心的事。我们试图用一个将来推广到整个自由世界中去的方式来巩固欧洲的团结。我们英国人参加谈判并不是半心半意的，或者甚至象有些人们所想的那样，单单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的人当然都在问我们：“那末，现在该怎么办？”我在回答这一点之前，想谈几句关于我们本来想做到的事情，且让我尽可能简单地讲一下。 369

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文明的摇篮。所有一切都是从欧洲传播开来的。不过它也一直是无数激烈斗争的场所。在过去五十年中，欧洲几乎使自己毁于两次大战之中。这些巨大斗争一般是由于一个国家、甚至是由于一个人想要支配整个欧洲，以建立一种虚假的欧洲统一局面而引起的，他们这样做不是通过协议或者伙伴关系，而是通过实力。我们要制止这种情况重演；我们要通过合作达成真正的联合，以便弥合欧洲的分裂状态；接下去我们还希望看到这个自由联合起来的欧洲利用自己的力量和繁荣去帮助外部世界。

已经发生的事情揭示了一种分歧。法国和它的政府正在往后看，他们似乎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支配欧洲，而且同样错误地认为，欧洲可以或者应该孑然独立。然而欧洲却不能够单独存在。它必须以平等的、体面的伙伴关系同自由世界的其余部分、英联邦以及美国合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英国人要坚持大西洋联盟的原因。过去十七年的历史毕竟还是一部说明欧洲复兴以及和解的历史。

我明白，我国有很多人对我申请加入共同市场感到忧虑。他们认为，我国同英联邦的特殊联系可能削弱，英联邦的贸易可能减少。我们

认为，由于英联邦贸易格局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国加入了共同市场就会在一个繁荣而不断扩大的市场中，为英联邦提供新的发展机会。这一点无论如何应是谈判必须涉及的内容之一。过去这些谈判曾经是漫长而复杂的。但是我担心，唯一能够说明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法国政府希望谈判能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之下失败——希望英联邦会拒绝谈判；或者希望保守党也许会在党代表大会上抵制谈判；再不然就是希望谈判无限期拖下去，以使其搁浅（尽管人家对我们保证没有这回事）。在谈判的最后几周里，一当看出所有剩下的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时，法国人就终止了谈判。

370

对我国说来，经济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感到，通过建立一个力量相当于美国的扩大了欧洲国家的市场，我们就能够比单干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的另一个目的是使它成为一个所谓向外看的体制，至少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有此愿望。我们不希望它把自己关在一个堡垒里。我们有必要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与较贫穷的、发展较差的以及不发达的国家共享其成。不过现在来争论这一点已是没有用了。谈判已经破裂了。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是，下一步怎么办。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问，是不是另外还有什么办法？如果指的是有着这么一个现成的优于我们本来所努力从事的计划的办法，那当然是没有的。

我们所做的事都应该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具有报复性。它必须和我们的目标一致，而不是与之格格不入。当然如果有可能在英联邦内建立一个象欧洲共同体那样的共同市场的话，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可能已经这样做了。从历史和感情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象那样的一个好办而现成的代替办法是没有的。不过有许多事情我们是能够做到而且也是应该做到的。在布鲁塞尔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是一直同英联邦国家进行磋商的，现在我们还要和它们商量以后怎么办。同时还要同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以及和美国商量。我们必须争取全面减低关税率，因为这是在整个世界增加贸易的最好办法之一。我们以后可以在关税会议中这样做，这个会议正在筹备之中，包括欧洲共同体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将参加。



我们当然不会因谈判破裂而削弱我们要在不实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在国内解决扩大经济问题的决心。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决心、自己的精力和自己的资源，我们必须善于适应新的情况，要善于使我们的过时的工厂和生产方法现代化，予以改造或更新；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尽力。这不是一个黯淡的前景呢？不，根本不是。我们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它总是使我们获得最好的成功。这次还会是这样的。

那时我恰巧重读了劳合·乔治所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371  
当他在书中提到法国的伟大的外交家儒耳和保罗·康崩时写道：

他们充满爱国热忱。法国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庙——他们的崇拜对象——他们的神。法国的真正爱国者的第一条戒律就是“除法国之外，汝不得信仰其他神道”。这一种类型的爱国主义在法国土壤上较之在任何其他地方上更容易产生。难道英国人不也是爱国者吗？是的，他们是爱国者，不过对他们来说，爱国是一种职责，对法国人来说，爱国可说是一种狂热。人类的伟大领袖们是通过号召部下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去作战而证明自己的领导才能的。纳尔逊号召英国水兵去尽自己的职责，以期不负英国对他们的厚望。拿破仑是以保持法国的荣耀来号召的。这是正当法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受到欧洲所有君主们的威胁时，在大革命的热潮中培植起来的一种爱国热情，这是正当拿破仑麾下的法国军队以沉重的步伐穿过这些君主们所统治的每一个首都（只有一个例外）的街道时而臻于成熟的一种爱国主义。他们终于被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所击败了。不过，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其说是取决于其战功，不如说是取决于其所进行的民族斗争的宏伟性。再没有其他国家具有象法国那样的经验。在和法国政治家打交道时得一直记着，他们国家的这一段伟大光荣的时代是决定他们的政策的根本因素。在同他们谈判时，这种心理状态严重阻碍着人们去达成顾及其他国家利益的合理协议的一切尝试。这种心理总是在一个不便的当口横里插进来。①

---

① 劳合·乔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伦敦，1934年），第四卷，第2028—2029页。

但是我认为,虽则这种情绪会左右戴高乐及其同辈,不过目光朝着将来的年纪较轻的法国人却是欧洲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在将来的年头里,我们一定要依靠这些力量。

在我向主要英联邦国家总理们发出了详细的通知后,就产生了一个是否应该试图同欧洲自由贸易区和英联邦国家组织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结合体的问题。不过我感到这一切想法都是错误的。372 我们必须耐心等待,我国同法国之间保持着小心翼翼地客气而冷淡的关系。十分不巧,玛格丽特公主已预定于这时访问巴黎。外交部和驻法大使都劝她延期。

他们担心,戴高乐会利用她同他的“私人性质的”午宴大大表演一番——将有仪仗队、法国内阁全体成员和许多大使等等参加。如果此事在法国被人误解(认为英国已经“就范”)的话,这会使五国(以及的确所有其余的欧洲各国)坠入五里雾中。所以我同意取消这次访问。这样一来就——在报界、下院和党内——引起了一场大争吵。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渡过了这一关。<sup>①</sup>

这些恐惧也许是很有根据的。不过事后回想起来,我感到我们的决定错了。让这位公主去履行一次久已约定的访问也许是更为得体的。

在令人焦灼的那几周里,我得去参加两次辩论会。第一次举行于1月30日及31日,内容涉及拿骚协定。我既要为关于共同市场问题的最后一轮辩论作准备,又要为这次辩论作准备,忙得不可开交;一面还要去处理在某些地区中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也门问题以及关于印尼入侵文莱和马来西亚的惊人消息。此外,还有一直存在的罗伊·韦伦斯基爵士和中非的问题。在国防问题上,

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激励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所以我在有关北极星导弹的辩论会开始和结束时,都作了有力的演讲。第一次的演说

---

<sup>①</sup> 1963年2月17日。

内容很长,但是理由充足,给人印象极深——这是一次巨大的努力,我在下院中一口气讲了一小时之久。结束语的内容很不错,我能够(在下院的喧闹声中)相当有效地对付了戈登—沃克、布朗和威尔逊。威尔逊的发言“内容贫乏”,不如他平日所发表的。<sup>①</sup>

我趁自己作结束语的机会谈到了格里蒙德所提出的谣言,说拿骚 373 协定不知怎么地损害了布鲁塞尔谈判。

这话我以前也说过了,现在我再把它重复一遍。我和戴高乐总统讨论过这事,并且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在“闪电”吹掉的情况下,我就要去取得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次协定是造成谈判失败的原因。的确,在过去几天和几周里,人们对法国突然改变政策,提出了这么许许多多大不相同的理由——说英国是一个岛国,说我们还不真正算得上是欧洲人,说谈判时间拖得太长等等。凡是可以想到的理由都提出来了。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无愧于心的。当我在拿骚迅速向戴高乐将军作首次联系时,我的确还接到了他表示十分赞同的答复。

虽然督导员们忧心忡忡,表决结果还是很有利于我们的,多得了一百余票,不过我还得在关于共同市场的辩论中发言。我得在发言中应付眼前的政治需要,要把事实经过说清楚,特别是不可危及将来。

我已经应意大利人之请,同掌玺大臣一起到罗马作了短期的访问。虽则这对整个欧洲事业是有帮助的,但它并不可能马上为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发现意大利人对戴高乐十分不满;但是他们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我怕法国人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们相信,所有这些愤慨都会象一阵风那样一吹即过,到头来取得胜利的还是他们。<sup>②</sup>

我在离开罗马之前,觐见了教皇约翰。

他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他消瘦了很多,看上去毫无血色——特别

---

①② 1963年2月4日。

是手和耳朵。罗马人说他患了癌症，拖不到年底，这将的确是悲惨的——因为他是一位(别具一格的)伟大人物，对世界有过极大的影响。他显得十分高兴——不断用法语讲话，留我谈了三十五分钟之久。我深受感动。我几乎只能插进一句话，提到女王决定派私人代表参加戈弗雷红衣主教的安魂弥撒礼。我向教皇说明，这是四百年来的第一次，他听了非常高兴。<sup>①</sup>

我们回国后，就得去应付第二次重要的辩论。第一次关于拿骚协定的辩论会开得非常之好，大出意料。不过关于布鲁塞尔会谈失败的辩论却更容易引起非议和责难。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我已经如此重视过欧洲联合事业，而且还由于我长期以来支持欧洲运动而使我个人与这事如此密切相关，所以我感到，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受到严重的挑战。报界已经开始预言，即使政府不垮掉，我这个首相也干不下去了。关键不仅在于议会的表决，而且还在于我所提出的论点对议会和全国人民所产生的效果。我明白，反对党内部对于欧洲问题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会把攻击矛头集中于政府总的政策的失败以及国内日益增长的困难这一点上。

除了加入欧洲共同体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这个大问題依然存在。如果我们老老实实的，就应该说别无他法——如果有过英联邦自由贸易区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早已抓住不放了。<sup>②</sup>

2月5日，我

现在似乎非得在2月11日(星期一)就布鲁塞尔谈判的善后这个大问題发表一篇演说不可了，我为此工作了一整天。昨晚进行表决后，我同某些主要同僚开了一次会。不过我感到他们谁也没有勇气来进行这次斗争了。总之，他们期望我去带头。经过上星期一阵辛苦后——在下院发表了两篇重要讲话，还在电视中露了面，接着到罗马作了三天访问——我很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不过却是非做不可。<sup>③</sup>

①② 1963年2月4日。

③ 1963年2月5日。



有些人，尤其是一向赞成实行“帝国自由贸易”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谈到要再举行一次英联邦总理会议。我决心要加以抵制。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只要恢复一个过时的概念，就可以使我们有办法了。不过我可要小心从事，并且要制订出旨在增加英联邦贸易的某些其他办法。关于第一点，我认为最好在演说中正面地加以应付。 375

英联邦不能同例如美国或者共同市场那样的任何其他贸易共同体相提并论，它不是一个单一经济体。这不单是由于各国彼此相距遥远，那是可以克服的；而是由于一个性质上完全不同的障碍。迥然不同的工业发展程度以及各英联邦国家所需要的不同性质的贸易，无法使它们全体都和我国联合组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有的国家关税率极高，有的国家关税率很低。有的刚刚开始进行工业化，有的则极为先进了。有的决心要用高税率来保护自己的新生工业——它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它们决不允许存在所谓来自英国的较廉价的产品充斥于国内的情况。澳大利亚、加拿大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新西兰也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无法扩大了，它是应该扩大的。这只是说，正由于存在着那些在政治和道义上代表着英联邦力量的差异，所以不可能把一个统一的体制适用于英联邦国家。这是所有英联邦国家都持有的态度。所以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岛上召开英联邦总理会议，或者召开其他什么会议，都不能够制订出一个既符合它们的利益又符合我国的利益的办法，以代替我国想为自己以及为它们去从欧洲取得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所以在这个阶段建议召开英联邦总理会议似乎是不妥的。

所以还是集中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为好，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大家合作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在一个特殊的领域里合作。这便是去商定各个世界性协定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现在主要是希望 376

去实现所谓“肯尼迪一招”（降低关税）。我们希望这事不久就可以开始实现。从而，我们已经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签订国部长会议之前不久，先召开一次英联邦贸易部长会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签订国会议可望于夏初举行。

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工作又可以同样地开展起来。

正如下院所知道的那样，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有着两个总目的。它已经使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集团在其内部大面积地降低了关税。此外，我们一直把它看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欧洲市场的一个步骤。这两个目标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欧洲自由贸易区各国实际上是一直同时地去致力于这两个目标的。

我们应该通过一切实际办法去加强这个欧洲贸易体制，

而且一直要做下去，直到阻碍着建立完全统一的市场的阻力被消除为止。在进行这项工作中，我们欧洲自由贸易区伙伴们的支持，将具有极大的价值。

接着我谈到了国内问题以及“发展”经济的必要性。我们除了执行原来的金融政策之外，还要象我们已经着手的那样，去作出新的努力以处理那些特殊地区的失业问题。在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即，老的企业单位本身已不可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和繁荣。我们必须在新技术上作出特殊的努力，这就会使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大，并使关于工业从业人员再训练的建议更显得重要，主管大臣已在这方面着手工作了。

所以我把这一部分的演说词总结如下：

首先，我们已经建议召开一次英联邦贸易部长会议。第二，为了实行“肯尼迪一招”，我们将争取和英联邦、美国、自由欧洲贸易区、还希望和六国共同体密切合作。其次，我们将维护欧洲自由贸易区组织。我们将致力于达成世界商品协议。在国内，我们将力求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收入政策为基础来扩大经济。

然后我谈到了欧洲。

谈判并非由于进行得不顺利而告终，相反，恰恰是由于马上就要成功才破裂的。我现在深信，法国政府在内心中，一直是担心它会成功的。不过我过去一直希望，他们会受到两种考虑的鼓舞：第一，无疑在根本上把英法两国联系起来的那种友谊。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那种友谊是非常深厚的，这些联系链条是在英法两国并肩受苦的可怕年头里，在战火的洗礼中锻造出来的，在我一生之中已经两度遇到这种情况了。

第二，我本来希望，法国政府可能不至于甘心使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即，公开反对共同体内的所有其他同僚们的愿望，并且甚至公开地使自由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感到失望。当然他们本来可能希望，作出这种决定的责任不一定会落在自己的肩上。他们本来可能认为，英国政府会由于自己的党、由于得不到英联邦的同意、由于下院，而无法推行自己的政策。可是一当这些愿望开始落空时，法国政府首脑就决定采取行动了。

应该指出，对法国政府在采取的方法上是有点手忙足乱的。

人们为法国拒绝英国加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它是一个岛国；说我国人民在思想上和欧洲人还有距离；说我国不接受罗马条约——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说有关北极星导弹的拿骚协定是一个突然的意外打击——这种说法也同样是错误的。很明显，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

众所周知，整个法国政府的人员都充分预料谈判即将圆满结束。据法国报纸报道，法国总理蓬皮杜先生曾经迟在1月11日——即在谈判突然结束的三天前——还对一群记者说，法国希望看到英国参加六国共 378 共同体并加入共同市场。其他法国部长们也于同一时期在私下讨论时向我们提出了类似的保证。

不过法国政府既已作出决定，我们就必须面对现实。现在我们必须竭力去保持我们过去能够利用的深厚友谊，以便使欧洲为它的将来而团结起来。我在最后说：

我并不是说，我们期望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谈判能及早恢复。这是不

可能的。它不是一项商业交易，前一个星期谈不成，下一个星期还可以继续谈。不论好歹，它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不能对之忽视；不过对于它的重要性、或许还有它的持久性，却也不应过于夸大。说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是荒谬的，但是我们却一定要把这种说法铭记在自己的心中。

辩论进行得很好，虽然我的演讲词、至少是部分演讲词有点阴郁，它还是受到了下院的欢迎，认为它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这个重大的场合很相称。后来报界也有这种看法。我自然不可能掩盖自己的失望和沮丧，不过我感到应该对欧洲迟早会联合起来这一点继续抱着希望，究竟还要过多久，我却不知道，但是从那天起，我的信心可不曾动摇过。

所以蒙现任首相希思——他是一直肩负这次长期而困难的谈判的全部重责的人——的眷顾，我终于能够于十年后亲临布鲁塞尔条约签字仪式，感到这真是一个极其令人感动的场合。由于签订了这项条约，在法国政府的完全同意下，英国以及其他三个国家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历史车轮已整个地转了一圈。



## 第十二章 财政措施

### 一、失业的阴影

据说包德温先生在自己长期政治生涯结束时，曾经感慨地说，一个英国政治家切不可同三种力量发生冲突。这三种力量是梵蒂冈、财政部和全国矿工工会。在我所叙述的那个时期中，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加上第四种力量——布雷顿森林制；它是整个自由世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国际协定而建立的货币管理制度。毫无疑问，在战后的最初几年，这个体制至少为千疮百孔的世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过它却在内部孕育了本身蜕化的苗子。因为布雷顿森林制度被大家接受下来时，并不包含梅纳德·凯恩斯当时所提出的重要建议。假如他为“银行组织”所草拟的方案被采纳的话，那末许多令人悲哀痛苦的事早就避免掉了。凯恩斯方案受到了美国财政部一个官员的破坏，而且终于“石沉海底，毫无消息了”，后来据说这个官员还是一个共产党间谍，这是历史上一桩有讽刺意味的事。这个人的确干得十分出色。这段离奇的插曲，即使出诸间谍小说，也未必说得通的，不过它却又一次证明了：“自然总是胜过人工”这条真理。在这同时，那法力无边的——仍然可以兑现的——美元，还要在它宣告崩溃之前继续主宰世界金融三十年之久。

对于这个在英国人看来更是加倍苛刻的制度，我多年来在思想上，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它限制了货币的流动性，限制了它为日益增长的财富生产提供资金的作用，而这种财富的生产价格则继续不断地上升；由于英镑的多种多样的作用，这种制度就使我们

比之我们的欧洲竞争对手们，多背上了一副特殊的担子。因此，我  
380 于 1960 年底，当准备同肯尼迪总统作首次会晤时，写了一封信给  
他，信中列举了将要加以讨论的主要问题。我写道：

首要的问题是：要是我们不能够显示我们的现代自由社会——新型的资本主义——的确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并使我们的经济力量稳步增强，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所以货币的问题，亦即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中适当使用货币，并保证有充分可供使用的信贷资金，以使我们所有国家都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问题，才是真正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失败了，共产主义不需要通过战争，或者甚至不需要通过颠覆活动，而只要显得是一种能为人们获致物质享受的较好办法，就会取得胜利。换言之，我想，我们果真一旦陷入象两次大战之间的那种倒退和危机状况，并且发生了大规模失业和机器停顿的现象，我们就会输掉。当然情况还不是糟到这种地步，不过我们却面临重大危机。由于各种原因，我认为可供使用的全部信贷资金不是不足就是使用不当，从而有必要对其所依赖的整个基础重新加以考虑。<sup>①</sup>

大约过了一年，虽然我已经看到的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小块乌云正开始逐渐映入大家的眼帘，却没有采取什么办法来应付它。所以我于 1961 年 12 月 13 日，听到当时的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说在这方面略有进展而感到欣慰。他向我报告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关于增加可供国际货币基金使用的资金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

我们盼望已久的那种迫切感终于出现了。对于打算把可供使用的资金增加六十五亿美元左右的计划，我们已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如果有关国家须付足此数的话）应由美国分担二十亿美元，我国分担十亿美元，六国共同体分担二十五亿美元，由其余国家再提供五亿美元，还要加上……来自瑞士的……一些资金。

381 可是迄至 1962 年 5 月，我的种种忧虑仍然不曾消除，所以我

<sup>①</sup> 该函的全文见于《指明方向》，第 310 页。

于5月22日向财政大臣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复述了自己所担心的事。

1961年初，我由于告诉美国新政府说，为了扩大信贷基础，并为了使我国摆脱试图以不足的资金去支援越来越多的生产和贸易的困难局面，最便当的办法莫过于提高黄金价格，因而同你以及财政部意见不一。

十八个月以来，针对世界信贷资金问题，我们大家都提出了种种试行办法，这一切自然都是有好处的，不过人们对于这些(以它们的倡议者的奇特名字而命名的)各不相同的方案兴趣已大为减退了。

英格兰银行行长克罗默勋爵在6月20日同我的一次长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疑虑。

他很有才智。他同意我的看法。不过实际上，虽则克勋爵是“正统派”，他却能觉察问题。他不愧是出身于伯令家族的人——这个家族具有悠久的商业和金融传统。他明白世界的新危机不在于世界性通货膨胀，而在于各国竞相紧缩通货。(加拿大元的崩溃迫在眉睫，这是有象征性的。我们正在筹组一个美—英—欧洲财团，以便向加拿大提供七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sup>①</sup>

过了几天，我于6月23日，向塞尔温·劳埃德又发出了一份备忘录。

今天早晨我们谈到了目前似乎正在露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你已经答应同你的僚属们商量是否有可能同美国磋商进行重大改革，以适应下一阶段的需要。我还建议让你同你的专家们和英格兰银行一起去考虑：在英镑处于足够稳定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由我国单独采取行动，或者由欧洲各国同我国一起采取行动，以使美元步我们的后尘。换一句话说，假如美国人不愿意调整黄金与美元的比价，只要英镑、马克和法郎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还是不得不跟着照办的。但是，如果大家能普遍同意做到这一切，那自然更好了。我只向你提出了这些有危险性的想法，  
382

<sup>①</sup> 1962年6月20日。

实际的问题是：应该举行一次由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世界经济会议。不过要是各国政府首脑这样一参加，单是由于召集这次会议，就有引起人心惶惶的危险。这就是问题所在之处。各国政府首脑可能无法来参加会议，各国财政部长也有可能由于受到较有正统思想的谋士们的有害影响，甚至无法作出有革命性的决定。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个障碍呢？你除了要研究第一段中的内容之外，假如再去考虑下列一点，我将为之高兴，即：是否可以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机构为幌子来掩盖世界经济会议，由各国政府首脑在幕后参加。把讨论范围从仅仅涉及货币问题扩大到商品以及经济发展问题，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设法把大量粮食卖给或赠给缺乏粮食的人民，以便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甚至美国人解决困难，这事本身自然会增加世界货币的流通，并增加这些规模较大的活动所需要的数额较大的资金来源。

我在一年前预见到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当时在你的顾问们看来，似乎仅是政治上的一种李尔王的狂吃而已。可是现在这个风暴显然正向我们逼近了。

同时我试图让外交大臣来通过美国国务卿做工作，我们将同他在伦敦举行会谈。

我想同他谈谈使我感到极为担心的世界经济形势。加拿大元在1962年的崩溃，其严重性可能不下于三十年前安斯托尔特信贷公司之破产。我想问一下腊斯克，美国政府是否同我一样地严重注视这种经济形势？他认为总统准备怎样来应付这种形势？合理的办法当然在于召开政府首脑一级的经济会议，不过这只会引起恐慌，而且它无论如何不宜于作为详细讨论经济问题的讲坛。但是西方国家一定要采取某些联合行动，以避免经济大衰退的威胁。我想问一下：美国人是否已经考虑利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而且在商品领域中，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383

我感到，这一经济问题确实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紧迫问题。

我还在1962年7月3日写信给驻美大使大卫·奥姆斯比·戈尔：



我打算发起一次运动，以便促成一个合理的国际信贷制度，不过这一点切不可让别人知道。你可能还记得，这是我在1960年冬首次写给总统的信的内容之一，而且我们也在1961年春首次会晤时，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商讨。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在信贷技术上的确也有了一些改进（例如，去年夏天向我国提供的以及最近向加拿大提供的援助），可是更富于进取性的计划却搁浅了。……总统是否仍然对这一切感到兴趣？或者我是否有什么机会使他对此感兴趣？我十分明白，关于黄金价格，他要单独搞，在政治上是无能为力的，不过他是否在思想上认为，应该设法来扩大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所依赖的那个基础？假如不是如此，那末上层建筑就不可能达到它应有的规模。须知，正统派以及可以称为经济上的权势集团，都把我在这里所持的观点视为危险的异端邪说；而我认为的许多更有智慧的人却和我抱有同感。我将极为重视你关于这事的一切想法。目前的迹象是，所有发展的国家都要开始进行通货紧缩或者希望保存自己的黄金；德国、法国和日本都在说同样的话；我国也略为谈了一些。美国正存在大量失业和工业开工不足的现象，而且到头来，由于采取了一项从任何个别国家角度说来都是可以加以辩护的方针，我们大家就会一起慢慢地（我不认为这次变化会象两次大战之间的危机那样迅猛）走向资本主义的衰败时期。

大使于7月11日写了一封极为有益的回信，他报告说，他认为总统对于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当然是不满的。不过纵使他和我的看法很相似，他自己还是无法提高黄金价格，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不过这位大使认为，有一种政治压力要迫使美国政府去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及不平衡的预算，宁愿不要遇上任何一项严重的通货 384  
紧缩措施所造成的经济停滞状态，我们可以指望依靠这种力量来防止最险恶的危机。他还补充了自己的意见说，现在应该是“根据我们在战后将近二十年的经验，来重新估价布雷顿森林制度所作出的决定”的时候了。在另一封信里，大卫·戈尔告诉我说，他建议当自己向总统作一次私人性质的拜访时，把整个问题非正式地

提出来。

虽然在许多方面以及在所有国家中，对诸如此类的想法进行了讨论，但却无法取得进展。英国政府已经精明地清偿了它由于1961年危机而欠给国际货币基金的债务，从而使自己免受美元可能贬值之害，同时也增加了货币基金的流通性。不过这在更为重大的场合中，还只是次要的事。

1962年7月间，财政部受到了内阁人事更动的影响，由莫德林接替塞尔温·劳埃德。

财政部现在采纳了我关于有必要增加世界货币“流通性”的观点，这使我十分高兴(而且吃惊)。同他们进行了十八个月——几乎两年——的争论后，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英格兰银行也同意了这个观点。由于美国总统显然仍拒绝(或者无法)提高黄金价格，英格兰银行就制订了自己的方案。固然，实际问题在于使公众舆论认识到，一家国际银行凭空创造信贷资金——或者货币——并不比一家国有银行这样做更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在国际上，我们的货币信贷制度还继续处于十九世纪初期的状态。<sup>①</sup>

不幸就在这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当我们的美洲和欧洲盟友们似乎正走向一项更为进步的政策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的总经理派尔·雅各布森却发表了一篇极其有害的讲话。在国际货币基金于9月17日举行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份充满乐观的报告。他把对大家竞相增加国际货币流通性的恐惧斥为多余的。并且说自己看到了工业国正走向“平衡状态”的迹象。换一句话说，就是：“天神在上，一切全都太平无事”。我立即向莫德林发出一封紧急信件。

我以相当焦急和痛苦的情绪看了雅各布森先生最近所发表的演讲。我希望这决不会有碍你的手脚，而且希望你毫不松劲地提出你的意见。我确信肯尼迪总统和此人并无同感。你是否希望我写一封私人信给他，

---

<sup>①</sup> 1962年8月10日。

向他极力说明使我们两国摆脱旧制度对于整个自由世界的重要性？我们说雅各布森先生大有可能成为蒙塔古·诺曼的化身，并非言之过甚。

过了几期星后，

就连雅各布森和英格兰银行的权威们也明白世界性通货紧缩的危险了（其实比通货膨胀更为危险）。可是不论肯尼迪总统或欧洲人都还没有采取行动。这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了。我（就象往常一样）对这一切都束手无策。<sup>①</sup>

共同市场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中，华盛顿显然无法起带头作用——他们的财政部代表们采取了极为明显的软弱无力的态度，他们似乎可能会差不多一直保持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我看不出有什么进展的可能。大家整整吃了十年苦头之后，才终于采取了一些步骤，来解开布雷顿森林制度所加于世界的桎梏。

我们既然无法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进展，那末该怎么办？我们应如何刺激英国经济，而又不至于引起国际收支上的种种麻烦、引起对英镑的压力以及引起常常使我们受苦的通货膨胀呢？英国经济情况显然需要我们去排除某些限制扩大经济的阻力，而且至少需要我们去“扳动一下加速器”。我对于下述问题感到关注：

在英镑继续（依靠其不足的储备）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有效地做到上述这一点？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世界贸易基础问题，我们所提的新对策并未在纽约取得什么进展。首先是美国人，接着是德国人，现在是法国人——这些国家已经先后收集了过多的货币。<sup>②</sup>

不过由于失业状况日益严重，投资无利可图，我们无论如何得冒一下险。在这同时，可以通过一次“使英国现代化”的有力运动，通过改进我国国内工业生产方法以及我国出口技术，来想一些办法。但是我们却需要更多的——多得多的办法。因此，我于1962年

<sup>①</sup> 1962年10月18日。

<sup>②</sup> 1962年10月10日。

10月下半月开始同莫德林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研究一下即使在得不到什么国际响应的情况下，是否也至少可以在国内冒个险，以刺激经济。

财政大臣似乎也象英格兰银行行长一样地反对降低银行贴现率——至少反对在目前这样做。不过他将集中全力去降低长期贷款的利率。可以通过提高金边股票<sup>①</sup>的价格而做到这一点。（不幸我却感到，提高金边股票价格只是反映出倒退现象。）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设法对房屋互助协会增加压力，使其降低利率。我所同意的另一项措施（我认为它理应很快收效）是：立即把汽车购买税从百分之四十五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将在议会复会时宣布）。这将使财政收入减少三千万镑。不过我相信它将对各方面都产生良好影响。我已经把自己关于（影响到创办及投资津贴的）“贬值”的想法告知莫德林。我担心，鉴于大家对（一）欧洲问题（二）大选没有把握，在下一年中，除非能够使用我所提出的某些办法来刺激私人投资，否则不可能使它自然地增加。莫德林正在考虑我的计划，并且希望不久就能得出结论。<sup>②</sup>

过了几天，财政大臣提出要进一步降低购买税，我立即同意了。

387 在发生古巴危机的那个有点狂热的星期里，文明世界可能遭到核弹毁灭的危机似乎比货币失调更为急迫，此事一了结，我们惊魂初定，就回过头来处理眼前的困难问题。此时失业人数已达五十万人，同很久以前发生过的情况比起来，这个数字不算大，不过对于那些开始把充分就业视为工业社会不变的而且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特征的这一代人说来，这却是令人惊惶的，而且，虽则失业人数在某些地区低达百分之二，而在其余地区则上升到百分之五。在今天看来，这个担子似乎还不太重；可是往事记忆犹新，这在当时对我们说来，不啻敲起了警钟。不过我明白，我们还是有必要防止不适当地提高工资和物价。

<sup>①</sup> 金边股票是由政府担保的一种股票。——译者

<sup>②</sup> 1962年10月19日。



目前并不需要对一切消费品都加以刺激(诸如用调节办法所产生的那种刺激——包括对威士忌酒和烟的调节),而是有必要对某些有选择的消费品加以刺激,这种消费品(一)对其他工业有广泛的影响(二)有良好的出口记录。财政大臣中午来访,为了确定一项小小的计划的最后一些方案。几星期来,我们一直在商谈此事,而且详细记下了彼此的意见。今天上午,我们确定了这“一揽子”计划。它将(甲)再提高创办或投资津贴;(乙)加速“注销”重型工厂设备;(丙)刺激对科学研究的投资;可以随意在一年之内予以注销;(丁)把汽车购买税从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二十五。这将使我们花费不少钱(九千万镑),不过这理应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十分良好的效果。<sup>①</sup>

这些改革措施于11月5日如期宣布后很受欢迎。

总的说来,这年秋天银根大大松动了。战后债务的偿还将使购买力增加四千二百万镑。公共投资增加了将近七千万镑。伦敦交换银行的特别存款利率从百分之二降低到百分之一;这“一揽子计划”所提供的资金在整整一年中将达到一亿六千五百万镑。虽则这些措施都会对整个经济起到刺激作用,但经济上的“黑点”却变得越来越黑了。工业现代化运动继续进行着;12月11日,大家又同意进一步降低购买税。可是我们可能做到的那一点点工作似乎对苏格兰以及英格兰北部老的“特殊地区”没有立即产生什么效果。同时政府还受到报界和电视台的广泛攻击。总之,即便在年底那一天,大臣们也并没有闲着。 388

和内政大臣及财政大臣商量了整个上午。我们对各种全面性经济措施进行了讨论。此刻财政部颇热衷于扩大经济了。明天将宣布把属于减税百分之四十五的所有其余项目的购买税降低百分之四十五至二十五不等。星期四将再次把银行贴现率减低百分之零点五(从百分之四点五减为百分之四)。我们商讨了针对西北和东北地区经济情况的一些

---

<sup>①</sup> 1962年10月26日。

方案以及某些特别措施。<sup>①</sup>

除了在社会福利方面可以作一些小小的调整之外，在提出预算案之前，是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想的。例如，1963年1月23日，宣布增加失业救济金以及退休金的金额；同时，除了我们在这个“使我们感到不满的冬季”遇到的其他种种困难之外——在此阶段中，关于核武器的纠纷层出不穷，戴高乐将军也终于粗暴地终止了共同市场谈判——我们还要在此后三个月中遇上1947年可怕的冬季以来的最恶劣气候。1月份的气温不断下降，失业人数却不断上升。

虽然雪不再下了，至少不会再下大雪了，但严寒仍然持续着。建筑行业几乎陷入停顿状态。<sup>②</sup>

次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估计不会再下雪了，但有严重冰冻——无论从生活、生产以及就业等方面看来，前景都是黯淡的。此外，今天传来的关于电力工业情况的消息更糟了。工会领袖们似乎正输给共产党的驻厂代表们。我们正面临严重局面。<sup>③</sup>

正当我们由于“自然原因”而受苦之际，电力工业的工潮却又为我们增添了一个人为的困难。

389 “怠工”再加上（持续的）严寒正在破坏工业生产和几乎每一个家庭的舒适生活。报界（幸而也包括《每日镜报》在内）对工会驻厂代表们所作所为以及正式工会领袖们的软弱无能十分有意见。问题就看电力委员会究竟还能够或者还应该做点什么事？工会虽有仲裁协议，却拒绝执行，理由是：自1961年夏季以来，仲裁者们已经对政府收入政策唯命是从了！我但愿事实如此！同财政大臣、劳工大臣、内政大臣以及电力大

---

① 1962年12月31日。

② 1963年1月11日。

③ 1963年1月12日。

臣开了一次会。我们商定将同电力委员会一道采取总的方针。他们大有拒绝在“威胁之下”——即在不经工会同意的“怠工”运动停止之前——继续进行谈判之势。这其实并不聪明，这只会为极端分子打气，而不会使他们泄气。<sup>①</sup>

人们自然把恶劣的气候以及一切其他困难都归咎于政府。报界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坏。我党的情绪也愈益不安了。

天气仍然寒冷；单就这一点，过去的两周就够令人可怕了。冰雪打乱了我国整个生活秩序——1947年以来从未有过象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各个部门都干得很出色。街道和公路上的积雪都扫清了，火车和公共车辆虽然受到一些耽搁，还是能够照常行驶。公众（的火气很大——至少报界是如此）并不抱这种观点，他们似乎对一切都作了尖刻的批评。不过我们还是设法胜利地解决了电力工业的纠纷。（抱极端态度的工会和驻厂代表们的确对已达成的协议啧有烦言——协议有效期限三年，规定每年递增工资百分之四——从收入政策的观点看来，这是一项很好的协议。）共产党的驻厂代表们失败了。不过电力工会仍然十分不满，并且扬言要重开谈判。我感到其余四个工会组织中有的不会同意这样做的。“怠工”的影响，再加上气候所引起的沉重电力负荷，是不好受的——“停电”、“熄灯”等等（星期五晚上我们〔在契克斯〕遇上了一次停电，从午夜一直停到星期六下午四时，这是由于霜冻和雾气对绝缘器的特殊影响，使伯明翰到白金汉郡之间的电压受到了干扰。）……不过看来就要解冻了，同时罢工也已被挫败了。这意味着自己已经同大臣们开过多（次）会议了。我们曾经试图不去干扰电力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兹教授）的工作，而只对他加以支持。<sup>②</sup>

我们就是在这个月里，采取了一项有点别致的步骤。我在这年年初，曾经就处理东北海岸以及迈西塞德地区问题的方案，同莫德林和总督导员进行了长期的商谈。

---

① 1963年1月14日。

② 1963年1月28日。

我们曾经就是否任命一位“特别专员”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去帮助东北海岸解决存在问题，反复争论不休，现在似乎有必要在该地区采取断然措施了。我经过多番考虑后，决定任命一位大臣（而不是设立一个部），而且决定任命一位一级大臣（而不是象有人提出并经大家同意的那样，任命一位国务次官或是国务大臣。）<sup>①</sup>

于是我于1月5日，向黑尔什姆勋爵发出了一份备忘录，措词如下：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最妥善地改进政府机器，以应付东北地区的特殊问题。我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假如要帮助内阁对这些问题作全面了解的话，就应该请一位内阁大臣就东北地区事务，去接受苏格兰事务国务大臣所行使的、内政大臣为北爱尔兰而行使的、以及房屋及地方行政大臣为威尔士而行使的那种职权。要是你愿意为此接受一项额外的临时任务的话，我将感到高兴。

391

我们一定要以促进该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条件为目的，以便使它的就业情况更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处理是极端重要的。即，把所有有关问题——“发展地区”的选择问题、发展房屋建造以及其他公共投资问题、改善交通问题等等——同中心问题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复合问题加以解决。一个由各部门联合组成的工作组正开始进行此项工作，它将置于你的指导之下。

你肯定会同意：你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到东北地区实地调查，以便取得有关当地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并去结识有关人物、特别是以(乔治)切尔特温德先生为首的东北地区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们。我希望你将能根据这些磋商的结果，为整个地区制订出一项可以向内阁提出的具体计划。这样，内阁才有可能把东北地区的要求同所有需要特别支援的其他各区的要求衡量对比，并对事情的轻重缓急作出明智的判断。我还将欢迎你就如何以最妥善的办法来保证我们采取的措施能迅速而有效地加以贯彻这一点，提出意见。

黑尔什姆以他特有的忠诚态度，接受了这项苛刻的而且在政治上

<sup>①</sup> 1963年1月11日。



没有好处的任务。

当(任命黑尔什姆的)消息于星期三传开时,反应很好。无论如何,反对党是十分恼火的,因为他们肯定害怕他会搞出一些名堂来。<sup>①</sup>

据一位公正的评论家说,几周后,黑尔什姆在上院的演讲清楚说明,他已经成功地使

白厅上层也介入关于地区性计划、发展地点和地方交通的辩论。黑尔什姆勋爵在2月19日对上院发表演讲,他似乎亟欲接受这个着眼于二十一世纪的大臣职务,并且要求在整个经济萧条地区“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革试验”。<sup>②</sup>

1月9日,我利用伯明翰商会第一百五十次年会午餐的机会——会上有六七百名客人——重申了政府的总方针。发言者中,有一个聪明而且甚至可谓才气横溢的人发表了

一篇反动而巧妙的、类乎自由党的放任自由主义性质的讲话,攻击“地方发展法案”,而且攻击政府准备帮助北方地区的打算等等。……不过他 392  
却向我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我砍掉了自己原来演讲词中的大部分内容,对他的发言作了措词激烈的回答,时而怒气冲冲,时而热情洋溢。结果,我终于使这些伯明翰佬们肃立、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我对此感到自豪;他们……似乎有点难为情。<sup>③</sup>

这对我特别有帮助,因为党内大部分不满言论都是由于工商界中的各种忧虑而引起的,而且,我由于能够在伟大的激进改革家约瑟夫·张伯伦的住宅中宣扬了进步主张而感到高兴,张伯伦的势力过去曾如此长期地左右着伯明翰,而且至今还没有被忘掉。

我审查了供电工业工潮的详细记录后,注意到了经常存在的劳动时间过长的情况。于是我于1月21日向电力大臣送去一份备忘录,建议可以实行一些减轻劳动的办法。

<sup>①③</sup> 1963年1月11日。

<sup>②</sup> 《1963年年鉴》,第7页。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发电及供电工业中，大家会同意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并且把这一点吹捧为工业进步的标志（你会记得，据说清闲是需要我们学会去享受的东西。）可是大家却似乎普遍同意每周工作五十五小时。既然存在着大量不需要什么熟练技术的工作以及一些需要较熟练技术的工作，并且在全国还存在着大量失业人群，那末工业界为什么不能雇用、而且为什么不能在必要时训练足够的人手，以防止这种程度的加班加点情况呢？加班加点只可作为应付一批额外定货的权宜办法，不应该使其固定化，成为经常的制度，你是否愿向你的下属谈及此点？我还感到，这样长的工作时间也许会在你的工人中产生一种稍带紧张的状态。当然他们是得到了额外收入，不过他们也过于疲劳了。如果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是被认为正当的话，他们起码是应当感到疲劳的。

后来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过假如仅仅把工作时间短作为一种可以通过大量加班加点以增加工资收入的办法，那么我们由于自己是一个工作时间短的现代化社会而自傲，就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了。

393 1月份一直有冰冻。

寒冷的气候使失业数字大大增加（也许增加了十五万至十七万名）。目前失业总人数已达八十万人——这是1947年以来最大的数字。反对党自然兴高采烈，他们将在下星期对我们提出不信任案。<sup>①</sup>

我于月底时，对形势作了如下的估计：

经济情况还没有随着财政大臣的措施而改善。英镑稳固；出口情况不差；进口减少了，所以国际收支情况是良好的；生产正在缓慢地增长。不过对造船业、重型钢铁工业以及建筑工程业而言——即对苏格兰和东北海岸地区而言——前景不佳。<sup>②</sup>

我们同苏格兰职工工会大会的成员们，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些问题，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我感到他们实事求是，对我有帮

---

①② 1963年1月28日。

助，而且一点也没有想去诋毁我们所作的努力。这个职工大会的书记乔治·米德尔顿很有见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可是冬天仍然捉弄我们。

气候恶化了。冰冻时期虽已过去，但继续下雪（在英格兰南部和东南部有大风雪），气温很低。我担心这会使我国的生产大大倒退。我们没有做好防寒准备，所以我生怕生产和就业人数都会进一步下降。<sup>①</sup>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命运打击使我们失去了议会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反对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害病后为时无几，就在1月18日突然病故了。对于他以过人的才能所领导下的工党说来，对于由于他而大大生色的议会说来，这都是一场灾难。对于整个国家说来，这也是一个损失。

可怜的休·盖茨克尔由于某种搞不明白的病菌或病毒，害了几星期的病，于星期五（18日）晚上去世。从以前的病况公报已可明显看出，他可能是不会活下去了。……这是很令人悲痛的……他是一个品格很高的人，他的去世是国家的一大损失。<sup>②</sup>

次日我感到自己作为首相，理应发表一篇广播讲话，对他加以表彰。 394

休·盖茨克尔卧病不久，年仅五十六就与世长辞了，这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损失。由于在过去几天里，在国内差不多没有一个家庭不是同他的英勇斗争息息相关的，——在病榻上进行到最后一息。所以大家格外痛感这个损失。即使在此刻，我还感到他的去世几乎难以置信。仅仅在一个月前，他还好端端地坐在下院议席上。可是在星期二，当我们于圣诞假期后回到议会时，他的座位就要空着了。我们将在那一天对他的生平和他在议会的工作加以褒扬。他去世过早；但是他留下的成绩，任何人都为之感到骄傲。我想在今天晚上就他的为人略谈几句。

---

① 1963年2月4日。

② 1963年1月28日。

我还记得在大战期间首次见到休·盖茨克尔的情况,那时他在战时经济部多尔顿先生手下担任临时公职,当时他已经是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了,他在白厅的工作更为之锦上添花。战争一结束,他就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在下院的经历是殊可惊人的。在短短六年之中,由普通议员一下子升到国务次官,又升任大臣,终于当上了财政大臣。他何以能够升迁得这么快?在工党取得下院压倒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在1954年那届议会中,可供选择的人才济济,他何以能出众超群呢?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他具有清醒的头脑和智力,由于他的明白易懂的讲解能力,还由于他的勤奋工作。不过他还有其他优点,他的品格是一般人没有的。所以当他后来被选为工党领袖和反对党领袖时,我们在下院这一边的人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具有处理特别困难任务所最需要的特性——勇气和耐心。这两者是他品质最重要的。他还有另一个——更难以觉察的——品格,无论他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至少在初交时)都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出这一点来。他有真正的仁慈心肠——不是炫耀于外而是由衷的。他不只是许多人认为的才华出众的人,他是一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他真诚地爱他的同胞——不只是笼统地爱全人类,他具体热爱个别男和女。他彬彬有礼,富于同情心,能体贴人,即使对讨厌的人也是如此。他全无仇恨之心——除了对世间一切不平事都深恶痛绝之外。

政治生活在某些方面是残酷无情的;成败全无把握;公众好恶无常;工作是如此艰苦而冷酷,所以对政治工作者说来,体力之重要性几乎变得不下于优异的智力和道德修养。不过也有一些极可令人安慰的事,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彼此可能有极大的矛盾,而却不存在仇恨。另一点便是使所有各党各派的真诚的人们象同志般地团结在一起的那种同情心,这种同志般的关系是一种独特而富有生气的事物。在我们这些人中间,盖茨克尔是既出色又受尊敬的,而在他的亲密朋友之中,他受到了他们的热爱。他的逝世自然会给我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一个巨大的空隙。他的忠诚的妻子和家庭成员也都会相信,他的去世同样是他所广交的朋友、是全国各地的人们、是真诚地哀悼他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损失。

虽则依照惯例,下院仅为了悼念前任首相的逝世才休会一天。不



过我认为也应该照此来纪念盖茨克尔。工党对此极为感激。星期二(1月23日),在下院对他进行了正式的褒扬。1月31日,我参加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追悼会。

与会人数极多——内阁阁员、外交使团——唱诗班——教堂左右两翼坐得满满的议员等等,教堂中央也坐满了人。哀歌唱得极为感人。我感到所选的经文很离奇——是关于绵羊和山羊的那一段——(在议会上次表决中,人们几乎可以听到圣彼得在呼唤:“山羊往左边走,绵羊往右边走”)。<sup>①</sup>

盖茨克尔去世对于工党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当然,他已经成为富有经验而且受尊敬的人了。……他是左翼党派在正常时期所需要的那种中上层领导人——犹如阿斯奎斯或艾德礼。他交游广阔,吸引着伦敦的学术界、文艺界以及……某些“时髦”社会人士。在国外——在美国以及在欧洲——的“进步”圈子里,他很受器重 396 (但由于他反对共同市场的态度而影响到欧洲人对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物,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勇气。……他使他的党团结一致。他的继任者(在面临大选的情况下)按理将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sup>②</sup>

我感到从工党的观点看来,他们在选择盖茨克尔的继承人这一点上是做对了。

威尔逊是一个能干的人——远胜布朗。他在下院、在国内都很有一手——据说对电视也有一套。<sup>③</sup>

虽然我听说一个由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一些其他右翼人士所创立的名为“星期一俱乐部”的保守党新派系正要求我辞职,不过在这整个困难时期中,我自己总感到,大部分党员继续保持十分坚定的态度。我在下院自然是有几个厉害的批评者,他们大多是已经

---

① 1963年2月4日。

② 1963年1月28日。

③ 1963年2月17日。

辞职的或是从我所主持的几届政府中解职的大臣。

这个运动……声势相当大。口号是：“麦克米伦必须下台！”我党必须有一个青年领袖（希思或者莫德林）来同威尔逊（四十七岁左右）对阵。这条路线把可怜的巴特勒和我都排除在外了。

这自然是有点道理的。我们流年不利。这个运动一旦开展，任何事情似乎都变得一无是处了。的确，凡是在顺利年头里可以视为无关宏旨的小事，都在不利的年头里上升为大危机了。但是，这除了由于怀有恶意之外，主要还是由于沮丧心理。要是我现在就辞职，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我们必须至少继续干到5月份，也许还要干到1964年10月，以期届时我们的经济措施会产生效果。所以我们必须撑下去。<sup>①</sup>

幸而此时大家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守党青年党员的一次大会，与会代表有一千四百名。据报界说，我特别要在这次会上去应付难以取悦的听众。

397

我试用一个新的（或者不如说老的）手法。发言内容不是预先拟好的，也没有“发言稿”——只记下几条提纲，其余的都是“即席而发”。（实际上，我花了两天时间去冥思苦想这篇演说词——把它组织好而且牢牢地记住它。）此举果然大获成功。我一生中，在演说后从未受到过这样的欢迎以及如此长时间而热烈的鼓掌。我于晚上七时回到海军部大厦时，感到很疲乏，但心情却大为宽慰了。连今天的报纸也感到无法抹煞我所取得的胜利。由于与会者中有很多议员，我希望会上情况会流传开来。不过假如情况（尤其是失业状况）没有改善，那就不好过了，这样，去找寻一个“牺牲品”的压力……就会开始增大。<sup>②</sup>

这次会议后的第一天来了两个重要的客人，

同巴特勒就政府和我党的情况作了长谈。他似乎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党内）反对派不可能有效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彼此互相猜忌。

W·哈利爵士（《泰晤士报》编辑）于午后六时来访。他对我的演讲极为钦佩，我也对他的社论十分敬慕。这种相互“恭维”使大家皆大欢

<sup>①②</sup> 1963年2月17日。

喜,而且可能是有好处的。①

在这同时,反对党内部也有困难。

哈罗德·威尔逊已经处于困境了。一个普通议员所提关于钢铁工业的动议使他强烈地赞许国有化计划。随着大选日益接近,对工党说来,这事就会变得越来越棘手。布朗(活象侦探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失踪了,《卫报》对此事颇以权威自居。我希望我于星期六(隐隐约约地)宣布在1963年内不会举行大选一举,会使局势稳定一些。②

2月中旬,全国失业数字已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九,不幸在东北地区竟达到百分之七。对于素来看惯充分就业,或者不如说看惯过于充分就业情况的人们,这些数字是令人惊惶的。我们此刻就是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中,不得不去处理预算问题,预算将具有何种性质显然事关重大。

398

一如往常,赞成实行扩大主义的预算那一派同反对派之间的意见总是势均力敌的。不少主要经济学家主张谨慎从事,佩什教授或许就是其中最著名者。国际收支状况是令人满意的;生产略有增加;目前的税率会使财政收支“略有”盈余。也许可能对包括废止甲类税目表(房地产所有者——占用者估定租金收入所得税)在内作出较小让步的余地。只要美国人拒绝为其他欧洲国家在改革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上带个头,以使各工业国能在经济上得到全面发展,那么等一等——停桨休息一下——不是更为稳妥吗?此刻失业人数的确有六十万左右,不过这个数字容易引起误会。其中不少人仅仅失业了几个星期;他们与其说是失业不如说是在转业中。而且就连福利国家的守护神贝弗里奇勋爵也宣称过,社会失业总人数如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三点五之间,则应视为存在着充分就业的情况(盖茨克尔也曾对此表示同意)。在西北部和东北部的某些老的“困难地区”,特别是苏格兰,情况的确要严重得多。

①② 1963年2月19日。

但是我们应该信赖供求法则。人口会随着就业机会而移动。要同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相颉颃是害多利少的。

对于这样在实际上冷酷而却令人有所感受地运用了过去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原则，我本能地而且猛烈地作出了反应。我感到自己这样做，是得到保守党党员群众和全国的同情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理由之外，显然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工会势力的增大以及社会福利的支撑力量，使贫困的压力比过去有所减轻，从而造成了经济体系的僵化，国家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或者命令主义——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保守党的传统主张。我认为这其实不是一个原则的问题，而仅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财政大臣和其余的同僚们也完全赞同这一点）。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奈迪）于2月底宣称，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每年仍可望增加生产百分之四，不过1961至1962年间的停滞状态使我们现在有必要作出努力，把增长率提高为百分之五左右，以便达到预定目标。大多数专家们自然认为国家经济至多只容许全国工资增加百分之三左右。假如能照此限制住工资的话，那末现在去“开动水泵”肯定是正确的了——换一句话说，就是根据凯恩斯的方针，在大范围内增加现有的购买力，并去刺激消费和投资。

在提出预算案之前，除了采取我已经说过的那些措施之外，还通过海军部关于泰因塞德港工程的订货、批准在丹第迪建造泰伊大桥以及在迈西塞德、苏格兰和东北地区进行各种公共工程，采取了某些进一步的措施，以帮助最困难的地区。但是关键将在于，我们在安全地对经济投入额外资金而又不至于陷入通货膨胀危机这一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的办公厅和财政部之间就此点相互交换了不少备忘录，而且还举行了长时间的商讨。我感到莫德林既善于变通又有才智；最后达成的决定虽然不是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冒险，至少比我所期望的更为大胆，因为我从经验中知道正统派的



主张在权力机关中是多么有力量。预算的扩大主义性质以及 1963 年的补充措施当然不是造成某些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接着就要在 1964 年底发生了。我无法断定，在我离职后的期间，究竟扩大经济的做法是否搞得过头了。我确信，在我负责主持政府期间，即使我们不能期望华盛顿去采取一项更有建设性的政策，我们也并没有越出谨慎的限度。当我们对预算作出最后决定时，减免的税收达到二亿六千九百万镑；还要加上某些政府开支，诸如政府付给造船业的三千万镑以及类似的其他补助金。由于我本来所敢提出的最高数字约为四亿镑，所以我对于上述成果是满意的。

不过能在 4 月 2 日提出预算案之前，还要去忍受一个艰苦的 400 时期。可怕的冬季仍在继续之中。

又下雪了，道路结冰，还没有真正解冻的迹象。失业数字还继续维持在九十万人以下，这可算幸运了——因为一切道路和房屋等等的修建工程都已经停顿两个多月了。<sup>①</sup>

不过同日，我由于同财政部交涉有进展而感到高兴：

同莫德林作了畅谈。我们对恢复经济的总方针意见大体一致。在英镑方面，我们得冒个险，如果全国人民（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也认为一项合理的“收入政策”是必要的，我相信我们就能够避开那必不可免的“停顿”而去进行另一个“尝试”。<sup>②</sup>

一切政治上的征候都仍然对我们不利。

盖洛普测验的结果很糟——工党遥遥领先，他们获得 12—15 分，我的“声望”正迅速下降。不过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都遇到过。哈罗德·威尔逊开始对我很不客气了——全是关于公爵们呀、裙带关系呀那老一套，这些话是经不起考验的。<sup>③</sup>

二三天后，我还由于下述事实而受到了鼓舞，

①② 1963 年 2 月 21 日。

③ 1963 年 2 月 25 日。

哈罗德·威尔逊在昨晚作了一篇十分聪明的广播演讲。不过他有所失策。人民不要增税；他们希望减税。<sup>①</sup>

我们继续感到心中无数。

报上仍然连篇累牍地刊载我将辞职以及党内有人阴谋反对我的报道，但是我认为这仅仅是几个星期前谣传的一种余波。现在一切全取决于预算案以及是否有可能扩大经济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这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普遍接受一个合理的收入政策，以作为“制约”。<sup>②</sup>

可是次日，“由于电力工业工潮以增加工资百分之六获得解决”，使我们对达成一项完善的收入政策所抱的希望遭到了“严重打击”。<sup>③</sup> 当新的一代人想到十年前使我们如此惶恐的工资增加数字竟是如此微不足道，就一定会感到很不理解。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就象米考伯先生<sup>④</sup>那样地争论不休；增加百分之三四是可以容许的；增加百分之五六便会使国家破产。我可从来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它毫不顾及同我国竞争的各国国内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不过我们还是决定把电力工资协议提交全国收入委员会(尼基)去审查，其目的与其说是要改变这项协议，不如说是作出一种姿态，收入委员会恰如其分地对之作了严厉的批评。

不论是否为了刺激消费或者为了刺激投资，都需要向国民经济投入更多的资金，与这个问题同时存在的，还有在英国工业中实行“现代化”的这个重要概念，我们为此开展了一个大规模运动。我们在春夏两季努力加紧进行了此项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不过最紧迫的任务无疑是要尽量做到扩大经济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女王访问了斐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回到国内后，我于3月11日向她写了一封信，试图把情况概括如下：

---

① 1963年2月28日。

② 1963年3月3日。

③ 1963年3月4日。

④ 米考伯是狄更斯小说《大卫·考伯菲尔德》中的人物。——译者

从我们的观点、实际也是从国家的观点看来，一切都要看我们是否能重新扩大经济而又不至于对国际收支和英镑产生灾难性后果。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能否做到繁荣而又不至于出乱子？学者们正在所有不论是大众化还是严肃的报刊上，就这个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们通常可分为三派。一派说：“只要繁荣，用不着顾虑出乱子”，也就是说，让英镑贬值或者让它的价格自由浮动。第二派说：“把经济扩大起来，一旦英镑受到攻击，就集中全力投入战斗。要尽力去借款，把这个仗打到底。”第三派说：“把经济扩大起来，不过要通过对一切进口货物的具体管制或是通过某种形式的附加税，来限制进口。”不过在这些学者的背后还有全国人民。陛下的政府是决心去扩大经济的。我们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将在预算中公布的进一步措施应该会产生这种效果。不过我们将继续努力说服人民去接受一项合理的收入政策，以作为扩大经济的代价。两年来的巨大斗争其实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相信即使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经验教训都消化掉，我们至少也领会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会以及甚至工党领袖现在也不反对收入政策本身了。他们的确都声称要有自己的收入政策。他们肯定会要求所谓富裕的人或者雇主们作出许多让步，拟议中的资本税可能与此有关。不过甚至在工党和工会圈子里也有人谈论收入政策了，这使我对于我们正在进行扩大经济时，可能不至于引起工资、薪金以及股息产生不适当的增长这一点抱有希望，再者，“不适当”一词在这里的含义和它在1961年时的含义不同。那时我国正在一马当先扩大经济，我们在欧洲和美洲的竞争者瞠乎其后。现在欧洲物价水平，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物价水平，已经高于我国，而且还在迅速上升。法国人为了制止物价上涨，此刻正在冒一次大罢工的危险，尽管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这一点证明，法国政府如何重视压低他们迅速增长的生活费用和生产费用。所以，假如我们能够使我们工资上涨率保持在每年百分之四，或甚至百分之五，我认为我们就有可能实现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扩大而又不至于产生通货膨胀。换言之，即能获得繁荣而又不至于出乱子。由于在苏格兰和东北地区还有未动用过的资源，假如我们集中相当力量在那里发展，我希望我们可能扩大经济而又不会遇到由

402

于充分就业或者过分就业而引起的那种通货膨胀。所以我们将力谋把相当的力量集中于这些地区。不过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这一点：正如我们两年来一直鼓吹的那样，正如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十分有效地加以强调的那样，假如我们现在能够开始扩大经济，假如我们要把控制货币的恶魔——英格兰银行要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推开不顾的话，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能自我控制的新人取而代之，这其实就是说，不要要求过高。陛下的臣民此刻是否愿意去接受这一点，我还没有把握，此事原极简单，我们竟会对之大加宣扬，几乎有点可笑。不过我想他们是有些变乖了，可能赞同不去杀死母鹅而等它生下金蛋来。

我在视察苏格兰期间，已经同苏格兰工会大会书记乔治·米德尔顿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于3月15日写了一封信给他，概括说明我们正在进行的以及准备在苏格兰进行的工作。

对于你在2月28日的来信谨表谢意。不管怎样，我本来就准备现在写信让你知道，在你们的代表团于1月22日来见我时所讨论的几点问题上，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我也同你一样地感到，这次会议是很有价值的。

关于建造泰伊大桥的事已于次日宣布了，这是你向我建议的几项计划之一。我并不讳言这是你的建议的直接结果，但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端。

我认为，如果我先把已经办妥的事简略地谈一下，然后再向你说明我们在某些其他建议上所取得的进展，可能更妥当一些。

你们的代表团曾经议论说，有可能而且也应该通过提高对建造房屋、道路、学校、医院等的开支水平，采取更多的措施，以加速社会发展。自从我们上次开会后，下列工程项目已经先后公布了：

在有选择的地区进行的规模较小的基本建设计划——二百万镑。

追加的道路工程——二百五十万镑。

在麦克布雷恩兴建的三艘车辆轮渡——一百二十五万镑。

两家供电局在输电及配电设备上的支出——六百二十五万镑。

扩建一所师范学院——一百万镑。



在格拉斯哥兴建的一处水库。

这些项目再加上用于泰伊大桥的四百二十五万镑，约等于在苏格兰另外投入了二千万镑基本投资支出。

还有你向我提出的，为南苏格兰供电局在邓费尔姆林的汤希尔兴建的煤气涡轮发电机。这将耗费一百九十五万镑。听说这将为1964—65年冬季迅速提供新的高度负荷能力，以弥补诸如在阿畏湖建立抽运储水装置等规模较大的工程投入运转之前电力不足的情况；不过这个电站管理费用将会很高，供电局一定要注意防止由于推广此种发电方法而使发电成本过重。

你们的代表团中有一个成员要求对工业使用土地更多地 进行改良工作。商业部将为此花费三十万镑，主要用于多尼勃里斯托、布兰太尔和法夫的莱文谷。关于整修已列入清单的工业地区的其他计划正在考虑之中。

还有拟议中的新火力发电站。这里存在着我们正在加紧处理的大 404  
量复杂技术问题。我希望在5月份即可作出决定。

造船工业的问题必须通盘加以考虑，我知道你是明白这一点的。苏格兰各船厂基本上存在着同英格兰各船厂相同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你向我提出的建议，而且政府的确也已经提出了几批它能够过问的定货。

这些总的说来都是能在短期内奏效的计划。长远的问题是如何使苏格兰的经济复苏。我在我们上次会上已经说过，我们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或者短期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决心去处理这个问题，并要去执行政府所能办到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措施。

请允许我添上一句私人的话，听说你就要退休，我感到很惋惜。希望你永远身心愉快。

4月2日，内阁于上午十时半召开会议。

财政大臣出色地说明了预算的一些主要建议的梗概——清楚而有说服力。我们在这方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成绩超出我原来的期望。把工业吸引到苏格兰、东北海岸等地区去，并把本来在当地的工业加以扩

大的建议，是富建设性的，理应是会有效果的。我确信，应该利用所得税以作为扩大经济的主要方法，而且在所得税中，应该使用补助金的办法而不是使用标准税率。整个预算是以一个简单的主旨为根据的——扩大经济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这意味着政府、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真正合作。为此调整的补助金——对一个已婚的、有两个孩子的、每周收入十五镑的人说来——等于增加工资百分之二点五，却又不增加生产成本。大臣们都很高兴而且感受颇深。①

405 虽则职业经济学家们有时和我们意见不一致，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更常常是各执己见相持不下，不过当预算于次日公布时却颇受欢迎。它是根据我早已讲过的方针来编制的，其中包括了数额达到三亿英镑的救济金，以及政府在各方面举办的工程等等的额外支出。工党由于已经主张增加税收而不是主张减税因此缚住了自己的手脚。此外，我们履行了塞尔温·劳埃德于上一年所作关于取消甲类税目的诺言，此举受到了好几百万房地产所有者——占用者的欢迎。

财政大臣从三时半一直发言到五时一刻——讲得出色极了，无论从形式和内容说来，都使政府党议员欢欣鼓舞，并使反对党议员不得不感到钦佩，威尔逊的拙劣讥讽毫无作用。事情已经决定了——要做到扩大经济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工会肯干吗？这全要看他们的态度了。②

过了几天，我同多罗西到南威尔士去访问。尽管别人对我个人的攻击变得越来越猛烈，不过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次访问证明是一次很大的成就。参加欢迎大会以及参加在以后举行的一次非正式联欢会的人数极多——也许多达五千人。“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实在令人感动。”③

---

① 1963年4月2日。

② 1963年4月3日。

③ 1963年4月6日。

这时，我利用“1922年委员会”在萨伏伊饭店举行午宴的机会明白表示，我打算在下次大选中继续领导保守党。由于几天后宣布普尔勋爵将回来同麦克劳德一起担任党的联合主席，而使这个决定更显得突出了。普尔勋爵以作为1959年使保守党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的组织者之一而闻名于世。人们对他回到党内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我们将取得同样胜利的吉兆。这次午宴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

由于两个原因这次宴会对我说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一）经过了去年整整一年的或者更长时期的困难情况后，我是否可以说我们正进入一个较好的环境呢？我是否应该使大家不再胡思乱想，宣布自己决心继续担任首相并且在下次大选中领导我党呢？（二）在宴会上，人家将把一幅极其有趣而且有价值的画赠送给我。在它（是由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汤姆森先生画的）上面画着1960年在下院进行答辩的情景——我正在发言；（提议答辩的）莫里斯坐在我的背后，温士顿坐在他常坐的角落里；盖茨克尔稍微提起身子，要去打断我的话；还有坐在前排和后排为大家所熟知的几位为首的大臣。这幅画的确好极了，它仿照上一世纪有时出现的类似作品的风格。赠画时，由约翰·莫里森致词，由议员们“揭幕”观赏。我在答词中力图十分热烈而又文雅地向他们致谢（这一表示爱戴的独特方式的确使我深受感动），并且鼓励他们为将来而奋斗。经过事前已同总督导员商量，我宣布自己打算（上帝意旨）在下次大选中继续领导保守党。<sup>①</sup>

随着春天的到来，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情况有了改善，在党内和国内都感到信心越来越大。“奈迪”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雇主们和工会工作者配合一起为新的训练计划、为学术研究机关和生产部门的科学家之间建立联系、为地区发展规划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计划，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即便“尼基”批评了建筑业的工资协议，认为它可能属于通货膨胀性质的，可是大家普遍感到，这种

<sup>①</sup> 1963年4月10日。

程度的通货膨胀有如女佣的婴儿,是小的无以复加的。

所以当我于4月27及28日在契克斯别墅,为研究英联邦及外交政策、工业及经济政策、社会服务以及政府机构问题——内容的确不少——而召集大臣们举行会议时,我们是抱着相当大的希望去开始进行工作的。这时我已经从格拉斯哥回来了。

我在那里的活动日程表是排得满满的,这包括(一)同工党党人的市长一起主持一个工业发展展览会的开幕仪式;(二)和苏格兰全境的报纸编辑共进午餐;(三)电视谈话;(四)为格拉斯哥大学的纪念(沃尔特·埃利奥特)图书馆主持开幕典礼;(五)参加一次群众大会——三千人以上;(六)同苏格兰工会头面人物共进午餐。这一天的活动都很顺利,据说这次电视谈话非常成功。<sup>①</sup>

这次大臣会议——包括内阁成员以及非内阁成员——进行了两天。

407 第一夜是同主要大臣们进行会议——主要关于外交及英联邦的事务,所有其余人员(三十二名)在星期天都参加了会议。那天一共开了三次会——一次在早上举行,其余两次在下午举行。每一个议题的“带头发言人”都准备好了发言提纲——其余的人则作即席发言。这是很有作用而且有趣的。这自然会使报界大为轰动,也(同样自然地)引起(一个十分尖刻的工党党人)利普顿先生在下一个星期问我:需要为此“支出多少公款”?我回答他说“一无所费”(我们早就防备这一着)。<sup>②</sup>

在5月初地方选举的失利情况也并不使我大吃一惊。当一届议会的任期过了一半时,这是常见的现象,这部分是由于拥护政府的选民的态度趋于冷淡之故。5月14日我

开始第一次进行了同两位党主席普尔勋爵和伊恩·麦克劳德的每周碰头会。我们还要召集其他人来协助进行各方面的工作。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两小时,很有好处。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看到一些进展了。地

---

<sup>①②</sup> 1963年5月5日。



方选举的结果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不好也不坏。<sup>①</sup>

随着 1962—63 年度可怕的冬季的结束,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全国的情绪都显著有所好转。让我引述一位公正的评论家的话:

经济发展加速了,这证实了莫德林先生的话。5 月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二千九百万镑,失业数字直线下降。据 5 月中旬统计,失业人数仅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二点四,在 6 月中旬为百分之二点一。不过这个数字并不是到处一律的。在伦敦和东南地区的百分比(一点二)令人想起“过分就业”的时代;而在苏格兰和东北地区还继续停留在百分之四点三。所有的迹象中,最好的莫过于出口的进展。冬季过后以及美国码头工人罢工结束后,随着贸易开始活跃,3 月份出口创了新记录(三亿四千九百万镑);现在 5 月份的出口不经扶助就上升到三亿四千一百万镑。<sup>②</sup>

不论在下院或者在全国各地,春天的到来以及特殊地区失业状况 408 大有改善的现象都反映在党的精神面貌上。有时我自己还会感到忧郁,这无疑仅仅是由于过劳之故。当我处于这种情绪时,往往感到英国公众

变得越发玩世不恭而且说话带刺了。我看了一篇以问答体裁写的关于现代青年知识分子所想的是什么的极其令人沮丧的文章。有七千个左右的问题;内容极为详细而且设想得极妙。宗教、道德、爱国、荣誉,所有这些对他们说来都不是那么重要。他们有着(虽则是不露于形色的)强烈嫉妒感,这是一种在情况好转的情况下颇无远见的悲观情绪。如何才能取悦于这类人,倒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sup>③</sup>

不过在 5 月的欢乐气氛中,即使是保守党中脾气最坏的批评我的人也开始放松对我的攻击了。我感到,从党的观点看来,现在我们已经柳暗花明了。就业和生产都继续上升。由于国际货币制度

---

① 1963 年 5 月 14 日。

② 《1963 年年鉴》,第 17 页。

③ 1963 年 5 月 20 日。

缺乏灵活性,我们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不过还不曾出现过出口下降迹象,或者对国际收支和英镑的任何压力。在整个夏季一直存在着这种情况,而且直到我这一届政府结束时还是如此,所以我们不知怎么搞的可算是弄得恰到好处。我只能借此对所有引导我们通过这些艰难险阻的人们,特别是对财政大臣莫德林记下自己的感激心情。

## 二、国防机构

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挫折之中,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令人满意的。我一就任首相,便开始去考虑建立国防中心机构的问题。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这个问题曾经一度被掩盖起来,那对丘吉尔在全国人民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不经议会批准就亲自担任国防大臣,这纯  
409 然由于其本人的权威,才能够实行一个为其继任者所无法维持的中央集权体制。甚至在他的最后一届政府中,保守党的国防大臣们也一如前任的工党国防大臣们那样,处于先天地无能为力的地位。我是通过痛苦的经验而了解到这种情况的。我感到自己担任那个职位的短短数月是一个不如意的痛苦时期。

议会关于在战后建立国防部的法案,所赋予国防大臣的权力是很成问题的,它甚至没有向他提供充分手段以完成需要他去执行的职务。这个新设的部不是由最高级指挥官们,而却是由次要的(即使是忠于职守的)军官们组成的,它很难同皇家武装部队的老传统相颉颃。在海军部中,有一批海军大臣麾下的各级将领;陆军部有它的国务大臣和陆军委员会;即使是战后建立的空军部,也配备着一个国务大臣——真正的实际控制权就是由这些历时已久的机构掌握的。而且任命了国防大臣之后,这些机构的政治负责人仍然对议会负有责任。即使象 A. V. 亚历山大这样性格坚强的人物,也无法改变自己固有的软弱地位。在这同时,我们的实战经

验表明：除了在中央要有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之外，任何实际作战活动都需要把三军置于一个司令官的单独指挥之下。我们在第二次大战的所有大战役中，都一直采取这个方式，每一个参加实战的陆海空军士兵都明白，无论在非洲、意大利或者西欧，盟军最高司令官行使的这种战略上、甚至战术上三军密切结合的统一指挥权所带来的好处。战后，这种由一名海军、一名陆军、一名空军人员组成统率所有各兵种的指挥体制，逐渐地在我国的殖民地和基地中建立起来了。

所以，我一组成政府就着手采取行动来加强国防大臣的地位<sup>①</sup>。几个月后，1957年5月16日我写信给国防大臣邓肯·桑兹说：

我们在国防白皮书中已经确定了武装部队的大体形式和规模，我们 410  
还要在本月稍晚的时候去考虑关于他们的配备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后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组织机构的问题上。

我们必须保持三军的个别传统和热爱组织的精神。同时，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有否可能把它们的首部行政管理和政策支配权归并于一个单一的、综合的国防部。这个部还要把军需供应部的职权接管下来。

我希望你去考虑这一点，并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我还要把这份备忘录的副本送给主管三军的大臣们和军需供应大臣。

这个计划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由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防大臣管辖下的崭新“机构”。正如一些重大的但却不是那么急迫的问题所常有的情况那样，有关方面从容不迫地进行了商讨并且传阅了一些文件。可是迄至年底，对基本原则还不曾作出决定。

1958年3月，任命了一些大臣去商讨关于国防机构的方案。不过正如我在当时所写的那样，

<sup>①</sup> 参看《乘风破浪》，原书第240—245页。

在这个问题上即将发生大争吵。参谋长们也好，三军大臣们也好，谁也不喜欢它。<sup>①</sup>

没有过几天三军参谋长和大臣开了一次会，会上探讨了现行体制的缺点，并且大略提出了以后的打算。但是真正的问题仍有待解决。我于1957年所发的指令至少使国防大臣有权就“涉及武装部队的规模、形式、组织和兵力布署”的政策的一切事务以及就供应、装备等事项作出决定。这的确是有所进步了。在此同时，三军的国务大臣和海军大臣照样可以主张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和职责。当然在和平时期，不论是我的指令，或者任何其他首相的指令，都无法否定他们历来已有的职务。毫无疑问，某些反对实行更合理的体制的意见，是由于个人之间性格的矛盾；当时担任国防大臣的邓肯·桑兹的坚强性格颇使一些军种的大臣感到不满，而他们则受到了专业顾问们的怂恿。不过这里也有带根本性的、真诚地坚持原则的问题。在1958年整个春季，白厅内部一直存在着一种暗斗。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有分歧；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空军元帅威廉·狄克逊爵士和海军大臣蒙特巴顿极力而且一贯支持改革措施；但是其余的人则十分反对。

在夏季，这桩事在内阁全体会议中进行了讨论。这时，这个争论已经见于报端了。当时我看到，而且从此以后也注意到，报纸会更快地接着介入三军之间任何此类的争吵，而且其程度会比单纯由民政事务所引起的争吵更为剧烈，甚至更为尖锐。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后一类争吵往往是属于暂时性质的，而前一种争吵则涉及一个人毕生所献身的工作和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的理想。内阁所考虑的白皮书草案的最后一稿内容极为温和。<sup>②</sup>它公布于1958年7月，主要是正式确认了我在上一年通过指令为国防大臣的职

<sup>①</sup> 1958年3月14日。

<sup>②</sup> 《国防中心机构》，敕书第476号（皇家文书局，1958年）。



务所重下的规定。基本上仍将保持四个各自独立的大臣们相互配合的体制；当时的第四个大臣是军需供应大臣，于两年后改称为航空供应大臣。1958年的白皮书中，有三项具体改革：第一，国防委员会名义上是由首相主持的，他将根据所涉及的问题性质，随时更动委员会的成员。第二，将设置国防参谋长这个新职务，从而改变了1957年时由三军参谋长之一来担任主席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因为这使主席具有独立的地位，以便使他能够从不偏不倚的立场来担当国防大臣的参谋。最后，成立了一个国防局，以协助执行1957年指令中所列举的一些职责。

连得这些变革也还是遭到了顽强的反对；有些人一度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不过，部分由于大家精疲力竭，部分由于友谊，部分由于诺曼·布鲁克爵士的不懈努力，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接受了下列原则：即新的国防总参谋长自己将不握有“实权”，把所有作战机构都交给三个参谋长去掌管，大家终于达成协议，并正式发表了白皮书。我感到这其实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胜利。虽然自己同有关的军官们有着良好关系，在第二次大战以及此后的期间，我同他们大多数人就一直很熟识，可是在某些阶段中，我们商谈的气氛还是令人极其不快的，所以我在面临许多其他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情况下，就不想重提这个问题了。 412

直到1962年底，我才感到有可能再提起这件事来。此时由彼得·桑尼克罗夫特任国防大臣，并已任命蒙特巴顿勋爵为国防总参谋长。我知道这两个人都会赞成改革而且的确会热情加以支持。同样重要的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官卡斯珀·约翰海军上将此时成为海军大臣，他是赞同革新的。最后，核威慑力量以后将不专由空军来掌握，而是要通过北极星潜艇，越来越受到海军的控制。这一事实似乎构成了不仅要把三军置于统一指挥之下，而且还要把它们组织机构和支配权也统一起来的进一步理由。我们

相信可以在参谋及指挥方面做到这一点，决不至于影响士气或者损害任何个别部队或者整个军种的传统。

通过了这些会谈，我向国防大臣送去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陈述改组的总方案。我于12月13日写信给女王，对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这个方案都作了略为详细的说明。

陛下将可在此刻看到我送给国防大臣的关于改组我国国防体制的备忘录副本。

413

如何使三个军部和国防大臣之间维持合理的关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了。三个军部一起磋商工作以及相互帮助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了。而且，现代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费钱，这就使下列情况成为必要：即所有各军部经济上的要求应该妥善安排并取得平衡，以便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有效的成果。

有人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加强国防部，把三个独立军种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皇家武装部队。正如在任何部门工作的文职人员都不分彼此那样，不论在海陆军或者空军工作的战斗人员也都将属于同一军种。将设置单一的参谋部，并将仅由一个大臣向议会负责。所有经费开支将一次议决，所有关于征兵、训练、薪饷、军纪和任免等事项，也将同计划、作战以及发展武器工作一样，由一个人来单独负责。

假如这些事情仅仅通过逻辑推理和就事论事的办法就可以处理得了的话，那么上述这个办法的确有许多优点，当然对于战斗人员，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士气了。士兵对自己所属联队比对全军更感到关切；水兵忠于自己的军舰而不是忠于海军本部；作为三个军种中最年轻的空军人员，也许比他的战友们更积极地把自己同自己的事业，即大队、或者中队、或者分队等同起来。

我们得设法去满足两个要求。我们必须使三军一元化以使其既有效率又能避免浪费；我们又必须分别对待以维持士气。

不少反对使三军进一步一体化的人是由于反对把三军彻底统一起来而觉得理直气壮的。这一点往往说明为什么在其他方面可算通情达理的人，竟会被迫去采取在局部关系中看来似乎是可笑的立场。在许多方

面,三军进行合作是很方便的:如储备、医疗、运输、交通、牧师传道工作等等。如果大家有意在这方面合作,就可以配合得很好。可是目前对涉及范围很广的单一军种概念所存在的抵触情绪,正阻碍着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推广涉及范围较小但却是十分切实可行的合作办法。

三个军部并没有准备在1958年采取任何重大改革措施。最后我和国防大臣都被挫败了。尽管发表了国防白皮书,成立了新的国防局,而且把作战职责转到国防大臣手中,可是根本的情况并未改变。三军依旧完全分立;仍有三个参谋部和三个相互竞争的部门,它们都力求取得可供国防使用的资源。三军的团结一致表现于它们对国王的忠诚,而不是表现于愿意彼此合作这一点上。 414

不过在最近的四年中,大家的思想感情已有了变化,这部分是迫于形势,部分由于参谋长的人选有了变动。蒙特巴顿勋爵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三军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卡斯帕·约翰爵士真诚地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赫尔将军已准备采取某些行动,甚至空军参谋长此刻也准备同意加强国防部了。所以我认为有可能去试图采取一个较有成功希望的新措施。

我的设想是要把单一军种概念和现存的三军分立的优点结合起来。我确信,把计划、作战和发展武器的职责集中于国防部,以作为国防大臣直接的责任这一点是正确的。为了使他对三军拥有必要的控制权,我认为他应该负责掌管高级军官升迁事宜,所以我想实行少将级以上人员的统一登记办法。在这同时,旅以下的三军编制可以继续分别存在下去。毕竟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军官不会升到旅长级以上,而普通士兵不大会指望自己升到上校以上的级别——实际上大多数只着眼于上尉或中尉一级。

实行统一登记办法将不意味着少将级以上的军人都属于一个军种。仍然分三种军服,陆军上将决不会坐在海军上将旗舰中的长官室中。但是国防大臣将根据统一登记,在适当军种中作出恰当的任命。三军将在国防大臣总的指导下,处理征召、训练、薪饷、纪律等事项。不过我认为不应该让国防大臣为这些事情向国会负责。且不说还有其他事情,单是这 415

事就是难以设想的沉重任务了；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样做会有效果。我认为应该为每一军种设置一个大臣。不是一个内阁国务大臣或者这一级的人员。这样做显然是过时了。但是设置一个国务大臣也许是对头的。还有待于解决的是：对现有的管理局或管理委员会怎么办？我们还有必要去解决三军中高级专业性职务的衔头问题。不过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讨论我所提方案的主要大纲时加以考虑。

还有必要去考虑航空部的问题，因为研究和发展计划现在已是我国国防布置中一个重要的而且不幸又是一个费钱的组成部分。新方案也应当把它考虑进去。似乎应当设置一位负责后勤工作的大臣，他将执行目前由陆军部及航空供应部所负责的一切军需职务；还要设置一位负责武器发展工作的大臣，他将执行目前由三军中不同的科研部门所负责的一切职责。

这样将有一位国防国务大臣、一位负责军需的大臣、一位负责武器发展的大臣和三位主管三军的大臣。也许还需要一位国防国务大臣的副手和一二名政务次官。

陛下将会看到，通过这些安排，我们就能够对国防及三军工作实行集中领导。至于作战单位，仍是一个联队、一艘军舰或是一个空军小队，这类组织由来已久，是三军士气所系的重要因素。

我将于圣诞假期后同大臣们进一步商讨我的方案，并将向陛下报告事情进展情况。

我从拿骚一回来，就接到了三军参谋长对这个方案的评议，不出所料，他们是有些意见的。

但是我认为，最近在国防方面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特别是轰炸机和  
416 潜艇之间何所抉择的问题），实际上都增强了对国防、至少对高级国防部门实行一体化的理由。<sup>①</sup>

12月31日，召开全体会议，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下午二时四十五分至五时，同三军大臣开会，他们（在参谋长们的支

---

① 1962年12月26日。



持下)猛烈反对改组三军及国防机构。①

为了争取三军的信任，我请伊斯梅勋爵和陆军中将伊恩·雅各布爵士对高级国防机构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这两位军官受到了他们在二次大战中所结识的人们普遍尊敬和爱慕，因为他们曾经担任过丘吉尔和参谋长之间的联络官。没有谁再比他们更有经验，或者比他们更能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的知识、想象力和良知了。当我在将近1963年2月底接到这份报告时，即将它交给内阁传阅。它分析了现行国防政策高级指导机构的缺陷，并提出补救办法；下一步应该是把三个军部变成国防部的附属部门，而让三军保持原状。虽然他们认为到头来还得根据职能来组织国防部，他们仍然建议在眼前应在国防大臣手下为每一军种设置一位负责大臣，不论上述最后阶段是否实现，他们所提出的办法是合乎常理的第一个步骤。同样，可望于最终出现一个由海军少将、陆军少将或空军中将级以上人员组成的一元化机构，它将具有上述级别以上人员的单一晋升名册。

当三军大臣和参谋长同我在2月26日讨论这个方案时，他们似乎很愿意照原议全盘予以接受，把进一步的改革留待以后再说。此刻至关重要的是去着手进行此事。次日内阁讨论了这个方案，并且一致予以通过。由于女王在武装部队中享有特殊地位，我自然又向她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以说明我们的一些建议。

3月4日，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议会对国防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时，提出了这个方案： 417

他所作关于改组(它使我们忙了而且担心了这么久)的演讲很成功。反对党完全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有些重要的人员已预先接到通知)感到很满意。②

---

① 1962年12月31日。

② 1963年3月4日。

航空供应部成为一个特殊问题，因为它所掌管的研究和武器发展工作无论对民用和军用都很重要。对这一点还有待作出最后的决定。

不过4月初，当我们要制订出新国防部的具体体制时，我就意识到我们又遇到困难了，这事涉及如何议决军需供应、任命会计人员等等这一切问题。于是我于4月8日向桑尼克罗夫特发出了如下的备忘录：

多谢你于3月22日送来了两份备忘录，它报告你执行内阁关于建立一元化国防部决定的进展情况。

我希望还有进一步的报告。由于我们希望在将近6月底时发表一份白皮书，所以我们应当在5月间采取行动去解决具体细节问题。时间将是相当紧迫的。

我理解到，主要危险在于这一点：我们可能受制于三个军部的可怕惰性而无所作为。这将是很糟糕的，会使政府大大出丑。

如果我们必须在两项可行办法之间进行抉择的话，我们总是应该选中较为激进的办法。根本不再存在把两种可能性的微小区别加以折衷的问题。我们一旦开始这样做，到头来就会一事无成。

我指望你留神不让我们再象1958年那样掉进那个陷阱。我很担心，单单把几个单位放在一间屋子里，使它们习惯于在相距不远的地点工作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十分担心我们以后须就国防预算进行四次表决而不是进行一次表决，果真如此我们倒不如不去为此费神了。

418 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不过假如我们不去建立一个新体制，我们的继任者自会这样做。我们还是去办妥此事立一下功为好，因为这是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去做的事。

4月29日，我接着又发出了一份备忘录。

我接到了你于4月26日送来的备忘录，我看到其内容后大为不安，我们应该有几条明确的原则。

通过这次改组，机关人员应至少裁减百分之二十。如能减少百分之

二十五，那就更好了，人们应该把你在第五节所列各项原则全部接受下来。应该明明白白地规定下属系统。只允许设置一个会计官，而不是设置四个。如果有四个会计官的话，事情就糟了。常务次官应该是副大臣。所有人的职位都得贬低，不得提高。与其到时候自认我们已经败于各军部之手，我宁愿此刻就完全放弃进行此事。请决不要去理睬任何反对意见，你应该照劳合·乔治大刀阔斧解决问题的方式去处理这事。包括大臣在内的任何人，如有反对意见，都可以走他的。无论在政治上或是在其他方面，三军大臣的地位都不太坚强。我恳求你毫不留情地排除源于这许许多多偏见和局部利益的阻力。

我在5月的第一周仍然感到焦灼。“新方案正在逐步形成中，但是阻力很多。”<sup>①</sup>过了几天，

我同国防大臣就改组机构方案作了长谈，这项工作进展很慢。尽管方案“被接受下来了”，三军各单位正在采取一种“怠工”办法来抗拒改组。<sup>②</sup>

最后于5月14日，我感到应该精确阐明我们要求做到的是什么。

对于你口头报告关于改组国防机构的进展情况极感兴趣；听说你准备白皮书工作有进展，感到很高兴。

我希望白皮书能反映出下列各原则：

419

（一）必须建立一个彻底一体化的单一国防部，它决不是一些半独立的分支部门的集合体。这并不一定意味彻底实现职能化，不过我在你4月26日送来的备忘录第五段第二点中，高兴地看到，你打算尽可能使新的国防部在国防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单个军种的基础上来发挥其职能。

（二）一切权力应归属于国防大臣。我们可能有必要把例如某些司法权力授予其他方面，我希望尽量减少这种情况。

（三）上承下达于国防大臣的命令和责任的渠道都应清清楚楚。

（四）任何其他当局都不得妨碍或干扰上述的渠道。

（五）国防大臣必须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委派和分配各种职务。

① 1963年5月5日。

② 1963年5月9日。

这一点必须包括有权随时对国防部采取证明是可取的改组措施。

(六) 绝对不许增加国防部所雇用的文武人员总数，如有可能还应该予以削减。这一原则将适用于所有各级机关。不得大量增加将级军官和次官的名额，并且通过削减其他级别的军官及文职人员以作抵偿。

我也把这份备忘录的副本送交主管三军的大臣们以及劳伦斯·赫尔斯比爵士和伯克·特伦德爵士。

准备白皮书的工作继续进行着，桑尼克罗夫特显得十分耐心，他还受到了蒙特巴顿勋爵的大力支持。7月11日，

内阁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议(10:30—1:30)，不过会开得很好。国防白皮书是讨论的主要内容，改组方案得到了批准。<sup>①</sup>

于是在7月16日发表了白皮书，它陈述了整个方案的内容。<sup>②</sup> 下  
420 院于7月31日进行了辩论，国防大臣在会上作了清楚而深刻的说明。我们在所有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了成功；我们挫败了要削弱新国防大臣的权力的企图。例如，将只设置一个常务次官，他的手下将有四名副常务次官，三军及国防秘书处各设一名。新任的国务大臣们将属于次要一级这一点也交代得一清二楚。同样，国防总参谋长也将只是国防大臣的顾问，虽则三军参谋长们当然将根据需要并在必要时列席改组后的国防委员会。他们还将保留向首相直接联系的传统权利，并且保持自己在本军种中领袖的地位——他们对此极为重视，在这一点上作让步似乎是明智的。鉴于空军部在民用和国防方面的任务都很重——例如，超音速运输机——它的问题是通过保留单独的部而解决的。为了方便彼此紧密配合，该部大臣和他的高级僚属将和国防大臣在同一座楼里办公。

执行这项革命性改革的必要议案是于11月提出的，由女王于

① 1962年7月11日。

② 《国防中心机构》，敕书第2097号(皇家文书局，1963年7月)。



1964年3月批准，并于同年4月1日开始生效。虽然我没有能够参预这项重大措施的最后阶段的工作，不过这事实上已经在1963年7月的议会辩论中获得解决了，我由于能够完成自己多年来孜孜从事的计划而感到十分满意。虽然在这以后才采取措施为国务大臣们提供合适的机构，不过大原则却已在1963年定下来了。不仅前线的指挥权，就连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研究、准备和计划工作，也将不再是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等个别军部的职责了；这些工作将改在国防部内进行，用白皮书的话来说，就是将在“国防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单一军种的基础”来组织这些工作。这个体制似乎能提供在中央实行权责一元化的好处，而一面又承认各个士兵在作战时的士气主要有赖于他们对自己的海军舰只、陆军部队和空军联队的忠诚。这样就保存了各个军种和部队的传统和战斗 421 荣誉；而对于各军种可能需要的设计现代化武器以及有效地制订各种大小作战计划的困难及其复杂性，也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有效工具。

## 第十三章 安全与丑闻

安全机关虽然是由适当的国务部门来掌管的，不过近年来却被视为现任首相专门负责的业务。因为连得他们最惊人的成就也必须加以保密，而他们偶尔失利几次就要被人家恶意地大加渲染，这个新办法一般说来证明是能够为其他大臣们所接受的。尽管我在这些年中对主管这些机关的官员极为敬重，不过我还是感到自己的任务是令人痛苦而灰心的。在处理其他不论是关于政策或是行政的事务时，人们总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去作出判断。然而在考虑冠以“安全”这个涉及面很广的字眼的一些复杂而又具有专门性的问题时，一个外行人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了。而且我对侦探小说涉猎也不广。所以我就单单致力于两个任务——第一，任命有经验而又正直的人去担任主要职务；第二，一丝不苟地执行根据每次受严重挫折后进行的各种专门性调查的结果所作出的建议。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令人痛苦的课题时，就明白了安全人员，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所遇到的特殊困难。1955年秋，我作为外交大臣，负责去处理两个外交部官员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案件，他们弃职逃往俄国。虽然事情发生于前一届政府期间，我还是不得不向下院透露经过情况。<sup>①</sup>我个人总不大相信此类逃亡者所带出去的情报有何真正价值，因为他们仅仅是政治官员，并无技术知识。我往往在想，到头来是谁大失所望——逃亡者还是引诱他们的人呢？不过我还是决心在以后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国机密。同时我也并不夸口说我们当时采取的措施就会杜绝此类事件

<sup>①</sup> 《时来运转》，原书第680—686页。

重演。对于任何证明会威胁个人自由的安全手续，我们必须权衡其利害得失，我们在当时也已经说过：“假如我们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却反而把它破坏掉，这就的确会成为一个悲剧。”这是、而且一定会一直是自由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幸而此后几年，我们并没有受到涉及安全的严重纠纷的折磨。直到1961年初，我才接到消息说，有这么一个企图取得关于新式潜艇的极度秘密的重要情报的危险阴谋。这通称为“波特兰案件”，牵涉的人有：据信是俄国人的“朗斯代尔”；波籍犹太人克罗格夫妇，他们原住美国而且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在水下武器局工作的两个英国人霍顿和吉。他们全都在1月7日被捕，当局于3月22日结束了对他们的审讯，并处以重刑。虽然我立即通知下院说，海军大臣卡林顿勋爵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去了解情况，不过公众对于一桩似乎无法解释的事极为关注。我幸而能够声明：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任何有关美国或是任何其他北约组织国家的情报已受到影响。盖茨克尔十分正确地要我注意1956年通过的安全法案。在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够不够？公众会不会反对我们的反间谍制度，而且甚至对“保密调查”制度失去信心呢？我承认我们可能有必要对称为“积极调查”——即对在敏感部门工作的人们所进行的特别严格审查办法——的那个办法再进行调查。于是内政大臣于3月29日宣布设立一个以查尔斯·罗默爵士为首的委员会，去调查经过情况，并且要特别去考虑现有办法中所暴露出来的缺陷。我自然对美国国会关于波特兰案件的批评意见感到关424切；但是美国总统却十分镇定，他接受了我们所作关于没有泄漏任何美国机密的保证。

当我们还在等待罗默委员会的报告时，却受到了又一个新打击。安全机关的一个雇员乔治·布莱克受到了审讯，并且发现他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当时还不可能，而且也不宜于公布详情。也

许可以从一个象大法官帕克这样仁慈的审判官对他所作的判决——徒刑四十二年——看出他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起初我认为，最好等罗默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后，再采取其他进一步的措施；不过盖茨克尔自然极力催促我们去进行更彻底的调查。我同他会面后，即于1962年5月4日向巴特勒发出如下的便简：

今晚见到了盖茨克尔。他原来打算带五个同事一起来——亚历山大勋爵、莫里森勋爵、戈登·沃克先生、欣韦尔先生和布朗先生。他已经答应把人数减为三个，不叫莫里森勋爵和戈登·沃克先生来了。……盖茨克尔还同我商妥，在第一次会谈后，他同我也许可以单独晤面去商量下一步的办法。……

我说我们这一边要请内政大臣、掌玺大臣和诺曼·布鲁克爵士参加。

过了几天，在一次全体大臣会议上，

我坚决声明：我认为（不论官员们怎么说）我们是免不了要去进行一些调查的。我们最终会从中得到好处。<sup>①</sup>

在这桩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盖茨克尔的做法始终是正确的而且能体谅人的。我对他的公正观点深为感激。可是报纸却不是那么有节制了。

报界闹得十分怕人，说话全无责任感。它们希望耸人听闻。此外，由于报界对我和政府都感到厌倦了……据说我们已经精疲力竭、年纪过大，实际上行将就木了。反之，城市地方选举却显出大大向右转的情况。我党赢得了利物浦、诺丁汉以及其他几个大城市。<sup>②</sup>

此刻我终于能够宣布，要对安全办法及手续再进行一次审查，并将向这个新的调查机构提供罗默委员会所调查到的资料。拉德克利夫勋爵同意去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这使我大为宽慰。

<sup>①</sup> 1961年5月8日。

<sup>②</sup> 1961年5月14日。



罗默委员会于6月13日提出的报告,揭示水下武器局的官员们有点缺乏“安全警惕性”,乔治·布朗就抓住这一点,追问应由哪一位大臣对此负责,他还应该受到什么惩处?幸而,尽管在议会质询期间制度出现过尴尬的时刻,不过到了7月1日,我感到下院开始对布朗死抓不放的态度有点厌倦了。“我们在议会中总算挨过了一触即发的一场大争吵,而且我还保住了海军大臣。”<sup>①</sup>接下去的一段期间是令人愉快的。一直等到1962年初,大臣们才终于有可能去考虑拉德克利夫勋爵所提出的全部至关重要的建议。

1962年1月26日,为处理安全事宜而任命的大臣委员会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去讨论应该怎么办。拉德克利夫所揭露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是令人震惊的,并且使我们卷入了一些困难而且微妙的问题中去。机关文职人员工会中有很多拿工资的工作人员是共产党人,为数之多令人不安。

情况糟透了,这和这许许多多体面文职官员们的真正看法是多么格格不入呀!这是电力工会事件的重演。<sup>②</sup>

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同盖茨克尔和他的同僚们去商量。接着就举行了相当麻烦的磋商。反对党领袖一直保持友好和蔼而且彬彬有礼的态度;可是他的尾巴(因为他活象苏格兰高地族长那样,一来总是带着一大批随从)包含着象乔治·布朗和伊曼纽尔·欣韦尔那样的好斗人物。接着事情耽搁了一下,因为我们也有必要同报界的负责人员商讨报告中关于所谓“D—注意制度”的部分内容。这份报告并没有隐瞒什么东西,如果予以全文发表,显然就会在国内外引起许多麻烦。不过大臣们还是批准了尽可能完整地发表报告书的计划。正如我向同僚们所说明的那样,这份报告虽然提出了我国安全措施中应该加强的几个方面,它并没有

① 1961年7月8日。

② 1962年1月26日。

说明整个制度有什么根本的缺陷。此外，它不仅揭示了间谍活动威胁的程度，而且令人信服地详细说明了，在自由社会中难以有效地去防止这种威胁的情况。所以发表这份报告会会有助于使公众更好地理解到整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拉德克利夫报告于1962年4月5日如期发表了。查明的主要事实如下：对安全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来自外国的谍报机关——俄国谍报机关不仅利用意识形态上的同情者，而且利用一切可以收买或者威胁的人；第二，来自一些颠覆性组织，这实际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1956年的枢密顾问官会议已经把重点放在甄别共产党人的工作上。拉德克利夫委员会认为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提防那些由于品德上的缺点或者其他原因（例如有亲属生活于铁幕背后）而特别容易受到俄国人的压力的人们。为了唤起所有在白厅的人们对这问题给予最大的注意以及对此事的责任感，该委员会肯定了由个别部门承担在最广义上的保密主要责任的做法。同时他们也更加精细地规定了安全机关本身的职责，并且还提出一些有所改进的联络方式。为了确保各部门以及派出单位的安全，他们就将予采取的措施和将予任用的人员两方面都提出了建议。他们使大家注意到了由于共产党人对机关工作人员协会和工会组织的大规模渗透所造成的问题，提出“任何部门有权不让其从事秘密工作的组织或人员同一个人被指名的工会工作人员接触或进行谈判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只要它有理由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共产党人”。委员会建议对各种保密分类办法重作估价，以防止把资料不必要地列入过于高度保密的类别，他们还要求把暂时需要保密的内容更有效地予以剔除，以便减少需要特别加以处理的资料的数量。为了避免错用间谍分子从事机密工作，委员会认为，一当有人被怀疑为共产党人时，就应该采取积极行动去弄清事实；此外，对于所有处于敏感工作岗位的人们，应该定期

进行品格审查——进行一劳永逸的“严格审查”办法是不够的。对于被指控为共产党人而又不能得到洗刷的人们，也提供了一条申诉的渠道；而且对于由于其他原因而得不到洗刷的人们，还应该给予更大的申诉权利。在上述任一情况中，只要当事人不是“工作无效率或是破坏公认的纪律标准”，行政机关有责任为他们寻找非敏感性工作。委员会还为下列各项提出了一些详细的建议：诸如，对派驻海外工作人员的挑选办法、对工业合同如何实行保密的办法、为保密而进行的教育和训练以及文件的具体安全保管办法，这包括关于如何防止产生非嫌疑工作人员有机会偷摄文件照片的情况的建议。委员会最后对“D—注意制度”进行了调查，并建议继续把它执行下去，不过其中有些细节还是需要重新商榷的。<sup>①</sup>

最为惊人的内容是这样一句明确的话：共产党人在机关工作人员协会和工会中的“渗透程度已比在工会运动的几乎任何其他方面都更严重”，这较之个别工作人员在压力之下不时出问题的情况更使公众震惊。然而那些协会和工会的官员虽然本身不是文职人员，不过他们在为会员服务时，可能觉察到微妙而秘密的活动。

报界对拉德克利夫报告反应不错，认为政府已经明智而且通情达理地处理了这桩事情。工党领袖密切配合我们去作出公布这份报告书的决定，并且还配合我们去贯彻以后采取的、特别是在工会范围内采取的某些措施，这被认为是明智而有远见的。我向下院提出这份报告书时，禁不住再次详细地叙述一个自由社会在抗御共产党国家冷酷无情而有效地操纵的庞大组织时的一些固有的困难。用委员会自己的话来说：“安全制度的缺陷……就是对人们希望加以捍卫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付出的部分代价”。

以“朗斯代尔”为首犯的所谓“波特兰案件”和布莱克案件对我国国防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虽然专家们向我保证，即使在第一桩

<sup>①</sup> 《公安法》，敕书第 1681 号（皇家文书局，1962 年 4 月）。



案件中，俄国人不大搞得明白的方法和技巧也并没有发生严重失密情况，可是我总是不安地感到，要末就是水下武器局派不了什么大用场，要末就是那里进行的工作重要非凡。不过由于技术和战术日新月异，我但愿这次失密不会对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产生真正的影响。布莱克案件差不多是罕见的，它使我们在某些地区的谍报体系受到了多年的损害。此外，布莱克的叛变使不少信任他的人被囚禁或死亡。但是就布莱克本人而言，他的情况似乎不是由于受恐吓或者受贿而屈服于敌人，却是由于真正改变政治信仰之故。在敌对的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中，一如在宗教斗争中，要追查一个由于某些道德上的缺陷或是由于财富的诱惑而屈服于压力以至失节的人是比较容易的。不过布莱克却声称，他并未屈服于具体压力或者物质利诱，而是“在朝鲜战争中被俘时就真正地皈依共产主义了”。由于有了因思想意识而产生的间谍，就使我们遇上了大约四百年以来不曾在我们这个岛国出现过的现象。但由于这些案件不具有很高的重要性而得到安慰——这种事情看来不大可能发生于把科学具体应用于武器制造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之中，而却更可能发生于不大明白真实情况的理想主义者的圈子中，在那里的男男女女可能是经不起人家奉承阿谀的，不过他们实际上却无法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429 我们开始迅速执行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一些建议，要是有关安全的整个事情就随着报告的发表而告一段落的话，那就一切太平了，我执政的余下期间就不至由于一片乌云而弄得黯然无光了。这片乌云一直威胁着我们，不过迄至此时还没有成为一场危险风暴的前奏罢了。可是以后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如意，一大堆麻烦的事使我担任首相的最后一年罩上了一层阴影，这些事情在开头是由于人们对于安全的某种真正担心而引起的，继之则迅速发展为牵涉面更广的丑闻，这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而且更普遍地被当作趣



事来谈。

1962年9月12日早晨,我正静静地坐在内阁办公室里,考虑一些重大的事务,其中包括自己将就共同市场问题向保守党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词初稿内容,我接到通知说,国防大臣桑尼克罗夫特和海军大臣卡林顿勋爵要求立即见到我。我明白大臣除非遇到极为麻烦的事,从未要求马上会见,所以我请诺曼·布鲁克爵士也参加一起商谈。他们告诉我的内容,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中,的确是令人极为难过的。在海军部担任行政工作的一个名叫J. W. C. 瓦萨尔的军官已经以间谍罪被捕,不久即将受审。

又发生了一起间谍案件——是在海军部发生的一桩十分糟糕的案子。一个从事行政工作的军官搞同性恋爱,上了俄国大使馆间谍的当,五、六年来一直把(具有各种不同价值的)资料泄漏出去。……又要发生一场大争吵了。<sup>①</sup>

即使我还算是有一些经验,我也无法充分估计即将对大臣们以及其他声誉很高的人们所发动的一些攻击的恶毒程度。不过这一点以后果然得到了证实。瓦萨尔罪有应得,他受到了审讯并于10月22日被判徒刑十八年。我根据诺曼·布鲁克以及其他人的建议,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在行政机关范围内来处理此事,而不必求助于外界法庭的庞大机器。我们毕竟还是可以依靠拉德克利夫体制来工作的。似乎最好是去进行一次初步调查,看看有什么地方不符合我们已经根据拉德克利夫勋爵的建议而加强和改进了的制度。<sup>430</sup>下一阶段也许可以用《年鉴》的话加以描述。

就在11月初,议会中爆发了一场关于海军部失密问题的激烈争吵。……首相(一面要应付古巴危机)决定由三个高级文官组成一个委员会,先进行非正式的审查,以处理瓦萨尔事件。他将根据他们的报告亲自采取行动,而不是对安全措施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在乔治·布朗先

<sup>①</sup> 1962年9月28日。

生的带头下，工党力言：鉴于海军部前几次失慎的情况，这完全是不够的。同时，在某些圈子里进行着一个咬耳朵运动，目的在于把瓦萨尔和海军部前文官大臣托马斯·加尔布雷思先生联系起来，他后来已经改任苏格兰事务部政务次官了。11月7日，以白皮书形式发表了加尔布雷思先生和瓦萨尔之间的来往信件，除了披露前海军部文官大臣对他的办公室地毯、陶器和纸夹子的兴趣之外，别无什么有损于他自己之处。充其量可以引起非议的，是加尔布雷思先生对于一个极力讨好、善于花言巧语的下属有点过于纵容了。<sup>①</sup>

这寥寥数语就描绘了即将开始证明是我和主要同僚们所感到极度痛苦而困难的局面。

瓦萨尔案件变得越来越棘手了。我担心上星期五国防大臣答辩的口气也未免过于象帕默斯顿<sup>②</sup>了——总之，是有点轻率。当有人提出，瓦萨尔住在道尔芬区是超出其经济能力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们大家都是人不敷出地住在所有的伦敦区的”——这说得很好。我感到其实应该责怪在莫斯科的大使和使馆办公室主任。人们应该以无法在伦敦办到的方式，去了解一个属员在莫斯科的私生活。这个人竟然能够在判刑之后写出回忆录，并且以巨价将其卖给报界，这似乎不可思议。<sup>③</sup>

431 此刻攻击的话变得愈益狂烈了。一个记者确实对一个保守党议员说过，加尔布雷思先生和瓦萨尔曾经密谋逃往俄国。此外，海军大臣卡林顿勋爵被指责在海军部中庇护叛徒，而且差不多被说成叛国了。至此，

我不得不承认……由文官委员会是不顶用了，并建议根据1921年的法案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拉德克利夫勋爵已经答应去担任主席——将同巴里法官先生和一位皇室法律顾问一起组成法庭。这个步骤执行起来颇不容易，我为准备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sup>④</sup>

① 《1962年年鉴》，第48页

② 帕默斯顿是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译者

③ 1962年11月5日。

④ 1962年11月15日。

正当这些事件爆发之际，我一面还忙于应付看来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局面，不仅由于经常同总统通电话而操心，还由于每晚不过睡一二小时而感到肉体上的疲劳。可是人类头脑的构造确也奇怪，这次可怕的危机似乎反而不象个人和人世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痛苦。

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为教人担心的时刻了——而且使人如此浪费精力。我想要是一开头就进行某种司法调查，那就要好一些了。要是我早知会产生这么多的流言蜚语，我就会这样做了。不过我们总不能每当捉到一个间谍就设立一个特别法庭呀！现在既然已经把网收拢了，或许还会发现一些其他案件。公众不认为抓到一个间谍是一次成功，而是把它看作一次失败。不幸人们却无法象猎场总管对付狐狸那样，把间谍埋掉，不让人家看到。莫里斯(麦克米伦)一直对我很有帮助，他熟知党内情绪。说也奇怪，我可能通过这一事件而获得好处，因为它有助于我在下院重新取得优势。<sup>①</sup>

整个事件中最令人不快之点也许就是有人建议对加尔布雷思采取一些不恰当的行动；我拒绝在事情弄清楚之前批准他的辞呈。拉德克利夫委员会以白皮书形式插进一份涉及加尔布雷思和瓦萨尔之间的往来信件的报告，为这个大臣彻底洗刷。当我回顾到这件事<sup>432</sup>时，至今认为在这阶段去接受加尔布雷思的辞呈是自己的一个错误。不过他辞意坚决，非等到调查得一清二白决不返任。他尤其希望能对诽谤他的人起诉。我是同情他的，不过我记得自己对他说过，虽则从我本人观点看来，我是希望他坚守岗位(那时他是苏格兰事务部次官)的，但是我也认为，他这样一辞职，至少会暂时改善其地位，以便进行反击并使他的敌人陷入窘境。

当我于9月14日提出动议要设立一个正式法庭时，公众似乎认为我这样改变自己的主张是有理由的。文官委员会原可处理涉

<sup>①</sup> 1962年11月15日。

及国内外机关内部组织的问题，不过此刻已经有人对处于高级职位的人员提出了性质极为严重的指控了。

必须通过对被指控者的罪行的揭露，或者通过公开方式证明：那些以公众保护人姿态出现的人们本身，不论是由于仇恨或私利，已经犯了试图破坏个人名誉的罪行，从而使公众恢复信心。这不是一个……委员会处理得了的事。这……只能由一个有传讯权、有权叫证人宣誓……的法庭加以审理，……如果证人说了假话，它还可以因他们作了伪誓进行追究。

我强烈地感到，不但要使真相大白，而且还要惩办散布假话的人。必须立即去制止一个刚刚萌芽的麦卡锡主义，这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会引起同报界的纠纷。盖茨克尔显然由于某些同僚的激烈和粗暴的态度感到痛苦，他在辩论时的确发表意见说，新闻记者们会拒绝透露自己据以发表诽谤性消息的来源或者所谓的来源。以后果然证明这是争论的焦点。法官的坚定态度使那些相信舰队街<sup>①</sup>具有一种神授权威、或者认为它是永远正确的人们大为恼火。在我们以后所遇到的一切麻烦中，报界只要一听到有人说可以就报上发表的内容追究其责任，还照样老羞成怒。我是从来也不理解这种态度的，可是不少有地位的编辑和记者却真诚地坚持这种立场。报界在要求对消息“来源”加以充分保护时，甚至要求享有教士的权利，不过这是一种错误的类比，因为忏悔者的秘密一般是不见于报端的。结果在1963年3月，有两名记者由于拒绝向法庭透露消息来源遭法官监禁，其中一人属于《每日纪要》，另一人属《每日邮报》。报界把他们捧为殉道者，而普通人则对此种说法甚感怀疑。

正当我们在等候瓦萨尔案件收尾之际，又有一些涉及“安全”的其他事件使公众感到有点不安。1962年12月，有一个中央情报

<sup>①</sup> 舰队街是伦敦各报馆集中之处，常用以指报界。——译者



部的高级官员由于向她的南斯拉夫籍情夫通情报而被判徒刑两年，她显然是在有点天真地想使他改变而适应西方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泄密的。我本人认为，这与其说是叛国，倒不如说是愚蠢行为。

次年初，一桩有名的、几乎是历史性的叛国案，有了一个离奇的新发展。

我们认为自己终于解开了谁向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通消息”之谜。他是一个当时很受怀疑的人，不过却对他提不出什么证据——是一个叫做菲尔比的人。他于1951年被组织解职，此后就一直住在中东，主要是住在黎巴嫩，他在那里为《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写稿。他一时酒醉，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一切全搞清楚了。……他现在已经是在贝鲁特失踪了，留下二千镑现金给他的妻子。他会不会在俄国出现，我们可不知道了。总之，这意味着更多的麻烦。<sup>①</sup>

3月29日，希思代表外交部宣布，菲尔比已在黎巴嫩失踪。7月1日，他明确声称，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肯定菲尔比就是向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通消息”的那个所谓“第三者”。据信此刻菲尔比已处于“铁幕的背后”了。这个声明引起了一阵质询，包括种种暗示和含沙射影的话。甚至有人风言风语地说，外交部那时正利用菲尔比在中东进行“秘密工作”。434

菲尔比案件很棘手，主要困难在于既要回答报界和公众所提出的问题，而又要不至于损害或甚至破坏秘密机关的工作。

我同哈罗德·威尔逊谈了一个小时，试图向他说明所谓安全机关究竟是怎样进行工作的，我感到我这样做是对头的，他也认为这样做很好。<sup>②</sup>

我也

---

① 1963年2月19日。

② 1963年7月11日。

同威尔逊先生和布朗先生畅谈了菲尔比案件。我想威是会“支持”我们的。<sup>①</sup>

这次接触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7月16日，人们提出了又一阵质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对安全机关的工作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当时我以下列措词作了一次呼吁：

我们从一个问题扯到另一个问题，而一个问题又再涉及另一个问题。去讨论这些问题对我们国家总的利益是危险而有害的。下院有一个十分悠久的传统，即把两党之间的关系交给现任的反对党领袖和现任首相去讨论。我现在要求下院再去恢复这个较老的传统，（议员们：“不行”）我认为这是符合我国真正利益的。否则我们就要去冒破坏对自己极为重要的机关的危险。

威尔逊先生庄重地响应了我的呼吁。他说：

这位可敬的先生是否明白我是能够证实他方才讲的话的？他在同我们举行的两次会议中，已经向我的可敬的朋友们和我本人十分详细而坦率地说明了这桩案子，它引起了一些争论问题，老实说，这些问题是无法在下院加以讨论的。虽则我们对原来处理此案的方式仍然感到某些严重焦灼的情绪，而且我认为最好是继续就此事同这位可敬的先生进行进一步的密商，不过我们感到，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事应该到此为止，不要再把它继续作为公开讨论和调查的题目了。

435

正当我被逼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对于反对党领袖所表现的礼貌和高度责任感，十分感谢。

拉德克利夫法庭关于瓦萨尔案件的报告发表后没有过几天，于4月12日发生了一桩与其说是危险的不如说是惹人恼火的事情。由裁减核军备运动以及百人委员会所扶植的一个左翼组织“争取和平谍报组织”竟能向奥尔德马斯顿“复活节进军者”散发复印的小册子，自称将指出为应付万一发生“紧急状态”而准备的一

---

<sup>①</sup> 1963年7月15日。

些地方政府的办公地点。

从实际看来，这事并不算太严重，不过这却是政府的又一次失密事件，报界——由于瓦萨尔案件而有余痛——赶紧抓住了攻击我和内政大臣的新机会。<sup>①</sup>

从而可见，由于事情特别凑巧或者由于出奇地层出不穷的厄运，在这个期间，议会和公众都不断受到刺激，以至于几乎产生了一种歇斯底里情绪。而且责备我们的人也不把失败和成功区分开来。我认为，要是反间谍工作不起什么作用的话，我们的日子确实可能好过些。不过在瓦萨尔案中，政府在一些真正严重的问题上的做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拉德克利夫勋爵于4月初把他的报告草稿给我看，我从他本人听到他认为安全制度并无大缺陷而大为高兴，虽然作一二处小的修改补充是必要的。拉德克利夫勋爵和他的同事们在主要问题上是不含糊而坚决的；横遭诽谤的卡林顿勋爵被彻底平反了。加尔布雷思也同样地被证明同瓦萨尔的间谍活动或者同性恋行为毫无牵连。这样，涉及两位大臣的大量谣言和重重疑云就被一个人一扫而空了，而此人对于这些事情的<sup>436</sup>意见是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的。他还受到了法庭其他成员们的支持。所以我感到自己有充分理由把这次彻底的平反看作对那些如此轻率地提出这些恶毒的诽谤而且如此无情地坚持这样做的人们的一种谴责。威尔逊作为反对党领袖，很注意去约束他的颇为多嘴的或许还是不甚谨慎的同僚们。在这整个痛苦的过程中，反对党领袖对于任何指望有朝一日能主持英国政府的人所负的重责，的确似乎是很明了的。

即使政府在瓦萨尔案件中取得了彻底胜利，不过法官坚决拒绝承认报界决不会犯错误这一条，虽则从一个观点看来是令人满意的，可是从另一个观点看来却无疑是有其危险性的。这使舰队

<sup>①</sup> 1963年4月16日。

街上上下下的人都大为恼怒，并且使各报亟欲寻找和利用任何可以反攻的机会。在此同时，我于5月3日满意地任命加尔布雷思为运输大臣的政务官。

不幸又有一阵令人痛苦而具破坏性的谣言开始流传了。虽然这次谣传的事在表面上涉及国家安全，其实是一个丑闻。这是一段离奇甚至是十分奇异的插曲的开端，若干年以后，我几乎仍无法把它说清楚。我不打算细讲“普罗富莫案件”以使读者感到厌倦。人们已经写了而且发表了不少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报道文章。我现在只要把这一连串可悲的事情扼要地加以叙述以便说明那个更为离奇的余波就可以了，这个余波便是对几乎全体大臣的忠诚和品德的一次总攻击，其粗暴程度以及其毫无掩饰地捏造事实的情况，是泰特斯·奥茨<sup>①</sup>时代以后所没有过的。

1963年2月4日，我对意大利作正式访问后回国之时，我的私人办公室通知我说，当我不在的时候，有一家报馆向我们报告了一个“情况”，它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但还不是阁员的大臣，即当时的陆军部国务大臣杰克·普罗富莫，他似乎曾同一个名声不好的女子用警察的用语说“勾搭”而受到连累。他是在克莱夫登所举行的一次有点下流的晚会上遇上她的，而她则是由一个名叫沃德先生的人带到那里去的。她已经或者正准备把事情经过出卖给报界。这事涉及安全问题，或者有人正打算使它具有这种性质。因为据说上述这位女士还垂青于一个名叫伊凡诺夫的俄国海军武官。我的私人秘书蒂姆·布莱已在我出国期间把这消息转给保安机关，大家同意去问普罗富莫这消息是否确实。于是布莱就同总督导员去见普罗富莫。他承认在1961年曾经结识上这个名叫克里斯廷·基勒小姐，而且也知道她同报馆联系的事。但是他否认人家对他毫

---

<sup>①</sup> 泰特斯·奥茨是十七世纪的英国人。他捏造天主教徒阴谋叛乱的罪名，使大批人被判刑。——译者



无根据的指责,并且说自己按照律师的建议正等待机会,只要报上发表了什么可以据以发出传票的内容,就提出诉讼,以便把这些无稽之谈统统驳掉。至于安全问题,普罗富莫解释说,他已于1961年接到警告,要他尽量不同斯蒂芬·沃德会面,因为这牵涉到安全问题,他已经注意到这个劝告了。我对于他的这些保证感到满意。毫无疑问,普罗富莫曾经常出入于一些圈子,在我年轻时,这些场所可能被认为是不宜于一位大臣涉足的。但是时代不同了,虽则我本人对于这种新的交际圈子所知不多,不过我认识到过去普遍遵守的那些界限已经不复被人们所承认了。现在体面的和声名狼藉的人们似乎都混在一起了。

3月14日,法庭上提到了上述女士的名字。在审讯一个被控要谋杀她的西印度人时,她曾作为公诉的证人被法庭所传讯,不过却没有出庭。鉴于起诉的内容,警方自然认为她是帮助他们去达成判决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此类丑事引以为乐的那些伦敦大众就开始窃窃私议她失踪的事,认为这证明她已被有势力的保护人掳走了。这个故事的“桃色”部分特别吸引人。

一个大臣(为了一个女人)遭到麻烦。我今天不得不为这桩无聊的事花了大量时间。这个人就是杰克·普罗富莫——陆军部国务大臣。如果仅是一桩关于品德的事就不是那么要紧了。可是这伙放荡而声名狼藉的人是以阿斯特(比尔·阿斯特)勋爵为核心的,而且经常和他们鬼混者之中不幸就有俄国的海军武官!这便是新的克莱夫登<sup>①</sup>一伙!……我必须决定怎么办。……这一切都是很有损于党和政府的名声的。<sup>②</sup>

我还没有忘掉加尔布雷思那桩事,他横遭流言蜚语的攻击,我感到自己曾经听任他受到一些不白之冤。我决心不让此事重演。

没有过几天,此事变得同处理瓦萨尔案件的法庭工作纠缠起

<sup>①</sup> 克莱夫登是比尔·阿斯特一座华丽的别墅。——译者

<sup>②</sup> 1963年3月15日。

来了。此时受那次审查牵连的两名记者已经被监禁了。

报界继续对政府十分仇恨。这主要由于瓦萨尔案件。由于成立了法庭以及由于担心拉德克利夫勋爵会说出什么之故。两名记者由于拒绝向法庭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因而以藐视法庭之罪被监禁，……报界（或许其大部分）都把这两人当作殉道者来看待（只有《卫报》可敬地加以抵制，《泰晤士报》也作了某些抵制）。同时，畅销的报纸变得越来越糊涂、肮脏而且下流了。《卫报》今天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来讽刺《镜报》。（新闻自由便是有自由去贿赂一个“女佣”诬蔑她的雇主。）<sup>①</sup>

3月21日，当下院就两名记者因藐视法庭而遭监禁一节进行辩论之际，一个工党议员乔治·威格这时开始以非官方的道德维护者和国家安全保护者自居，坚定地提出指责，他力言由于报界的嘴已经被瓦萨尔案的法庭封住了，所以自己有责任这样做。他宣称，涉及一个政府成员的一些谣言正在到处传播，这个人应该要末就承认、要末就否认针对自己的指责。在进行这一段辩论时我没有在场。威格是在讨论统一基金法案时发表讲话的，根据我们的规则，对此可以提出任何质询而毋需事前通知。这时我已经离开下院了。

439 在辩论中提出此事的议员们其实帮了普罗富莫的忙。昨天半夜举行了会议，今天一清早就要我于下院召开会议后（上午十一时）去批准一项“个人”声明。我同总检察长以及总督导员一起看了声明内容后，即前往下院去支持普罗富莫。他的声明毫不含糊而且相当令人信服。他原来已在克莱夫登见到过沃德，而且还到过沃德的住所，那个女子也住在那里。他（和他的妻子）同这两个人都有过交情，不过自从1961年底以来，他实际上就没有见过这个女子。普罗富莫行为愚蠢，有失于检点，不过还不算道德败坏。他的妻子（凡拉莉·霍布森）为人很不错，而且明白事理。当然，所有这些都涉足于放荡、逢场作戏、浪漫的圈子，在那里的人大家彼此都不太了解，不过彼此却都十分“亲密”。但是普罗富莫

---

<sup>①</sup> 1963年3月20日。

似乎不明白,我们——从事公务的人——有必要遵守那些不同于目下在许多圈子里通行的准则。<sup>①</sup>

普罗富莫的声明要比我日记所记下的更为明确。他自1961年12月以后就没有见到过基勒小姐;他是在1961年7月首次遇到她的,从这时起直到1961年12月之间,他见到过她五六次;至于她没有出席老贝莱<sup>②</sup>的审讯,这同他毫无牵涉;他们彼此之间并无不道德的行为,假如在下院以外有人提出此等说法,他就要为这种诽谤和诬蔑著文申斥。在我看来,这项明白的声明已经把问题解决掉了。

唯一的新情况是,威尔逊肯定是在威格的怂恿下来找我,把沃德于1962年11月写给他的信给我看;沃德在信中承认或者宣称自己就是古巴危机时把一封俄国人写的信交给外交部的中间人。这事并没有什么不妥或是危及安全之处。所以我不予注意。各大使馆有时使用非正统的方法也是常见之事。

普罗富莫对《巴黎-竞赛》和意大利的《时报》及其在伦敦的发行所立即分别提出了控告,这就大大增强了我对他的信任。在第一桩案子中,被告立即收回自己的话;在第二桩案子中,被告付出了讼费和损害费。即使我怀疑到普罗富莫不老实,我也很难相信他会既欺骗了下院又在法庭上作了伪誓。

4月9日,威尔逊给我送来由威格编写的一份备忘录,虽然他 440 是根据有关沃德以及他的朋友们的社交生活的相当凌乱的叙述写成的,但是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人们对普罗富莫在两年以前和这种人混在一起的愚蠢做法有何意见,但他却不存在危及安全的问题。这样一天又一天过下去,我一面忙于更远为重要的问题,一面相信我们再也不会听到这个插曲了。甚至当沃德走访

① 1963年3月22日。

② 老贝莱是伦敦中央刑事法庭。——译者

我的一个私人秘书而且声称普罗富莫没有向下院说真话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足以引起惊惶的严重事故，当时沃德明白，警察正怀疑他是一个淫事的媒介，正在调查他的品行。他的目的显然在于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制止警察去调查他的罪恶生活。我于5月14日告诉威尔逊说，由威格提供的“材料”已经研究，但是除了已采取的行动之外，似乎没有必要去采取特别措施。5月24日，威尔逊寄来一封信，内附沃德所写的长篇材料，他在文中力言普罗富莫对议会的声明不真实。我后来见到威尔逊时就告诉他说，我要再把这事调查一下。不过我感到，不论是在安全问题上或者在任何其他涉及的问题上，沃德似乎更急于要开脱自己而不是要帮助我们。在这整个期间，反对党领袖的行动一直是十分得体的，而且当普罗富莫案件真相大白并且随即公布之时，他首先就声明这并不涉及安全问题。有损于政府的关于个人品德的丑闻自然是可能受到一切反对党的欢迎的，但他并没有参加即将掀起的一阵狂暴的诽谤。

5月29日，安全机关领导人来见我，他告诉我，据基勒小姐说，沃德曾经要求她从普罗富莫那里弄到一些关于原子秘密的情报。不过她否认自己曾经照办。这项证据过于无力，不足凭之以对沃德提出的公诉。这的确象是一则笑话，因为普罗富莫手中并无“原子秘密”的情报，沃德是否真的是个“特务”也值得怀疑。警察确信沃德并不是一个间谍——他名声很坏，也许是一个拉皮条的人，他的作风过于公开而马虎，不可能当一名特务。但是我并不  
441 感到这些新情况可以完全予以忽视，所以请大法官继续进行调查，并且把我的这一行动告知威尔逊，他是一直对我施加压力的。

于是我和多罗西到苏格兰去作一次小休。

我把职务交巴特勒代理一星期(除了出国作较长时间访问之外，我担任首相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我只将过问最小量的电报和文件。



这是一次真正的休息。<sup>①</sup>

可惜短短几天的休息不久就横遭干扰。

当我在奥本时，接到电话说，普罗富莫已经承认自己对我、对下院、对法庭都说了假话。虽然我们还是设法去度完我们在苏格兰的假期，并且照原计划前往约安那和格兰尼格尔斯，但是自我回来之日起直到现在（此刻已略为缓和一点了），一直都发生着严重的、有时还是险恶的危机，它似乎可能使政府垮台并迫使我辞职。

我真不知道有比这更折磨人的，即使苏伊士事件也还是“干净的”——它只是涉及战争和政治的事。这桩事却是“臭不可闻”。<sup>②</sup>

事情经过很简单。6月4日，普罗富莫突然“把真情全部招供出来”。他无疑由于做贼心虚，精神负担不了，向总督导员和布莱坦白，说基勒小姐曾经是他的情妇，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对下院说真话。

这是不可原谅的。毫无疑问，普罗富莫是存心并且是在朋友们和同僚们对他提出慎重警告之后，对下院和法庭撒谎的。我次日就接受了他的辞呈，由于议会正在休会，我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赶回伦敦。

在我回来之前，已经有了某些新变化。又有一个西印度人由于袭击了基勒小姐在老贝莱受审。更重要的是，沃德于6月8日被捕了，并且被控依靠妇女的不道德收入为生。6月9日，《世界新闻》<sup>442</sup>胜过了所有的竞争者，开始连续刊登基勒小姐的艳史。据说这家报馆为这一文学瑰宝花了二万三千镑。

我于6月10日返回伦敦。议会将于16日召开，不过议员们却已经到达伦敦。此刻有关普罗富莫传说的点点滴滴都只不过是从“沃德案件”（它可说是一种斯塔维斯基案件）派生出来的而已，它被兴高彩烈的

---

① 1963年5月31日。

② 1963年7月7日。

报界利用来攻击政府，为自己在瓦萨尔案件中吃了亏而雪恨。《泰晤士报》态度很怕人——从此以后被称为“比你更圣洁”的态度，的确令人作呕。“大众化”的报纸满篇这种间谍和妓女生活史，肯定是在办公室里杜撰的。日复一日，报上的攻击愈演愈烈，主要是针对我——说我老了、不中用了、可以休息了。<sup>①</sup>

在这段困难时期，还是有一些愉快的事，其中有这么一桩特别值得回忆的事。肖克罗斯勋爵叫人送来如下的一封信：

我不能不告诉你，我对于你不幸碰上了这桩倒霉的事是多么同情。但愿我能对你有所帮助。政治的进程竟会受到如此不相干的事情的影响，的确使人感到害怕，它竟使个人遭受不幸。

内阁自始至终坚定不移；不过我们自然还得去应付混乱而激动的下院。

（6月17日）在辩论时，我遇上了极为困难和吃力的事情，我得把整个事情经过说清楚——从2月1日（普罗富莫否认、而且继续否认自己同沃德和基勒小姐除了有极其肤浅的交情外，并没有什么深交）直到他坦白为止。我得去为警察、为保安机关、为行政机关以及为自己辩护。同时，议会党团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人们是不时要这样发作一番的。结果，有二十七名保守党人“弃权”——这就是说，弃权者不限于通常对我们心怀不满的那些人。……而且还包括不少激于义愤的可敬的人们。使6月17日的辩论格外（教我感到）吃力的是前一个星期的活动，在那个星期中，预定的一般性（令人疲乏的）活动特别多，例如到苏塞克斯大学接受学位，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来访问，以及随之而举行的一些通常的宴会、招待会等等。在这整个期间，大家普遍认为政府马上就要垮了。<sup>②</sup>

443

6月17日，当需要说明情况时，我当然得带头发言。

我着手去证明三点：第一，我过去的做法是正当的；第二，我过去的

---

① 1963年7月7日。

② 1963年7月10日。

行动是公正的；第三，我行事是相当慎重的。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前两点已被整个下院乃至报界所接受了。<sup>①</sup>

辩论之后，大家普遍认为，至少在缩小对我责难的范围这一点上，我已经取得了成功。上述最后一点还没有得到肯定。我对普罗富莫的话不予置疑照单全收，是否算得明智？我感到即使在此点上，那些超然地认为事情已经过去的人也会接受我的论点。我们的政治生活是以议会中、党内特别是政府内部的完全彼此信任为基础的，象普罗富莫“以人格担保”的那种正式声明是被认为有绝对约束力的。对涉及个人的事尤其是如此。毫无疑问，在不论大小问题上，某种程度的闪烁其词是可以原谅的——丘吉尔所谓“用词不当”是常有之事。但是这些只是指具有不肯定而混乱的内容、象羊毛那样乱蓬蓬、象磨损的衣边那样不整齐的各种政治论点。至于对单一问题作正面声明之时，对议会撒谎是不可宥恕的，而且从来也不会受到原谅。那么我们去接受这种声明难道还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吗？

这个危机接着进入了第二个星期，它大体上是从6月17日辩论结束那天算起，直到6月22日为止，当天我宣布政府决定以丹宁勋爵为首，对以种种道德败坏的罪名加于所有人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流言蜚语，进行一次司法性的调查。

除了普罗富莫—沃德丑闻之外，到处还充满了一种泰特斯·奥茨事件的气氛，最受人尊敬的大臣们也受到了极度荒谬的谣言和影射的话的攻击。部分由于“召唤女郎”的恐吓性声明；部分由于报纸所编写或者人们向报纸所提供的故事；（我确信）还有一部分是由于苏联特务利用了这个情况，共有半数以上的阁员被指责为腐化堕落、搞同性恋等等。本 444  
周末，我在布朗利发表演讲，我说我要“既不慌张又不固执地采取行动”，我要采取最有利于国家和本党的行动。据认为，这话意味着（正如我打算使它意味着那样），我要继续干下去。<sup>②</sup>

①② 1963年7月7日。

于是我于6月21日正式宣布任命丹宁勋爵去担任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不愉快的工作，他纯然出于爱国才接受下来。这至少使谴责和谣言的浪潮受到了一些制约。同日，所有大臣都接到了具有下列内容的备忘录：

你将从我今天在下院的声明中获悉：丹宁勋爵正在进行一次司法性的调查，以了解引起普罗富莫先生辞职的有关安全方面的一些情况，他还受命去调查他可能接到的关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资料的任何情报。

正如我在声明中所说的那样，许多有损于大臣们以及从事政治生活的人们的流言蜚语正在到处传播。假如这些谣言确有根据的话，那就可能说明有关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危及安全的。

把这一大堆含沙射影的流言扫清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认为政府所有成员都应该把这类谣言报告有关方面。应该尽速以备忘录形式向内政大臣提出报告，要指出听到谣言的时间和日期以及是从谁哪里听到的，要指出谣言的性质和内容，而且要指出据说它首先是由谁传出来的。内政大臣将采取必要行动，把这些资料提交丹宁勋爵。

如果大臣们听到涉及自己的诽谤性谣言，应即同自己的法律顾问一起研究是否需要提出申诉（在不少情况下，这样做可能是很正确的），不过为了肯定大臣们在任何此类情况下都会采取一致行动，假如你在对某一具体情况作出决定之前和总检察长商量一下，我将表示感激。

445

兹附上新闻指南一份，大臣们可在考虑如何对付一种出版物时，加以使用。他们应该把涉及自己的、而且其涉及方面是自己准备对之提出诉讼的出版物的样本送交首相（并且还要表示在适当时候同意提交丹宁勋爵去处理）和总检察长。

我认为也应当向女王陛下作情况汇报，我于6月23日将情况写在如下的信中：

虽然我将于下星期四荣幸地觐见陛下，不过我急于向陛下表达自己对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所深深感到的遗憾，所以不愿多所耽搁。……



回顾到这一切可悲的事件时，我就象一个人往往是事后诸葛亮那样，看出了在一些当口上，原是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措施并且也许从而就可以避免掉这么多的麻烦。不过我总感到我们的行动应当公正而明智，也许在人们对卡林顿勋爵和加尔布雷思先生进行了不公正的攻击后，我对上述考虑可能是过于重视了。而且我对于奇异的下等社会确是一无所知的。除了普罗富莫先生之外，不幸还有其他的人也陷进去了。我们不大明白沃德博士起过什么具体作用。但是我却开始怀疑，所有这些指向许多人的、包括大臣们和其他人在内的荒谬诽谤，在性质上有几分象是一个旨在破坏现有社会制度的阴谋。今天《星期日镜报》所刊登的全部内容与其说是针对我，不如说是针对可怜的诺曼·布鲁克勋爵以及行政机关，这是很有趣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教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是可以克服的；我也坚信，在我认为是漫长而成功的统治过程中陛下回顾这些事情时，就会感到，它们只不过是过去经常使陛下的先王们感到关注的一些惹人恼怒的事情而已。使我一想到便感到痛苦的是，不论我采取什么行动，都可能给你增添了麻烦。

从6月24日起进入了危机的第三周，在此期间

446

开始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应。我接到大量电报、信件等，（据说）其数量之多是唐宁街十号的历史中所不曾有过的。这些信件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他们之中有的和我有过一些瓜葛（例如在卢斯的一个排长）、有的仅由于我的名声而知道我。在路上的工人们喊道：“忍耐住，麦克！”……本星期三我得上新学院去为一幢新建筑主持开幕式。……次日是牛津大学校庆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常见的预定活动——从林肯学院到谢尔登尼亚学院的游行；谢尔登尼亚学院的典礼仪式；万灵节；巴里奥学院举行的园游会；基督教堂学院的宴会。各种各样的人在每一阶段，以不同的方式，特意向我表示他们的同情，这是很令人感奋的。<sup>①</sup>

本周末在沃尔弗汉普顿举行了一次大会，由六十个密得兰选区的将近三千名代表参加。

---

<sup>①</sup> 1963年7月7日。

这是一次极其不寻常的表示忠诚和爱戴的方式。我也作了广播演说。……从事反对我的议员们颇感意外。在这整个星期中，选民一直对不忠的议员作出反应，并且对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这段危机的第三周就这样结束了。<sup>①</sup>

同时这个不幸的人物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惩罚了，这些混乱和愤怒的浪潮就是围绕着他而汹涌的。他不但被迫辞去政府职务，而且还不得不放弃掉枢密院成员的资格，并让出在议会的席位。这样，他由于做了丢脸的事而且不诚实而受到重罚。不过他已经开始通过从事为他人谋福利的社会工作以改过自新，这样到后来不但恢复了自尊心，而且还博得了他人的尊敬，我应当对他的勇敢做法加以表扬。

同时，丹宁勋爵已经老练而迅速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8月16日，为了弄清某些疑点，我向他提供了自己的证据。

447

他乘这个机会提出了自己在完成报告书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我提出建议说，他不妨同(作为司法部门领导人的)大法官商量。我感到我可以(绝对真诚地)说，自己不曾与闻他的工作，而且(除了提供自己的证据之外)也不曾同丹宁勋爵讨论过报告的内容。他也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sup>②</sup>

9月10日，我同包括大法官、巴特勒、麦克劳德和总检察长在内的几位大臣，就如何公布丹宁报告书一事进行了商讨，我们即将于几天内收到这份报告书。存在的困难都是属于技术性的，但却相当麻烦。

我必须将报告提交安全委员会(以便把涉及安全的内容加以删节)。(鉴于基勒小姐由于作伪誓受审)我必须同我的法律顾问们进行讨论(以便把可以作为“藐视法庭”的罪名的内容删掉)。我必须就这两点同威尔

---

① 1963年7月7日。

② 1963年8月16日。

逊商量。文件付印需要十天工夫,还有“特权”的问题,(要是反对党同意的话)可以通过召集上院来做到这一点。不过他们也许不会同意。由于两党正召开党代表大会,所以下院不能参加。由于议会休会,所以在议会于10月24日开会之前,可能无法取得必要的议会豁免权。<sup>①</sup>

9月17日,我接到了报告书。

针对各个大臣的一切诽谤性“谣言”,全都被否定了。报告所述及的事情经过的其余部分,和我告知下院的内容完全一致。<sup>②</sup>

只有一段话可能引起一些忧虑。丹宁勋爵也许是正确地认为,普罗富莫的同僚们由于轻信受骗,可能要负一点责任。不过我对此并不过分关注——这是老生常谈。由于丹宁勋爵如此慷慨地帮助了我,我自然向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彼得·罗林森爵士对普罗富莫在下院所作的声明特别关注, 448  
他大方地提出辞呈,不过我却很不愿意接受。我感到,即使我们在处理这一困难问题上有错误,我们也必须大家共同负责。无论如何应由我来负主要的责任。

当内阁于9月19日召开会议时,大臣们自然感到宽慰;虽然,针对这些到处流传的荒谬谣言的彻底而最终的回答,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关于“特权”的尴尬问题却引起了不少关注。这个问题简单地产生于下列情况:鉴于基勒小姐正在受审,而且由于议会已经休会,所以报纸可能因为政府无法宣称有“特权”而不愿意全文刊登报告内容。其次,报告中可能偶然有些话会影响对基勒小姐以及其他人的公平审理。关于发表丹宁报告书的问题

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特别是关于)“特权”的问题——绝对的还是有限制的“特权”——有否必要召集国会的一院或同时召集两院——这种做法的缺点乃至其危险性何在——是否采取最下策,即等到10

---

① 1963年9月10日。

② 1963年9月17日。

月24日再公布报告书。稍过一些时,就产生了“管它,公布拉倒”的念头。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对所有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呢?说到底,翻印报告内容的报纸以及其他刊物也只不过取得“有限制的特权”罢了。(除非能够证明它们“怀有恶意”,它们是很安全的,而且一家报纸单单把一份钦定的政府文件加以翻印,显然不能证明它是“怀有恶意”的。)那么,谁会从“绝对特权”得到好处而且会得到什么好处呢?首相和文书局会得到好处(据信丹宁勋爵无论如何是有“绝对特权”的)。所得的好处又是什么呢?嗯,就“绝对特权”而言,甚至连申诉书也不能公布,甚至也不能要求法院发出单方面的命令书。就“有限制的特权”而言,可以进行申诉,并可以利用申诉来拖延时间,甚至可以阻止报纸继续刊登,不过法院会不会支持却是很值怀疑的。

这样,要是我愿意的话,就由我来决定“不管怎样,公布拉倒”了。<sup>①</sup>

有一二点内容由于安全的理由应稍加删节;不过关于会不会影响到对基勒小姐进行公正审讯的问题,

449 这天稍晚时候,司法官员写了一份书面意见,说报告中涉及基勒小姐的内容,其实没有一点不是已经由她本人或由涉及她的文章公布过的。<sup>②</sup>

威尔逊于午后来找我。

我告诉他……基于安全的原因而作的一些仅有的删节,这些删节看来毕竟还是合适的。我把基勒小姐的情况向他作了说明。我们就此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不过他说他要让我来作主,并且要公开支持我的任何决定。接着谈到公布报告书的事。我对特权一节作了说明,并且说我意欲一俟可以付印即予以公布。他似乎很吃惊,而且说,“也不召集议会以取得绝对特权吗?”我说(由于我们两党正举行大会)我认为几乎无法召集下院开会。召集上院将会有困难,我满脸带笑地说着。<sup>③</sup>

同日稍晚,和个别大臣商量后,

我决定公布全文……并且要尽速公布。至于召集议会则是完全不

---

①②③ 1963年9月19日。



可能了。①

这天稍晚时候，反对党领袖向报界宣布，要求召集议会，他的确有权利这样做。不过他却不曾向我送来任何正式申请，于是我们决定让大家知道，

假如他们送来正式申请书，我们就要加以拒绝。这样召集议会是没有过先例的。我认为工党对事态的发展感到狼狈。②

这天的其余时间是用于研究范围更广但却并不更富于爆炸性的核力量问题。

当报告书于9月26日公布时，它证明是对整个夏季中大发作的一阵诽谤和辱骂运动的势不可挡的回答。报界忘记了切斯特菲尔德勋爵③的格言：“在丑闻事件中一如在抢劫案中一样，收受赃物者罪同盗贼”，他们

由于丹宁报告书中没有什么丑闻而大感失望，所以全都把矛头指向我，这原是可以想得到的。各报社论的措词要比新闻版来得温和。④

不过，不久形势就根本改观了。

450

我认为我们在普罗富莫案件上进行了出色的反攻。黑尔什姆和麦克劳德在电视中作了卓越的讲话。据说我的无线电广播演说也很不错。肖克罗斯勋爵说的话十分有力——他是一位对我们非常友好的中立派！⑤

对一些绝对正直的头面人物捏造一大堆使人难过的指责而几乎把公众激动到恐慌的程度，当我回想到这一离奇的插曲时，很难解释其原因和动机。在我国自己的历史以及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当然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不过一般都有某种较为有力的根据。

---

①② 1963年9月19日。

③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是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兼作家。——译者

④⑤ 1963年9月26日。

回想起来，原因似乎在于两方面。一系列不幸的有关失密的审讯已经使公众对安全机关工作的信心产生动摇，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虽则某些案件是由于总的制度上的缺陷而产生的，但正是由于我国保卫力量的高度警惕性和技巧才终于把罪犯们置之于法。我们反间谍工作越是成功，我们对付外国特务的罗网收得越紧，公之于世的案件自然就越多。可是人们并不认为这是胜利，却视之为失败。而且也无人充分认识到，由于人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援引法律所提供的种种保护以利于被告而给反间谍工作带来的巨大困难。谁要是了解这种敌我两方斗智的详细情况以及我国忠心耿耿的人员在工作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就会明白这个问题；可是一般公众却不知道，而且也不能向他们说明这个情况。其次，事实——正确地——证明，一个主要大臣闻所未闻地出了丑、丢了官，乃是一桩使大众极为震惊的事。一位大臣可能被发觉无能，这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一位大臣竟然欺骗自己的领导、同僚以及同辈，却是对整个国家的一种伤害。

充满着淫秽内容的斯蒂芬·沃德案件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被渲染为一桩著名的讼案，它还揭示了这个新的自由时代的奇怪社会的特征。有点地位的人、有时甚至地位很高的人竟会受到引诱，同  
451 骗子、吹牛者、淫媒和高等妓女们混在一起，我得承认，当自己听到这种怪现象时，也同普通人一样感到惊讶。在我青年时代，由于彬彬的礼仪，而不一定由于良好的品德，使大家无法这样混在一起，上流社会和花柳界是截然分开的。可是目前却似乎有一种新的风气流行于一小撮声名狼藉的人们中间。所以我对某些人——他们对伦敦现代生活中被揭露出来的某些颇为猥亵的腐化堕落的情况而感到耻辱——是同情的。我甚至可以理解到《泰晤士报》编辑的激动情绪（虽然我认为他也发作得过于厉害了），他也同我一样地出身于体面的中上阶层家庭，在那里，这种事情不仅是令人厌恶

的，而且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不赞成这种做法是一回事；但是把这一事件变成一场放肆的运动，它破坏而不是维护一切现有政府的声誉，又由于它做得太过头，这就变得可笑了。

受到这些揭露的事实连累的人们中，也许有的由于老的社会关系明显地削弱而感到有点羞愧。他们需要一个牺牲品来抚慰被激怒的众神，这些神即使不是道德的守护神，至少也是传统的守护神。为此，除了一个年老而体面的保守党首相之外，还有什么更现成的牺牲品呢？麦考利的散文集中有一段话出色地描绘了英国人生活中偶然爆发的情绪激动情况：

象英国公众在每次周期性道德狂大发作中所表现的那种可笑情况是闻所未闻的。一般说来，私奔也好，离婚也好，家庭纠纷也好，都不大受人注意。我们从报上看到了丑闻经过后，谈论了一天，就把它忘掉了。不过每隔六七年，我们的德性变得荒谬绝伦了。我们不能再容忍宗教和正当行为的准则受到破坏了。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罪恶勾当了。我们一定要对浪子们进行教育，要让他们明白，英国人是重视家庭关系的。于是某一个倒霉的人便被挑选出来，以作为赎罪的牺牲品，他实际上并不比其他数以百计得到宽恕的人更为腐化堕落。……他其实是一个替罪羊，据信，通过他代人受难，就可以使一切其他犯有同类罪行者都受到充分惩罚。我们满意地想到自己的严厉做法，而且极其骄傲地把在英国确立的高度道德标准同巴黎的松松垮垮的作风相比。我们的怒气终于发够了。我们的牺牲者已经被毁掉而且心碎了。我们的德性又可以安静地再去睡上七年大觉。<sup>①</sup>

整个这桩事件当然是对我的一次大考验。我明白自己在处理它的某些方面所犯的错误，我自己本来应该对普罗富莫逼迫得更紧一些，而不是把这事让他的同辈和同僚来处理。当第一阵指责象河水泛滥般在政府脚下开始上涨时，我本来应该采取更为强硬

<sup>①</sup> 麦考利勋爵，《批判性历史论文集》中的《穆尔著的拜伦勋爵传》（伦敦，1851年版），第206页。

的立场。但是，我可以声称，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都托付给一位法官的这种做法的确是冒了一些风险的，这证明我们对自己的品德怀有信心。这个做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即便它使我的体力受到了损害，同时或许也是造成我后来患病的原因之一，我却能骄傲地回顾各方面向我表示的忠诚和爱戴。尤其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困难情况中，假使不是我的妻子每天经常的爱护和支持，我可能已经受不住愁闷和忧思了。她安祥沉着，总是在艰难的时期使我产生信心。



## 第十四章 在莫斯科的突破

古巴危机在 1962 年 11 月 4 日告一段落，不过还存在一些复杂的细节有待解决，华盛顿还有必要就此对莫斯科施加相当的压力。同时，我开始考虑到赫鲁晓夫惊人行动失败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在克里姆林宫中并无绝对的权力，他的权力会不会严重动摇呢？他会不会通过对柏林采取某种危险行动来反击呢？再不然，他会不会认输而回到自己在美国门口进行这项危险试验之前所采取的比较温和的政策上去呢？

赫鲁晓夫和希特勒是大不相同的人物。希特勒不得不拼命赶紧行动。他不能等待，因为他所加于德国的压力不是这种国家所能长期忍受的，而且，由于我们已经和俄国人“抗衡”了十五年之久了；由于赫鲁晓夫也许是我们遇到的最好一种类型的俄国领导人，所以有一种强烈的主张，要求现在就去就某些有限的或者涉及面更大的方面，进行协商，达成协议。<sup>①</sup>

11 月 27 日，俄国大使亚历山大·苏达托夫交来赫鲁晓夫的一封长函。这无论如何是一份有点意想不到的文件。关于古巴他仅仅说：

古巴问题仍然是首要的。现在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于最后消除已经产生的危机上。双方已经相互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使加勒比地区极度危险的局势有所缓和，这已经证明，我们是有可能使世界免于滑到悬崖下面去的。

苏联对历史便是这样写的。不过这封长函基本上是有建设性的。454

<sup>①</sup> 1962 年 11 月 27 日。

关于柏林，他要求这位大使和霍姆勋爵作进一步的商讨。但是他呼吁的主要部分涉及达成一项核禁试协议的可能性。他议论说，此刻三个核大国之间实际上已就停止水下、大气层、外层空间核爆炸达成了一项协议了。不过一项完全的协议应该比这更进一步，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的一切试验都应该禁止。不需要派出视察小组；现代科学能够研制出一些设备，无人控制的自动地震站可以通过这些设备来进行必要的监听。次日，外交大臣通知我说，虽然大使关于柏林的建议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却似乎表明一种要“谈判”的真实愿望。但是，戴高乐和肯尼迪总统都认为，最好还是一面继续敞开谈判之门，一面让柏林以及类似问题自流下去。我们无论如何应该等待俄国人采取正式行动。

当我们在拿骚的时候，总统从赫鲁晓夫那里接到一封关于核试验的信件。这同他已经写给我的那封信的内容极为相似，不过却增加了重要的一点和一个真正的让步。虽则他再次主张可以由无人操纵的监听站来侦察地下核试验，但是他又说，此刻苏联将愿意考虑答应每年进行二三次实地核查的视察活动。即使肯尼迪并不认为每年视察两三次是足够的，而且说苏方所提供的视察地区也还有限制，他也还是认为这一建议标志着一大进步。

1963年3月8日，有消息传来说，在日内瓦的十七国裁军委员会和由三个核大国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已陷入完全僵局，我立即召集外交大臣、约瑟夫·戈德伯（国务大臣）、哈罗德·卡奇亚和腓力普·德朱鲁塔举行会议。这是一个可怕的词——一次“工作午餐会”。我的目的

是要去商讨出一个方案，（我们）可以试图通过它来打破在日内瓦出现的关于核禁试协议的僵局。我们在这上面工作到三时半左右。接着威廉·彭尼爵士到来，他从科学角度来说明……具体情况。他是他以他惯有的明了易懂的方式来作说明的。他非常明白，总统所以踌躇不前不是由于科

学而是由于政治在拖后腿。我亟欲我国采取某种主动，于是我们决定去起草一封可以由我发出的信，并且去考虑，在美国人（正象我所担心的那样）持顽固态度或者害怕国内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我可以采取的行动。<sup>①</sup>

3月11日，在另一次会议上，外交大臣

完全同意我打算就自己关于核禁试的主张直接向肯尼迪总统写信的想法。我怀疑自己究竟能否打动他，也许要被迫采取单独行动。不过第一桩事是要设法同肯尼迪进行一次商谈。我写出了下列内容：（一）致总统的信，（二）另外写给大卫·戈尔的一份说明。一俟接到戈尔的补充意见后，我就要去写出最后的一稿，并在接到（大使的）回话后，把事情告诉内阁。<sup>②</sup>

大卫·戈尔认为我就核禁试问题再次同总统接触是极有好处的，不过他感到政局不容乐观。迪安·腊斯克上次写信给亚历克·霍姆的信表明美国人此刻感到多么绝望，总统也很有同感。而且国会、特别是参议院有对立情绪。假如我要提议再次召开最高级会议的话，他感到有必要指出，除非实际上能够保证产生建设性的结果，总统是不打算去考虑这个计划的。因此有必要设法去弄清，赫鲁晓夫会不会对“一揽子交易”真正感到兴趣。戈尔不认为通过正常外交渠道，不论是通过外交部长或是大使，能起什么大作用。大使写道，“我感到赫鲁晓夫是以自己对葛罗米柯的重视程度来估量腊斯克的重要性的，换言之，即把他看作一个能胜任工作的邮递员”。所以，假如要办成什么事的话，不如由华盛顿和伦敦各派出一名特使。结果证明上述这一建议是极有效果的。

在大卫·戈尔的建议的鼓舞之下，我重新起草了致总统的信，<sup>456</sup>并于3月16日将它作为外交邮件送出。它的内容涉及整个裁军领域；虽则我的某些希望证明非我们力所能及，不过核禁试条约却是以它为基础的，从而它是具有一些历史意义的。

<sup>①</sup> 1963年3月8日。

<sup>②</sup> 1963年3月11日。

接到了你所写关于核武装力量整个问题的来信很是高兴。

我越是想到这个问题，就越相信我们的拿骚宣言是具有建设性的，不论我们的方案最终会以什么形式出现，随着时光的推移，它们所根据的精神无疑已经越来越被人所理解了，……

随着我们两国根据拿骚会议精神签订了技术协定，我们就将为一部分工作妥善而真正地打下了基础。我想我们这里继任的政府以后也永不会把它抛弃掉。我通过长期经验后发现，我们大家都容易在不掌权时提出一些不适当的主张，而当我们继他人执政时就会感到不愿意或者无法予以贯彻。

不过由于对这些事情想得很多，使我联想到这个核问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更富建设性的方面，我也希望你想到这一点，因为它可能为改善世界局面打开一条途径：大家一味积蓄巨大的核武装力量，如果不加以使用，就是惊人的浪费，如果使用的话，就会使人类彻底毁灭，而且这样做充其量也不过是通过一种恐怖力量的均衡而勉强维持和平的局面。所以我经过仔细思考后，感到必须写信给你，让你知道我关于核试验问题以及达成禁止核试验协定可能性的想法。

你我两人都不会忘记我们在百慕大举行会议的背景。那时由于俄国在前一年秋季进行了大规模试验而破坏我们在两三年前实行停止试验——它是非正式的，但却极受全世界欢迎——似乎就要到手的协议。赫鲁晓夫先生进行了这些试验，有几成是为了国内政治的原因？又有几成是为了使中立国以及不结盟国家对他的力量感到害怕或产生印象？这一点仅能加以推测而已。不过它当然使我们大家都大为震惊。当我们于1961年12月在百慕大会晤时，我感到您也同我一样，亟欲避免以另一系列不论是英国或是美国的核试验来回答它——你们的核试验规模当然是远远地大过我们的。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商谈的经过以及不能从专家们那里把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的困难。说也凑巧，我越是讨论这个问题，就越是感到：我们门外汉谈论着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专家们却老是对我们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这里汲取一些教训吧！



当我们在百慕大时，坚决不肯基于政治的理由去进行一系列新的核试验来回答俄国人，但是为了保护西方联盟的重要利益，我们好不容易才信服有必要基于军事上的理由来进行核试验。这便是我们在百慕大所发表文告的主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才能够说服我的同僚们和议会同意英美联合进行核试验，并且同意两国共同使用圣诞岛。

所以不管怎样我还是于那年的圣诞节日气氛中，感到有必要向你写了一封无法原谅的长函，以阐述自己的感想。

通过一些信件往来后，我们决定恢复核试验，同时提出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当新颖的办法。它在我们两国中造成了很好的印象。我们于1962年2月7日向赫鲁晓夫先生发出了联名信，接着又发出了措词大体相似的两批信件。……你会记得，其要点是：虽然西方的试验势在必行，不过我们希望这一系列试验将被视为一个明确的回合的终结，而且我们大家都应该设法集中力量于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已经应俄国之请把核禁试问题交由这一机构来处理。我们两人都答应要亲自对此事加倍留神，并要在适当时机使事情有结果。2月25日我对赫鲁晓夫说了如下一段话：

“正如我在2月14日的信中所告诉你的，一当看来政府首脑会商可能产生积极效果时，我就十分愿意亲自参加这些谈判。这个办法在下列两种情况中可能是有效的：第一，假定会议能令人满意而且肯定有进展。在此情况下，政府首脑的会晤将有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效果，并且能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达成真正的协议。

“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了某些势将阻碍会议进展主要而明显的分歧，458  
在此情况下，政府首脑应该开会，以便打开僵局。”

2月24日，你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你在信中说：

“在外交一级已经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索并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协议后，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点时，政府首脑就应该碰头来解决这些分歧。”

迪安·腊斯克和亚历克·霍姆两人都到日内瓦去出席首次会议，这就充分表明你我两人对这次会议的重视。

在最近数月中，谈判已取得相当进展。俄国人已经公开接受视察的原则了。他们在三年前的确似乎是接受这一点，不过后来又十分明确地予以拒绝了。他们现在肯定同意视察了，而且同意每年进行三次。西方则已把要求视察次数从二十次减到七次。所以从普通人的观点看来，双方已经大大地接近了。外行人的确认为，我们双方意见似乎已如此接近，几乎无法设想还有什么不能够弥合的分歧点。当然为了使这几次视察成为一个事实而不是一出滑稽戏，还有一些其他有关的要点需要加以解决。但是我不认为：俄国人在确定视察次数之前拒绝讨论这些要点，就意味着他们要利用这几项使谈判夭折。假如在大家对视察次数取得协议之后他们再这样做，就会使他在世人面前显出极坏的姿态。

我心中一直在纳闷，并且试图为下面一个问题找出答案：为什么赫鲁晓夫先生突然在视察问题上往前走了一步？只要他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视察都包含间谍活动这一个原则，他至少还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立场。我们可能认为这很可笑，不过这一做法符合于人所共知的俄国人对于同外界接触的敏感性，也符合于差不多是东方式的仇外心理，不论是在沙皇俄国或是在共产党俄国，这种心理一直具有传统性。但是既然放弃了这个立场，那就很难争辩三次视察不会危及安全而四、五、六或七次就可能危及安全了。我拿不准他是否也许真的对此有某种误解？他是否认为，要是他在原则上作了这个让步，我们会同意每年只进行二三次视察？赫鲁晓夫先生记忆力之好有如一只老象。例如在1959年在莫斯科会谈中首次谈到此事时，我无意中提出每年进行从三次到十二次次数不等的视察，以说明自己赞同签订一项核禁试协定的总的论点。从此以后，他就假装把这句偶然的话看作英国政府的具体建议。他当然应该明白并没有这回事。不过这就是他已经学到的思考方法——或是自相矛盾的思考方法。同样，最近肯定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它足以说明赫鲁晓夫的显然真正的恼怒和猜疑的心理。可是，不论对此作何解释，情况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在视察次数问题上出现了僵局。

那末我们该怎么办呢？是的，有着这么一些有力的论点，认为什么事情都不做。这是逻辑上有力的论点，是政治上有力的论点。可是你对

上帝和人类都负有最大的责任,你决不会以这种精神来执行自己的职务的,我也决不会以这种精神试图来尽同样的职责的。我感到,为了解开这个东西方关系中的恐惧和猜疑的可怕疙瘩,核禁试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它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就从它所产生的影响而言,那就更加重要了。不管怎样,严格说来,现在应该轮到俄国人采取行动了,他们把视察次数从零增加到三次,你们已从二十次减少到七次,现在应该由俄国来加码了。如果他们希望得到一项条约,他们垂手可得——而且人家会问,假如他们不要的话,为什么还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谈判呢?为什么老是要西方去采取行动呢?为什么一切让步似乎都是由我方作出的呢?等等。当然还有一些真正主张恢复核试验的极其有力的意见。有些科学家认为不去了解可以了解到的情况是令人惋惜的。不把试验规模越弄越大,去看看爆炸结果如何就几乎是束手无策而反动的了。其他的人很担心,俄国人偷偷摸摸断断续续地进行这些试验后,会不会设法从中得到什么重要的东西。我想这是一个受到压力而让步的老问题,这可能对发展最尖端的反导弹的导弹有关系。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同样有力的意见认为,如果从纯粹科学观点来看待我们正在讨论的视察次数问题的话,视察次数少并不见得比视察次数多更为危险。 460

我刚刚看过关于此事自始至今整个经过的简述,我对下述的情况深有感受:即一当我们似乎将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时,就有人发现一个新的科学理论,这个“无底洞”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好例子。人类的一切希望很可能——除非我们谨慎——埋葬于这个大洞之中。人们反正是可以提出有力的主张来反对我们去采取行动,而且我确信,对你说来,这种主张在政治上一定是十分有力的。除了我已经指出的几点之外,还可以加上这样一点:即,如果我们签订了一项核禁试条约,法国人和中国人是不会参加的,所以结果我们可能得不到什么大的新进展。最后,还有人极力说,对任何一方说来,要着手进行一系列新试验的压力都不太大。

可是,由于对一组试验进行鉴定并为下一组试验作必要的准备看来需要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间歇情况可能证明是很容易使人上当的假象。在一或二年之内,我们可能会面临我们于1961年在百慕大会晤时



所遇到的同样形势。我确信你会同意,要是能够签订这项条约的话,除了能够避免我们即将遇到的具体困难之外,我们还将得到很大的好处。第一,这将停止污染大气空间。我们一直对地下核试验想得太多,以致于使自己忘记了大气空间试验所造成的损害。这项条约并不能使中国人和法国人停止试验,它们的试验将转向地下,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不失为一桩好事。第二,我确信,它对于某些拿不定主意要怎么办国家将产生相当的影响。例如,瑞典、印度、以色列等等几乎一定会参加核竞赛,除非它们能得到不这样做的保证。第三,我们两国同俄国庄严地签订了一项协定,其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它将使人们感到极大的新希望。我们也许能够给裁军会议以新的推动力,还可能在其他方面做出榜样来。

假如瑞典、印度、以色列等等保证不进行试验,那自然会是一个极大的收获;不过我感到,要是我们能达成核禁试协定的话,我们还将取得另一项同等重要的报偿。我们有可能同时达成一项不扩散核武器的协定;就是说,无核国家保证不接受别国所赠送的核力量以供自己单独使用,而核大国则保证不向无核国家提供核武器或者核知识。我感到这是解决德国问题的真正关键;这是一个深使俄国人和我们担心的事,而且实际上也是使不少德国人担心的事,他们的确担心到时候他们自己或者其继承人会被迫使德国变成一个核国家。德国目前的确受到了各种协定和义务的约束。可是在将来这些都可以轻易地被一个坏的德国人说成是凡尔赛条约的近代翻版。我们明白——简直太明白——这种想法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老实说,拿骚协定<sup>①</sup>第七条的最吸引人的部分其实便是:它使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参加了核国家的行列而又不至于产生此种危险。不过我感到,假如我们能实施第七条的话,那末,一项核禁试条约再加上不扩散协定就能够加强第八条,而且这项条约本身无论如何将会是有效的。这样就没有任何德国人会说,签订目前这些条约或协定的时候,德国人是在大战刚刚结束后衰弱阶段中被迫克制自己而接受的。

反之德国人可以骄傲地说,德国已经同其他大国一起承担了这个义务,以便为解决世界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作出贡献。同时,这个前

---

① 见《附录》四。



景肯定对俄国人同样有吸引力。西方国家已经决定重新建立同德国的关系,我们应该为此感谢上帝。我们已经设法去忘掉两次大战、忘掉希特勒的迫害等等事情。贵我两国是这样,说句公道话,法国人亦复如此。这都是好事。不过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有利害关系,因为德国人是我们反对共产党人的盟友,俄国人对德国人又恨又怕。他们恨他们,是由于回忆他们的暴行而激发的,而那些暴行我们已经决定要予以忘记;他们怕他们,是由于德国人工作讲实效、埋头苦干、勇敢而坚定。他们也不会不意识到由于自己坚持强使德国分裂为二,而不断地施加于德国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德国人感到极为不耐烦。为了所有这些原因,我认为实 462  
行核禁试之后——其他国家接着也将同意不进行——,再加上一项将会受到大力支持的不扩散条约,就会对消除目前世界紧张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

自然,不论签订那一种协定,俄国人都可能设法避开它,而我们则可能抓不住他们。我们认为,假如在俄国每年发生大的二十五次强度为四级左右的未经判明的震动,在每年进行七次视察的情况下,我们抓住他们的机会约为四分之一;假如每年视察五次,我们抓住他们的机会为五分之一,假如只视察三次,机会为九分之一。当然,假如他们肯定是连续性试验,我们抓住他们的机会就更多。也有这种可能性:他们会安排在年底举行试验,这时我们却可能已经把视察的权利都用光了。不过还是有可能在谈判中,不仅通过消除七次和三次之间的分歧,而且通过安排,在大家同意的范围内,把未使用过的视察次数从一个年度转入下一年度,从而使此类困难问题得到解决。由于我们的仪器,不论是公开或是秘密使用的,都会不断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每年就会需要更少的视察次数,这种把视察次数积累起来的安排,可能是让我们在开头有充分的视察而对未来的视察又无影响的一种方法。

关于俄国人欺骗我们时我们抓住他们的机会就谈到这里。不过我敢说,我认为他们真的在签订条约之后还要不老实就得要冒极大的风险。虽则他们可能没有什么道义上的约束力来防止自己不守信用,不过我认为,他们对于自己在全世界的面前公开示众这一点还是会感到难为

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把一项不扩散协定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以及这一切对中欧的影响都丧失掉。

这样我们就谈到如何为了取得满意的结果而去重开谈判的问题。回顾我们在1962年的宣言，我必须说，我有义务遵照自己当时所说的去做。自然，我的声明也许要比你的声明内容更进一步。在声明中，我的确许诺在发生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时，就要去为恢复谈判做一些事情，现在其中的一种情况就要来临了。

463

有几种可能性存在：

(一) 我认为仅仅通过日内瓦的谈判代表提出还不一定能为对方所接受的五次视察，是不利的。如果遭到拒绝将在政治上对你极为不利，但对我则不至如此。

(二) 简单地提议让我们三人碰头以谋解决问题这一做法，这里包含着种种危险，虽则我认为其好处可能大得多。要是那时西方提出进行视察五次而赫鲁晓夫则坚不答应，我们可能有损尊严，但不至于丢脸。

(三) 我们可以在下述谅解的基础上召开一次会议，即，先把视察的条件谈得差不多，然后只要商定关于这些事情所需要采取的最后步骤以及视察次数的问题就可以了，但是这里可能还有风险。

(四) 要不然，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我可以私下或公开地或则兼用两种方式写信给你和赫鲁晓夫，建议大家在日内瓦会晤。如果他拒绝了，我们将大失所望，我们将无法达成协议，但不至于使我们失面子。

(五) 在我们联名或单独建议举行政府首脑会议之前，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试探。

关于这一点，我对于赫鲁晓夫接受视察原则这一行动仍然感到有点奇怪，也许是在思想上真的有所误解，要不然可能是那些把自己在日内瓦所了解到的情况向他作汇报的俄国人对事情有误解，或是他们的报告不符事实。所以你可以就这事向赫鲁晓夫写一封私人信件或者派出诸如艾夫里尔或你的弟弟博比<sup>①</sup>这样的特使，他们既能澄清任何误解，并了解是否可能就五次左右的视察次数获得解决，或通过玩弄数学把戏

---

<sup>①</sup> 即罗伯特·肯尼迪。——译者

最后获得解决，这包括采用网球赛中让分的办法以及在每年中规定一个限额的办法，自然还要加上我认为的可以使赫鲁晓夫大感兴趣的内容，即不扩散方面的问题。

我接到的某些电文报告说：据说他对核禁试已失去兴趣了，不过要是这样的话，很可能是由于我们并没有充分使他对不扩散方面的内容得到印象。

我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给你，感到很抱歉，但是我感到自己责无旁 464  
贷，这是一项必须由我想方设法要及时加以处理的任務。须知，我并不想麻烦你打电话给我，不过我很乐于通过大卫·戈尔或者电传打字机，先听到你的意见，然后我们也许就可以接着进行商谈，以澄清任何存在的问题。

我此刻正通过大卫把信捎给你，他十分了解我的想法，我相信你也是同我一样地信任他的。

将可看出，我是以赫鲁晓夫有条件地接受“就地”视察的原则为根据而提出呼吁的。结果，部分由于美国人对要求的视察次数所持的僵硬态度，部分由于俄国人对可供视察地区所加的限制，结果我的整个想法都落空了。不过这还是有助于推动谈判。即使我们到头不得不以实行部分核禁试为满足，没有把地下核试验包括进去，然而比之世界所得到的巨大好处来，这个损失可谓微乎其微了。

3月28日，总统的回音来了。虽然他认为在同一谈判中涉及核禁试和不扩散条约的问题是不明智的，而且也不愿意在我们的代表们解决了技术性问题之前去举行另一次最高级会议，他的答复却并非无补于事，他建议向赫鲁晓夫先生发一封联名信，并寄给我一份草稿。

在好几天之中，我们之间往来传送了联名信的草稿及其补充意见。鉴于赫鲁晓夫正同中国发生纠纷，肯尼迪开始怀疑他是否愿意来同我们谈判。对此，我回答说，他同中国发生了麻烦就越加

可能同我们妥协了。4月11日，肯尼迪同我在电话中作了长谈，我记录道：

又一次从总统那里接到回话，内容是关于拟向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议。他同我的意见已更趋于接近了。今天下午我同他在电话中进行了一次有益的交谈。然后有必要向戈尔发出大量电文，我深受鼓舞。<sup>①</sup>

465 总统又提到自己对实际上等于提出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建议一举所感到的忧虑——单单照原议派出特使是否更为明智呢？当我向他送去又一份联名信的草稿时，他仍然对提出最高级会议的建议感到担心。

我们必须设法答复肯尼迪总统上次提出的建议。我们意见已如此接近，我希望趁他还在棕榈海湾度复活节假时，在发生变化之前同他（谈妥）。

腓利普·德朱鲁塔和外交大臣于上午商谈后，我们（在电话中）同意了发往华盛顿的电报内容以答复总统，我同意了他的两点补充意见，并建议对主要一句（导致最高级会议的谈判方法）的次序略作变更，我希望他能加以接受。假如大卫·戈尔能把这最后几点解决掉，就可以叫我们的大使们于明后天把联名信交出去。可是，“……也许还有波折”。<sup>②</sup>

总统赞成我的意见，不过他在4月15日的一封信里提醒我说：

我国国民和我自己对1960年5月的事情……记忆犹新，根据过去历史，我认为赫鲁晓夫不象会在最高级会议上对在自己指导下提出的主张作重大改变。

最后我同意了经他修改过的内容，并且准备好了向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发出的训令。

虽然电报和电话频频往来的日子并不太长，但对我说来却是够紧张的。我拼命想取得一点成就，我本能地感到至少某种协定

---

① 1963年4月11日。

② 1963年4月13日。



已经在握了。

赫鲁晓夫正离开莫斯科,外出数天,所以一直等到4月24日,才把信交给他,同时

(原来虽不能算是持反对态度,但却是抱怀疑态度的)国务院突然对我们向赫鲁晓夫提出的联合建议大感兴趣了。我想这意味着总统的宣传员 466们正准备把这事说成完全是美国的倡议,在这位年轻的新边疆主义者<sup>①</sup>的带头下,这位英国的老首相正勉强地被拖着跟在后面。这的确是很有趣的。<sup>②</sup>

4月15日交给赫鲁晓夫的那封联名信的内容如下:

你会想起,我们曾经在1962年2、3月间,就日内瓦裁军会议、尤其是就一项核禁试条约内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交换了一些信件。肯尼迪总统和我都保证过要亲自关心这次会议的进展,人们对这次会议寄托多么大的希望。去年10月我们两人在写给你的信中,都表示要对裁军问题、特别是关于核武器扩散和核禁试问题,作出新的努力。

日内瓦会议虽然一直在进行,但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不过,还是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例如,你接受了对未经判明的震动实行就地核查的原则就具有极大的价值。同样,西方国家已经能够把他们认为非提出来不可的每年视察次数从二十次左右减少到七次。剩下的分歧自然是实质性的,这似乎只是由于两种推理方法不同的结果。同时,你所提出的每年进行三次视察和我们要求的七次之间的实际距离虽则是重要的,还是应该有可能加以解决的。至于自动测震站的问题,我们之间的差距似乎已相当小了。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去考虑安全的必要性;不过我们对人类也负有责任,所以肯尼迪总统和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最可行的办法,认真作出新的努力,看看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你协助之下,使这事情有个着落。

我们知道有人议论说,虽然核禁试条约,特别是关于禁止大气空间 467

---

① 肯尼迪当时推行的政策名为新边疆政策。——译者

② 1963年4月17日。

的试验，是有价值而且受欢迎的，不过它本身却不能对世界和平及安全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当然我们之间还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其他问题，但是核试验问题看来的确是一个可能在目前达成协议的问题。在一个问题上取得协议，肯定有助于鼓舞信心，而使其他问题较容易获得解决。此外，我们肯定还可能迅速地进而对不扩散核力量的问题举行具体而有成果的谈判，以导致一项有关的协议。假如这样的一项协定能理所当然地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的话，我们感到它可能对目前世界的紧张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假如果真有可能就核武器问题并就各国的核力量扩散问题迅速达成协议，那末就可能为达成涉及面更广的一些协定开辟道路。

实际的问题是怎样来最好地进行此事。关于安排视察次数问题，进一步的商讨可能会使双方提出新的可行办法。不过要是我们还是目前这样，双方就会无法取得进展，因为这样就显得只是牵就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却没有就一项明确的条约取得最后的协议。也许我们可以根据在日内瓦中立国代表们所提出过的一个意见——其想法是：可以商妥每阶段以数年为期的就地视察次数，以便据此在较之限定每年视察次数办法更为灵活的条件下进行视察——来探索一下，以便在这个次数的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但是在视察次数上得不到进展，我们还必需对条约草案的最后内容取得一致的意见，而特别是需要对有关如何进行视察的某些重要问题作出决定。你已经认为，一旦大家同意了视察次数，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过我们却感到，除非先把大多数其他问题解决掉，否则不见得能够对视察次数取得最后协议。这样我们就遇到困难了。

468

我们乐于听到你关于如何去摆脱这个僵局的建议。就我们而言，只要看来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们现在已有充分准备去安排三方的密谈。例如，我们在日内瓦的总代表可以就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商讨。另外，或者在稍后的阶段，肯尼迪总统和我到时候将派出相当高级的代表，他们将受权代表我们在莫斯科同你直接商谈。我们希望不论是在日内瓦，或是通过在莫斯科的此种高级代表，都能使事情达到接近最后解决的地

步,这时再去考虑由我们三人举行一次会晤才可能是适当的,在此会上,就可以把一项具体的核禁试协定肯定下来。我们三人的会晤导致的一项核禁试条约的事实,将会在我们的关系上以及在为讨论涉及面更广的问题提供机会这一点上开辟新的一章,这自然是很显然的。

我们真诚地相信,你会认真地考虑这项建议。我们认为,核禁试条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是我们设法去达成协议的最有希望的方面。我们认为,我们所提出的办法似乎是取得将受到举世欢迎的一项成果切实可行的办法。

赫鲁晓夫于5月8日来了回话,他的论点还是那一套。他力言一切核试验都可以不通过视察而侦察出来。现代科学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可是西方却坚持要进行视察,其故安在?就是为了进行间谍活动。苏联政府同意每年进行二三次象征性的视察,其唯一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是有助于总统去应付美国参议院的一种政治需要。可是西方非但不就提出这个建议的精神加以接受,反而开始同苏联讨价还价。当时我们要求进行每年七八次左右的视察,每次范围为五百公里。

假如我国政府所参加的谈判是我们每年允许多少名间谍进入以及我们将为这些间谍创造什么条件的话,我国人民自应对政府严加责备了。

不过俄国人还是打算继续设法取得协议,并准备“去接待你们的 469 高级代表”。

这个情况自然由于美国提出所谓“北约兵力多样化”而复杂化了。我国已经于拿骚在原则上予以接受了。不过这事看来不象是什么实质性问题。此刻接着在契克斯开了几次会。

大卫·戈尔专为参加这些会议飞回国内。他对大家帮助极大。参加会议者有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国防总参谋长(蒙特巴顿)、索利·朱克曼、威兼·彭尼以及象卡奇亚(外交部)和斯科特(国防部)这样一些官

员,讨论的两个大问题是:

(一) 赫鲁晓夫对于总统一首相关于核试验的信的答复。

(二) 美国的所谓兵力“多样化”的建议——二十五艘军舰和二百枚北极星导弹。①

我由于把大使召回来了,感到十分高兴,因为

在我们同美国以及肯尼迪总统处于微妙关系的情况下,大卫·戈尔在有关这两个问题的整个争论过程中一直是极起作用的,他已经同肯尼迪总统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他的亲密而受信任的朋友。一位英国大使享有这种地位是极为荣幸的——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先例的——这种关系是以肯尼迪家族和卡文迪什家族以及戈尔家族不同成员之间的战前老交情为基础的。我对于他的智慧和他的机敏以及他的乐观情绪,都有深刻印象。②

通过商谈,迄至星期天晚上,

我终于能够对总统的两封信写出了回信。在第一封回信中,我极力劝他不要由于赫鲁晓夫回信中意见十分相左的那方面内容而沮丧。尽管有些话颇为虚伪而令人恼火,到底并没有拒绝我们的主要建议——即派出两名公认是我们所特别亲信的全权使者到莫斯科去商谈,并去看看究竟能否使彼此的意见再接近一点。美国人可能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大卫·戈尔确信总统是会同意的——只要我高兴。③

470 我在第二个问题上设法拖延时间。

迄至5月29日,经过一些电报往来之后,我们对写给赫鲁晓夫的回信内容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们反驳他的某些论点,但是(我希望)在方式上不要盛气凌人或是惹人恼火。不过我们还是对他愿意接待我们的“两位特使”表示欢迎。④

---

①② 1963年5月20日。

③④ 1963年5月29日。



我们于6月8日又接到了赫鲁晓夫的回话。虽则它以相当强硬的措词重述他关于间谍活动的看法,而且还节外生枝地对西德“复仇主义者”以及拟建立的北约核力量加以攻击,不过它却清楚表明了赞成举行谈判的意见。总统在一次于华盛顿发表的重要演说中公开地对此表示欢迎,他在演说中宣布,不久即将在莫斯科开始就核禁试问题进行高级的会谈。他还宣称,只要其他国家不进行大气空间核试验,美国就不再进行此类试验。

这时我决定派出黑尔什姆勋爵为我国代表。我确信在象汉弗莱·特里维廉这样能干的大使协助之下,他一定会干得很好。他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这会对赫鲁晓夫有吸引力。同时我十分高兴地获悉,总统已经决定由哈里曼来代表美国。我一向认为艾夫里尔·哈里曼是我所遇到的最能干的美国人之一。他具有担任这类任务的一切品质——无限的耐心、手腕、勇气以及彻底的独立性,不屈于任何政治乃至任何政府的压力。他的权力极大,可以在紧急情况之下依赖白宫和国务院给予的绝对支持,自行决定行事。

这时我向肯尼迪发出了一份由我国科学家所准备的备忘录。他们的意见似乎是:要末根本不订立什么条约,要末就订立一项包含着让人家偷偷摸摸地进行地下核试验危险的条约。这类地下核试验会有什么成果呢?任何一方的力量都已经能够毁灭对方了,各种在技术上可能作出的改进不会影响总的均势。唯一能够影响这种均势的是成功地发展反导弹导弹。不过反导弹导弹的最后试验似乎并非完全有赖于地下核试验,使这种体系成功而可靠地起作用的一些主要因素将是截击、扰乱复合的雷达体系之类。所以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对地下核试验本身以及是否要肯定地判明它是人为的震动现象而非自然震动现象这一点过于重视?从相当高度的空中爆炸数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地面造成的破坏范围可以广达数千平方公里,这也是很可怕的;在海上进行大规

模爆炸也可能引起海啸,造成类似的破坏。所以,地下核试验比较起来就似乎同这些可怕的威胁的进一步发展不一样了。如果一项部分核禁试条约能防止所有这些可怕的威胁,那末我们为什么要对地下核试验不放心呢?

总统于6月29日到桦林居对我作短暂的拜访,这就凑巧地为讨论这些重大事情提供了一个机会。此外,当时我们在国内正遇上一些麻烦,这就不失为一种令人快意的调剂。

总统是由爱尔兰乘飞机来的(他在那里对“肯尼迪家族的故里”作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旅行,并且发表了一篇关于自由的相当愚蠢的演说)。他别出心裁地改变行程,决定在德比郡停留,到恰茨沃思去看他的姐姐哈廷顿夫人的墓。(说来很凑巧又富于讽刺意味,她就葬在被爱尔兰人刺死的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的墓边。)他因此稍为迟疑了一下。但在略为耽搁一会之后,他终于还是去了。

杰克·肯尼迪——他的贴身仆人和警卫员住在我母亲的(卧室)和(我父亲的更衣室里)。迪安·腊斯克和邦迪先生住三号及四号房间,我们的秘书住五号房。他一行的其他人则住在保育室里。大卫·戈尔和几个美国人住在普克斯(我儿子的房子)。

贝尔太太和我家寥寥无儿的仆人们都干得非常出色。我们从政府宾馆请来了一位厨师。

虽然星期六湿漉漉地令人不舒服,星期天气候却好转了,下午十分晴爽。

472

总统一行要在这里住一天一夜;约有十二小时是用于会谈的。……我把吸烟室让给美国人做办公室。我的起居室则供英国人办公之用。参加者有霍姆勋爵、黑尔什姆勋爵、彼得·桑尼克罗夫特、邓肯·桑兹;特德·希思来了又走开了。(亚历克·霍姆住在我家里。)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会谈极为成功……

我们达到了一切目的。

(一) 全力进行在莫斯科的谈判——核禁试是首要内容。

(二) 对兵力多样化问题要慢慢来。

我们对其他难解决的但其实是次要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保安人员(数以百计),交通人员(带着巨大的仪器),英国警察(数以百计)使整个地方成了一个兵营。不过一切都搞得很好,(在总统离开后)这种乱哄哄的情况就如同他们突如其来那样突然消失了。报界……对于这次会晤情况不太吃得准。当然,对于那些想千方百计来攻击我们的人们说来,我们如愿以偿对他们是不好受的。

从我日记中摘下的急匆匆写下的短短数语,只能对充满于这段激动人心的时间中奇异的甚至带有浪漫色彩的气氛作不完整的描述。自从总统的直升飞机飞到并在花园中降落直到他离开为止,一直存在着一种带着欢乐的激动情绪,它使所有有关的人、并且的确还使周围所有的居民,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他步出飞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的形象优美、年轻而快乐,背后跟着一批忠诚的随从。他的部下出色的工作,而且忠心耿耿,这一点谁也不能和他相比。在他离开之前,这出戏中的主角们突然到场和同样突然的退场,左右了我们整个小小的圈子。我自己的房子和我儿子的房子都供他们使用;当然我们的房子还不够大,容纳不下这许多国务大臣、大使、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人员、秘书、打字员以及构成他那庞大的朝廷的一切保护机构。附近的饭店被包下来了,旅馆被征用了;在布莱顿设立了一个交通中心,它的前哨设在我儿子的屋里。此外伦敦或布莱顿中心和在我们这里的降落点之间不断有直升飞机 va-et-vient(往来)。<sup>473</sup>

记者们自然来得极多,不过却没有给我们造成麻烦;因为他们都处于代表我这方面的哈罗德·埃文斯和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的出色指导之下。塞林杰能力不在埃文斯之下,不过作风比较粗。事后我看到了关于我们彼此交谈的全部内容以及由此而达成的所有结论的报道。写得颇为详细不过互有出入。由于消息



缺乏，记者和编辑们已是尽最大的力量了。无论如何那几张照片是真实的。

我们的近邻情绪热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肯尼迪来到时，我请邻近学校的学童们（包括附近一所预备学校的学生们）、邻居、房客、仆人和庄园的职员们去欢迎他。他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朴素而真挚的欢迎，这使他们都大感快乐。大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其中还包括一百名裁减核军备运动示威者，他们拿着旗帜，上面写着要求禁止核试验。由于我们晤面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核禁试，所以这次示威游行似乎没有必要。不过总统对之并不介意。当他于星期天一清早驱车到森林街去参加弥撒礼时，车道外的马路以及在（阿什当森林附近的）切尔伍德门转角的马路上，都挤满了来自远近的人们。我听说，在森林街那里，也同样地挤满了情绪热烈的人群。大家似乎都只是由于一个人而受到了鼓舞。对他们说来，肯尼迪就意味着年富力强、理想主义和世界的新希望。后来在他遇刺去世时，这两处的居民都特别在当地为他树立纪念碑。

在我屋里，会议开得更象是演戏，或者不如说更象是热烈进行中的排演，而不象是庄严的国际会议。没有一点通常作为此种会议的特征的那种严肃空气。我们大家毕竟都是朋友，而且不少人还是亲密的朋友；整个气氛就象是在乡间别墅举行的一次联欢会，外加一次游园会和舞会。参加者有的就是住在这里的人，有的是从外面来的。外交家们和政治家们以及他们的属员川流不息而来。他们都坐着交谈，但愿他们都对接待满意，精神愉快。

总统似乎极为兴高采烈，对于多罗西和孩子们尤其殷勤，送给我们大量礼物，我们当时感到高兴，而我现在对之更其珍视了。当我们明白了这位快乐而豪放的人物已经怎样地遭到了病痛之苦时，自然感到难过。他不得不带来特制的床，他只有睡在这床上时



才会感到舒服。我留下了他在整个商谈期间所用的摇椅，而且至今对之珍视不已。不过他的性情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这些病痛的影响。他在我们的联欢会里，无疑就象在许多其他联欢会里一样，是个“中心人物”。

所有重要的商谈都是由他和我单独进行的，有时由私人秘书参加，以便对决定作记录。这似乎是迅速达成全面协议的最有效办法。不过那天終了时，我却提议说，由于屋子里、附近住宅和旅馆里已经集中了这么多的专家，我的确应该让他们显一显身手。肯尼迪老爱恶作剧，很喜欢作弄腊斯克以及他的其余心腹，不让他们与闻商谈情况。不过他还是欣然同意了 my 提议。于是我们遵照传统方式举行了一次颇为正式的会议，两位首脑面对面坐着，后面环坐着他们的下属——有点象拳击比赛的排场。这是在客厅里举行的，由于我们已经把所有重要之点都谈妥了，所以需要想出一个商谈的题目。总统建议对北约组织前途作一般性讨论。我感到这题目很不错，于是我们主要为了照顾到谋士们而进行了一次正式的意见交换。肯尼迪的态度有点逗趣。我也禁不住同样地与之呼应。例如，他有一次问道，我是否认为其他北约组织国家希望有一位加拿大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或者英国的军官来担任总司令，以改变由美国人连续担任这一职务的做法？我再也忍不住了。“是呀，总统先生，我同意。再不然或许还可以任命一位俄国籍的司令官。”我背后的谋士们有些不知所措了，其中有一个人喊道：“我想首相说的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吧。”“是呀，我的确是这个意思。475 瞧，这将起很好的效果。西方国家的军队已经面对东方了。俄国人只要‘向后转一下’，这样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家就能够联合起来保卫欧洲，以对付中国的威胁了。”总统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毫无笑容地说：“首相先生，我认为这是一项需要十分郑重考虑的建议。”

访问很快地告一段落。是客人离开的时候了。他去时也同来时一样：是坐直升飞机的。在握别之前，我们再次商讨了通过电报或电话经常保持联系；我们在圣诞节之前或最迟在新年之前还要碰一次头。他没有戴帽，兼有着一个男孩子在度假日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样子和一位总统兼总司令的庄严神态，以轻快的步伐跨过花园，走向飞机。我们站着挥手。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那直升飞机在6月底的繁茂的橡树和桦树叶丛上，沿着山谷飞去。他去了。唉，我再也不能见到我的朋友了。就在这些树叶枯黄掉下之前，他的生命已经被一枚刺客的子弹夺走，不复能为他本国以及全世界服务了。

7月2日，赫鲁晓夫在东柏林发表谈话，他似乎暗示俄国人可能接受一项部分核禁试条约；他们本来主张要末实行全面核禁试，要末就拉倒。我把这种新变化告知了老英联邦各国的政府，并继续通过电报同总统商量如何最妥善地来对法德两国做工作。戴高乐当然从核禁试条约得不到什么东西，而德国人则对东西方达成的任何协议一直感到不安。

7月12日，哈里曼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来同我共进午餐，我和他个别畅谈了一通。

476 他当然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并且要尽一切力量同俄国人签订某种核禁试条约。他对德国和法国以及对如何应付它们的看法都很正确。我从总统那里收到一封使我感到鼓舞的专函。不过赫鲁晓夫先生将有何动静？我们可不知道。他是否想达成协议呢？对我说来这种形势是激动人心而且是利害攸关的。假如有达成协议并在以后召开最高级会议的可能性的话，我就将在国内政治中继续奋斗。否则，我将宁愿认输不干。<sup>①</sup>

---

① 1963年7月12日。

谈判于7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终于在25日结束了。虽则这个期间不长，但确属紧张。黑尔什姆在写来的第一封信中报告自己同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赫鲁晓夫明白表示已经撤回了他前此所提出的每年进行二三次就地视察的建议。这个关于间谍活动的固执观念，不论其是否真的还是伪装的，似乎左右了他的整个思想。在另一方面，他并不坚持把解决德国问题同任何可能达成的核禁试条约联系起来。

7月16日，总统突然改变方针，重新另起炉灶，这种做法一直是美国在近年的政策的明显特征，鉴于我们新近的会谈，使我殊感意外。他提出，为了抚慰戴高乐并诱使法国在任何可能达成的核禁试协定上签字，要向法国披露多年来他们先是对我国、后来又对法国人十分保密的重要核情报。这项意想不到的建议除了要求法国不进行核试验之外，显然将是在不带任何条件和无代价的情况下提出的，而且无论如何将使试验变得没有必要了。当白厅听到美国采取的这个新行动时，可想而知其心情是复杂的。假如美国人在六个月之前就向我提供这一有力的武器的话，就可能使英国和欧洲的情况完全改观了。

7月18日。

我们在召开内阁会议之前举行了短时间的商谈，我感到自己同外交部的看法几乎完全不同。当总统如此雄心勃勃，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谨慎小心？何必担心总统的做法“远远越出他的谋士们所认为适当的范围之外”呢？这是美国人的事。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总统对法国的态度——即试图用核情报这一礼物作为政策的手段——对我国是否有利？既然这正是我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去做的——但却得不到美国同意的——  
477  
事情，我为什么要加以反对呢？我们甚至可能重振欧洲（共同市场等等），并发动一次新的、有希望的运动，以便把整个同盟弄得舒舒齐齐。于是我把内阁会议（它主要是处理堆积于议会开会期末的日常事项）交由巴特勒主持，自己则集中力量于写回信。……到下午一时，我们写就了一

份质量很好的草稿,内阁会议后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把它看后就予以同意了<sup>①</sup>。

我于7月18日致总统的信内容如下:

多谢你于7月16日的来信。根据我7月17日所作的诺言,我和同僚们一直在思考这事,现在已经能够向你传达我们经过慎重考虑的意见了。

我首先要说明,我们是多么欢迎你的办法以及你的大刀阔斧的建议。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即此刻存在着这么一个重大的机会,它将在东西方关系上起深刻影响,并且还会通过同法国恢复伙伴关系而使西欧联盟恢复完全的团结。我们愿意同你们充分合作,尽力利用这个机会。同时,我知道你会同意,正是由于这个机会之重大才需要我们极其仔细地对之加以估量,并慎重地加以掌握。

我们感到我们的直接目标似乎是相当简单的。就是去防止戴高乐立即在我们可能同俄国人临时签署一项核禁试条约之后,或者也许在他于7月底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发表一些激烈的谈话,从而至少不至于破坏这项条约在道义上的影响。这位将军此刻显然正在闹别扭。关于这一点,我就要叫大卫·戈尔让你看看我们最近从我国驻巴黎的大使狄克逊接到的一些电报,他是在上星期五,即7月15日,同将军晤面后发出的。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看出,戴高乐正采取一种强硬的态度,而且毫无妥协之意。这就是更加应该首先把我们的力量集中于有限的目标之上的理由。

从而我建议我们可以遵照下列的方针向戴高乐作初步接触。我们将向他解释说,正如他原来知道的那样,美国和联合王国希望莫斯科谈判会导致一项条约,由大家同意不进行核试验。在莫斯科就此点举行的谈判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不过看来我们仅能考虑达成一项包括禁止在大气空间、外层空间和水下核试验的条约,而地下核试验则将不包括在内。我们当然还不能确知连这样的一项有限条约到底能否缔结得成。不

478

---

① 1963年7月18日。



过我们不仅由于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实际价值，而且还由于它可能成为同俄国人达成缓和的第一步，所以很重视同俄国人就此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而我们明白戴高乐将军是一直主张同俄国人达成缓和的。由于这样一项条约对我们大家所可能具有的象征性意义，我们希望戴高乐将军将继续对这一项条约的价值持达观的态度。

我们还要说，即使我们要求其他国家遵守核禁试条约，我们也很明白法国的情况是特殊的。还不曾开始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也如同已经获得经过充分试验的各种核武器的国家一样，对遵守核禁试是没有什么大困难的，不过我们十分明白，所有这一切对法国所产生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法国政府将同意我们两国进行密谈，以便决定我们是否可以在不损及法国规划的情况下，设法使法国至少不必在条约所涉及的三种空间中进行核试验。我们可以说，要是他对这个想法有兴趣的话，一当莫斯科谈判取得更多的进展，我们将提出举行三国秘密会谈的具体建议。

你在信中建议让我们两国大使拜访戴高乐总统，并向他传达我所认为的一种联合通知。我深知他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猜疑，狄克逊最近的报告表明这种情绪仍然左右着他的思想，所以我们不敢说你的这个方法为上策。我倒是认为，要是你我两人多少遵照上一段所说的方针，分别向这位将军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私人信，也许可能更好一些。假如你赞同这一意见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把信稿交流一下。我们感到这个办法要比现在就向戴高乐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建议为妥。那样做法会有 479 风险，要末就是我们给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不得到充分的保证以作为报答，要末就是引起他立即拒绝我们的提议，其理由是，我们要以不合理的条件来束缚他的手足。

另一点极为重要的考虑是：贵我两国都应该在同法国人进入详细商讨之前，对于自己准备给他们什么而又要从他们取得什么以为代价这一点做到心中有数。至于提出要给法国人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考虑商定向他们提供核知识并且也许还向他们供应裂变物质或其他物资，以使他们节省时间和金钱，当然主要是让法国人不进行新的试验。在我们这一方，我们应该考虑我们可能期望得到什么酬报。例如，我们要在北约组

织中得到什么？我们要在欧洲—大西洋关系上得到什么？我们要从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合方面得到什么？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我们能否利用这个机会，至少为走向一个新时代铺平道路，而在此时代中法国在西方世界关系中以及在东西方关系中都将起充分的作用？在我们初步商定的范围之外（我已经大略讲过）向法国人提供更多的东西之前，我们之间似乎应在技术和政治方面对这些问题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假如你同意的话，我们很愿意派出一个合适的小组到华盛顿来，或者我们在这里接待你派来的人，要是你宁愿这样办的话。显然我们应该尽快进行这项工作。

即使我们向戴高乐提出初步的有限的建议，我认为我们也应当仔细考虑应该如何向我们的盟国交待。我们大概可以说，我们十分明白法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尽可能去说服法国人至少不在条约所涉及的范围内再去进行核试验的重要性，我们将考虑如何做到这一点。

这时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开始源源而来。

480 还没有到摊牌阶段——不过我由于赫鲁晓夫的公开谈话而感到有点不安。他可能会制造破裂的借口以便把责任推到西方身上去。在另一方面，他已经如此公开而激烈地同中国人闹开了，似乎更有可能真的要谋求和西方达成缓和。<sup>①</sup>

总统的回信十分令人满意。他同意了我们的主张，并且建议让我们通过我们两国驻巴黎的大使分别递交信件。同时，他送来自己的信稿，信稿中表示希望戴高乐在同美国及英国政府商讨“可以为你们的计划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的另外办法”之前，不要对将来的行动作出最后决定。次日我发出了我们所拟的信稿，它是有可能被接受的。不过此刻肯尼迪似乎对“将军与日俱增的不友好态度的征兆”，感到关切，担心他会在即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出难听的话来。

对巴黎所作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在以后几天里，一切都要看

---

① 1963年7月19日。

在莫斯科会发生什么情况了。这对我来说是令人激动而感奋的时刻。我由于黑尔什姆和哈里曼两人以极大的精力和积极性来进行这次微妙的谈判，对他们是感谢不尽的。此刻俄国人的态度略有变化。他们重新提出在签订核禁试条约之同时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两个西方代表只能重申，虽则他们很乐于听取对方的意见，可是他们对这项影响到西方联盟的其它成员国建议却无权采取行动。至于视察和“甄别”的问题，俄国人继续持顽固的态度。就我而言，我亟欲在签订条约的同时达成一项不扩散公约。不过黑尔什姆向我报告说，美国人此时已转而反对这种想法。他们认为俄国人总是会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以使他们遵守核禁试条约的（现在已经证明此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还担心这一项公约对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影响，因为他们仍然死抱着自己心爱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不放。

这时哈里曼感到，为了维持这个势头，我们可以提议举行进一 481  
步的另一轮谈判，其范围不仅涉及可能建立的无人控制监督哨（即赫鲁晓夫于7月19日的演说中曾提到过的著名的“黑箱子”。据说它能测出震动性爆炸），而且涉及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其它事项。不过这却在总统的思想中引起一些惊惶，他生怕盟国、极可能是德法两国会对扩大莫斯科谈判范围深感疑惧。他认为我们的代表应于草签条约后立即离开莫斯科。但是葛罗米柯不断催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过去希特勒经常同别国商订互不侵犯条约又往往在事后将其撕毁，听到这一词就使人引起不快的回忆。除此之外，我不认为这事有什么害处。可是大西洋两岸的空谈家都大为惊惶。于是哈里曼和黑尔什姆只好推托说，我们还得同自己的盟国进行一些适当的协商。不过黑尔什姆还是向我保证他自己是持乐观态度的。他在7月22日写的一封信中解释说：葛罗米柯曾经问过，且不管其他盟国意见如何，英美政府对涉及面较广的一些问题

究竟持何态度。

我强调了你想尽量利用这个机会以谋改善东—西方关系的愿望，而且强调了你觉得这种机会可能一去不再来的想法。在另一方面，要是我们的盟国认为我们正背着他们在莫斯科做一笔交易，那末其结果将会极其不利于苏联政府。哈里曼强调尽快签订核禁试条约的重要性，我就说这会对西方以及整个欧洲的舆论产生深刻的印象。如果苏联政府希望达成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话，核禁试条约的签署就能够成为订立的局部性协定的有力理由，其中也许包括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在内。我们自己将尽力响应此举。

在同一信中，他说自己相当有把握地认为，苏联政府不会坚持把这两项条约联系起来。也许可能在最后公报中写上使俄国人感到满意的提法来。

482

整天的时间都耗于同莫斯科以及华盛顿函电往来，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情况究竟如何。大家对条约内容当然是没有异议的。不过他们却在争论如何解释苏联政府所建议的“互不侵犯条约”。（在法国人挑拨之下）德国人正开始感到恐慌。<sup>①</sup>

次日早晨发生了一次一般性的挫折。

今晨从莫斯科发来了消息不好的电报，我已嘱戈尔暂不离开，留在华盛顿。<sup>②</sup>

大卫·戈尔不断对我发出警告说，虽则美国国会愿意接受一项不论是部分或全面的核禁试条约，但深恐下述的想法会流传开来，即，只是因为有了我们的盟国所反对的一些建议，才能同俄国人达成协议。所以我们只好等着看下文。7月25日证实是

漫长而教人疲倦的——但却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戈尔在夜里打来的电报以及他同霍姆勋爵的电话交谈显示出：关于俄国所提签订“互不侵

---

① 1963年7月23日。

② 1963年7月24日。



犯条约”的建议，总统已经决定同意把黑尔什姆勋爵所说的妥协性的话写在公报里（不是写在条约里）。①

不过还有最后一关。正当一切似乎都解决的时候，却在一个高度技术性的问题上出现了新的困难。条文中提出：任何国家都可以参加核禁试条约，只要它愿意在条约上签署，但这份文件由原来发起的三个签约国“保存”。某个机敏的律师就问道：如果某国政府希望参加但却同原来三个签约国不存在外交关系，那怎么办？

“保存”条款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它等于是这样：如果台湾——或中国（美国人承认蒋政权为中国）——要求参加这项条约那将发生什么情况？俄国是不会让一个它不承认的政府签字的，同样，假如东德要参加的话，美国以及或许联合王国就要予以拒绝。荒谬的是，这两个国家随便怎样幻想，都不可能获得进行核爆炸的能力。美国所提出的新条款似乎又否定了原来大家已经同意的妥协办法。原来的办法是很通情达理的，其内容为：任何一国毋须接纳同它没有关系的国家正式加入这项条约。（如果它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这样做。）美国提出的另一条是：条约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援用来防止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其内容之荒谬简直难以置信。条约的名称叫做“核禁试条约”。这一项修正条款亦即新条款如何能与条约本身的性质相称呢？② 483

7月25日，莫斯科会议将预定于下午四时复会（即我国的时间下午二时）。

黑尔什姆预料将发生一场争吵，会议或许亦将随之破裂。霍姆于这里的午饭时间通过普通电话对戈尔讲了话，戈尔就去见总统。三点一刻，我就得（在下院）去回答质询，其中包括一条关于莫斯科谈判进展情况的问题，可是我却对那里发生的事情茫无所知。③

最后一分钟发生的困难竟会阻挠这项条约的签字，这似乎难以置信。它即便不是一项全面性的条约，也还是会受到整个文明世界

①②③ 1963年7月25日。

的欢迎的。因为毕竟是大气空间试验以及从其日益增长的威力可以预料到的恶果，才引起类乎恐慌的感觉。假如地下核试验进行下去的话，其规模可能不大，而且从污染角度来看，其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我也许应该遵照我当时的记录来叙述这一事件其余的经过。内阁在上午的议程是挤得满满的。它于下午四时又在下院召开会议，以便处理一些事项。接着我前往海军部大厦，并且

484

终于在五时半同总统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放弃了美国原来的立场，并叫哈里曼不再坚持。他的的确确还说这项条约刚刚在草签中！（他早就应该告诉我们，免得我们担这么多的心！）他说全是某个律师想出了这一套！不过考虑到进行三方谈判的困难以及各个首都的不同时间，我认为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再发生更多混乱现象，这可算不错了。六时我回到下院。条约草签的消息约于五时四十分到达。我一度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究竟自己是否到下院去还是必须同总统争论下去，不过既然事情圆满结束了，那一切就都很好了。<sup>①</sup>

晚上十一时，我征得同意在下院作简短的声明。

下院中座无虚席。议员们对我的声明反应很好，接下去的质询都很友好而客气（特别是极左派所提问题）。当我离场时，所有保守党议员都起立，挥舞手中的议程表。不少反对党议员也站起来。这象是我在议会中最大的一次成功。毫无疑问，到了明天某些关于安全或者个人品德之类的事可怕地揭发出来，就会危及政府，那我可就要倒霉了。不过此刻还是平安无事，我体会到（在历经艰辛之余），一个人不应过分受逆境或是顺境的影响。<sup>②</sup>

这样我所致力的一個重大目标至少终于得到实现了。我也毫不怀疑，一旦核大国之间的核试验竞赛告一段落，就会在限制数量不断增加和结构日益复杂的核武器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我向所有英联邦国家发出了情况通报后，终于能够满怀信心地等待条约

<sup>①②</sup> 1963年7月25日。

的正式签署,这是8月5日由三国外长进行的。

也许应该以我于8月1日请霍姆勋爵转交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来结束这一段经过。

黑尔什姆勋爵带回了你送给我的美味鱼子酱、蟹肉和酒,你的好意深使我感动。我希望你也会收下一只现代英国花瓶,我已经请霍姆勋爵将它带上,我认为它就象征着我们大家以不同方式所渴望的和平和繁荣。我还希望你尝一尝同时送上的英国斯蒂尔顿奶酪。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对我说来是极可满意的事,我知道对你亦 485  
复如此。我由衷希望这项本身就够重要的条约会导致我们去达成另外的一些协定。

## 第十五章 命运的打击

由于议会好不容易地休会了，我才有机会来考虑我自己的以及保守党的前途。内阁是坚定的。不过看来应该召开一次

阁员以外的大臣会议，这包括国务大臣、政务次官以及上、下两院的议员们在内。我向他们作了四十五分钟的讲话，最后一段话是关于我本人以及我的前途。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关系重大。我后来在晚上听到人家说会议开得极为成功。<sup>①</sup>

在接下去的那个星期里，就得去应付一次更加严峻的考验（或者报纸是这样预言的）——1922年委员会。

这次大经渲染的会议结果开得十分出奇。与会者热烈鼓掌并且捶桌子对我表示欢迎。我就国内外的总政策谈了四十分钟。我已经在星期天想出了演说内容，（除了一页发言摘要之外）作了即席发言。我按照自己对低级大臣会议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发言（只是在形式上较为通俗）。议员们自然知道了签订核禁试条约的消息，而且会议主席约翰·莫里森也提到了这一点。可是我除了在论述东—西方关系问题对自然而然地谈及此事之外，几乎对之只字不提。我简单地说到我本身，说自己的唯一目标在于为党和国家服务，并且还要在下次大选中取胜，接着我就坐下来，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在会议厅后面也许有个人没有鼓掌（极其个别）。……总的说来，这是对我投的一次凯歌高奏的信任票。<sup>②</sup>

487

可是激动之余我却开始

感到一个奇怪的反应。我们已经为签订核禁试条约花了这么多的气

---

① 1963年7月18日。

② 1963年7月25日。



力,搞得这么长久,(直到几星期前)这事还似乎如此没有希望,以至我至今仍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当总统(在电话中)把我们还没有接到的消息告知我时,我不得不走出房间。我是去把这消息说给多罗西听的,而且还失声痛哭了。我夜夜还拚命为此作了祈祷呢。①

同时我可以从我党在质询时的举动感到,他们又对我恢复好感了。

我党议员们正大力支持我和其他大臣。这使反对党惊惶失措,而且总的说来也是一种好现象。②

而且,举国人民又明显地转而对我党以及对我个人恢复了好感。

《每日邮报》民意测验表明选民又大大地转向了我们。只有百分之六左右的人(而不是百分之十八至二十的)支持工党,我在公众中威望的上升程度亦复相同,或者更甚于此。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呀!③

除了签订马来西亚协定的结尾工作以及源源而来的关于安理会和关于向南非出售武器的电报之外,此刻至少可以稍为松一口气。在联合国中,

我们大家都同意不向南非提供武器以作国内镇压之用。我们出售武器(诸如潜艇、军舰、飞机)是供抵御外来侵略之用。不过这是大利所在。正当史蒂文森州长在联合国指手划足之时,美国军火集团——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全力支持之下——正拚命同我国出口商竞争,以期取得巨大的军火合同。④

我和多罗西此时出发到芬兰和瑞典去旅行,时间是8月6日至13日。我决心摆脱过多的烦恼去享受这些访问的乐趣。我们俩人都感到,这样换换空气是令人愉快而使精神振奋。

488

自从我同戴维斯勋爵(于1940年)访问芬兰——设法通过(一)派遣志愿军(二)输送军火来援助芬兰政府——以来,已是二十三年了。他们

---

① 1963年7月27日。

② 1963年8月1日。

③ 1963年8月2日。

④ 1963年8月4日。

那时正同无缘无故突然向他们发动攻击的俄国人作战。孟纳兴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兼总顾问沃登将军）召集了相当庞大的军队，极为勇敢而坚韧地同敌人作战。起初他们把俄国人打得大败。但是最后由于寡不敌众才吃了败仗。……（我于1959年访问俄国时所戴的）著名白帽子就是在当时得到的。俄国人当然知道我在芬兰的那段经历，至少他们知道我的帽子是芬兰制的。但是他们对此很谨慎。俄国人强迫芬兰人把包括维普里市在内的全部的卡累利阿割让给他们。他们的目的自然在于改善列宁格勒的防务。当俄国人去占领割让的地区时，他们发现其中阒无一人。<sup>①</sup>

塞拉奇乌斯上校在1940年时曾经是我的东道主，在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我由于见到他的儿子而感到高兴。以订立核禁试条约作为高潮的最近事态自然使芬兰人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并且使他们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他们在东西方之间脚骑双头马，处境困难而微妙。

次日我们同吉科宁总统和卡里亚莱宁总理进行了几次相当拘束的会谈。这是不足为怪的。

吉科宁总统一点也不露口风，他总是支吾了好一阵后才去回答一个问题——特别是关于定额等问题以及我国同芬兰的十分巨大的贸易逆差。关于俄国石油的事，他也是同样地刁滑。<sup>②</sup>

不过我对于芬兰政府是十分同情的，他们显得既有勇气又手腕高明。当我在冬季战争<sup>③</sup>期间在那里作短暂逗留时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些人；我们每次驱车出巡，看到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有条不紊而美丽，就十分感叹。我们受到了

一次很好的而且甚至是热烈的接待。这部分是因为当地报纸“夸大了”

---

① 1963年8月6日。又见于《战争风暴》原书第28—59页。

② 1963年8月7日。

③ 即1940年的苏芬战争。——译者

我在1940年所作的小小努力：部分因为人们鉴于核禁试条约的签订以及其深远意义而感到宽慰。<sup>①</sup>

总的说来，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我们特别喜欢乘车通过乡下村镇，欣赏湖泊和森林的秀色。

我对于芬兰的印象是相当纷乱的。政府是联合组成的，好不容易依靠吉科宁总统的巧妙手腕维持下去，他使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彼此倾轧，而自己却对苏俄保持颇似“同路人”的态度而使莫斯科无话可说。“资产”阶级——即工厂的所有者和经理人们相当不安，不过总的说来他们对于避免了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或半共产党的政权，是相当高兴的。到处都可以感到俄国所施加的压力，对于一个没有真正自己的历史的国家，这是特别厉害的。芬兰先是瑞典的一个殖民地，后来又成为一个——历经一百年的——俄国殖民地，芬兰的人口很少，但是他们决心以一切手段来保持独立。它通过严酷的“冬季战争”，知道不可能真正用武力来维持自己的独立。不过它现在似乎能够通过极其巧妙和极其灵活的外交手腕做到这一点。<sup>②</sup>

8月9日下午，我们前往斯德哥尔摩。至于真的有什么正事需要办的话，在那里和我碰头的外交大臣也已经把我的担子都挑去了。他最近为了进行核禁试谈判才访问过莫斯科，瑞典的大臣们对于他所谈的情况特别感到兴趣。

瑞典人过去对德国人的同情，目前已经大大衰退了。纳粹政权使他们深为震惊。他们对于阿登纳在欧洲政策上所持僵硬立场，特别是对苏政策很有意见。持有天主教徒偏见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当然是不能吸引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不过他们似乎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相当密切的联系。除了谈及对外政策之外，(经济部长贡纳尔)朗格先生发表了他 490 自己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区前途的看法和忧虑。<sup>③</sup>

---

① 1963年8月7日。

② 1963年8月9日。

③ 1963年8月10日。

在斯德哥尔摩所进行的通常观光活动中包括了对著名的市政厅的访问,人们在那里为我们举行正式午宴。除了上述活动之外,我们在可以被称为瑞典的契克斯别墅的哈普松德别墅受到了此行中最令人快意的款待。我们在下午五时到达,

在花园中走走坐坐,并且继续进行完全非正式的商谈。哈普松德是一幢十分漂亮的房子——是古瑞典田宅式的,建于古老的领地之上,有着美丽的花园和农舍。七时进晚餐——吃小龙虾和荷兰杜松子酒!这是瑞典迎接小龙虾季节的老风俗。歌声悠扬,一派欢乐气氛。参加晚餐的约有二十人,其中包括瑞典驻英大使尼尔逊先生和夫人、我国驻瑞典大使和夫人、保守党领袖、一个实业家(沃林格)等人。真是一个十分惬意的夜晚。①

星期天天气极好,温暖如春,阳光灿烂。

十一时上教堂去。教堂建筑很优美(北半侧是十四世纪的建筑,其余是近代的)。座无虚席。歌咏好极了。举行了“圣餐前”仪式,以讲道和唱诗收尾。

乘车前往格里普斯霍尔姆古堡——一个美丽的小镇——十分古老,饶有风味。晚上乘船由斯德哥尔摩到德罗特宁霍尔姆宫。(新近发现的)剧院是十八世纪的瑰宝。观看了一出可爱的小歌剧(《音乐大师》)的出色演出后,吃了一顿冷晚餐。总而言之,这一天过得舒服极了,不大谈政治,游览了很多地方。②

次日大部分时间用于觐见国王。“他虽然年逾八十,还是精神矍铄、见多识广。”③

除了外交部的日常电报之外,没有从伦敦接到什么消息,不过随着这次有趣的假期的结束,我有必要对将来作出一些具体的决定。丹宁报告尚未接到,但是我相信它的内容不会使我们严重担

① 1963年8月10日。

② 1963年8月11日。

③ 1963年8月12日。



虑。当我有时间在桦林居家中去细细考虑时，感到需要加以解决的一些问题似乎变得更加明确了。

问题是要就两点进行选择：（一）在议会复会之前的那个星期中——约在10月22日左右——辞职；（二）继续干下去，并且进行竞选，还要在党代表大会上这样声明。我不大愿意在从11月到圣诞节的令人厌倦的八周中，于下院党团种种作梗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然后再在圣诞节辞职。除非在国际上能作出某些重大成就，多干这两个月是不值得的。所以问题就是在10月底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或一直干到大选，并进行竞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sup>①</sup>

然而这个问题却由于即将出现的第三个可能性而变得复杂了——那就是：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我将在下次大选中领导我党。

此时我开始感到自己经历过的所有艰辛在自己的健康上严重反应出来了。我对事物的反应似乎不象过去那样敏捷，开始感到一种麻木不仁，这肯定是即将害病的预兆。我幸而得以在约克郡休假十天，先是到博尔顿艾比去，那里有一群讨人喜欢的同伴，还有很多松鸡。大卫·戈尔也是应邀的宾客之一，这使我有机会同他商谈一下总统会不会同意和俄国人谋求进一步的“缓和”。要促使法国人和德国人去作新的努力就需要英美两国出大气力。不过我们要不是乘核禁试条约所取得成就这股劲而再接再厉，就似乎可惜了。我从博尔顿艾比前往斯温顿处，我们进行了三天的射猎游戏，好不有趣！我对于斯温顿勋爵的才智和经验极为信赖。他对我怀有真正的好感，他对事物的判断是完全不偏不倚的。我和他多次争辩后，终于把立即辞职的念头打消了，因为辞职表示软弱，而且几乎是自认失败。

禁猎区的新鲜空气使我的头脑清醒一些。凡是可能使我不体

<sup>①</sup> 1963年8月16日。

面地结束长期首相生涯的措施，凡是使自己显得害怕去应付任何面前的困难的措施，我都决心不去采取。我不愿意被历史说成是一位被伦敦阴沟中涌出的污水所淹没的首相。从而，看来此刻显然仅仅存在着两个选择。第一，在布莱克普尔宣布，我将在大选前辞职，这就是说必须在次年春或1964年秋。我将仿照丘吉尔，让我的继承人选择辞职的日期。另一办法是：我将宣布自己决心继续执政，并带领我党参加下次大选。赞成第一个方案的理由是以这个事实为根据的：我次年就要七十岁了，在青年人令人赏识的时代中，人们对年龄大的人是不大尊敬的，年龄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不利因素。的确丘吉尔那时年龄比这更大，不过他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我还感到十分疲乏，而且已经有了一些健康衰退的麻烦迹象。反对第一方案而赞成第二方案的理由也很充足。无论是从我党的观点看来以及对个人效忠的观点看来，这个办法会鼓舞我们的支持者。而且，这将免掉物色新领袖的困难问题。我的情况不如丘吉尔，他的继承人已经指定多年了，而且没有什么有力的竞争者可与之相颉抗。

我在契克斯度过了9月份的大部分时间。多罗西仍然远在苏格兰，除了我家里的人偶尔来探望我之外，我是一人同值班的私人秘书住在一起的。在此期间，大臣们、特别是同发表丹宁报告所产生的问题有关的一些人，自然是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我在本书中已对该报告作了交待。不过随着光阴一周又一周地荏苒而过，我的忧郁心情开始与日俱增了，虽然手头有很多日常工作，我却闷闷地思念着前途问题。不过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就变得越加有必要去作出决定，因为迟早总得要去澄清报界的猜测。我于9月5日在日记中写道：

我开始对于自己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了。我一定要呆下去，以处理丹宁勋爵的报告以及议会中的辩论——大约在11月初。不过我

不可能继续干到大选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我开始感到自己缺乏这样的精力，或许另一位领袖能担当起我在艾登离职后所挑起的那种担子。不过一个平庸的政客是办不到的。这需要一个目光远大、有道义力量的人。<sup>①</sup>

我于9月5日写信给女王，内容是对她邀请我于这年稍晚时候到巴尔摩拉尔去玩表示谢意，并且还把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总形势向她作了一些汇报，我还说：

我还得去应付的另一主要问题是关于政局、党的领导人选和本届议会的任期。对于这些事情应如何加以处理，我在自己的思想中尚未作出决定，一旦我的思想比目前更有条理时，我就要向陛下再写一封信。

在这几个星期中，我注意到

哈罗德·威尔逊的确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运动——地价以及行政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干扰——看上去都相当有名堂。可是我们并未作出什么反应。<sup>②</sup>

于是我在9月15日向这时担任党主席的伊思·麦克劳德写了一封信：

你昨天正在谈反对党。他们由于国内经济情况良好、社会充分就业、签订了核禁试条约以及从整个英联邦传来的总的说来是好的消息而一筹莫展，就转而对司法工作说了许多无聊的话，而且还对我个人加以攻击。从今天的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现在格里蒙德和威尔逊俩人都开始照这个方针大力进行。我认为这很不错，它正是医生们开的药方，有助于使我们的人重新团结起来。

在此同时，应该对他们作认真的回答，这不应该由我而应该由某些支持我们的人来回答，因为我要把话留到党代表大会时去说。总检察长或是副检察长或是内政大臣是否可以好好来回答他们？要不然，假如你

---

① 1963年9月5日。

② 1963年9月8日。

自己不论在什么地方发表一次谈话,那就更好了。

494 9月11日晚,巴特勒来访,

我们于晚餐前后对局势作了长谈。我十分小心谨慎,不让他意识到我将在几个办法中选择那一个。……可是我却对他的立场摸得很透。(如果我辞职的话)只要大家普遍赞同,他自然会同意担任首相。不过他不愿意再冒一次竞争失败的危险。<sup>①</sup>

此刻一桩凑巧的趣事使政界的气氛大为轻松。

自由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马克·博纳姆·卡特被轰下台来,大家根本不让维奥莱特小姐发言)结束时成为一出滑稽戏。<sup>②</sup>

不过我于次日写道:

现在哈罗德·威尔逊正对我个人进行猛烈的攻击——罪名为“败坏和腐化政治生活”。我并不重视此事。我想威廉·哈利爵士接着就会随声附和他。<sup>③</sup>

除开东南亚的形势有些可忧之外,情况是相当平静的。

我担心印尼政府也许会通过没收我国的有价值的投资(壳牌油公司,尤尼利弗公司等等)来对我国作出反应。不过我不相信他们真的要冒同马来西亚发生战争的险。特别是在沙捞越和婆罗洲,他们肯定会试图进行颠覆等等。<sup>④</sup>

当外交大臣来找我商量这些事时,我同他谈了我自己的态度。霍姆勋爵

对于我竟会想退休感到十分难过,但是他颇能明白我要这样做的原因,而且感到其理由充足。……(他)担心党内会发生彻底的分裂,接着就要发生大麻烦。我可能不得不呆下去。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被选拔出来’的——不是‘恋栈’。我不愿意被人家看成死抱职位不

---

① 1963年9月11日。

② 1963年9月14日。

③ 1963年9月15日。

④ 1963年9月18日。



放”。<sup>①</sup>

这时此项新计划就要形成了，我的主要同僚们已经开始明白其含义了。要是我于1964年1月或2月辞职的话，大家自然将会极力猜测谁可能当上继承人。9月20日，我觐见了女王，我先告诉她关于生产上升和失业下降的可喜经济状况，我接着便说明自己打算

于10月12日宣布：今年将不举行大选，我也将不领导我党进行竞选。这样就要在1月或2月份进行人事更动。女王表示完全谅解我。不过我想她是十分难过的，（也许）有几成是由于想到失去一个已经熟识的首相，但（无疑地）主要还是由于考虑到任命继承人时所产生的困难，它会使国王深深地卷进去。我们对各种可能性作了一些商谈。她感到维护王权完整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她请某人去组阁而这个人却失败了，这将带来什么伤害呢？这种情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的确几乎一度还成为无可避免的现象。要是一切都能象我自己所碰到的情况那样一帆风顺，那自然就要好得多了。<sup>②</sup>

这便是博纳·劳于1922年所采取的办法，

当时他拒绝在自己被选为保守党领袖之前接受国王的委任。在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垮台之时，情况毕竟还是相当纷乱的。博纳·劳已经退休了。张伯伦任保守党领袖。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博纳·劳不应该提出这个条件，国王也不应该加以接受。<sup>③</sup>

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这项王权，它在过去曾经起了这么多的作用，在将来可能还是极有价值的。我于觐见后不久于9月25日向迈克尔·阿迪思写了如下的便简：

我将遵照自己的诺言，在10月12日（星期六）于布莱克普尔发表演说之前写信给女王。根据你自己说的话，我明白届时你将要离开这里。

---

① 1963年9月18日。

②③ 1963年9月20日。

我于日前到休亨登去。我提到这事只不过向你提醒一下，(也许你也知道)在那里的教堂里有一块碑，上面刻着：

为了纪念敬爱的  
比康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sup>①</sup>  
他的感激的君王兼朋友  
皇家科学院及协会会长维多利亚  
特立此碑

“其言善者王者所爱”《箴言篇》，<sup>②</sup>第26章，第13节。

在苏塞克斯的霍斯特德·凯恩斯市有一所漂亮的古诺曼式教堂——圣贾尔斯教堂。到时候，教堂的墙上自会有空的地方可以写下名字。

同时，我准备随时服从女王陛下的召唤。当女王从苏格兰回来时，我大概将照通常方式去觐见她。

这项计划——打算在1964年初辞职的计划——至少在原则上已经大体决定了，于是我就去处理继承人的问题。不久就可以清楚看出，那个似乎是最方便的解决办法，即象丘吉尔于1955年那样静悄悄地辞职，让新任的首相自行选择日期的这种做法有其严重不利之处。就丘吉尔而言，继承人选是确定下来了，唯一需要决定的是日期问题。就我的情况来说，一切都会陷入混乱之中；自议会于1963年10月间复会起一直到1964年初我任职的最后一天为止，将会不断产生分歧和阴谋。而且，我或者我的任何顾问越是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就越似乎感到没有把握了。在报上以及在私下的谈话中，都提出了不少继承人选的名字。我个人是属意于黑尔什姆或麦克劳德，而尤其是中意前者，因为我感到这两位是党内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们是我毕生所鼓吹的迪斯雷利激进保

① 比康斯菲尔德伯爵是迪斯雷利的封号。——译者

② 《箴言篇》是《圣经》之一篇。——译者

守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我不得不抱歉地承认，我不认为巴特勒会在大选中获胜或者能够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黑尔什姆，并且表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继任人选。不过我们两人自然都明白，如果女王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将采用1956年艾登辞职以后实行的那个办法，虽则咨询的范围可能要加以扩大。

但是，即使我还在坚持这项计划之时，我已经开始慢慢地对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感到怀疑了。甚至在丹宁报告为大臣们完全昭雪之后，

我仍然感到自己决定不参加大选是正确的，虽则我极其不愿意紧接在普罗富莫纠纷之后就这样做。不过我希望大家会理解我的决定和这一事件完全无关。总之，我知道内阁和党内广大群众都会感到很难过，所以自己颇想改变主意。这个日期——10月12日——（或者其实不如说是10月8日的内阁会议）日益逼近了。我一直在闷闷地思考这桩事——幸好我在契克斯的这个期间（三四个星期）使我有机会去悄悄而冷静地去思考这一切。<sup>①</sup>

在10月初的几天里，各方面都向我发出了呼吁——大臣们、前任大臣们、普通下院议员们；我一定要不惜一切牺牲继续任职。我于10月6日在日记中写道：

昨晚通夜未眠。……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主要的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继承人。不过在党内，特别是在地方党组织里，还存在着赞成我继续任职的日益增长的情绪。这将会在布莱克普尔的大会上显示出来。我已经写好了发言稿——在结束时留下六七分钟时间来谈一下个人的事——是去职还是干下去呢？要是自己不干的话就会使所有这些从上到下的忠心耿耿的人们大失所望。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十分不快；在另一方面，假如我呆下去的话，也许就有丢脸的可能，那时大家就会

<sup>①</sup> 1963年9月18日。

说,都是由于这匹恋栈的驽马才把事情弄糟了。①

同日下午,我同我的儿子莫里斯就这问题商量了好久。

我正(在最后一刻)开始转而倾向于继续干下去了——再干二三年。莫里斯说,虽然很难在第四次竞选中取胜,不过可能通过人们一阵热情做到这一点。……我们毕竟为他们带来了繁荣及和平。②

498 同日晚上,我同霍姆单独共进晚餐。

我们一开始就讨论在东—西方关系上究竟有没有一个真正向前跨进一大步的可能性。他并不太抱希望;但却向我提醒了去年在核禁试问题上的形势,法国人自然是反对缓和的。(除非是由戴高乐来倡议和指导)在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人的态度要好得多——虽则阿登纳——即使在退休之中——和布伦塔诺肯定是会作梗的。真正的困难在于:(一)随着本届议会的结束,我在大不列颠的势力正在衰退;(二)总统处于同样的景况。更糟的是,在这里得人心的政策(核禁试条约等等)在美国并不是得人心的。总统好得很,一直跟着我们办。不过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他会更加担心到他的政策对大选的影响了。反正我们过去的确获得成功过,我们还是可能再度取得成功的。③

在我个人的问题上,虽则霍姆总的说来是赞成已经在大体上提出的计划,即,我将在布莱克普尔宣布该年秋天不举行大选,我本人则将于次年退休。

不过他(和我)却开始纳闷这在事实上是否办得到。这就意味着:从10月12日迄至(约)1月份的第一周(共三个月)的这个阶段中,我将成为一个(被自己)判处死刑的首相。整个局面会不会就此瓦解呢?我们感到,如果我在星期六宣布自己将不参加竞选,就无法阻止大家立即开始去寻找一位领袖而不遑顾及其余。在另一方面,要是我宣布自己决心干下去,这将会被接受——而且还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不过还是有一部分有实力而且能起哄的少数派。要耗费极多的精神和体力才能制服他们——而且还要苦战两三个月。④

---

①②③④ 1963年10月6日。



我和多罗西此时已回到伦敦，并且搬回唐宁街去住。即使海军部大厦有许多优点——房间较考究，光线较好而且使人感到地方比较宽敞——我还是乐于回到唐宁街十号去，这幢房子已经修复而且甚至有所改善了，不过还是保持着其富有历史性的过去的全部风味。

部分报纸以及党内某些人的激动情绪又重新抬头。不过在同 499 时，我的私人秘书蒂姆·布莱却报告说，内阁中大多数人希望我留任。

早上乘车到伦敦去。我首先同布莱谈话，他告诉我说，内阁正重新热情地团结于我的周围。只有一二个人例外。在上午我见到巴特勒——他显然希望我干下去，因为他——从内心说来——不指望接任而且害怕此事。接着来访的是大法官（迪尔霍恩），他一心一意要我干下去——“战斗的号召”。总督导员——表示一接到命令就立刻投入战斗。接着来的是邓肯·桑兹——他是毫不犹豫地支持我的，而且忠心耿耿。<sup>①</sup>

奥利弗·普尔于五时半来访。他对我极有帮助，而且一直是足智多谋的。

我对他说，我现在开始认为除了干到底之外别无选择——而且还由于下列原因：

一、我会显得象是“临阵脱逃”，这特别会影响到下院中的“边沿”席位。

二、我将显得是屈服于不满集团，他们是受着个人好恶或者纯然反动的情绪所支配的。

三、将使我党陷入完全分裂状态——有一部分人支持巴特勒、一部分人支持黑尔什姆、一部人支持莫德林。<sup>②</sup>

普尔深受感动，他不认为这种办法是对头的。在此情况下，我党在大选中极可能败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一面

---

①② 1963年10月7日。

是不利于我的继任者，另一面对我说也是丢脸的。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屈辱呢？我是无法挽回局面的，由于我还得在下院的大吵大闹等情况中度过以后的三个月，不可能挤出时间来作补救。<sup>①</sup>

晚上稍迟，

500 大法官、巴特勒、霍姆、桑兹也来参加商谈。长谈之后还是得出同样的几点结论。邓肯极力主张我留任。亚历克·霍姆模棱两可。……邓肯留下来吃晚饭，总督导员接着来了。如果我决定干下去的话，显然会得到内阁的完全支持，不过有几个人将会十分不快，他们部分由于替我着想，部分由于替党着想。<sup>②</sup>

巴特勒和霍姆又写来了一二封信，不过我十分明白，我的所有同僚都会同意我所提出的任何办法。大法官还是同往常一样地鼓舞我，帮助我。

10月7日晚，我坚决地作出决定，要留任下去，并且还要参加大选。我打算于次日早上把我的这个意图通知内阁。内阁需要开会处理日常事务，并且听取我的声明。会后，大多数大臣们将前往布莱克普尔，我也将于该星期稍晚一些时候到那里去。

回顾到这二三星期中犹豫不决的情况时，我对自己的举棋不定深感震惊。我甚至在自己一生最困难的处境中，也从来没有过拿不定主意以及无必要地征求他人意见的情况。在这整个阶段中——即我于9月初从约克郡回来以后——我一直感到紧张、不安而且出奇地缺乏控制事物的能力，而且往往在不适当的时候想打瞌睡。我认为这是由于疲倦之故，不予注意。不过现在我确信这些衰弱现象就是自己即将害病的征象。我的医生约翰·里查森爵士正在休假，我不想叫他回来，也没有请教其他医师。不过当我经过了这些不寻常的宕延和犹豫之后，终于决定继续任职并且参加竞选时，感到大大轻松了。我的妻子自然完全同意我的主张。虽

<sup>①②</sup> 1963年10月7日。

然她本来对我的体力感到不放心（她也许已经看到了我这种奇怪的懒洋洋的现象），此刻却由于我重下决心而显得心宽了。

我昨晚就寝时已决定通知内阁，说我已经决心继续留任并要参加大选，而且要求我的同僚们给以全力支持。我将说，我充分了解存在的困难，不过我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sup>①</sup>

由于人们对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写了不少往往是不正确的文章，我有必要去详述一下经过情况。恰巧就在我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并受到内阁完全支持之当天就病倒了，这的确几乎是难以相信的。某些评论家认为事情经过难以取信于人。一个著名的专栏作家卡桑德拉说我的病是假装的。我但愿他自己永远不会吃上这样的苦头。10月7日夜间，我已经决定继续担任首相并要再度去争取人民的批准。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却已经身处医院之中，并且已经受到外科医生的初步诊察了。

我在半夜（或者说在晚上较早的时刻，当我们正进行热烈的讨论时）发觉自己无法通小便，而且想要通便时便感到剧痛。我不断痉挛。……多罗西来照顾我并且请了一位医生——金—刘易斯博士（约翰·里查森爵士正在温德米尔度假）。他终于在早上四时左右到达，并设法把一个器械伸入我的膀胱导尿，来解除我的痛苦。不幸膀胱中的小便不断地满了起来，迄至八时左右，情况恶化了。金博士又来为我想办法。他答应我要在下午一时前请来这方面的最了不起的外科医生（A.W.）巴德诺赫先生。

内阁于十时召开会议。议程很多——评定救济标准、罗宾斯关于教育的报告等等。我在中午时把后面的议程搁起来；叫内阁秘书们离开（除了伯克·特伦德爵士之外），把问题简单地向内阁说明并宣布我的计划。（我说）由于我明白大家在我面前不可能畅所欲言，所以我退出了会场。（这个“计划”当然是要在布莱克普尔宣布，我将领导我党参加大选。）这时，我（根据金—刘易斯博士所说的）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病将是

<sup>①</sup> 1963年10月8日。

很严重的。他希望在几小时之内就能够恢复正常通便。也许可能避免或者推迟更为彻底的治疗办法。当然金博士当时为了使我镇静,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并且没有谈有关的情况。他认为只是星期六要到布莱克普尔发表演说而已。可是,在举行内阁会议的过程中,我因痉挛不得不两度离开会场,感到人很难过。巴德诺赫先生于十二时三刻到达。他又把器械插入膀胱进行导尿。他同金博士会诊后告诉我说发病的原因是(由于良性或恶性肿瘤所引起的)前列腺发炎,必须进行治疗。已经以电话通知里查森爵士,他将于下午四时左右抵达伦敦。大家同意于下午六时开会决定行动方针。同时(于一时半左右)我从总督导员那里听到,内阁(除了一人之外)已经同意全力支持我继续干到大选以后。……

这天整个下午,时而感到阵痛,时而又轻松一阵。我们于六时半至八时还设宴招待属员们,以庆祝迁回唐宁街十号房子。我在医师开会并作出决定后还设法出席了宴会。医师们决定我立即住院动手术。

在这天晚上的其余时间里,情况相当混乱。我同(在布莱克普尔的)普尔勋爵通了电话。巴特勒来看我。我同莫里斯及二个女儿作了谈话。

晚上九时,我在剧痛之中前往医院(爱德华国王军官医院)。巴德诺赫先生来了,我立刻进手术室。他在那里放了一只导尿器来导尿。这使我松了一些。

经过一般的医疗处理后,我被置于床上,约于夜里十一时半入睡。<sup>①</sup>

在我于10月8日晚离开唐宁街十号之前,哈罗德·埃文斯就正确地坚决主张向报界公布事实真相。所以这就成为次日上午的“头条新闻”。第二天外交大臣和大法官来探望我。恰巧霍姆即将作为当年保守党全国协会主席而主持布莱克普尔大会。在他们两人以及我的出色的私人秘书帮助之下,我们办妥了不少事情。

一、写就一封由亚历克在星期五去宣读的信,信中清楚说明,虽则我原来决定继续干到大选以后,但现在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了。

二、此信由女王批准。

<sup>①</sup> 1963年10月8日。



三、写一封信给女王,把情况大略地介绍一下。

四、我已经——在患病之前——从总统那里接到一封写得极好的信,内容涉及我在促成核禁试条约中的作用。是否可以把这信内容向大会宣读?或是以其他方式予以公布?大卫·戈尔将征询总统的意见。(该函系于10月13日向大会宣读的。)

五、关于我退休以及继任者接任日期的一些大体的方案。如果黑尔什姆要成为逐鹿者之一的話,他就必须立即放弃爵位,并且去寻找一个可以代表的选区。

我设法在该日完成全部未了的日常工作。多罗西于下午来了,莫里斯是上午来的。

今晚六时半来了一大批医生及其他人——两个外科医生、两个内科医生,一个住院医生和一个麻醉师。在日里,还进行了验血、心脏检验和肺部X光透视等等,这都是相当痛苦的,因为随便动一动便苦楚非凡。

中午,排尿管堵塞——可能由于血块或杂质或某些设备故障所引起——于是不得不对它又进行一次教人头痛的清洗——这是由住院医师来处理的(我认为他处理得很好)。

我记了日记,读了圣经。<sup>①</sup>

也许最好还是根据我自己设法于10月12日记下的内容,来继续叙述这个经过情况。

10月10日: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我记不得是怎样从病房被送往手术室的。迄至下午一时,一切都结束了。不过我不大记得这天其余时间以及次日的情况。

10月11日:多罗西上下午都来过。其余的人也要来,但是不成。我只能写几个字。

10月12日:可怕的一天——不断“痉挛”,这是很痛苦的,但幸而并不危险。

这时的国家大事……已非我力所能及了。我对于自己的去留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且对任何事以及对任何人都没有发出指示。我让巴特

<sup>①</sup> 1963年10月9日。

勒主持政府工作,不过一当我自己能够视事时就要收回这种权力。但是我担心大家正为争夺党的领导权而进行着种种阴谋和斗争。那些亟欲把我排挤出去的人或许此刻能够看出此种做法的害处了。我深深希望这种公开的争吵不至于损及党的形象。

今天多罗西和莫里斯来作片刻的探望——不过我身体十分衰弱。女王又打电话来了——这是第三次。外科医生已在医院里把情况对她说了。皇太后也打了电话来。不过那天很糟糕,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

这次不幸的命运打击来得也太不巧了。要是它早一个月发生,继承人的整个问题可能已经援引过去的惯例而悄悄地解决了,根本用不着向党大会提出,也不至于在布莱克普尔弄得人心惶惶。要是它晚一个月发作,那么党代表大会可能已经圆满地结束了,我就可能已经宣布自己打算干下去了,而病发之时,我也仍然可能有条不紊地辞职了。最后,如果就象丘吉尔和艾登的情况那样对于继承人人选多少有点把握的话,即使这样不巧的事情也可能不至于引起什么问题。可是这些事件并在一起就产生了极度的混乱和紧张情绪,而且,唉!还对党造成了损害。这在当时,而且在以后都一直使我极感痛苦。政治上的死亡总是不愉快的;不过在我的情况中,这事发生得也实在太不是时候了。

这项公告是由霍姆勋爵以大会主席身份宣告的,说我的辞职是势在必行了。我是于动手术前夜,在下述口授的备忘录中授权他这样做的:

要是在你主持的布莱克普尔大会上说明我由于本星期不能和他们聚会而感到十分遗憾,我将感激不浅。我本来特别盼望召开这次在星期六举行的大会,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而且这次大会更可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不管我先前的想法如何,现在很明显,我在体力上将无法挑起领导

---

① 1963年10月12日。

我党参加下次大选的重担。假如我将于明天动的手术进行得顺利的话，显然还需要相当期间的休养。我将不可能应付漫长的竞选运动的种种工作。也不可能期望再继续担任首相的工作，我已经把这情况上奏女王陛下了。 506

在此情况下，我希望不久可能在党内就今后的领袖人选问题，依照一向的办法进行咨询。

你作为大会主席，我特向你写信，请你尽早宣布此事。

于是不少的候选人就开始竞相逐鹿了。

同时我写就一篇告别书，它将于大会最后一天向大家宣读：

作为每次保守党代表会议特征的大规模群众大会即将召开，我感到极为高兴，我知道在霍姆勋爵和巴特勒先生主持之下，它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不能亲自出席，自然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会想念你们，我还要通过大会主席之口，向你们提出自己的这么一二点想法。

自从我首次参予议会竞选以来恰巧正好是四十年。在这整个期间，我一直看到了保守党稳步走向实现我和第一次大战以后还活着的朋友们以青年时代的满腔热情为我党设想的宏伟目标。我们在当时回顾了现代保守主义的伟大奠基者的遗烈——皮特、坎宁、尤其是迪斯雷利。我们认识到在有些阶段中，保守主义曾经陷入一种与这伟大传统不相符的僵硬状态。即使在两次大战之间，它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现代世界中的种种国内外问题。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各届工党政府都完全而且悲惨地失败了。只有一个伟大形象——丘吉尔的形象——显得鹤立鸡群。不过从1942年以来，我总算活着看到了我们所梦想的党形成了，它是名副其实地民主的，它的组织是广泛地根据选民的意志而建立的，它的候选人不是由于其财产或地位，而是由于其才能而被挑选出来的。我看到了我党的政策发展成为介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极端之间的实事求是而明智的折衷办法，而个人主义是我党在其全盛时期所一贯主张的。我看到它通过不断增加人们的空暇时间以及不断发展教育制度，为我国人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舒适生活和福利以及过良好生活的机会，这种空暇和 507

教育制度是我和战友们在几乎五十年前跋涉于佛兰德<sup>①</sup>的泥泞地时所无法想象的。这场沉默的、保守党的革命便是这样地发生了。在这同时，我看到了英国冷静而且毫不踌躇地应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变化，有信心地把它的旧帝国改造为目下的英联邦，同时照样在世界中起着有影响的作用——总是巨大的，而且有时还是有决定性的。

第二次大战结束迄今几乎已是二十年了，我凭着保守党执政十二年的可靠经验，预见到了一个新的景象——一个变化了的英国，一个变化了的世界。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确必须欢迎——变革。但这不是为变革而变革。不是意味着抛弃英国人民通过长期经验而知道去尊重的道德和宗教价值的那种变革。保守党一贯有信心去尊重历史教导我们去敬仰的东西。不过它也有勇气去抓住新鲜事物，这样在我国国家生活中，就不断地进行着更新和再度注入新力量的过程。

今天，当我国在一个动乱的世界中，面临着这么多的责任和这么多的机会之际，如果要保证自己能负起这些重责并且能抓住这些机会的话，我们就需要这双重的激励力量。希望你们人人下决心去证明自己是够得上这个要求的。

上帝保佑大家。

虽然我是在10月10日进行手术的，我直到10月18日才正式辞职。我还无法觐见女王，不过我熟知宪政历史，明白自己职责所在。她完全有权要末就请任何一位保守党政治家去组阁，然后让他把初步试探结果向她汇报；要末就任命他为首相，在后一情况下，他就将立即吻她的手表示谢意。她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王权去采取上述任一种办法，而毋需找卸任的首相商量。这已有过508 清楚的先例：当格拉德斯通辞去最后一任的首相职位时，维多利亚女王并未征求他的意见就任命罗斯伯里勋爵为首相。博纳·劳明白表示自己病得过重了，不堪受国王的咨询，不过，宫廷已经明白

---

<sup>①</sup> 佛兰德包含法国东北部及比利时部分地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译者



通知我们说，女王将征求我的意见。我到底已经为她服务将近七年之久，她希望我帮助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样我就变得有必要去做自己本来想去避免的事——卷入了我的同僚们从布莱克普尔大会回来以后所存在的局面中去。由于我仍在卧病之中，因休克和衰竭而极度疲乏，我原是可以更加轻易地援引博纳·劳的先例，拒绝提供意见。我郑重地考虑过这个能避免掉极其麻烦责任的办法。可是在三思之下，我感到这是一种卑鄙的回避办法，对女王、对我党都是不应该的。不过我知道无论自己怎样做都会引起许多责难，而且一定会引起有关我的行动的种种或真或假的传说。不管怎样，在我的忠诚的属员们的帮助下，我一定要对整个事情经过作出详尽而精确的记录。

我在动手术后的短短几天内，在半麻醉的昏迷状态中卧于床上时，突然浮现一些怪念头。由于一个奇怪的命运作弄，我们此刻即将陷入的严重困境完全由于极其不可思议的偶然因素。要是韦奇伍德·本先生能心满意足地跟着他的父亲也转到上院去的话；要是在1962年任命的联合挑选委员会不能迅速而且意见一致地提出报告的话；要是我党的政府不但不让那些继承爵位的人们，而且也不让那些现存的贵族们去放弃自己的爵位和特权的话；要是已经下院批准的这项政府建议能为上院所接受的话——政府曾经建议，新体制要在本届议会解散之日起才生效，而在上院则以四比一的多数票压倒了前座议员的主张，通过了要使法案从国王批准之日起即告生效的修正案；要是不能在距这次危机仅有十周的时候，即1963年7月31日之前，在议会通过议案并且得到国王的批准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困难就都避免掉了。黑尔什姆勋爵也好，霍姆勋爵也好，甚至在实际上都无法被考虑为首相候选人；巴特勒一定已经在几乎无人与之竞争的情况下继任首相了。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往往就是系于象这样的一线机会。

我的医生和外科医生要求我绝对保持安静，并且对我警告说，如果违反他们的劝告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就会影响复元或甚至危及复元。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可是我却无法完全袖手而什么也不干。于是我于10月14日终于能够见到了总督导员和普尔勋爵。不过我由于过于衰弱，仅能听取他们报告自己关于布莱克普尔大会的印象。

此时我已经决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当艾登辞职之际，当时的枢密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大法官(基尔穆尔勋爵)曾逐一征询过内阁阁员、总督导员、党主席和“1922年委员会”主席的意见。把其结果向女王作了报告。而且还把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召到宫中去。曾经有人感到，这样做法的局限性过大。所以我建议应该征询下列人的意见：非阁员大臣们以及政务次官们；上院中一贯支持保守党的人们；下院中所有的保守党议员。此外，还要向各个党组织征询意见。于是，我在10月14日晚就我所认为应该遵照的办法，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将其发给巴特勒和其他主要同僚们。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最好地去执行惯有的征询意见办法。你已经向我告诉了你对此事的考虑，如你所知那样，我已在今天见到了大法官、总督导员和作为保守党联合主席之一的普尔勋爵。

510 我认为应该把我的这一意见记录下来，即照下列办法来进行试探是正确的：大法官去找内阁阁员商量；总督导员去找所有其余的大臣们和下院议员；圣·奥尔德温勋爵去找一贯支持我党的上院议员们，而普尔勋爵则将找切尔默勋爵和代表全国协会的谢泼德夫人商谈(而且还要把全国协会的候选人包括进去)。

这种咨询工作将需要一两天时间。一当磋商结束，我将乐于听取其结果，并将在此时根据自己健康情况，决定所采取的步骤。

我可能会亲自接见有关的人，或者可能希望作出其他安排，以使他们的意见协调起来。我将会让你知道我的决定。

我极为盼望我们在明天即10月13日，星期二，举行的会晤。不过我认为今晚向你发出这份备忘录可能是有帮助的。

我也把这份备忘录的副本送交大法官、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总督、圣奥尔德温勋爵和普尔勋爵。

## 此后

我晚上感到好过些，一共几乎睡了七个小时——略服了安眠药。各种痛楚都平息下来了，或是正在改变发作的部位。我对于这些近代麻药折磨人的厉害作用感到惊讶。它们似乎使人遍体刺上尖针，凡是针所触及之处，就感到痛楚。<sup>①</sup>

10月15日，十点钟敲过不久，巴特勒就来见我。我向他出示那份包含着我的指示的备忘录，我希望他向全体内阁宣读。他似乎相当乐意地答应了。<sup>②</sup>

这天稍晚，我接到了巴特勒的报告。

我感谢你于10月14日就党的领导人问题按照惯例征询意见的备忘录。

我们于今晨会面时，对此加以讨论了，并且同意让我向内阁宣读。我今天于议程结束时这样做了。他们都一致认为，这是正确的办法，我想你会乐于听到这一点的。

我正把这份备忘录的副本送交其他有关的人。

同日，我不顾医生们和护士们的抗议，又完成了另一项工作： 511

这样在将来就不会搞错或者发生争论，我已经以向女王写信的形式，口授了一份包括自上星期一开始以来的情况记录。布莱将对此进行核对，并于今天稍晚时候把它带回来。<sup>③</sup>

这份文件于傍晚前完成并且也已发出了。我详述了直到自己动手术前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接着说：

---

①②③ 1963年10月15日。

在星期一早晨之前，我一直处于各种厉害的镇痛剂作用之下，以致对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很难作出清楚的分析。不过在星期一那天，我已能够对情况进行考虑，并且决定自己必须采取主动以便使可能以彻底混乱而告终的局面变得上轨道一点。虽则巴特勒先生能够代表我主持内阁以及其他各内阁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能代表我作出某些决定，不过由于他有可能成为我的接班人，这事就不是他所能处理的了。所以我于星期一晚向巴特勒先生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副本附于本信后）。这份备忘录阐明向各方面征询意见的某些步骤。……我希望在星期四上午之前获悉其结果。我获悉这些结果后，即将考虑最妥善的措施。但是我冒昧地建议陛下不必在这些征询工作结束之前为此操心。

我亟欲把迄今所做的一切事情详细地记录下来，以避免引起使前几次危机后来变得恶化的那种混乱状态，这些危机对于所有有关的人们都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相信这次事情的经过情况都可以原原本本地写入文献。……

我在结束此信之时，不能不再次对陛下在此十分困难时期对我个人的好意表示极大的感激。

既然见过了巴特勒，我就无法拒不接见所有其余的大臣们，他们来的目的部分是想谈论自己在大会上的所闻所见，部分是要对局势发表自己的看法，部分是出于好意和对我的忠诚，并且还要同我告  
513 别。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在我政府中的任期即将迅速结束了。这个过程使我十分疲乏，我同意接见他们这一做法也许是愚蠢的。10月15日晚，来的是霍姆、麦克劳德、希思、莫德林和黑尔什姆。次日上午，10月16日，我接见了桑尼克罗夫特、博伊尔、索姆斯、劳埃德、约翰·黑尔、布鲁克、基思·约瑟夫和邓肯·桑兹。我得到的总印象是：虽则对于谁接替我这一点，大家意见有很大的分歧，

不过实际上，不论这些大臣们是霍姆派还是巴特勒派或是莫特林派，大家一致同意，要是霍姆勋爵愿意担任首相的话，整个内阁和全党都会高



兴地在他领导之下团结起来。<sup>①</sup>

10月17日，我为迎接将具有决定性的那一天而极力提起精神来。我必须听取自己曾向之征询意见的人们的报告。

我在上午(分别)接见以下各人：

一、大法官。

二、总督导员和约翰·莫里森——我同后者单独谈了几分钟。

三、圣奥尔德温勋爵——上院总督导员。

四、普尔勋爵；(全国协会主席)谢泼德夫人；查尔默勋爵。

这是遵照我送交内阁并经他们批准的备忘录进行的。

午饭后(下午三时起)我一次接见了大法官，总督导员，圣奥尔德温勋爵，普尔勋爵。

这一切使我十分疲乏。我在上午花了二小时半，又在下午花了两小时来会见他们。可是六时后又开始工作了，我口授了致女王的备忘录(她可能征求我的意见)，并且还签署了正式的辞呈。我们于午夜才结束工作！蒂姆·布莱在医院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从唐宁街十号来的两个打字员整天都在这里。<sup>②</sup>

无怪乎医生们大感不安了。不过我决心不让事实受到一点歪曲，至少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这样。口头上提出的意见可能被忘记或者被歪曲。我写给女王的备忘录将存于我自己的档案和皇家档案室中，可以用来保护我的名誉和君主的宪法地位。 514

我向所有这四种人征求意见的结果是值得注意而且非我始料所及的(与我原来的期望大相径庭)，绝大多数人一下子就选中了霍姆勋爵(只有选民们的意见是例外的，他们不知道他是一个有力的后补人选，不过他们也认为，假如他被选拔的话，会受到普遍的赞同)。……有极力支持巴特勒的人，但是也有猛烈反对他的人。有大力——十分大力——支持黑尔什姆的人——但是也有十分猛烈反对他的人。至于莫德林，无论

<sup>①</sup> 1963年10月16日。

<sup>②</sup> 1963年10月17日。

是赞成或者反对的人情绪都不是那么强烈。

在内阁中，十个人赞成霍姆；三个人赞成巴特勒；四个人支持莫德林；二个人支持黑尔什姆。在三百个被征询的议员中，赞成霍姆的人最多（不是多得很，而是相当多），而没有人反对。在上院中赞成霍姆的人为二比一。有百分之六十的选民赞成黑尔什姆；百分之四十赞成巴特勒，不过选民中也存在着强烈反对他们两人的情绪。斯夫人和查勋爵确信大家都会拥护霍姆。

我起草了备忘录，我的那份副本（我准备把它保存在私人档案中）将附有一切证明文件。<sup>①</sup>

预定为我担任首相最后一天的次日是

一个可怕的日子，对我说也是十分不好过的一天。医生们提出了抗议，可是我却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那天终了时，我几乎不能执笔。

上午七时半，布莱打电话来说，发生了危急的局面，他和总督导员将于八时半到医院来找我商量。看来大家选中霍姆的消息已于昨晚传开了（有人把它泄露出去）。人们召开了各种会议。……打算由所有落选的候选人——巴特勒、黑尔什姆、莫德林和麦克劳德——搞一次有组织的反对霍姆的闹乱。想到他们彼此在最近几周中的激烈竞争，倒有点象十八世纪时代……而且也有点令人作呕。霍姆打电话来，他感到难过。他只是出于团结全党的愿望才被人请出来作为调和矛盾的候选人。他想退出去。我劝阻他不要这样做。要是我们屈服于这种阴谋的话，就要发生大混乱。<sup>②</sup>

在这种奇异而又有些梦魔般的气氛中，我决定仍然照原来计划进行。我的辞呈是于上午九时半送出并交到宫中去的。用我在那天写在日记中的话来结束自己对这段经过的叙述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女王于上午十一时莅临医院。我正在会议室里，躺于床上。在我的

---

① 1963年10月17日。

② 1963年10月18日。

右边已为她放好一只高椅。由多罗西、护士长、伯德伍德小姐（医院的秘书）、J.理查森爵士、巴德诺赫先生迎接女王，她是同迈克尔·阿迪恩爵士一起来的。大家都留在室外，她一个人进来了，步伐坚定，那副明亮的眼睛是她最好看的地方。她似乎有点激动，我也是这样。她谈到我已为她服务了这么长的时间——将近七年了——以及接到我的辞呈时感到多么难过。然后她问我她自己应该怎么办。我请她允许我把昨天已经写好的那份备忘录念给她听，而且在今晨听到某些大臣的所谓“闹乱”之后，还把最近的内容补充进去。我说自己身体还不够好，没有稿子发言是没有把握的，我也希望把写就的备忘录放进女王档案室内，以作为她可能依照我的建议而采取任何行动的充分依据。

她表示谢意，而且说除了我之外她不需要，也不准备去征求任何其他人的意见。于是我就念了这份备忘录。她也认为霍姆勋爵看来是最可能得到普遍拥护的人选，他有着极好的和最坚强的性格。不过闹乱情况如何？……我说，我认为应该迅速行动，希望她立即召见霍姆勋爵——一回到宫中就这样办。这样他就可以开始工作。她同意了。她在离开之前，为我在这件事情中以及这许多年来在涉及她个人安乐的许多其他事情中对她的关心，再度大大向我表示谢意。她把手给我吻后就离开了，手里拿着——放在大文件袋中的——那份备忘录，（当门开启时）我可以看到她把它交给阿迪恩——这使他看上去……活象个传令兵。

有一桩事情应该记录下来……我在口头以及在书面备忘录的第二部分都劝她不要在首次召见霍姆时就任命他为首相，而是采用以往的惯例，授予他以组阁的任务，这样他就可以进行试探工作，然后向她报告。她照这办了。

这样我的首相职务就告终了——1957年1月11日至1963年10月18日。<sup>①</sup>

上奏女王的备忘录描述了我所采取的步骤以及向各方面征询意见的结果，还附上一些补充意见。这份文件叙述了我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所写下的一些结论。我所补充的重要之点是我的一项

<sup>①</sup> 1963年10月18日。

具体建议：要是霍姆勋爵接受了女王的提名，他就应该引用新的贵衔法案，并且设法立刻使自己选入下院。

霍姆于一二天之内成功地组成了内阁，它包括了巴特勒、莫德林和黑尔什姆这三个主要竞争者在内，他们都团结得很好。我所极为器重的麦克劳德却感到无法参加内阁，这使我很难过。

还有不少其他任务要继续去完成，这包括提出一份适当的名单以便对辞职的大臣们授勋。并有大量来信以及丘吉尔发来的一份十分令人感动的电报，有待于领谢。我和比弗布鲁克勋爵来往的信也许值得记下来。

在你辞职所引起的悲伤过后，欢乐终于来到了！目前每天都听到你的好消息，大家深信，你的体力和健康将恢复得既快又彻底。

你的朋友们都感到很高兴。

再回来重新投身政治活动吧！你退出政府只让人觉得多么不能少了你。

要是你作为争取和平的首相而重返政府，我深信你会于大选中在全国获胜，而且也许还会取得相当的多数票。

517

我们之间仅仅存在对共同市场这个问题的分歧。但是现在此事已成过去，而且我希望从此永远了结！

我现在写这封信不带什么政治色彩，仅仅表示自己对你如此出色地克服了困难所感到的欢乐而已。

敬祝一切顺利。

我回信说：

十分感谢你十六日的充满善意的来信。

它使我深为感动。我从来不曾忘记我担任你的次官时你对我的眷顾，而且这种友谊至今一直不变。假如我以后能再度在政治上起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为了去完成你所说的那个目标。这是现时的唯一大事。俄国已经同中国闹翻了，而且对中国极为畏惧。我们必须使俄国人成为欧洲人。英国人是能够在这方面起特殊的作用的。



自然还有无数其它来信，其中有些是可以由私人秘书来答复的，不过其中有好几封使我自己花了好几个星期去作答。最令人感动的来信之一是总统写来的，这是我从他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信是在他死前几星期发出的：

在你卸下你的重大职责之际，我想通过我们之间的专用电报线路，再给你一信表示我对你的敬意。我们在将近三年的合作关系中，事无大小都是彼此配合的，彼此从来不曾有过误解或互不信任。我认为比起我们刚开始合作时，如今世界似更安全一点，而且自由世界的前途是更有希望了，我确信历史将会肯定你对这种好转的情况所起的伟大作用。

我的夫人和我一起最热烈地预祝你迅速完全康复，而且还希望以后作为要好的老朋友，再能够常常见到你和多罗西夫人。

谨致热烈的敬礼。

仅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有待解决——我自己的前途。

女王已经写信给我说，她来到医院时没有提出要封我为伯爵，因为 518 她明白我志不在此，如果提出，怕我感到为难。她在信中明白表示，假如我有意的话，她可以批准我的爵位（就是说，不是“由她建议”）。这是很大的恩宠。<sup>①</sup>

可是我并不急于进入上院。我感到自己去接受无可避免的结局，而且放弃自己在其中起不了作用的政治生活是较为适当的。我没有立即辞去下院的议席。因为没有必要在大选于一年内即将举行的情况下，在本选区中进行一次补缺选举以添加麻烦。我只在三个场合发过言，而且由于自己体力衰弱，发言时极为吃力。第一次是我在 11 月总统遇刺以后所作的讲话。第二次是我于 1963 年 12 月间丹宁报告书公布之时所作的一次简短声明。第三次是我在 1964 年 7 月间恰好在议会解散之前跟着大家对丘吉尔所致的颂词。

正当我卧病在床思考所有这些以惊人速度发展的事态时，突

<sup>①</sup> 1963 年 10 月 20 日。

然从女王那里接到了一封使人感到安慰的信。

当你于9月间告诉我说，你在下次大选之前可能不再担任我的首相时，这事似乎还很遥远；但是谁也不可能料到紧接你的决定之后就这么快地发生那样多的事，这些事态的出现肯定同你的决定有关系。

现在你既然已经向我提出了辞职，我必须再次告诉你，对于你不再担任首相，我是多么感到遗憾。

我对于亚历克·霍姆是极为信任的，他在外交部以及作为上院领袖所作出的卓越成绩更加强了我的这种信任；这两个部门以及相信他的品格和才能的外国政治家们对他将是想念不已的，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作为我在位的第四任首相，将会同样坚定而有把握地领导政府和国家。

519

然而，你连续担任政府最高职务将近七年之久。我认为这在二十世纪还是一个创纪录的事，即令别人在其他时代中的任期比这更长，但是他们的情况是不可能与现代政治生活的困难处境相提并论的。这对我而言就意味着：在我在位的大部分期间，你不但掌管着英国的政策，而且还是我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中的带路人和支持者，以及我在涉及我国宪法和我的臣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事务中的导师。

所以尽管你的接班人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不可能完全象你那样在那么多的方面作出十分慷慨的贡献，我对这些贡献是十分感激的。

在这些年中，你不得不去解决一系列涉及世界和平以及英国和英联邦本身存亡的重大和复杂问题。历史将是你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使用的卓越手腕的见证。我想，最能使你感到满意的成就也许是最近签订的核禁试条约，为了条约的签订，你和你的同僚们长期奋斗，百折不挠，这个条约为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还有一些涉及我家庭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许不大，但却很复杂——一定使你花了不少时间。你就此事不吝费心地向我提出了建议而且还帮助我去找出了解决的办法，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正如你知道的，有朝一日你将接受伯爵的封号，并在上院继续参预政治生活，即便不是很快。这是我的希望，尽管你已经不再担任首相了，不过不论你是在上院或是在下院，我将从下面这一点得到安慰 即，你作

为一个枢密顾问官和一个有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的前辈政治家，一旦有需要还要请你提供意见。

在你辞职的时候，谨向你和多罗西表示真诚的良好祝愿，并望你不久就能出院，完全康复。

很难设想再有比这更为客气而气量宽宏的君王对臣下的颂词了。

## 第十六章 结束语

从本卷最后一章所叙述的事件以来，差不多又是十年过去了。

随着我于 1963 年 10 月辞去首相的职务后，我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我并未人为地去设法延长任期。我一直感到，“知足常乐”。我在下院当了四十年的议员，又当了十七年的大臣，其中包括艰苦的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的工作，最后又差不多当了七年的首相，这个经历理应满足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抱负——和自讨苦吃的劲头。所以自 1963 年以来，我就谨慎地逐步摆脱国家大事。而且，我总是感到，当最后一场戏演完而幕落时再去接受这一真正告终的喜剧，艺术性更强烈些。终于从舞台退出之后，还继续徘徊于后台也许是自找没趣，而结果一无所获。

因此，在我长期休养结束时，即着手遍阅自己在长期生活中所收集的大量日记、信函、文件等。1964 年 8 月，我为以后可能出版的书准备了一份简短的大纲。

次年初，即 1965 年，我开始动笔。我当时自然不知道自己所叙述的内容规模究竟多大和篇幅多长。对这一点，我只能以缺乏经验和资料之浩繁为自己辩护。

如果说我在前几卷中还不过是一个旁观者，随着故事的开展，我越来越成为一个剧中人了。此外，不管自己过去的经历多么艰苦，我还是引以为乐的，因为通过我五十年从政时期的一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和戏剧冲突，我又深入一个新的脚色了。

521 当然我有几度也曾经感到灰心，意欲抛弃自己加在身上的工作重担。我的妻子于 1966 年夏病故，使我的晚年罩上了一层阴



影,因她死得突然,出乎意外,这就更其令人悲痛,甚至家属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数朋友的深情也不能完全消除我的此种悲痛情绪。由于她的品格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赞赏,得到所有认识她的人、甚至不论以什么身份和她接触过的人的深深爱戴,这使我感到快慰。

我在1969年进行了第二次大手术,这证明自己的健康又退步了。不过在我的老朋友约翰·理查森爵士的帮助下,我的精力得以恢复和维持,以完成我的这项写作任务。

我一直力图依赖当时的资料,而且尽可能根据所述及的事情的当时文献资料——包括信函、备忘录——而不是根据事后的想法来描述。为此,我主要取材于自己的日记。在其中我记载着自己当时的感想。

我也极力试图尽量客观地叙述各桩事件。自然,特别在一本自传中,还是有必要保持适当程度的主观性的。但是要尽可能地保持主客观之间的平衡。

最后,我很感谢人们对这一巨著的前五卷的良好反应。我希望第六卷,也是最后一卷,也将同样受到评论家和读者们的欢迎。

塔利朗<sup>①</sup>曾经说过,凡是不知道大革命前法国情况的人,就不可能理解“甜蜜生活”的真正含义。

对于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情况的人,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同样适用。我当然不是指在当时有着不少缺陷的社会结构,也不是指当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的分配制度,也不是指现在看来肯定是极低的健康、住房、卫生和教育的标准。我想到的是在本世纪过程中我们被夺去的和平和安全感。

内燃机的发明打破了我们的安宁。从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 522

<sup>①</sup> 塔利朗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政治家。——译者

签订到 1914 年德国侵犯比利时为止，除了一些次要的例外情况外，一直得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那个国际体制的崩溃就结束了人们对欧洲的旧观念——这在过去更由于在东西方都出现了巨人而威胁着欧洲和欧洲人的地位，在目前则又由于发展了巨大无比而无法使用的核力量所造成的不可思议的矛盾现象而使世界四分五裂。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早期是在（几乎没有受到铁路影响的）马车时代中度过的。当时甚至伦敦也有点象乡下市镇，而牛津则对其马曳的交通车感到骄傲。所有这一切悠闲和宁静都被不断来自地面和空中的噪音所淹没了。

同时在本世纪初，人们必然享有和平与进步这一点似乎是十分有保证了，而且几乎被看作是生活上理所当然的状态。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就吃了十年战争的苦头，又几乎花了十年来恢复元气和备战。

但是人类具有极大的复元能力，所以尽管有了这些可怕的障碍，几乎在一切领域中至少还是有了一些具体的进展，这情况决不是处于我童年时代的古老、宁静和安逸的国家中的人们所敢想象的。

我在这几卷著作中，试图至少对我所称为“五十年的变革”的情况作概略的描述。因为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人们从来不曾象英国人民那样地被迫去适应如此巨大的变化——而且是在这么短的期间完成了这一过程的。

社会变革；经济和技术变革；把旧大英帝国改造为新的英联邦；世界力量均势的激烈变化——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变化，使不少人一面憧憬于过去，但同时又过分地对我国的目标大加诽谤。

不过正象往往所发生的情况那样，真理也许就介乎这两个极

端之间。

英国人民长期以来怀有高枕无忧之感，而且他们在各方面都胜过别人——在贸易、工业、货币稳定性以及举世无双的海军力量 523 等方面——这是一个对于帝国和殖民地肩负日益重大责任的、实行英国式和平<sup>①</sup>的国家，这就使他们很不容易去适应新的环境。他们不会去想这种绝对的领袖地位是不会长久的。

不过我们这个岛国的人民在自己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多次经历过了激烈的命运变化。从伊丽莎白时代到十八世纪初，我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孤立的但却是非常有活力的国家，从此以后，马尔巴勒使我国成为强国。即使这样，我国也只作为强大联盟的盟主，才得以应付并且击败了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

我们只有在欧洲重新联合的事业中，才能在完全忠于自己对英联邦所负的责任的情况下再度发挥作用，以应付今后的五十年可能为我们带来的一切不测的危险，并利用其所可能带来的一切新机会。

根据我自己长期的经验或者根据我对于今日青年一辈的观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担心英国各阶层人民会在新的困难面前退缩下来，或者应付不了局势。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恢复并加强多少年代以来自己度过的这么多的艰难险阻所依靠的那个道德、精神和物质基础。

1973年5月

哈·麦·

---

<sup>①</sup> “英国式的和平”（Pax Britannica）指强迫别国照英国意旨实行和平。——译者

封面  
目录  
正文